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集

铃木博之、远藤光晓 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ISSN 2436-6471

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集

铃木博之、远藤光晓 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2024

『地理言語学研究』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 No. 8
ISSN 2436-6471

铃木博之、远藤光晓 编
《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第一集 2024

Cover photo: The Panlongcheng site, Wuhan © 2024 Mitsuaki Endo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020551
© 2024 by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発行日：　2024 年 11 月 1 日
発行者：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ウェブサイト：　https://geolinguistics.sakura.ne.jp/
所在地：　東京都渋谷区渋谷 4-4-25　青山学院大学 G1305 研究室

目　录

线上会议“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 2024”日程 vii

远藤光晓：汉藏语历史地理语言学的构想 1
远藤光晓：《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一”的汉语部分（稿） 7
铃木史己：《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二”的汉语部分（稿） 16
野原将挥：《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三”的汉语部分（稿） 26
野原将挥：《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四”的汉语部分（稿） 35
八木坚二：《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五”的汉语部分（稿） 42
八木坚二：《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六”的汉语部分（稿） 54
桥本贵子：《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七”的汉语部分（稿） 69
桥本贵子：《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八”的汉语部分（稿） 78
野原将挥：《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九”的汉语部分（稿） 88
八木坚二：《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十”的汉语部分（稿） 95
铃木博之：《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
——“一”至“十”的藏语部分（稿） 111
野原将挥：数词“一”到“十”的上古音 153
桥本贵子：数词“一”到“十”的中古音 164
远藤光晓：数词“一”到“十”的近代音 180

曾晓渝：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的声调演变 183
汪维辉、卜宇钦：“肚皮”今昔 215
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 236
宮島和也：試論上古漢語的方位詞“所”及其方言特徵 254
三輪大樹：魏晉南北朝的魚虞分合時序地圖 265
铃木博之：藏语支语言数词“二十”与二十进制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88
刘岩、黄诗淇：关于语言地图符号设计原则的思考
——以“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集”为例 297
曾智超：超越泉漳——粤琼闽语的三项音韵存古 307
铃木史己、渡部展也、大川裕子：从方言分布看中国历代的水利设施
——以“池塘”为例 324
马菁屿：看类动词表“趁”义来源探析 339
陈思捷：“蜘蛛”异名小考——从现代方言“蛛”的特殊读音谈起 350
刘婧涵：辽宁方言声调类型 362

肖能萍：黄淮地区官话方言阴平低凹调的连字调表现 381
更科慎一：乙种本《华夷译语》“来文”里的汉蕃对音 395
岩佐一枝：《华夷译语》中彝文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及其有效性 423
黄河：用残差地图呈现方言之间的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 454

TABLE OF CONTENTS

Program for the online symposium titled "2024 Forum on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vii

ENDO, Mitsuaki: Plans for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s in Sino-Tibetan 1
ENDO, Mitsua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One' in Sinitic 7
SUZUKI, Fumi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Two' in Sinitic 16
NOHARA, Masa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Three' in Sinitic 26
NOHARA, Masa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Four' in Sinitic 35
YAGI, Kenj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Five' in Sinitic 42
YAGI, Kenj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Six' in Sinitic 54
HASHIMOTO, Takako: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Seven' in Sinitic 69
HASHIMOTO, Takako: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Eight' in Sinitic 78
NOHARA, Masa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Nine' in Sinitic 88
YAGI, Kenj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Ten' in Sinitic 95
SUZUKI, Hiroyuki: *Historical geolinguistic atlas in Sino-Tibetan*: 'one' to 'ten' in Tibetic 111
NOHARA, Masaki: Old Chinese sounds for numerals ranging from 'one' to 'ten' 153
HASHIMOTO, Takako: Middle Chinese sounds for numerals ranging from 'one' to 'ten' 164
ENDO, Mitsuaki: Modern Chinese sounds for numerals ranging from 'one' to 'ten' 179

ZENG, Xiaoyu: Evolution of tones in the language of garrison immigrants speaking the Nanjing dialect of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83
WANG, Weihui & Yuqin BU: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origins of the word *Dupi* (肚皮) 215
LUO, Ziqu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ersistent markers of the *zhu* clas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236
MIYAJIMA, Kazuya: Study of the localizer "所" in Old Chinese and its dialectal characteristics 254
MIWA, Daiki: Time series maps of Yu (魚) and Yu (虞) rhymes during the Wei-Chin-Nan-Pei-Ch'ao Period 265
SUZUKI, Hiroyuki: A geolinguistic study of 'twenty' in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vigesimal system 288
LIU, Yan & Shiqi HUANG: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s map symbol design: Take the "Atlas of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297

ZENG, Zhichao: Beyond Quan-Zhang: Three phonological contrasts preserved in Yue-Qiong Min dialects 307
SUZUKI, Fumiki, Nobuya WATANABE, & Yuko OKAWA: The history of water facil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dialectal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words denoting "pond" 324
MA, Jingyu: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meaning of *chen* in visual verbs 339
CHEN, Sijie: Brief study of the synonyms of 'spider' and their etymology in Ancient Chinese 350
LIU, Jinghan: Different types of tones in the Liaoning dialects 362
XIAO, Nengping: Tone sandhi of T1 of the Mandarin dialects in Huanghuai Region 381
SARASHINA, Shin'ichi: Sino-foreign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 in the "*Laiwen*" documents of the *Hua-yi Yi-yu* 395
IWASA, Kazue: Geolinguistic analysis and its effectiveness for Yi characters in the *Hua-Yi Yiyu* 423
HUANG, He: Visualizing barrier effect and channel effect using residual maps 454

线上会议“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2024”日程

主办：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基盘（B）2023-2025 年度项目《迁徙和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汉语全时代形成史的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代表人：远藤光晓）及青山学院大学综合研究所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心

日期：2024 年 3 月 2 日（周六）至 3 月 4 日（周一）北京时间

会址：线上

3月2日（周六）

9:00-10:30 第一场 主持人：松江崇（京都大学）

远藤光晓（青山学院大学），汉藏语历史地理语言学的构想

远藤光晓（青山学院大学）、桥本贵子（公立小松大学）、八木坚二（国士馆大学）、铃木史己（南山大学）、野原将挥（京都大学）、铃木博之（京都大学），汉语-藏语数词的历史语言地图——由“一”至“十”（稿）

10:40-12:10 第二场 主持人：竹越孝（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同上（60 分钟）

盛益民（复旦大学），汉藏语数量类疑问代词：共时类型与历史演变（汉语部分）

13:10-14:40 第三场 主持人：汪维辉（浙江大学）

松江崇（京都大学），古汉语时点、时量疑问代词的类型与历时演变——上古至近古

竹越孝（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古汉语时点、时量疑问代词的类型与演变——自近代至现代

铃木博之（京都大学），汉语与藏语程度-数量疑问代词的类型与历时演变（藏语部分）

14:50-16:20 第四场 主持人：沈瑞清（新加坡国立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的声调变化

汪维辉（浙江大学），“肚皮”今昔

罗自群（中央民族大学），现代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特点

16:30-18:00 第五场 主持人：野原将挥（京都大学）
宮島和也（成蹊大学），從出土文獻來看上古漢語的方位詞“所”
三輪大樹（京都大学），魏晉南北朝方言的魚虞分合地圖
铃木博之（京都大学），藏语支语言“二十”与二十进制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3月3日（周日）
9:00-10:30 第六场 主持人：姜镕泽（中央民族大学）
刘岩、张青青（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内爆音的地理分布
黄诗淇、刘岩（中央民族大学），语音地图的符号标记原则
韦景云（中央民族大学），单音复音交替：壮语元音地理分布特征

10:40-12:10 第七场 主持人：罗自群（中央民族大学）
沈瑞清（新加坡国立大学），西汉淮楚方言与汉语东南方言的形成
曾智超（新加坡国立大学），从音变看粤琼闽语的移民史
铃木史己（南山大学）、渡部展也（中部大学）、大川裕子（上智大学），从方言分布看中国历代的水利设施——以“池塘”为例

13:10-14:40 第八场 主持人：铃木史己（南山大学）
马菁屿（大理大学），看类动词表“趁”义来源探析
陈思捷（浙江大学），汉语方言“蜘蛛”义词中“蜘”的读音与本字
戴佳文（浙江大学），吴语“脸”义词的时代层次与历史来源

14:50-16:20 第九场 主持人：周国炎（中央民族大学）
赵川莹（浙江大学），农业技术流动与词汇传播——以“插秧”为例
杨潇潇（中央民族大学），苗瑶语稻作文化词汇的地理分布
刘岩、王岩（中央民族大学），从南亚语看汉语“茗”的来源

16:30- 18:00 第十场 主持人：桥本贵子（公立小松大学）
刘婧涵（南开大学），辽宁方言声调的类型
肖能萍（南开大学），黄淮地区官话方言阴平调差异地理分布及其解释
更科慎一（山口大学），乙种本《华夷译语》“来文”里的民文-汉字对音

3月4日（周一）

9:00-10:30 第十一场 主持人：更科慎一（山口大学）

姜镕泽（中央民族大学）、王燕（淮阴师范学院），中国朝鲜语方言研究的地理语言学视角

崔桂荣（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中国朝鲜语西北方言的语音演变特征小考——以平安南道方言为例

10:40-12:10 第十二场 主持人：远藤光晓（青山学院大学）

周国炎、蒋金晶（中央民族大学），布依语“彩虹”的地理语言学阐释

鄢卓（南开大学），壮语“月亮”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陈娥（云南师范大学），布朗语的“月 / 月亮”的方言分布及特点分析

13:10-14:40 第十三场 主持人：余金枝（云南师范大学）

高天俊（华中科技大学），苗瑶语演化网重建与分析

杨晓霞（云南师范大学），语言地理类型视野下的白语声调演变

岩佐一枝（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关于《华夷译语》中彝文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14:50-16:20 第十四场 主持人：曾晓渝（南开大学）

余金枝、陶文武（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苗语方言地图集》绘制的几点思考

满欣（云南财经大学），哈尼语方言鼻韵尾的地理分布特征

刘正发、白明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地理学研究综述

汉藏语历史地理语言学的构想

远藤 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迁徙和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汉语全时代形成史的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工程计划，并说明将于 2026 年出版的《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的概要以及其中一些理论问题。

一、工程概要

日本学术振兴会 2023-2025 年度三年计划工程“迁徙和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汉语全时代形成史的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成员为远藤光晓（代表）、桥本贵子、八木坚二、野原将挥、铃木史己和铃木博之。其宗旨分别为：“历史地理语言学”要把文献语言史和地理语言学结合；“汉语全时代”涵盖由上古、中古、近代一直到现在的所有时代，也追溯到汉藏祖语的阶段；“迁徙和语言接触”则参考考古学、历史地理和遗传学的有关内容。

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亚洲语言地图集》和《亚非语言地图集》，也就是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LAA; Endo et al. eds. 2021)（分卷版可由亚非所网站下载 https://publication.aa-ken.jp/）和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LAAA) Vol.1 (Suzuki et al. eds. 2022); Vol.2 (Suzuki et al. eds. 2023a); Vol.3 (Fukushima et al. eds. 2023)。其内容分别如下：

LAA: 太阳、稻子、奶、风、铁、名词计数法、声调和音高重音、下雨

LAAA-1: 老鼠、鸡、马、狗、狼、熊

LAAA-2: 小麦、小米、黍、稗子、芋头、山药、辅音系统

LAAA-3: 兄弟姐妹称呼系统、主-宾角色表示法、数词系统

这些都是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亚非地理语言学工程 2015-17; 2020-2022 以及日本文部省扶桑人遗传基因组（Yaponesians genome）科研计划 2018-2022 的成果。

本工程在此基础上，要在汉藏语的范围内重新描绘所有词形都区分开来的语族内部地图，最后将于 2026 年出版《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汉英版）。该地图集的内

容分类与上面所列一致，并注重选择了适合于宏观比较的词汇，农业、畜牧业、矿业等文明史方面的词汇也在内。以往有严格的篇幅限制，一个语族只登载一、两张大尺度宏观地图；但由于汉语族一般超过一千地点，藏缅语支一般在六百地点，因而这些语言地图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做进一步研究；鉴于此，这次工程不加以篇幅限制，解释方面也要实现更加细致的处理。

这次工程的新的尝试是，地理语言学的横向比较和文献语言史的纵向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参考整个亚非地区各个语族的考证结果，进行类型学上更加丰富细致的研究。至于 LAAA-1 和 2 收载的动植物词汇，已和遗传学家合作编出了生物遗传基因谱系地理学和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论文集，将在 2024 年底前面世，还可以进一步进行该领域的探索。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的一种样本见于 Suzuki et al. (2023b)，但还需要加上历史文献轴。如果能应用三维地图也很好；不然就把见于历史文献的形式写在地图旁边。2023 年度绘制数词语音形式的地图，见于本论文集里。由于汉语数词几乎没有词汇差异，只有语音差异，因此从中能归纳出音变链。Kümmel (2007)已列出了印欧语和 “一”的地图并归纳出音变链。从汉语数词语音形式归纳出音变链，能增加人类语言普遍性的实例。关于 2023 年度的研究成果已经收载在本论文集里，此不赘述。

2024 年度主要研究粮食植物等农业方面词汇的地理分布和历时变迁。2025 年度主要涉及到动物词汇，到最后总共涵盖 30 项语言特征的各种大小地图。

二、研究计划中的一些问题

这次计划中要把地理语言学和文献语言史结合起来。这里讨论其中一些问题。

我们已编纂了汉语史的断代文献目录系列，即远藤等编（2009、2011）和竹越等（2016）。还要往前追溯，唐宋时期汉语文献目录已经基本完工，即将面世。这些文献收载历代第一手资料及其研究文献，试图搜尽古今中外以往研究。这好比是建筑高楼大厦时首先要进行地质勘探，现在要着手谱写涵盖所有时代、所有地理变体的整个汉语史。这将是浩大的工程，需要几百个研究者花几十年才能完成，我们只不过要提供蓝图和头 30 个语言特征的样本而已。

根据 Zhang et al. (2019)等研究，汉藏语的原乡是陕西、甘肃一带西北地区，LaPolla (2018) 和 Wen et al. (2004)综述了其后的区域扩大过程。由这些研究可见，在汉语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历过大规模移民和语言接触。沙加尔提出汉藏南岛语族，侗台语是其中南岛语中的一个语支。虽然这次工程无法全面涉及到最原始的阶段，但要部分地进

行试探。

下面的论述以音韵方面为主，因为本人专攻音韵，而且本工程成员大部分为音韵研究者。汉语音韵史的最早阶段是上古音，但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阶段。商代到汉代的时间幅度大约有 1500 年，但其间只当作一个或两个时代研究。上古方言的研究很少。藤堂（1954，1987）指出，在《诗经》里，-m 和-ng 相押的例子（入声和阴声仿此）集中出现在小雅、大雅和颂，反映周代早期的情形，后来产生了部分-m＞-ng 的音变。秦风和豳风保留较早时期的面貌，可能因为那里是西周的发源地。河野（1950, 1979）所说和牙喉音与章三谐声有关的 A 方言和 B 方言也可能是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的不同。如果陕西音更保守的话，保留牙喉音的方言也就是陕西音。

关于中古音，有马伯乐的名著《唐代长安方言考》（马 1920, 2005）。该著总览反映唐代长安音的各种资料求出每个世纪的音系。附带说一下，原来研究中古音的学者分两类，读过马伯乐该著的人和没读过的人。因为原著是法语，因此看不懂法语的人不是中古音专家。不过有了汉译本以后没有这么回事了。我们顺着他开辟的道路还可以增加时点。在本工程里，这项研究由专攻梵汉对音的桥本贵子完成。她的老师吉田丰还有一系列伊朗-汉对音等西域译音研究，并收集了其他日本学者的对译资料，已经有 20 多个时点的音韵描写。

至于近代音，虽然文献数量多，反映纯粹方音的资料并不多，需要鉴别。比如说，《中原音韵》（1324 年）是江西作者增补的，掺杂着江西音的特色；相当于“墨本”的《中州音韵乐府类编》倒反映纯粹的北京音。《蒙古字韵》有人为的成分，也有当时实际语音的特点。《四声通解》（1517 年）参照很多先行韵书，偶尔有人工成分。但是编者崔世珍还是卓越的语言学家。他记录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入声声点有特殊分化条件，以元音高低来分两类。其实高元音的一类在现代北京话里有反映，平山（1960）所分 C 层都是元音 i、u、yu 类并读去声，这些字都带有文读色彩。这也就是说，北京音系在元明之间有断层，崔世珍描写的是明代通行于北京等地的官话，到现代北京话也留下其痕迹。汉语方言里以元音高低分入声类别的演变非常少见，应该是从入声只有一类的系统分化的。这种系统是江淮官话，也就是明代开始时奠都的南京话的特点。后来陆续发现支持明代官话说的一系列证据。《西儒耳目资》1626 根据《洪武正韵》1375 编纂，这一点由太田（1997）具体研究。这种资料性质的探讨还要继续下去。另一个方面是个别地点的年龄差异和近期历史的变化，远藤（2004、2015）分别做过个案研究。

文献语言史和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有一个重要领域，也就是根据地理分布推测文献的基础方言。远藤（2016）研究 13 世纪末《脉诀》波斯语翻译，根据当代方

言语音形式地理分布推测其基础方言。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仅仅根据一个字或者一个语言特征的分布来推测基础方言还不够充分，需要组合多种语言特征才能达到较可靠的推测。

在这里追加一个超过语族的词形分布的例子。地图 1 是侗台语的“铁”的词形分布（Endo 2017）。图中出现的词形当中，fa、va、go:i、maa 等可能是侗台语的固有词，至少不是来自汉语的借词。lek^{7}、lek^{8}、khət、thi:t、ti:t 则是汉语借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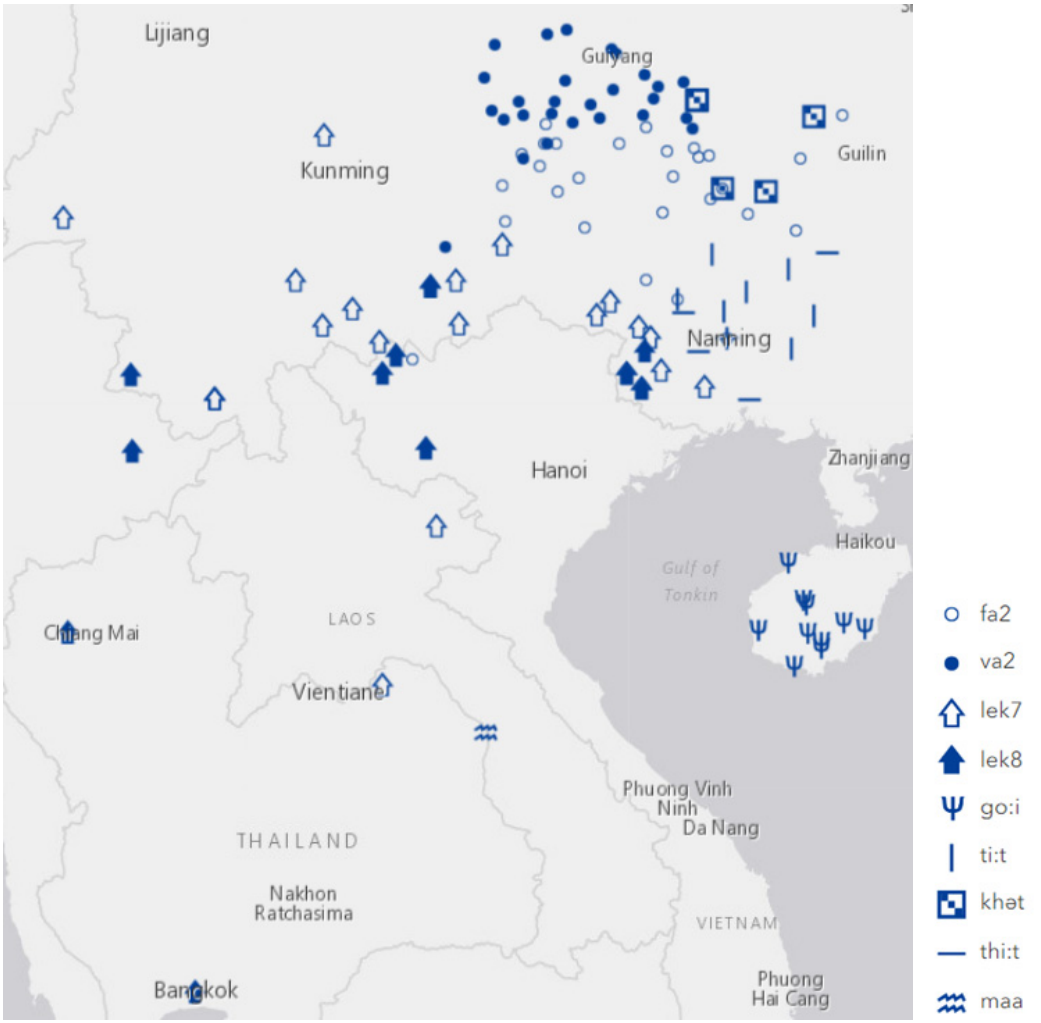


图 1：侗台语的“铁”

Baxter-Sagart 构拟的上古音音值为*l̥ˤik，泰语正书法还保留开头 h，如果元音的发音部位低化就成为*hlek > lek[7]（苗瑶语也有类似例子）。如果开头 h 脱落就成为 lek > lek[8]。*hl-的声母变成 kh-就成为 khət。*hl-的声母变为 th-，而且韵尾 –k 受到前面元音 i 的影响发音部位靠前就成为-t，于是变成 thi:t。侗台语的送气音是原有的还是后起的问题还没有澄清，但如果无法给出分化条件时还是需要构拟区分多的状态，因此在此把 ti:t 处理为经历了送气成分脱落的变化。由地图 1 可知，接近上古音原始形式的词形分布在离汉语更远的地方，接近中古音的形式分布在接近汉语方言的地方。说不定接近中古音的形式还不是中古时借过去的，而是晚近时从保持-t 韵尾的毗邻汉语方言借过去的。

三、结语

“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2024 年举办了第一届，2025 年和 2026 年还要举办第二届、第三届，将分别发行论文集《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第一～三集。在剩下的两年之内要开展上述的各种课题的种种考证，也邀请国内外有关领域专家参与。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成果之一。定稿时承曾晓渝教授过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河野六郎 1950, 1979 中国音韵史研究の一方向——第一口盖音化に关联して《河野六郎著作集》2, 227–232. 平凡社

马伯乐 1920, 2005《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

平山久雄 1960 中古入声と北京语声调の对应通则《日本中国学会报》12: 139–156.

太田斋 1997《西儒耳目资》编纂过程推测の手がかり《神户外大论丛》48(2): 61–72；续 48(5): 41–51. URI: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745

藤堂明保 1954，1987《上古汉语の方言》《藤堂明保中国语学论集》汲古书院

远藤光晓 2015 近 150 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远藤光晓 2016《元代音研究》汲古書院
远藤光晓等编 2009《译学书文献目录》博文社
远藤光晓、竹越孝编 2011《清代民国汉语文献目录》学古房
竹越孝、远藤光晓编 2016《元明汉语文献目录》中西书局
Endo, M. 2017. Iron: Tai-Kadai. *Studies in Asia Geolinguistics* 5: 15–16. URI: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5_iron_2017.pdf
Endo, M., M. Minegishi, S. Shirai, H. Suzuki, and K. Kurabe (eds.). 2021.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Tokyo: Hituzi Syobo.
Fukushima, Ch., S. Shirai, M. Fukazawa, H. Suzuki, and M. Endo (eds). 2023.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II*.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223731
Kümmel, M. 2007. *Konsonantenwandel*. Wiesbaden: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LaPolla, R.J. 2018. The Chinese Expansion and Language Coexistence in Modern China. In S.S. Mufwene & A.M. Escobar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64–8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017/9781316796146.006
Suzuki, H., M. Fukazawa, A. Yokoyama, and M. Endo (eds.). 2022.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118188
Suzuki, H., K. Nakazawa, and M. Endo (eds.). 2023.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I*.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Suzuki et al. 2023a) doi: http://doi.org/10.5281/zenodo.7754469
Suzuki, H., K. Yagi, and F. Suzuki. 2023.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 Sino-Tibetan: Lexical relationship in some animal and plant terms. *Studies in Geolinguistics* 3: 164–179. (Suzuki et al. 2023b)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437113
Wen, B. et al. 2004.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 431: 302–305. doi: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2878
Zhang, M., Sh. Yan, W. Pan, and L. Jin 2019.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 112–115. doi: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153-z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一”的汉语部分（稿）

远藤 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一”主要有两种词形：“一”和“蜀”。后者出现在闽语地区，有可能和藏语 gcig（一）同源。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158 地点“一”字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计划 2026 年面世的《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第一集最主要的部分是汉语和藏语。在“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 2024”报告时只涵盖汉语和藏语数词“一”到“十”的项目，因此称作《汉语-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但后来要扩大计划，仅在数词范围内还要包含侗台语和彝语-白语方言的方言地图，其他收载项目还可能包含其他语族或语言，因此还是按原计划定名为《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其中“一”的汉语部分，分别讨论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由于两年以后定稿时还会增加地点，解释方面也要加以改进，因此这次版本加上（稿）字。

关于“一”字，曹（2008：191）分类为“一”和“蜀”两个词形，作为词汇研究可能也就够了。但是《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的目标是对所有的语音变体给出不同的符号，求出详细的语音演变过程，并和历史文献中的形式进行比较。结果，方言地图显得特别复杂，这些细节对于专攻文献词汇史的学者没有必要。但是来源于同一词根的单一分布对于音韵史研究特别重要，分出其中所有语音变体能展现出汉语音韵演变的整个过程，而且能从中归纳出的音变链作为人类语音演变的途径能提供扎实的实例，尤其难能可贵。

数据库 1158 地点的来源是已有的调查报告，其精确度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做好同音字表后的描写至少比印象标记法要可靠些，描绘成地图后能得出连续分布的话，起码能当作出发点，烘托出问题。至于在细节可能存在的这种或那种问题，等将来由每个方言的专家批评指正再逐渐提高精确度并修正解释。所依据的数据库是八木坚二、铃木史己两位老师输入的，本当放在作者之列。稿本阶段暂时以每个解释者的名义撰

文，等正式出版时再以合适的形式明确这一点。

二、韵尾

韵尾的情况最单纯，于是从韵尾开始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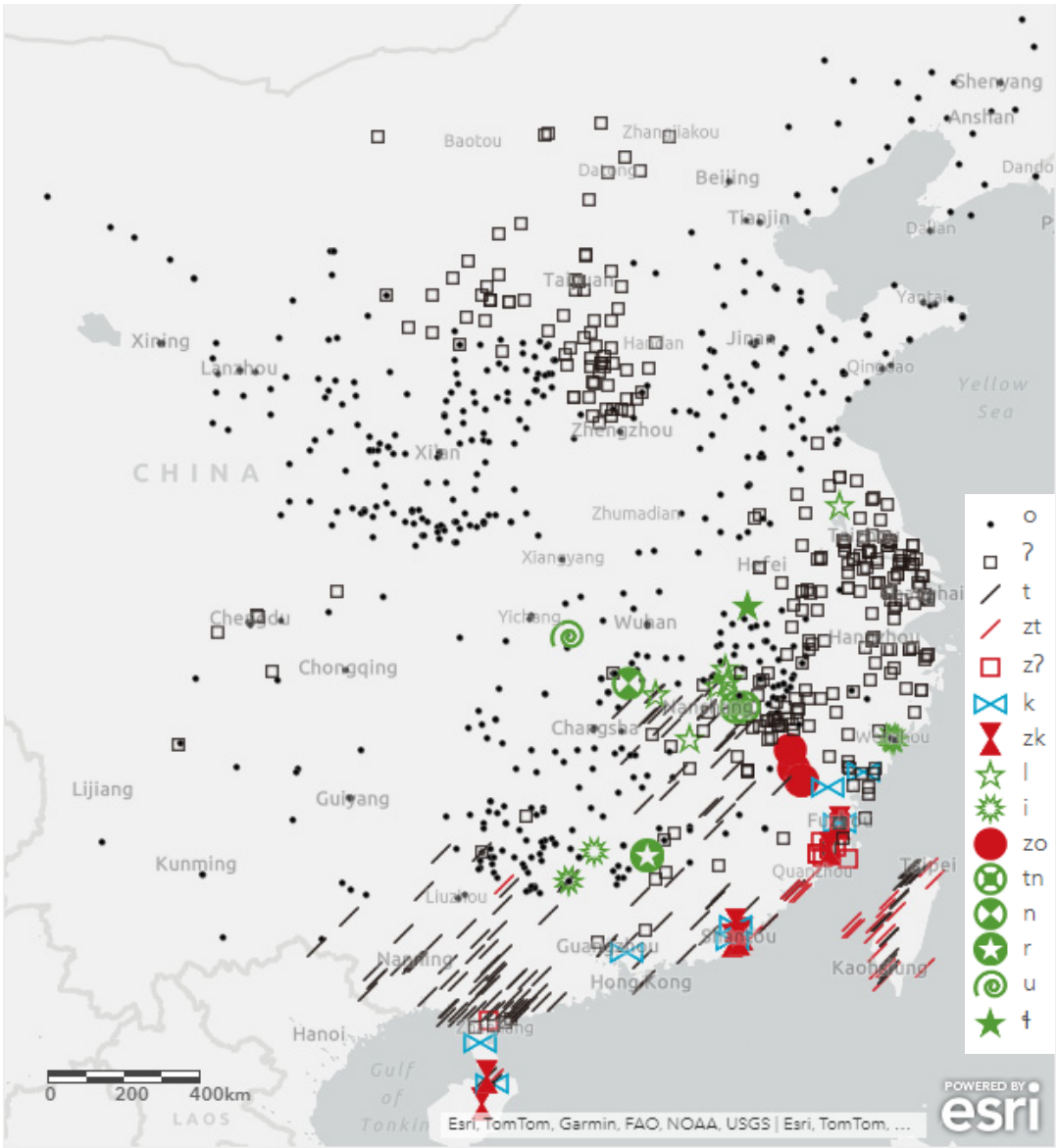


图 1：“一”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图 1 表示“一”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和北京音一样的零韵尾形式占第一位，568 个地点，大都是官话方言。其次是喉塞韵尾，293 个地点，主要在晋语和长江下游及四川的个别地点。第 3 位是收-t 尾，148 个地点，主要是粤客语。从中古音出发，演变次序是-t > -ʔ > -0（零）。头 3 位形式加起来达 1009 个地点，占 87%。

从中古-t 韵尾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t > -l > -ɬ

> -r

> -tn > -n

这些形式的更详细的分布地点见图 2 和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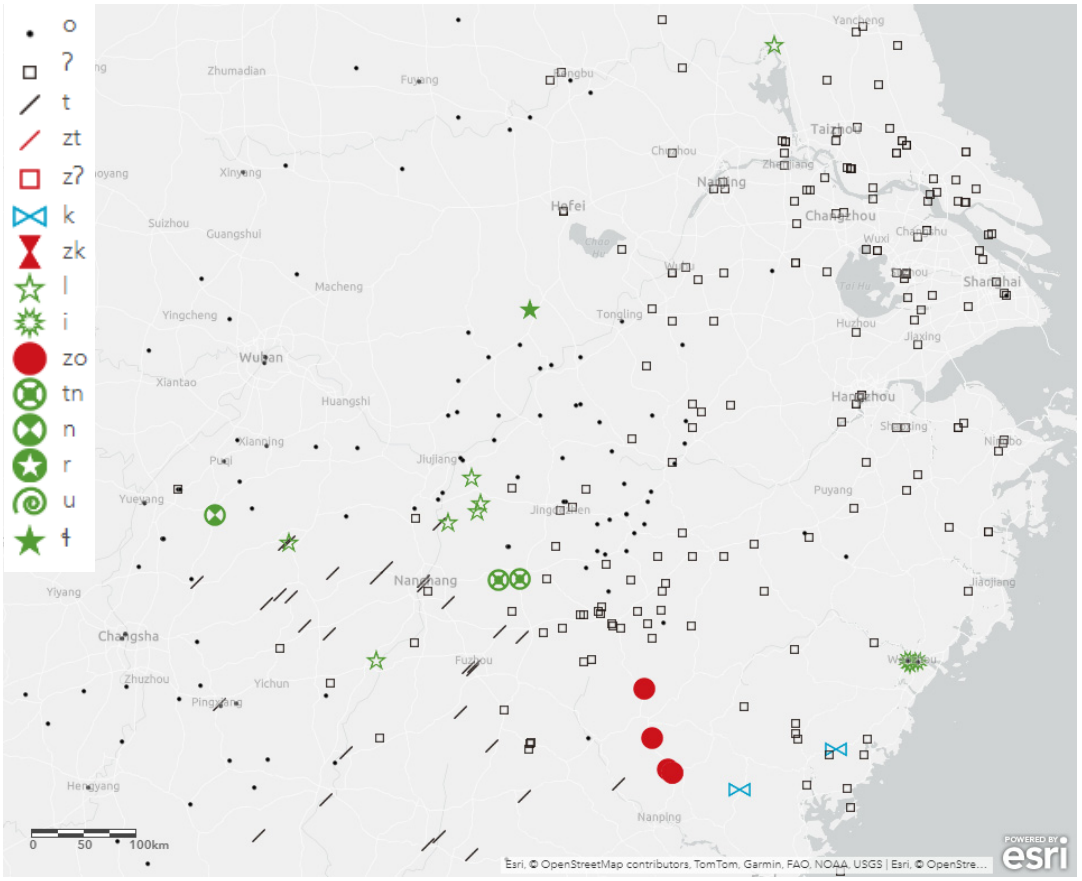


图 2：华中地区“一”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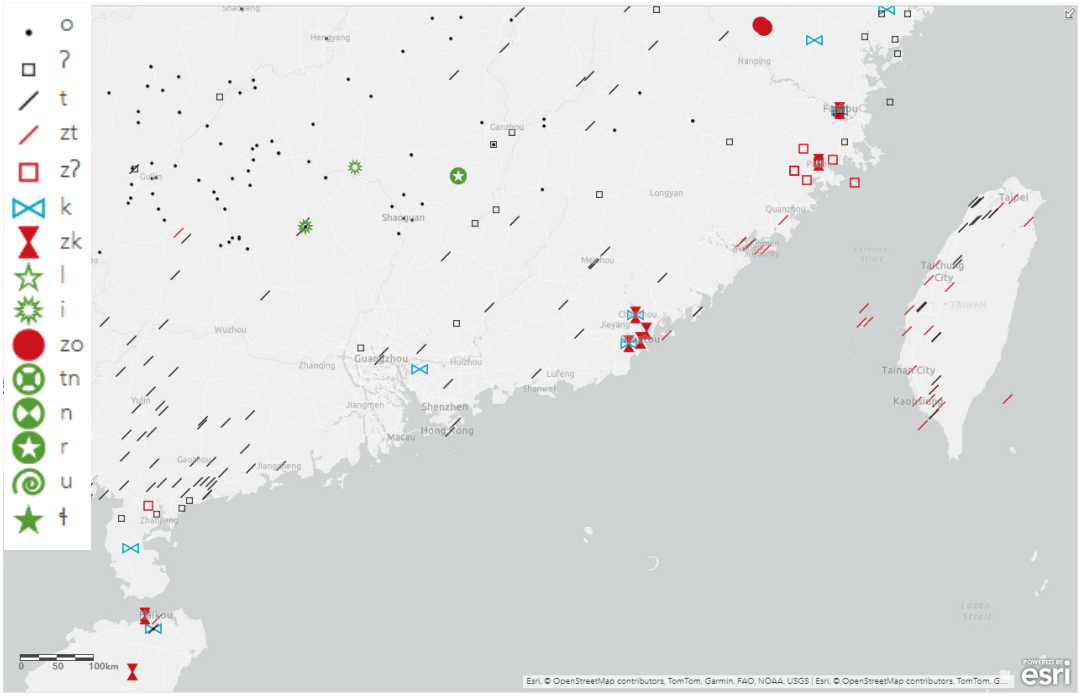


图 3：华南地区“一”韵尾地理分布

关于-t > -l 和-t > -r 的变化，在唐代西北文献资料中有所反映，朝鲜汉字音也如此，是一种弱化的过程。据远藤（2016），13 世纪末的波斯汉对音资料《脉诀》也有-ld 等反映，可能是江西音。该著描绘具有-l 韵尾的方言点更详细的分布图。其中也包括收-n 的方言在内。太田（2013: 143-144）举出许多在河北、山东一带把中古-t 韵尾保存为后面附加音节 l- 声母姿态的方言词汇实例。

收-u 的语音形式实际上是“幺”，为了避免和“七”混淆改音。

闽语里有和中古“一”不对应的形式“蜀”，记录在扬雄《方言》里，表中用红色符号表示。郭（2017）讨论该形式在闽南语各方言中的反映，说有的地点读-t 尾是受到“一”感染作用的结果。-k > -t > -ʔ > 0（零）是容易猜测的演变过程。该形式的介音有时是-u-，有时是-i-，除了韵尾以外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语音对应研究，但这已不在本文所能涉及到的范围内，需要由闽语的专家来完成。

然而在闽语里文读层零声母字也受到白读层的类推作用产生了-t > -k 的变化。在交界地带也有-ʔ > -k 的变化，也是类推变化，不是普通音变。

三、声母

声母方面应分为两个部分探寻其历史来源：一个是对应于中古“一”的形式，另一个是写为“蜀”的闽语形式。大致上说，这两个形式的界限非常清晰，读清擦音 ts、ɬ、s、θ 都来自“蜀”；但浊擦音 z、ʑ 等也出现在甘肃一带，这些是 j 的浊擦音成分强化以至于变成 z、ʒ 等。在华南的 z、ʑ 等光看“一”的音值还不行，需要考察每个方言点的来历。这次没能分辨谱系来源及其在语言地图符号上加以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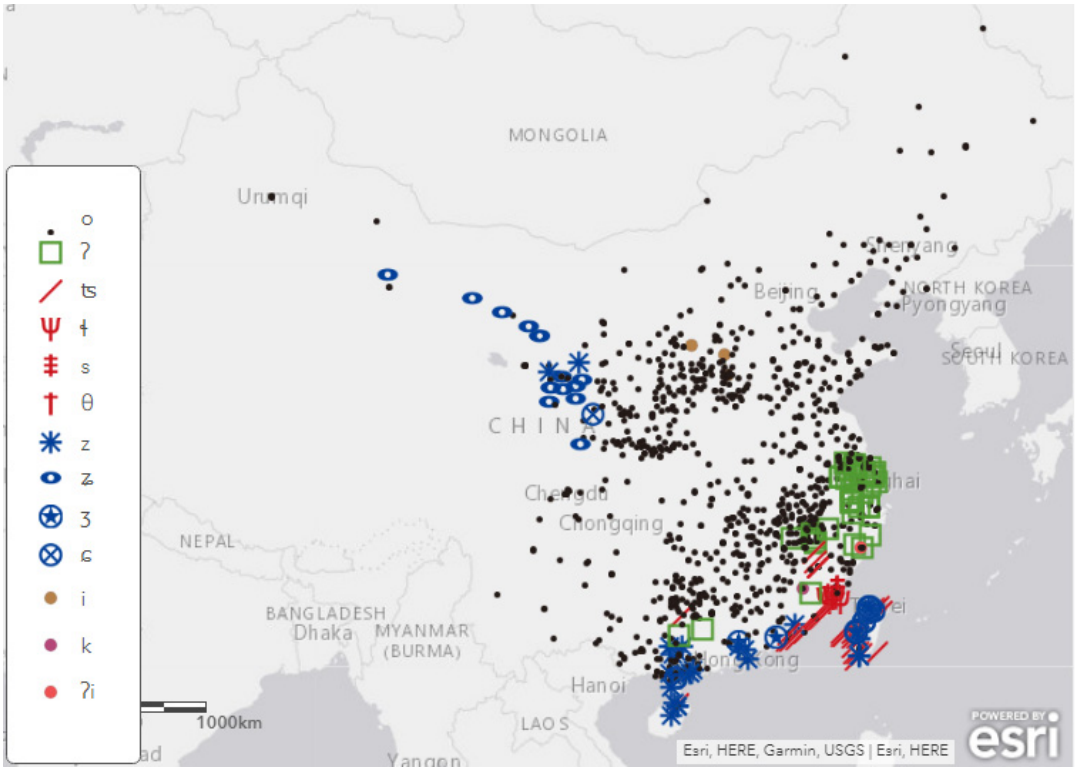


图 4：“一”声母的地理分布

来自中古“一”的声母音变链较容易推测。绿色方块符号是喉塞音，因为在吴语地区还保持全浊音，因此这是音位性的区别。在其他方言里，零声母或许有时带有喉塞音，但不是音位性的区别，因此径直当作零声母。在此可以归纳出下面的方向性：

ʔ > 0（零）

另一方面，在甘肃或客家语产生了如上所述的音变：

i > ʑ, ʒ > z

至于闽语的“蜀”，由于需要进一步仔细考虑，先不推测具体的音变过程、原因和方向性；但

ts - ɬ - s – θ

的链条是客观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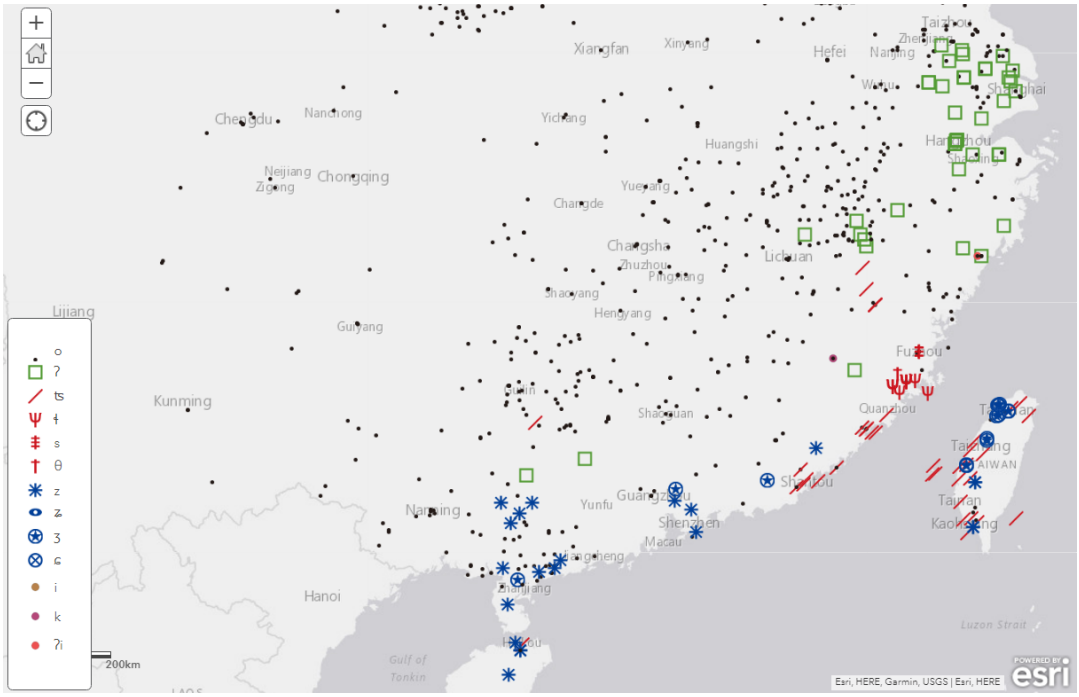


图 5：华南地区“一”韵尾地理分布

四、元音

实际上，“一”的情况除了“蜀”以外就和“七”一样。桥本贵子已在本论文集的“七”的项目进行考证，因此在此只举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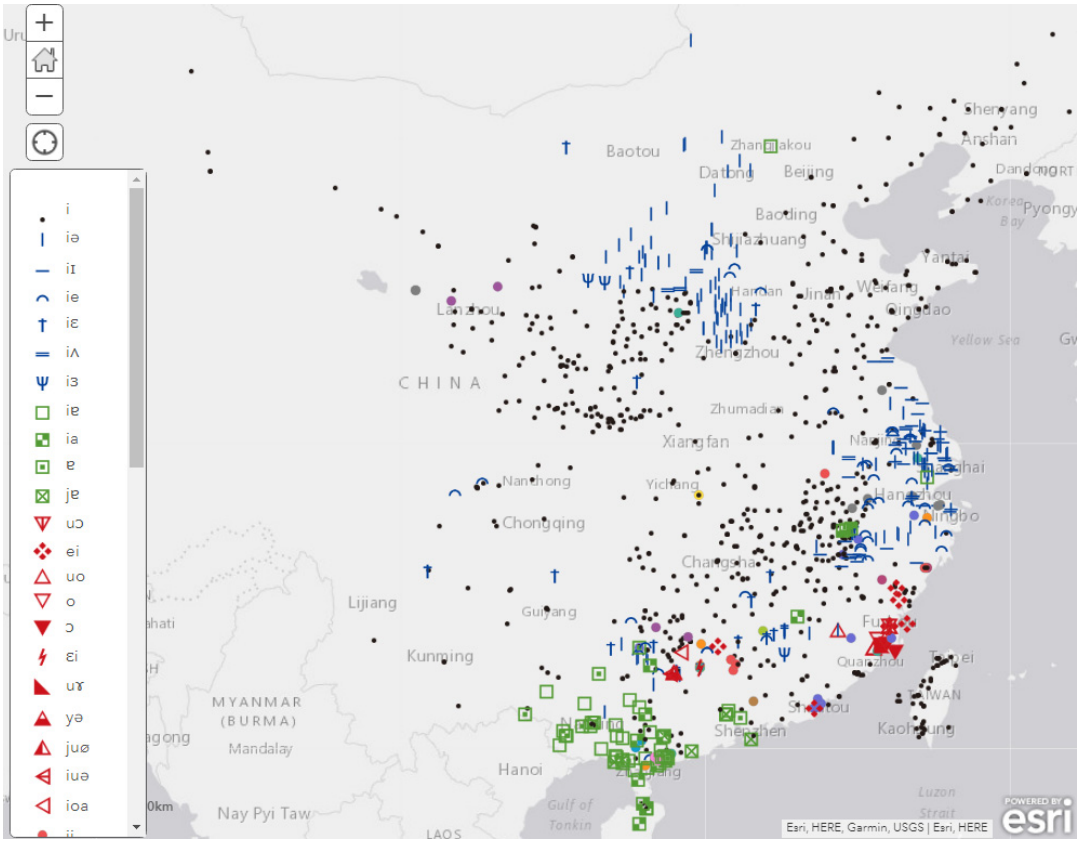

i
iə
iɪ
ie
iɛ
iʌ
iɜ
iɐ
ia
ɐ
jɐ
uɔ
ei
uo
o
ɔ
ɛi
uɤ
yə
juø
iuə
ioa
Baotou
Datong
Beijing
Baoding
Shijiazhuang
Zhengzhou
Xiangfan
Nanchong
Yichang
Chongqing
Changsha
Lijiang
Guiyang
Kunming
MYANMAR
(BURMA)
Mandalay
Nay Pyi Taw
Hanoi
Gulf of
Tonkin
LAOS
CHINA
Shenyang
Anshan
Yantai
Weifang
Jinan
Qingdao
Yellow Sea
Ningbo
Fuzhou
Quanzhou
Shantou
Shenzhen
TAIWAN
Kaohsiung
Luzon
Strait
0km
Esri, HERE, Garmin, USGS | Esri, HERE
POWERED BY
esri

图 6：“一”元音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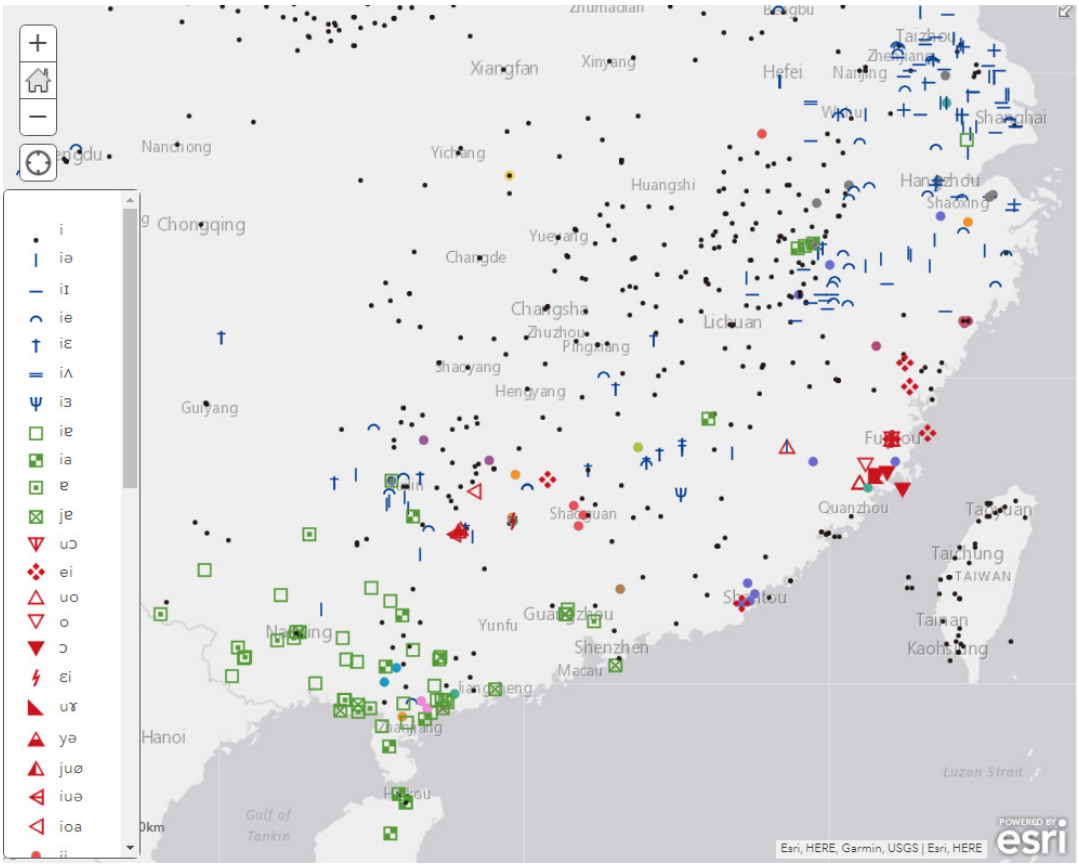


图 7：华南地区“一”元音地理分布

五、汉藏语里的音变过程

STEDT（https://stedt.berkeley.edu/~stedt-cgi/rootcanal.pl/etymon/2726；2024 年 7 月 2 日阅览）提到藏缅祖语形式*tyak ⩙ g-t(y)ik，最后列出汉语对应形式：隻。一部分闽语的形式可能来自这个“只”，但还有对应于“蜀”的具有合口成分的形式，一时难以做严格的考证。这里暂时提出如下的可能：

汉藏祖语*g-tyik（书面藏语转写形式为 gcig）> tsik 一部分闽语（头 g-脱落）；

> ʔik > ʔit　汉语大部分方言（声母 g- > ʔ- 并 -t- 脱落，韵尾-k > -t）。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定稿时承曾晓渝教授过目，在“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 2024”报告时得到汪维辉、沈瑞清两位老师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郭必之 2017 闽南区方言表<一>的<蜀>及其相关问题《单周尧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415–424. 万卷楼

太田斋 2013 山东方言的入声及相关问题《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83: 135–171. doi: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47

远藤光晓 2016《元代音研究》汲古书院

Endo, M. 2016. Goals of the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2015-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1–4.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汉语-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二”的汉语部分（稿）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二”主要有两种词形：“二”和“两”。本文着眼于“二”字的语音形式，从声母、元音和韵尾考察汉语方言 1070 地点（共计 1221 个数据）的地理分布。“二”属于中古日母至韵，在声母地图，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零声母，占 60%，鼻音声母则占 25%，非鼻音化趋势甚为明显。零声母形式多数带有流音韵尾（[ər]等），其分布区域内零散分布着带有卷舌性的辅音（[ʐ-]、[ɭ-]等）或成音节辅音（[l̩]等）。在元音地图，前高元音[-i]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其周围分布着舌位较低或靠后的元音，在江西一带则分布着圆唇元音，可以看出元音低化、后化和圆唇化的倾向。官话区广泛分布着带有 r 韵尾的形式([ər]、[ɐr]等)，其韵腹多为央元音或后元音。舌位靠后的元音可以在保持其调音部位的状态下翘起舌尖，因此元音的低化和后化可能促进了ər 音的产生。

一、前言

本文将分析数词“二”的汉语部分。关于数词“二”的方言地图，曹志耘（2008：192）收入“二一~三”条，分为“二”、“两”和并用“两～二”3 类。Suzuki（2023）绘制了汉语数词“二”的方言地图，分为“二”、“两”、“双”3 种词形。该文指出“两”集中于吴语区与闽语区，此倾向也可由曹志耘（2008：192）得到确认。除此之外，八木（2021）绘制出了止摄日母开口字（儿而耳二）和相关语音特征的地理分布图，并探讨了 er 音的地理分布以及 er 音产生的机制。本文着眼于“二”字的语音形式，分声母、元音和韵尾来考察汉语方言 1070 地点（共计 1221 个数据）的地理分布，并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二”字在音节的分类上有若干问题。本文所采用的标准如下：

(1)音节末位的流音（[-r]、[-l]等）

从音节结构来看，音节末位的流音应分为韵尾，但有时难以分割。例如北京方言

的材料中就记录有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

北京：二[ər^{51}]（詹伯慧等 2017：下卷 284）

[ɚ^{5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71）

平山（1959）描述了北京话中整个元音带有卷舌性的儿化现象（即[ɚ]），李思敬（1994）将其称为“韵尾化合型”，音节末位附加[-r]的[ər]称为“韵母拼合型”，还指出两者的使用情况取决于年龄差异、个体差异、发音草率或清晰等多种因素（可参看日本中国語学会編 2022：23-24）。此现象亦涉及到除北京话外的其他方言。由于[ər]和[ɚ]难以区别，而且将 r 韵尾和元音一起分析有利于考察“二”字音形的演变，因此本文在输入信息时按照所引资料原文，但在讨论时暂且将 r 韵尾作为“元音”的一部分进行处理。为了方便起见，i 韵尾也同样归入元音。

(2)成音节辅音（[l̩]、[n̩]等）

“二”字的语音形式中出现不少成音节辅音，如[l̩]、[n̩]、[l̇]。为了方便起见，在声母地图上视为声母（即不归入零声母），在元音地图上作为一种元音标出。

“二”字属于中古日母至韵，各家提出的构拟音有所不同，如 Baxter and Sagart（2014：110）构拟为**nyijH*，平山（2018：13-16）构拟为*ɲɪi，共同之处是带有鼻音声母和前高元音。下面我们将分别分析声母、元音和韵尾的分布情况。

二、声母

图 1 表示“二”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共有 20 种（包括零声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零声母（黑点），以官话区为中心广泛分布于全国，共有 712 个数据，占 60%，其大部分是音节末位带有流音的形式，如[ər]、[əl̩]、[əl]。

鼻音声母（蓝色）次之，共有 309 个数据，占 25%，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东南沿海地区，还见于台湾。[ŋ̍-]（116 地点）和[ɲ-]（21 地点）基本与前高元音[-i]结合，[n-]（94 地点）和[ŋ-]（72 地点）除[-i]以外还与舌位较低的元音结合（参看图 3）。

吴语区处于鼻音和非鼻音的交接处，有的方言点并用两种形式。

上海：[ŋ̍i^{13}] / [ɦəl^{13}]（许宝华等 1997：28, 14）

值得注意的是，带有卷舌性的声母零散分布于流音韵尾（零声母）的分布区域内。卷舌浊擦音[ʐ-]分布于安徽、江西，卷舌边音[l-]则分布于山东、山西、河南一带。[l-]分布区域附近分布着成音节的[l̇]或[l̩]和音节末尾带有[-l̩]的形式（参看图 3），本文将在第 3 节详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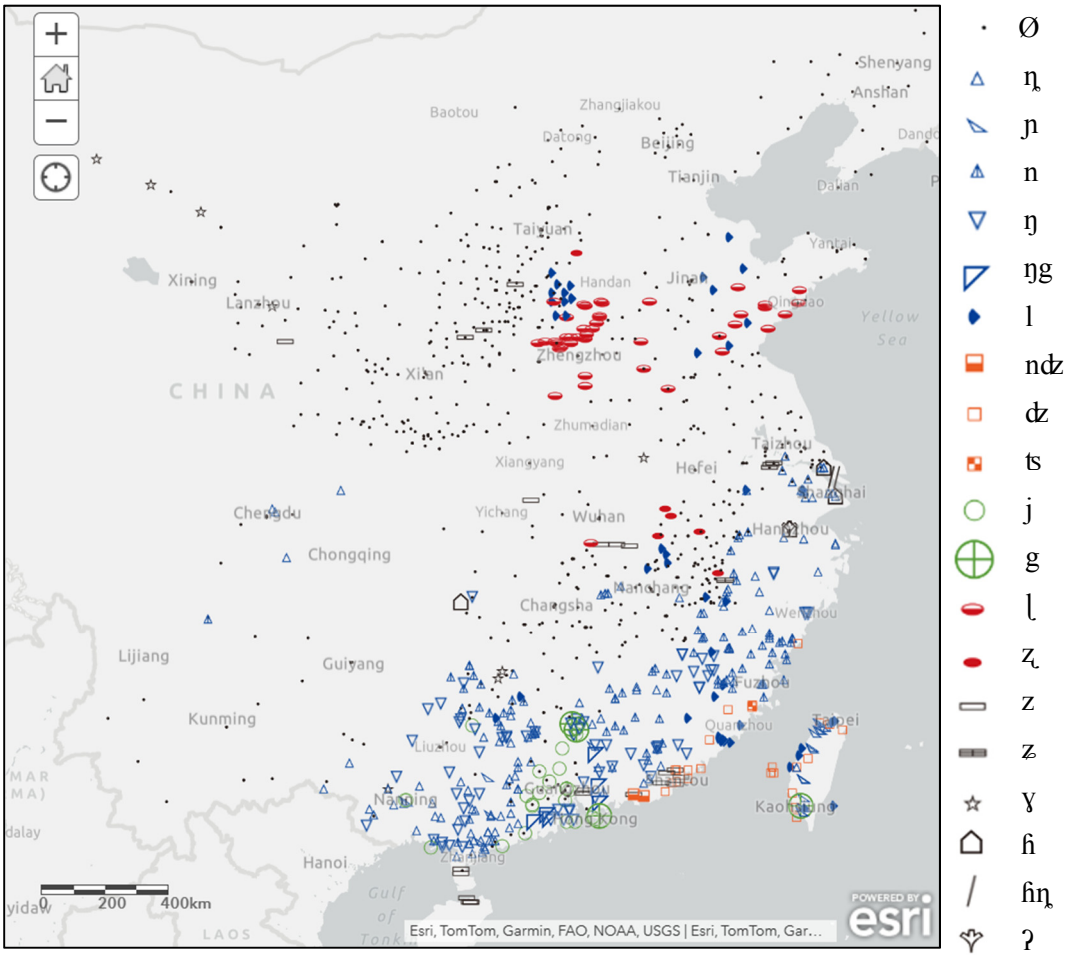


图 1 “二”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

图 2 表示“二”的声母在华南地区的地理分布。在闽语区，除鼻音声母（[ŋ̊-]、[ɲ-]）之外，还分布着[ndz-]、[dz-]、[ts-]和[l-]。[ndz-]是由[ɲ-]演变而来的，失去鼻化成份变为[dz-]。[dz-]又变为[l-]，少数清化为[ts-]（参看洪惟仁 2023：58-59）。这里的音变方向如下：

ŋ̊-, ɲ- ＞ ndz- ＞ dz- ＞ ts-
＞ l-

在粵语区，主要分布着[ŋ̊-]、[j-]、[ŋ-]和零声母。粵语区的零声母形式不是 ər 音，而是不带流音的前高元音[i]，有的方言点并用[j-]和零声母形式。可以推测，[j-]摩擦弱化变为零声母形式。这里的音变方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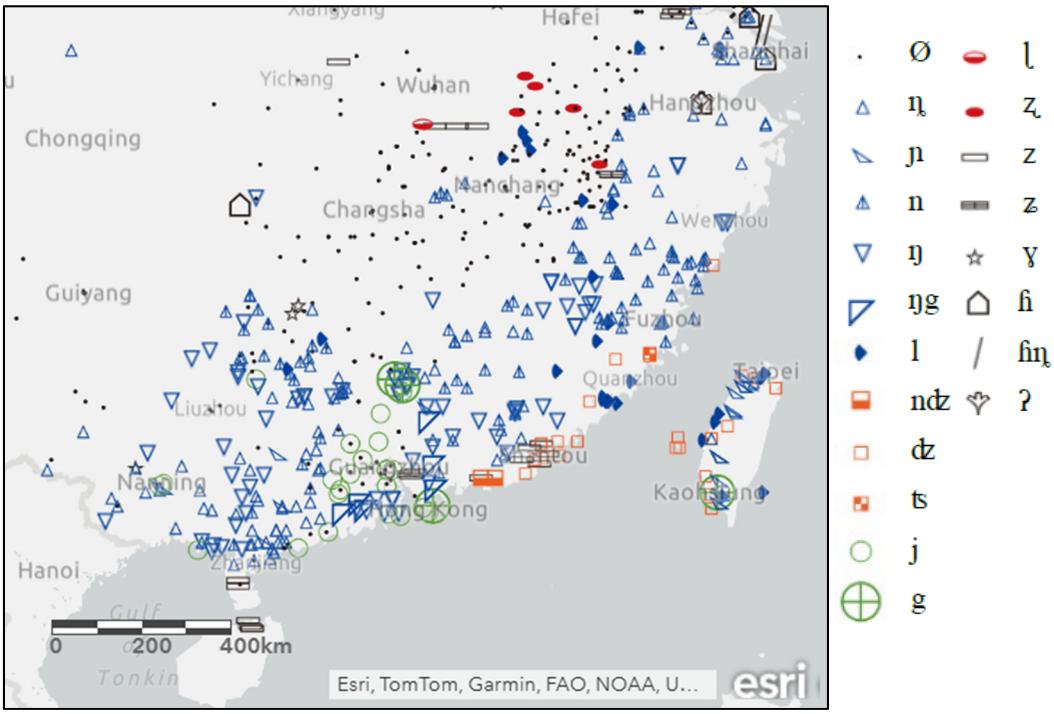


图 2 “二”声母在华南地区的地理分布

ŋ̊- ＞ j- ＞Ø（零声母）

＞ ŋ-

关于日母字的读音，有个别方言点读为明母[1]。

仍：建宁（城关话），miŋ^{213}（二 ŋi^{45}：李如龙等 1992：51）

肉：全南县城厢镇，miuʔ^{2}（二 ni^{22}：刘纶鑫 1999：132）；福建尤溪，ma（二 ne^{31}：陈章太等 1991：62）[2]

日：建瓯，mi^{42}（二 ni^{44}：陈章太等 1991：62）

耳：江山，mi^{33}（二 ŋ̊i^{31}：秋谷 2001：20）；庆元，mɪŋ^{221}（二 ŋ̊ĩ^{31}：曹志耘等 2000：259）；福清，mi^{33}（二 ne^{41}：秋谷 2020：619）；富川七都土话 miəu^{31}（二 nai^{35}：谢建猷 2007：503）

饵：宁远（清水桥），mi^{55}（二 ni^{31}：李永明 2019：452）；归化（现呼和浩特市，二 ər^{35}：陈章太等 1996：语音卷上 436）、兰州（二 ɯ^{13}：张文轩等 2009：15）、

[1] 承蒙马菁屿教授提供材料，在此衷心致谢。括号内为笔者补充的“二”字读音。

[2] 引自金有景（1984：346）。笔者未见。

温州（二 ȵ^{11}：游汝杰等 1998：361）、宁波（二 ȵi^{213}：汤珍珠等 1997：34），mi^{3}

在上述方言点，“二”字都不读为明母。就本文目前能收集到的材料，未发现“二”字读为明母的情况，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三、元音

图 3 表示“二”的元音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图 4 则表示“二”的元音在华南地区的地理分布，共有 60 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前高元音[-i]（蓝色），共计 382 个数据。[-i]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与鼻音声母的分布区域重复（参看图 1）。

[-i]分布区域的边界附近分布着舌位较低的元音（[-e]、[-ɛ]、[-a]等，包括带有 i 韵尾的[-ei]、[-ai]等）和舌位靠后的元音（[-ə]、[-ɤ]等）。据此可以推测，前高元音[-i]由于舌位降低变为[-ei]、[-ai]，i 韵尾脱落后变为[-e]、[-ɛ]、[-a]，舌位偏后就变为[-ə]、[-ɤ]。

*ɪi ＞ ei, ai ＞ e, ɛ, a（低化）
＞ ə, ɤ（后化）

江西一带分布着圆唇元音（黑圈），可能是圆唇化的结果[4]。

e ＞ ø （圆唇化）

ə, ɤ ＞ ɵ, o

带有流音韵尾的[ər]共有 323 个数据，以官话区为主广泛分布于全国。若把韵尾化合型[ɚ]也包括在内，则[ər] / [ɚ]共计 414 个数据。除此之外，带有卷舌性的元音（红色，包括带有流音韵尾的形式）零散分布于[ər] / [ɚ]分布区域内。值得注意的是，带有流音韵尾的韵腹多数为央元音或后元音。舌位靠后的元音可以在保持其调音部位的状态下翘起舌尖，因此，“二”字元音的低化和后化可能促进了 ər 音的产生。这里的音变方向如下：

ə ＞ ər, əɻ, əɭ

八木（2021：174、182）根据对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的分析推论，卷舌声母和开口中元音是引起流音韵尾产生的音韵条件之一，还指出日母字在历史演变过程

[3] 引自高本汉（1940/2003：338）。
[4] 八木（2021：170）推测圆唇元音也可能是卷舌性的一种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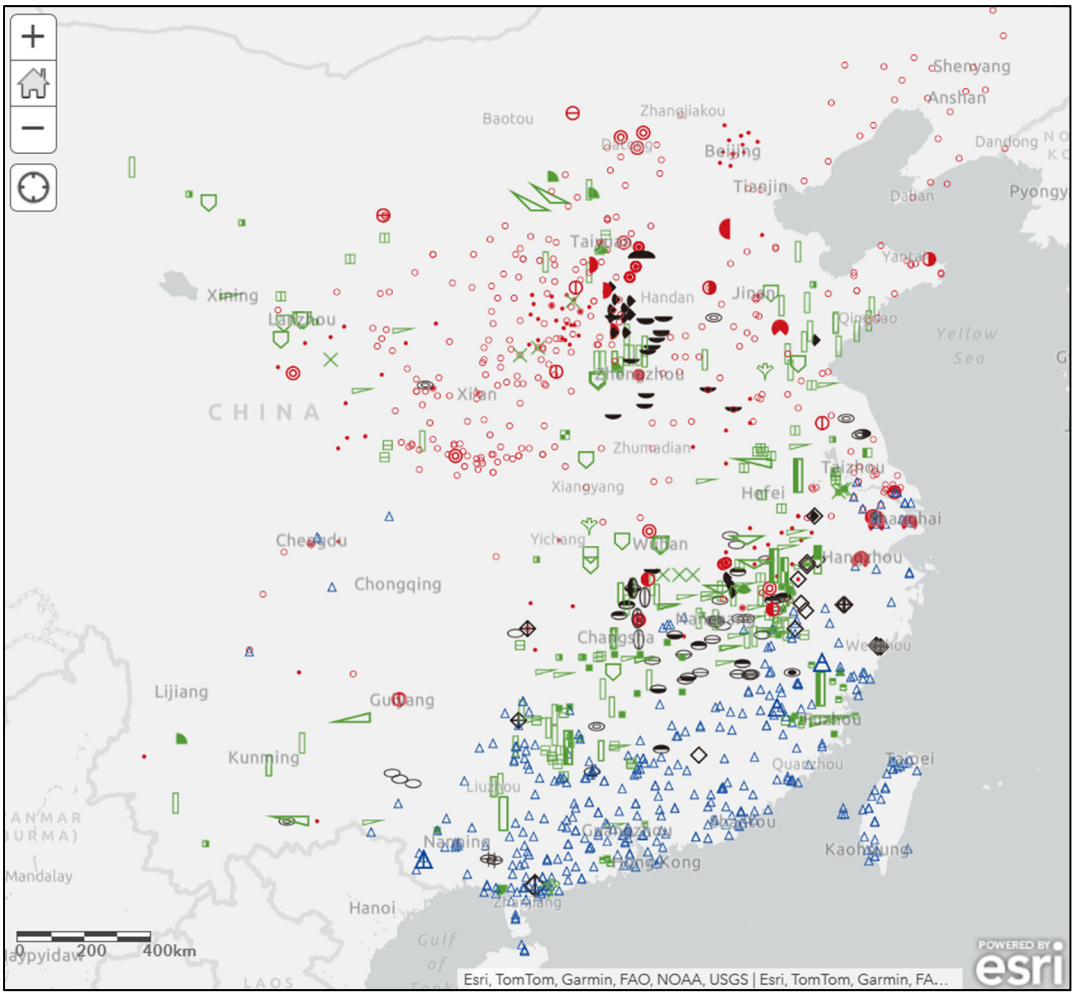


图 3 “二”元音在全国的地理分布



中经历过卷舌性由音节头位到末位的转移，以致 ər 音的产生。

如第 2 节所述，带有卷舌性的声母零散分布于[ər] / [ɚ]的分布区域内，[l̩-]分布区域附近分布着成音节的[l̩]或[l̩]和音节末尾带有[-l̩]的形式。[l̩-]基本拼央元音[-ə]，可以推测，[lə]由于[-ə]的弱化变为[l̩]，从而产生了[əl̩]。这里的音变方向如下：

lə ＞ l̩（成音节）＞ əl̩

有可能与非鼻音化以后形成 ər 音的过程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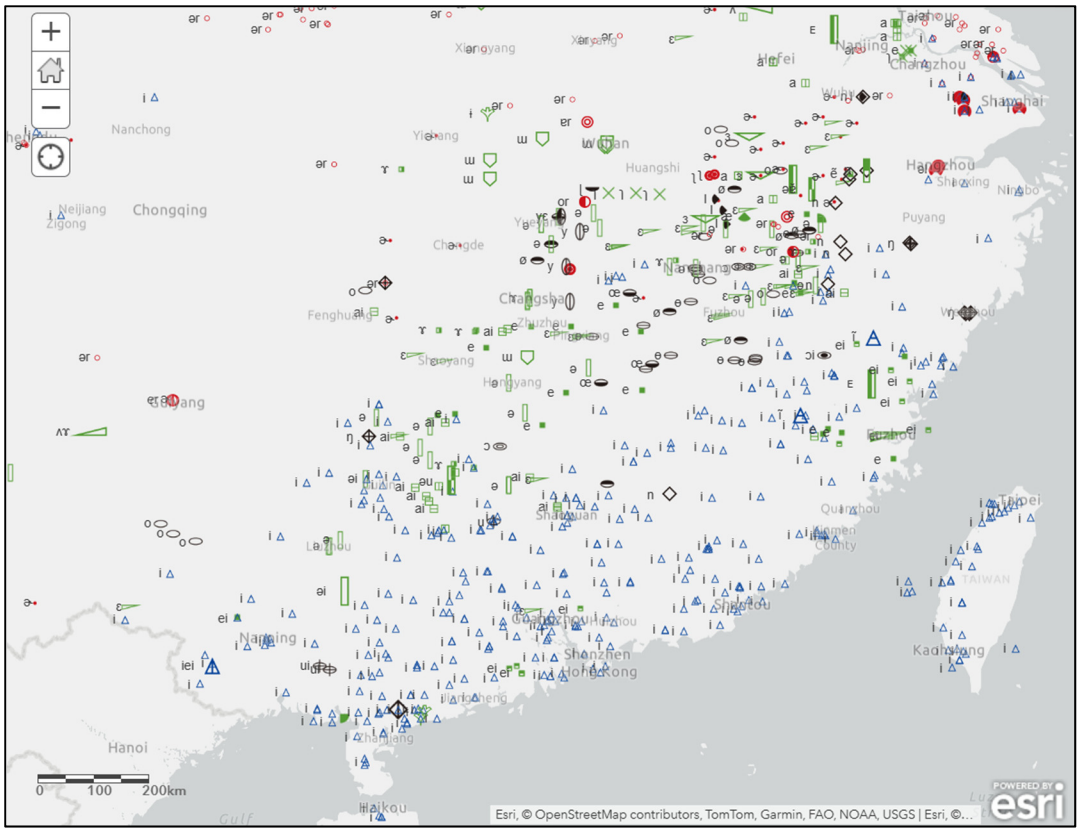


图 4 “二”元音在华南地区的地理分布

注意：个别方言点的元音形式记于符号左边

四、韵尾

图 5 表示“二”的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如上所述，本文将流音韵尾和 i 韵尾都视为“元音”的一部分，因此，“二”字的语音形式基本不带“韵尾”，这里只有两种：

(1)[-ʔ]（2 地点）

安徽旌德：[ɔ-ʔ^{55}]（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465）

安徽黟县：[əɛ̆ʔ^{32}]（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465）

(2)[-ŋ]（1 地点）

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话：[ɦioŋ^{13}]（陈晖 2016：127）

零声母形式带有喉塞音韵尾是常见的现象。泸溪乡话的[ɦioŋ^{13}]与其他山摄开口三等所辖字的对应规律不符（陈晖 2016：127）[5]，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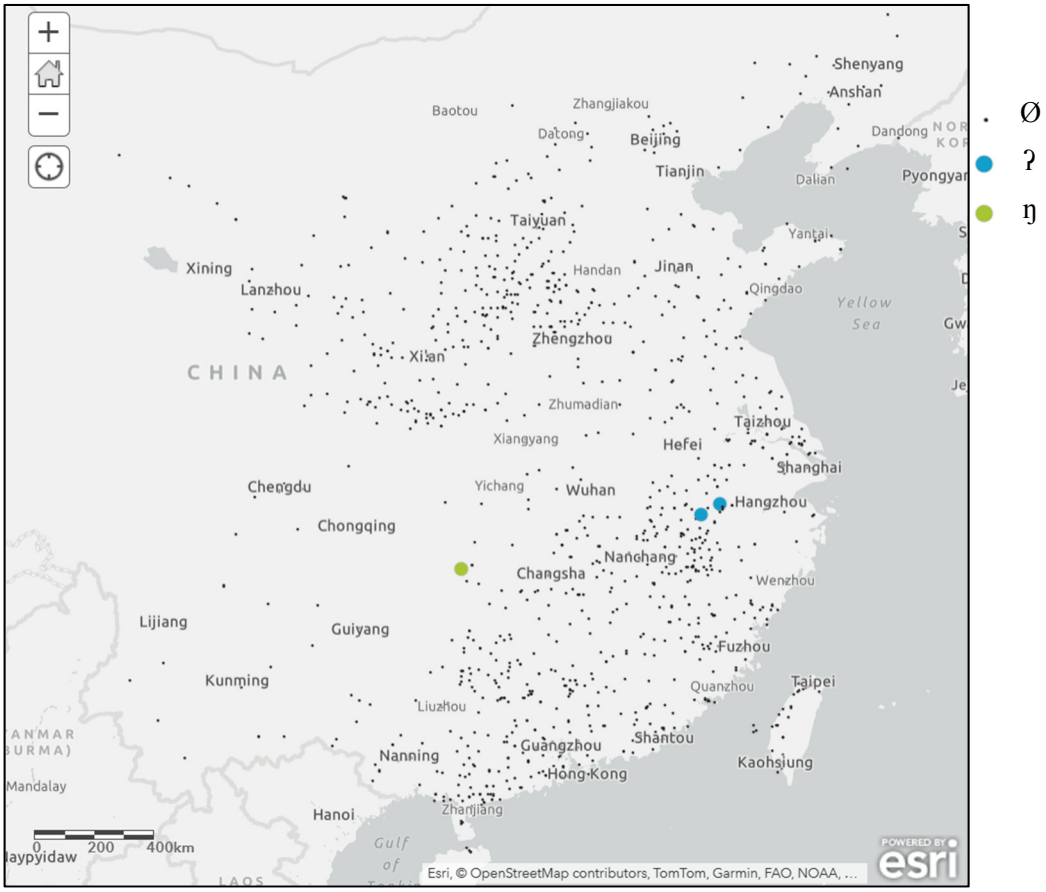


图 5 “二”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

[5] 泸溪乡话的日母字有文白异读，如“入”白读为[oŋ^{41}]（～伏），文读为[ʐu^{13}]（～殓）；“日”白读为[ioŋ^{41}]（后～）、[ɦioŋ^{41}]（～头），文读为[ʐʅ^{24}]（星期～）；“耳”白读为[ŋiu^{51}]（～屎），文读为[ʐʅ^{24}]（木～）（陈晖 2016：54）。

附记：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中国语言历史地理论坛 2024”（2024 年 3 月 2 日，online）上进行过口头报告，承蒙马菁屿教授的指教，在此谨致谢忱。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JSPS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23H00625 的资助。

参考文献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八木坚二 2021《er 音的分布——以中西部方言为主》，《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167-184.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ag_mono1_papers_on_geolinguistic_studies_of_the_languages_in_china_2021.pdf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修订 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 2 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陈晖 2016《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话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1940/2003《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洪惟仁 2023《闽南地区方言地图集》台湾语文学会

金有景 1984《论日母——兼论五音、七音及娘母等》，《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345-361

李思敬 1994《汉语“儿”[ə]音史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永明 2019《宁远方言》湘潭大学出版社

刘纶鑫 1999《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平山久雄 2018《敦煌《毛诗音》音韵研究》好文出版

秋谷裕幸 2001《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总合政策学科

秋谷裕幸 2020《闽东四县市方言调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1997《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谢建猷 2007《广西汉语方言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许宝华、陶寰 1997《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杨乾明 1998《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詹伯慧、张振兴 2017《汉语方言学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
张文轩、莫超 2009《兰州方言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axter, W. H. and L.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945375.001.0001
Suzuki, F. 2023. Numeral systems in Sinitic.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II*, 159-16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223731
日本中国語学会編 2022『中国語学辞典』岩波書店
平山久雄 1959「北京語の音韻論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 : 特に主母音と r 化について」,『言語研究』35，31-51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三”的汉语部分（稿）

野原 将挥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三”有可能和藏语 g-sum（三）同源。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98 地点“三”字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分别讨论“三” 的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就“三”的上古音，上古音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Baxter and Sagart（2014）给“三”构拟*-r-，如：*s.rum，这是因为“三”有可能跟“参”有同源关系。“参”的上古音是*srum。Baxter and Sagart（2014）认为“三”之后的“四”引起了沾染（contamination），把“三”的*s.r-变为*s-（相当于中古音心母 *s-*）。就韵母，按照从上古音到中古音的音变规则，“三”的中古音该是 *som* 或 *srim*（覃韵心目或侵韵疏母），然而其中古音为 *sam*（谈韵心母）。就其上古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韵尾

以下是“三”的韵尾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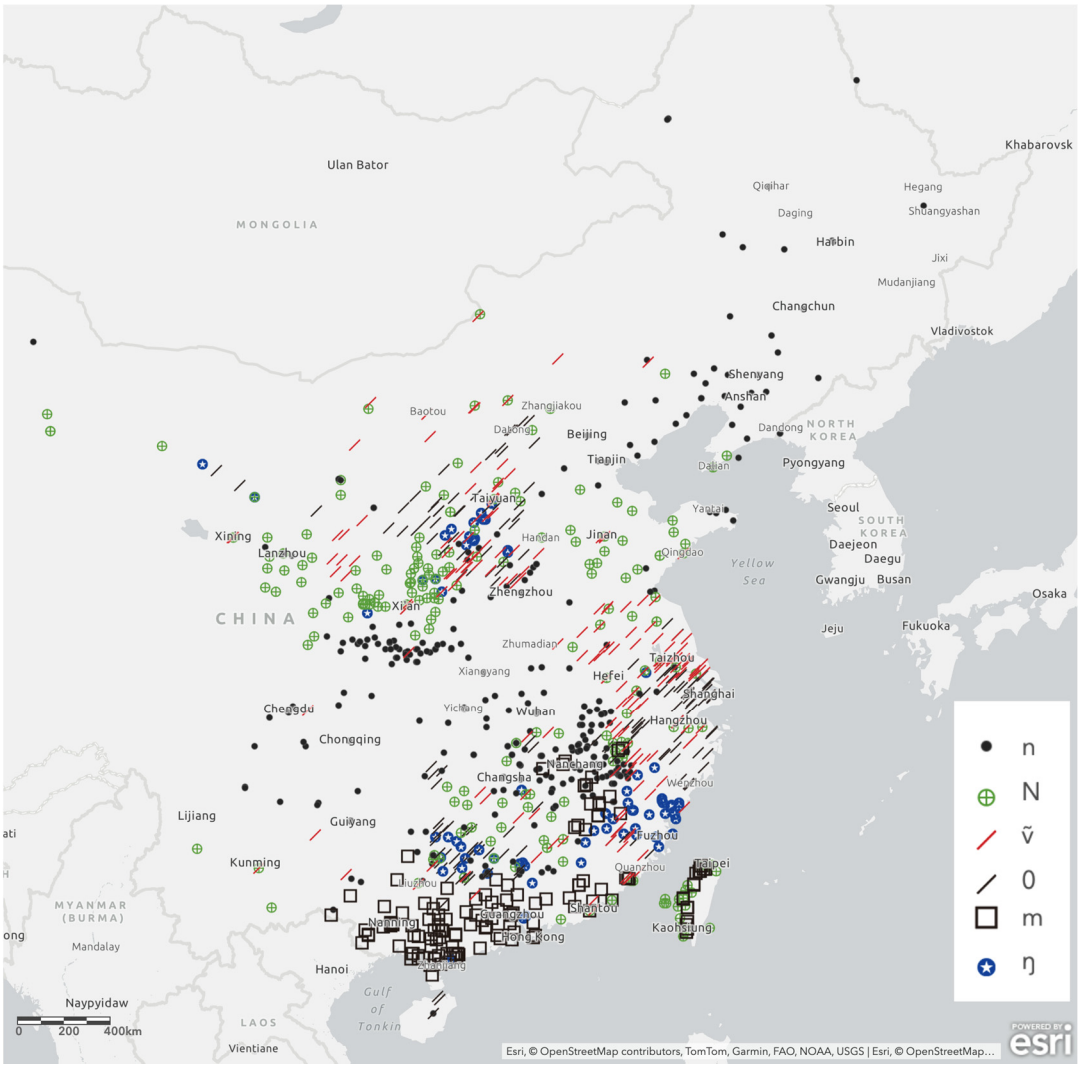


图 1　“三”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图 1 表示“三”的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其韵尾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无鼻音韵尾的。斜线（黑色和红色）都表示没有鼻音韵尾的地点。176 个地点（黑色斜线）完全没有鼻音成分。180 个地点（红色斜线）虽然没有鼻音韵尾，但其元音带有鼻音成分（鼻化元音）。从中可以看出，红色斜线所示的地点和黑色斜线所示地点互重叠或接近的趋势。红色斜线（鼻化元音）的地点也许在非鼻化的阶段中（$\tilde{v} > v$）。

第二类是带有鼻音韵尾的。也可以分成 4 个小类。最多的是-n 尾（317 个地点，黑色圆形），其次是-ɴ 尾（197 个地点，绿色），第三是-m 尾（147 个地点，方形），

最后是-ŋ尾（81 个地点，蓝色）。

从中古音出发，演变次序是-m > -n 或 -ŋ（-N > ṽ） > -0（零）。鼻化元音应该是过渡阶段。带有鼻音韵尾的加起来达 742 个地点，占 68%。

从中古-m 韵尾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m > -n
> -ŋ, -N
> ṽ > 0

最明显的是，-m 尾都在南方方言中出现的。-m 尾的更详细的分布地点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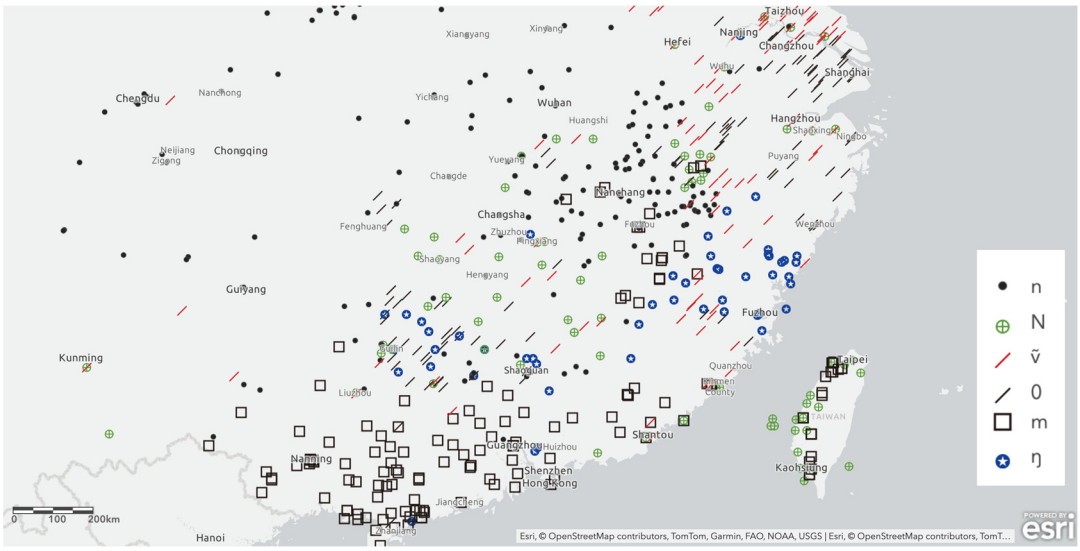


图 2　南方方言中-m 尾地理分布

“三”的中古音韵尾为-m，唇音韵尾-m 保存在蒙古字韵，中原音韵等。有趣的是，据远藤（2016），13 世纪末的波斯汉对音资料《脉诀》也有-m 尾，也有-ŋ尾的反映。-ŋ 尾可以在西北地区观察之外，也在闽语中出现。请参看图 1 和图 2。

三、声母

以下是“三”的声母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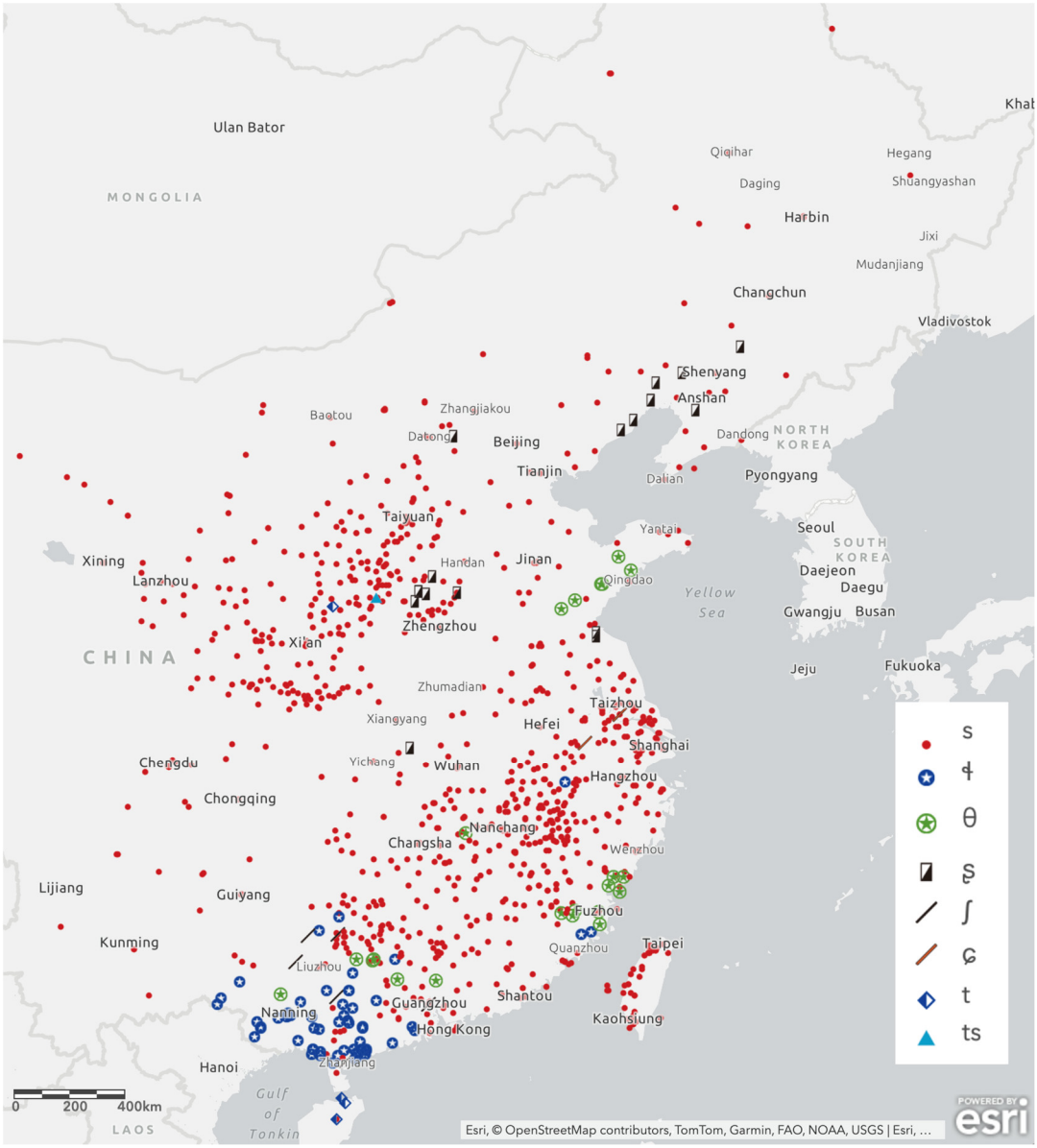


图 3　“三”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图 3 表示“三”的声母的全国地理分布。“三”的中古音声母为心母 *s*-。从图 3 看出，大部分方言还保存着中古音声母 s-（红色圆形），一共 984 个地点，大约占 90%。其次是边擦音 ɬ-（60 个地点，蓝色），第三是齿间音 θ-（22 个地点，绿色）。也有些翘舌音 ʂ-的地点（18 个地点）。在少数地点有经过颚化的 ɕ-或 ʃ-（一共 9 个地点），也

有经过塞化的 t-（5 个地点），临汾有读为 ts-的地点（山西侯马城关）。

从中古音心母 s-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s > ɬ-
> θ-
> ɕ-或 ʃ-（颚化）
> ʂ-（翘舌化）
> t- （塞化）
> ts- （塞擦化）

翘舌音 ʂ-跟上古音的*s.rum 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据远藤（2016），13 世纪末的波斯汉对音资料《脉诀》也有塞擦音声母 tsʰ-的反映（tsʰam）。这跟山西侯马城关的 ts-也许有关系。

四、元音

以下是“三”的元音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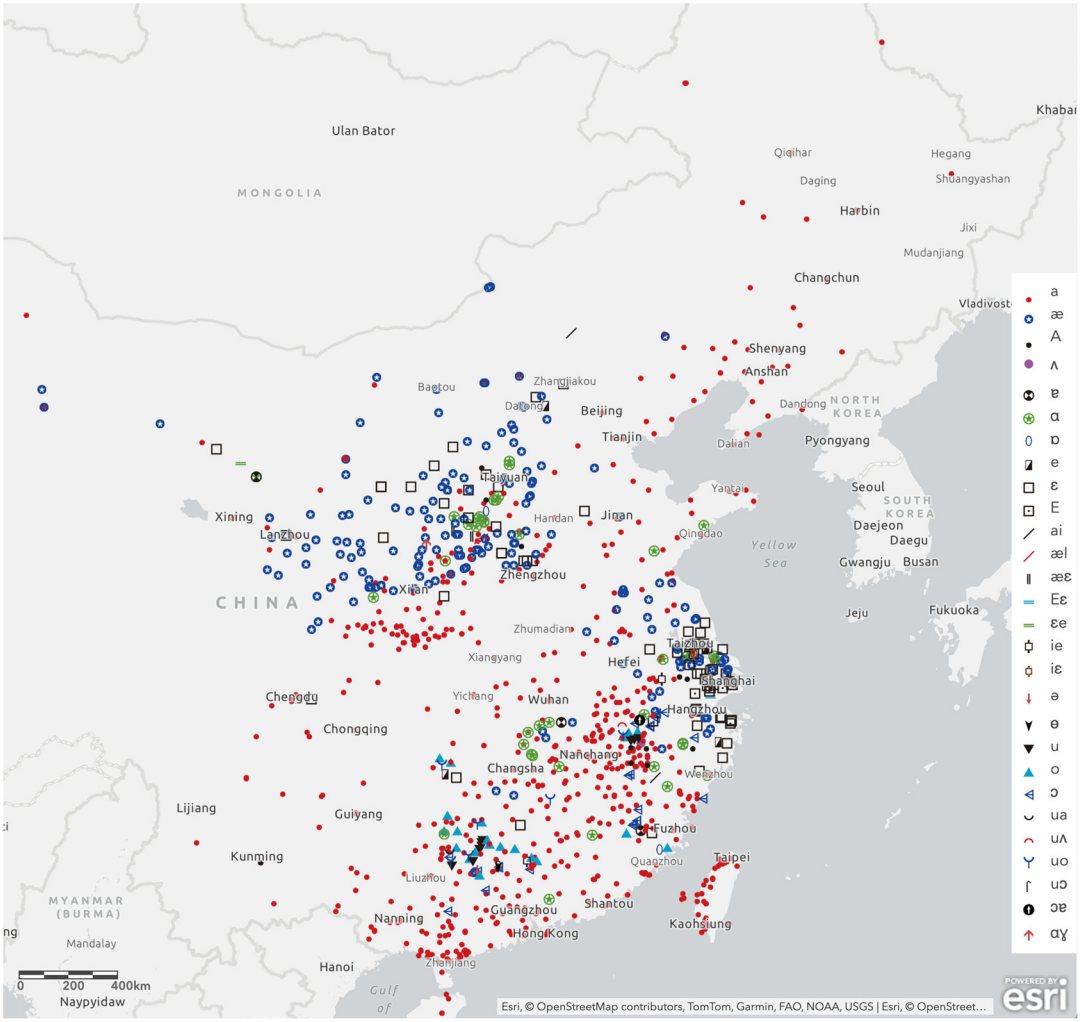


图 4　“三”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图 4 表示“三”的元音的全国地理分布。这图没有反映鼻化元音的分布，鼻化元音都归为非鼻化元音里去（如：ã→a）。元音的变化较为复杂，有单元音，也有双元音之外，开合口都有。最多的是红色圆形 a，691 个地点，占 63%。其次是蓝色圆形的 æ，186 个地点，占 17%。

明显的是 æ 与方形的 e，ɛ 类较接近，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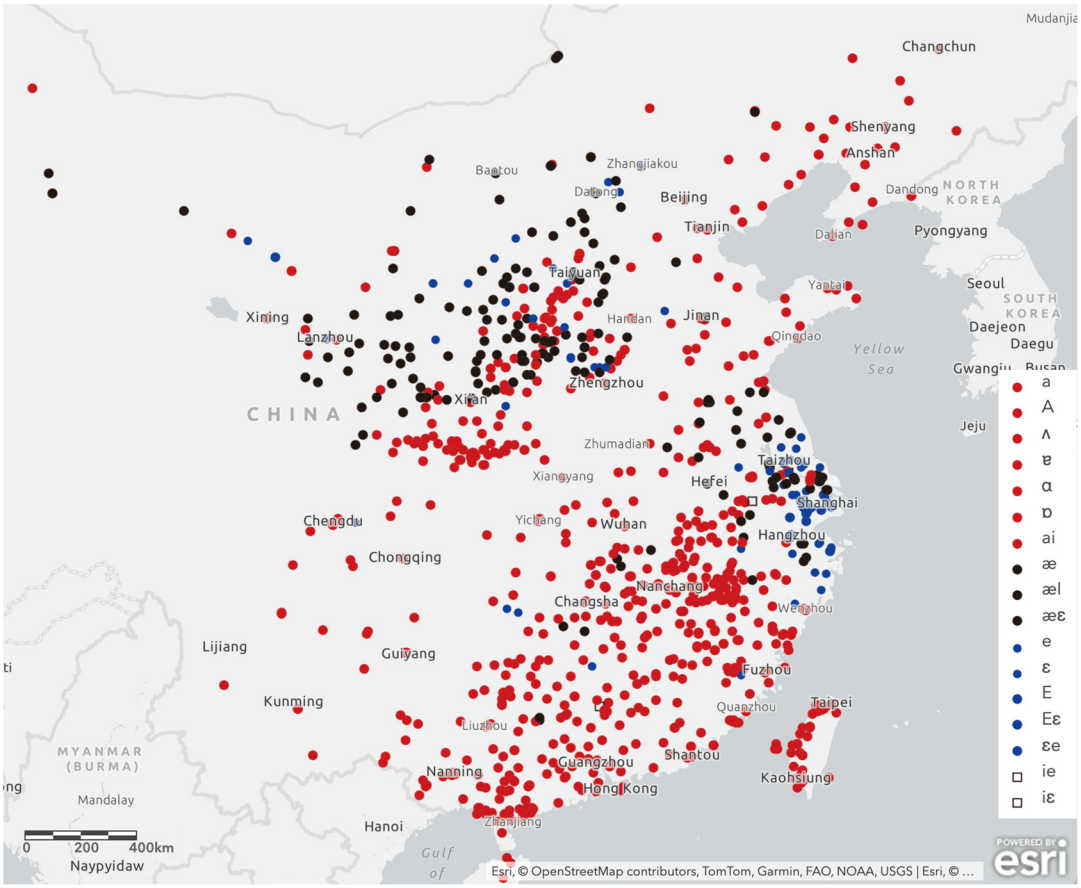


图 5　“三”的 æ 与 e，ɛ 地理分布

æ 类（黑色圆形）与 e 类、ɛ 类（蓝色圆形）的分布有互重叠或接近的趋势。集中于山西和陕西地区以外，江苏和浙江一带也有类似的现象。从此分布可推测，e、ɛ 类原来是 æ 的（元音高化）。有介音-i-的也许从 e 演变过来的：

a > æ
> æ > ɛ
> æ > ɛ > e
> æ > ɛ > e > ie

另外，合口成分的分布也较明显。如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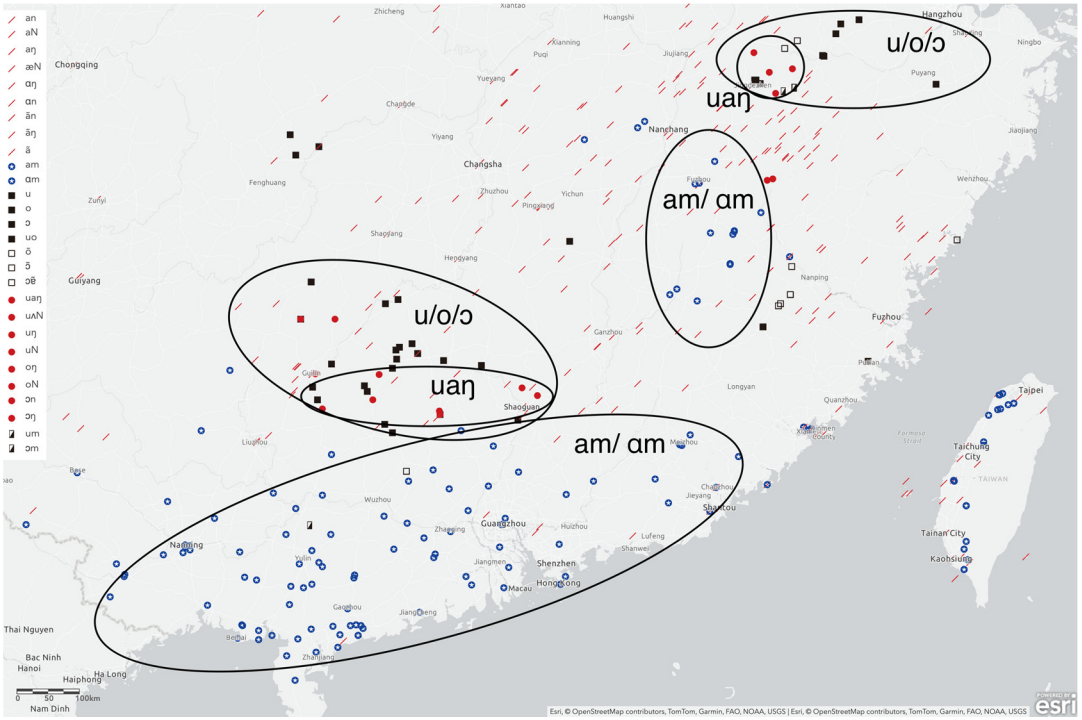


图 6　“三”的合口成分与-m 韵尾地理分布

广西、广东地区还保存着中古音的-m 尾（蓝色），其北部有开音节的合口元音 u、o、ɔ、uo（黑色方形）之外，还有-uŋ、-uaŋ等带有鼻音韵尾的合口元音的音节（红色圆形）。从此分布可推测，合口成分也许是-m 尾引起的同化。

am > am, ɑm
　　> uam > um, ɔm
　　> uam > uaŋ
　　> uam > (uaŋ) > uə̃ > ɔ̃
　　> uam > (uaŋ) > uə̃ > uo, ɔ

附记：本文为 JSPS KAKENHI（Grant Number 23K25322）的一个成果。

参考文献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远藤光晓 2016 《元代音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四”的汉语部分（稿）

野原 将挥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四”有可能和原始藏缅语*b-ləy（四）同源。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971 地点“四”字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分别讨论“四”的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就“四”的上古音，上古音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Baxter and Sagart（2014）把“四”拟为*s.li[j]-s。有趣的是，藏缅语的“四”有流音-l-，而且汉语“泗”似乎跟“涕”有同源关系（王力（1982:418）），因此有学者给“四”构拟流音*-l-。

二、声母

以下是“四”的声母的分布：



图 1　“四”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图 1 表示“四”的声母的全国地理分布。“四”的中古音声母为心母 *s*-。因此，其声母分布跟数字“三”（也是心母字）大同小异。也可参看数词“三”的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从图 1 看出，大部分方言还保存着中古音声母 s-（红色圆形），一共 825 个地点，

大约占 85%。其次是边擦音 ɬ-（57 个地点），第三是齿间音 θ-（20 个地点）。也有些翘舌音 ʂ-的（17 个地点）。在少数地点有经过颚化的 ɕ-或 ʃ-（一共 46 个地点），也有经过塞化的 t-（4 个地点），临汾有读为 ts-的地点（山西侯马城关）。

与数字“三”不相同的是，ɕ-和 ʃ-的分布。“三”的声母为 ɕ-和 ʃ-的地点一共有 9 个。“四”读为 ɕ-和 ʃ-的地点远远超过数词“三”的地点，一共有 46 个地点。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应该跟“四”的元音-i-的分布有关系。除此之外，翘舌音 ʂ-的分布也跟元音-ɿ-的分布也有关系。也可参看图 2 的元音-ɿ-的地理分布。

从中古音心母 s-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s > ɬ-
> θ-
> ɕ-、ʃ-
> ʂ-
> t-
> ts-

三、元音

以下是“四”的元音的分布：



图 2　“四”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图 2 表示“四”的元音的全国地理分布。最普遍的是红色圆形 ɿ，640 个地点，占 66%。其次是-i-，191 个地点，占 20%。元音 i 都集中分布在南方地区。第三是双元音 ei，46 个地点，占 5%。元音 ei 也分布在南方地区。单元音 ʅ 的分布跟翘舌音声母 ʂ 的分布完全一致。

除了单元音 V 之外，有不少双元音 VV 的地点。有趣的是，双元音都分布在南方方言地区。双元音的分布比 i 的分布更偏南。图 3 表示南方地区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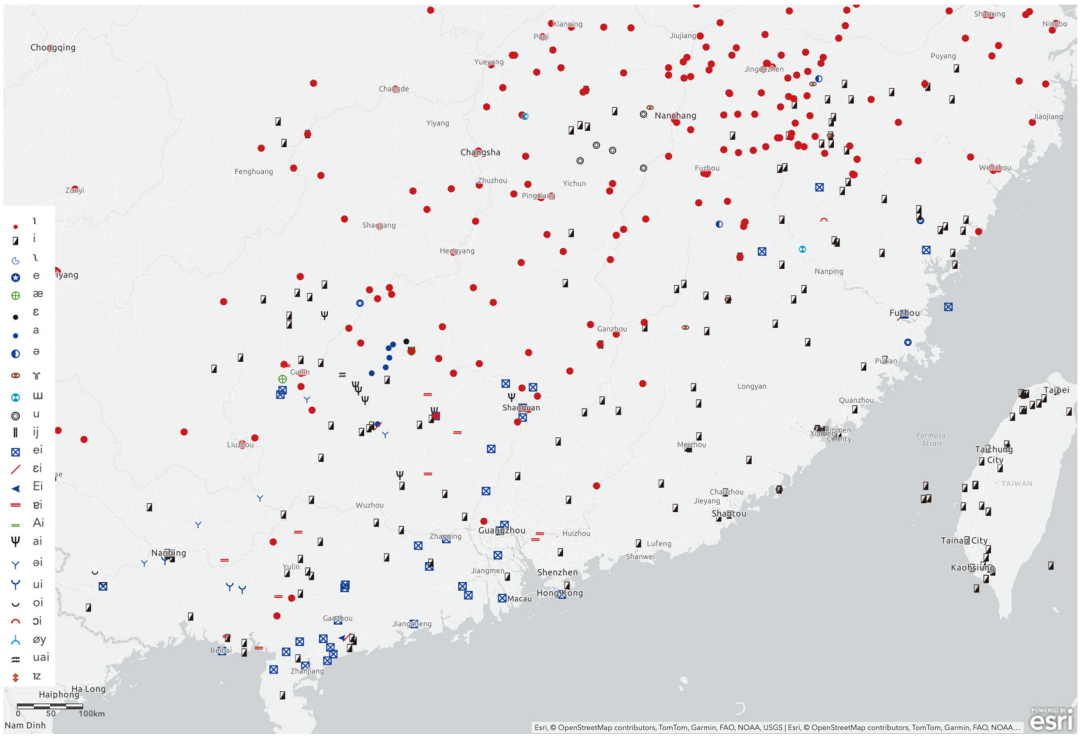


图 3　“四”南方地区地理分布

如上所示，i 分布在南方地区。它的分布跟双元音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推测，i 变为 ei 等双元音化发生在南方地区。

图 4 是单元音、双元音、合口成分的分布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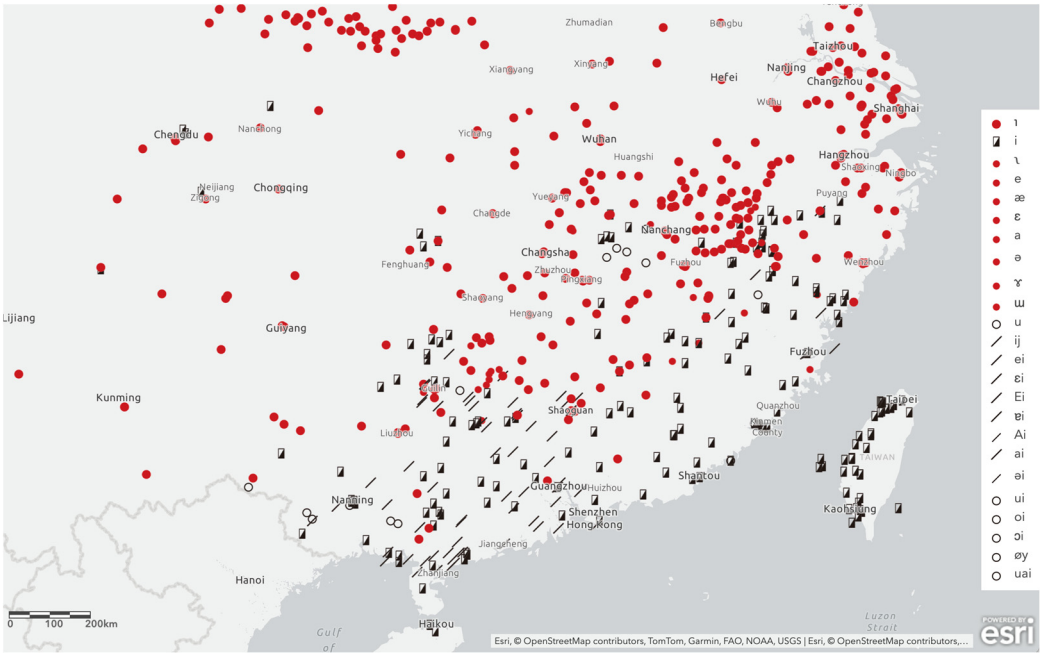


图 4　“四”的单元音、双元音、合口成分的分布地图

与“四”相同，数词“三”也有些变为合口的音节。但是，其分布并不跟数字“四”的合口成分的地理分布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三”的合口化和“四”的合口化的条件没有任何联系，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结果。

从中古音-ij 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ij > ʅ
　> i
　> i > ei
　> i > ei > ɛi
　> i > ei > ɛi > ai
　> ui
　> ui > oi
　> ui > oi > øy

附记：本文为 JSPS KAKENHI（Grant Number 23K25322）的一个成果。

参考文献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五”的汉语部分（稿）

八木 坚二
大阪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五”的中古音韵地位是上声疑母姥韻（疑古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nguX。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27 个地点的“五”字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五”的汉语部分，分别讨论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我们利用已刊行的方言调查报告，绘制了 1027 地点的地图。“五”的中古音韵地位是上声疑母姥韻（疑古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nguX。

二、韵尾

资料中出现的韵尾有 v, ʊ, m, n, ɲ, ŋ, N, ʔ和元音韵尾。其中出现最多的韵尾是元音韵尾，占全体的约 66%。其次多的是 ŋ（包括自成音节），占全体的约 26%。其次还有 n、m、v，但其出现频率只占全体的 3%以下。甚至 ʊ、 ɲ、 ʔ和 N 的出现率只有全体的 1%以下。图 1 表示“五”韵尾全国地理分布，表 1 表示“五”的韵尾地图的凡例。

v 韵尾的音节多为自成音节，以北方为中心比较零散地，但相当广泛地分布。如：

[ʔʊv] ：余姚（钱乃荣 1992）

[v] ：榆社（李建校等 2007）

这些例子的分布周围有很多 v 声母的分布，所以这些韵尾的出现应该跟声母 v 的发生有相当大的关系。

ʔ韵尾在以山西和浙江等地方分布。这些地区大部分有入声韵尾的ʔ，所以这些韵尾的产生有可能是舒声促化的结果。如：

[uʌʔ] ：平遥（侯精一主编 1999）

[uʔ] ：灵石（高晓莉 2015）

[ŋuʌʔ] ：常山县（曹志耘等 2000）

v 和ʔ以外的韵尾（m, n, ɲ, ŋ, N）都为鼻音，基本上以南方地区为中心分布。分布最广的 ŋ 在南方广泛地分布。有些地区有“元音+鼻音韵尾”的形式。如：

[ʊŋ] 阳江（北大 1989）

[oŋ] 通道县菁芜州镇（彭建国 2019）

这些形式可以视为声母 ŋ 由音节初移动到音节末的。ŋaN 或者有鼻音化韵母的形式可能是反应其移动的中间形式。如：

[ŋaN]：全州县文桥镇（唐昌曼 2005）

[ŋɔ̃]：厦门（李榮主編 1998）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nguX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韵尾演变的过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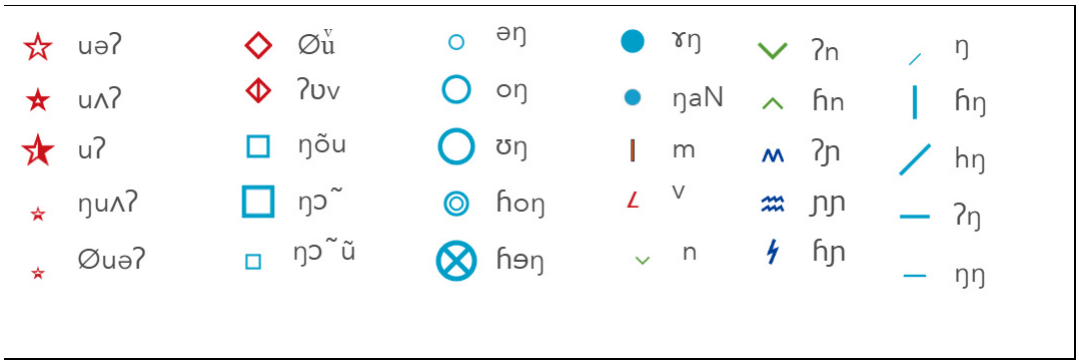
X ＞ v

＞ ŋ, m, n, ɲ, N

＞ ʔ

＞ 0

表 1 “五”的韵尾地图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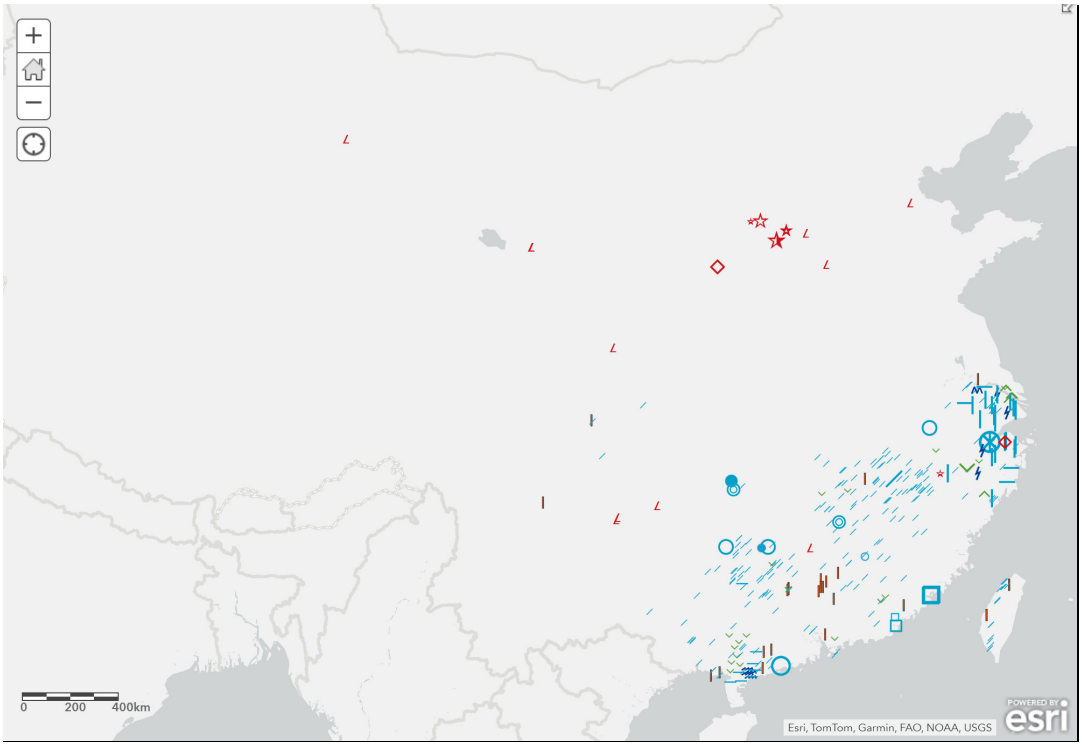


图 1　“五”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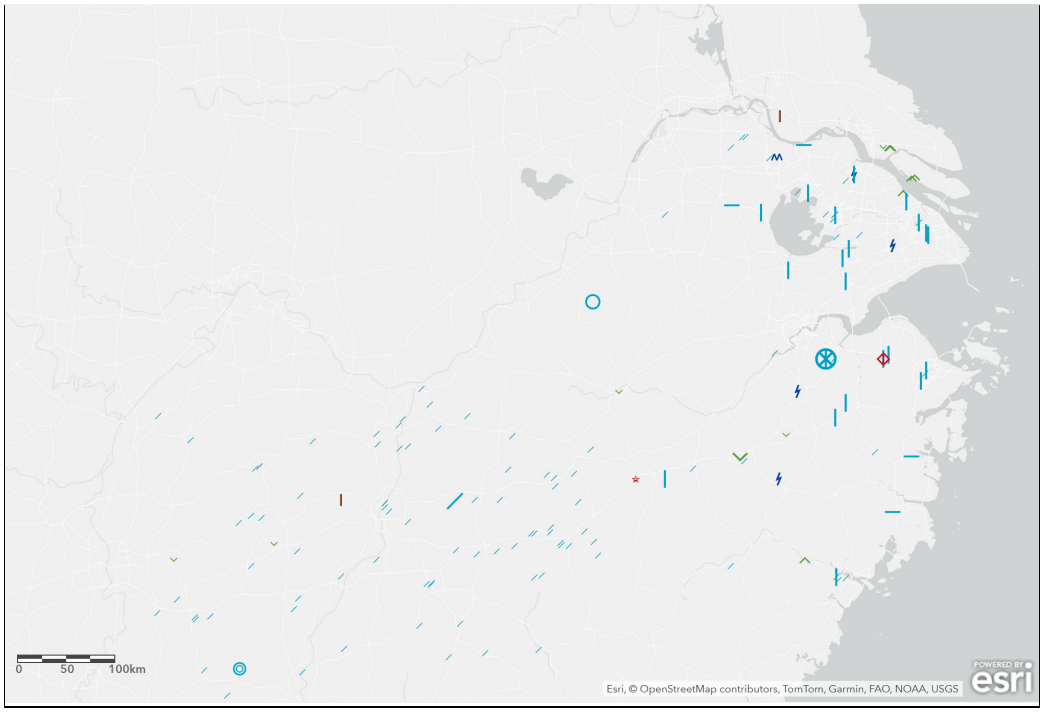


图 2　华中地区“五”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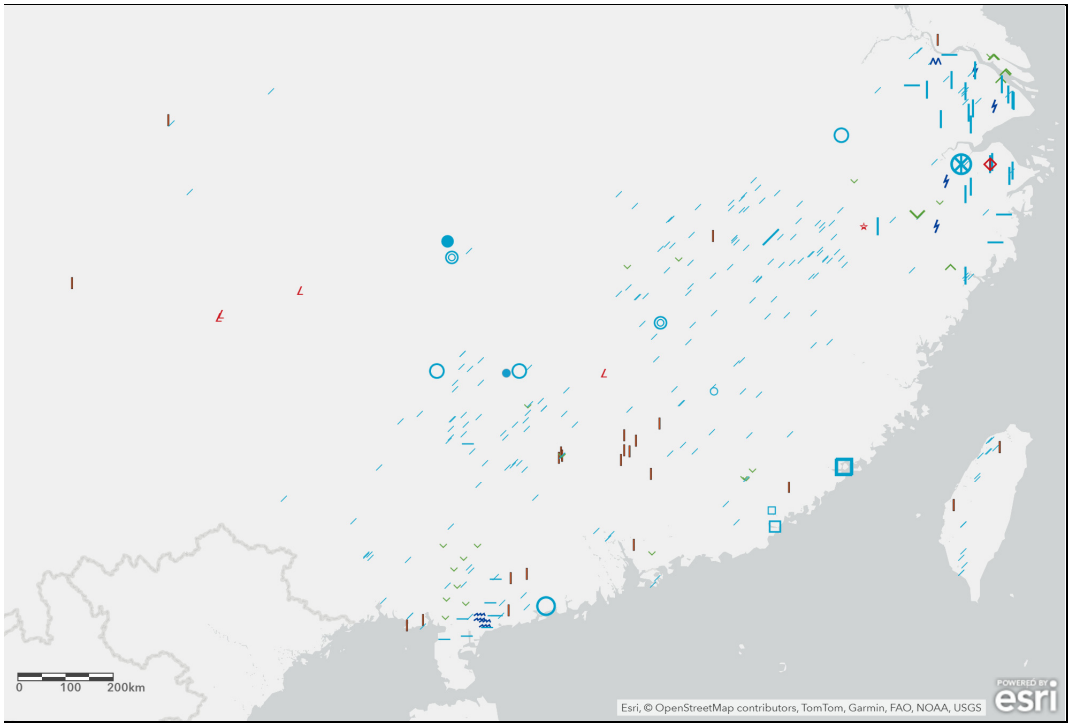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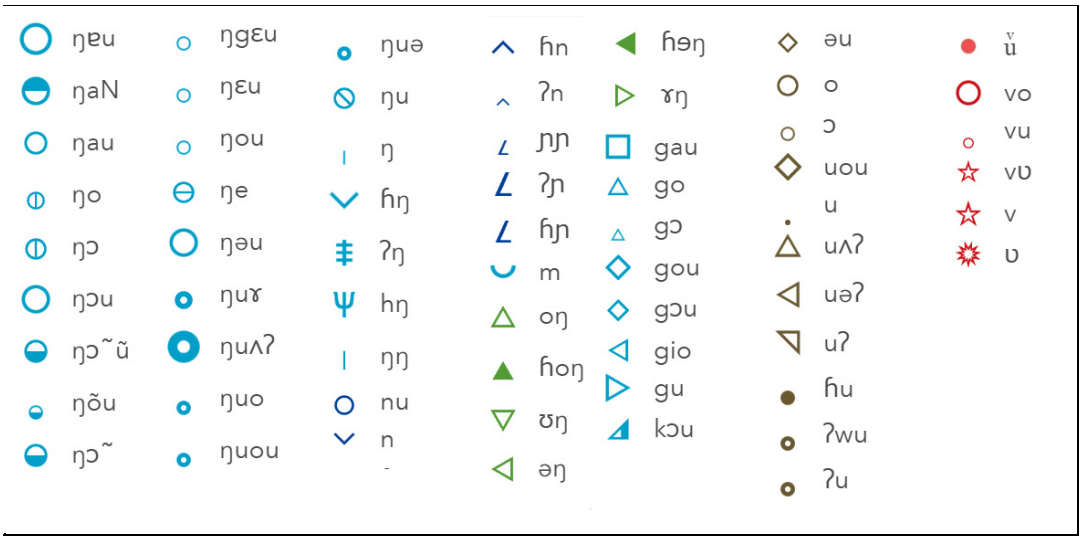
图 3　华南地区“五”韵尾地理分布

三、声母

资料中出现的声母有 g, ɦ, h, k, m, n, ɲ, ŋ, v, ʊ, ʔ和零声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元音声母（零声母），占全体的 37%（出现的元音有 u, ʊ, ɔ, o, ɤ, ə 等，其中最多的是 u，占元音声母中的 90%以上）。其次多的是 ŋ 和 v，各占全体的 32%和 16%。接下来有 g, ɦ, m, n, ʔ等，但各只占全体的 5%以下。

零声母的分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地区扩大其分布。v 声母有分布在零声母的周围地区的倾向，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分布比较多，可是在长江流域也有分布。以 ŋ 为声母的音节（包括自成音节）在南方很广泛地分布。声母 g 的分布也都在南方，其分布多在闽语地区。m、n、ɲ 等 ŋ 以外的鼻音声母也在南方零散但相对广泛地分布。图 4 表示“五”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表 2 表示“五”的声母地图凡例。

表 2　“五”的声母地图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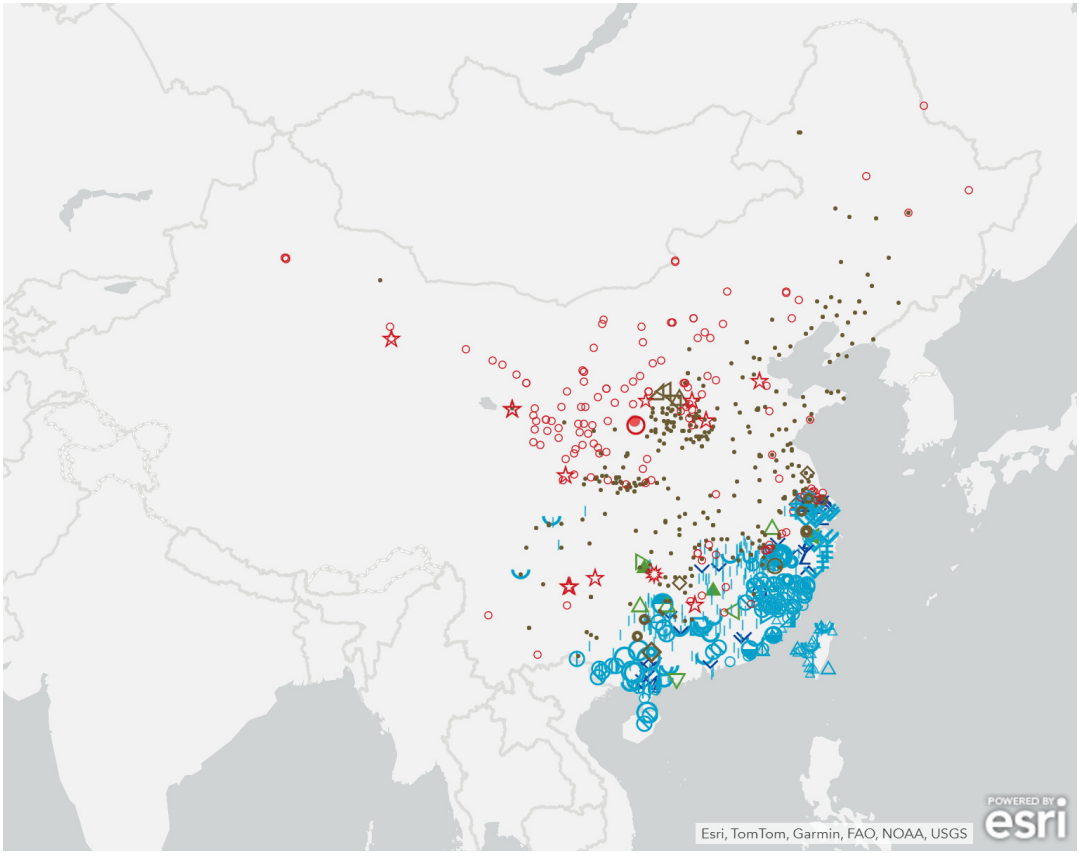


图 4　“五”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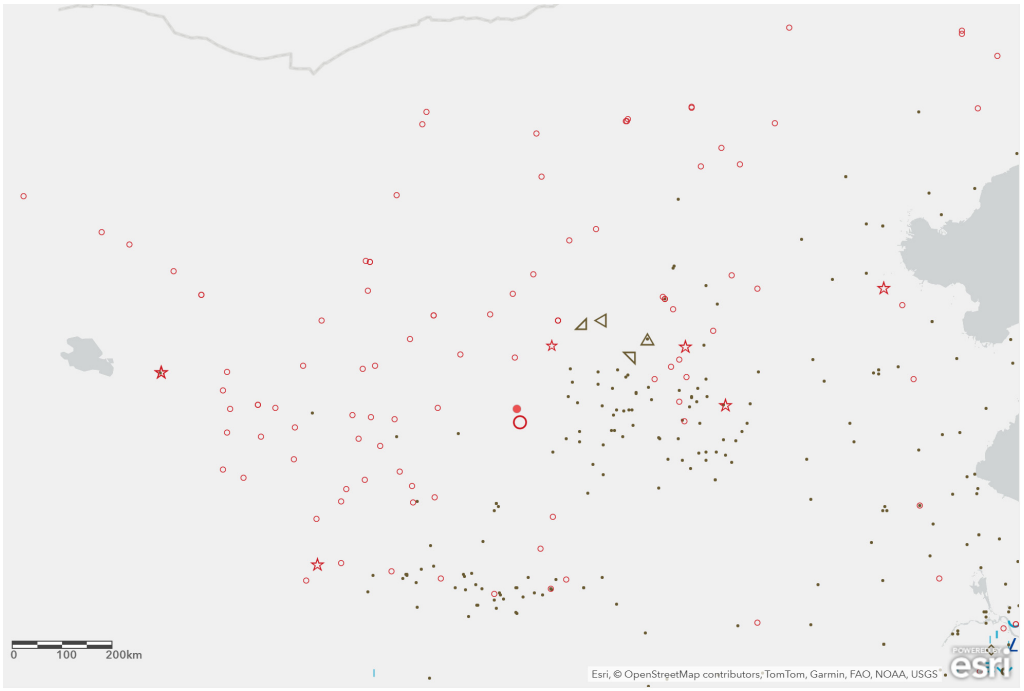


图 5　华北地区“五”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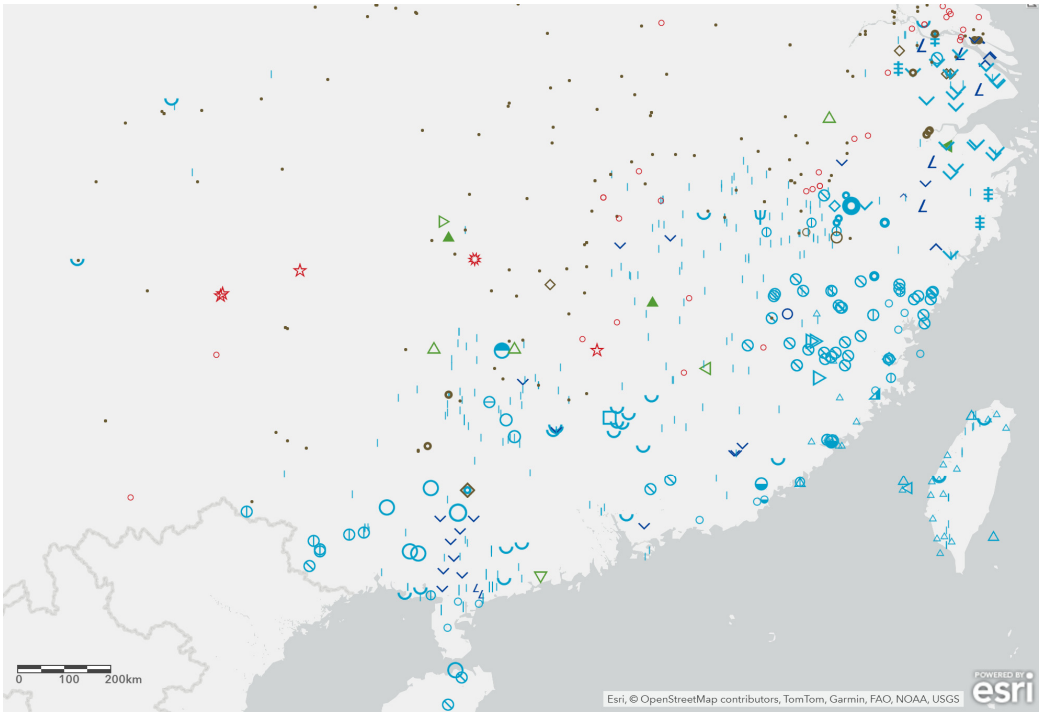


图 6　华南地区“五”声母地理分布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nguX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声母演变的过程如下；

ng ＞ ŋ

＞ m, n, ɲ, ɦŋ, ɦm, ɦn, hŋ, ʔn, ʔɲ, ʔŋ

＞ g ＞ k

＞ v, ʊ

＞ ɦu, ʔu

＞ 0

四、元音

资料中出现的韵母（元音，但包括自成音节）有以下 32 钟。

ɐu, a, au, ɛu, uʌ, ɔ, ɔ̃, ɔu, ɔ̃ũ, ə,əu, uə, uɤ, ɤ, o, ou, õu, io, uo, uou, ɘ, e, ʊ, u, ů, m, v,ʊ, ʊv, n, ɲ, ŋ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u，占全体的 57%。其次的 ŋ（自成音节）占全体的 25%。接下来有 ɔ, n, m, o, ou, v, əu 等韵母，但各只占全体的 4%以下。这些 9 中韵母占全体的 96%。如上述，鼻音的自成音节在南方广泛地分布。ɐu、au 等，拥有低元音的韵母只在南方分布，基本上以 ŋ 或 g 为声母。从半低到半高的元音分布也以南方为中心，但是在山西附近也有分布的。图 7 表示“五”元音的全国分布，表 3 表示“五”元音地图的凡例。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nguX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元音演变的过程如下：

uX

＞u, ů

＞m, v, ʊ, ʊv, n, ɲ, 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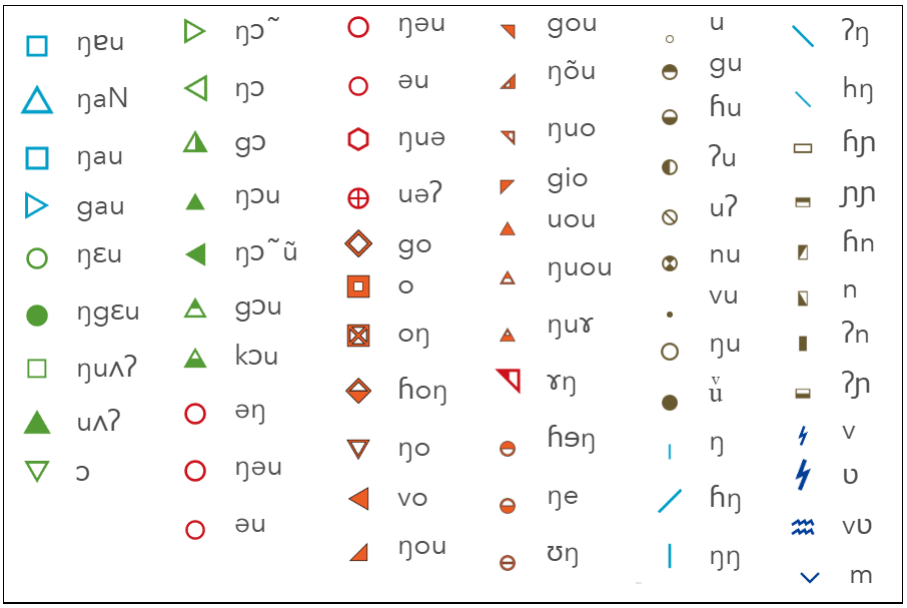
＞uɤ, uo ＞uou ＞ ou, õu, ʊŋ, io ＞ o ＞ ɤ

＞uʌ ＞ ɛu, ɔu, ɔ̃ũ ＞ ɔ, ɔ̃,

＞uə, əu ＞ ə, ɘ, e

＞au, ɐu ＞ a

表 3　“五”元音地图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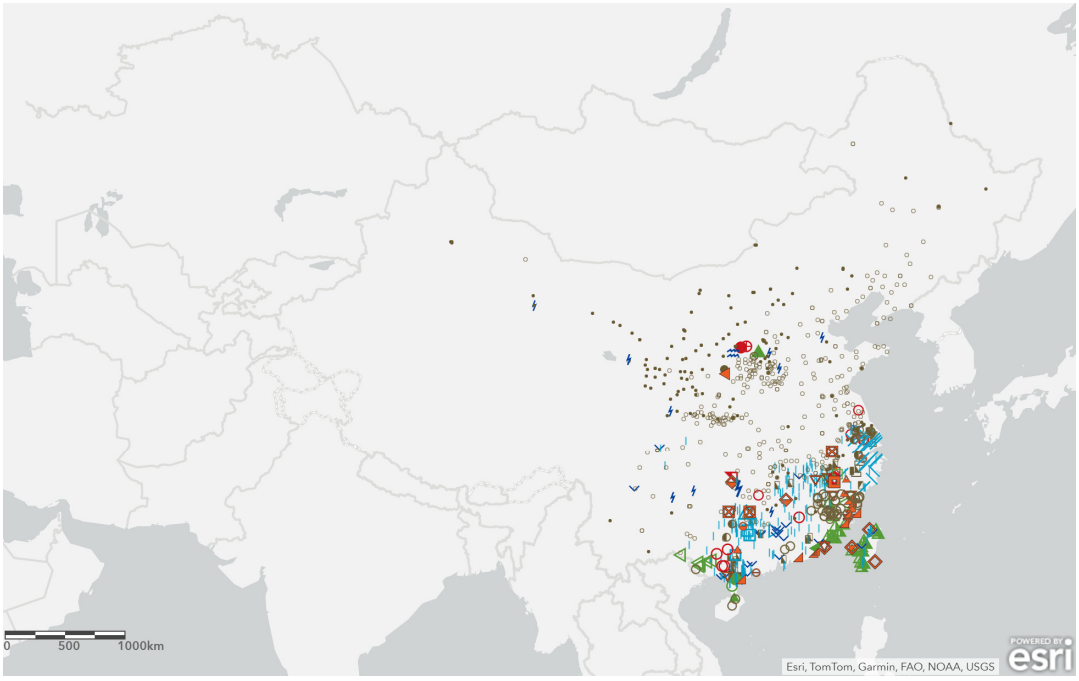


图 7　“五”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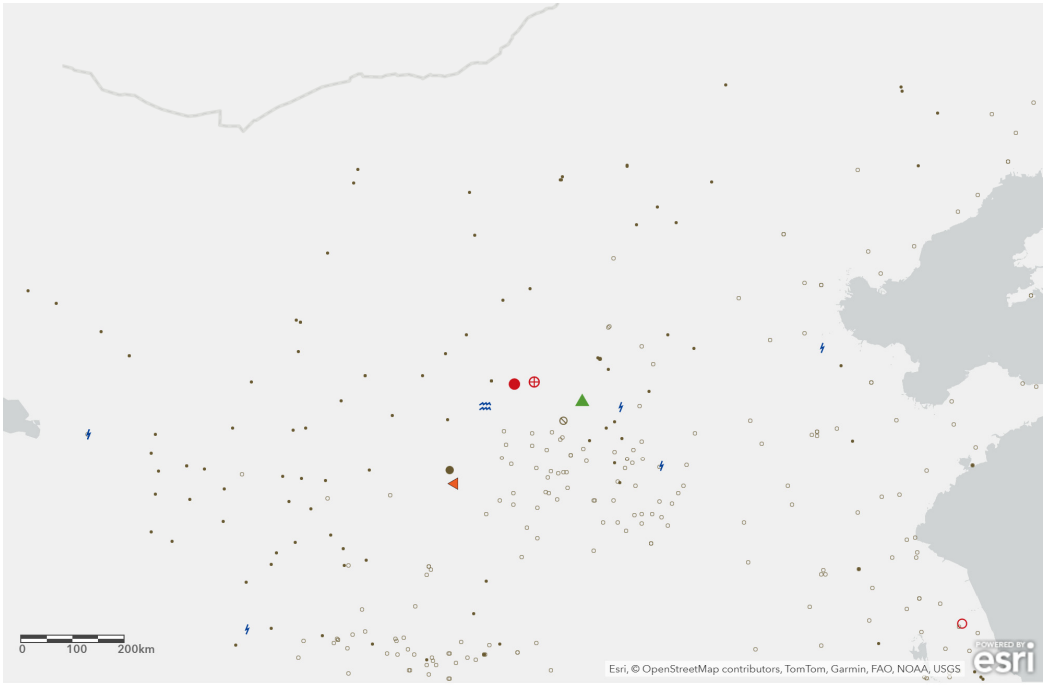


图 8　华北地区“五”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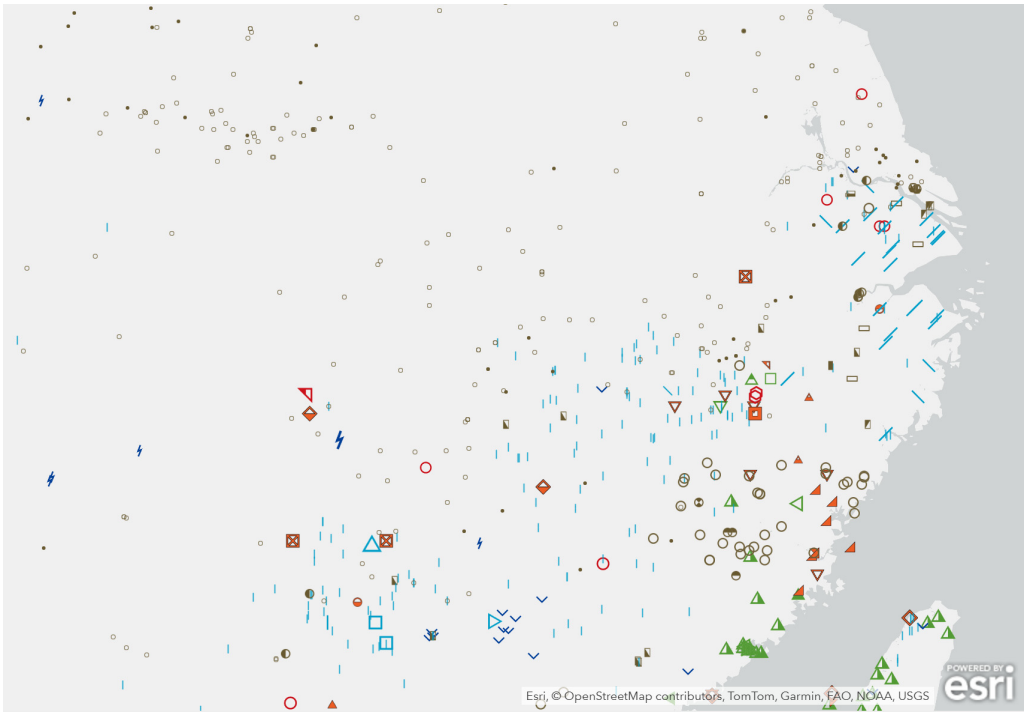


图 9　华中地区“五”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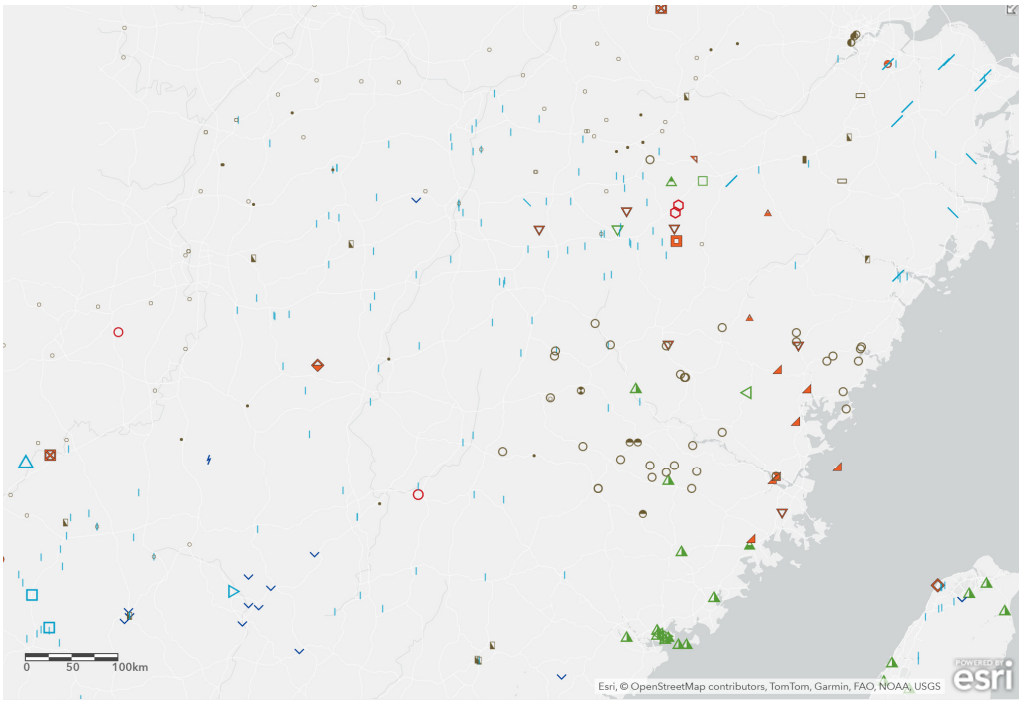


图 10　华南地区“五”元音地理分布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23K00486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曹志耘等 2000《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好文出版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高晓莉 2015《灵石方言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
侯精一主编 1999《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平遥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建校等 2007《榆社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榮主編 周長楫 1998《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厦门方言词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钱乃荣 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唐昌曼 2005《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全州文桥土话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彭建国 2019《中国濒危语言志 湖南通道本地话》，商务印书馆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do, M. 2016. Goals of the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2015-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1-4.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六”的汉语部分（稿）

八木 坚二
大阪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六”的中古音韵地位是入声来母屋韻（力竹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ljuwk。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44 地点“六”字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六”的汉语部分，分别讨论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我们利用已刊行的方言调查报告，描绘了 1044 地点的地图。“六”的中古音韵地位是入声屋韻来母（力竹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ljuwk。

二、韵尾

资料中出现的韵尾有ʔ, k, g, kŋ, ɬ 和元音韵尾。其中出现最多的韵尾是元音韵尾，占全体的约 63%。其次多的是ʔ，占全体的约 20%。其次多的 k 占全体的 15%。其他韵尾（g, kŋ, ɬ）的出现率只有全体的 1%以下。图 1 表示“六”韵尾全国地理分布，表 1 表示“六”的韵尾地图的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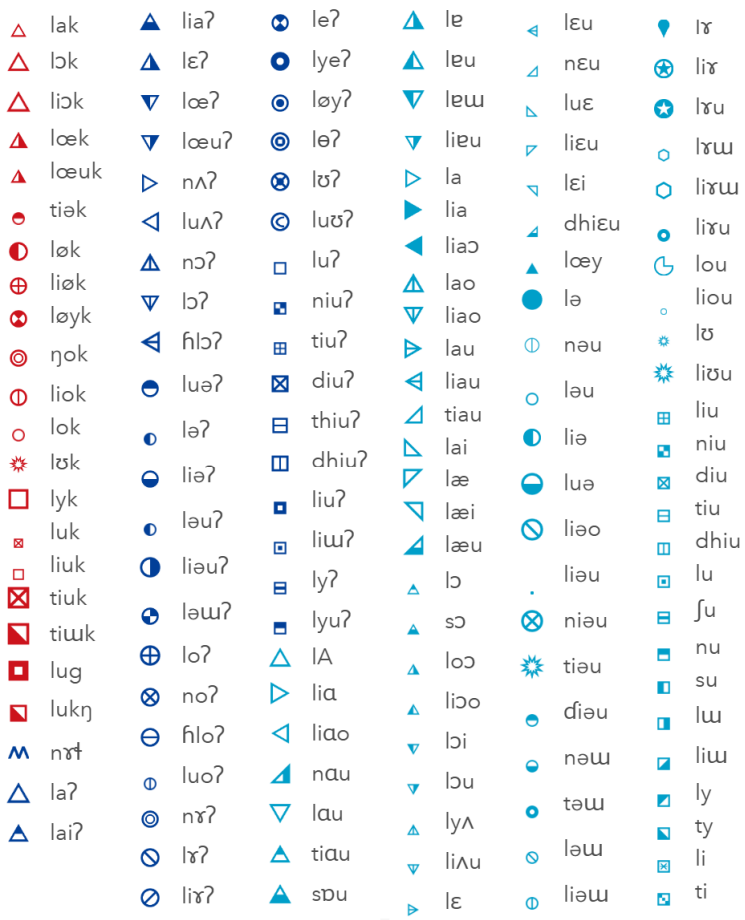
与一般的入声韵尾的分布情况同样，韵尾 k 的分布以南方的两广地区为中心，ʔ韵尾在长江流域和山西附近有分布。其他大部分地区为元音韵尾。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ljuwk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韵尾演变的过程如下；

k ＞ ʔ, ɬ ＞ 0

＞ g, kŋ ＞ 0

表 1　“六”韵尾地图凡例


lak
lɔk
liɔk
lœk
lœuk
tiək
løk
liøk
løyk
ŋok
liok
lok
lʊk
lyk
luk
liuk
tiuk
tiɯk
lug
lukŋ
nɤɬ
laʔ
laiʔ
liaʔ
lɛʔ
lœʔ
lœuʔ
nʌʔ
luʌʔ
nɔʔ
lɔʔ
ɦlɔʔ
luəʔ
ləʔ
liəʔ
ləuʔ
liəuʔ
ləɯʔ
loʔ
noʔ
ɦloʔ
luoʔ
nɤʔ
lɤʔ
liɤʔ
leʔ
lyeʔ
løyʔ
ləʔ
lʊʔ
luʊʔ
luʊʔ
niuʔ
tiuʔ
diuʔ
thiuʔ
dhiuʔ
liuʔ
liɯʔ
lyʔ
lyuʔ
lA
liɑ
liɑo
nɑu
lɑu
tiɑu
sɒu
lɐ
lɐu
lɐɯ
liɐu
la
lia
liaɔ
lao
liao
lau
liau
tiau
lai
læ
læi
læu
lɔ
sɔ
loɔ
liɔo
lɔi
lɔu
lyʌ
liʌu
lɛ
lɛu
nɛu
luɛ
liɛu
lɛi
dhiɛu
lœy
lə
nəu
ləu
liə
luə
liəo
liəu
niəu
tiəu
ɗiəu
nəɯ
təɯ
ləɯ
liəɯ
lɤ
liɤ
lɤu
lɤɯ
liɤɯ
liɤu
lou
liou
lʊ
liʊu
liu
niu
diu
tiu
dhiu
lu
ʃu
nu
su
lɯ
liɯ
ly
ty
li
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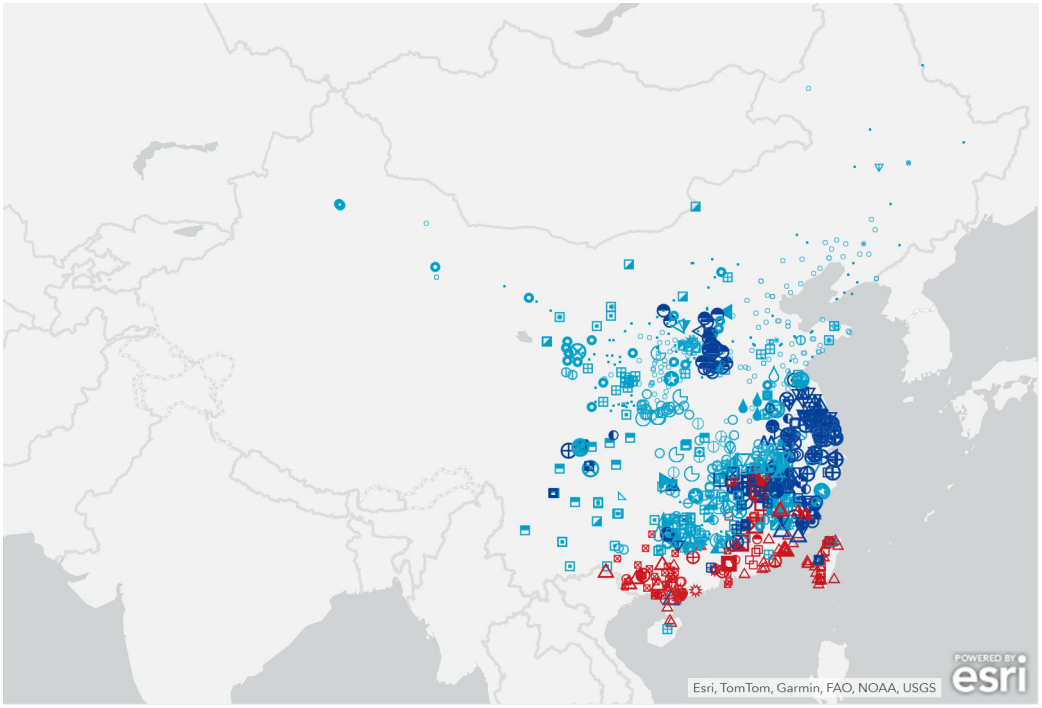


图 1　“六”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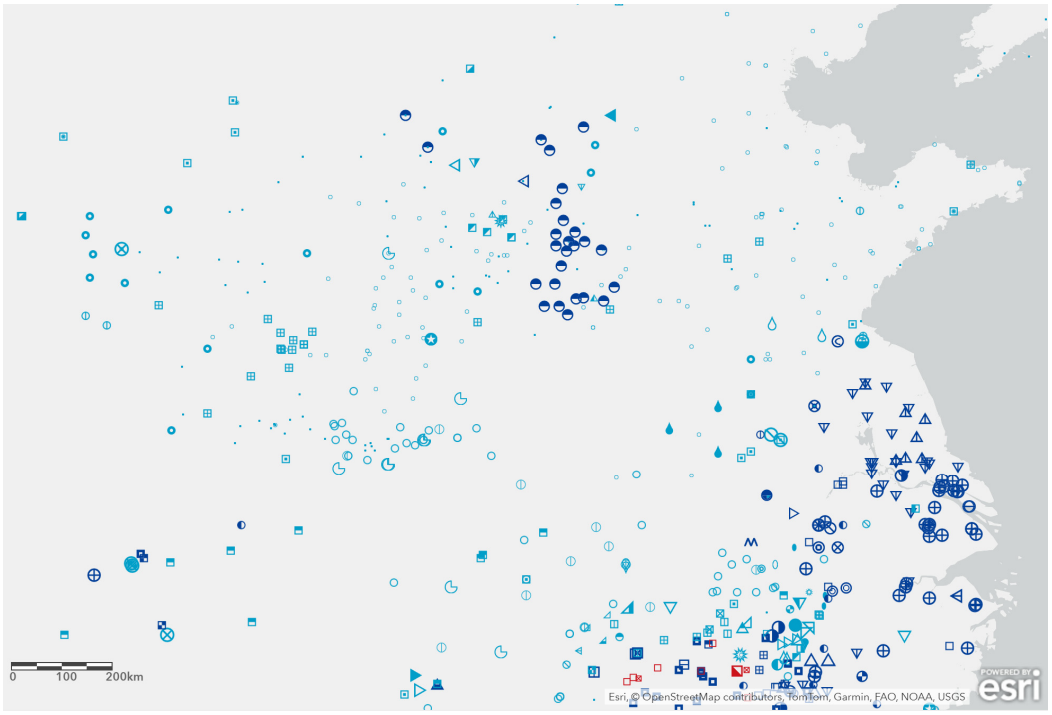


图 2　华中地区“六”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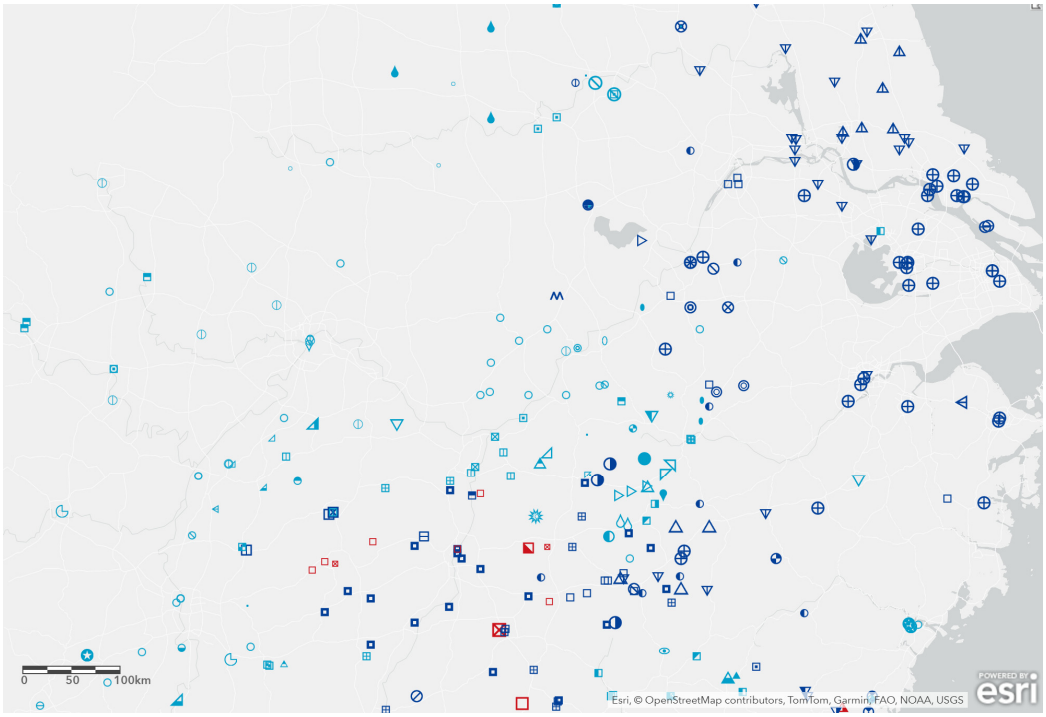


图 3　长江下游地区“六”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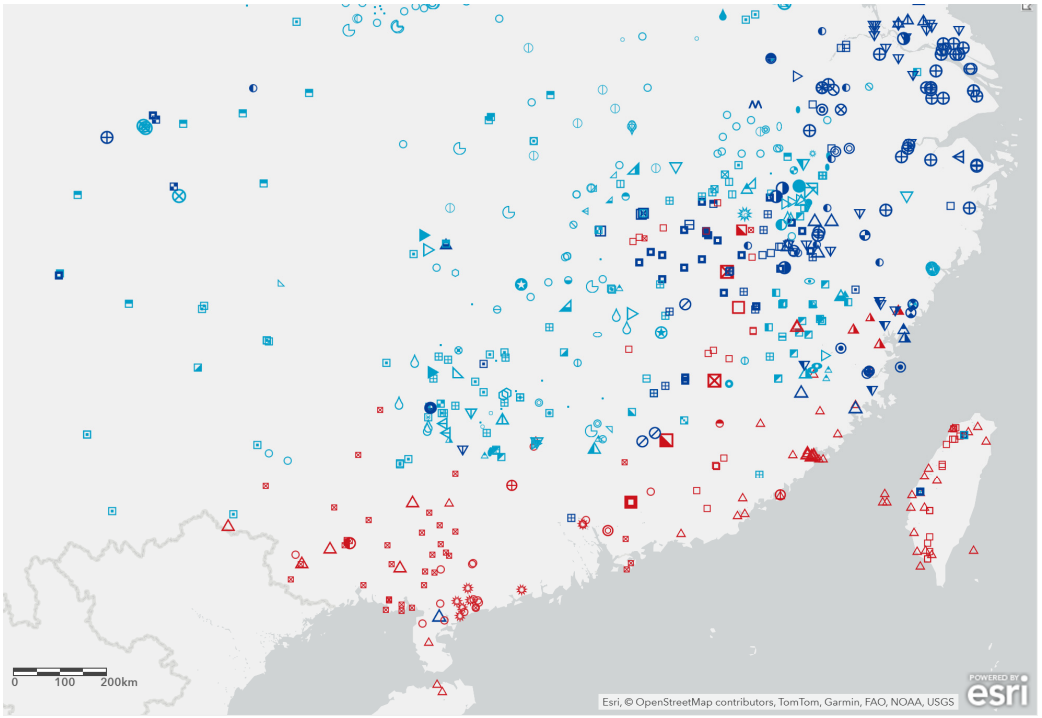


图 4　华南地区“六”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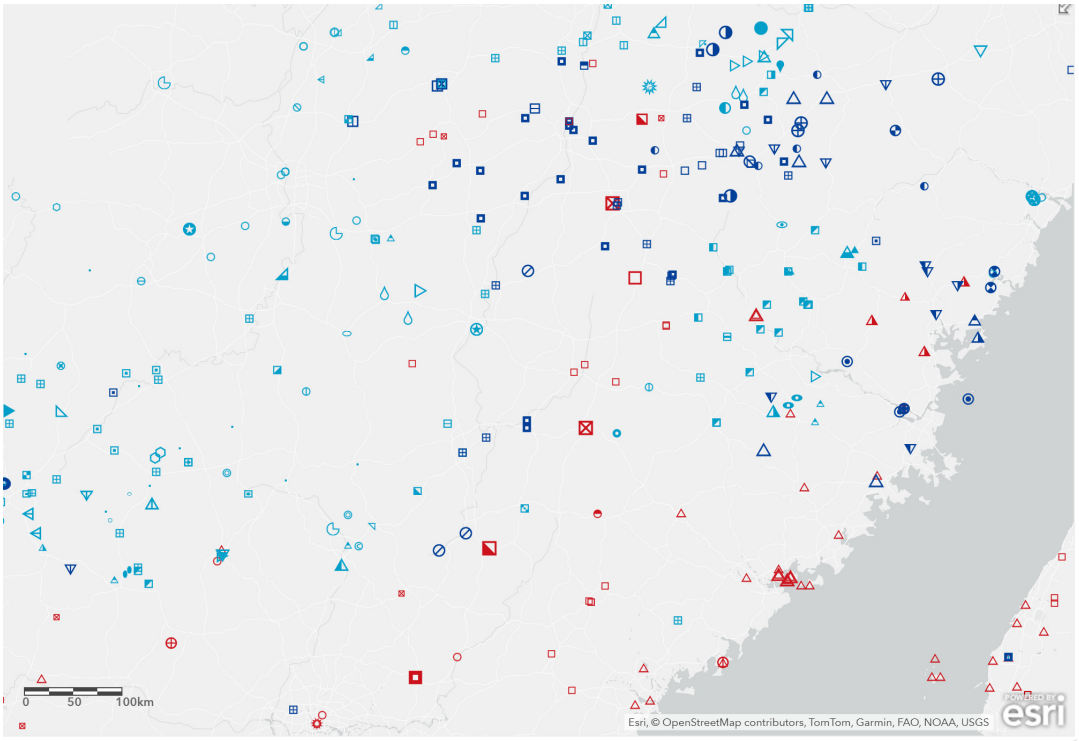


图 5　东南沿海地区“六”韵尾地理分布

三、声母

我们的资料中出现的六的声母有 d, ɗ, d^h, t, t^h,l, ɦl, n, s, ʃ, ŋ。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l，占全体的 89%，其次多的 n 占全体的 5.7%，其次多的 t 占全体的 2.3%。其他声母各占全体的 1%以下。

六的声母的全国分布大部分为 l，在长江流域 l 和 n 经常合并，所以六的声母也为 n 的多。在以江西的客赣方言区为中心，d, ɗ, d^h, t, t^h, s, ʃ 等声母分布。这些辅音虽然语音上比较多样，可是其地理上的分布比较临近，其演变的背后可能存在类似的变化因素，还要注意到 s 与 ln 合并地区的连续性。图 6 表示“六”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在表 2 表示“六”的声母地图凡例。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ljuwk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声母演变的过程如下；

l ＞ ɦl

　＞ n, ŋ

$> d, d\c > d^h > t, t^h, s, \int$

表 2 “六”声母地图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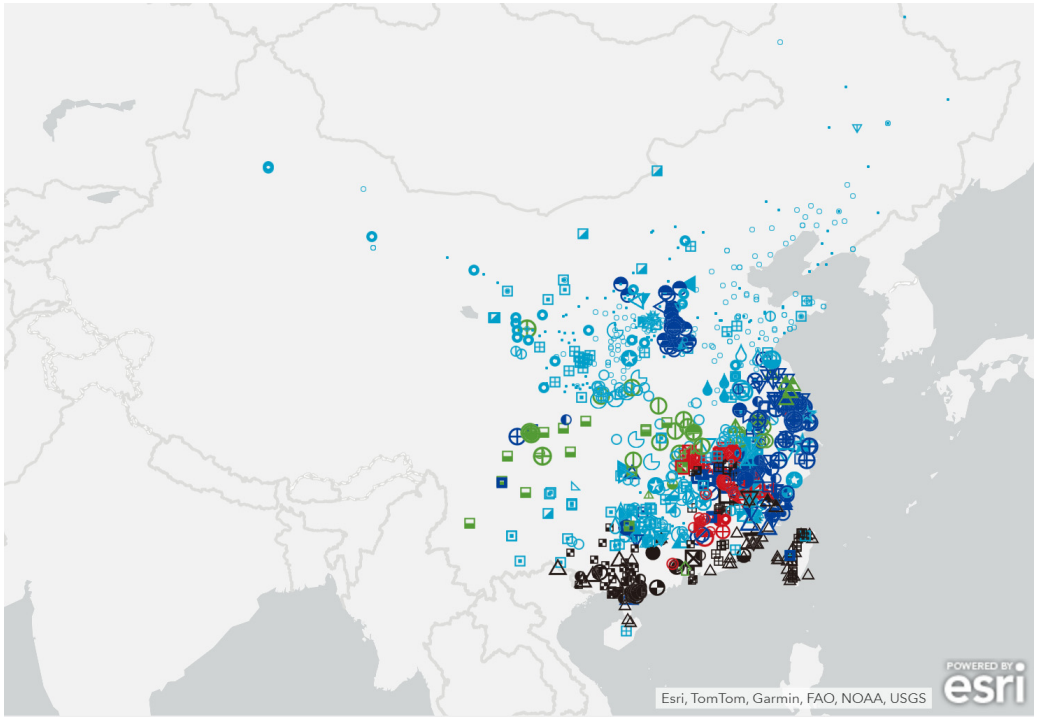


图 6　“六”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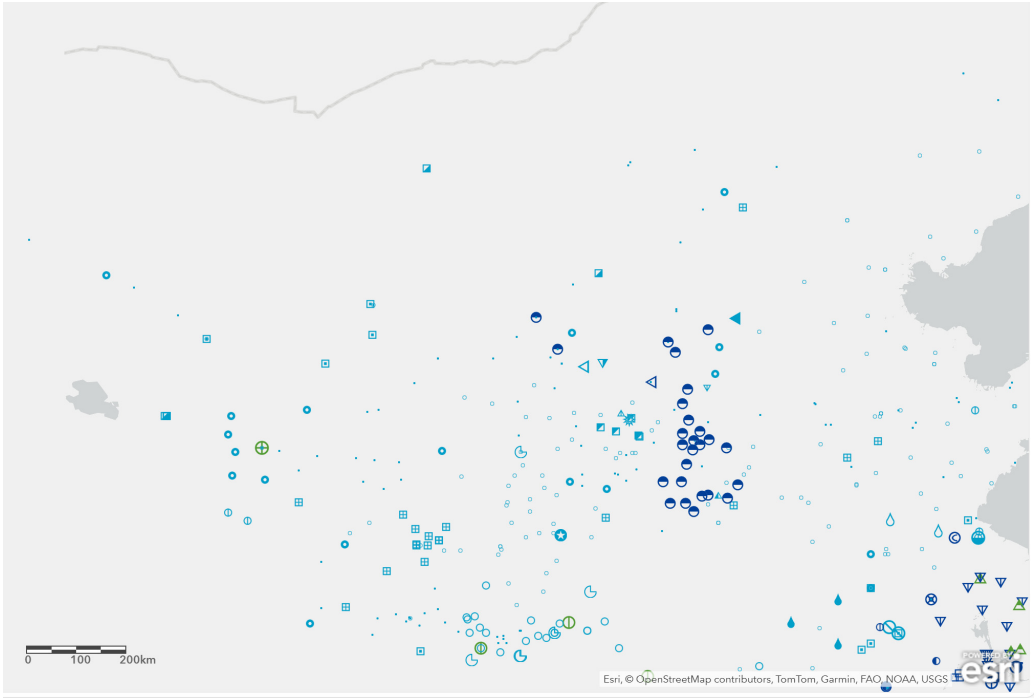


图 7　华北地区“六”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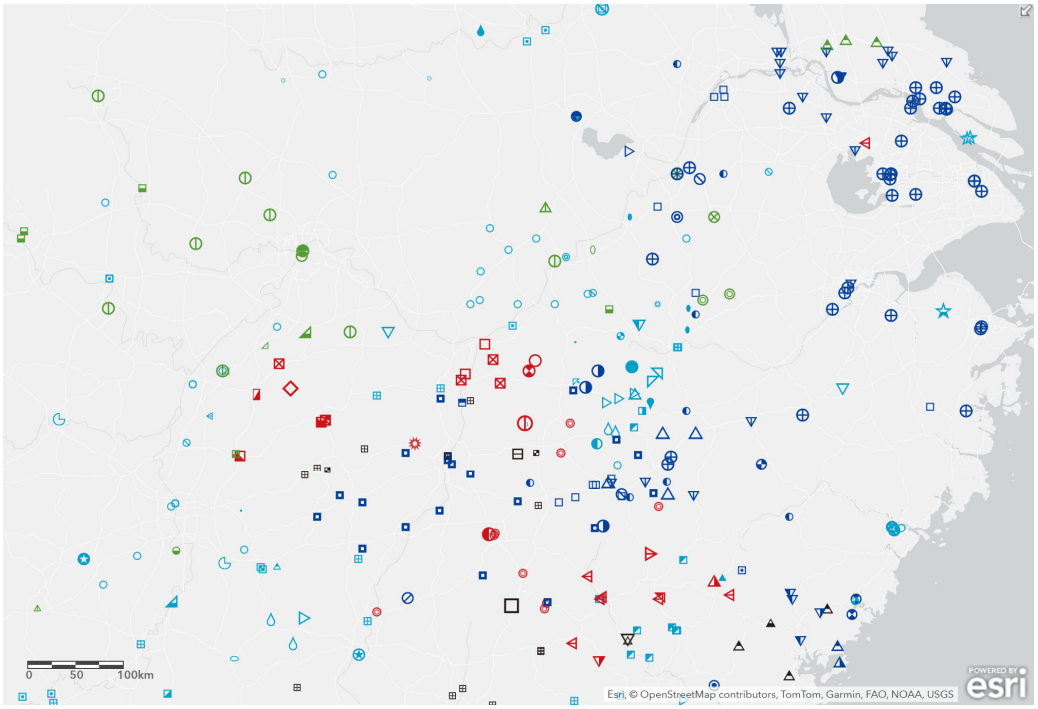


图 8　华中地区“六”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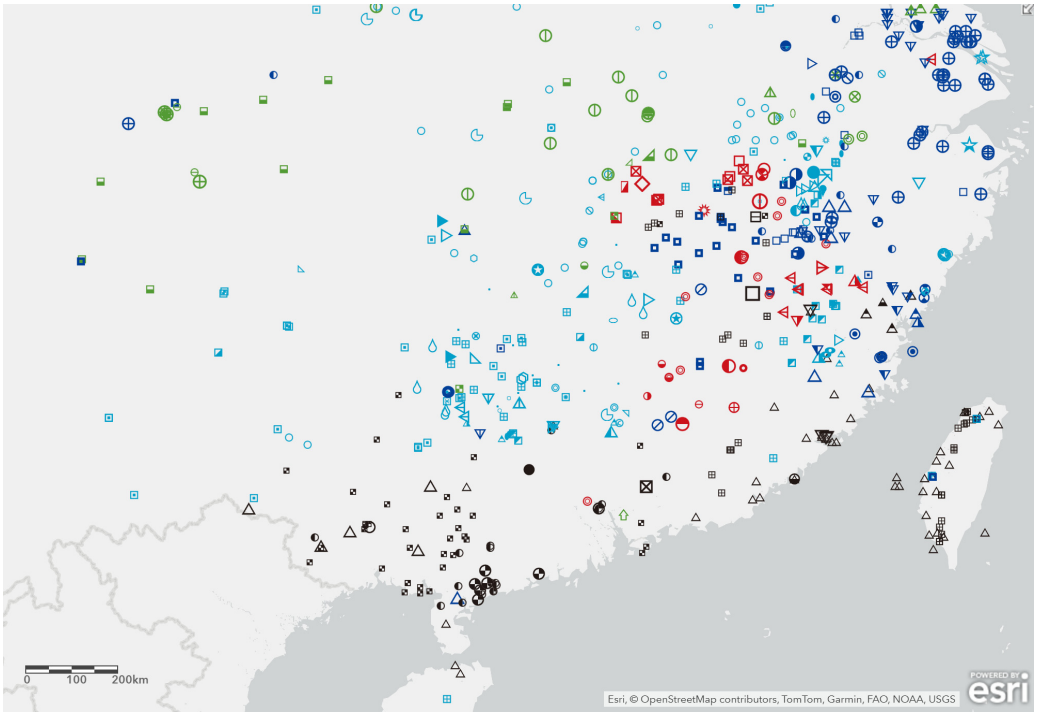


图 9　华南地区“六”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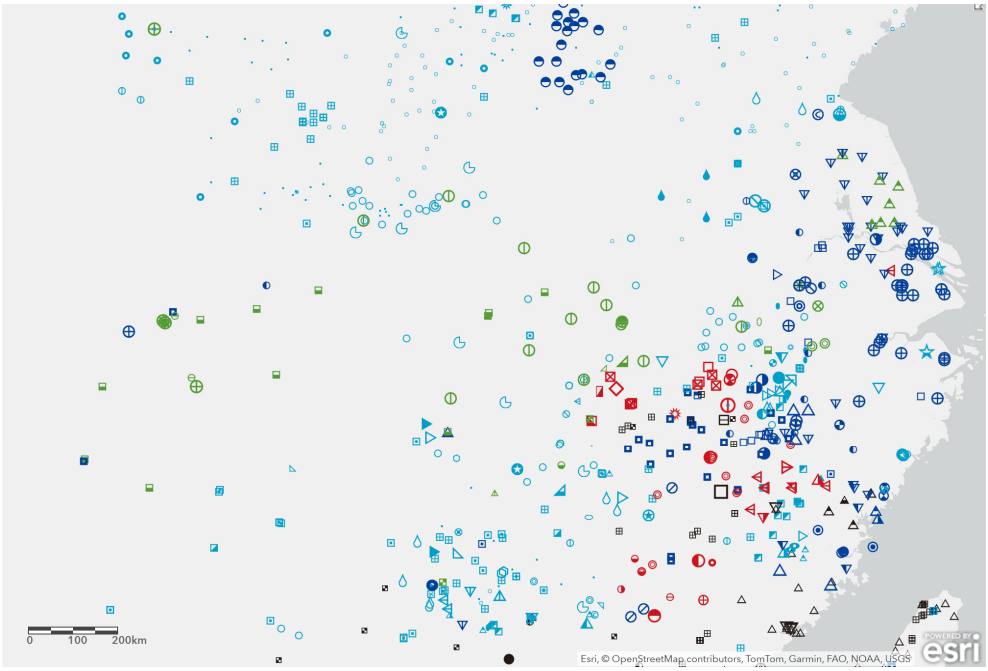


图 10　长江流域“六”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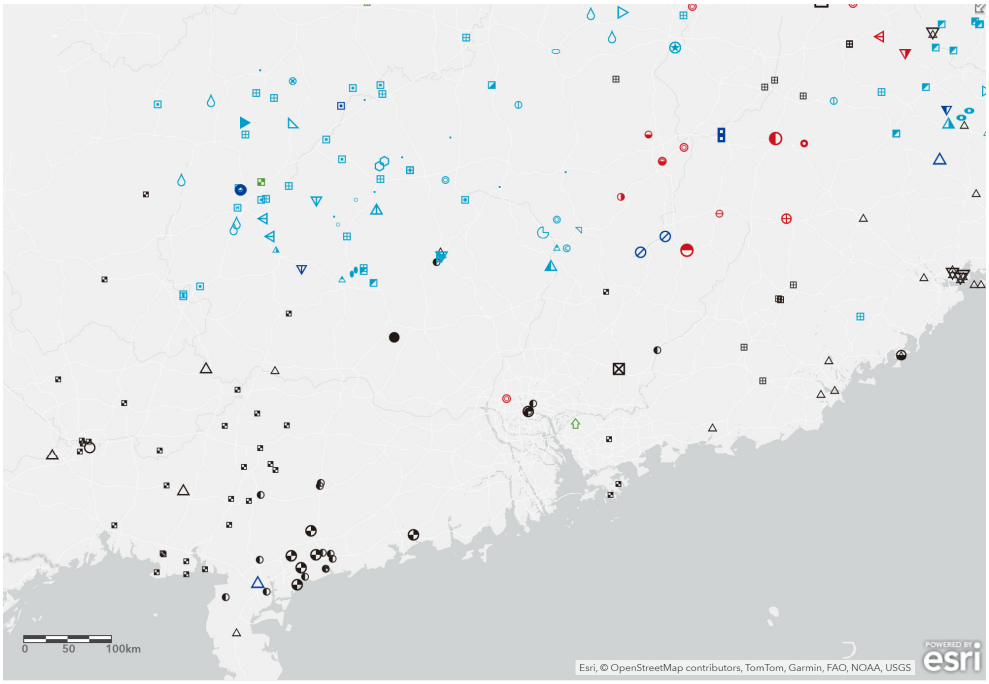


图 11　华南沿海地区“六”声母地理分布

四、元音

我们的资料中出现的六的元音有以下的 78 种类。

iou, iəu, iu, u, əu, o, a, ɔ, uə, y, iɤu, ou, iɯ, io, ə, ʊ, iəɯ, œ, əɯ, ɤ, øy, ɑu, e, ɤu, iɔ, iɤ, ɛu, ia, iau, iə, iɤo, uo, ai, ɛ, i, iɑ, iɑo, ie, iəo, iɛu, iɤɯ, iø, iʌu, ø, œu, ɐ, æ, æi, æu, ɐɯ, ao, au, ɐu, ɒu, ɔi, ɔu, ei, eu, ɛi, ɤɯ, iaɔ, iao, iɐu, iɑu, iɔo, iɵ, iʊu, ɯ, oɔ, œy, ɵ, uɛ, uʊ, uʌ, ʌ, ye, yu, yʌ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iou, iəu, iu 和 u 各占全体的 15～11%。其次多的是 əu, o, a, ɔ, uə, y, iɤu 等元音，各占全体的 6～2%，以上 11 钟元音占全体的 82%。

图 12 表示“六”元音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在表 3 表示“六”的元音地图凡例。低元音在南方有广泛的分布。在北方在山西近邻的所谓晋语区附近有些分布。众所周知晋语附近保存入声调，入声的发声特征可能影响到元音的高低。高元音的分布以长江中上游地区为中心，比较广泛地分布。值得注意在南方地区，有些地区有低元音和高元音临近地分布。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ljuwk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元音演变的过程如下；

juw

＞iu ＞y ＞ø, œ ＞i

＞iəu, iɛu, iau, iɐu, iɑu, iɤu, iou, iʊu, iʌu ＞iɔo, iaɔ, iao, iɑo, iəo, iɤo, io, iɔ ＞iɵ, iø

＞iəɯ, iɤɯ, iɯ ＞ iɤ, iɑ, , ia, ie, iə

＞yu ＞ yʌ, ye

＞uə, uɛ, uo, uʊ, uʌ,

＞œu ＞ œy, øy

＞ou, ɔu, ɒu ＞ oɔ,

＞æu, au, ɐu, ɑu ＞ eu, əu, ɛu, ɤu, , ao,

＞ɔi

＞u ＞ ʊ, o, ɔ, ɵ

＞ɤɯ, ɐɯ, əɯ ＞ ei, ɛi, æi, ai

＞ɯ, ɤ, ʌ, e, ə, ɛ, æ, ɐ, a

表 3　“六”元音地图凡例


lɑu
nɑu
liɑ
liɑo
tiɑu
sɒu
lʌ
lɐ
lɐɯ
liɐu
lɐu
lak
laʔ
laiʔ
lai
lau
la
liaʔ
liaɔ
lao
liao
liau
tiau
lia
læ
læi
læu
nʌʔ
luʌʔ
liʌu
lyʌ
lɔk
liɔk
lɔʔ
nɔʔ
ɦlɔʔ
liɔo
lɔ
sɔ
loɔ
lɔu
lɔi
lœk
lœuk
lœuʔ
lœʔ
lɛʔ
lɛi
lɛu
nɛu
liɛu
dhiɛu
lɛ
luɛ
lœy
ləʔ
ləɯ
nəɯ
təɯ
ləu
nəu
tiək
liəo
liəɯ
niəɯ
liəu
niəu
ɗiəu
tiəu
lə
liə
luə
luəʔ
liəʔ
ləɯʔ
ləuʔ
liəuʔ
nɤɬ
lɤʔ
nɤʔ
lɤ
liɤʔ
liɤo
lɤu
lɤɯ
liɤɯ
liɤu
liɤ
lok
ŋok
liok
liou
ɦloʔ
loʔ
noʔ
luoʔ
lou
nou
lio
lo
no
so
luo
ləʔ
liə
leʔ
lyeʔ
lei
leu
le
lie
løk
liøk
løyk
løyʔ
liø
lø
lʊk
lʊʔ
luʊʔ
lʊ
liʊu
tiɯk
liɯʔ
liɯ
lɯ
luk
lug
lukŋ
luʔ
lu
nu
su
ʃu
lyuʔ
liuk
tiuk
liuʔ
niuʔ
diuʔ
dhiuʔ
liu
diu
dhiu
niu
tiuʔ
thiuʔ
tiu
li
ti
lyk
lyʔ
ly
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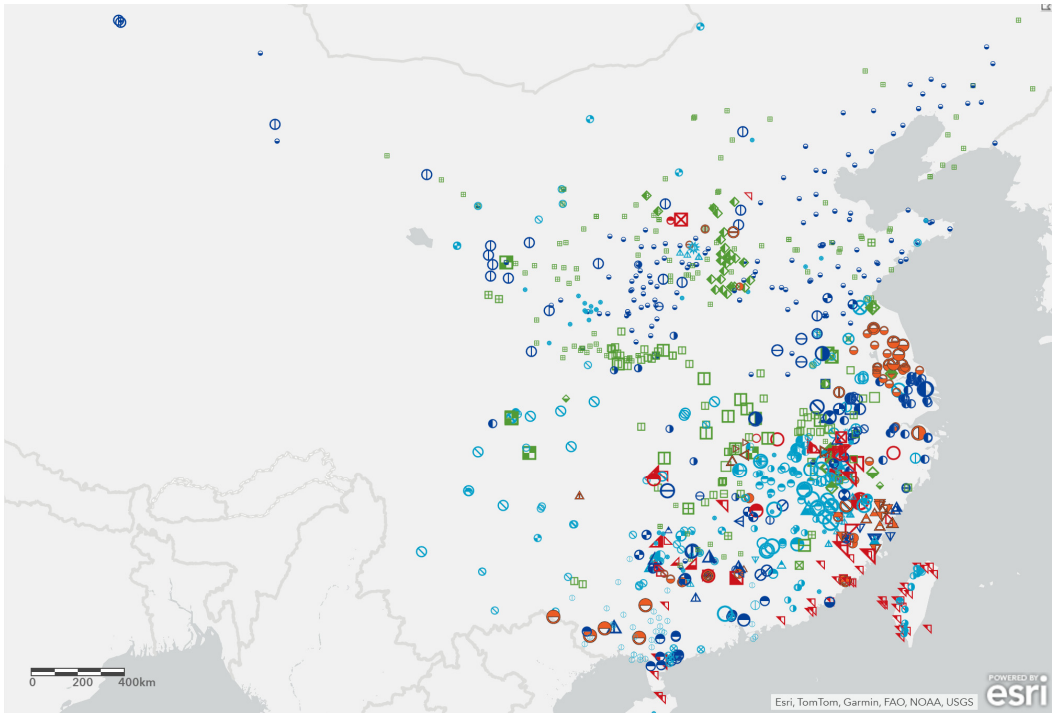


图 12　“六”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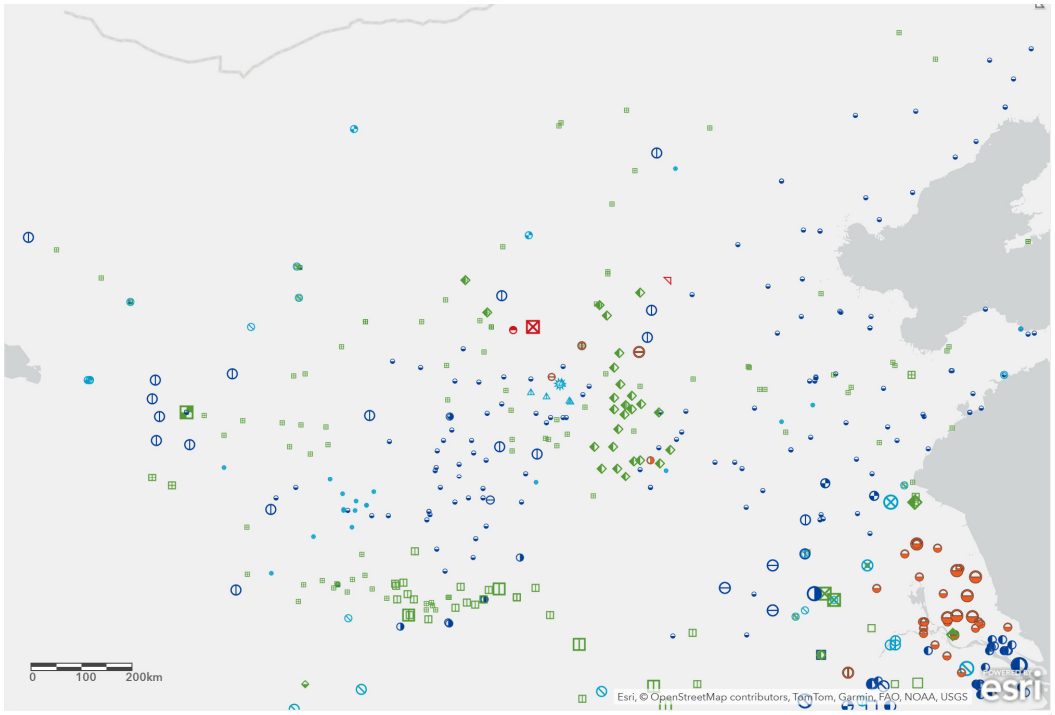


图 13　华北地区“六”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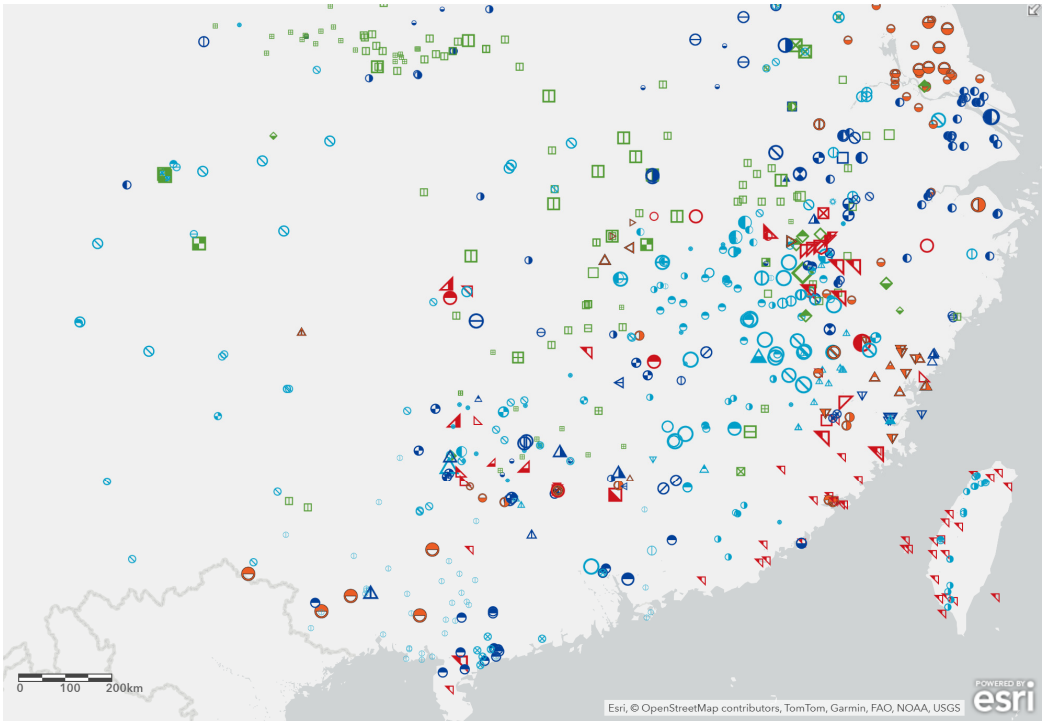


图 14　华南地区“六”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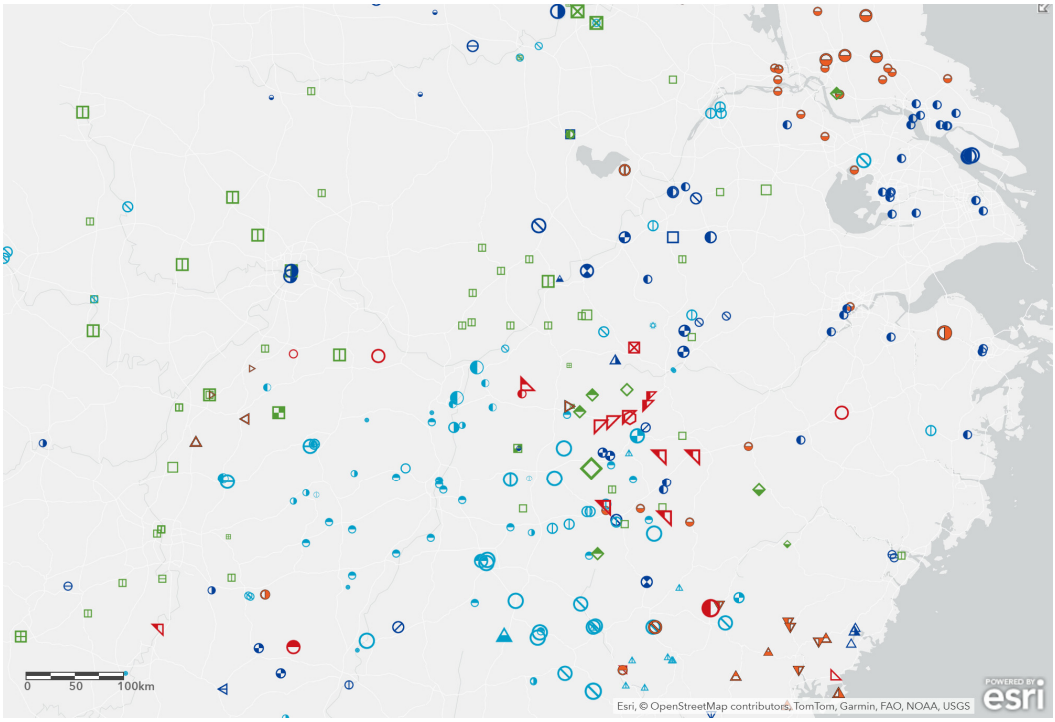


图 15　华中地区“六”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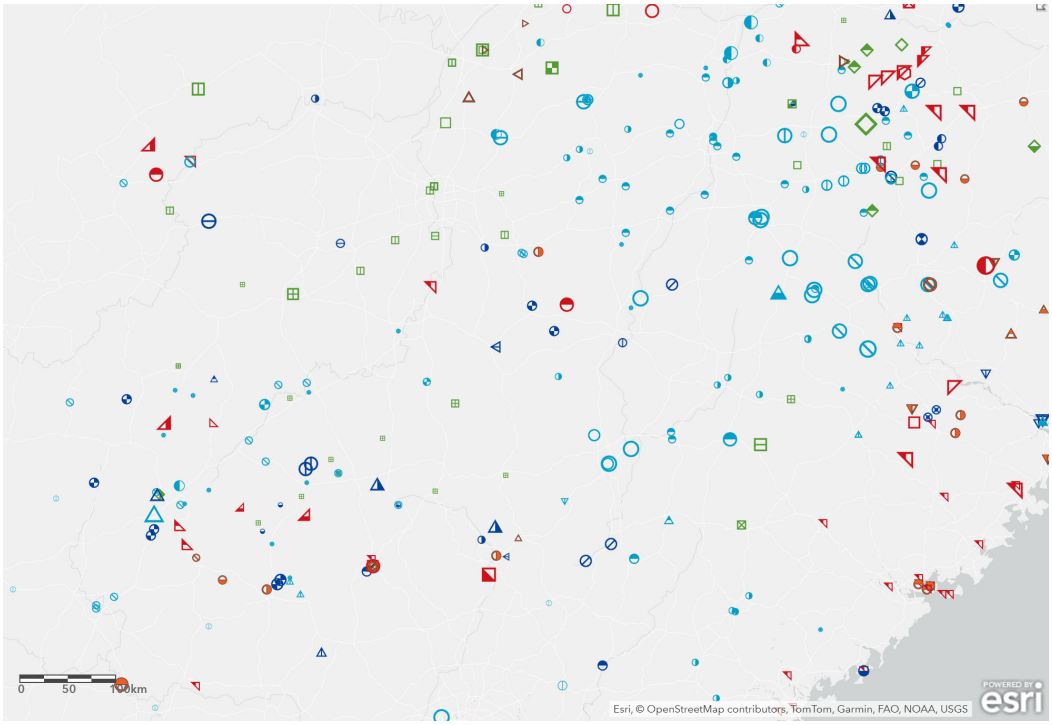


图 16 华南内陆地区 “六”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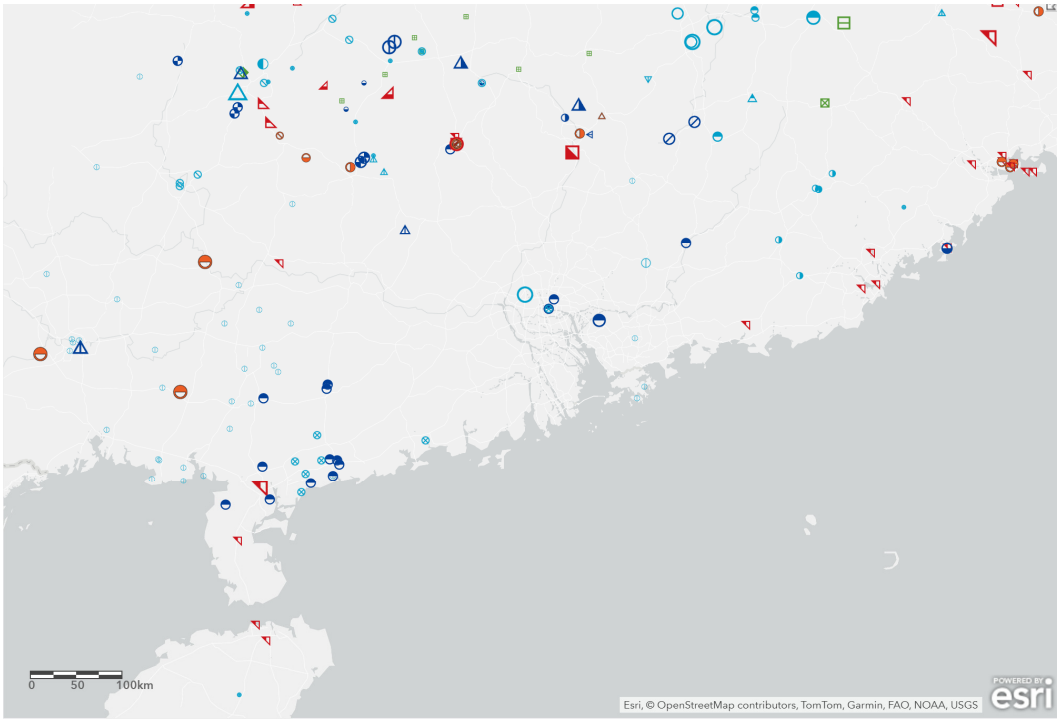


图 17 华南沿海地区“六”元音地理分布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23K00486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Baxter, William H.,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do, M. 2016. Goals of the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2015-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1-4.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七”的汉语部分（稿）

桥本 贵子
公立小松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115 地点“七”字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方向。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汉语方言中 1115 个地点“七”字的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并归纳其音变方向。

“七”是质韵清母字。在中古音，“七”的声母拟为*tsʰ-。在现代北京话中，变为 tɕʰ-。在南方，有些方言保留 tsʰ-，在粤语中变为 tʃʰ-。本文将探讨这些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地理分布进行观察。

在中古音，“七”的韵母一般构拟为*-iet、*-iɪt 等形式。在现代北京话中，“七”的元音是 i，元音保持得较好，但韵尾已经消失。本文还将通过地理分布的观察，尝试探讨各方言中“七”的元音和韵尾的变化方向。

二、声母

图 1 表示“七”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最多的是 tɕʰ-，有 581 例，占 52 %。由于受到 i 介音的同化作用，tsʰ-容易经过颚化变为 tɕʰ-。在陕西和山东的一些方言中，进一步演化为 tʂʰ-。

其次是 tsʰ-，有 399 例，占 35%。这些地点可以说还保留着中古音的形式。tsʰ-主要分布在南方，少数见于北方。

第三位是 tʃʰ-，有 63 例，占 5.6%。集中分布在粤语区，也散见于其他一些方言中。粤语区的 tʃʰ-是原来念作 tsʰ-，后来与 tʃʰ-合流而形成的。

陕西有一些方言念作 tʰ-，这可能是由 tsʰ-或 tʂʰ-演变而来。在南方，tʰ-散见于 tsʰ-的分布地区中，因此可以推测，tʰ-可能变自 tsʰ-。

湖北南部和江西北部有浊音化的倾向，这是该地区的方音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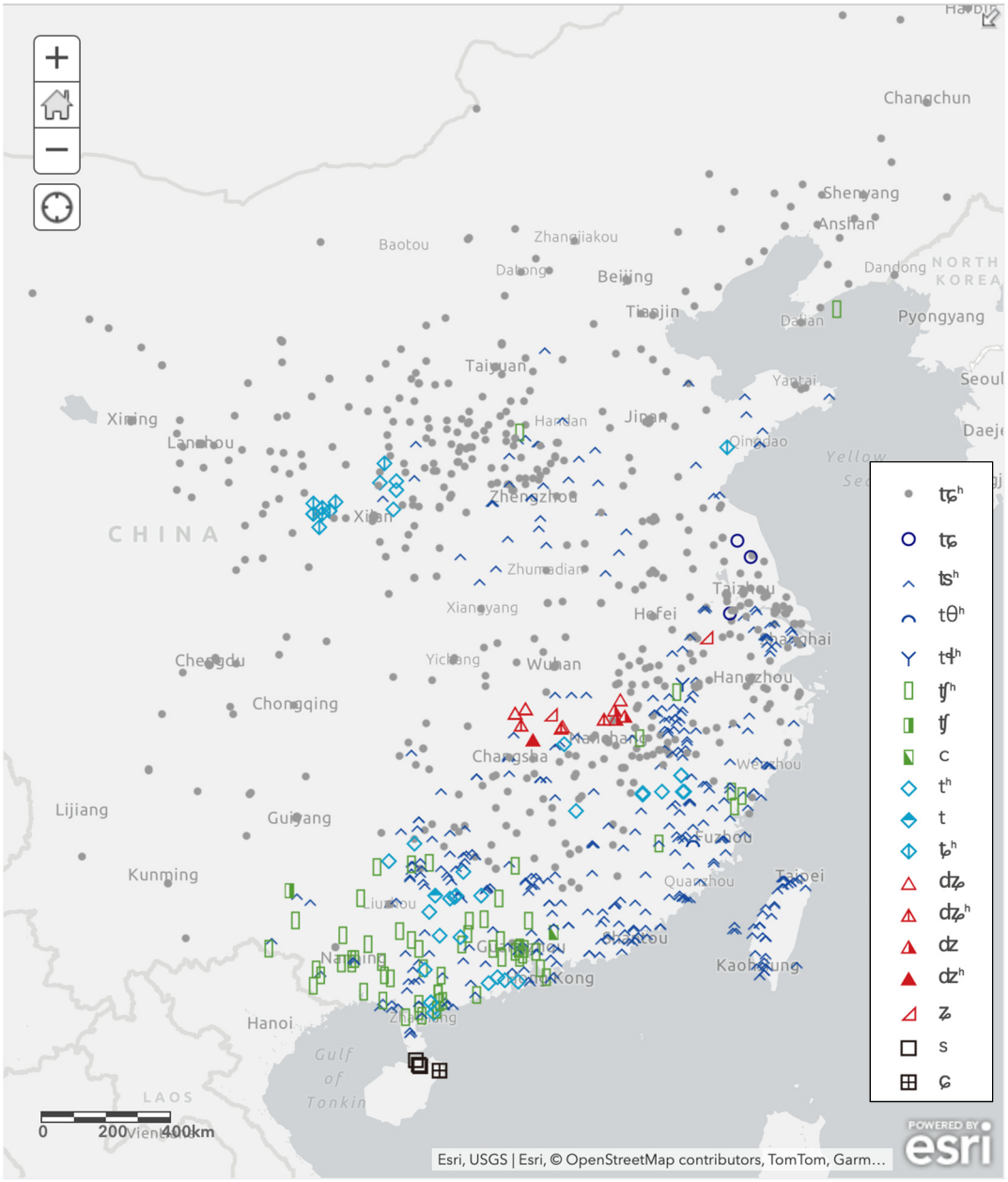


图 1　“七”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本文推测，自中古 tsʰ-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如下：

tsʰ- > tɕʰ- > ʈʰ- > tʰ-

> tʃʰ-

> tʰ-

> tɕʰ- > dʑʰ-, dʑ-, ʑ-（浊音化）

> dzʰ-, dz-（浊音化）

三、韵尾

图 2 表示“七”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在大多数方言中，“七”和“一”的韵尾形式基本相同（除闽语）。

零韵尾形式占第一位，有 544 例，占 49%。

其次是喉塞韵尾，有 306 例，占 27%，主要分布在晋语区和长江下游等地区。

第三位是收-t 尾，有 228 例，占 20%。主要分布在粤语、赣语、客家话、闽南话等地区。

在闽语区，与“八”韵尾的分布情况相比，“七”的发音中带-t 或-k（变自-t）韵尾的地点较多，而带喉塞韵尾的地点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七”的元音比“八”的元音较高，所以更容易保持-t 或-k 韵尾，不易变为喉塞韵尾。

收-t 尾经过喉塞韵尾最后变为零韵尾的过程，可能因地区不同而有几种路径。本文推测，自中古-t 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如下：

-t > -k > -ʔ > 0（零）

> -ʔ > 0（零）

> -l, -d, -tn > -ʔ > 0（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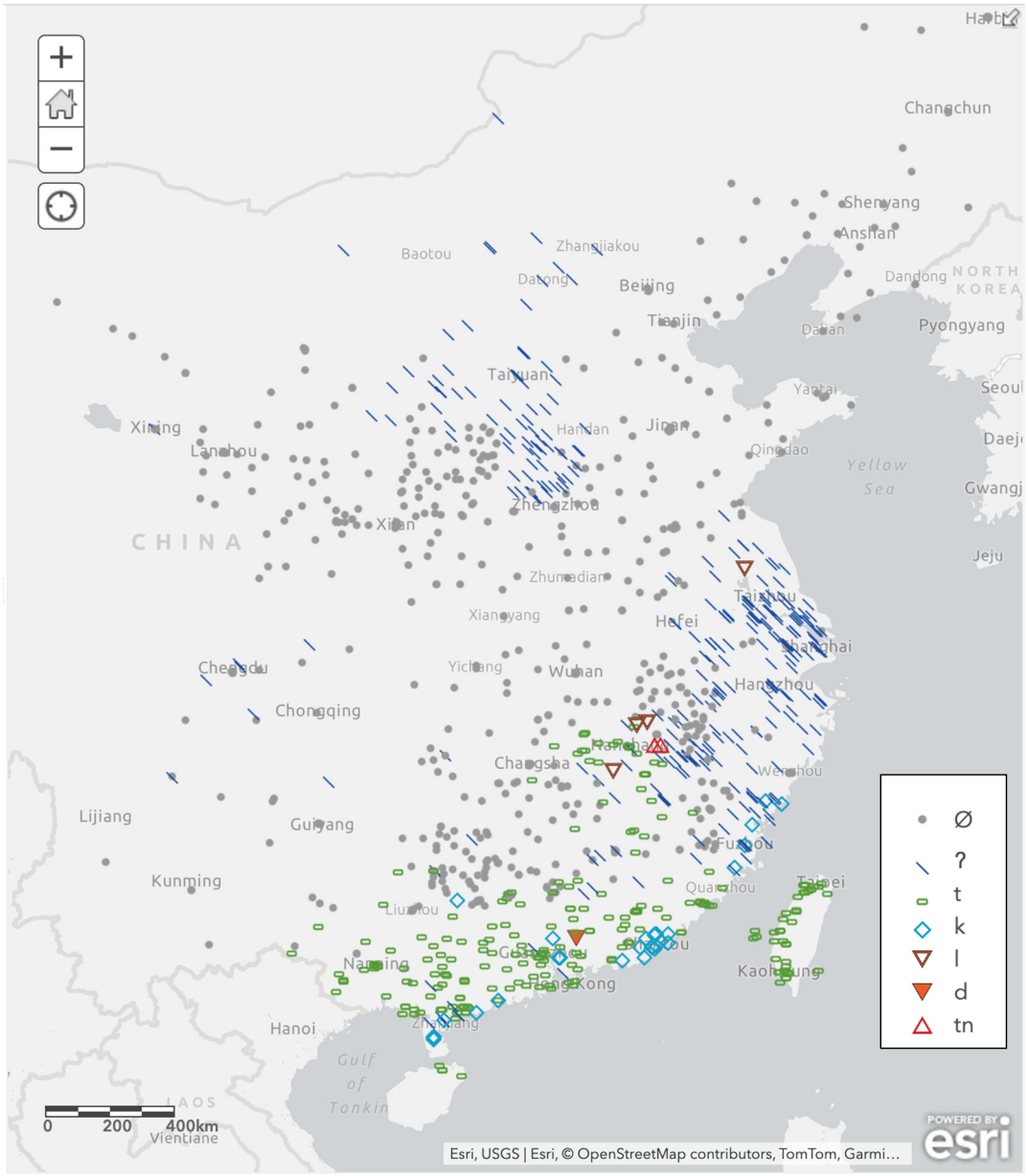


图 2　“七”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四、元音

图 3 表示“七”元音（介音和主元音）在全国的地理分布。

单元音 i 的分布最多最广，有 651 例，占 58%。

其次是 i+中、低元音，有 226 例，占 20%。虽然后者显示 ABA 分布，但它可能是后起的形式。根据以下述及的观点，本文尝试提出曾经发生过 i > i + 中、低元音这样演化的想法。

第三位是低元音，有 125 例，占 11%，主要分布在粤语区、广西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等地区，少数见于江西、温州等地。

单元音 i 主要分布在零韵尾和-t 韵尾的地区。单元音 i +零韵尾的形式（如 ts^hi、$tɕ^hi$、$ʈ^hi$ 等）在所有 1115 例中有 421 例，占 38%，表明这种形式比较普遍而稳定。-it 有 131 例，约占 12%，也算较多。单元音 i 和-t 韵尾的发音方法很近似，发 i 时，舌面接近硬腭，发-t 时，舌面接触硬腭，因此单元音 i 和-t 韵尾融合性很强，单元音 i 在-t 韵尾的前面保存得较好。

本文发现，图 3 中的 i + 中、低元音（蓝色）和中元音（棕色）主要分布在图 2 中的喉塞韵尾地区，据此可以推测，中、低元音和喉塞韵尾之间有某种关联。因为喉塞音的发音部位是声门，与发 i 时舌的最高部位离得很远，所以在发 i 之后紧接着发喉塞音时，容易产生过渡音。这种过渡音可能后来就变为中元音，并在各方言的元音系统中固定下来。

在南方，我们还能看到 i 介音脱落而元音低化的倾向，尤其在粤语区，许多地点都念为低元音。另外，在南方，还有圆唇化的形式，如：o、ɔ、uə、uø。因为其分布很零散，所以形成过程很难考察。

本文推测，这些形式的演变方向如下：

i > iɪ, iə, ie > ɿ, ʅ, ɪ > ə, e > ɛ, ʌ > æ, ɐ, a

> ə, e > ɛ, ʌ > æ, ɐ, a

> iɛ, iʌ, iɔ > ɛ, ʌ > æ, ɐ, a

> iɐ, iɑ > æ, ɐ,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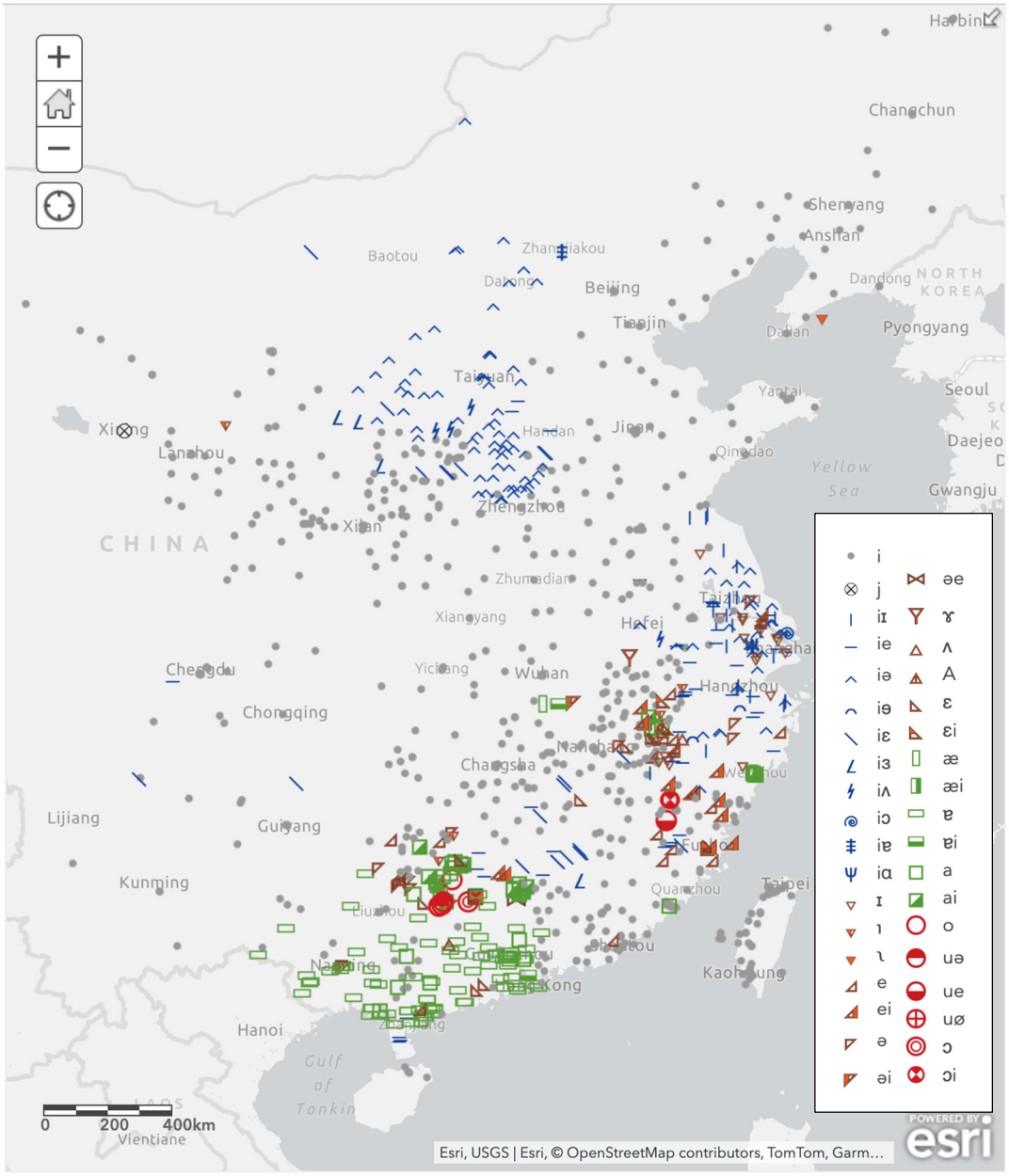


图 3　“七”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在南方，还有 ei、ai 等双元音的形式，它们的分布较为分散，其形成背后可能各有不同的原因，因此需要逐一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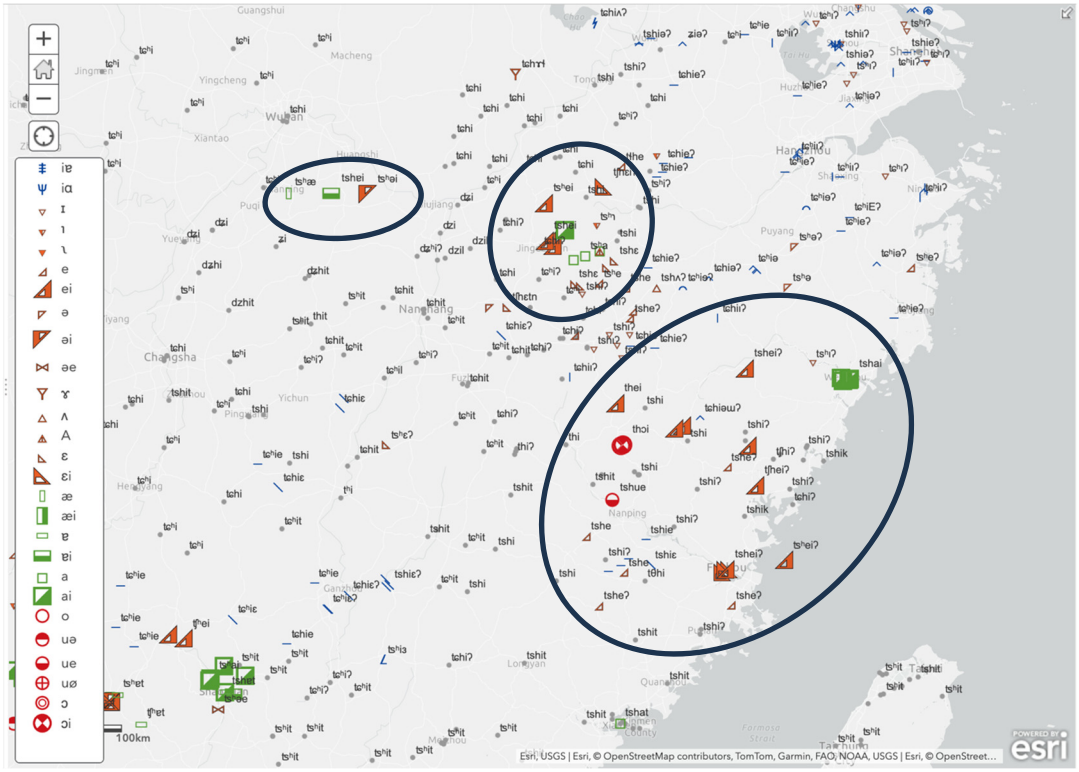


图 4　“七”徽语、湖北东南部的赣语、温州、闽北、闽东的双元音形式

图 4 表示“七”在徽语、湖北东南部的赣语、温州、闽北和闽东的 ei、ai 等双元音形式的地理分布。

徽语中的-i 结尾形式有-eiʔ、-ɛiʔ、-aiʔ、-ei、-ai。我们注意到其周围还有-iʔ、-eʔ、-i、-e、-ɛ、-a 等，据此可以推测这一带的双元音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iʔ > -ɪʔ > -eiʔ, -ɛiʔ > -ei

> -aiʔ > -ai > -ɛ, -e > -a

> -ɛʔ, -eʔ > -ɛ, -e > -a

湖北东南部的赣语有-ɐi、-əi，不知它是独立发生的，还是与徽语中的双元音形式有共同的渊源。

温州、闽北、闽东的-i 结尾形式有-eiʔ、-ei、-ai、-ɔi。其周围还有-iʔ、-ɪʔ、-eʔ、-əʔ等，据此可以推测这一带的双元音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iʔ > -ɪʔ, -eʔ, -əʔ > -eiʔ > -ei > -ai

> *-ɔiʔ > -ɔ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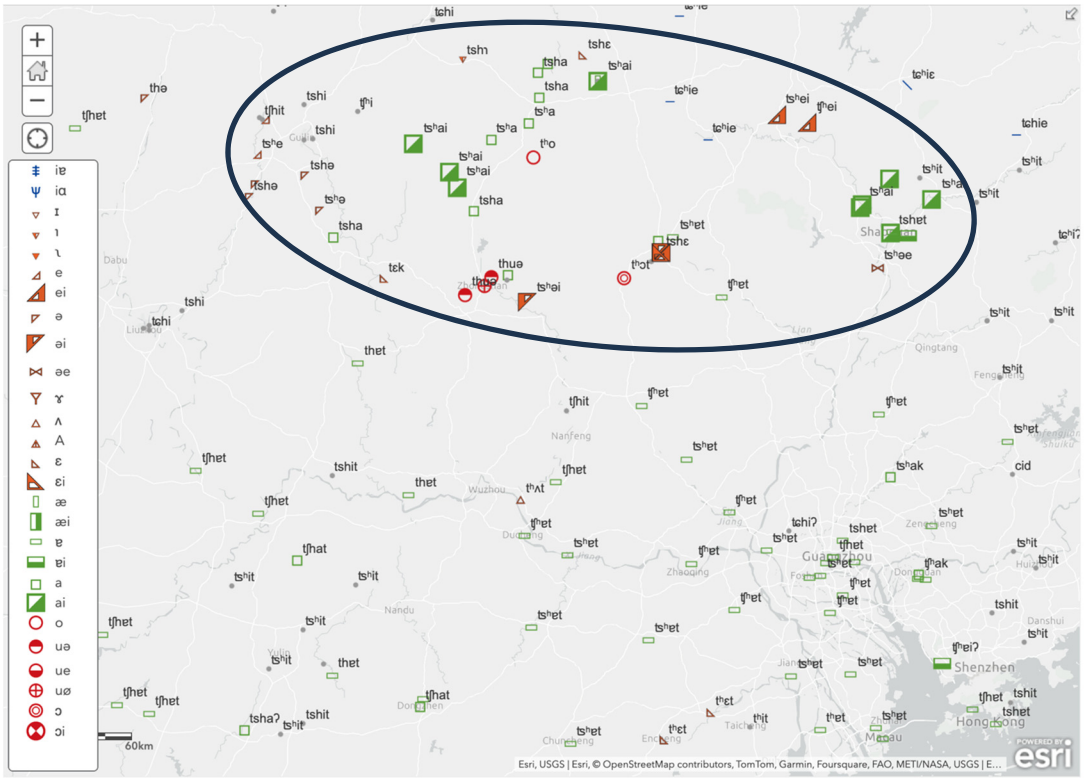


图 5 “七”广西平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的双元音形式

图 5 表示“七”在广西平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中的 ei、ai 双元音形式的地理分布。这些地区的双元音形式有-ai、-ɛi、-ei、-əi，其周围还有-a、-ɛ、-e、-ə、-ɿ、-i 等形式。其实，这一带是平话、土话、客家话、赣语、湘语、粤语和西南官话的交界地区，所以双元音形式与其周围的形式之间是否有连续性，难以推断。我们暂且拟测这一地区的双元音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i > -əi, -ei > -ɛi, -ai > -e, -ɛ

> -ɿ, -ə, -e > -ɛ, -a

五、结语

本文考察了汉语方言中“七”字的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对各地的音变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声母方面：最多的是 tɕʰ-，其次是 tsʰ-和 tʃʰ-。本文推测了自中古 tsʰ- 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过程。

韵尾方面：最多的是零韵尾，其次是喉塞韵尾和-t 尾。本文推测了自中古 -t 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过程。-t 韵尾经过喉塞韵尾最后变为零韵尾的过程，可能因地区不同而有几种路径。

元音方面：单元音 i 的分布最广泛，其次是 i＋ 中、低元音和低元音。在南方，单元音 i 主要分布在零韵尾和-t 韵尾的地区，i＋ 中、低元音主要分布在喉塞韵尾的地区。本文尝试通过元音和韵尾之间的调音位置距离来解释这些地理分布的重叠现象。此外，南方的 ei、ai 等双元音形式，本文推测了其形成过程。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成果之一。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八”的汉语部分（稿）

桥本 贵子
公立小松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55 地点“八”字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方向。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汉语方言中 1055 个地点“八”字的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并归纳其音变方向。“八”是黠韵帮母字。在研究中古音到现代方言音的变迁过程中，“八”的韵尾和元音的变化尤为引人关注。

在中古音，“八”的韵尾有 -t 尾，在现代北京话中，-t 尾已经消失，变为零韵尾。在南方，有些方言保留 -t 尾，也有些方言变为喉塞音。本文将探讨这些变化是否可以通过地理分布进行观察。

在中古音，“八”的元音是低元音，很多学者将其构拟为 *a、*æ、*ɐ 等低元音。在现代北京话中，“八”的元音是 a，这表明元音方面保持得较好。本文还将通过地理分布探讨各方言中“八”的元音的演变情况。

二、声母

图 1 表示“八”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绝大方言都念作 p-，有 1038 例，约占 98%。b-、ɓ-、ʔb- 散见于南方，表示经过浊音化，并且在一些方言中，再经过擦音化后变为 v-或零声母合口。本文推测，自中古 p- 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如下：

p- > b-, ɓ-, ʔb- > v- > 0（零声母合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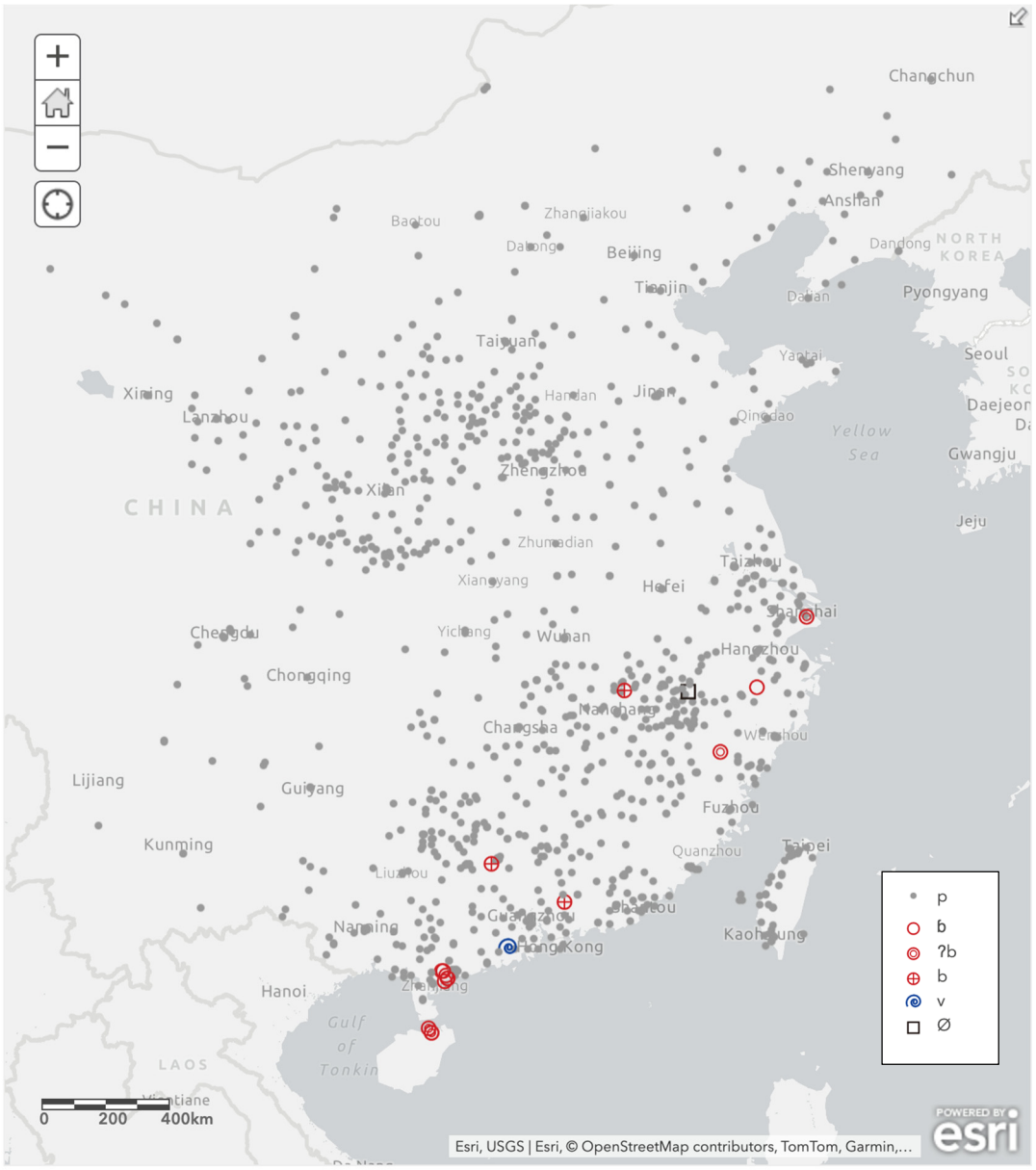


图 1　“八”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三、韵尾

图 2 表示“八”韵尾在全国的地理分布。与“一”和“七”的分布情况基本相似，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零韵尾形式占第一位，有 569 例，约占 54%。

其次是喉塞韵尾，有 295 例，约占 28%，主要分布在晋语、长江下游、赣语、闽语等地区。

第三位是收 -t 尾，有 169 例，占 16%，主要分布在粤语、赣语、客家话等地区。

在闽语区，与“七”韵尾的分布情况相比，“八”的发音中带喉塞韵尾的地点较多。这可能是因为“八”的元音比“七”的元音较低，所以更容易与喉塞韵尾结合。

收 -t 尾经过喉塞韵尾最后变为零韵尾的过程，可能因地区不同而有几种路径。本文推测，自中古 -t 到现代方言中各种形式的演变如下：

-t > -k > -ʔ > 0（零）

> -ʔ > 0（零）

> -tn, -n, -d, -l, -ɬ >-ʔ > 0（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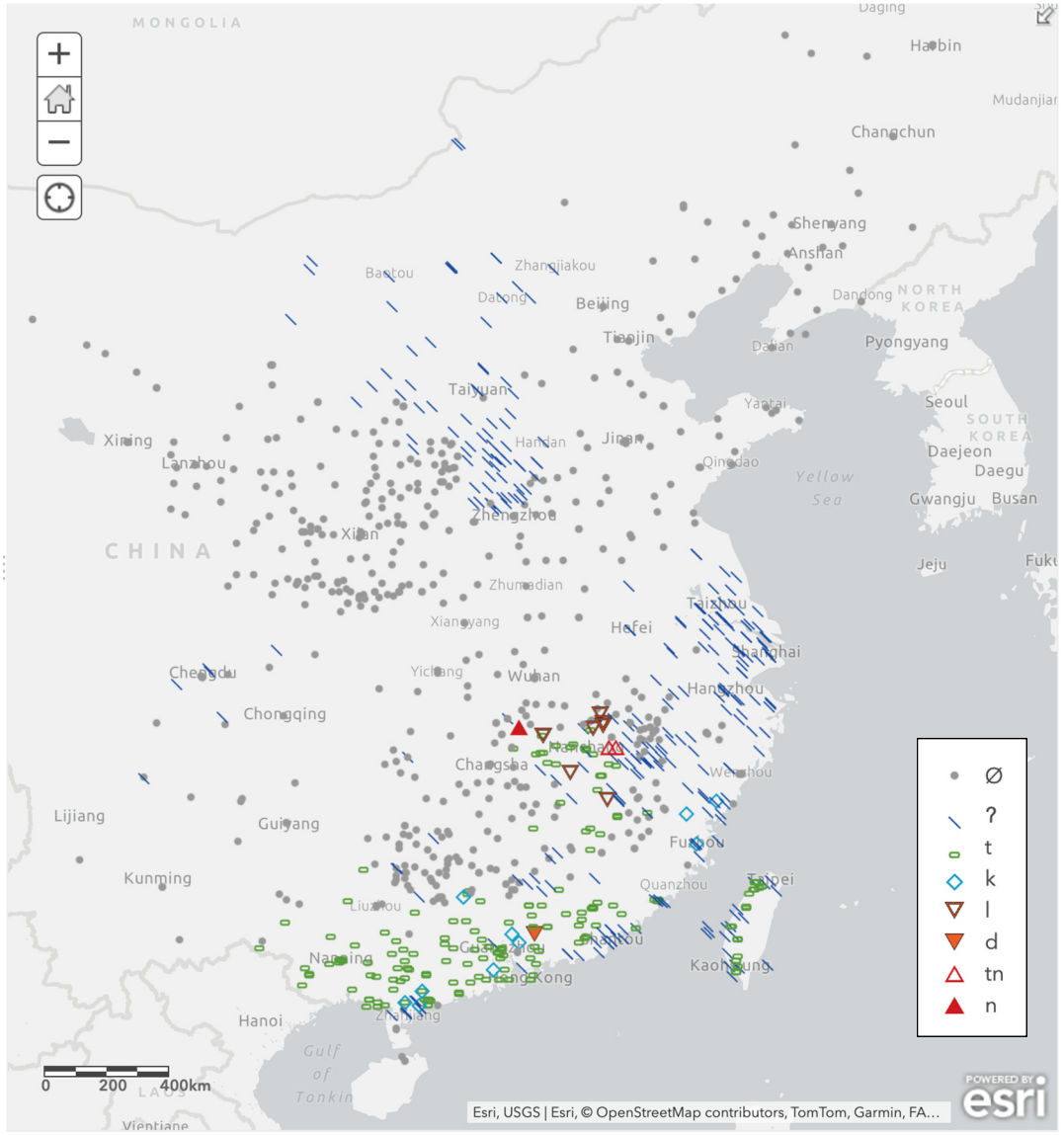


图 2　“八”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四、元音

图 3 表示“八”元音在全国的地理分布。

低元音（a, ɐ, ɑ, ai, æ 等）占第一位，有 773 例，占 73%，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

其次是 u + 元音（ua, uʌ, uə, uo 等）以及圆唇元音（o, ɔ 等），有 108 例，占 10%，主要分布在南方。

第三位是前中元音（ɛ, e, ei 等），有 69 例，占 6.5%，也分布在南方。

在现代方言中，“八”的元音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元音高化，二是圆唇化。

(1) 元音高化

元音高化的原因通常是为了减少发音劳力，开口度逐渐减小。关于“八”的元音，我们注意到图 2 中的有辅音韵尾（-t，-k，-ʔ）的地区有元音高化的倾向，而图 2 中零韵尾的地区较好地保持低元音，因此也可以考虑辅音韵尾促使元音高化的可能性。

北方：a > ɐ, ɑ > ə, ʌ

南方：a > ɐ, ɑ > ə, ʌ

> æ > ɛ > e > i

在南方，还有 i 介音产生的现象，这很可能是从元音高化的趋势中发展出来的。

a > ia > iæ > iɛ > ie

> ɛ, e > ie

(2) 圆唇化

圆唇化的原因大概是声母 p- 的同化作用。本文推测各地的演化如下：

吴语：ɑ, ɒ, ʌ, ə > ɔ > o

徽语：ɑ, ɒ, ʌ, ə > uɐ, uɤ, uʌ, uə > uɔ > uo

> ɔ > o

> uɔ > uo

闽语：ɛ, e > ue

平话、土话：uə, uo, o （来源未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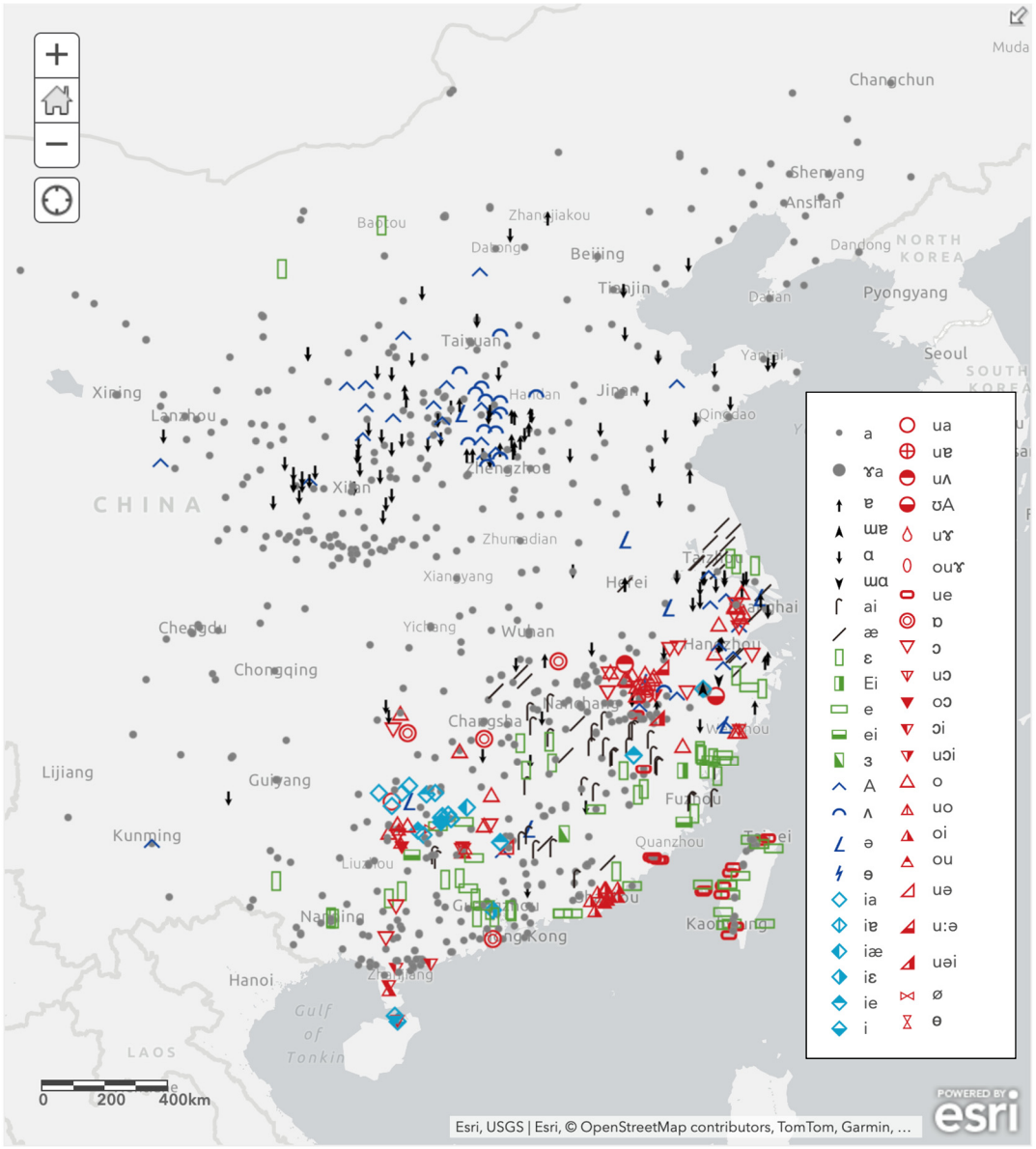


图 3　“八”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另外，南方的双元音形式（-ai, -ei, -oi）的分布较为分散，其形成背后可能各有不同的原因，因此需要逐一考察。

图 4 表示“八” 徽语、赣语、客家话、闽北、闽东的双元音形式的地理分布。

徽语区的 -i 结尾形式 -uɔi、-uəi 可能来自其周围的圆唇化形式（-ɔʔ、-oʔ、-ɔ、-o、-uɐ、-uo、-ue、-uɤ 等）。圆唇化的原因如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地区 -i 结尾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aʔ > -uɐʔ > -uɔʔ > -uɔi, -uəi

赣语和客家话的 -i 结尾形式是 -ai、-aiʔ、-ait，其周围还有 -at、-aʔ、-æʔ、-a、-ɛ、-e 等形式，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在‘八’还带入声韵尾 -t 或 -ʔ 时，元音和韵尾之间产生了过渡音 i。赣语和客家话的 -i 结尾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at > -aʔ > -a

> -aiʔ > -ai > -ɛ > -e

> -ait > -aiʔ > -ai > -ɛ > -e

> -æʔ > -ɛ > -e

闽东话的 -i 结尾形式主要有 -ai、-ei、-aiʔ、-eiʔ，其周围还有 -ɛʔ、-eʔ 等形式。按音理而言，我们可以推测以下音变方式：

-ɛʔ, -eʔ > -eiʔ > -ei

> -aiʔ > -ai

大部分闽东话都有入声韵尾 -ʔ 和 -k。据地图所示，‘八’的入声韵尾在闽东的很多地点都念为 -ʔ，福州的 -aik 和屏南的 -eik 可能来自 -aiʔ、-ɛiʔ，或是 -aiʔ、-ɛiʔ 的变体。

关于闽北话的 -ai，不知它是否变来自闽东的 -aiʔ，变自临近的赣语 -aiʔ、-ai 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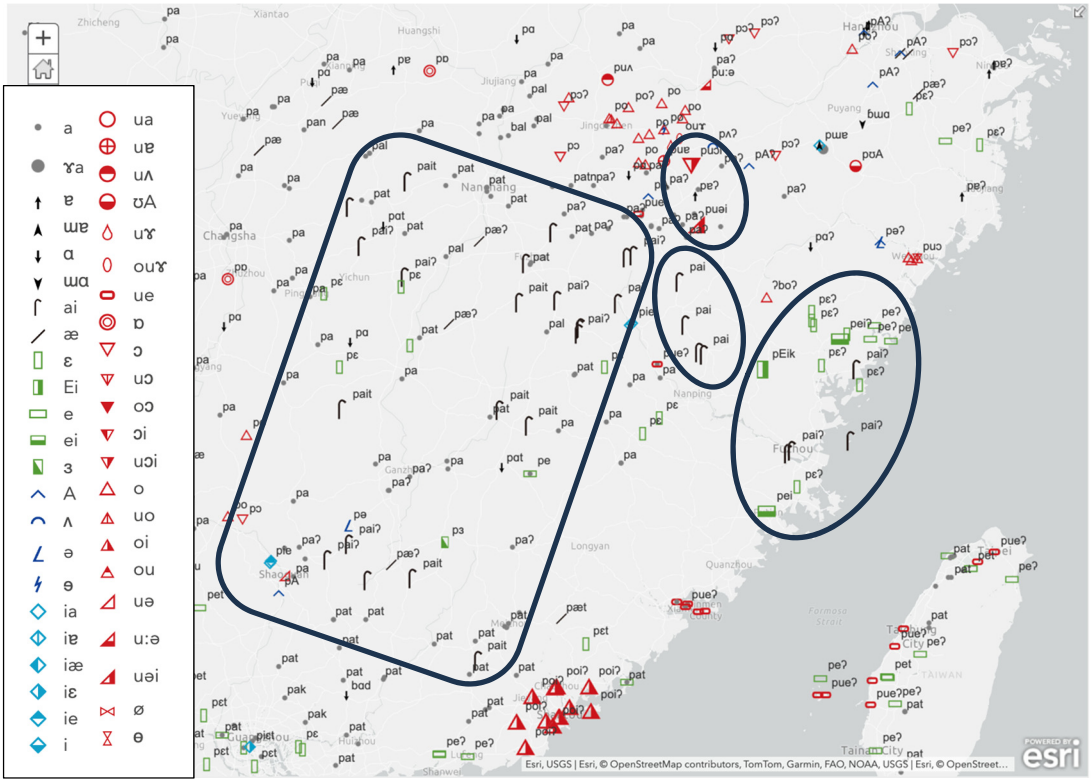


图 4 “八”徽语、赣语、客家话、闽北、闽东的双元音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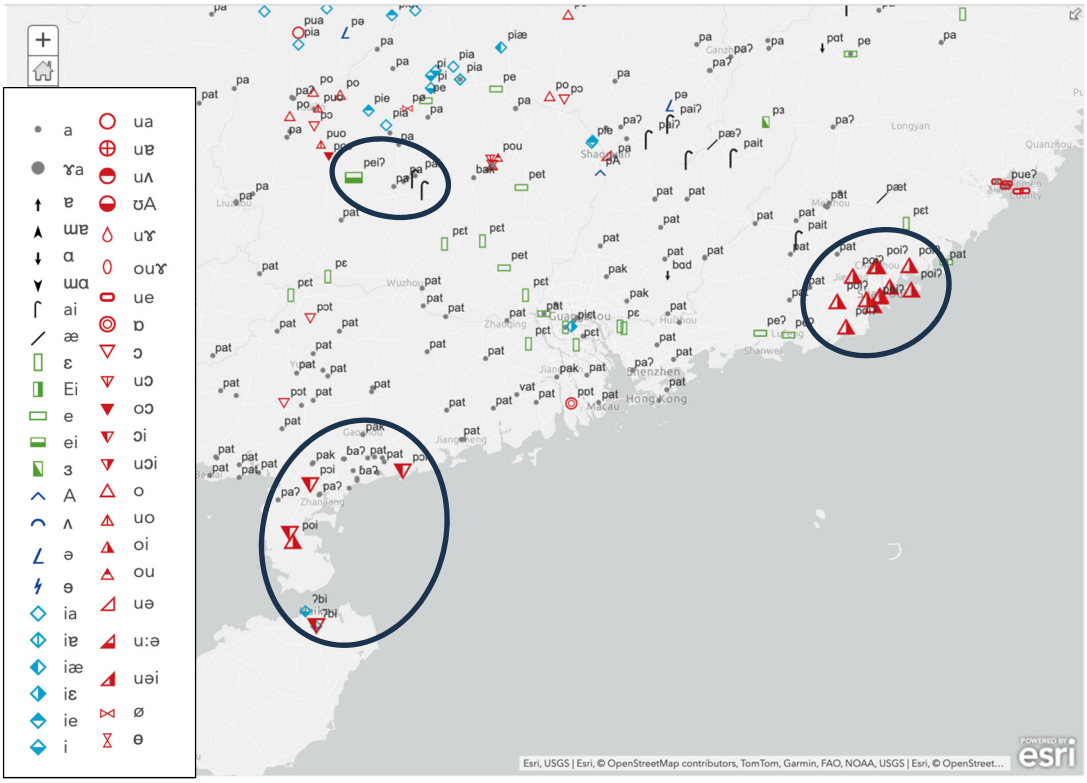


图 5　“八”闽南话和广西平话的双元音形式

图 5 表示“八”闽南话的双元音形式的地理分布。闽南话的 -i 结尾形式是 -ɔi、-ɔiʔ > -oiʔ（潮州、汕头），可能与其他闽南话中的 -ueʔ、-eʔ 等形式有关系。

-ɔiʔ > -oiʔ（潮州、汕头）

　　> -ɔi（雷州、海口）

平话中的 -i 结尾形式是 -ai、-eiʔ，它的分布很孤立，与周围的形式看不出渊源关系。按音理而言，可以追溯到 *-aiʔ。本文推测这一地区的 -i 结尾形式的形成过程如下：

-aiʔ > -ai

　　> -eiʔ

四、结语

本文考察了汉语方言中“八”字的声母、韵尾和元音的地理分布，并对各地的音

变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声母方面：绝大部分方言都念作 p-。在南方，有少数地点发生了浊音化。

韵尾方面：最多的是零韵尾，其次是喉塞韵尾，第三位是收 -t 尾。在闽语区，与“七”相比，“八”的发音中带喉塞韵尾的地点较多。这可能是因为低元音更容易与喉塞韵尾结合。

元音方面：“八”的元音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元音高化，二是圆唇化。有辅音韵尾（-t，-k，-ʔ）的地区有元音高化的倾向，而零韵尾的地区较好地保持低元音。据此，本文尝试解释辅音韵尾促使元音高化的可能性。此外，对于南方的 -ai、-ei、-oi 等双元音形式，本文推测了其形成过程。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成果之一。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九”的汉语部分（稿）

野原 将挥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九”有可能和藏语 d/s-kəw（九）同源。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47 地点“九”字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分别讨论“九”的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就“九”的上古音，上古音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Baxter and Sagart（2014）把“九”拟为*[k]uʔ。有学者认为“九”与“肘”有字源关系。因此，有学者给“肘”构拟*t-k-之类的复辅音。这让我们联想到嘉戎语的 $tə^{22}$ kru^{33}（也可参看 Baxter and Sagart 2014:32）。

二、声母

以下是“九”的声母的分布：



图 1　“九”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图 1 表示“九”的声母的全国地理分布。“九”的中古音声母为见母 *k*-。明显的对立是舌音和牙音的对立。

从图 1 看出，大部分方言已经被腭化而变为舌尖音。最多的是 tɕ-（红色圆形），一共 725 个地点，大约占 70%。其次是尚未经过腭化的 k-（方形），一共 253 个地点，占 25%。部分地点也有声母 c，一共 21 个地点。主要分布在山西和山东。图 2 是舌音与牙音（也包括 c）对立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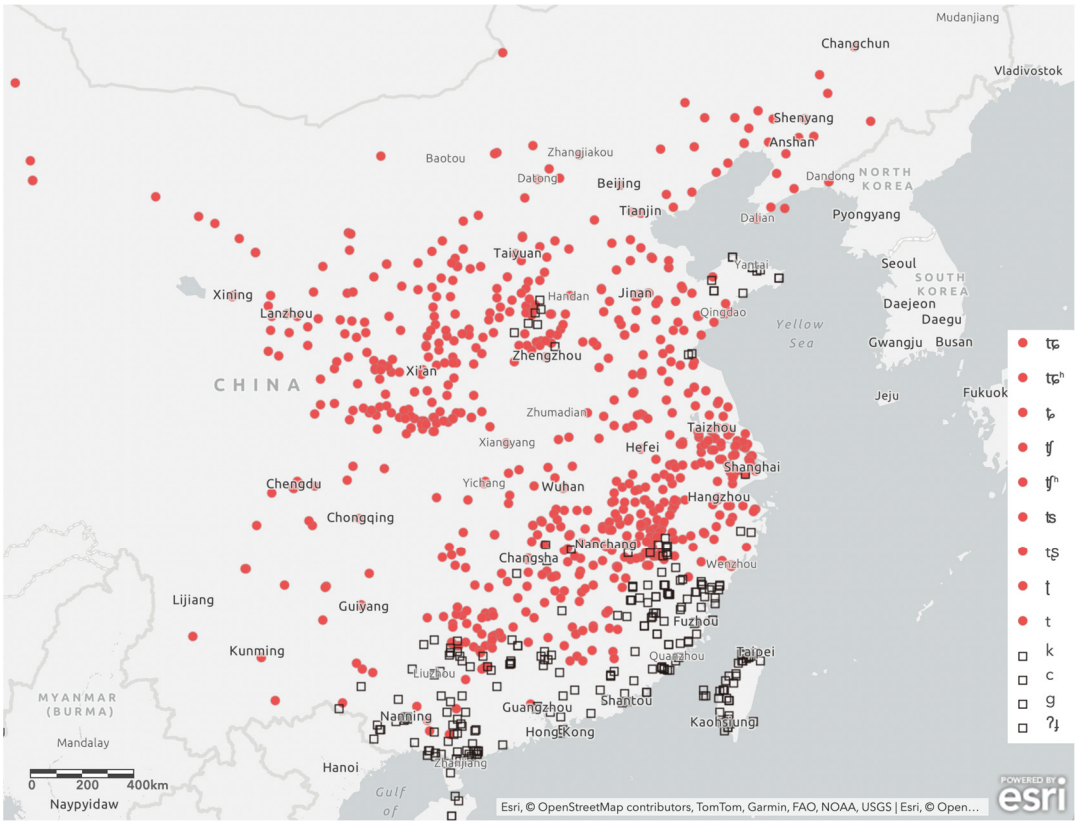


图 2　“九”T（TS）类和 K 类的地理分布

在南方保存中古音的见母 k 的地点较为多。如图 1 所示，在山西和山东一带“九”的声母为 c，腭化的程度与南方方言有所不同。毋庸置疑，腭化的程度与其元音有关系。图 3 是有无 i 介音的分布和 k 的分布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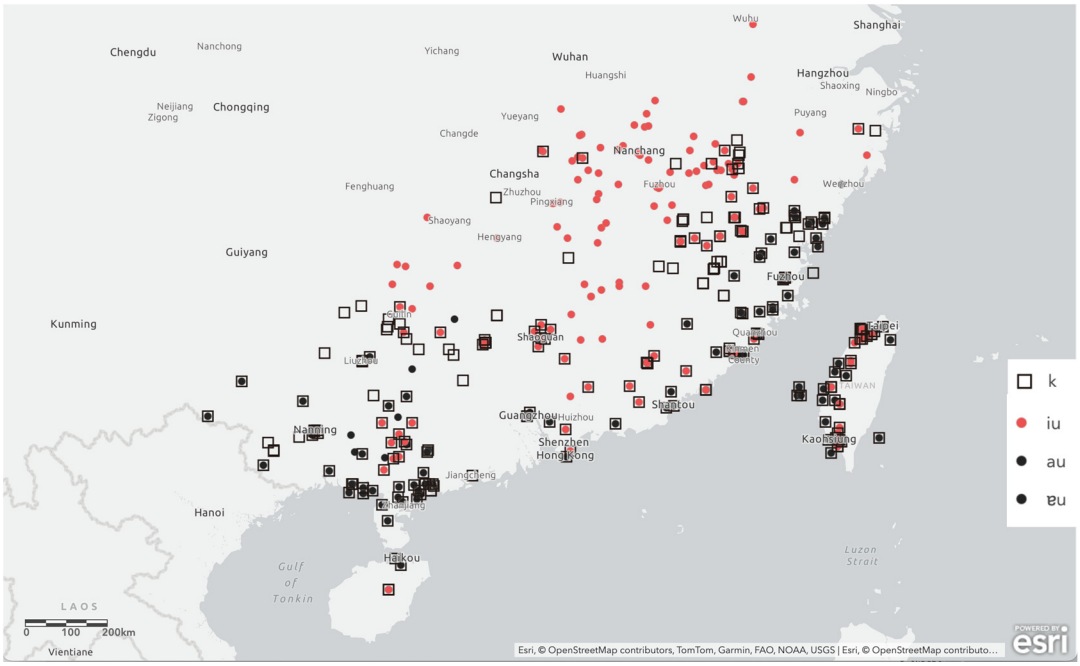


图 3　有无 i 介音和声母 k 的地理分布图

红色圆形为 iu，黑色圆形为 au 或 ɐu。方形符号（□）为声母 k。可见，沿海地区 kau/kɐu 类较多，内陆地区 kiu 类更多一些。

从图 3 可以看出，沿海地区没有 i 介音的地点较多，而内陆地区有 i 介音的地点相对较多。无需赘述，与此相关，沿海地区还自然地保留了更多声母 k 的地点。

从中古音见母 k-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

k- > tɕ-
　　> tʃ-
　　> ts-
　　> k-
　　> c-

三、元音

图 4 是“九”的元音的地理分布。“九”的元音的较为复杂，一共有 63 种韵母（图 4 不包括一两个地点的语音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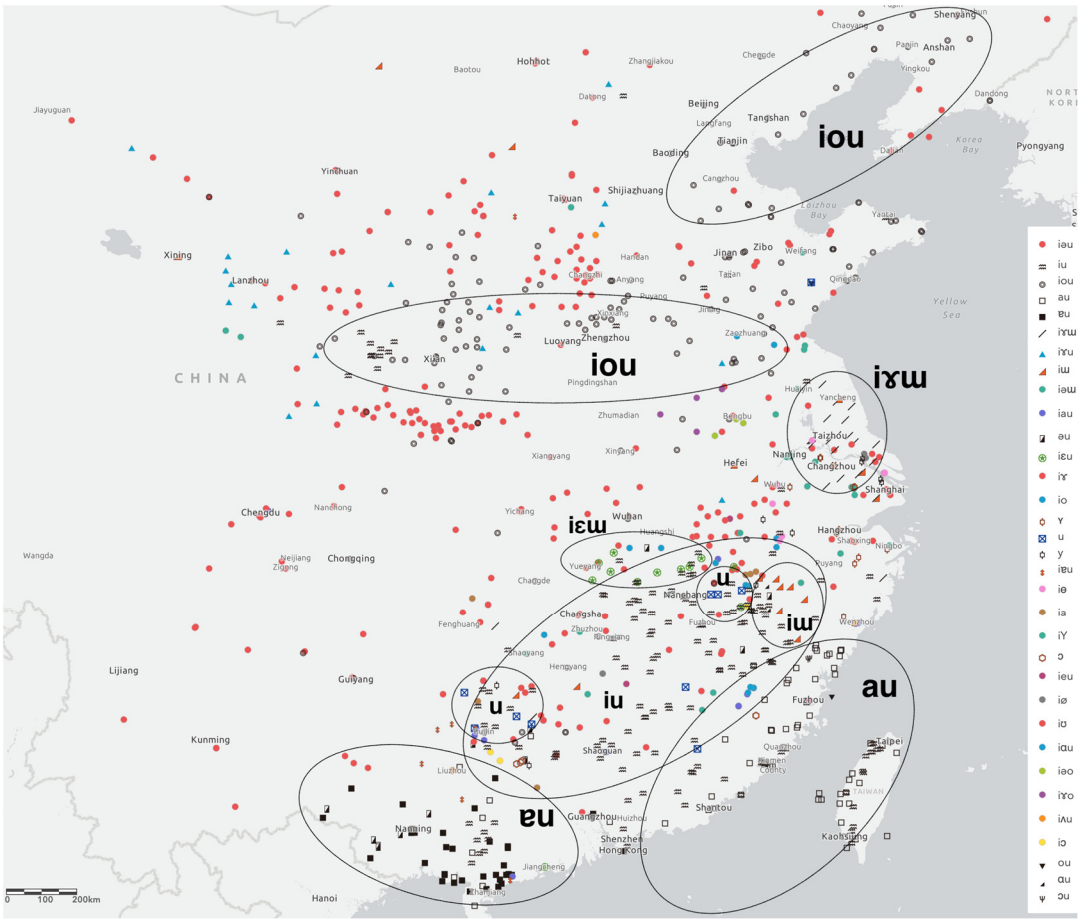


图 4　“九”的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最多的是 iəu（红色圆形），269 个地点，占 26%。其次是 iu 和 iou，184 个地点和 178 个地点。第三是 au 和 ɐu，一共有 115 个地点，占 11%。

本文也把“九”的韵母分成四类。请参看图 5。A 类为有 i 介音的，如 iəu、iu、iou 等（红色圆形）。B 类为没有 i 介音的双元音韵母，如 au、ɐu 等（白色方形，□）。C 类为撮口呼的单元音韵母，如 y、ʏ（蓝色方形，⊠）。D 类为其他单元音韵母，如 ɔ、u 等（斜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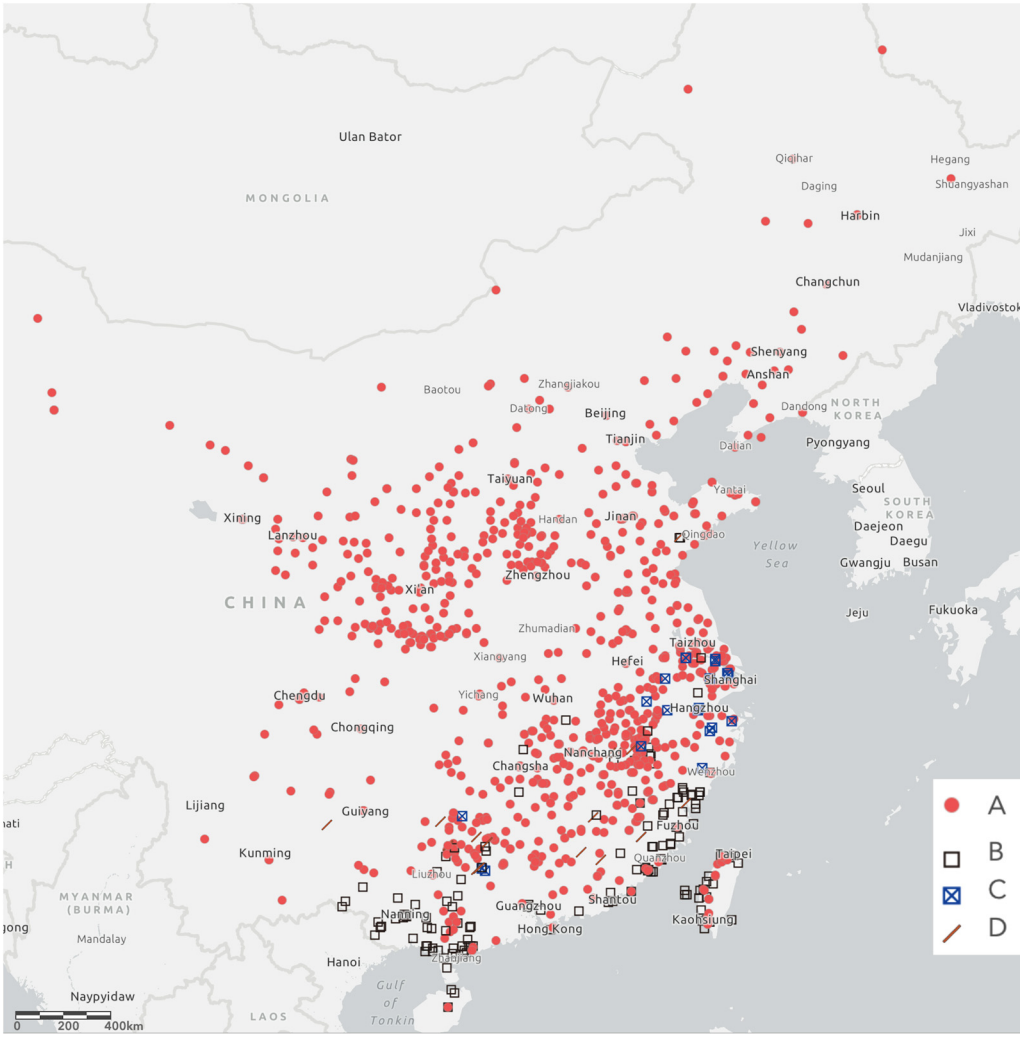


图 5　“九”的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从图 5 可以看出，“九”的韵母大多是带有-i-介音的（A 类），一共有 861 个地点，占 82%。没带 i 介音的双元音韵母（B 类）都分布在南方方言中，一共有 145 个地点，占 14%。撮口呼 y、ʏ（C 类）主要分布在吴语地区，21 个地点，占 2%。从声母和韵母的搭配来看，y 和 ʏ 的声母几乎是 tɕ、tʃ 类，相反声母 k 极少。部分 æi、əu 韵母也跟 tɕ，tʃ 类出现。估计这些韵母大部分原来有 i 介音。单元音 ɔ 和 u（D 类）的地点也不多，只有 19 个地点，约占 1.8%。其声母大部分是跟中古音一样软腭塞音 k。

从中古音*-juw* 往别的方向演变的形式有（一部分）：

juw > iu
> iou
> iɤɯ
> iu > y, ʏ
> iu > u
> iu > iɯ

主要分布在南方的 au 类可能来源于比中古音更早的语音形式（上古音*u）：

*-uʔ（上古音） > *iuw* （中古音）
*kuʔ（上古音） > *kəu （原始闽语） > *kau（原始闽南语）> kau
> kau > kɔ（大田等）

此音变正好跟上古音幽部一等韵的音变相同。上古的*u（非三等韵）变为中古豪韵 *aw*，如“早”。

附记：本文为 JSPS KAKENHI（Grant Number 23K25322）的一个成果。

参考文献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李孝定 1982《甲骨文字集释》第十四补遗存疑待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十”的汉语部分（稿）

八木 坚二
大阪大学

内容摘要：汉语数词“十”的中古音韵地位是入声緝韻禅母（是執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dzyip。本文分别考察汉语方言 1009 个地点的“十”字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

一、前言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十”的汉语部分，分别讨论韵尾、声母和元音的地理分布，从中归纳出音变链。我们利用已刊行的方言调查报告，绘制了 1009 地点的地图。“十”的中古音韵地位是入声緝韻禅母（是執切），Baxter & Sagart（2014）的构拟音是 dzyip。

二、韵尾

十的基本汉字形式是“十”但在湖南的一些地方出现[pʰau], [pʰʌu]等形式（报告中的汉字形式是“炮”），这些形式与“十”的来源应是不同的。

pʰʌu ：隆回 (代少若 2020)

pʰau ：邵阳 (储泽祥 1998) 、长沙 （鲍厚星等 1999）

资料中出现的韵尾有 p, b, m, t, tn, n, l, k, ʔ, ɬ 和元音韵尾（上述的 pʰau、pʰʌu 等除外）。其中出现最多的韵尾是元音韵尾，约占全体的 53%。其次是ʔ和 p，各占全体的约 21%。再其次是 t，只占全体的 3%，其他韵尾（b, m, tn, n, l, k, ɬ）的出现率只有全体的 1%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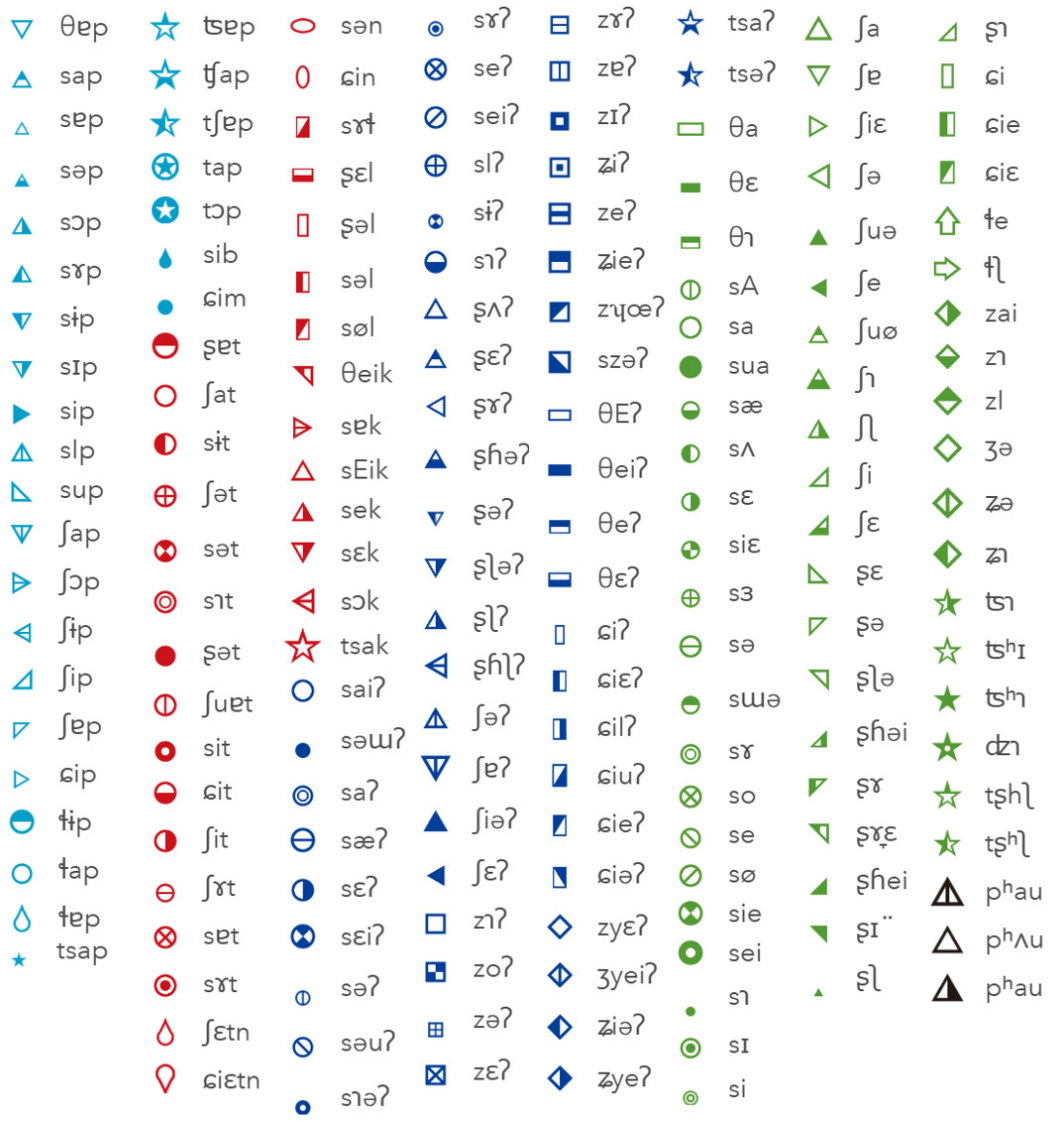
图 1 表示“六”韵尾的全国地理分布，表 1 是“六”的韵尾地图的凡例。以两广为中心的地区分布着 p。虽然数量少但也有 b,m 等韵尾分布在南方。其他的 tn, n, l, k, ɬ 等形式在南方也有分布，这些形式可以视为是随着入声韵尾弱化而产生的形式。与其他入声同样，山西近邻地区和长江领域分布着ʔ韵尾。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dzyip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十的韵尾演变的过程如下：

p ＞ t, tn, n, l, k＞ ʔ, ɬ

＞ b, m,

表 1 “十”韵尾地图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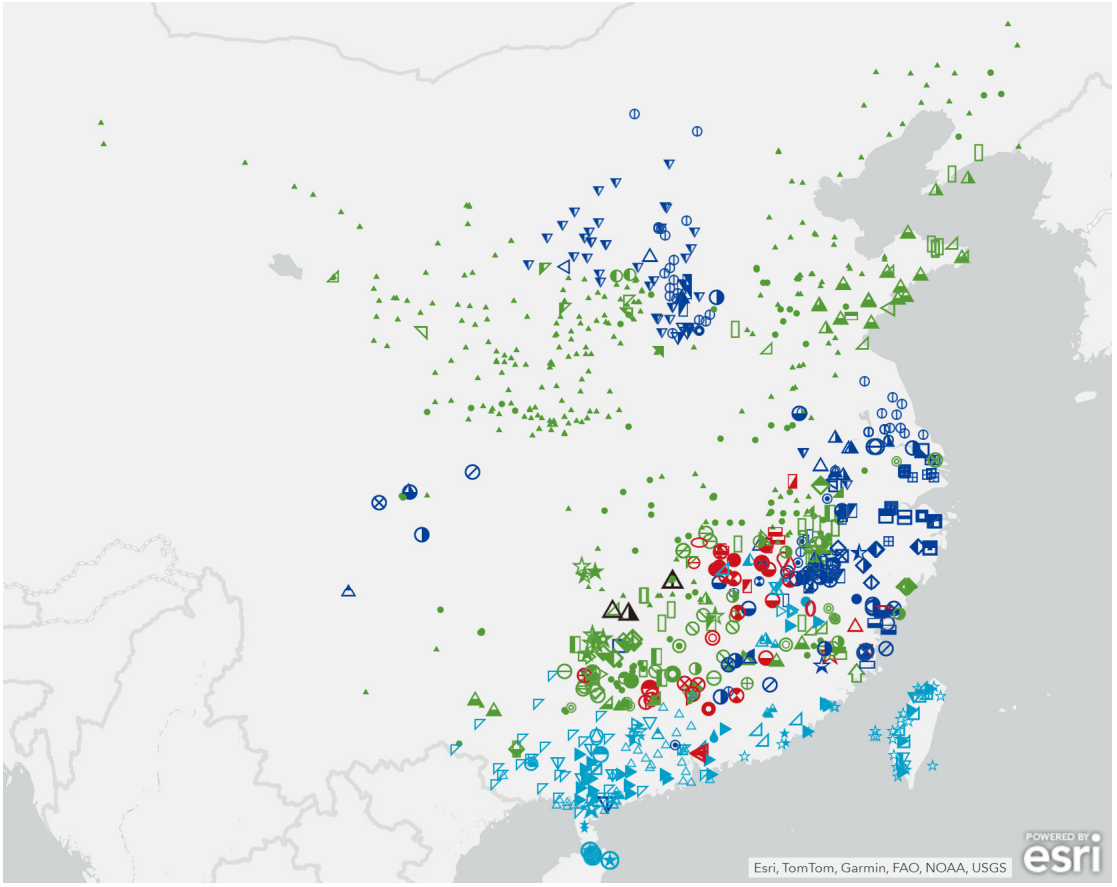


图 1　“十”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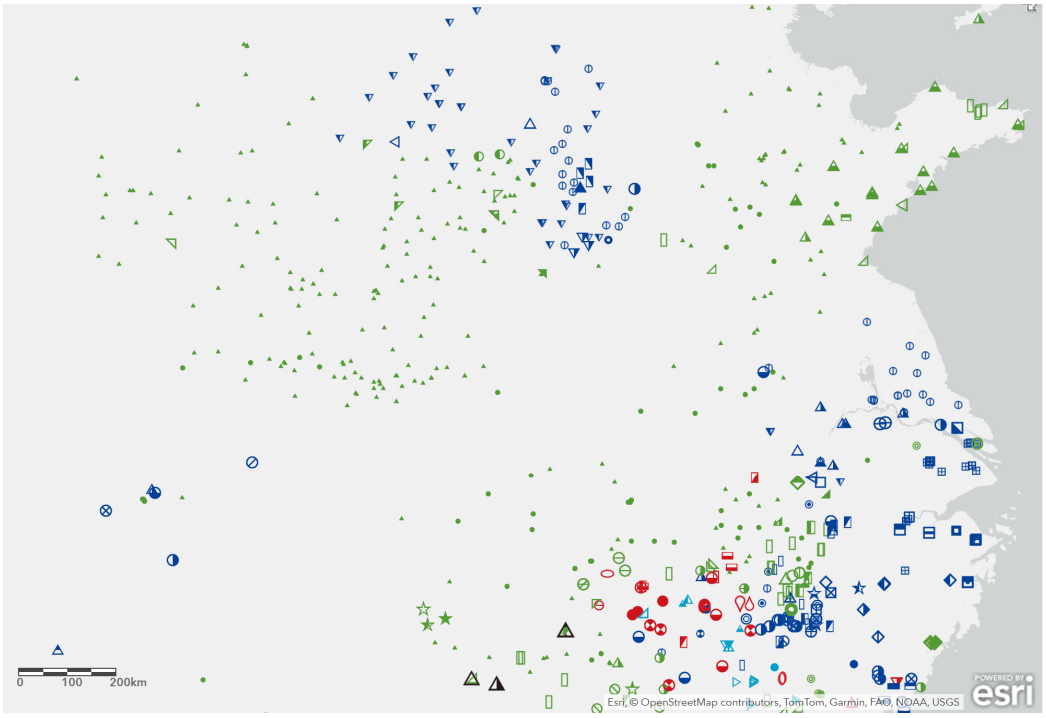


图 2　华北地区“十”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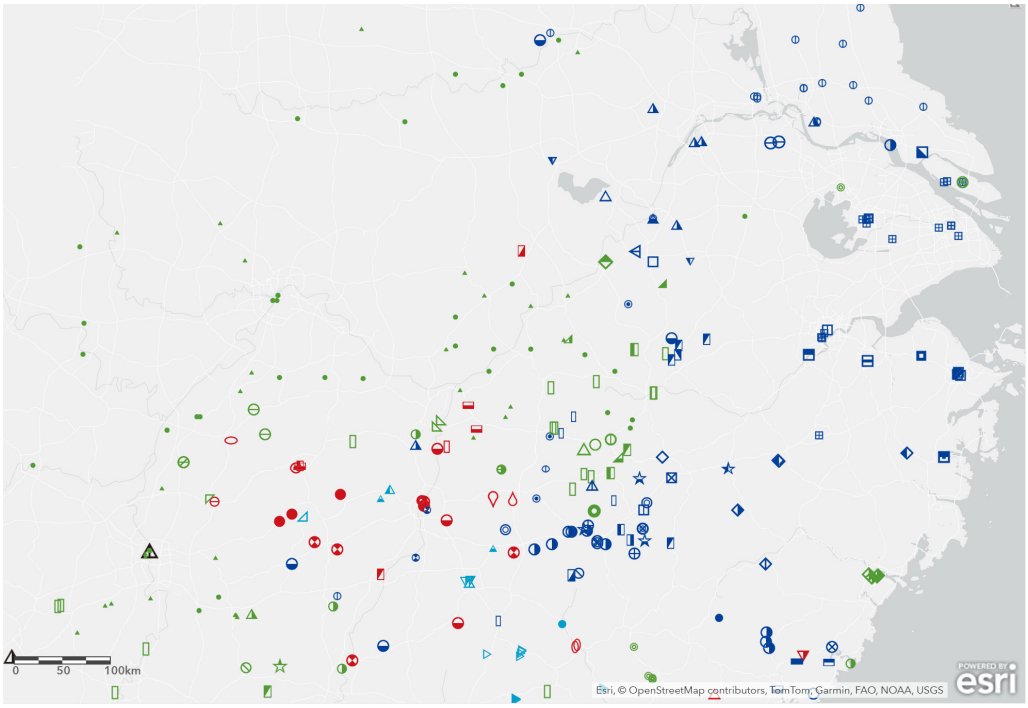


图 3　华中地区“十”韵尾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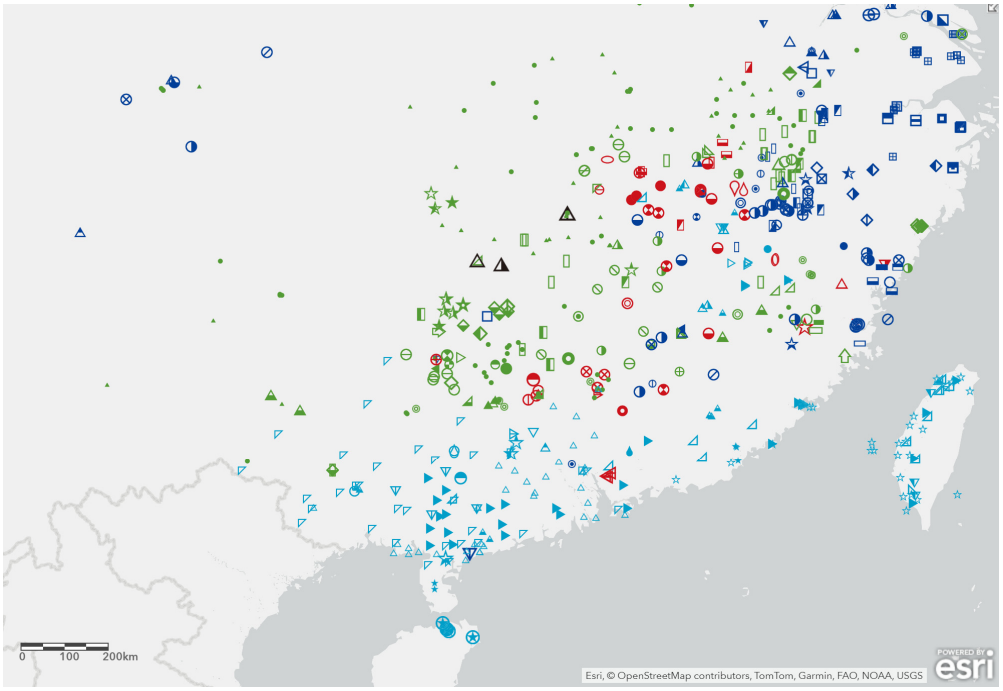


图 4　华南地区“十”韵尾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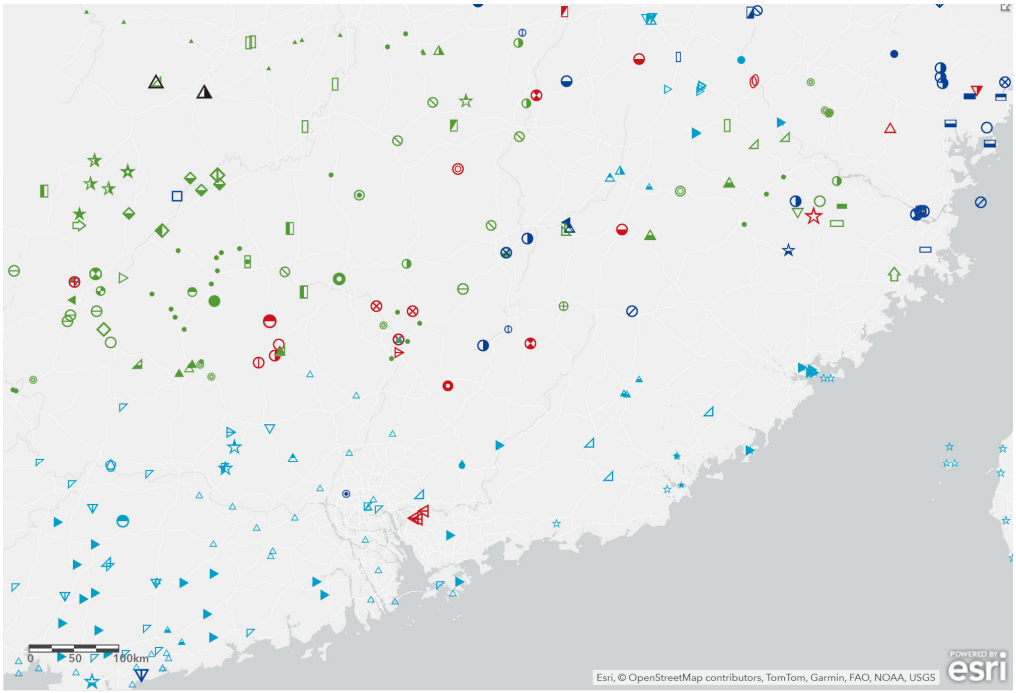


图 5　华南沿海地区“十”韵尾地理分布

三、声母

我们的资料中出现的十的声母有 θ, ɬ, s, ʃ, ʂ, ʂʱ, ɕ, z, ʑ, ʒ, ʦ, ʧ, ʦʰ, tʂʰ, ʤ, t　([pʰau], [pʰʌu]等的 pʰ除外，下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s 和 ʂ，各占全体的 37%和 34%。其次是 ʃ，ɕ，z，ts，θ，各占全体的 11%、6%、4%、3%、1%。其他的声母均占 1%以下。

图 6 表示“十”的声母在全国的地理分布，表 2 表示“五”的声母地图凡例。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有舌尖后音或舌叶音的广泛分布。舌面前音的分布在南方的江西、湖南等地区和北方的山西、山东、辽东等地区。虽然数量比较少，但在南方地区相当广泛地分布着塞擦音声母。在海南有 t 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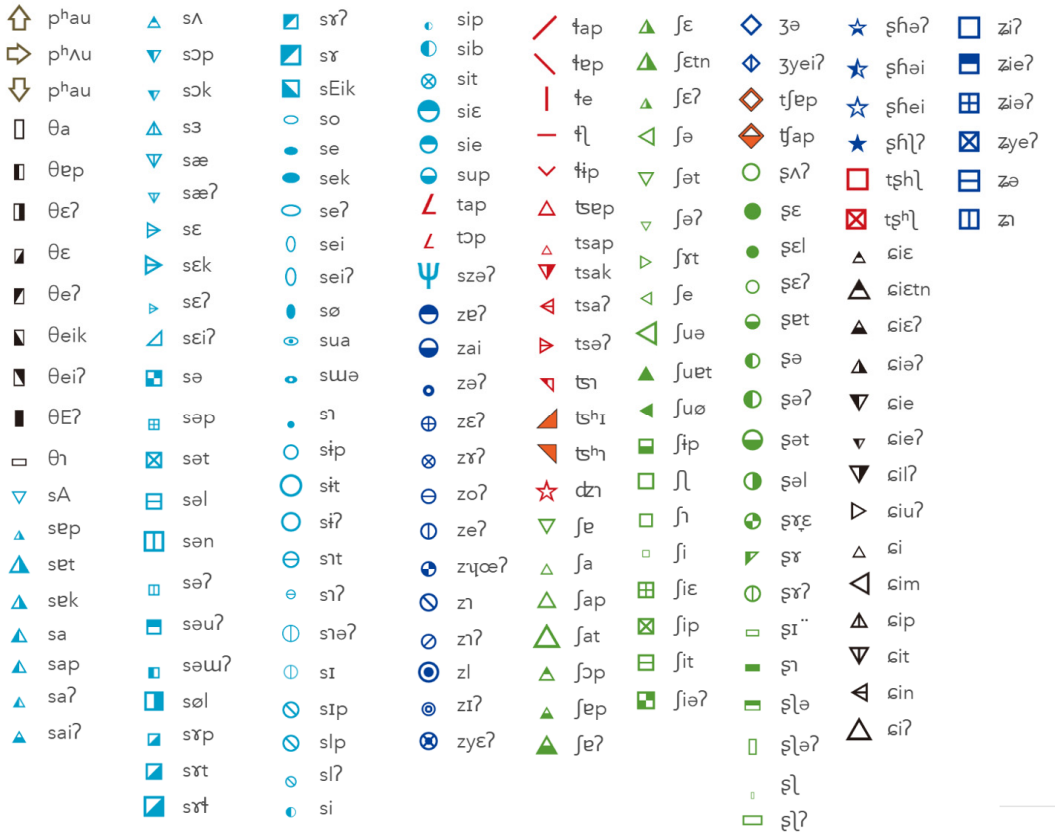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dzyip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十的声母（pʰ 除外）演变的过程如下：

ʤ ＞ ʧ, tʂʰ , ʦ, ʦʰ ＞ t

＞ ʒ ＞ z, ʑ ＞ ʃ, s, θ, ɬ, ɕ

＞ ʂʱ ＞ ʂ

表 2 “十”声母地图凡例


pʰau
pʰʌu
pʰau
θa
θɐp
θɛʔ
θɛ
θeʔ
θeik
θeiʔ
θEʔ
θɿ
sA
sɐp
sɐt
sɐk
sa
sap
saʔ
saiʔ
sʌ
sɔp
sɔk
sɜ
sæ
sæʔ
sɛ
sɛk
sɛʔ
sɛiʔ
sə
səp
sət
səl
sən
səʔ
səuʔ
səɯʔ
søl
sɤp
sɤt
sɤɬ
sɤʔ
sɤ
sEik
so
se
sek
seʔ
sei
seiʔ
sø
sua
sɯə
sɿ
sɨp
sɨt
sɨʔ
sɪt
sɪʔ
sɪəʔ
sɪ
sɪp
slp
slʔ
si
sip
sib
sit
siɛ
sie
sup
tap
tɔp
szəʔ
zɐʔ
zai
zəʔ
zɛʔ
zɤʔ
zoʔ
zeʔ
zɥœʔ
zɿ
zɿʔ
zl
zɪʔ
zyɛʔ
ɬap
ɬɐp
ɬe
ɬl
ɬip
tsɐp
tsap
tsak
tsaʔ
tsəʔ
tsɿ
tsʰɪ
tsʰɥ
dzɿ
ʃɐ
ʃa
ʃap
ʃat
ʃɔp
ʃɐp
ʃɐʔ
ʃɛ
ʃɛtn
ʃɛʔ
ʃə
ʃətʔ
ʃəʔ
ʃɤt
ʃe
ʃuə
ʃuɐt
ʃuø
ʃɨp
ʃl
ʃɿ
ʃi
ʃiɛ
ʃip
ʃit
ʃiəʔ
ʒə
ʒyeiʔ
tʃɐp
ʧap
ʂʌʔ
ʂɛ
ʂɛl
ʂɛʔ
ʂɐt
ʂə
ʂəʔ
ʂət
ʂəl
ʂɤɛ
ʂɤ
ʂɤʔ
ʂɪ¨
ʂɿ
ʂlə
ʂləʔ
ʂl
ʂlʔ
ʂfəʔ
ʂfəi
ʂfei
ʂflʔ
tʂhl
tʂʰl
ɕiɛ
ɕiɛtn
ɕiɛʔ
ɕiəʔ
ɕie
ɕieʔ
ɕilʔ
ɕiuʔ
ɕi
ɕim
ɕip
ɕit
ɕin
ɕiʔ
ʑiʔ
ʑieʔ
ʑiəʔ
ʑyeʔ
ʑə
ʑ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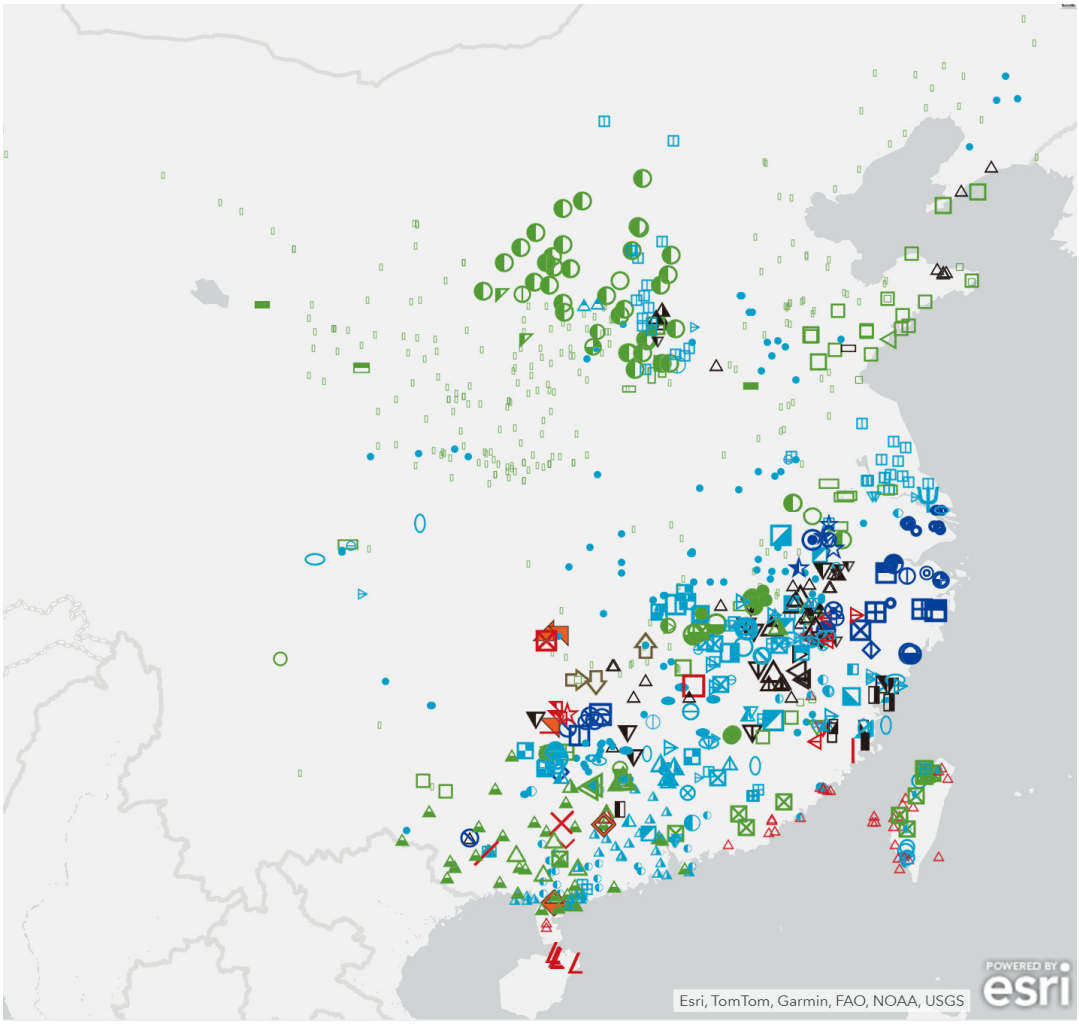


图 6　“十”声母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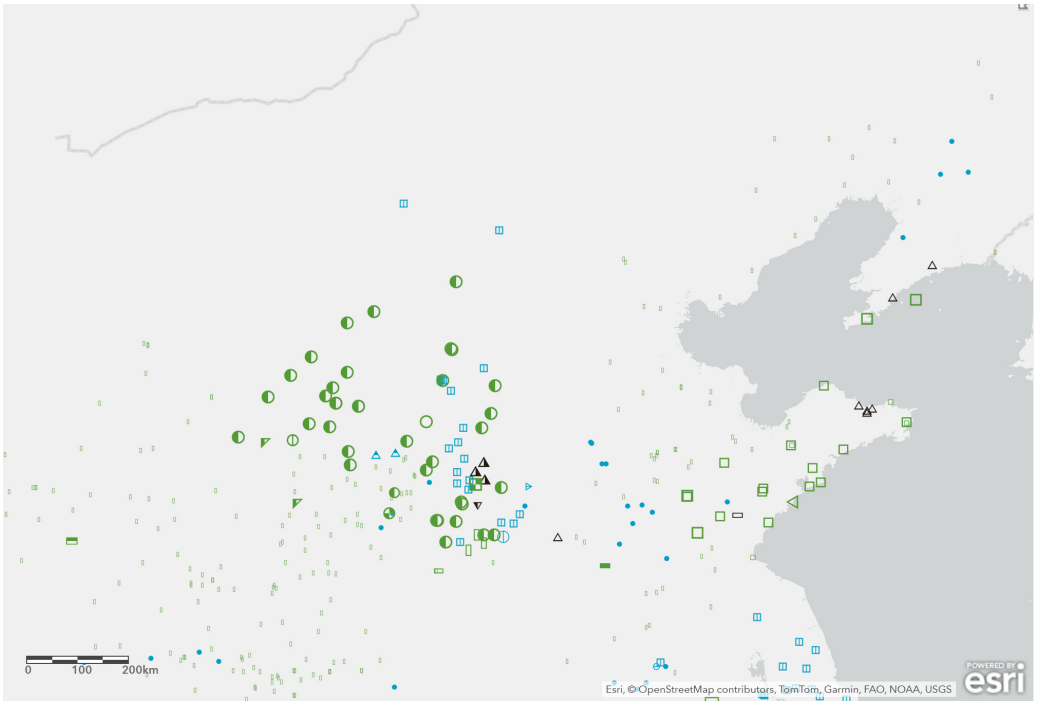


图 7　华北地区“十”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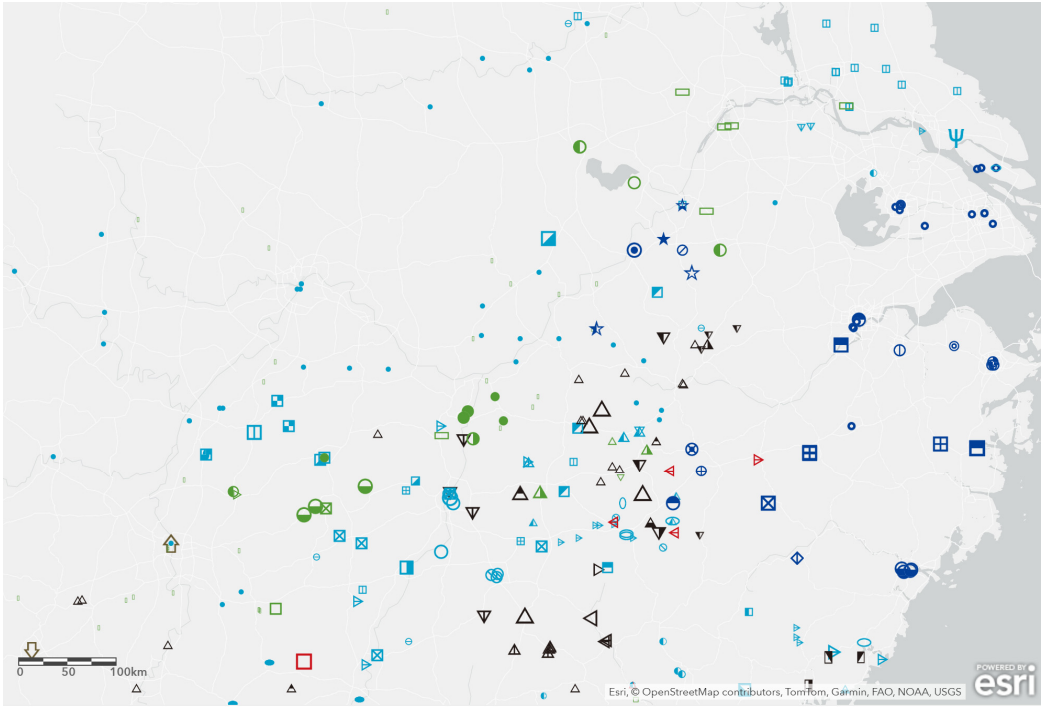


图 8　华中地区“十”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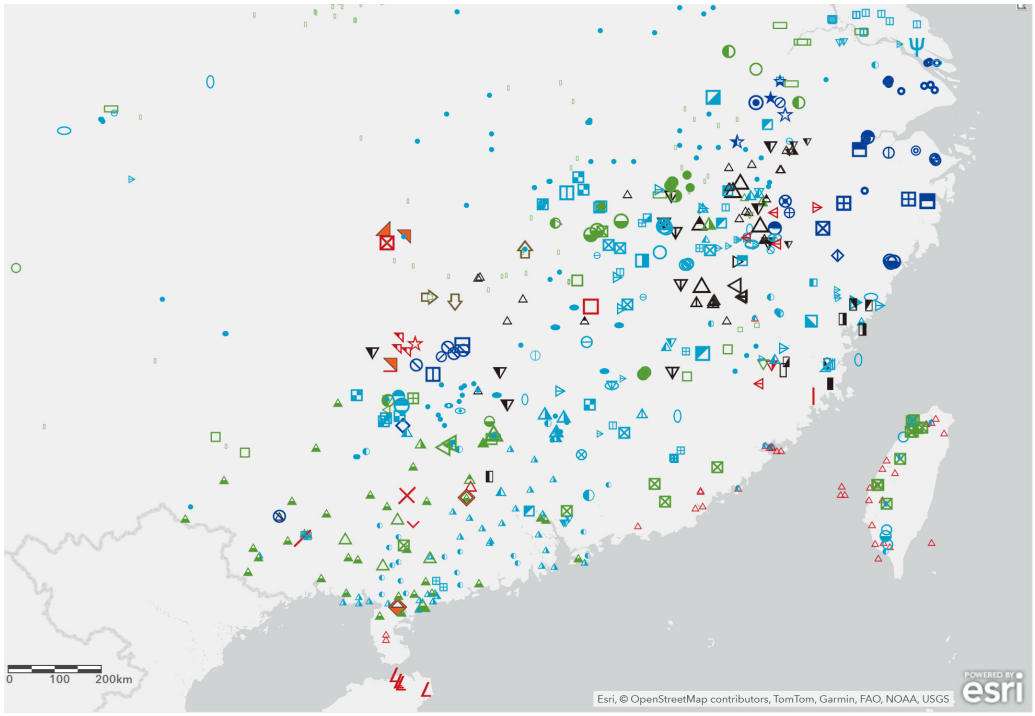


图 9　华南地区“十”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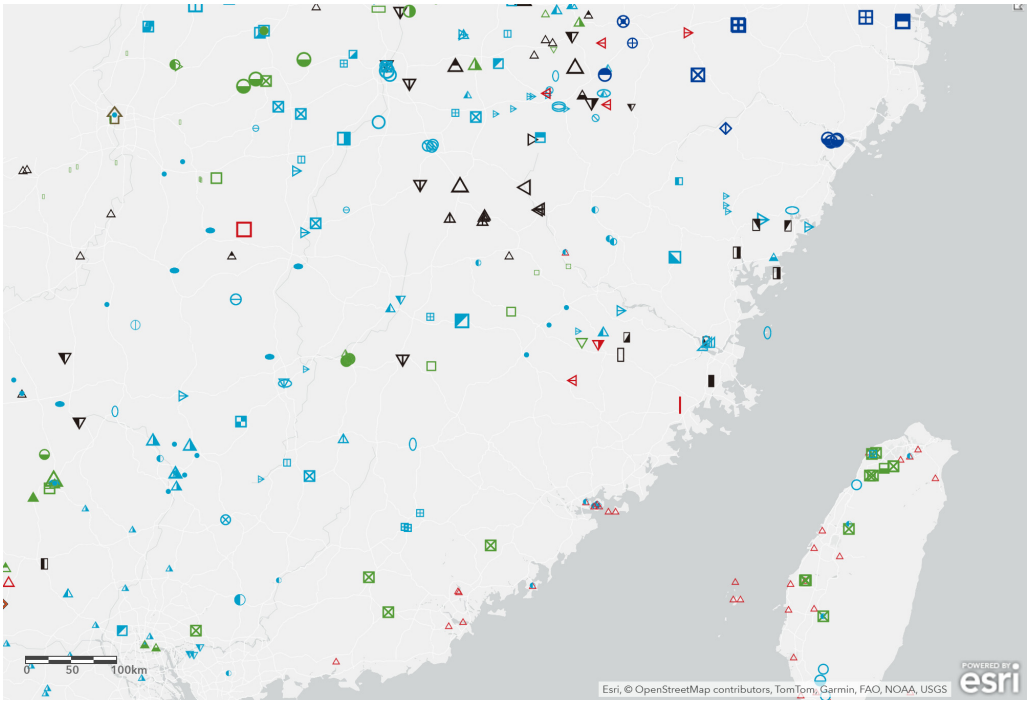


图 10　华南地区“十”声母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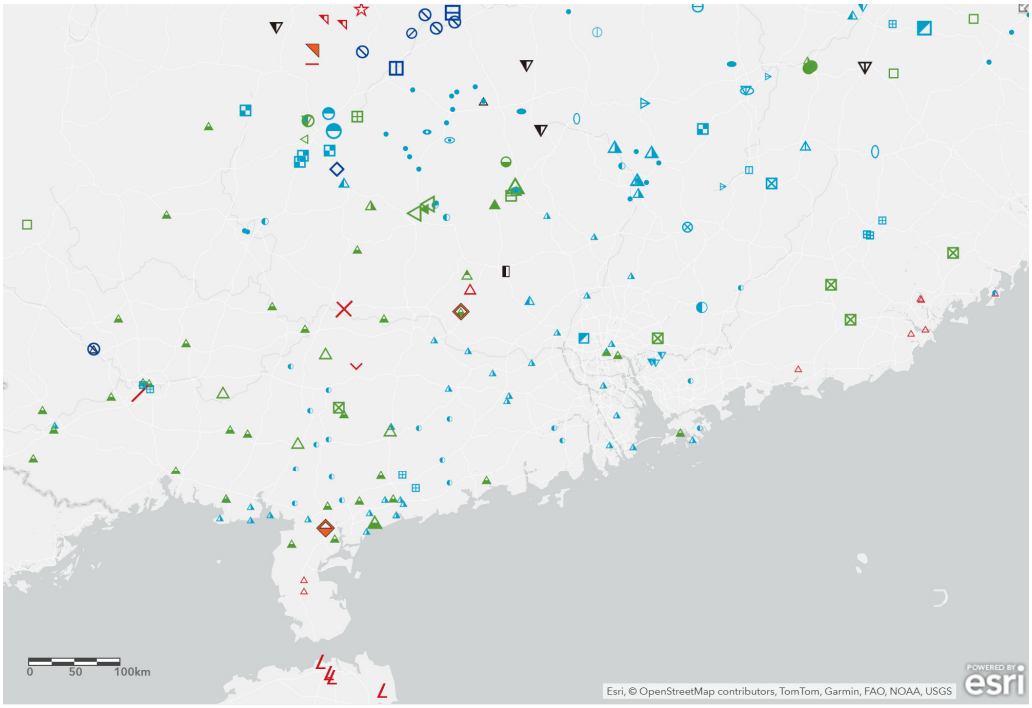


图 11　两广地区“十”声母地理分布

四、元音

我们的资料中出现的十的韵母有以下 44 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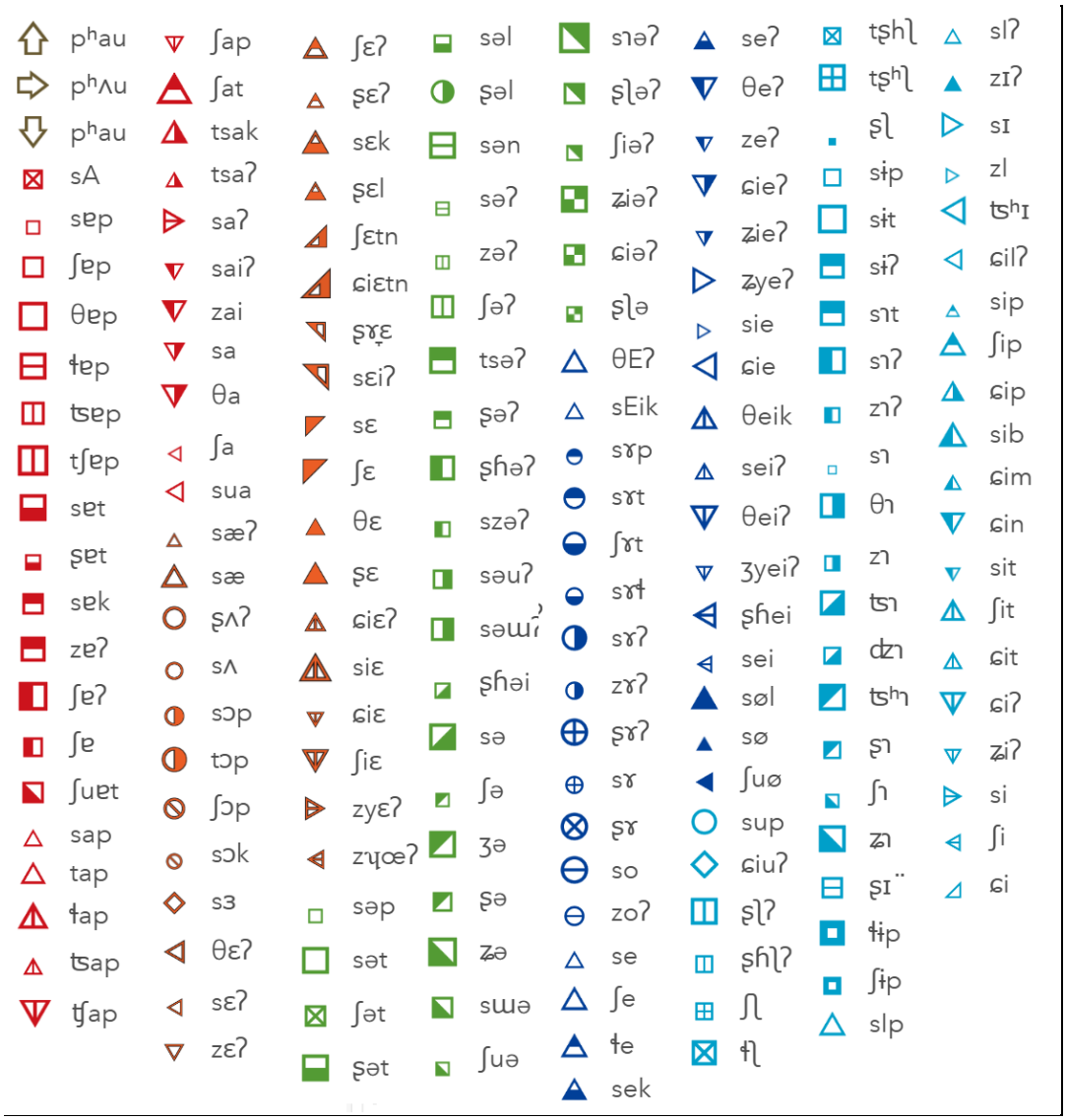
ye, yɛ, yei, ɥœ,i, ɪ,ɿ, i̱, ï, ɻ,ua, uɐ, uə, uø o, ɔ, ø, iI, ie, iə, ɭə, iɛ, ɯə, ɻə, iu, ei, əi, ɛi, ai, e, ɛ, æ, a, ɐ, əu, ʌu, au, əɯ, ə, ɜ, ɤ, ɻɛ, ʌ,u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ɿ，占全体的约 27%。其次多的是 ɻ, ə, i，各占 14%, 14%, 12%。接下来有 ɐ, a, ɛ, e 等，各占 9～2%，这些 8 钟元音占全元音的 88%。

图 12 表示“五”元音的全国分布，表 3 表示“五”元音地图的凡例。

低元音韵母大部分在南方广泛地分布，也有在山西近邻的所谓晋语的分布地区。

表 3　“十”元音地图凡例


pʰau
pʰʌu
pʰau
sʌ
sɐp
ʃɐp
θɐp
ɬɐp
tsɐp
tʃɐp
sɐt
ʂɐt
sɐk
zɐʔ
ʃɐʔ
ʃuɐt
sap
tap
ɬap
tsap
tʃap
ʃap
ʃat
tsak
tsaʔ
saʔ
saiʔ
zai
sa
θa
ʃa
sua
sæʔ
sæ
ʂʌʔ
sʌ
sɔp
tɔp
ʃɔp
sɔk
sɜ
θɛʔ
sɛʔ
zɛʔ
ʃɛʔ
ʂɛʔ
sɛk
ʃɛtn
ɕiɛtn
ʂɤ̞ɛ
sɛiʔ
sɛ
ʃɛ
θɛ
ʂɛ
ɕiɛʔ
siɛ
ɕiɛ
ʃiɛ
zyɛʔ
zɥœʔ
səp
sət
ʃət
ʂət
səl
ʂəl
sən
səʔ
zəʔ
ʃəʔ
tsəʔ
ʂəʔ
ʂhəʔ
szəʔ
səuʔ
səɯʔ
ʂhəi
sə
ʃə
ʒə
ʂə
ʑə
sɯə
ʃuə
sɪəʔ
ʂləʔ
ʃiəʔ
ʑiəʔ
ɕiəʔ
ʂlə
θEʔ
sEik
sɤp
sɤt
ʃɤt
sɤɬ
sɤʔ
zɤʔ
ʂɤʔ
sɤ
ʂɤ
so
zoʔ
se
ʃe
ɬe
sek
seʔ
θeʔ
zeʔ
ɕieʔ
ʑieʔ
ʑyeʔ
sie
ɕie
θeik
seiʔ
θeiʔ
ʒyeiʔ
ʂhei
sei
søl
sø
ʃuø
sup
ɕiuʔ
ʂlʔ
ʂhlʔ
ʃl
ɬl
tʂhlˌ
tʂʰlˌ
ʂlˌ
sɬp
sɬt
sɬʔ
sɪt
sɪʔ
zɪʔ
sɪ
θɪ
zɪ
tsɪ
dzɪ
tsʰɪ
ʂɪ
ʃɪ
ʑɪ
ʂɪ¨
ɬɬp
ʃɬp
slp
slʔ
zɪʔ
sɪ
zl
tsʰɪ
ɕilʔ
sip
ʃip
ɕip
sib
ɕim
ɕin
sit
ʃit
ɕit
ɕiʔ
ʑiʔ
si
ʃi
ɕ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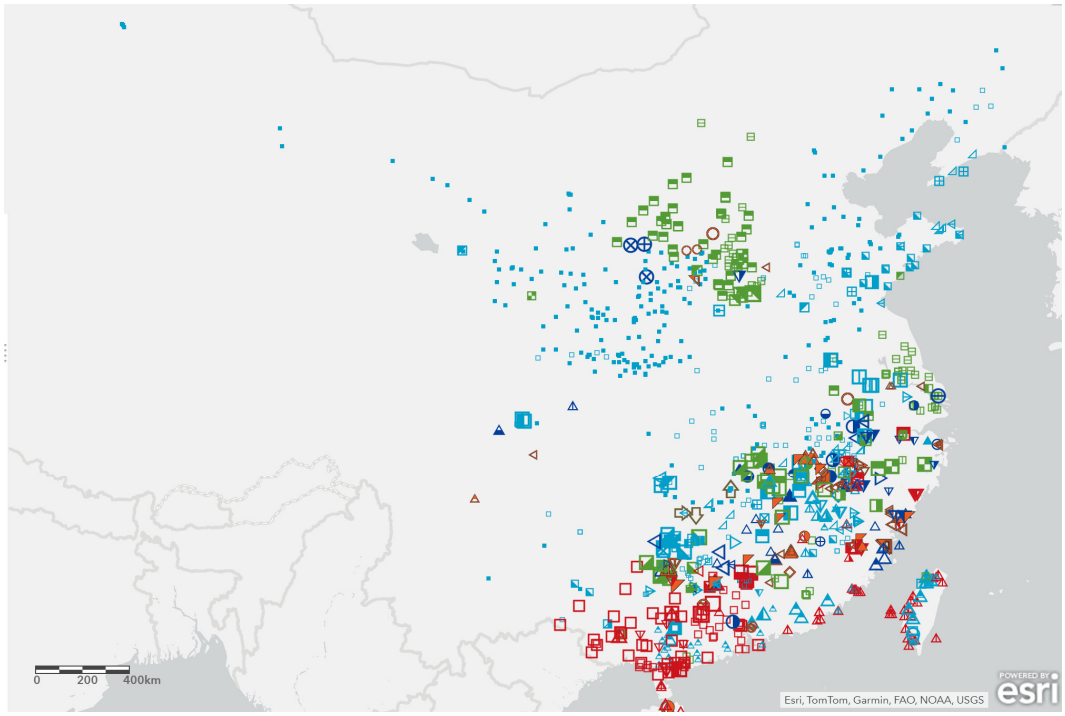


图 12　“十”元音全国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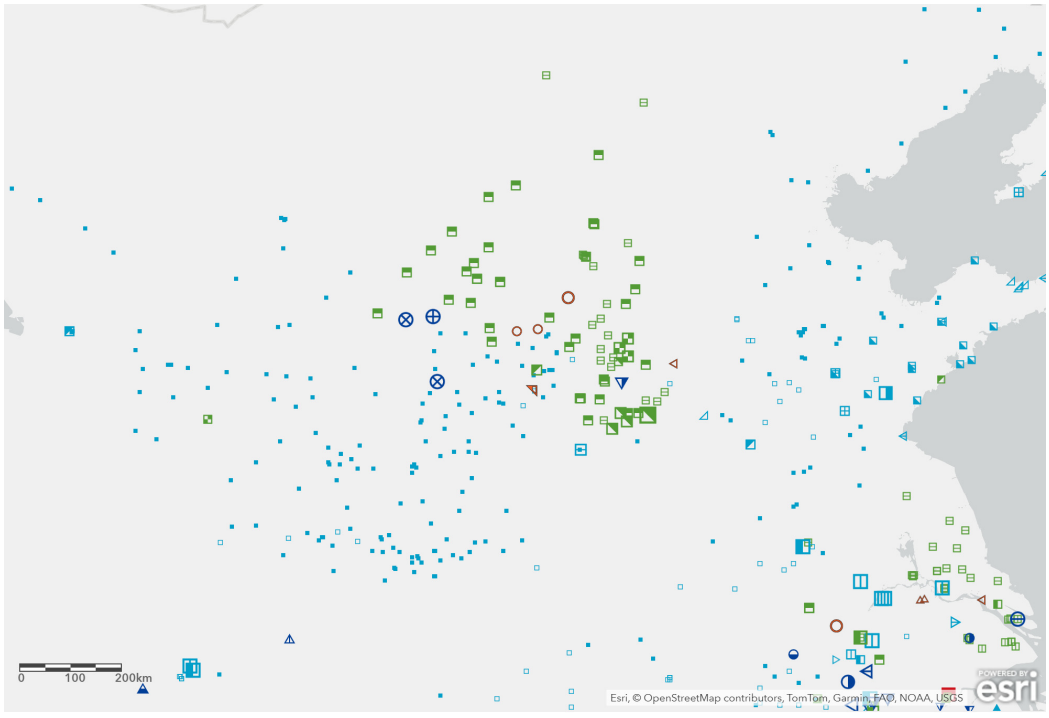


图 13　华北地区“十”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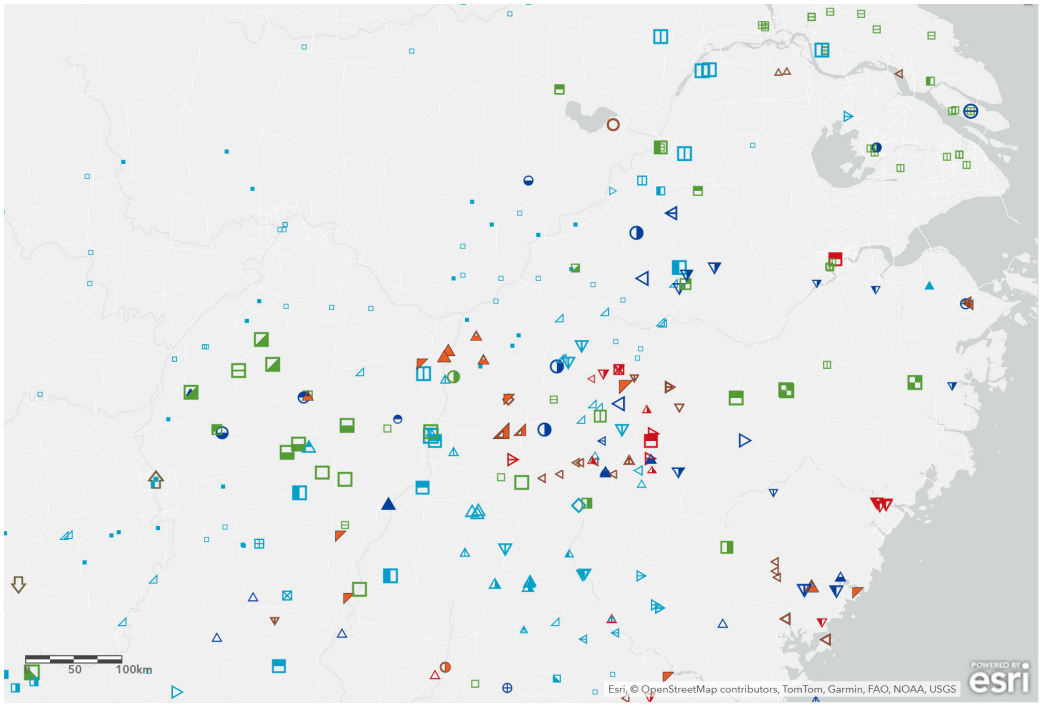


图 14　华中地区“十”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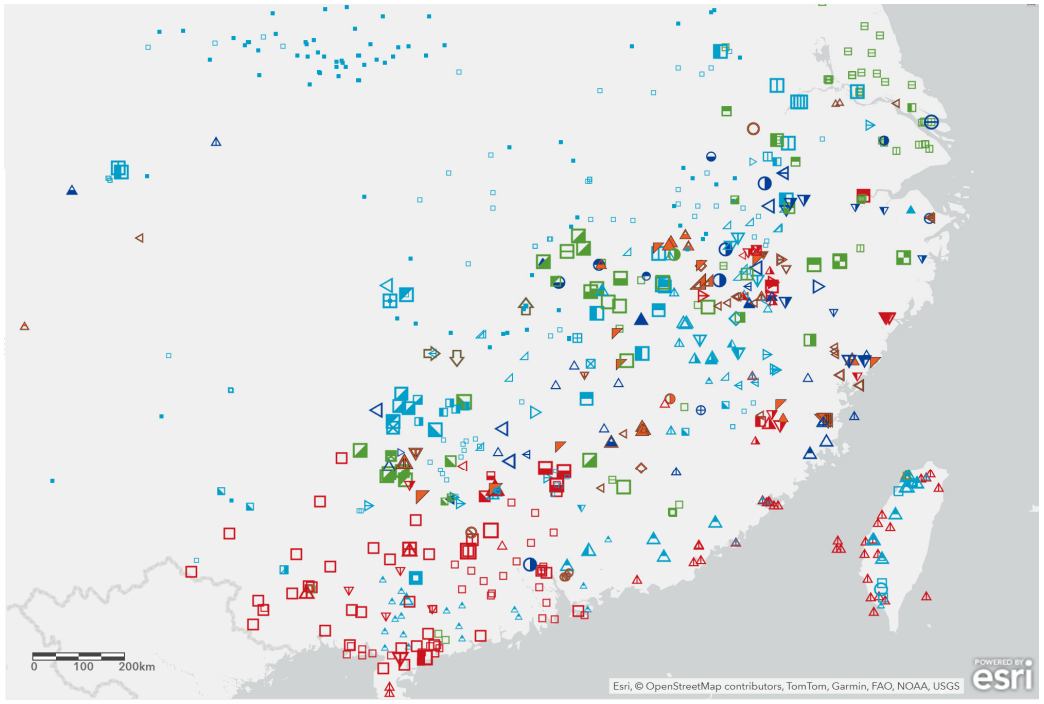


图 15　华南地区“十”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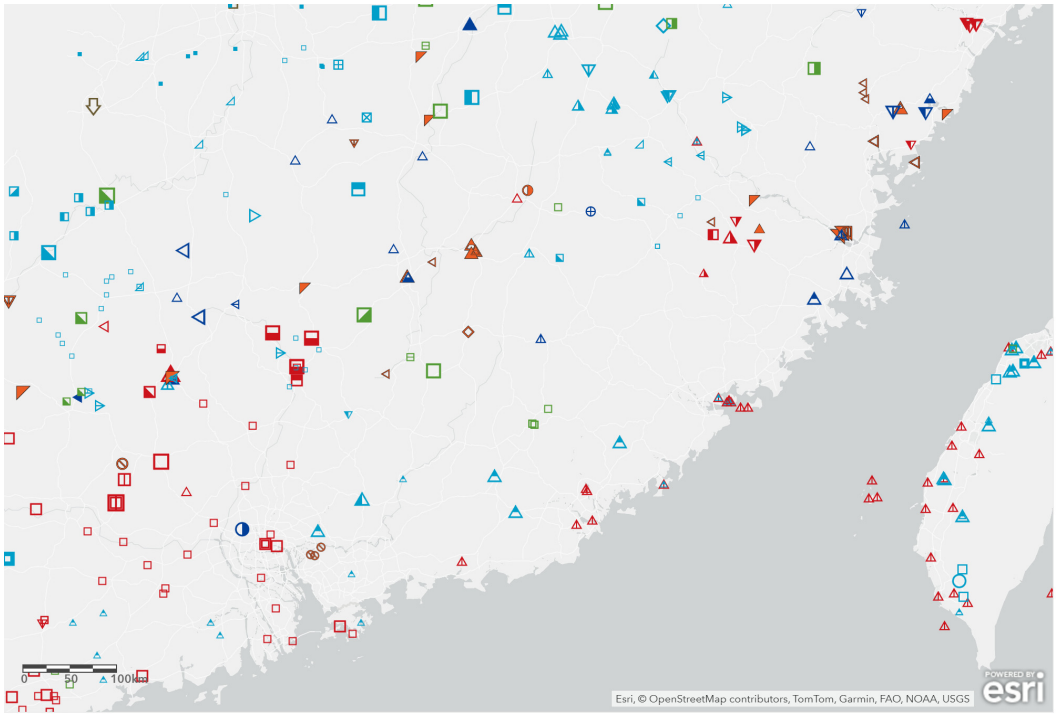


图 16　华南沿海地区“十”元音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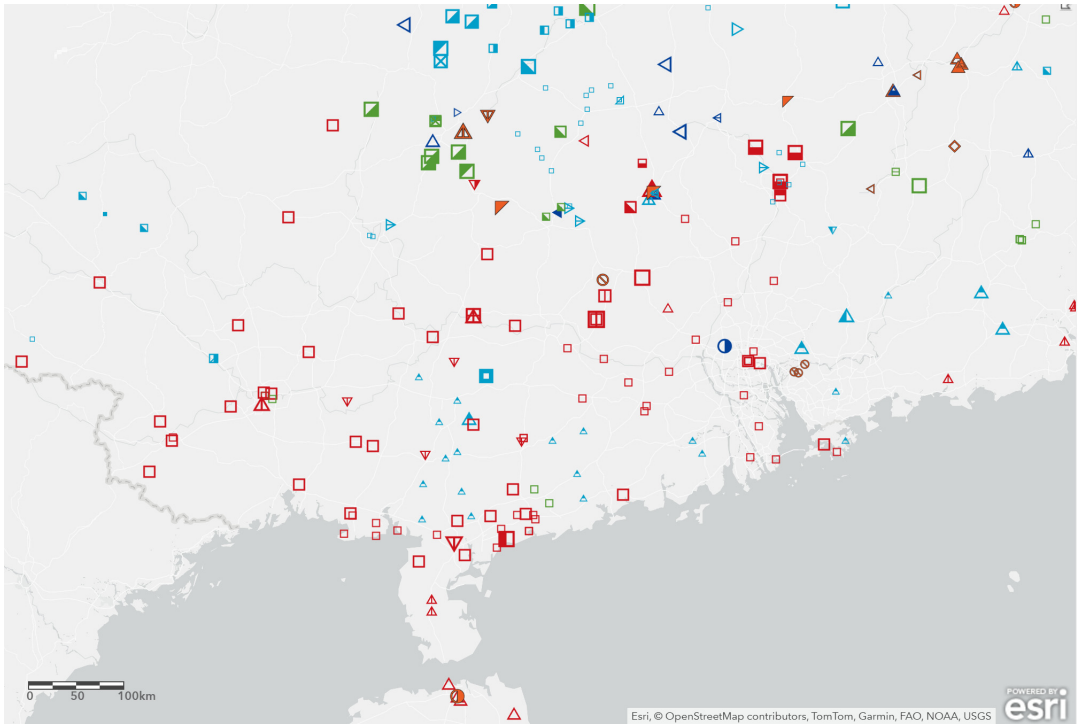


图 17　两广地区“十”元音地理分布

如果以 Baxter & Sagart（2014）构拟的中古音 dzyip 假设为理论上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描述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十的元音演变的过程如下：

yi

＞ ye, yɛ, yei, ɥœ

＞ i, ɪ,ɻ, i̞, ï, ɿ

＞ ua, uɐ, uə, uø ＞ o, ɔ, ø

＞ iI, ie, iə, ɿə, iɛ, ɯə, ɻə,

＞ iu

＞ ei, əi, ɛi, ai ＞ e, ɛ, æ, a, ɐ

＞ əu, ʌu, au ＞ əɯ ＞ə, ɜ, ɤ, ɣɛ, ʌ

＞ u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23K00486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鲍厚星等 1999《长沙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储泽祥 1998《邵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代少若 2020《湖南赣语词汇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do, M. 2016. Goals of the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2015-2017.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 —Sun—*, 1-4.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1_sun_2016.pdf

《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一”至“十”的藏语部分（稿）

铃木博之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为《汉藏语历史语言地图集》“一”至“十”的藏语部分。我们针对各数词形式中的声母和韵母分别绘制语言地图。十个数词中，“一”“二”“十”的词根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文末将明清时代藏语口语文献记录中的数词形式列为参考。

一、前言

本文的讨论范围涵盖东部藏区（滇川藏甘青地区及缅甸）的藏语支（Tibetic）语言，一共涉及 297 个语言点。按照 Tournadre and Suzuki（2023）的分类，本地区的语言可分为三类：东北区（所谓的安多藏语）、东区（所谓的安多区康巴藏语）、东南区（所谓的康区康巴藏语）[1]。

本文资料来源均为作者亲自的调查记录。为保证对于语料语音描写的统一，以便比较研究，标音方法依据藏语支语言统一的自定标音标准（参见 Suzuki 2016）。藏文的拉丁转写依据 de Nebesky-Wojkowitz（1956）的规范。

二、描写与分类及语言地图

本节对各个数词提供个别描述，依次分别绘制声母和韵母的地图，而不涉及声调。“一”“二”“十”等三个数词由于使用非单一的词根，因而加以有关词根分布的地图。由于调查点地理分布不均的原因，必要时我们会扩大地图的南端部分（以云南藏区为主）作为独立的地图。“一”至“十”的地图编号为两个数字，第一位数字代表所讨论的数词，第二位数字为各数词内的序号。

由于篇幅所限，各个数词先做描述与分析，之后展示地图，原则上一页安排一幅。

[1] 对于括号内的名称，参见铃木博之（2016）及 Suzuki（2022）。

“一”

数词“一”的词形有藏文 gcig 及其变体 zhig 和 cig，另有书面语上没有但许多方言口语中采用的*gtsig。在东部藏区的土话中，有的与 gcig 对应，有的与 gtsig 对应。在康区中西部，使用后者的土话和牧区话有关。安多藏语的牧区话目前均不使用后者，但作为“十一”词形中的语素出现（参见完玛冷智 2006）。

笔者认为，gcig（< *gtyig）和 gtsig 在词根上互相不同，而不是派生关系。除了部分土话中/ts/在前高元音之前会演变成/tɕ/（比如，Suzuki 2015 描写的舟曲藏语拱坝话、铃木博之 2022 描写的香格里拉藏语建塘组土话），/ts/>/tɕ/的音变不出现于其他任何土话。

图 1.1 为数词“一”词根差异的分布。C 类与藏文 gcig 对应，TS 类则与 gtsig 对应。TS 类在中部东西方向有一条连续的分布带。这幅地图仅包含东部藏区的情况，因而目前无法判断 TS 类是否在整个藏语支语言分布地区表现为 ABA 分布。

图 1.2 为数词“一”声母的分布。与藏文 gcig 对应的形式，按声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五种（tɕ 类、ʈʂ 类、cç 类、c 类、tʂ类），分别呈现出与藏文的规则性对应。其历时层次关系可构拟为(1)[2]：

(1)

藏文 gc: gtɕ	> ᵡtɕ	> ˣtɕ	> ʰtɕ	> tɕ	(1a)
	> ...		> ʰʈʂ	> ʈʂ	(1b)
	> ...		> ʰcç		(1c)
	> ...		> ʰc		(1d)
	> ...		> ʰtʂ		(1e)

图 1.3 为数词“一”韵母的分布。“一”的不同藏文形式的韵母相同，按元音在土话中的表现大致分为四种（i 类、ə 类、e 类、u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可构拟为(2)：

(2)

藏文 ig: ik	> ik-iq	> iʁ-iɣ	> iʔ	> i:	> i	(2a)
	> ək	> əɣ	>	> ə:	> ə	(2b)
	>	> ejʔ	> eʔ	> e:		(2c)
	> ...		> uʔ			(2d)

[2] 在展示音变过程时，“...”表示音变过程不明但按照实际语音形式可以假设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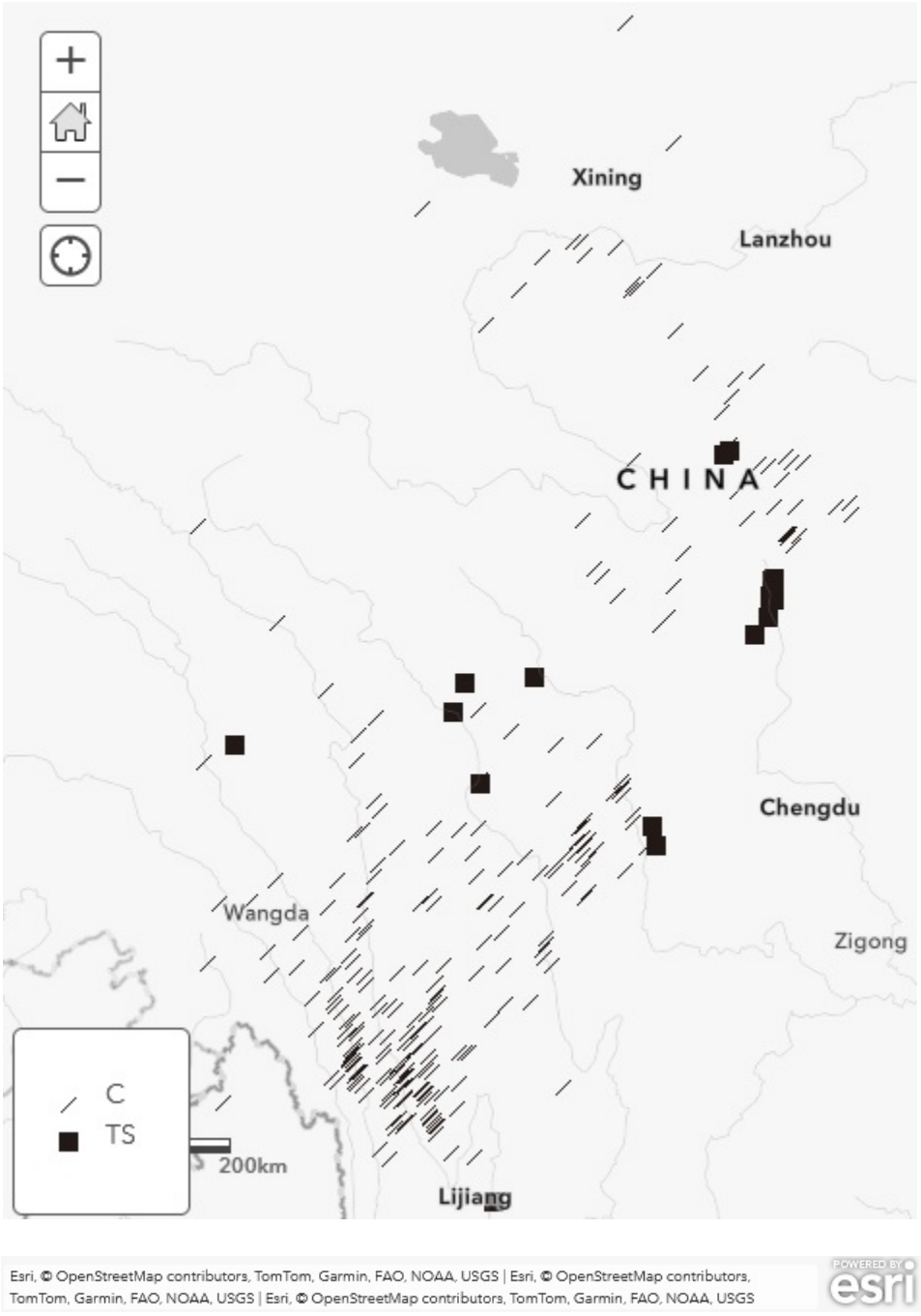


图 1.1：数词“一”词根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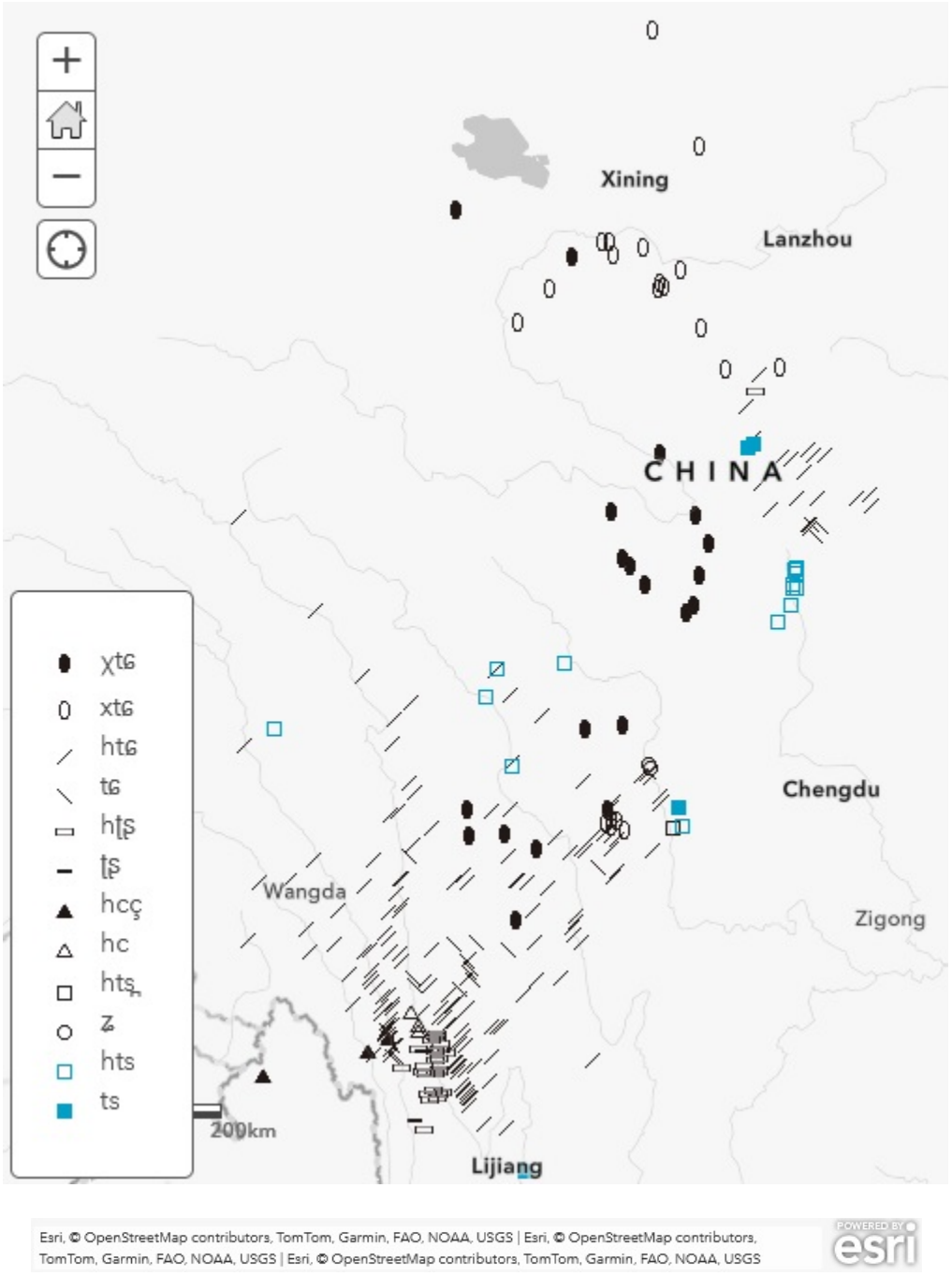


图 1.2：数词“一”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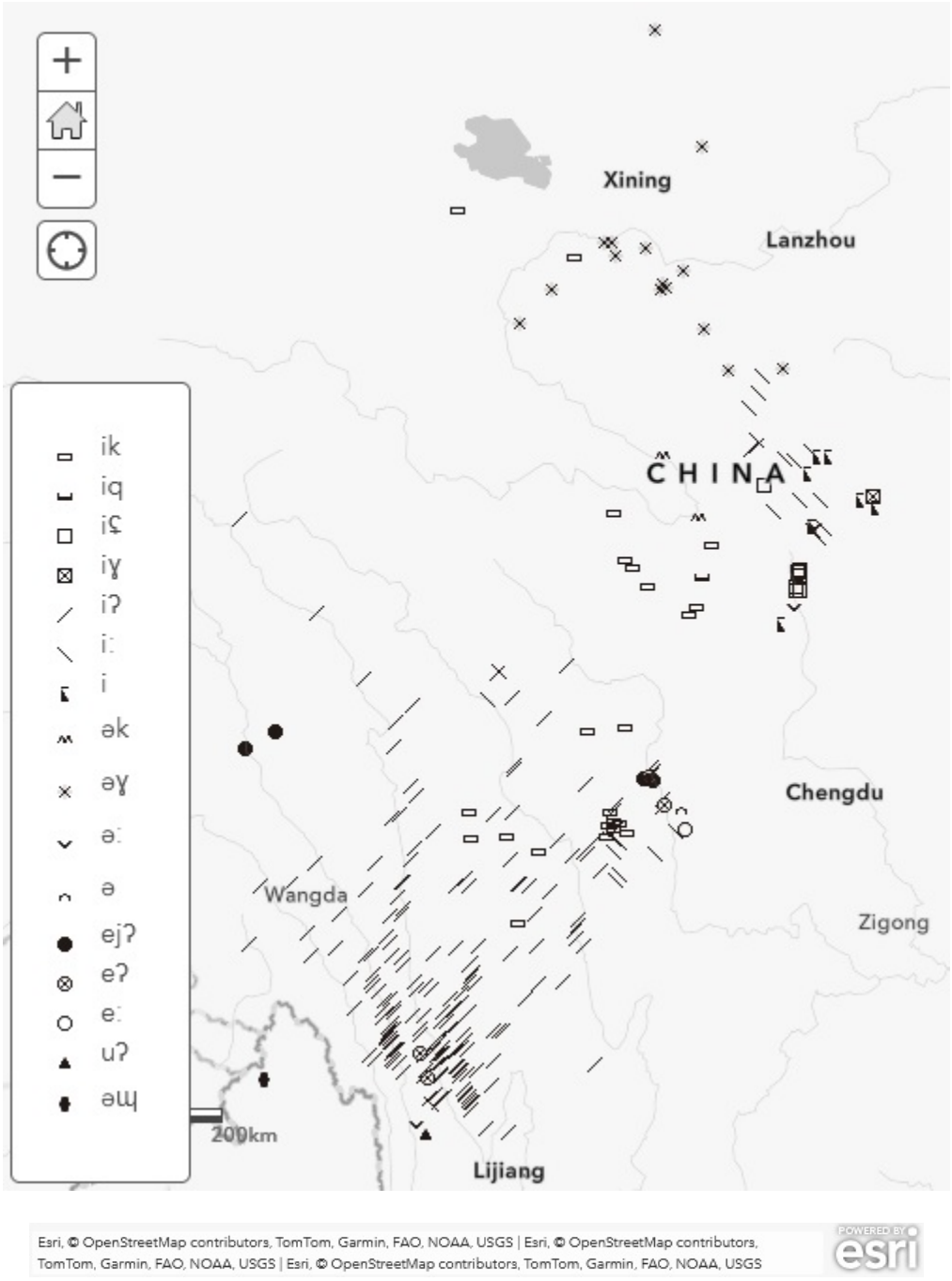


图 1.3：数词“一”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二”

数词“二”的藏文词形有藏文 gnyis（基数词）和 do（数量数词）两种，大多数调查点使用前者。另有书面语上没有、许多土话中呈现的*gnis。还有含 m 声母的形式，无对应的藏文形式。参见铃木博之（2014a）及 Suzuki（2018）。

图 2.1 和图 2.2 所示为词根类别的地理分布，共有五种。其中，三个与声母有关，NY 类为具有 ŋ̊ 声母的，N 类为具有 n 声母的，M 类为具有 m 声母的。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土话缺乏腭前鼻音（ŋ̊）而统一实现为齿-齿龈鼻音（n）。此类土话中，带 n 类声母的“二”应同 gnyis 对应，但不排除和 gnis 对应的可能性。上面地图上有 N=NY，和其他类别相区别。D 类仅在卡坝亚力巴话（甘南）中发现，属于数量数词，有藏文对应形式，并不是该土话的创新（细节参见铃木博之 2024）。

图 2.3 为数词“二”声母的分布。与藏文 gnyis 对应的形式，按声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两种（ŋ̊ 类和 n 类；n 类为音系缺乏 ŋ̊ 的情况）。其历时层次关系可构拟为(3)：

(3)

藏文 gny: gŋ̊ > ᵏŋ̊ > ʱŋ̊ > ŋ̊ (3a)

> ... > ʱn > n (3b)

图 2.4 和图 2.5 为数词“二”韵母的分布。与藏文 gnyis 对应的形式，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五种（i 类、ə 类、ʉ-u 类、e 类、o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可构拟为(4)：

(4)

藏文 is: is > i: > i (4a)

> ej > e: (4b)

> əj > ə: > ə (4c)

> əw > ʉ: > u (4d)

> o > ɔ (4e)

由于受到声母鼻音特征的影响，也有产生鼻化元音韵母形式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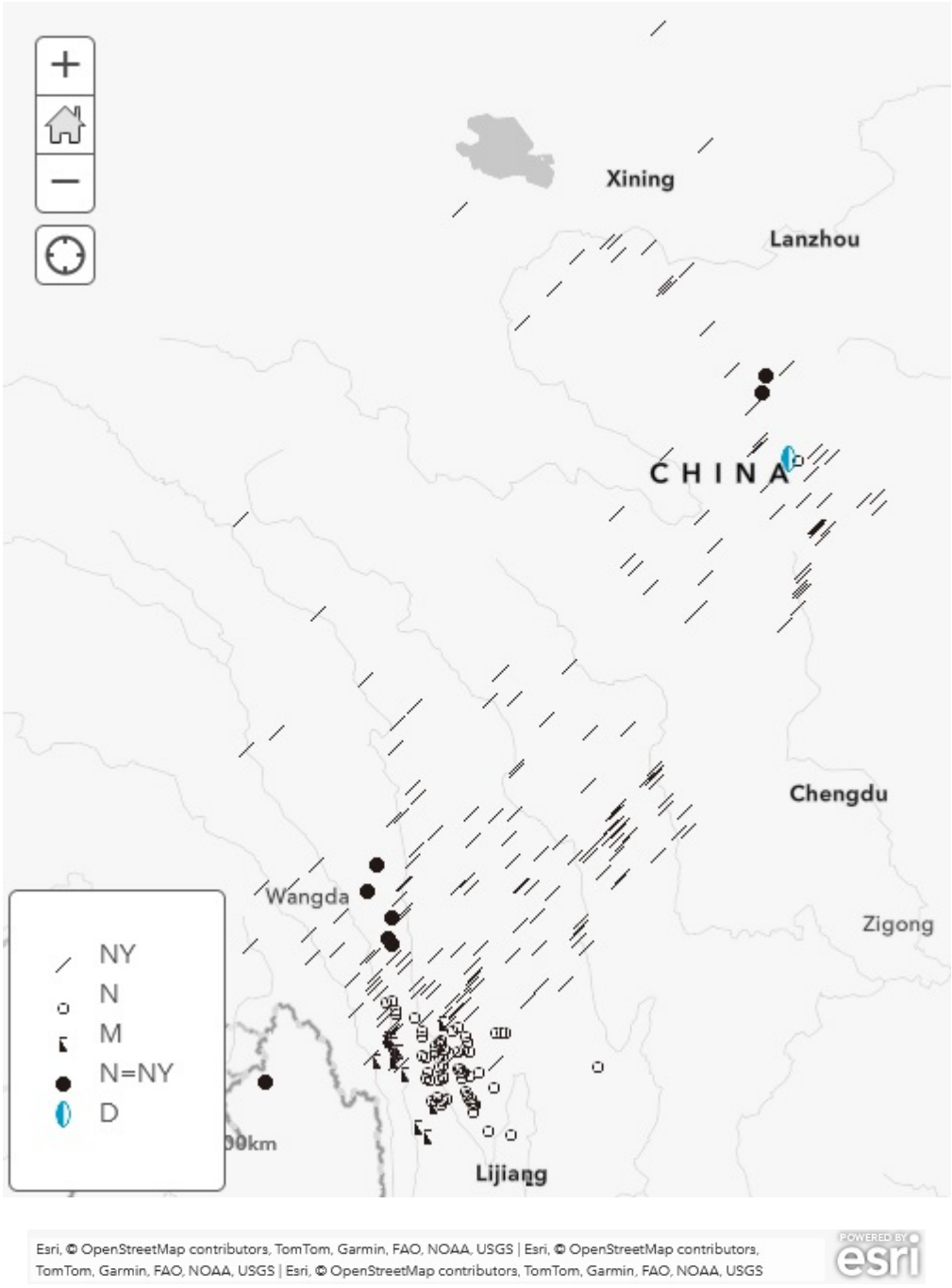


图 2.1：数词“二”词根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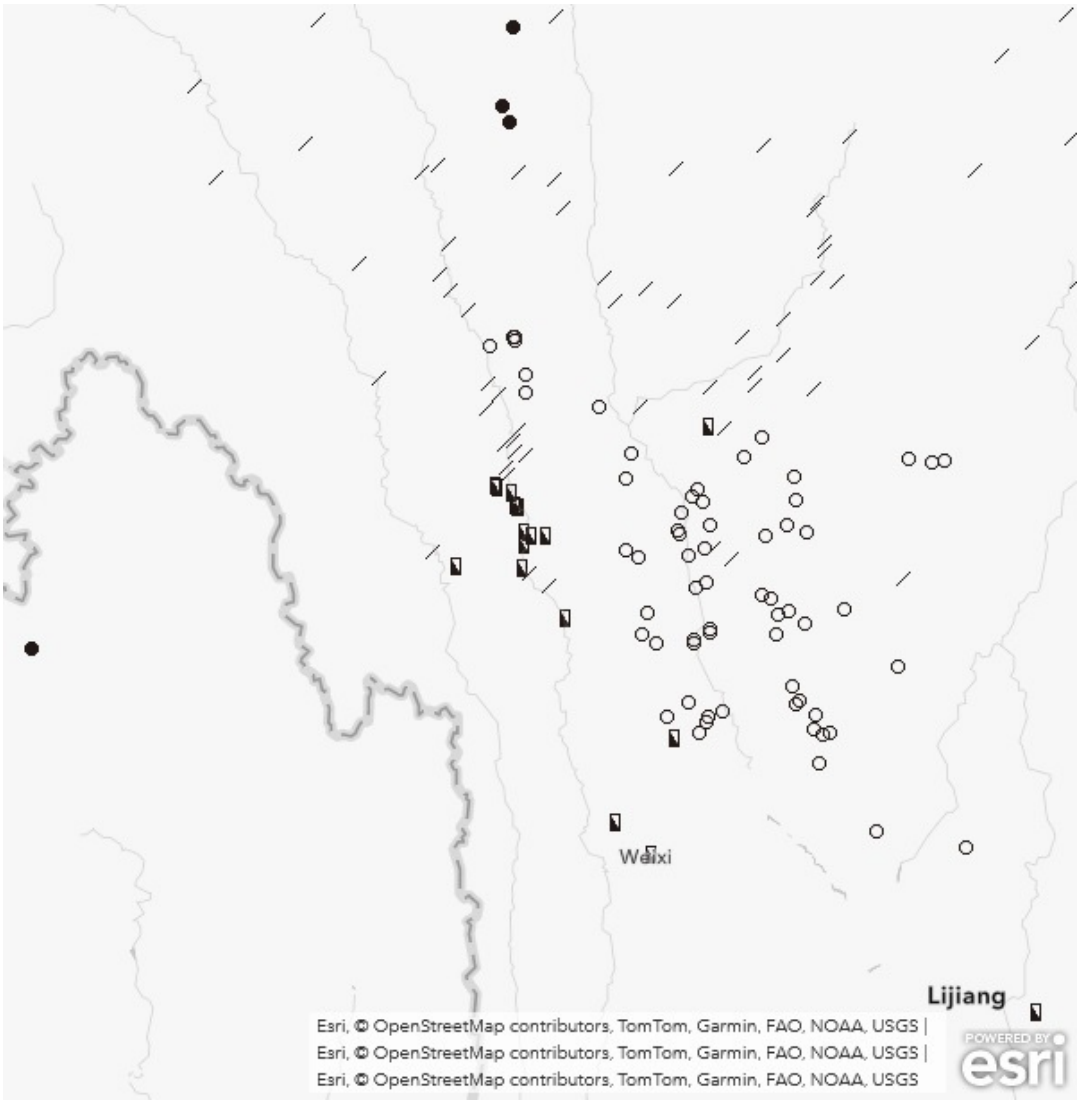


图 2.2：数词“二”词根形式的地理分布（云南藏区扩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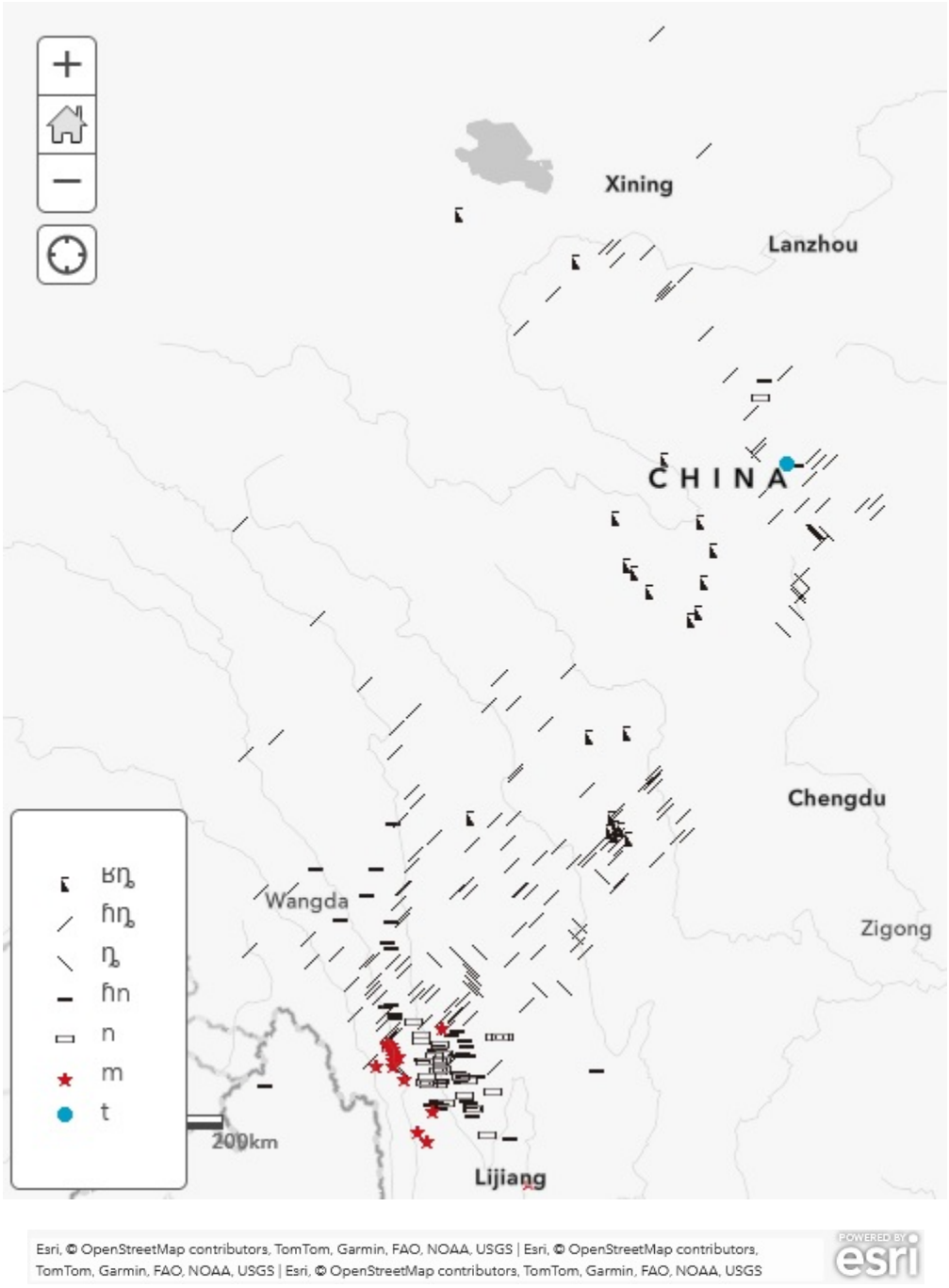


图 2.3：数词“二”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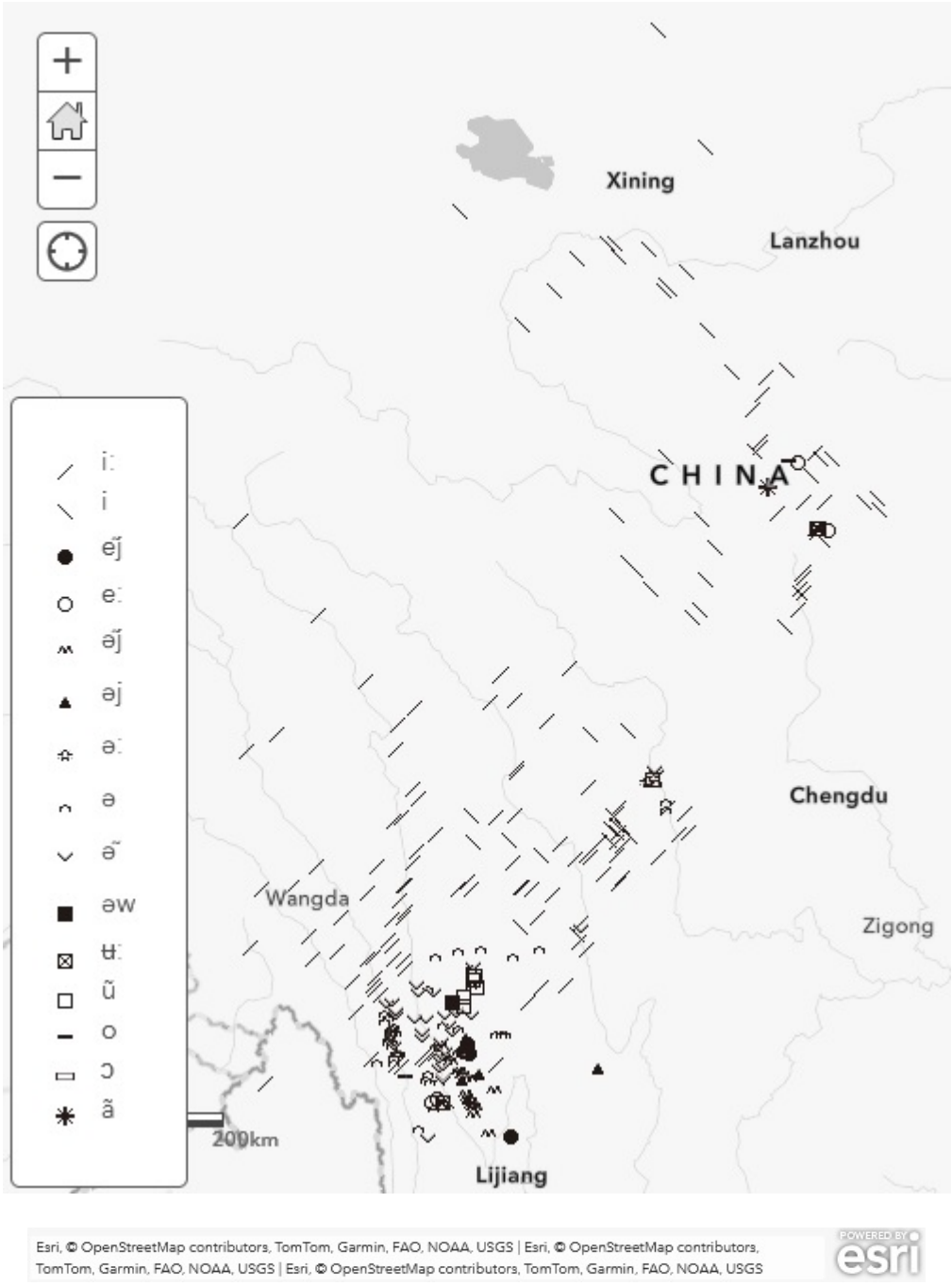


图 2.4：数词“二”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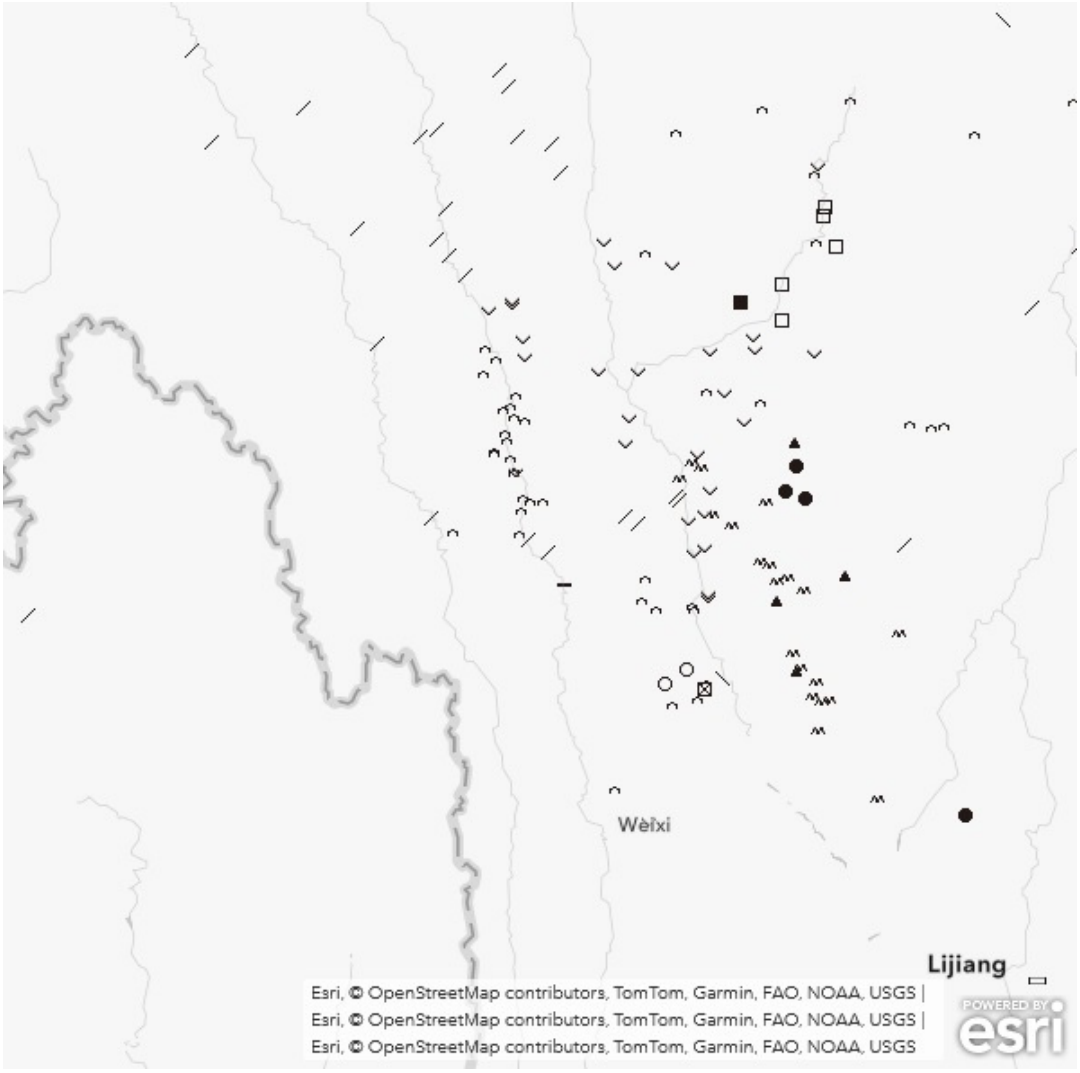


图 2.5：数词“二”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云南藏区扩大版）

“三”

数词“三”的词形仅有藏文 gsum，东部藏区土话中的形式都与此对应。

虽有几个特殊例子，如 ɬ、ɕ 等，但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呈现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5)所示：

(5)

藏文 gs: gs	> χs	> ˣs	> ^{h}s	> s	> s^{h}	(5a)
	> ...		> ^{h}ɕ			(5b)
	> ...		> ^{h}ɬ			(5c)

其中，(5a)的最终形式送气声母 s^{h}，来源于调音强化（fortisation）或原声母（藏文形式）失落先行辅音（前加字）（s > s^{h}；在东部藏区藏语支语言中单声母 s 变成送气音 s^{h} 为规则性演变）这两种途径，但尚未确定。(5b)是由于后续韵母性质为前高元音而产生。(5c)的细节参见 Suzuki（2013）和铃木博之（2018）。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九种（o 类、ɑ 类、ə 类、u 类、ɔ 类、ɯ 类、ʉ 类、ụ类、ʌ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6)所示：

(6)

藏文 um: um		> ũ:	> ũ	> u:	> u	(6a)
om	> oŋ	> õ:	> õ	> o:	> o	(6b)
	> ɔŋ	> ɔ̃				(6c)
	> ɑ̃					(6d)
	> ɯm	> ɯ̃				(6e)
	> əm	> ən				(6f)
	> ʌ̃					(6g)
	> ụ:	> ụ				(6h)
	> ʉ					(6i)

另外，由于受到声母鼻音特征影响，也会产生鼻化元音的韵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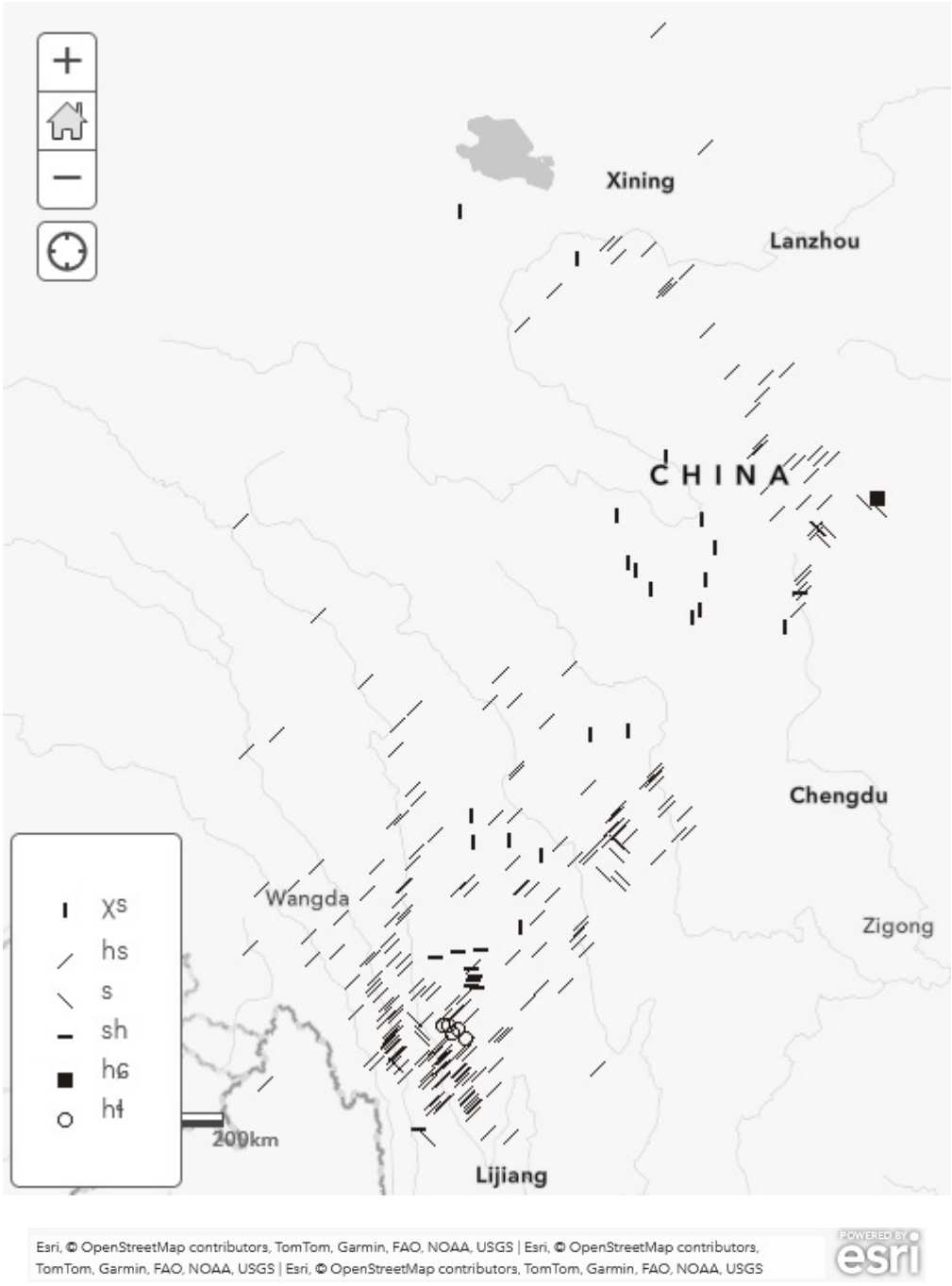


图 3.1：数词“三”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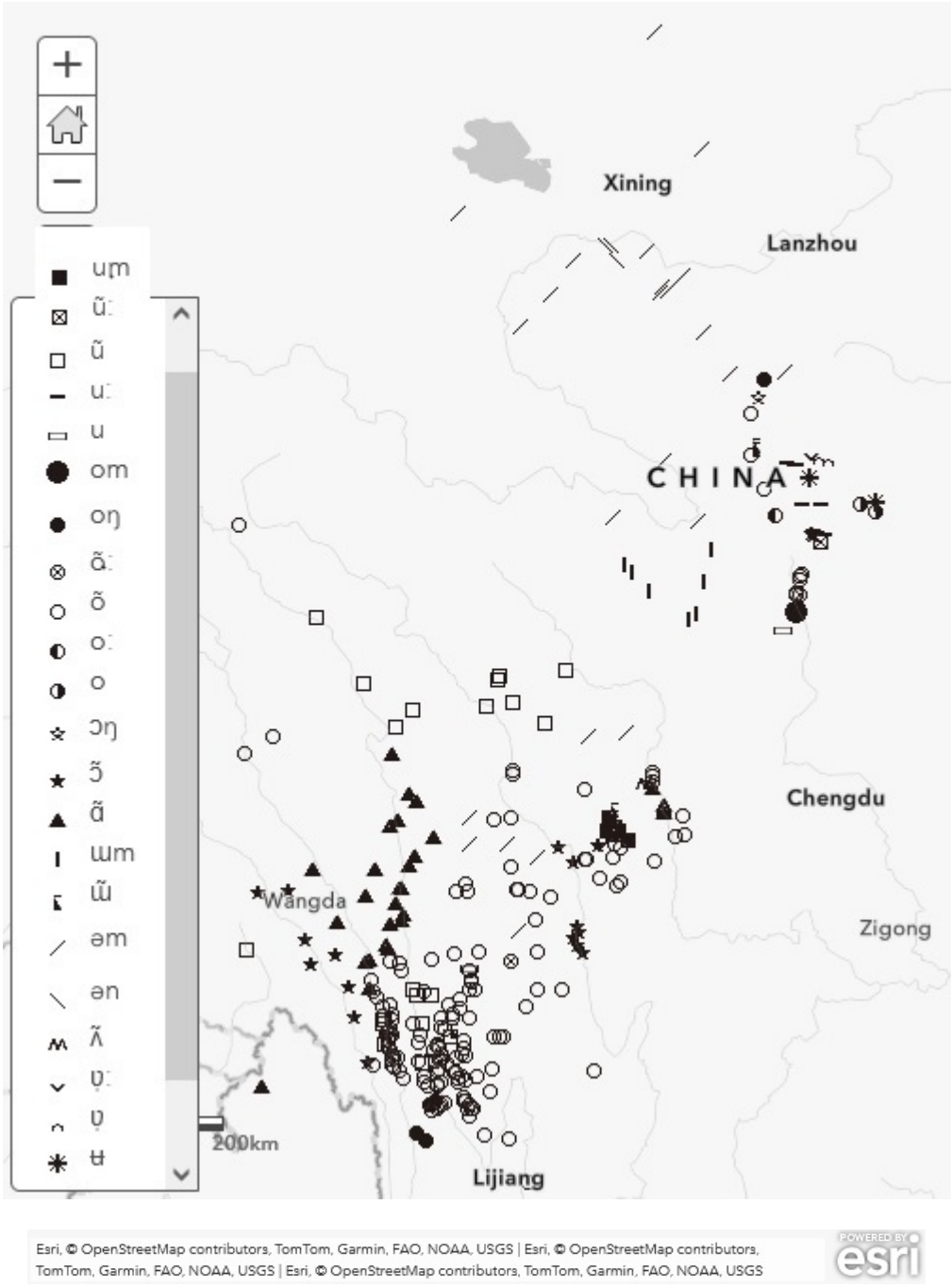


图 3.2：数词“三”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四”

数词“四”的词形仅有藏文 bzhi，东部藏区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

藏文 zh 字的语音对应较为丰富，但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都呈现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7)所示：

(7)

藏文 bzh: bʑ	> ^{w}ʑ	> ^{ɦ}ʑ	> ʑ	(5a)
	> ...	> ^{ɦ}ʐ	> ʐ	(5b)
	> ...	> ^{ɦ}ʒ̈		(5c)
	> ^{w}ɣ	> ^{ɦ}ɣ	> ɣ	(5d)
	> ...	> ^{ɦ}ɣ^{j}	> ɣ^{j}	(5e)
	> ^{w}ʝ	> ^{ɦ}ʝ	> ^{ɦ}ç	(5f)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三种（高元音 i 类、央元音 ə-ɿ 类、低元音 a-ɔ-ɑ-ɜ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8)所示：

(8)

藏文 i: i	> i	> i:			(8a)
	> ə/ɿ	> əɯ			(8b)
	> ...	> ɜ	> ɔ:	> ɑ	(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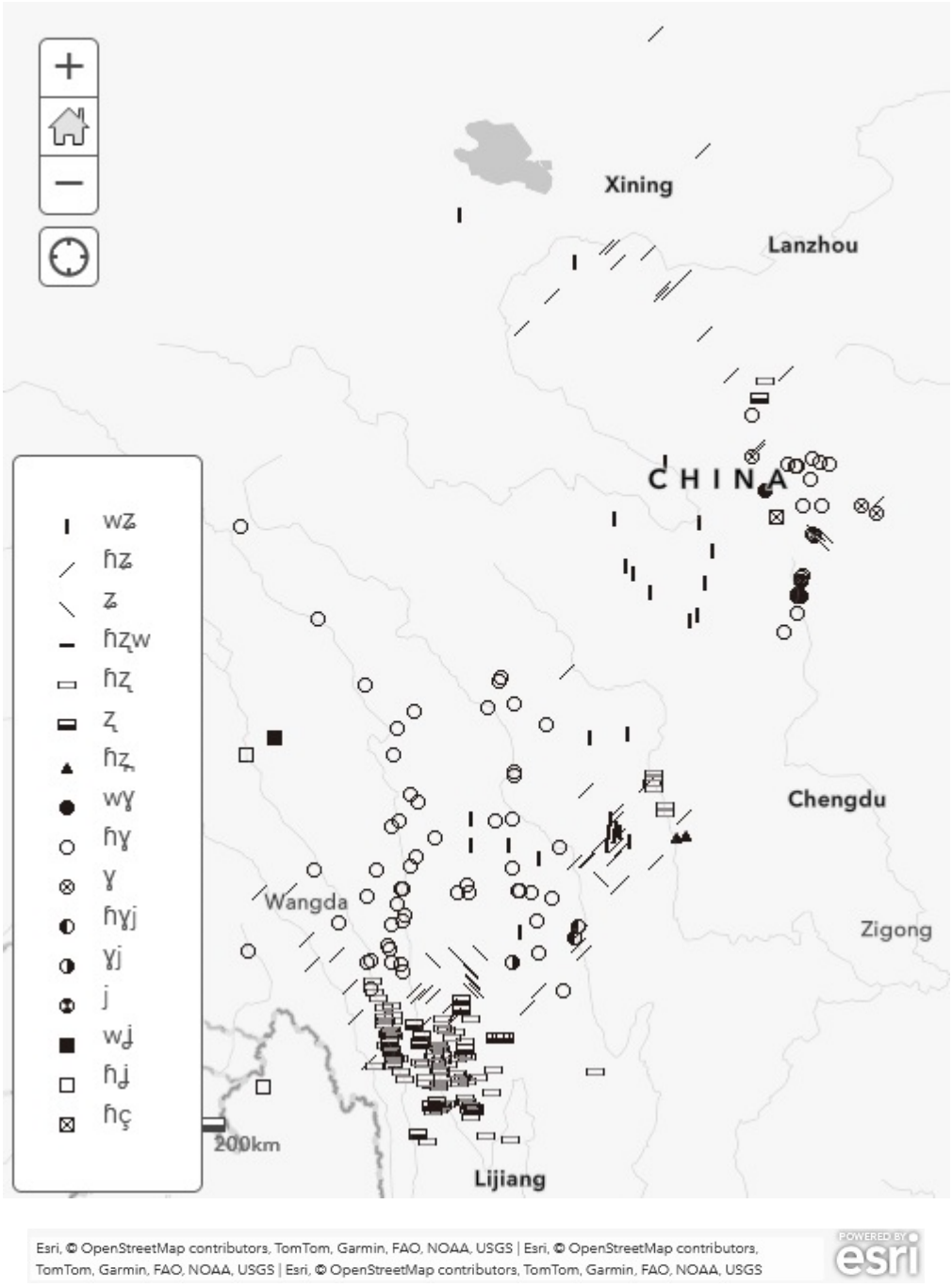


图 4.1：数词“四”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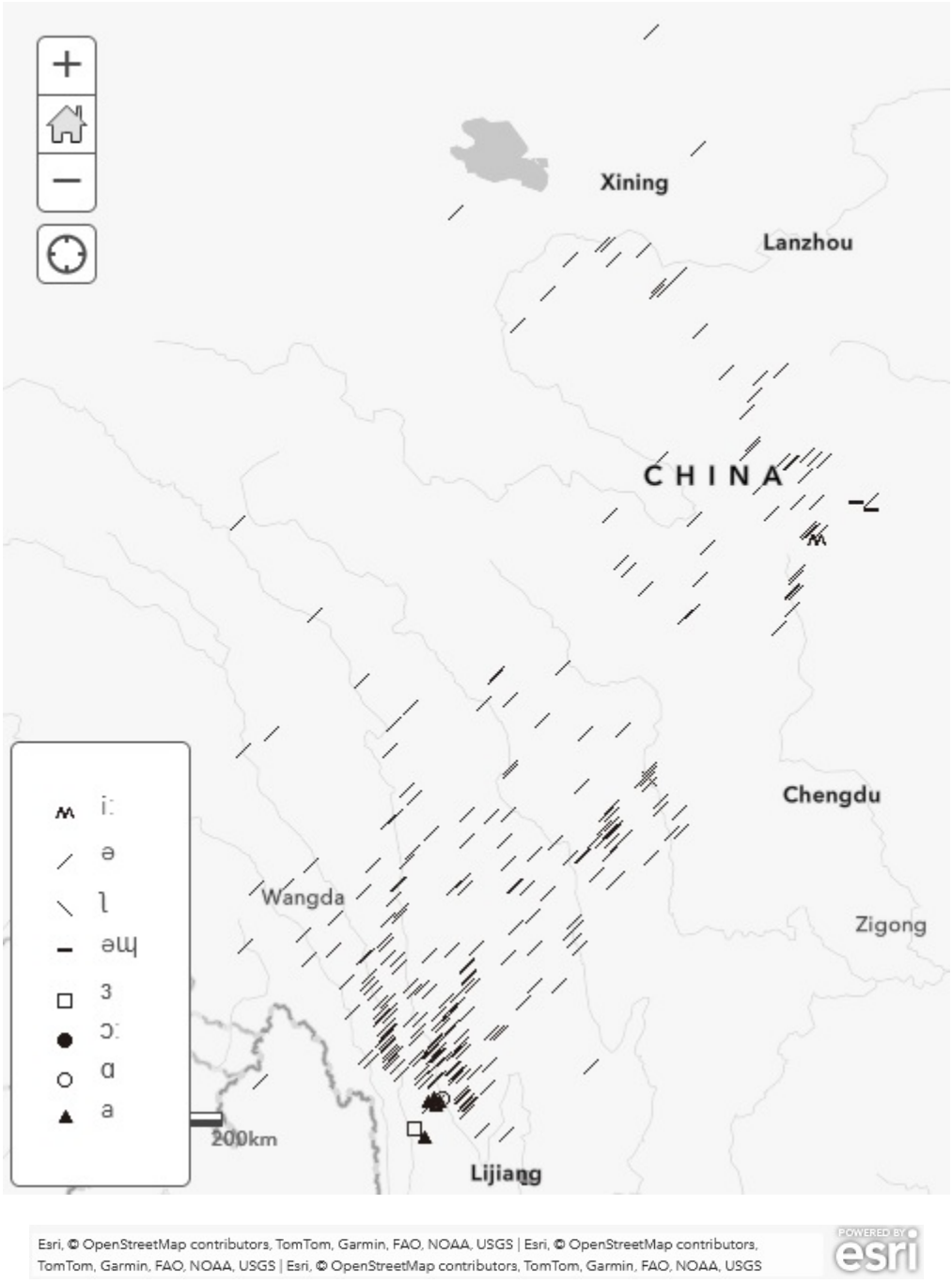


图 4.2：数词“四”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五”

数词“五”的词形仅有藏文 lnga，原则上在东部藏区的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然而，在有些具有声调对立的土话中，w 介音的形式和小舌鼻音形式不一定与 lnga 对应，而会与藏缅语构拟形式*ŋwa 对应。

与藏文 lnga 对应的形式中，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都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9)所示：

(9)

藏文 lng: lŋ > ˡŋ > ʳŋ > ʱŋ > ŋ (9a)

> ... > ˢŋ > ˢ̊ŋ̊ (9b)

> ˀŋ (9c)

虽有几个特殊例子，如 a:等，但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0)所示：

(10)

藏文 a: a > ɐ > ɜ > ə (10a)

> ɑ > ɔ > o (10b)

此外，由于受到声母鼻音特征的影响，也会产生鼻化元音的韵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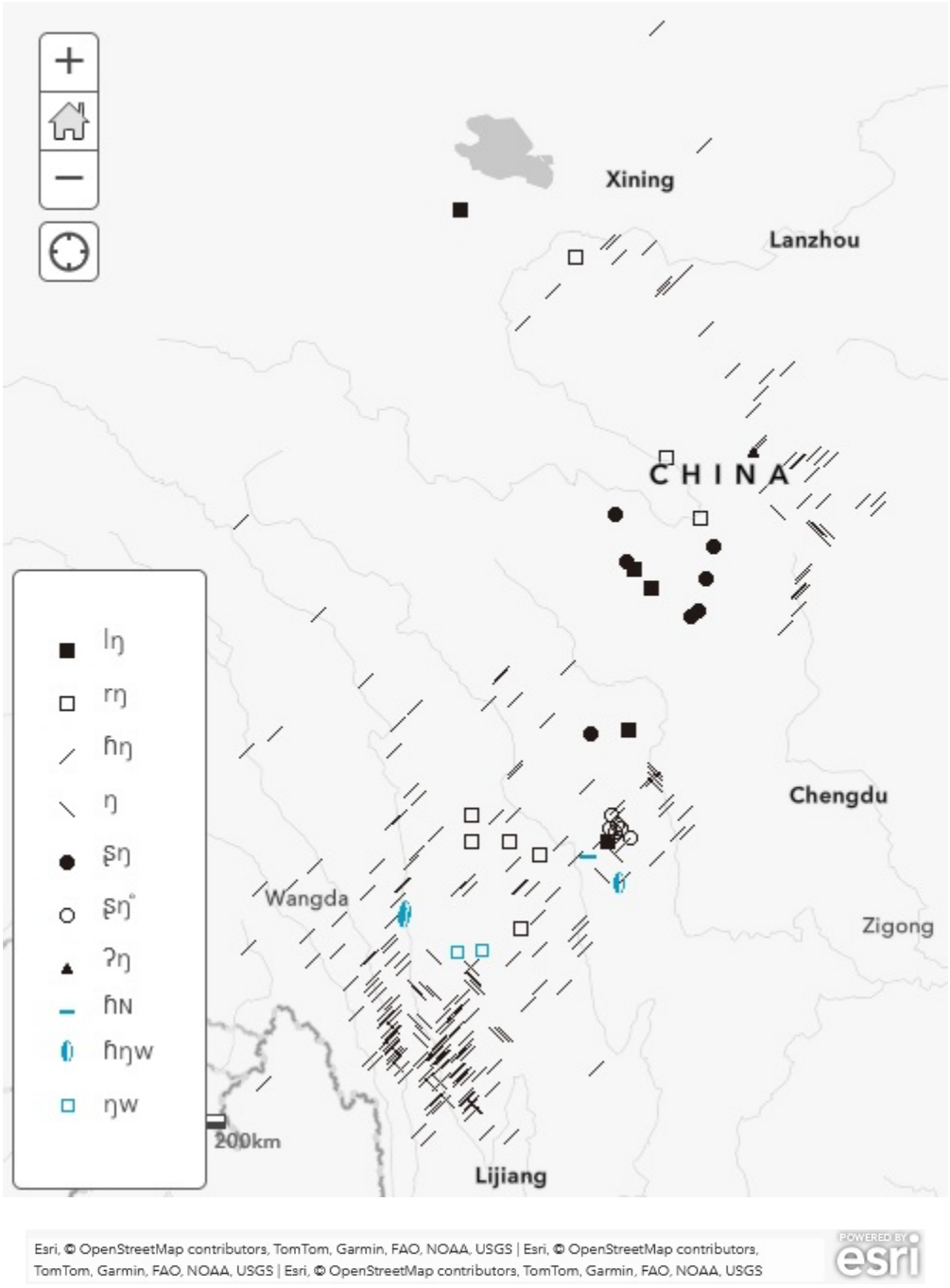

Xining
Lanzhou
CHINA
Chengdu
Wangda
Zigong
Lijiang
200km
lŋ
rŋ
ɦŋ
ŋ
ʂŋ
ʂŋ̊
ʔŋ
ɦɴ
ɦŋw
ŋw
Esri,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TomTom, Garmin, FAO, NOAA, USGS | Esri,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TomTom, Garmin, FAO, NOAA, USGS | Esri,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TomTom, Garmin, FAO, NOAA, USGS
POWERED BY esri

图 5.1：“五”的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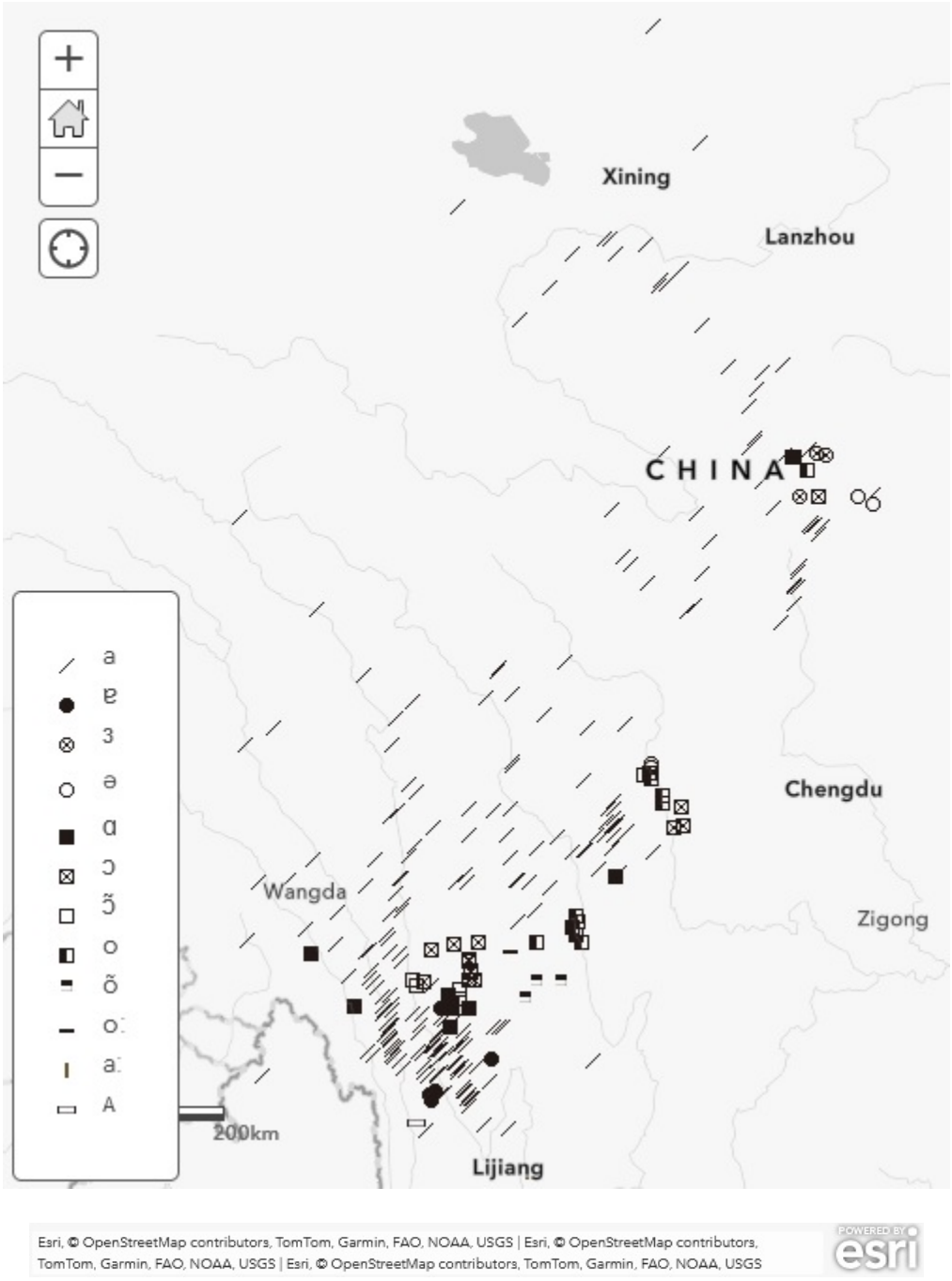


图 5.2：数词“五”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六”

数词“六”的词形仅有藏文 drug，原则上东部藏区的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然而，在有些具有声调对立的土话中，呈现高调类的形式不一定与 drug 对应，而是与藏缅语的构拟形式*d-k-ruk 对应（Suzuki 2009:88）。

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1)所示：

(11)

藏文 dr: dr > ɖ > ʈ (11a)

> (ɖʐ) > ʈʂ (11b)

> (dj) > tɕ (11c)

> (dɣ) > t (11d)

声母组合 ʈw 中的 w 属于来自韵母的介音，因而该形式不属于(11)范围。

(11a)为藏语支语言中分布得最广、最普遍的语音对应及音变途径。(11b)也是如此，可以认为是(11a)在具体土话音系中的塞擦音音位变体。在东部藏区以外区域的藏语支语言中，如在拉萨话中，ʈ 又进一步音变成为 ʈʰ。

(11c)仅发现在下迭藏语（甘南）中。此藏语土话完全缺失卷舌阻音，卷舌阻音由腭前塞擦音替代。

(11d)仅发现在大安话（丽江）中（铃木博之 2011）。该土话属于香格里拉藏语维西塔城组，该组的各种土话具有特殊的语音同藏文 r 对应，发生了 r > ɣ 的演变。之后大安话出现与 r 对应的语音成分发生脱落的现象（严格说，不是单纯的脱落，但同数词“六”无关，不再赘述；参见 Suzuki 2024a, b）。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七种（u 类、ɔ 类、o 类、ə 类、ʉ 类、ɯ 类、ɐ̟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2)所示：

(12)

藏文 ug: ug > uk/uq > uʕ > uʔ > u: > u (12a)

> ɔɯʔ > ɔɯ > ɔw > ɔʔ (12b)

> ... > owʔ > oɯʔ > oʕ > oʔ (12c)

> ɯk > ɯwʔ > ɯʔ > ɯ: (12d)

> ək > əw > ʉ: > u (12e)

> ʉʕ > ʉʔ > ʉ: > ʉ (12f)

> ɐ̟ˠ > ɐ̟ (12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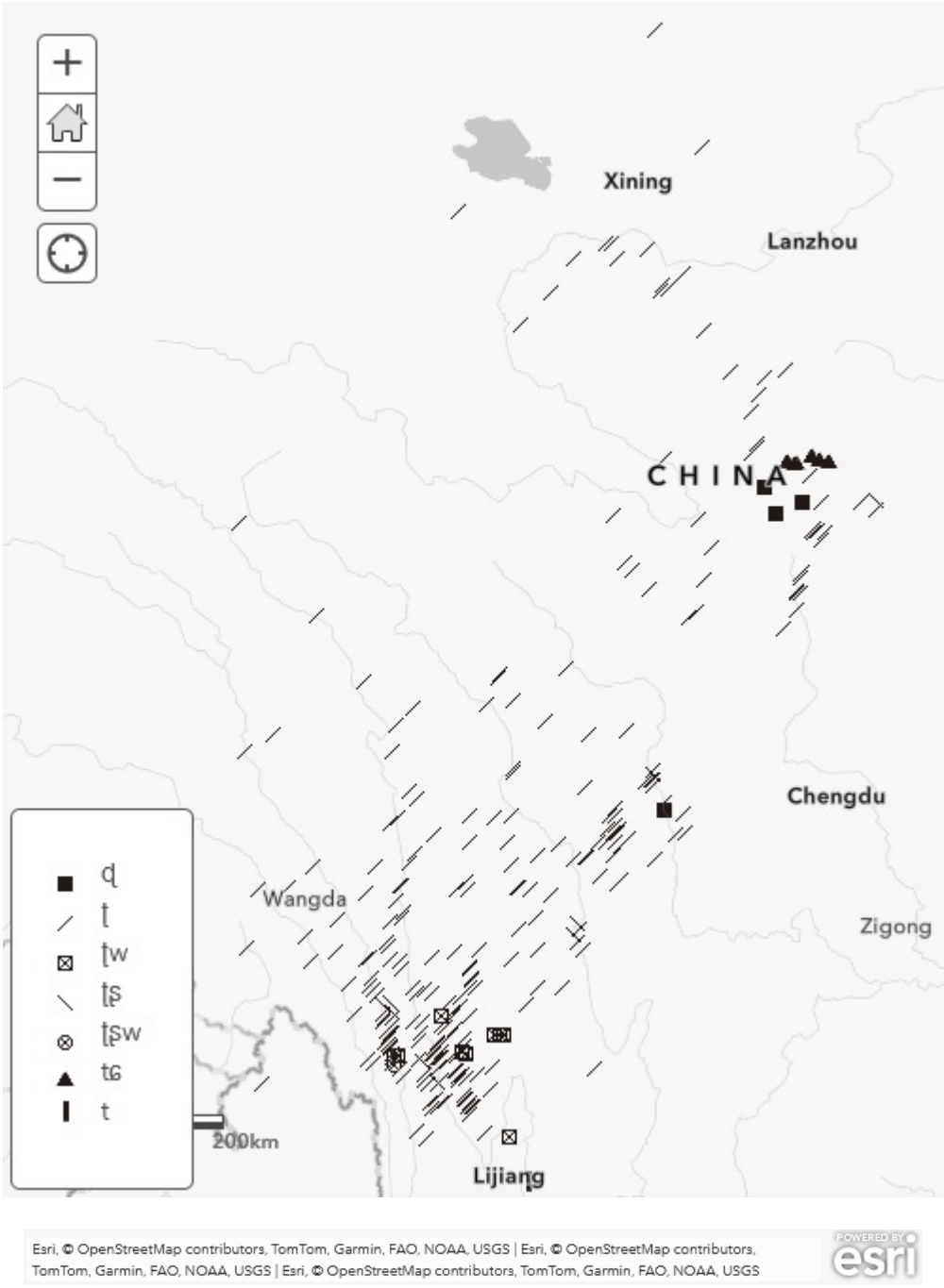


图 6.1：数词“六”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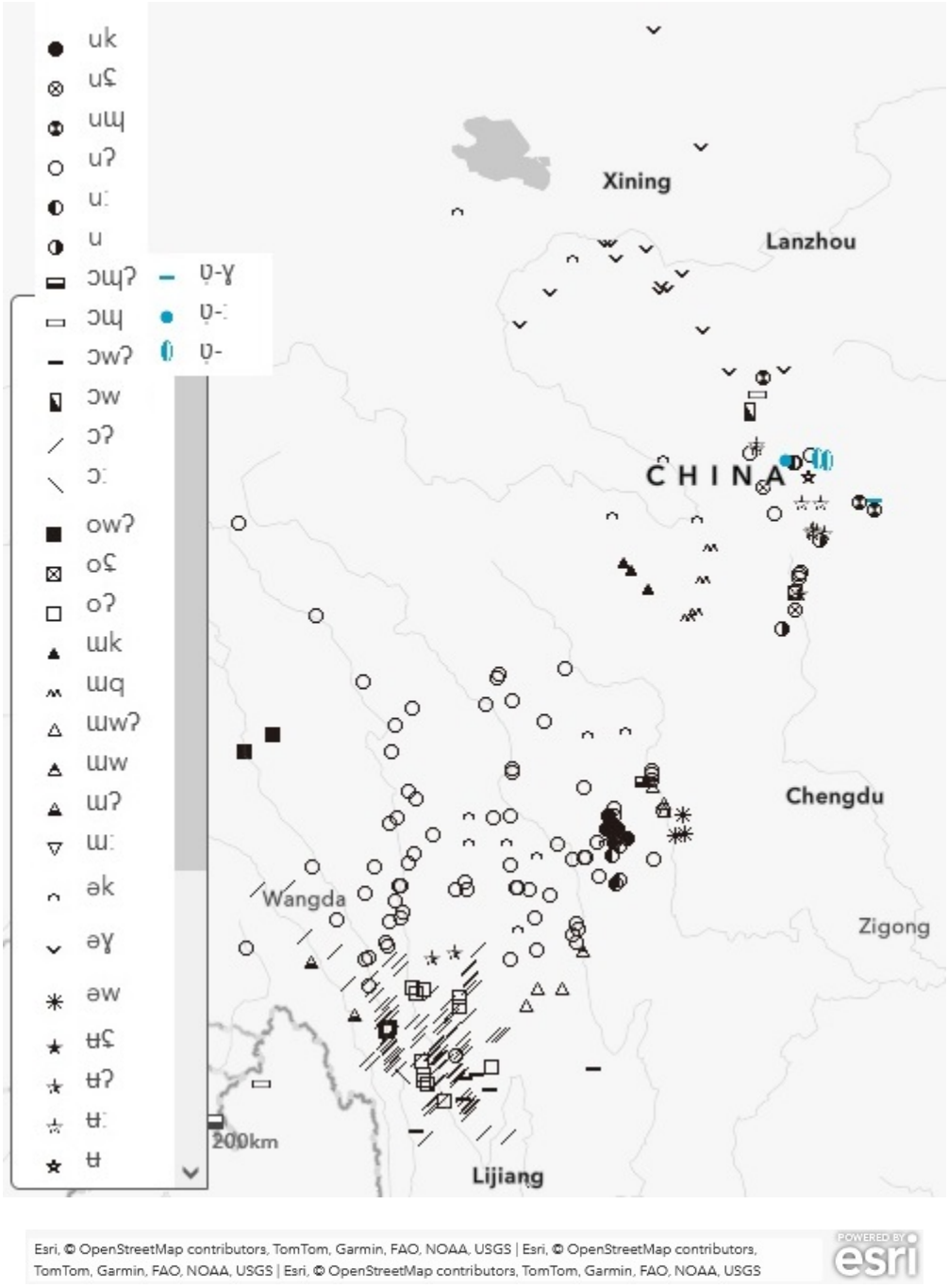


图 6.2：数词“六”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七”

数词“七”的词形仅有藏文 bdun，东部藏区的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

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都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3)所示：

(13)

藏文 bd: bd > ᵇd > ʷd > ʱd > d (13a)

> ... > ʱdj > ʱdʑ (13b)

> ... > ʷt > ʱt (13c)

其中，(13b)是由于后续的韵母为前高元音而产生的。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八种（ʉ 类、e 类、ɛ 类、a 类、ə 类、ɯ 类、ɵ 类、i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4)所示：

(14)

藏文 un: un > ʉ̃ > ʉ (14a)

> ĩ > i: > i (14b)

> ẽ > ẽj > e: > e (14c)

> ɛ̃ > ɛ̃j (14d)

> ã > a: (14e)

> ɵ̃ > ɵ: (14f)

> ɯn > ɯ̃ (14g)

> ən > ə̃ (14h)

鼻化元音有长短之别，但此特征取决于土话音系，故鼻化长音不体现于(14)中。如果考虑舌位出发点，(14)中各项的先后顺序可以排列为(a) > (b) > (c) > (d) > (e)、(a) > (f)以及藏文音 > (g) > (h)等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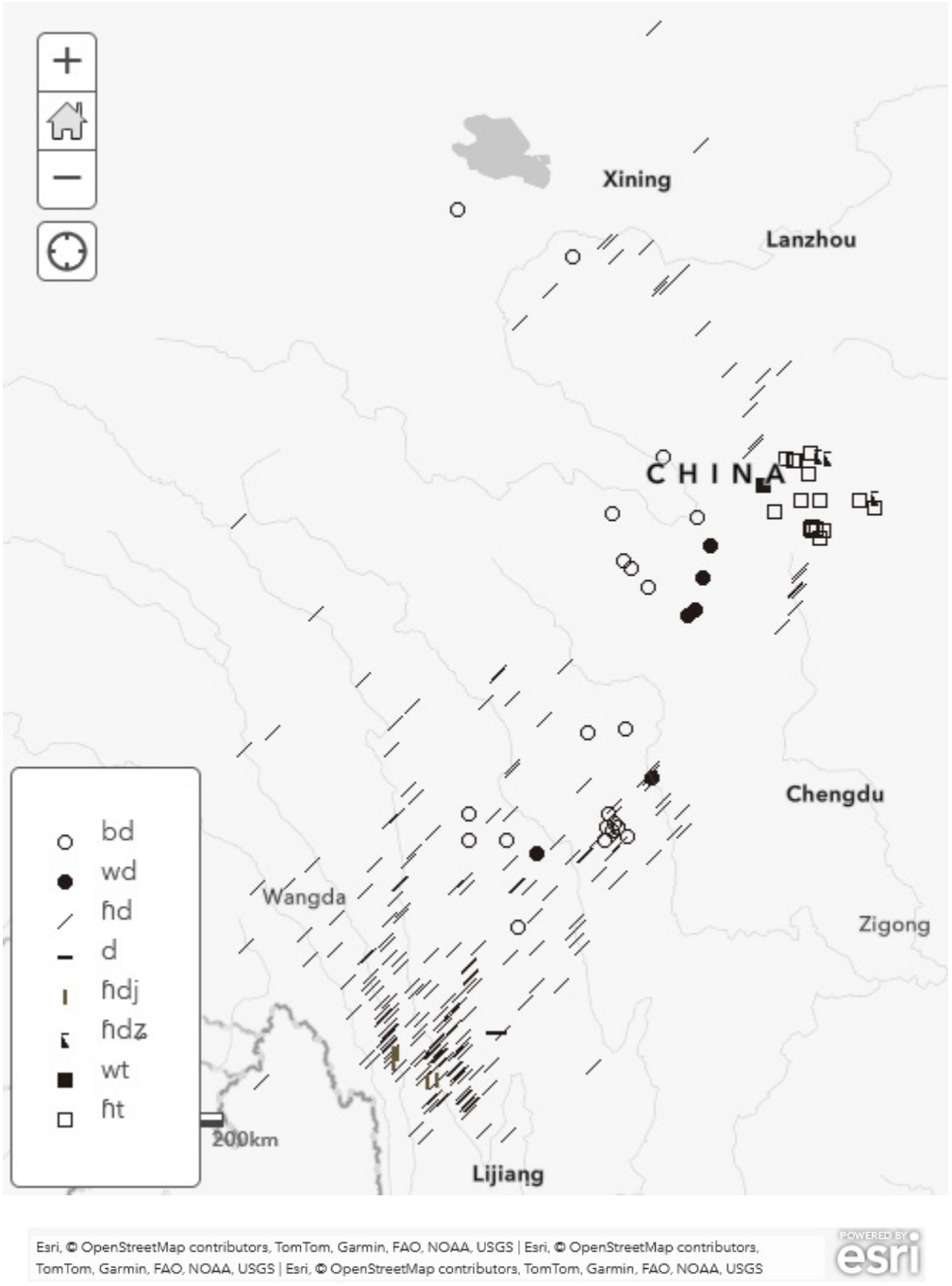


图 7.1：数词“七”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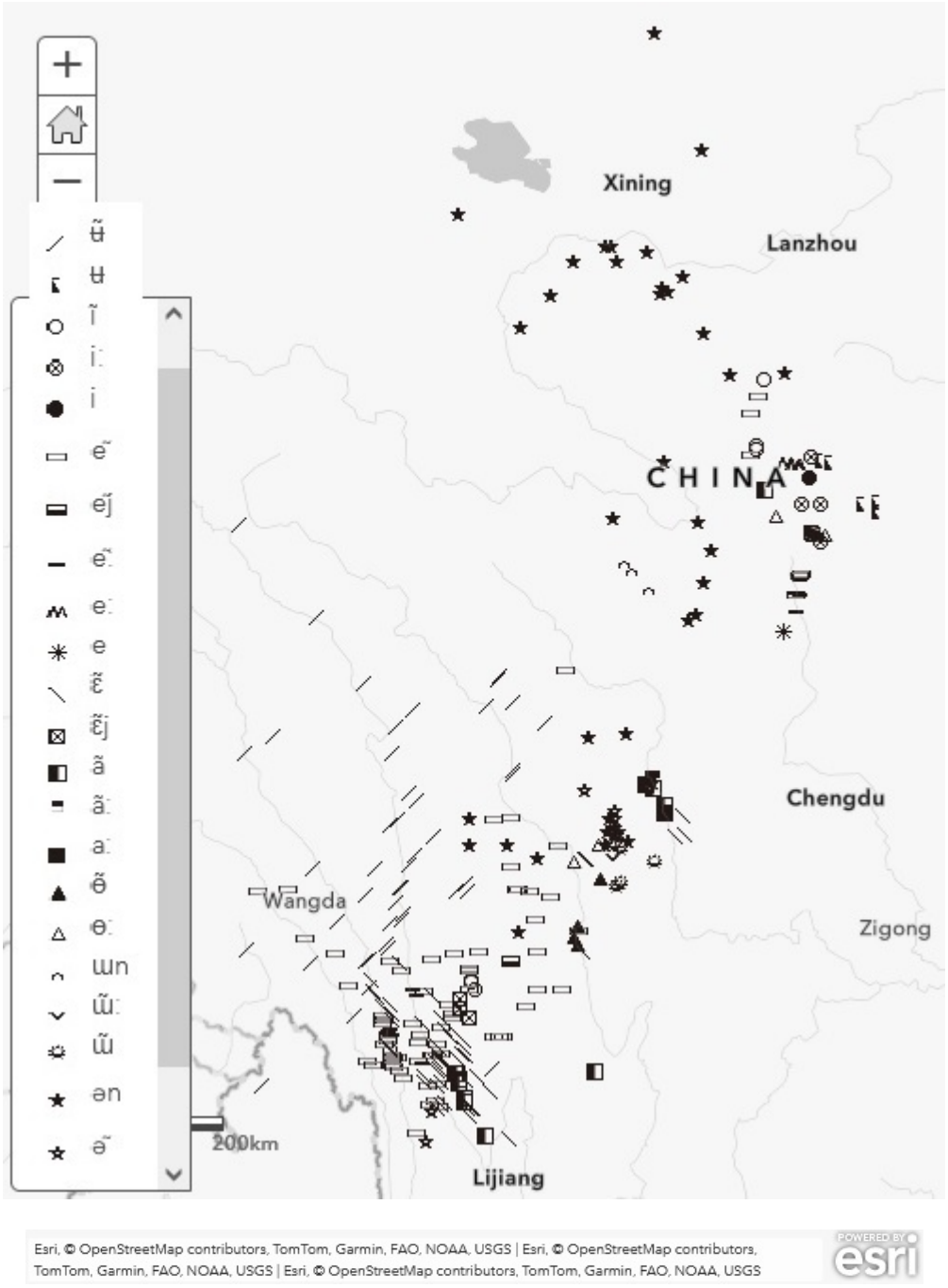


图 7.2：数词“七”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八”

数词“八”的词形仅有藏文 brgyad，东部藏区的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

藏文 brgy 组合的语音对应较为丰富，但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都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5)所示：

(15)

藏文 brgy: brgj	> ^{b}ɟ	> ^{w}ɟ					(15a)
	> ...	> ^{b}dʑ	> ^{w}dʑ	> ^{ɦ}dʑ	> dʑ	> ʑ	(15b)
	> ...		> ^{w}tɕ	> ^{ɦ}tɕ			(15c)
	> ^{ɦ}dz						(15d)
	> ^{ɦ}ts						(15e)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四种（a 类、ɛ 类、e 类、i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6)所示：

(16)

藏文 ad: ad	> at	> al	> aʔ	> a	(14a)
	> ɛt	> ɛʔ	> ɛ:		(14b)
	> ...	> eʔ	> e:	> e	(14c)
	> il	> iʔ	> i:	> i	(14d)

如果考虑舌位出发点，(14)中各项演变的先后顺序可以排列为(a) > (b) > (c) >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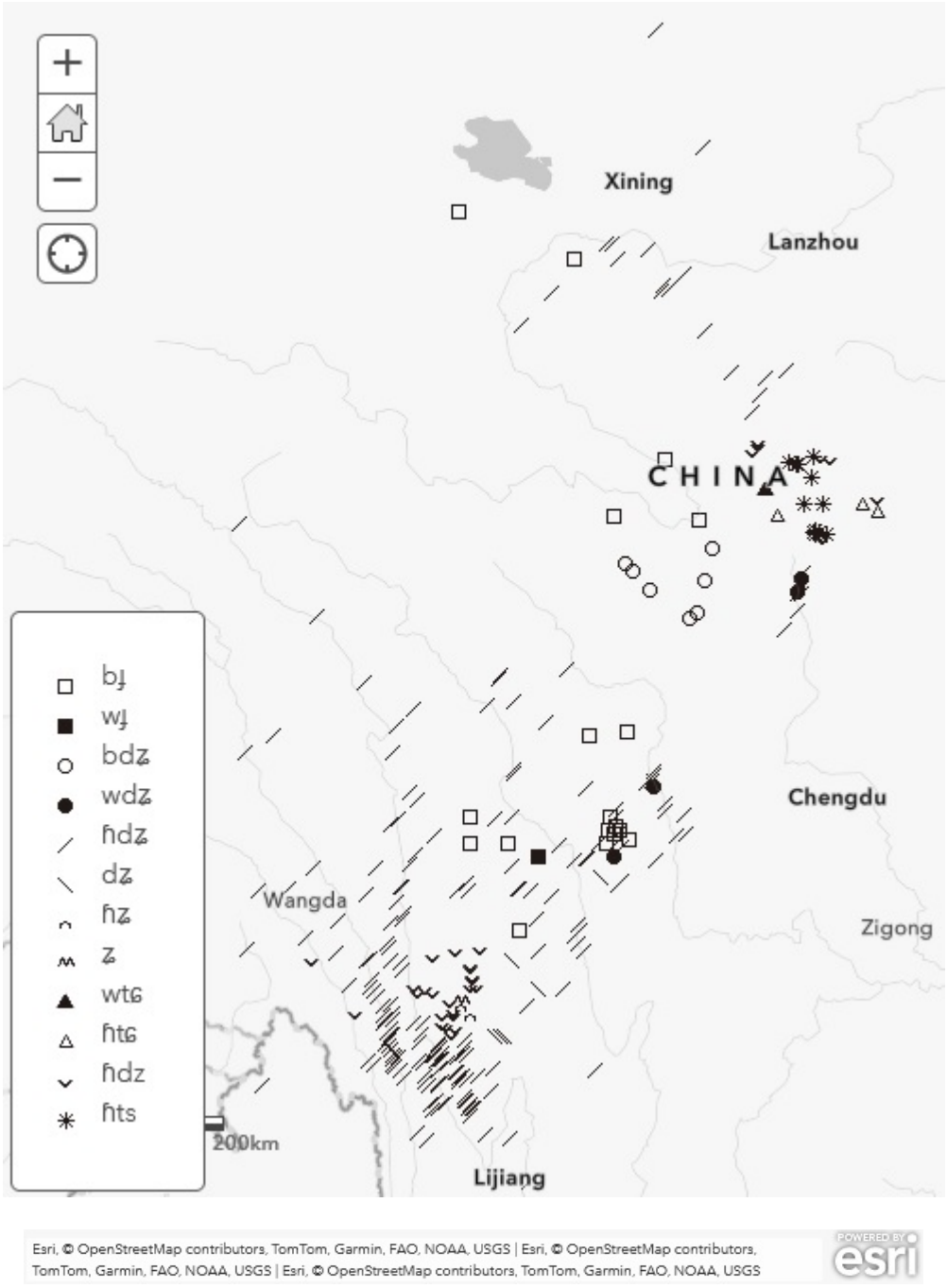


图 8.1：数词“八”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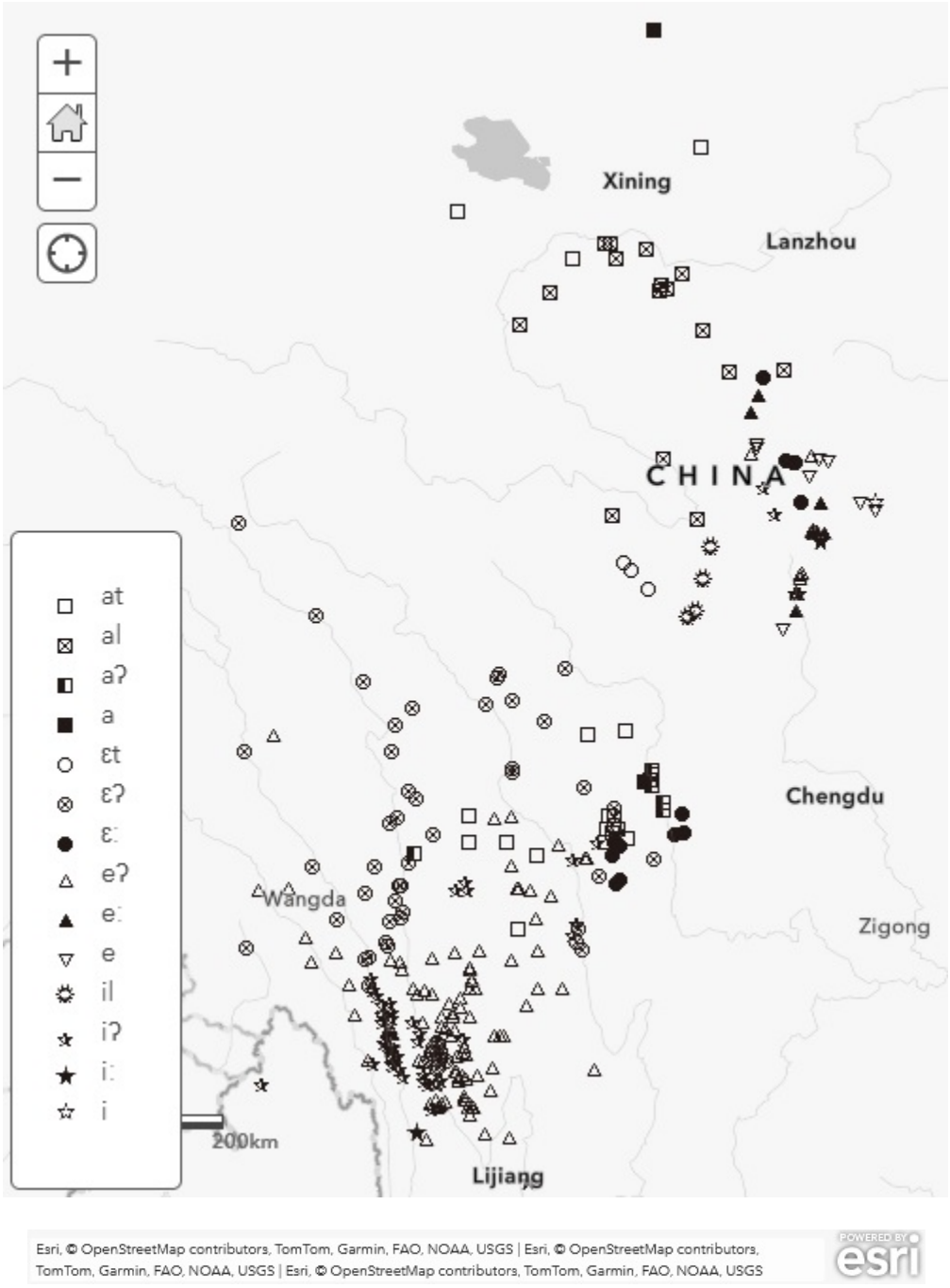


图 8.2：数词“八”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九”

数词“九”的词形仅有藏文 dgu，东部藏区的土话中都有与此对应的形式。

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都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7)所示：

(17)

藏文 dg: dg > ʳg > ʱg > g (17a)

> ... > ʱk > ʰk (17b)

> ... > ʱʝ (17c)

其中，(17c)仅在尼汝话（迪庆）中出现，这是由于藏文 ky 系列的语音对应形式（软腭音）为了保持区别而将藏文 k 的对应形式的发音部位往前推进（但一般是后退实现为小舌音）而形成的。参见铃木博之（2014b）。

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七种（u 类、ɯ 类、ʉ 类、o-ɤ 类、ə 类、ɜ 类、ɔ 类），其历时层次关系如(18)所示：

(18)

藏文 u: u 保持不变> u: (14a)

> ɯ > ɯː (14b)

> ʉ (14c)

> o > ɤ (14d)

> ə (14e)

> ɜ (14f)

> ɔ (14g)

如果考虑舌位出发点，(18)中各项的先后顺序可以排列为(a) > (b)、(a) > (c) > (e) > (f) > (g)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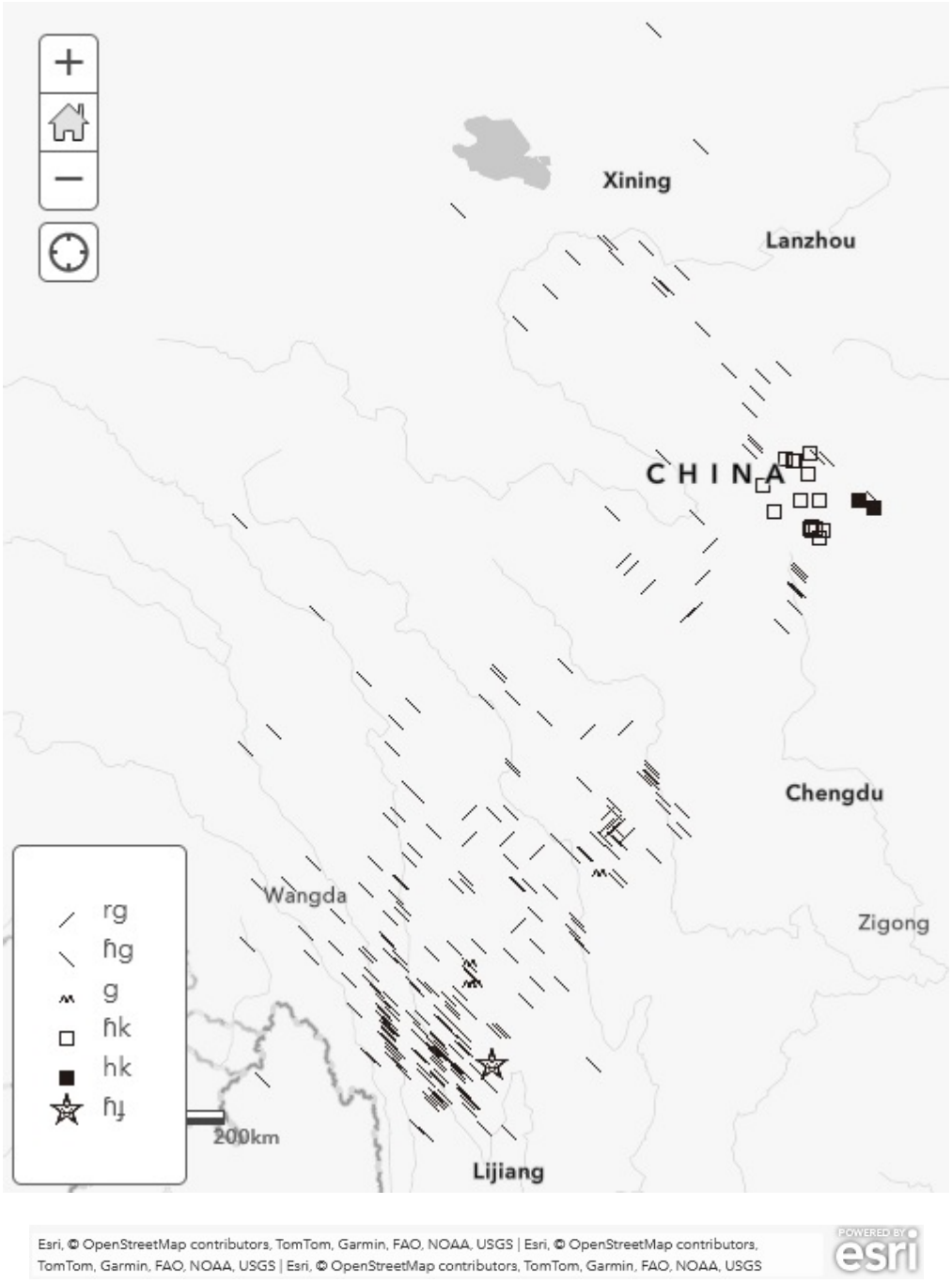


图 9.1：数词“九”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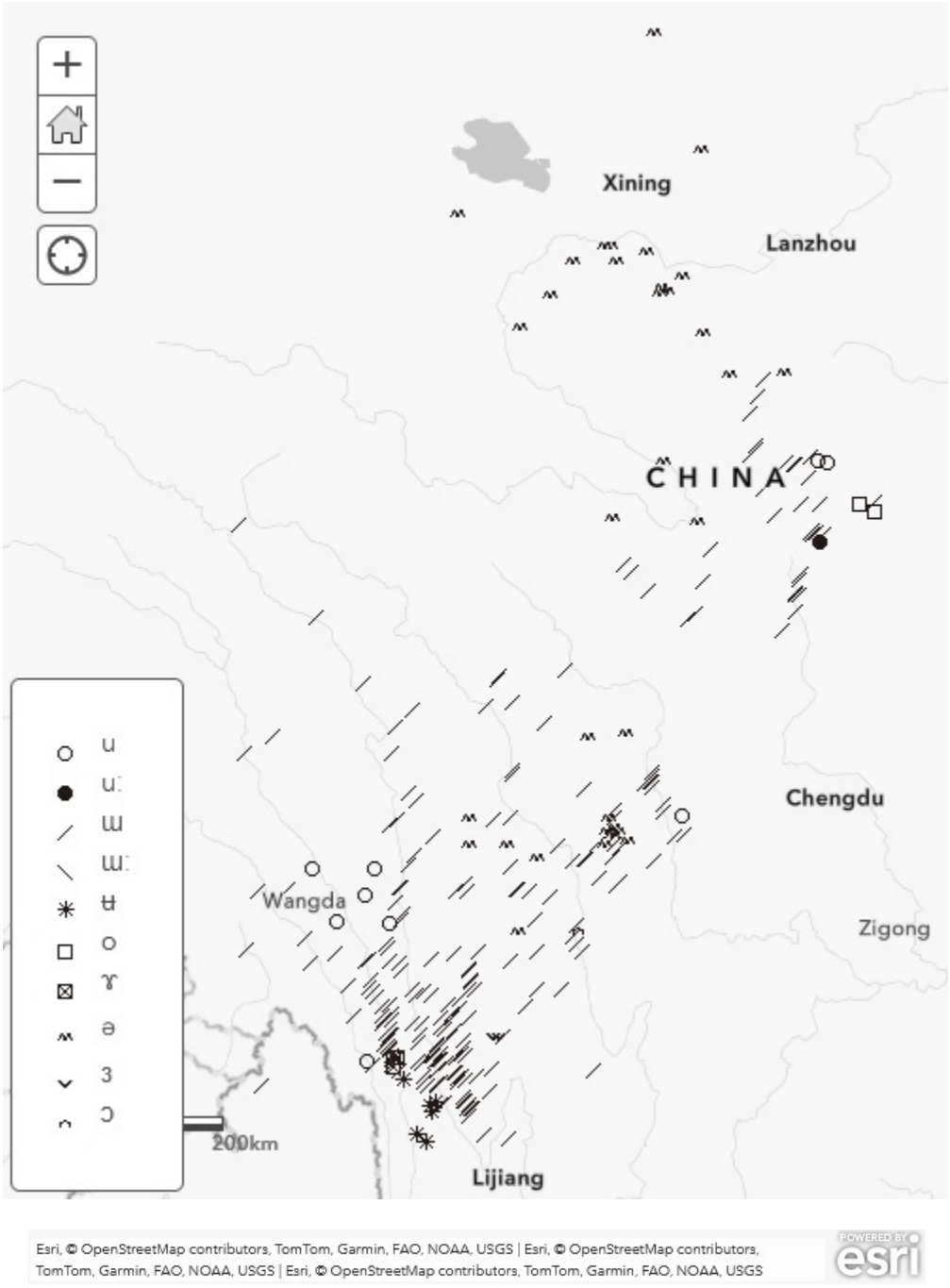


图 9.2：数词“九”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十”

数词“十”的藏文词形有藏文 bcu（基数词词根）、bcu tham pa（基数词词根加“整”）以及 tham pa（原“整”义；使用二十进制的土话用此为“十”）三种。第三种仅在下迭部（甘南）才有。上迭部有 dʑa ba 形式，无藏文对应。考虑到桑吉次力（2020）描写的上迭部话“清音浊读”现象，可以说该例外形式可能与 bcu tham pa 对应，第一、第二音节呈现出类似反切合并的结果。

图 10.2 中的蓝色标记表示与藏文 tham pa 或 bcu tham pa 的缩短形式对应，其余黑色标记表示与藏文 bcu 对应。后者藏文 bc 组合的语音对应较为丰富，但各个声母在具体土话中呈现出一般的语音对应关系，历时层次关系如(19)所示：

(19)

藏文 bc: btɕ	> ^{p}tɕ	> ^{ɸ}tɕ	> ^{h}tɕ	> tɕ	(19a)
	> ...		> ^{h}tʂ		(19b)
	> ...		> ^{h}cç		(19c)
	> ...		> ^{h}c		(19d)
	> ...		> ^{h}ʈ		(19e)
	> ...		> ^{h}ʦ		(19f)

图 10.3 中的蓝色标记表示与藏文 tham pa 或 bcu tham pa 的缩短形式对应，其余黑色标记表示与藏文 bcu 对应。后者按韵母的性质大致分为八种（u 类、ɯ 类、ʉ 类、ə 类、ɜ 类、ɤ 类、ɔ 类、ʌ 类）。如果考虑规则性，“十”（藏文 bcu）的韵母应该与“九”（藏文 dgu）的韵母一致，但实际上不一定如此实现。其历时层次关系如(20)所示：

(20)

藏文 u: u	保持不变		(20a)
	> ɯ		(20b)
	> ʉ		(20c)
	> ɤ		(20d)
	> ʌ		(20e)
	> ɔ	> ɔ:	(20f)
	> ə		(20g)
	> ɜ		(20h)

如果考虑舌位出发点，(20)中各项的先后顺序可以排列为(a) > (b)、(a) > (c)、(a) > (d) > (e) > (f)、(a) > (g) > (h)等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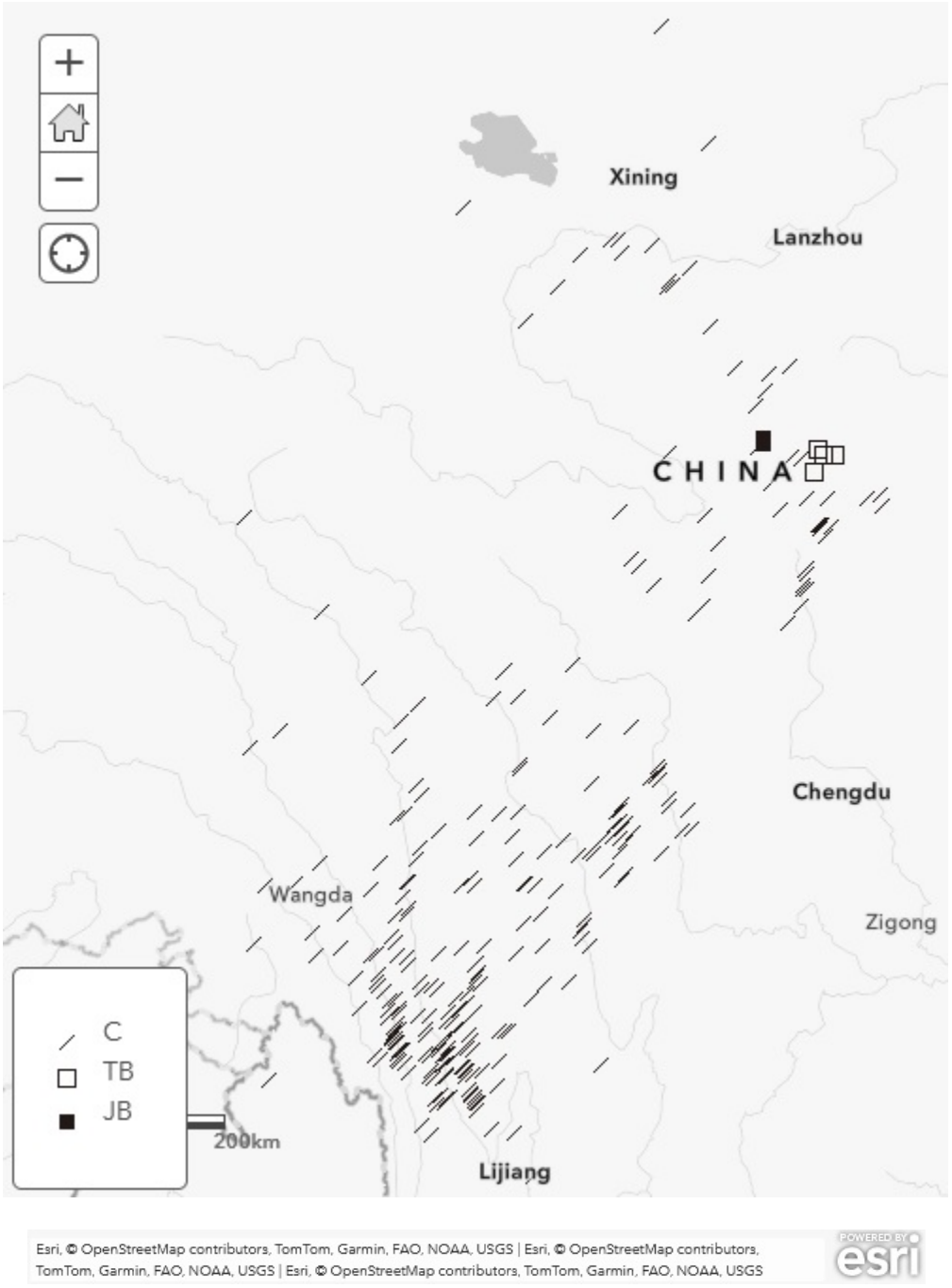


图 10.1：数词“十”词根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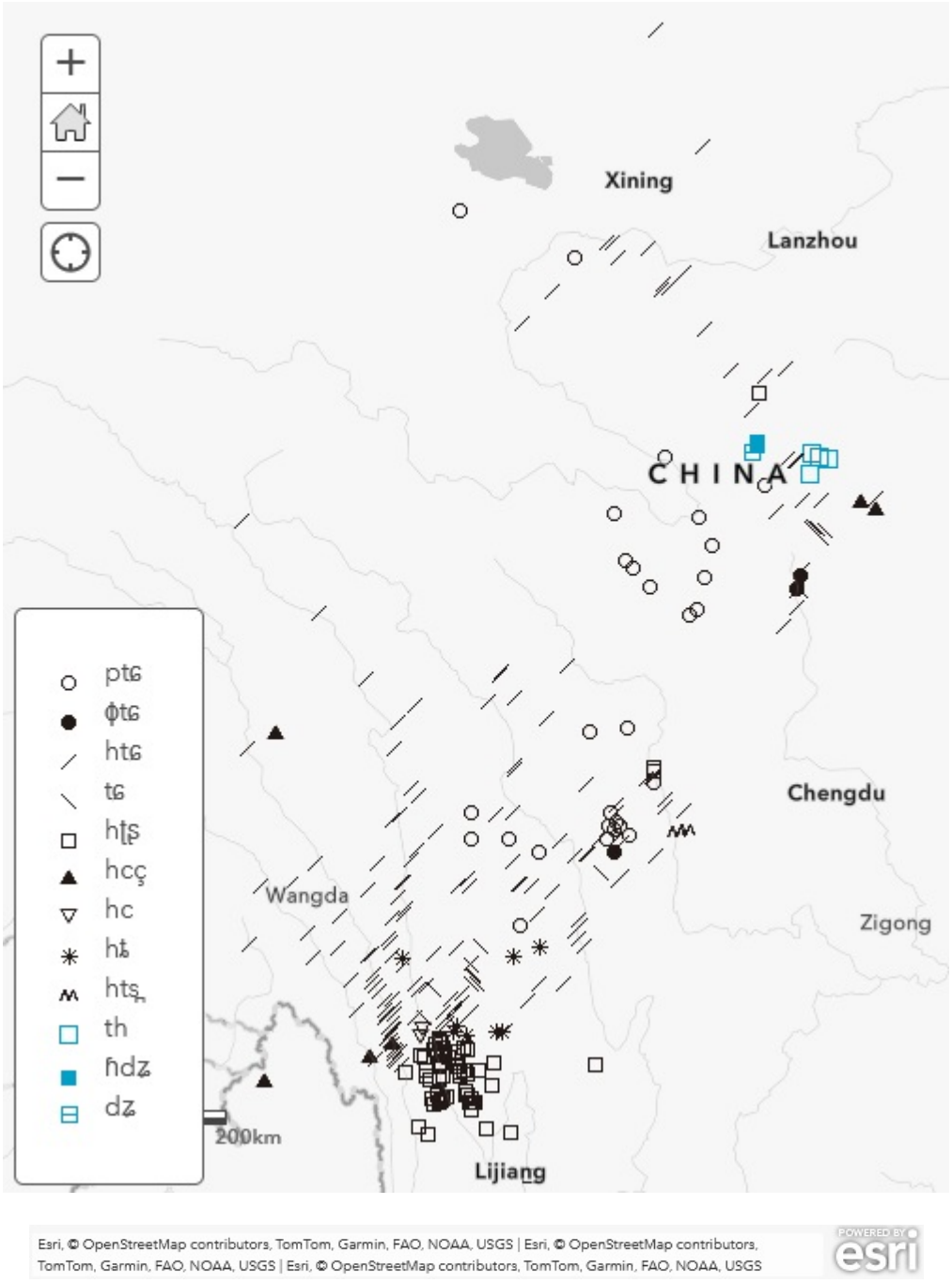


图 10.2：数词“十”声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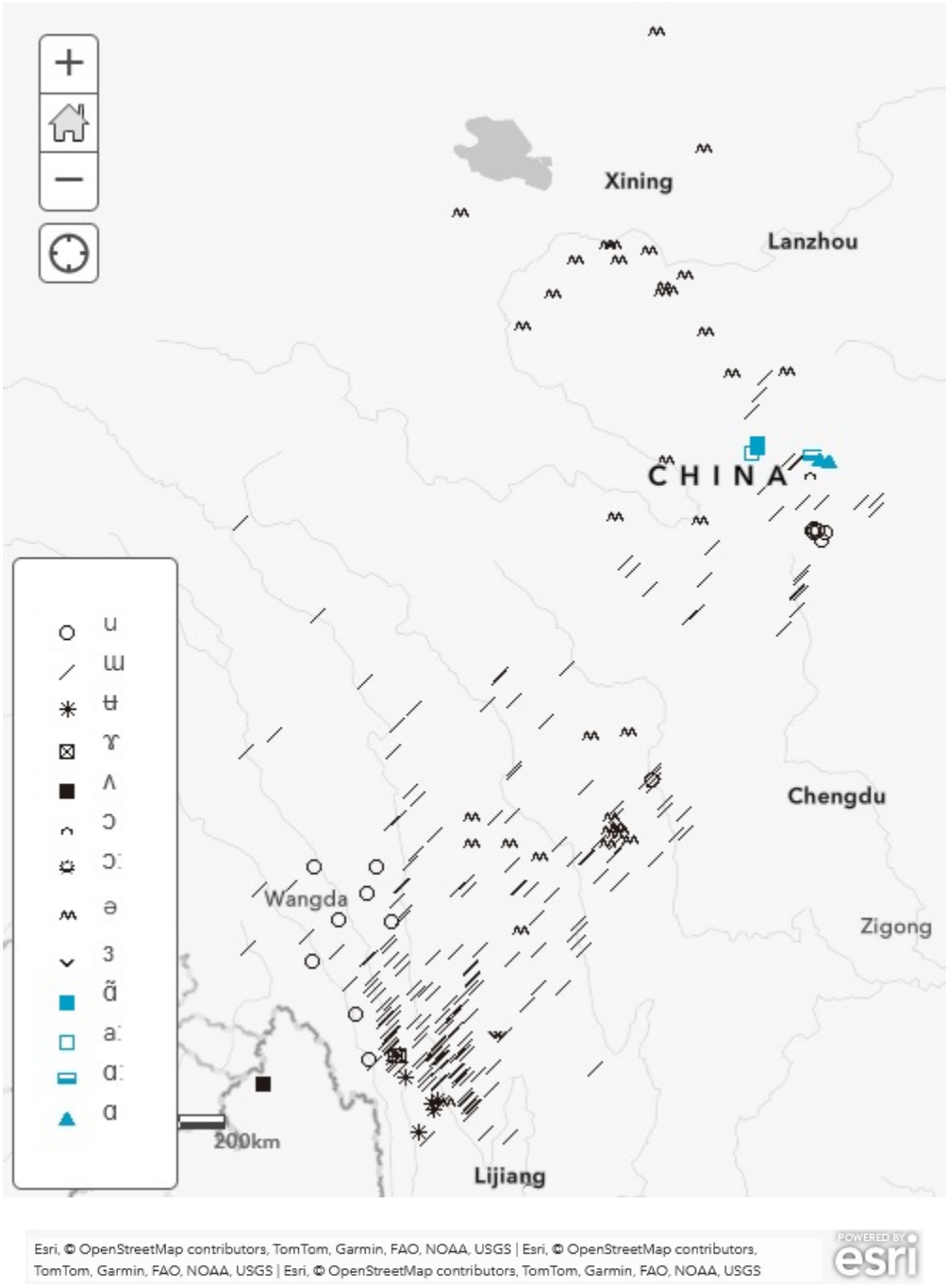


图 10.3：数词“十”韵母形式的地理分布

三、16-19 世纪文献资料中的数词及语言地图

本文提及的范围内有少量文献记录过数词“一”至“十”的形式。这类文献有丙种本《西番馆译语》（16 世纪成书）、丁种本《西番译语》（故宫版本称《川番译语》；1748-49 年成书），以及 von Rosthorn（1897）[3]。这些具体记载如下：

丙种本《西番馆译语》，亦称《天全译语》：记录了在今康定市炉城镇附近通用的一种木雅热岗藏语（铃木博之 2015）。西田龙雄（1963）设想所记录的语言为今天全附近通用的藏语方言。然而，由于天全在藏语分布地区之外的原因，其看法难以成立。本文将西田龙雄（1963）及太田斋（1986）作为资料来源。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一），亦称《松潘译语》：记录了今松潘县进安镇附近通用的一种夏尔藏语（铃木博之 2007a）。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太田斋（2012）作为资料来源。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二），亦称《象鼻高山译语》：记录了今平武县虎牙藏族乡的藏语土话（铃木博之 2024a）。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作为资料来源。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四），亦称《白马译语》：记录了今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白马语[4]；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作为资料来源。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六），亦称《木坪译语》：记录了今宝兴县穆坪镇的丹巴二十四村藏语（铃木博之 2007b）。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松山节、三宅伸一郎（2015）作为资料来源。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七），亦称《打箭炉译语》：记录了今康定市炉城镇的木雅热岗藏语（铃木博之 2009）。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作为资料来源。需要注意的是，川七的内容有被后期文献抄录的痕迹，如《卫藏图识》（18 世纪末成书）中的《蛮语》、《西藏图考[5]》（19 世纪末成书）中的《附蛮语》等。虽然这些文献中的描述需要细致的考证，但词汇记录与川七重复部分用注音汉字且大致相同，故暂时无法作为成书时代的佐证资料[6]。

---

[3] 除此之外，还有 DTLF（1899）、DFT（1956）等文献包含着 19 世纪分布在东部藏区的各种康巴藏语词形。然而，按照地理语言学的标准，这些资料的记录地点不太精确（铃木博之 2024b）。故，在此不作为口语资料。

[4] 此语言具有“白马语”或“白马藏语”两种说法。按 Tournadre and Suzuki（2023）的分类，白马语属于藏语支。但依然难以认为是从古藏语直接发展下来的语言，而有一定的底层语言。因此，在此保留着“白马语”这一名称。

[5] 所藏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西藏图考》抄本已作为电子版并对外公开，可见在以下网址：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ru05/ru05_03123/index.html

[6] 另外，《卫藏图识》之前的方志类文献还有《西藏见闻录》（18 世纪中叶成书）中的《方

丁种本《西番译语》（川九），亦称《木里译语》：记录了今木里藏族自治县至盐源县的藏语支语言中系属待定的土话（铃木博之 2007c, 2018）。本文将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作为资料来源。

von Rosthorn（1897）：作者于 1891 年亲自记录了今小金县汗牛乡丹巴二十四村藏语。Suzuki and Dawa Drolma（即出）提供其中语音形式的校释。

以上各文献所记录语言的地理分布如图 11 所示。



图 11：16-19 世纪各文献所记录的语言点

各文献中，西番（馆）译语系列中数词的汉字注音整理为下面表格（表 1）。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将表 1 的资料用作本课题的研究材料，首先要探讨这些汉字注音的

语》。但是，此文献中的语言记录具有同样的问题，亦在此不作为口语资料。

语音系统，然后才能基于此语音系统来构拟藏语形式。目前暂时仅为参考。

表 1：西番（馆）译语的数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丙种	治	膩	孫	日	阿	竹	敦	節	谷	竹灘巴
川一	記	利	送	日	阿	住	頓	吉	谷	足
川二	子	力	宿	日	狎	竹	的	及	谷	脚堂巴
川四	止	呢	所	日	哈	州	的	節	谷	掌八
川六	己	你	生	日	俄	竹	屯	業	谷	諸
川七	吉	逆	桑	日	呵	竹	頓	結	固	菊
川九	己	立	唆	入	阿	朱	甸	揭	谷	居

附记：本研究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17H04774）、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8H00670），及基盘研究（B）“迁徙和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汉语全时代形成史的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23K253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完玛冷智[Padma lHun-grub] 2006《藏语数词的语音变化》载《民族语文》第 4 期 39–40.

桑吉次力[Sangs-rgyas Tshe-ring] 2020《迭部藏語的“清音濁化”》*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49(1): 1–20. doi: https://doi.org/10.1163/19606028-bja10001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7《清代木坪土司所管地区的藏语方言》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3 期 1–5.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824.2007.03.001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1《丽江永胜县大安藏语语音分析》载《汉藏语学报》第 5 期 163–172.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a《云南藏语土话中的特殊数词形式：其地理分布与历史来

源》载《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68–76.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4b《尼汝藏语的小舌辅音与其藏文对应规律》载《东方语言学》第 14 辑 1-12.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6《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载《民族学刊》第 2 期 1–13+92–94.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9391.2016.02.001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9《再论丁种本《西番译语》（川九）中被记录的藏语方言》第二届近代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北京）
铃木博之[Suzuki, H.] 2022《建塘藏语齿音腭化现象及其历史演变》载《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 31–3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2389.2022.03.006
铃木博之[Suzuki, H.] 2024《藏语支语言“二十”与二十进制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载：铃木博之、远藤光晓（编）《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集 2024》（本论集）東京：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太田斎 1980「[資料]丙種本西番館訳語校本（稿）」『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I: 157–215. URI: https://hdl.handle.net/11094/19215
太田斎 2008「[資料]丁種西番訳語（川一）校本（稿）」『アジア言語論叢』7: 109–164. URI: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154
鈴木博之 2007a「川西民族走廊・チベット語方言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論文. doi: https://doi.org/10.14989/doctor.k12734
鈴木博之 2007b「丁種本《西番譯語》〈川六〉に記録される 18 世紀木坪チベット語の特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I: 157–180. URI: http://hdl.handle.net/11094/20648
鈴木博之 2007c「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九〉に記録される 18 世紀木里チベット語の特徴」福盛貴弘・遠藤光暁編『華夷訳語論文集』83–94. 東京：大東文化大学
鈴木博之 2009「《西番譯語》〈川七〉18 世紀チベット語打箭爐方言の性格について」『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28: 33–63. doi: https://doi.org/10.14989/141799
鈴木博之 2018「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形成」『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 5–63. doi: https://doi.org/10.15026/92458
鈴木博之 2024a「丁種本《西番譯語》（川二）《象鼻高山譯語》に記録されるチベット系言語の性質について」『雲漢』2: 84–103. URI: https://kurs10026.sakura.ne.jp/kchgk/yunhan/data/vol-2/vol-2-84-103_suzuki.pdf

鈴木博之 2024b「『フランス語・チベット語辞典』(1956)に記録される雲南チベット語の性質について」『日仏東洋学会　通信』47: 33–48.

西田龍雄 1963「十六世紀における西康省チベット語天全方言について：漢語・チベット語単語集いわゆる丙種本『西番館譯語』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7: 85–174. URI: https://hdl.handle.net/2433/72922

西田龍雄・孫宏開 1990『白馬譯語の研究 ペマ語の構造と系統』京都：松香堂

松川節・三宅伸一郎 2015『「華夷譯語（西番譯語四種 猓玀譯語一種）」影印と研究』京都：中西印刷

DFT = Giraudeau, Pierre Philippe et Françis Goré (1956) *Dictionnaire français-tibétain (Tibet oriental)*.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DTLF =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u Thibet (1899)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Nebesky-Wojkowitz, R.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von Rosthorn, A. 1897. Vokabularfragmente ost-tibetischer Dialekte. (mit einem Kommentar von A. Conrady).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51(3): 524–533. URI: https://www.jstor.org/stable/43366893

Suzuki, H. 2009. Origin of non-Tibetan words in Tibetan dialects of the Ethnic Corridor in West Sichuan. In Y.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71–96. Suit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doi: https://doi.org/10.15021/00002558

Suzuki, H. 2013. Extraordinary sound development of *s and *z in mBalhag Tibetan (Shangri-La, Yunn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6(1): 101–110. doi: https://doi.org/10.15144/LTBA-36.1.101

Suzuki, H. 2015. Esquisse phonétique du tibétain de dGonpa : un dialecte parlé à mBrugchu. *Revue d'études tibétaines* 33: 231–249. Online: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ret/pdf/ret_33_07.pdf

Suzuki, H. 2016. In defense of prepalatal non-fricative sounds and symbols: towards the Tibetan dialectology.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10: 99–125. URI: http://id.nii.ac.jp/1085/00002195/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Fuch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Online: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 2022.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Suzuki, H. 2024a. Shaping rGyalthangic: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Yunnan Khams. In M. Nohara & T. Ikeda (eds.)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6: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hange*, 87–108.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Suzuki, H. 2024b. Evolution of dorsal fricatives in rGyalthangic varieties of Khams Tibetan. *Journal of the Phonetic Society of Japan* 28(2): 108–119. doi: https://doi.org/10.24467/onseikenkyu.28.2_108

Suzuki, H. and Dawa Drolma. 即出. von Rosthorn's Hanniu Material Recorded in 1891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Rongbrag Tibeta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Tournadre, N. and H. Suzuki. 2023.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026628

数词“一”到“十”的上古音

野原 将挥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一下数词“一”至“十”的上古音构拟的情况。我们主要整理些押韵、谐声关系、古文字、闽语、原始藏缅语和其他语言中借词等材料。

一、前言

上古音研究的传统方法和手段主要包括利用押韵、谐声关系以及通假现象的研究。最近，由于大量的古文字资料被发现和公开，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古文字资料。除此之外，还应参考原始闽语、原始藏缅语以及与非亲属语言之间的借词等。

本文收集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也计划两年后定稿时补充更多内容和证据。

本文主要利用 Baxter and Sagart（2014）的上古音构拟和中古音标记。

{一}

“一”的中古音为质韵三等 A 类入声影母（*ʔjit*）。原始藏缅语*ʔit。原始苗瑤語*ʔɨ。

“一”在《诗经》中入韵，如：

（1）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桧风・素冠》
（2）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曹风・鳲鸠》

“一”与“结”、“七”押韵。“结”和“七”的上古音分别是*k$^{\text{ʕ}}$i[t]和*[ts$^{\text{h}}$]i[t]。可见，“一”的上古音韵母也可拟为*-it，即上古的质部。

就其声母，如只根据中古音，应该是*ʔ-。但是在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请看表 1:

[表 1] 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ʔi̯ĕt	*ĭet	*ʔjet	*jit	*ʔjit	*qlig	*ʔit	*ʔi[t]	*qʰig

郑张尚芳（2013）和潘悟云（2024）都构拟小舌音声母。虽然 Baxter & Sagart（2014）也采用小舌音假设，但没有给“一”构拟小舌音声母。

就“一”的韵尾，其实也有两种看法。郑张（2013）和潘悟云（2024）构拟-g 尾之外，Baxter and Sagart（2014）给韵尾 t 加个方括号，其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构拟*-t（换言之，有构拟*-k 的可能性。部分质部字可来源于*-k 尾）。

另外，在出土文献中有各种表示｛一｝的字（“𠂤”等）。这些字似乎跟“一”的字音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些字，准备定稿时补充。

｛二｝

“二”的中古音为脂韵三等去声日母（*nyijH*）。原始藏缅语*g-ni-s。

因为“二”不入韵，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古音构拟其上古音。学者一般认为“二”可归为脂部*-ij。

在其谐声系列上有“貳”、“貤”和“次”。这些字的上古音分别是*ni[j]-s、*nri[j]-s、*[s-n̥]i[j]-s。学者一般认为原始藏缅语*g-ni-s 和汉语的｛二｝是同源的。

[表 2] 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ŋi̯ər	*ŋĭei	*ŋi̯ed	*njidh	*njijs	*njis	*nis or *nih	*ni[j]-s	*nʲis

《说文》给“次”字加注为“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声。”因此，有学者认为“次”是从欠二声的形声字。比如，Baxter and Sagart（2014：333）拟为：

（3）次 *[s-n̥]i[j]-s > *tshijH* > cì ‘put in order; second’

根据 Baxter and Sagart（2014）的解释，*s-n̥-变为中古音清母。与此平行的是“千”字：

（4）千 *s.n̥ʰi[ŋ] > *tshen* > qiān ‘thousand’

但也有从古文字的角度反驳构拟鼻音声母（*s-n̥-）的研究，可参看复旦大学（2024：72）。该研究主要根据“即”字表示｛次｝的商周金文的通假例。“即”的上古音声母为*ts-，显然没有鼻音声母*n-。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次”更早时原来带有清鼻音声母的可能性。

｛三｝

“三”的中古音为谈韵一等平声心目（*sam*）。原始藏缅语*g-sum。

“三”在《诗经》中押韵，如：

（5）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召南・摽有梅》

“三”与“今”押韵。“今”可归为上古的侵部，其上古音为*[k]r[ə]m。不过，就“三”的韵母的拟音，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

[表 3] 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səm	*səm	*sə̂m	*səm	*sum	*suum	*sə̂m	*s.rum	*sǫm

从表 3 看出，其元音有*ə、*u、*ǫ的三种看法。Baxter（1992:550）根据原始藏缅语*g-sum 给汉语的“三”构拟*sum。也可参看 Coblin（1986：149）。

有趣的是，Baxter and Sagart（2014）给“三”构拟*s.r-声母，如：*s.rum。这可能是因为“三”与“驂”、“参”似乎有同源关系，其上古音分别*m-sˁrum (*s.r̥ˁum)、*srum (*s.rum)。

（6） 骖 cān < *tshom* < *m-sˁrum ‘three horses on a team; outside horses of a team’

《說文》：“骖：駕三馬也。从馬參聲。”

（7） 参 shēn < *srim* < *srum ‘the three stars of Orion’s belt’

Baxter and Sagart（2014）认为“三”之后的“四”引起了沾染（contamination），把“三”的*s.r-变为*s-（相当于中古音心母 *s-*）。“三”与“参”到底有没有同源关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没有同源关系的话，也不需要构拟*r）。

另外，根据音变规则，“三”*sum 应该变为覃韵 *som*。然而，“三”的中古音为谈韵 *sam*，这是一个例外的音变现象。

{四}

“四”的中古音为脂韵三等开口去声心母（*sijH*）。原始藏缅语*b-ləy。原始苗瑤語*plei。

“四”在诗经中押韵，如：

（8）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鄘风・干旄》

“四”与“紕”“畀”押韵，都是上古的脂部字。以下是各家的上古音拟音：

［表 4］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si̯əd	*sĭei	*sjed	*sjidh	*s(p)juj/ts	*hljids > *s	*sis ?	*s.li[j]-s	*p.lʲigs

从表 4 看出，Baxter（1992）、郑张尚芳（2013）、Baxter and Sagart（2014）、潘悟云（2024）都构拟*l。这可能是跟原始藏缅语*b-ləy 有关系（也可参看 Schuessler（2006: 478））。

另外，在“四”的谐声系列上有“駟”、“泗”、“佽”。前两者都是中古音心母字。其中，“泗”好像跟“涕”字有同源关系（可参看王力（1982:418））。根据 Baxter and Sagart（2014），“涕”可拟为*[l̥]ʰ[ə]jʔ。据此，“四”也许可以构拟一个*l。因此 Baxter and Sagart（2014）和潘悟云（2024）把“駟”拟为*s.li[j]-s 和*p.lʲigs。

最后一个“佽”是“佾”的异体字（“佽”是由“四”得声的字）。可参看《说文》：“静也。从人血声。《诗》曰：‘閟宫有佾。’況逼切。”、《集韵》：“佾，火季切，静也。或作佽。”“況逼切”、“火季切”都归为中古音晓母。这到底跟“四”有无关系，我们尚未能确定。

{五}

“五”的中古音为模韵一等上声疑母（*nguX*）。原始藏缅语是*l/b-ŋa。原始苗瑤語*pra。

“五”也在《诗经》中押韵：

（9） 孑孑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鄘風・干旄》

“旗”、“都”、“组”、“予”都是上古音鱼部字。前两个字是平声字，后面两个是上声字。其上古音分别是*la、*tʿa、*tsʿaʔ、*laʔ。可见，与此押韵的“五”可归为上古的鱼部。

在“五”的谐声系列上有“吾”字，可拟为 ŋʿaʔ。表 5 是各家的拟音：

［表 5］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ŋo	*ŋa	*ŋɑg	*ŋagx	*ŋaʔ	*ŋaaʔ	*ŋâʔ	*C.ŋʿaʔ	*s.ŋa̱ʔ

另外，Baxter and Sagart（2014）也构拟*C.ŋ-。这跟原始闽语有关系。原始闽语的“五”可拟为*hŋ-。为了解释闽语中的清鼻音声母，我们需要构拟*C.ŋ-之类的复辅音声母。有趣的是，Proto-Tai 的“五”也拟为*haːᶜ（Pittayaporn（2009 :382）、也可参看 Schuessler（2006:519））。

{六}

“六”的中古音为屋韵三等入声来母（*ljuwk*）。原始藏缅语*d-ruk（WT *drug*）。原始苗瑤語*kruk。

“六”在《诗经》中押韵，如：

（10）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鄘風・干旄》

“六”与“祝”、“高”押韵，其上古音分别是*[t]uk、*kʷuk-s。可见，“六”可归为上古的觉部。以下是各家的拟音：

［表 6a］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li̯ôk	*liuk	*li̯ok	*ljəkw	*C-rjuk	*rug	*ruk	*k.ruk	*g.rug

在“六”的谐声系列上有与“六”同音的“𠦂”。《说文》：“从中六声。”

另外，“六”跟闽语的“来母读擦音”现象有关系。以下是闽语中的对应关系：

［表 6b］闽语中的对应关系

福州	厦门	潮州	建阳	建瓯	邵武
løy^{8}	lak^{8}	lak^{8}	so^{8}	ly^{8}	ʃu^{5}

闽北、邵将地区等所谓内陆闽语的部分来母字读为擦音，如：s、ʃ、ɬ。因此，梅祖麟 •罗杰瑞（1971）把这些读擦音的来母字拟为清流音声母*lh-。加之，这些原始闽语清流音声母正好跟 Proto-Hmong-Mien 和 Proto-Kra-Dai 的*kl-之类的声母对应。也可参看秋谷裕幸（2011）、沈瑞清（2011）、Nohara（2023）。

总而言之，除了押韵之外，汉语内部里构拟“六”的证据并不多，但是按照原始闽语和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讲，“六”带有*k.r-的可能性较高。

{七}

“七”的中古音为质韵三等入声清母（*tshit*）。原始藏缅语可拟为*s-nis。

“七”在《诗经》中的押韵，请看如下：

（11）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曹风 • 鳲鸠》

（12）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召南 • 摽有梅》

“七”与“一”、“结”、“吉”押韵，其上古音分别是*ʔi[t]、*kʷi[t]、C.qi[t]。可见，

“七”也可归为上古的脂部。以下是以往学者的拟音：

［表 7］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ts’i̯ĕt	*tsiet	*ts‘i̯et	*tshjit	*tshjit	*snhid	*tshit < snhit?	*[tsʰ]i[t]	*sn̥id

原始藏缅语可拟为*s-nis，因此郑张（2013）、潘悟云（2024）都拟为*s 后面加清鼻音的声母*sn̥-。也可参看 Pulleyblank（1962:134）。

“切”也许由“七”得声的字。《说文》：“切：刌也。从刀七声。千结切。”黄德宽（2007：3381）指出“‘七’…或说以示切割之意，疑切之初文，借为数词‘七’。”藤堂明保（1965:776）认为“七”跟“切”构成一个词族｛TSET｝。但请注意，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七”字只用为数词｛七｝，没有表示｛切割｝之意的。Schuessler（2008:419）也指出“The graph originally wrote qiè 切 which never had a nasal in the initial, hence prob. no *n in qī.”。

因此，目前我们认为“七”没有足够的证据构拟清鼻音声母。

｛八｝

“八”的中古音为黠韵二等入声帮母（*peat*）。原始藏缅语*b-r-gyat。原始苗瑤語*jat。原始闽语*pet。

“八”不入韵。以下是以往学者的拟音。

［表 8］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pwăt	*pet	*pet	*priat	-	*preed	*prêt	*pˤret	*pʳe̲d

采用六元音系统的学者主要构拟前元音*e。

《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黄德宽（2007:3393）指出：“八，甲骨文、金文作八，示分别之意。《说文》‘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之本意为分别，疑即扒（捌）之初文，后借为数词‘八’。”

其实，“别”也可构拟前元音*e，其上古音是*pret（本文不讨论“清浊别义”的问题）。“八”和“别”也許可以构成同一个词族。藤堂明保（1965:650）虽然没有采用前元音假

设，但是把“八”和“别”归为｛PAT｝的词族。

｛九｝

“九”的中古音为尤韵三等上声见母（*kjuwX*）。原始藏缅语*d/s-kəw。原始苗瑤語*N-ɟue。

“九”不入韵。以下是以往学者的拟音：

［表 9］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kɨ̯ŭg	*kĭu	*kɨ̯ŏg	*kjəgwx <*kwjəgwx	*kʷjuʔ	*kuʔ	*kuʔ(*kʷəʔ)	*[k]uʔ	*kuʔ

在“九”的谐声系列上有“仇”、“究”、“轨”之外，还有“廄”也许是由“九”得声的。可参看说文古文  。“廄”的中古音为尤韵三等去声见母。“仇”、“究”、“轨”和“廄”的上古音分别是*[g](r)u、*[k](r)u(ʔ)-s、*kʷruʔ、*[k]ʷu(ʔ)-s。

另外，有学者认为“九”跟手臂有同源关系，“九”和“肘”初文有可能是同源的，如李孝定（1982:4189）、裘錫圭（2003：391）、黄德宽（2007:443）。也可参看甲骨文的“肘”字：  （合集 4899）。Baxter and Sagart（2014:32）也有同样的看法，给中古音知母的“肘”构拟较复杂的声母*t-k-。还指出：“Tibeto-Burman shows both unprefixed forms such as Written Tibetan *khru* ‘cubit’ and prefixed forms such as rGyalrong /tə^{22} kru^{33}/ ‘elbow’…”Schuessler（2007:320）也认为“九”字原是表示｛to bend｝之意的字，“九”与“鞠”是同源。“鞠”的上古音是*k(r)uk。

｛十｝

“十”的中古音为缉韵三等禅母（*dzyip*）。原始藏缅语*gip。原始苗瑤語*gjɥɛp。

“十”不入韵。以下是以往学者的拟音：

［表 10］各家的拟音

Karlgren	王力	董同龢	李方桂	Baxter	郑张尚芳	Schuessler	B & S	潘悟云
*ɖi̯əp	*zĭəp	*źi̯əp	*djəp	*gjip	*gju̯p	*gip	*t.[g]əp	*gljub

Baxter（1992）、郑张（2013）、Schuessler（2007）、Baxter and Sagart（2014）和潘悟云（2024）都构拟软腭塞音*g。这都是根据原始藏缅语*gip 和其他语言的证据构拟出来的。也可参看 Coblin（1986:147）。“十”的中古音声母为禅母，如果“十”来源于上古的*g 的话，其元音应该是前元音*i，不然的话，我们无法解释“十”为何经过腭化而变为中古音禅母 *dzy*。因此，Baxter（1992）、郑（2013）、Schuessler（2007）都构拟前元音*i 或*j。

与此不同，Baxter and Sagart（2014）的声母为*t-[g]，不需要构拟前元音*i。他们认为“十”的古文字原来表示｛针｝（也可参看裘锡圭（2003：391））。以下是 Baxter and Sagart（2014：154）的“针鍼箴”的擬音：

（13） 针，鍼，箴 *t.[k]əm > tsyin > zhēn ‘needle’, pMĭn *tš-; pHmong *kjɔŋ A, VN *găm* [ɣam A1], Proto-Lakkia *the:m A, Proto-Tai *qem A

可见，在汉语周围的其他语言中表示｛针｝的词似乎带有*k 之类的声母。加之，“十”的原始藏缅语和苗瑤語分别是*gip、*gju̯ɛp。给“十”的上古音声母构拟*g-，这项假设还是有道理的。

本文简要介绍了数词“一”至“十”的上古音构拟。构拟上古音数词时，需要综合考虑押韵、谐声、通假现象之外，同时参考古文字、原始闽语、原始藏缅语以及亲属语言之外的语言等。本文仅为介绍性文章，我们计划在两年后定稿时补充更多内容和证据。

附记：本文为 JSPS KAKENHI（Grant Number 23K25322）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董同龢 1944/1948 《上古音韵表稿》，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黄德宽 2007 《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 2024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上冊。上海：中西书局。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孝定 1982《甲骨文字集释》第十四补遗存疑待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梅祖麟 • 罗杰瑞 1971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声字，《清华学报》9：96-105.

秋谷裕幸 2011 闽语中“来母 S 声”的来源，《语言学论丛》43: 114-128. 北京：商务印书馆。

裘锡圭 2005 釋郭店《緇衣》“出言有𠂤，黎民所𠂤——兼說“𠂤”為“針”之初文，《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原载《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 年）。

沈瑞清 2011 也谈闽西北方言来母读擦音现象，*Paper presented at 1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南开大学, 天津。

藤堂明保 1965 《汉字语源辞典》东京：学灯社。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潘悟云 2024 《汉语古音手册》。上海：中西书局。

郑张尚芳 2003/201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blin, W. South.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8.)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en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hara, Masaki 2023. Old Chinese ‘egg’: More evidence for consonant clust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4:2: 325-344.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22-238.

Pittayaporn, Pittayawat. 2009. *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lleyblank 1962-6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58-144, 206-265.

Ratliff, Martha. 2010. *Hmong-Mien Language History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chuessler, Axel. 2007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数词“一”到“十”的中古音

桥本 贵子
公立小松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各种外国汉字音和对音资料中的数词“一”到“十”在中古音时期的读法，考察这些资料反映的汉语音的音韵特点及其演变情况。

一、前言

在中古音时期，汉族和周边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很活跃。因此，我们能够利用反映中古音的各种资料，例如：日语音有吴音和汉音，朝鲜语和越南语中也有汉字音。这些汉字音的主要层次一般认为都引进了中古音。除了外国汉字音外，在历史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民族接触和交流的许多痕迹。有些文献使用外国语言的文字记录汉语发音，有些则用汉字记录外国语言的发音，这些一般被称为“对音资料”。 外国汉字音和对音资料不仅是汉语音韵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各个外国语言历史的重要资源。

本文收集了中古音时期外国汉字音和对音资料中数词“一”到“十”的读音，试图考察这些读音所反映的汉语语音特点以及中古音时期发生的一些语音变化。

1.1 外国汉字音

本文所使用的外国汉字音有四种，即：日本吴音、日本汉音、朝鲜汉字音和越南汉字音。日本吴音是指在 8 世纪以前从中国大陆（可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日本汉音是指在 8 世纪到 9 世纪左右，通过派遣遣唐使和邀请音博士，从唐朝的首都长安引入，并在日语中固定下来的汉字读音。关于朝鲜汉字音和越南汉字音的借入时期有几种说法，但学者一般认为它们都是在中古音时期的某个时候引进的。

为了更接近中古音的实际情况，本文重视采用历史文献中的读音记录。朝鲜汉字音依据伊藤（2007）的研究，越南汉字音依据三根谷（1972）的研究。然而，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的读音无法从历史文献中获取。古代日语的标记法与现代日语的标记法差异很大，并且有些资料没有标明清音和浊音的区别。虽然这些

特点可以说是历史文献的真实面貌，但笔者不知道应该如何用拉丁字母转写，如果直接采录这种标记，一定会给读者带来混乱和误解。因此，本文只好利用字典所收录的吴音和汉音的现代读音。《汉辞海》这部字典的吴音和汉音基于现代的古代日语学者对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的整理研究，排除了根据韵书和韵图推测的读音（佐藤、濱口2004：1633-1634），因此足以用于考察。为了方便读者，笔者将其读音转写成拉丁字母，但这种转写只是应付使用，并不严密。

1.2 对音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对音资料包括藏文资料、粟特文资料、于阗文资料、回鹘文资料和梵汉/巴汉对音。前四种是用各种外国文字标记汉语音的资料。前辈学者的研究已阐明，它们反映了 8 世纪到 10 世纪的西北方音。本文主要依据日本学者的整理研究，即：高田（1988a），吉田（1994），武内（2008），庄垣内（2003）。需要注意的是，回鹘文资料其实反映了从唐末到元朝时期，吐鲁番一带的回鹘人使用的汉字音。为了方便比较，将回鹘文资料与同样反映西北方音的对音资料一起排列。

一般而言，由于数词具有较高的表意性，因此在译音资料中很少出现。然而，由于梵汉/巴汉对音的数据量较大，其中会出现一些数词。在其他译音资料中，几乎看不到数词。因此，本文仅利用梵汉/巴汉对音，主要依据 Coblin（1983）和辛岛静志的研究（辛嶋 1994；Karashima 2001；Karashima 2010），并收录了笔者自己调查的结果。

二、数词“一”到“十”的中古音

2.1 “一”

“一”是质韵影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ʔiɾᵉt /ʔiet/（/ /号表示音位标记，以下同）。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itɕi	itɕi ; itsu	il	nhất ; nhứt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i ; ”į ; ”ir ; ”įr ; yi ; ”yi ; ”ye ; ”yi ; ”yir	’y ; ’yr ; ’yr’	ī ; īrä ; ye ; yerä	’y ; ’yr

梵汉/巴汉资料：

一阐提 icchantika（后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

一地臾 Iṭṭhiyo（萧齐 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

一底蜜底 iṭṭi miṭṭi ；一徵利鼙底利 iṭṭiri bhiṭṭiri ；一质多耶 iṭṭitāya ；一智蜜智 iṭe miṭe ；一涕蜜涕 itte mitte （萧梁 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

一窒里 iṭṭiri ；一峙鼻峙 iḍi viḍi ；一掇蜜掇 iṭṭi miṭṭi ；一哩枳死 ilikisi ；一里迷逻 ili mela ；一底蜜底 itti mitti ；一里蜜里 ili mili ；一掇 iti ；一底摄伐囉 itiśabare ；一底吒也 iṭṭitāya ；一帝蜜帝 itte mitte 一哩雉弭哩雉 iriḍi miriḍi ；一智蜜智 iṭe miṭe ；一底诃细 iti hāse（唐 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以及朝鲜汉字音中的读音以元音 i 开头。越南汉字音中的读音很特别，读为 nh [ɲ]。在越南汉字音中，影母字一般都读为 ’，但遇到真韵和质韵时念 nh（三根谷 1972：107-108）。藏文资料通常标为 ”、”y，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用 ’ 表示。这些符号都表示影母读为喉塞音。于阗文资料标为 y，有时没有标出声母。在梵汉对音中，“一”对应词头的 i。

（2）元音：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以及朝鲜汉字音中读为元音 i，而越南汉字音中读音为 â [ə]、ư [ɯ]。越南汉字音读为 â [ə]。质韵在越南汉字音中一般读为 ât（三根谷 1972：139）。清水（1999：65，69）表明，在 17 世纪的越南汉字音资料中，包括“一”在内的真韵字和质韵字的元音部分读为 i，因此可以推测，17 世纪以后发生了 i > ə 的变化。藏文资料标为 i、į、e。粟特文和回鹘文中的 y 能代表[i]～[e]，“一”的标音中的 y 大概表示[i]。于阗文标为 ī、(y)e。在梵汉对音中，“一”对应 i。

（3）韵尾：各种资料都反映了某种齿音韵尾的存在。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中“一”的韵尾读为 tɕi（< ti）或 tsu（< tu）。越南汉字音读为 t。朝鲜汉字音读为 l。河野（1968）和伊藤（2007）认为，在朝鲜汉字音中，山摄和臻摄的入声韵尾读作 l，这可能是由于朝鲜语特有的语音性质所导致的（河野 1979：440-441；伊藤 2007：264，注 418）。藏文资料、粟特文资料、回鹘文资料都基本上标为 r，于阗文标为 rä。马伯乐解释这种标音反映了山摄和臻摄的入声韵尾已变为[ð]（Maspero 1920：41；马伯

乐 2005：54-56），羅常培（1933：61-62）认为，这个 r 表示已经变到了 r。有坂（1936）认为，它可能反映了从[-dḍ]到[-ʔ]的变化过程中的中间状态，即“仅有过渡音的半卷舌音 r”（有坂 1957：604），高田（1988a：155-156）和吉田（1994：332）对此表示赞同。

另外，在这些外文资料中，有时没有标出“一”的韵尾，如：藏文资料中的 “一卷” ”i kwen ；“一切经” ”i tshe kyi ；“一部” ”i bu 等例子，但“合为一相”则标为 hab ’u ”ir syang，表示有韵尾。高田（1988a：159-160）说，质韵字没有标出韵尾的例子集中在“一”，并解释说只在“一”的独立性高的时候就把入声韵尾读得很清楚。10 世纪粟特文资料中的“一心”’ysym ；回鹘文资料中的“一切”’ytsy ，大概是因为“一”的齿音韵尾和后一个音节的齿音声母连读时，韵尾的调音不明显，所以没有标出韵尾。于阗文资料有时也标为 ī、ye。但在这些外文资料中，山摄和臻摄的字基本上都标有韵尾，所以这些没有标出韵尾的例子并不意味着反映入声韵尾的脱落现象。

在梵汉对音中，“一”的韵尾对 c、t、ṭ、ḍ、l 等辅音，表示还保持齿音韵尾。

2.2 “二”

“二”是至韵日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ɲɲi /ɲiei/。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ni	ʑi	zi	nhị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zhị ; zhị ;’zhi	ẓy ; ẓ-y ; šy ; šy’	śī’	sy ; šy

（1）声母：日本吴音读为 n、日本汉音读为 ʑ。朝鲜汉字音读为 z，这是中期朝鲜语中的标音，后来 z 变为零辅音。越南汉字音读为 nh。日本吴音和越南汉字音表明，所根据的汉语音中的日母字还保持着鼻音，而日本汉音和朝鲜汉字音则反映了它们借入时期的汉语日母字已经变为浊擦音。

外文资料都反映了已变为浊擦音之后的状态。藏文资料标为 zh。8 世纪粟特文资料标为 ẓ、10 世纪回鹘人用粟特文标记的资料中标为 š、ẓ。这些标音并不意味着日母的鼻音成分已完全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藏文资料中有“十二” 标为 shim zhi，10

世纪粟特文中有“十二”标为 šym šy，“二十二”标为 šyšym ẓ-y 等例子。这些例子中，“十”字韵尾标为 m，这表明“二”的声母影响到了前一个音节的韵尾，也就是说产生了连读音变，同时，这也说明“二”的鼻音成分尚未完全消失。回鹘文资料中标为 s̈、s[1]。于阗文资料标为 ś’[2]。

译音资料中很难找到用“二”字来对译的例子。在梵汉对音中，8 世纪以前，日母字对译梵语鼻音 ñ、ṇ、n 等，而 8 世纪以后对译梵语 j，这种对音情况的变化表明日母自 8 世纪以后开始浊音化了[3]。福建霞浦新发现的汉译摩尼教文献概为初唐末期成立，其中有以日母字“而” 作为声符的“唲”字对译中古伊朗语 ž 的例子，据此，橋本（2021）推测，日母在初唐末期开始浊擦音化了。

（2）元音：外国汉字音都读为 i。在外文资料中，“二”的元音部分基本上都对应外国语言的 i。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中的 y 代表[i]，这是毫无疑问的。

2.3 “三”

“三”是談韵心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sɑm /sɑm/。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saN	saN	sam	tam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sam	s’m ; s’m’	saṃmä	s’m

梵汉/巴汉对音：

[1] 在《慈恩传》以及 10 世纪回鹘人用粟特文标记的资料中，日母标为 ẓ，然而，在后期的回鹘文资料中，这些音被标为 s̈、s。据吉田（1994：320）的解释，这可能是由于/ž/在回鹘语中一旦固定下来后，在汉字音本地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清音化。

[2] ś’是在代表 ś 的字母下加一个小勾的形式的转写。研究于阗文《金刚经》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小勾有表示浊音的作用，但是李建强（2018）指出，于阗文《金刚经》中的清声母字也使用下加小勾的标音。因此，他主张，于阗文对音中的下加小勾应该是一种区别符号，表示与单纯的字母读音不同。

[3] 水谷（1957）曾指出，在 7 世纪的梵汉对音中，有以鼻音声母字对译梵文不送气浊音的例子，据此认为日母的鼻音成分已经在 7 世纪开始弱化了。然而，桥本（2007）指出，水谷（1957）所举的论据不足以证明当时日母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昧 samādhi；三拔衍 saṃpatti；三耶三佛 samyaksaṃbuddha；梵摩三钵 brahmāsahāṃpati；阿惟三佛 abhisaṃbuddha；般舟三昧 pratyutpannasamādhi；三藐三菩提 samyaksaṃbodhi； 三陂諟 saṃpadī； 三摩 sāma；三摩陀 Samanta（东汉 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

阿三磨三履 asamasame；萨婆僧伽三摩地伽兰地 sarvasaṃgasamatikrānte（姚秦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

婆三婆四, Vāsa(ṃ)vasy’；三物第 samudre；三婆婆 Sambhava；三摩由 samayo（后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

三拔劫 saṃvaṭṭakappe；三拔叉夷 saṃvaṭṭaṭṭhāyī；波致三毘陀經 Paṭisambhidāyaṃ （萧齐 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

彌里多三恃婆底 mṛtasaṃjīvani； 三曼陀跋陀離 samantabhadre；三勿陀罗 Samudrā 等（萧梁 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

三謎 same；三磨 sama；萨缚僧伽三末底羯烂帝 sarvasaṃgasamatikrānte（唐《玄应音义》卷 6 所收玄奘译法华经陀罗尼）

阿波三摩罗 apasmāra；三曼頞跋姪囉 samantabhadre；三覩伐帝 santuvaṭṭe；三麼耽婆 samatumbā；三曼多暮丽 samantamūle；三忙祇罗 Samaṅgira；三没揭多 Samudgata 等（唐 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

三滿帝曩 samantena；三藐波啰底半曩南 samyakpratipannānāṃ；摩贺三摩野 mahasamaya 等（唐 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以及朝鲜汉字音读为 s。越南汉字音读为 t，这符合心母字在越南汉字音中的一般对应规律（三根谷 1972：94-96）。藏文资料标为 s、z，粟特文资料也标为 s、z。于阗文资料标为 s。回鹘文资料标为 s。在梵汉/巴汉对音中，“三”出现率较高，自东汉至唐代基本上都对应梵文 s。

（2）元音：外国汉字音都读为 a。藏文标为 a。粟特文和回鹘文都标为 ’，即[a]。于阗文标为 a。在梵汉/巴汉对音中，“三”的元音部分对应 a。

（3）韵尾：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ɴ，它变自 mu。朝鲜汉字音和越南汉字音读为 m。藏文标为 m。粟特文和回鹘文都标为 m。于阗文标为 saṃmä[4]。在梵汉/巴汉对音中，“三”的韵尾部分对梵文 m、ṃ，ṃ即为 m 的替代形式。

[4] 在于阗文《金刚经》中，“三”还有 saṃ的读音，见于梵文 saṃbhava 的音译中。这不是汉语数词“三”的读音，因此不在此讨论。

2.4 “四”

“四”是至韵心母字，根据平山久雄（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sɪi /siei/。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ɕi	ɕi	sʌ	tứ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si ; sị ; zi ; ”zi	sy ; sy” ; zy	si ; siysi ; siysä	sy

梵汉对音：

婆三婆四 Vāsa(ṃ)vasy’ （后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

伊里吉四 ”ilikisi ；苏四磨 Susīmā （唐 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以及朝鲜汉字音读为 s。越南汉字音读为 t-，这与“三”字相同。藏文资料标为 s、z，粟特文资料标为 s、z。于阗文资料标为 s。回鹘文资料标为 s。在梵汉对音中，“四”的声母部分对应 s。

（2）元音：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i。朝鲜汉字音读为 ʌ，越南汉字音读为 ư [ɯ]，朝鲜和越南的读音可能反映了精组止摄字的直音化。藏文资料标为 i、ị。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都标为 y[5]，即[i]。在于阗文资料中，止摄字一般标为 ī、īyi、īya，这些标音代表[i]。而“四”的元音部分标为 iysi、iysä、i，这些标音是精组止摄字所特有的，高田（1988b：109-110）和 Emmerick & Pulleyblank（1993：45, 48-49）解释说，这种标音可能反映了已经发生的直音化，变为[ɿ]。在梵汉对音中，“四”的元音部分对应 i，“婆三婆四” Vāsa(ṃ)vasy’ 的 y’ 等于 i，词尾的 i 遇到后一个以元音开头的词时，i 就拼写成 y’。

2.5 “五”

“五”是姥韵疑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ŋᵘoˑ /ŋuʌˑ/。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5] 庄垣内（2003：78）指出，回鹘文资料中有将止摄字的元音部分标为 w 的例子，他解释说，这种标音反映了止摄精组字的直音化。但也有非精组的止摄字标为 w 的情况，目前对此还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今后需要继续探讨。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ɡo	ɡo	’o	ngũ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go ; ’gu	γw ; γwβ’ ; γwy	gū	qww ; ’wqw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ɡ。朝鲜汉字音读为 ’，是零声母。越南汉字音读为 ng。藏文资料标为 ’g，高田（1988a：88）认为这种标音表示鼻冠浊音。粟特文资料标为 γ。回鹘文资料标为 q。于阗文资料标为 g。

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文资料中的“一十五”、“二十五”等词汇中，“十”字的韵尾标注为 m，这表明“五”的声母对前一个音节的韵尾产生了影响，同时也说明“五”的鼻音成分尚未完全消失。粟特文资料中的“十五”标为“šym γwy”，其中“十”字的韵尾也标为 m，其道理与藏文资料相同。

（2）韵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读为 o。朝鲜汉字音读为 o。越南汉字音读为 u [u][6]。藏文资料标为 o、u。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标为 w，在这两种文字中，[u]和[o]都标为 w，所以不知道“五”字的标音 w 所代表的是[u]还是[o]。于阗文资料标为 ū。

2.6“六”

“六”是屋韵来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lrˤʊʷk /liʌʷk/。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ɾoku	ɾiku	ɾiuk ; iuk	lục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lug ; ’lug ; lyug	ɾywγ ; rywγ ; lwk ; lwk’ ; lyγ	无	lwq ; lwq̈

[6] 模韵在越南汉字音中一般读为 ô [o]（三根谷 1972：119）。

梵汉对音：

鞞六雞 veluke ；陀六迦 Dāruka （唐 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ɾ。朝鲜汉字音读为 r。越南汉字音读为 l。藏文资料标为 l。粟特文资料标为 r 和 l。回鹘文资料标为 l。

在梵汉对音中，“六”字出现得很少。笔者只能从唐代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中找到较为可靠的两例，“六”的声母部分分别对应 l 和 r。

（2）元音：日本吴音读为 o，日本汉音读为 i。朝鲜汉字音读为 iu。越南汉字音读为 u [u]。藏文资料标为 u、yu。8 世纪粟特文资料标为 yw，10 世紀粟特文资料标为 w、y。回鹘文资料标为 w。日本吴音和越南汉字音没有反映 i 介音，而日本汉音、朝鲜汉字音、粟特文资料及部分藏文资料反映了 i 介音。在梵汉对音中，“六”的元音部分对应 u。

（3）韵尾：各种资料都反映了舌根音韵尾的存在。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读为 ku。朝鲜汉字音读为 k。越南汉字音读为 c [k]。藏文资料标为 g。8 世纪粟特文资料标为 γ，10 世紀粟特文资料标为 k、γ。回鹘文资料标为 q。在梵汉对音中，“六”的韵尾部分对应 k。

2.7 “七”

“七”是质韵清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tsʰɪᵉt /tsʰiet/。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ɕitɕi	ɕitɕi ; ɕitsu	cʰil	thất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tshi ; tshir ; tshịr ; ’tshir	tsyr ; cyr ; syr ; syr’	无	syr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ɕ。ɕ 原来在古代日语中是塞擦音，后来变为擦音。朝鲜汉字音读为 cʰ。越南汉字音读为 th。清母在越南汉字音中一般读为 th

（三根谷 1972：85）。藏文资料标为 tsh。8 世纪粟特文资料标为 ts，而 10 世紀粟特文资料（大概是回鹘人所记）标为 s。回鹘文资料标为 s[7]。

（2）元音：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读为 i。朝鲜汉字音读为 i。越南汉字音读为 â [ə]。关于质韵的元音在越南汉字音中的演变，已经在对“一”的考察中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藏文资料标为 i、į。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标为 y，即[i]。

（3）韵尾：日本吴音读为 tɕi，日本汉音读为 tɕi、tsu，tɕi 变自 ti，tsu 变自 tu。朝鲜汉字音读为 l。越南汉字音读为 t。藏文资料标为 r。粟特文资料、回鹘文资料都标为 r。

2.8 “八”

“八”是黠韵帮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pæt /pæt/。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hatɕi	hatsu	pʰal	bát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pa ; par ; ’par	p’r ; p’r’	parä	v’r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读为 h，它来自 ɸ。朝鲜汉字音读为 pʰ，是送气音。这是受到“七”cʰil 的类推作用的影响（伊藤 2007：53）。越南汉字音读为 b。帮母在越南汉字音中一般读为 b，并母同样读为 b，但这两种声母在声调上有区别（三根谷 1972：65-67）。藏文资料标为 p，’p。粟特文资料标为 p。于阗文资料标为 p。回鹘文资料标为 v。在回鹘文资料中，帮母一般标为 p，“八”标为 v 是例外。庄垣内（1987：25）和庄垣内（2003：49）解释说，这可能是回鹘语内部发生的变化。

（2）元音：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a。朝鲜汉字音读为 a，越南汉字音也读为 a。藏文资料标为 a。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都标为 ’，即[a]。于阗文资料标为 a。

[7] 在五代至宋初的回鹘文资料《慈恩传》中，汉语的精母、清母、从母标为 ts，心母、邪母标为 s（庄垣内 1987：32-33）。然而，在成立于被推测成立于元朝时期的回鹘文资料中，这些声母一律标为 s。这可能是因为回鹘语中不存在的破擦音/ts-/被摩擦音/s-/所取代（庄垣内 2003：59）。

（3）韵尾：日本吴音读为 tɕi，日本汉音读为 tsu，tɕi 变自 ti，tsu 变自 tu。朝鲜汉字音读为l。越南汉字音读为t。藏文资料一般标为r，然而“八十一”标为pa shib ”yir，其中“八”字没有标出韵尾。这可能是因为“八”的齿音韵尾和后一个音节的齿音声母连读时，韵尾的调音不明显，所以没有标出韵尾。粟特文资料、回鹘文资料都标为r。于阗文资料标为 rä。

2.9 “九”

“九”是有韵见母字，根据平山（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kɪᵊu /kiʌu/。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ku	kju:	ku[8]	cửu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gu’u ; gi’u	kyw ; ky’w	无	kyv

（1）声母：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k。朝鲜汉字音读为 k。越南汉字音读为 c [k]。藏文资料标为 g。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标为 k。

（2）元音：日本吴音读为 u、日本汉音读为 ju:（< iˈu）。朝鲜汉字音读为 u。越南汉字音读为 ửu [ɯːu]。藏文资料标为 u’u、i’u。粟特文资料标为 yw。回鹘文资料标为 yv。这些外文资料都显示了 i 介音的存在。

在梵汉/巴汉对音中，找不到“九”字。据笔者所知，在唐代以前，声母和韵母与“九”一致的“鸠”（平声）和“究”（去声）一般对应梵文 ku、kū、ko，而唐代以后，尤其在咒语的对音中，这些字很少对应 ku、kū、ko 了。

2.10 “十”

“十”是缉韵常母字，根据平山久雄（2018）的研究，它的拟音为 ʤɪep /ʤiep/。

各种中古音资料中的反映如下：

[8] “九”字还有 kiu 的读音，见于“九合”一词中，这个“九”是“纠”的意思（伊藤 2007：167），不是数词的“九”，因此不在此讨论。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	越南
ʑju:	ɕju:	sip	thập

藏文	粟特文	于阗文	回鹘文
shib ; shim ; zhib ; ’zhib	šy ; šyp ; šym	śīhvä: [9] ； śaipä	syp ; šyp

梵汉对音：

十伐唎 jvale （唐 《玄应音义》卷 6 所收玄奘译法华经陀罗尼）

（1）声母：日本吴音读为 ʑ，日本汉音读为 ɕ。朝鲜汉字音读为 s。越南汉字音读为 th，这符合常母字在越南汉字音中的一般对应规律。附带而言，在越南汉字音中，除了常母，船母和书母也读为 th（三根谷 1972：94-96）。藏文资料标为 sh、zh。粟特文资料标为 š。于阗文资料标为 ś。回鹘文资料 š、s。

日本吴音和部分藏文资料反映了常母的浊音性。日本汉音、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读为清音，粟特文资料、于阗文资料、回鹘文资料标为清音。可能有学者认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当时汉语常母已经发生了清音化，但本文不一定赞同这一观点。橋本（2019）指出，唐代义净和不空的梵汉对音都反映了当时的匣母还保持其浊音性，并没有全面的清音化，所以不一定能说当时匣母还没有与晓母合流。也考虑到藏文资料中的反映情况，可以推测，在 9 世纪以前，包括常母在内的其他全浊声母也尚未完全清音化。此外，对于外国汉字音和外文资料中的常母字读为清音的现象，我们还应该考虑当时的全浊声母的浊音性可能无法用一些外国语言的文字表现出来。

在梵汉对音中，“十”的声母部分对应 j，表示“十”的声母有浊音性，但很难以此推断其发音方法是擦音还是塞擦音。

（2）元音：日本汉字音（吴音汉音）读为 ju:，本来读为 i(ɸu)，后来受到后面唇辅音 ɸ 的影响发生圆唇化。朝鲜汉字音读为 i。越南汉字音读为 â [ə]。缉韵在 z 越南汉字音中一般读为 â（三根谷 1972：138）。藏文资料标为 i。粟特文资料和回鹘文资料标为 y，即[i]。于阗文资料标为 ī、i、ai。Csongor（1972：71-75）曾提出过用轻重音来解释于阗文《金刚经》中的多种读音的观点。高田（1988b：114）考虑到 ai 这个标音出现在“千二百五十人”中，认为这也许与轻音有关。

[9] 武内（2008：180）标为 śihvä:，根据其他于阗文《金刚经》的研究改为 śīhvä:。此外，武内（2008：180）还举例了 śī，但在其他于阗文《金刚经》的研究中找不到此例，因此暂不讨论。

（3）韵尾：各种资料都反映了唇音韵尾的存在。日本吴音和日本汉音都读为 ju:，它来自 iɸu。朝鲜汉字音读为 p。越南汉字音读为 p。藏文资料标为 b，但遇到后一个音节为“二”“五”的时候，受到鼻音声母的影响，而读为 m 的情况，粟特文资料标为 p，有时也能看到读为 m 的情况，与藏文资料的情况相同。例如：“十二”šym šy；“十五”šym γwy；“二十二”šyšym ẓ-y。还有省略韵尾的形式，例如：“十方”šy βw，这是“十”的韵尾与后一个音节的轻唇音声母连在一起念的（吉田 1994：334, 332），所以没有标出韵尾。于阗文资料标为 hvä、pä。回鹘文资料标为 p。

在梵汉对音中，“十”的韵尾部分对梵文 v，表示有唇音韵尾。

三、结语

本文利用各种外国汉字音和对音资料，考察了中古音时期数词“一”到“十”的读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中古音时期的音变情况。

（1）声母：除了日本吴音和越南汉字音以外，在其他资料中，“二”的读音都反映了鼻音声母的浊塞音化。“五”在很多资料中没有标出鼻音成分的存在。但在藏文资料和粟特文资料中，“二”和“五”的前一个音节的韵尾标为鼻音，这可能是由于“二”和“五”的鼻音成分的影响。“十”在日本吴音和部分藏文资料中反映了常母的浊音性，而其他资料中读为清音。后者的情况是否反映了常母已经变为清音，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商榷。

（2）元音：在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于阗文资料中，“四”的读音反映了止摄精组字的直音化现象。这可能表明，与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资料所依据的汉语音较为晚期。

（3）韵尾：在各种资料中，“三”的鼻音韵尾和“一”、“六”、“七”、“八”、“十”的入声韵尾依然完全保持。但在反映西北方言音的藏文资料、粟特文资料及回鹘文资料中，入声韵尾的标记方式有时很有特点。可能由于后面音节声母的发音方式影响而没有标出韵尾，或者以不同形式标出韵尾。这不是入声韵尾的音变现象，而是实际语音听感上的问题。这些资料是为了汉语学习或佛典诵读而用的实用性文本，可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实际朗读时的连读音变现象。

附记：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4-1932《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出版

高田時雄 1988a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 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創文社

高田時雄 1988b 《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漢語史の諸問題》：71-128，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河野六郎 1968《朝鮮漢字音の研究》天理時報社，原载于《朝鮮学报》31-33, 35, 41-44（1964-1967），收录于河野六郎 1979 《河野六郎著作集》2 ：295-512，東京：平凡社

吉田豊 1994 《ソグド文字で表記された漢字音》，《東方学報》66：271-380. https://doi.org/10.14989/66751

李建强 2015 《从于阗文咒语对音看武周时期北方方音》，徐时仪、梁晓红、松江崇编《佛经音义研究——第三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19-331，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建强 2018《從于闐文對音材料看中古漢語西北音日母的發展——兼論于闐文獻下加小勾的功能》，《汉语史学报》19：31-43

羅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臺北：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 年影印

马伯乐著，聂鸿音译 2005 《唐代长安方言考》北京：中华书局

平山久雄 2018 《敦煌〈毛詩音〉音韻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橋本貴子 2007 《陀羅尼の音写字から見た次濁鼻音の非鼻音化について》，《中国語学》254：124-142

橋本貴子 2019《対音資料から見た初唐期の匣母の音価について—義浄の音訳漢字を中心に—》，《開篇》37：67-80

橋本貴子 2021 《対音資料から見た唐代の軽唇音化について：附論 日母の脱鼻音化》，《神戸外大論叢》73(3)：121-146.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578

清水政明 1999 《Alexandre de Rhodes の辞書に見るベトナム漢字音について》《東南アジア ー歴史と文化ー》28：55-80. https://doi.org/10.5512/sea.1999.55

三根谷徹 1972 《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

水谷真成 1957 《唐代における中国語語頭鼻音の Denasalization 進行過程》，《東洋学報》39 (4) : 1-31. 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records/4714，收录于水谷真成 1994 《中国語史研究 中国語学とインド学との接点》94-162，東京：三省堂

田久保周誉 1972 《梵文孔雀明王経》東京：山喜房仏書林

武内康則 2008 《ブラーフミー文字で音注を附した漢文経典について—北大 D020〈金剛般若波羅蜜経〉—》，《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27：169-188. https://doi.org/10.14989/73222

辛嶋静志 1994 《〈長阿含経〉の原語の研究—音写語分析を中心として》平河出版社

伊藤智ゆき 2007 《朝鮮漢字音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有坂秀世 1936 《入声韻尾消失の過程》，《音声学協会会報》41，收录于有坂秀世 1957《国語音韻史の研究 増補新版》：601-607，東京：三省堂

庄垣内正弘 1987 《ウイグル文献に導入された漢語に関する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17-156. https://hdl.handle.net/11094/20071

庄垣内正弘 2003 《ロシア所蔵ウイグル文献の研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佐藤進、濱口富士雄編 2004 《全訳漢辞海》東京：三省堂

Coblin, W.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songor, Barnabas. 1972. 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Brāhmī Script. *Unicorn (Chi-Lin)* 10: 36-77

Emmerick, E. Ronald, Pulleyblank, G. Edwin. 1993. *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Serie Orientale Roma LXIX.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Karashima, Seishi. 2001. *A Glossary of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妙法蓮華經詞典,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Karashima, Seishi. 2010.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道行般若經詞典.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X: 1-124. https://doi.org/10.3406/befeo.1920.5549

数词“一”到“十”的近代音

远藤 光晓
青山学院大学

内容摘要：小文简单介绍几部重要近代音资料的承袭性质和音译特点，并列出各个资料从“一”到“十”的具体音值。

一、近代音资料样品的性质

汉语近代音的开始年代如果以全浊上声合并到去声为标准的话，应该定为唐代中期。但在本工程中为了分工方便起见，姑且以朝代划分，以宋代为上限，以清代为下限。2023 年度为本工程第一年，在此仅举最有代表性的几个资料为样品。

《蒙古字韵》（1308 年序）用八思巴字（1269 年制定）记音。该书掺杂着人为的成分（如声母保持全浊音）和反映当时大都实际语音的成分（如入声韵有 ai、au 等），需要甄别。宁（1992）考证《蒙古字韵》据《新刊韵略》编纂；中村（1993）则认为据《五音集韵》编纂。八思巴字碑文在各地建立，但皇帝圣旨原文均出自大都皇室，是高度规范化的资料，不能当作方言资料。在表 1 里列出沈（2015）的标音。

《中原音韵》（1324 年）是江西人周德清在卓从之述《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远藤 2024）。《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反映纯粹的大都音，入声已经完全合并到舒声里；《中原音韵》是保存入声的江西人编的，因此在周德清看来，“入派三声”仅仅是为了方便押韵的措施，还掺杂着一些江西音的成分在内。

《脉诀》波斯文翻译是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的资料，远藤（2016）分主层和其他层次。主层是江西人讲的官话，旁层有几种，有一种里还保持入声韵尾-p、-t、-k，但还有-t 读-ld 音值的现象，因此还是一种江西话。当时的其他本土资料一般都有参照资料，往往包含人为的成分。而该资料是波斯人听当时汉人的实际发音记录的，反映音值细节。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是 16 世纪初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每个字有两种谚文注音，左侧音是《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解》（远藤 1994）俗音；右侧音是崔世珍附加的“正音”。两种音合起来看才能得出正确的音来。右侧音应反映当时北京通行的来自南京的官话音。因此有入声，而且其分调不按声母，而按主要元音的高低而分

为两个调。其中类似于去声的类别可见于现代北京话中的一个层次。

《西儒耳目资》（金尼阁，1625 年），据太田（1997）考证，是根据《洪武正韵》编纂。据他说，该书反映南京官话。下表 1 中据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版列出原符号标写。

二、近代音资料中“一”到“十”的音值

下面列举各个资料从“一”到“十”的音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蒙古字韵	ji 入	ri 去	sam 平	sɨ 去	u 上	ly 入	tsʰi 入	pa 入	kiw 上	ʒi 入
中州乐府	i 上	ɻī 去	sam 阴	sī 去	u 上	liəu 去	ts‘i 上	pua 上	kiəu 上	ʂi 阳
中原音韵	i 上	ɻī 去	sam 阴	sī 去	u 上	liəu 去	ts‘i 上	pua 上	kiəu 上	ʂi 阳
脉诀	i	ʒi4	sam1	sɻ4	u3	liu	tsʰi	pa	kiu3	ʃĭ2
脉诀旁层		zɻ4	tsʰam1, saŋ1			lu	tsʰit	pak		ʃĭp
老朴左侧	iʔ5	zɻ4	san1	sɻ4	ŋu3	luʔ5	tsʰiʔ5	paʔ5	kiu3	ʃĭʔ5
老朴右侧	iʔ5	zɻ4	san1	sɻ4	u3	luʔ5	tsʰiʔ5	paʔ6	kiu3	ʃĭʔ5
西儒耳目	ie˙入	ul 去	san 清	su˙去	u 上	lo˙入	ç‘ie˙ 入	pa 入	kieu 上	xe˙ 入

表 1　从“一”到“十”的近代音

附记：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 JP23K25322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定稿时承曾晓渝教授过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宁继福 1985《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宁忌浮 1992《蒙古字韵》校勘补遗《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9-16

沈钟伟 2015《蒙古字韵集校》商务印书馆

太田斋 1997《西儒耳目资》编纂过程推测の手がかり，《神户外大论丛》48 (2)：61-72；48 (5)：41-51.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744

远藤光晓 1990《<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汉字注音索引》好文出版

远藤光晓 1994《四声通解》の所据资料と编纂过程，青山学院大学《论集》35：117-126

远藤光晓 2016《元代音研究》汲古书院

远藤光晓 2024《中原音韵》的成书过程，《汉语研究》2024 年第一辑：114-134

中村雅之 1993《蒙古字韵》と《五音集韵》，《中国语学》240：21-30

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的声调演变

曾晓渝

中国 南开大学

内容摘要：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存在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作为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后裔语言的海南崖城军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天津话，其声调系统分别源自明代南京辖区的江淮官话或中原官话。600 年来，由于相对封闭或开放的不同环境、言语群体的差异等因素，这四个方言点声调系统的历史演变呈现出自然发展、接触变异的不同模式。

一、引言

1.1 研究缘由

中国明代初期（公元 1368-1435 年）大力推行卫所军户制，由此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军屯移民。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1）等史料明确记载，明初天津三卫、贵州三卫、云南八卫、海南崖州守御所，其军人及家属来自当时的南京（南直隶，辖今安徽、江苏），如图 1 所示（底图引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1996：40-41）。

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已存在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的区分（曾晓渝 2013），现代天津话、贵州屯堡话、云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四地方言，是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后裔语言的典型代表，至今这四地官话方言仍遗存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江淮官话或中原官话的痕迹，显现出与周边方言迥异的“另类”特征。此前，我们考察研究了这四地官话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在南北不同语言接触环境中，自明代南京官话至今的演变异同及条件动因（曾晓渝 2021），但是，尚未深入探讨声调系统的历史演变，本文即对此进一步研究。



图 1：明代南京军屯移民至津、黔、滇、琼四地示意图

1.2 研究基础及思路

明代的全国通用语是南京官话（曾晓渝 2016）[1]。根据明代来华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西儒耳目资》（1626）中的声调描述，以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手抄《汉拉字典》（Borgia Chinese 475）中明代官话五声的乐谱描述，明代南京官话

[1] 主要论据之一是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388，391）中的记述：当时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传教士们就没必要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省份的方言了；这种通用口语官话即“南京话”。

声调系统构拟如下（曾晓渝 1992，高田时雄 2004）：[2]

表 1：明代南京官话声调系统构拟

调类	基于《西儒耳目资》（1626）		基于《汉拉字典》(Borgia Chinese 475)	
	金尼阁的描述	曾晓渝（1992）	乐谱描述	高田时雄（2004）
阴平	无低无昂，不高不低	**33**		**33**
阳平	上浊皆低，最低曰浊	**21**		**11**
上声	上浊皆低，次低曰上	**42**		**42**
去声	去入皆昂，最高曰去	**35**		**24**
入声	去入皆昂，次高曰入	**34**		**12/23**

表 1 中的《汉拉字典》大约成书于十七世纪末期，比《西儒耳目资》晚约 70 多年，两书所描述的明代官话调值的细微差异，可能是由于时间不同有变化，也可能是南京辖区内不同区域群体的社会变体。就声调格局看，两书描述记录的明代南京官话声调系统基本一致，由此推测，整个明朝时期通用全国的南京官话声调系统是相当稳定的。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以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1991）等历史资料文献，详细记录了明代全国各地驻军卫所军官的籍贯地，我们查阅研究发现，其中天津三卫、贵州三卫、云南八卫、海南崖州守御所的军官籍贯近一半来南京（南直隶）（曾晓渝 2021：47，119，199-200，257）。明代卫所军户制规定家属从军，由军官籍贯可大致推知士兵家属籍贯，因此推测明代天津三卫、贵州三卫、云南八卫、海南崖州守御所的军屯移民群体内的通用语是南京官话，其声调系统类似于表 1 所示。这里将明代官话与现代相关官话方言代表点的声调系统对比如下。

[2] 赵元任（1930/1980）在表述五度值标记法时指出：“为了避免区分过细，2 度和 4 度除了单独使用和相互配合使用之外，不跟 1 度、3 度和 5 度相配。”这被称之为“双数调原则”（石锋 2020），听感实验证实该原则符合人们的听辨实际。据此，曾晓渝 30 年前构拟的阳平 21、入声 34，分别与高田时雄先生构拟的阳平 11、入声 23，可认为并无本质差别。

表 2：明代南京官话与明代军屯移民后裔语言官话代表点声调系统对比

时代	方言	单字调系统					备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明代	**南京官话**	**33**	**21**	**42**	**35**	**34**	曾晓渝（1992）
		33	**11**	**42**	**24**	**12/23**	高田时雄（2004）
现代	天津话	21	45	13	53		杨自翔等（1999:10）
	贵州屯堡话	55	31	42	35		曾晓渝（2021:184）
	云南昆明话	44	31	53	22		杨时逢（1969:19）
	云南陆良话	44	53	42	24	313	杨时逢（1969:697）
	海南崖城军话	33	31	221	55	324	刘春陶、曾晓渝（2017 调查）

表 2 显示，作为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后裔语言的官话代表点天津话、屯堡话、昆明话、崖城军话的声调系统，与明代南京官话的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如何认识解释这种差异，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海南崖城军话的声调演变

崖城军话是海南岛上的一个很小的官话方言岛，处于海南话（闽语，当地称为客话）、迈话（粤语）、黎语（侍方言）的包围之中，其地理位置如图 2 所示（引自《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B12）。

崖城军话处于海南岛最南端，使用人口约 1 万人。据移民史、人口史以及崖城地方志的考察，崖城军话始于明代，其源头是设置于明代洪武十七年的崖州守御所（千户所）约 3500 军人及家属内部使用的通用语，他们绝大部分（60%）来自南京（南直隶）（曾晓渝 2021：258）。虽然现在当地说崖城军话的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比当地居民高，有明显的优越感，坚守祖先母语的态度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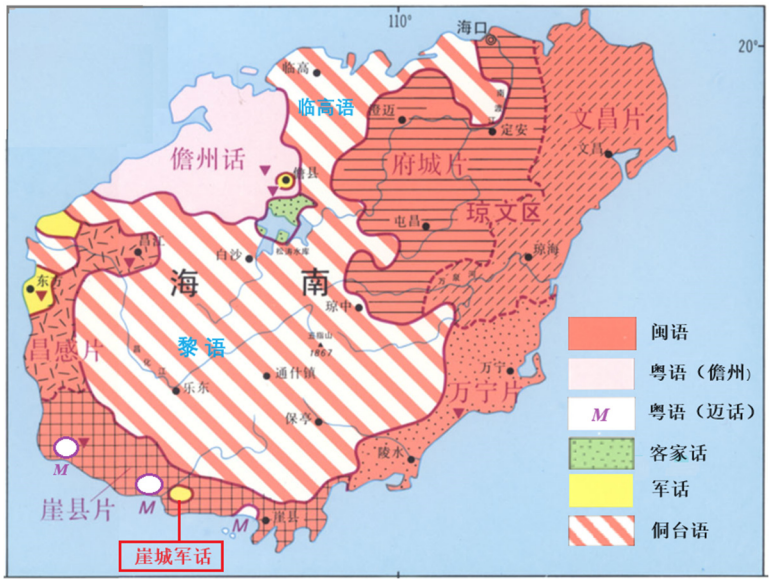


图 2：海南崖城军话位置图

2.1 崖城军话的声调系统

崖城军话的单字调系统：阴平 33，阳平 31，上声 221，去声 55，入声 324，其单字调格局图（图右侧的 1、2、3、4、5 分别代表阴、阳、上、去、入五个调类，后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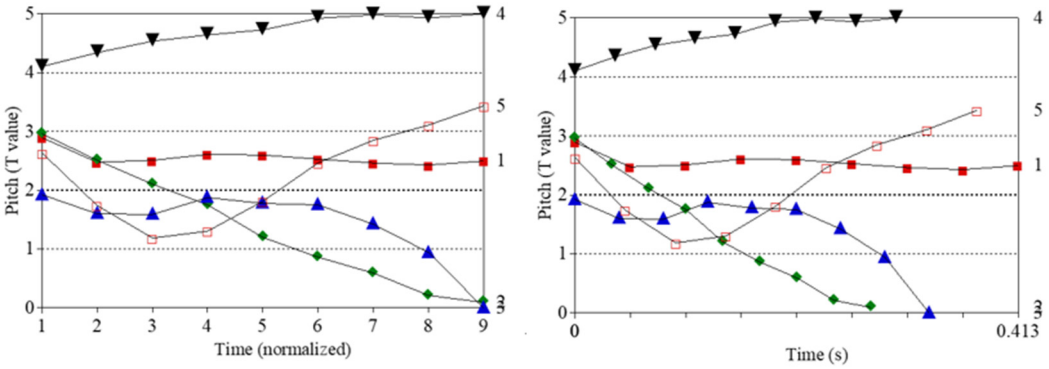


图 3：崖城军话单字调格局图

[3] 海南崖城单字调根据刘春陶 2017 年的调查录音材料，发音合作者是世居崖城的军话母语者洪先生（70 岁）和吴女士（65 岁）；此声调格局图采用洪先生录音材料实验分析。本文采用 Paul Boersma & David Weenink（2020）开发、贝先明和向柠（2020）汉化修改的 Praat 软件。

入声音节在今崖城军话里已失去塞音尾，但往往读作嘎裂调，中间插入喉塞音，尤其女发音人的入声调基本上都是嘎裂调，举例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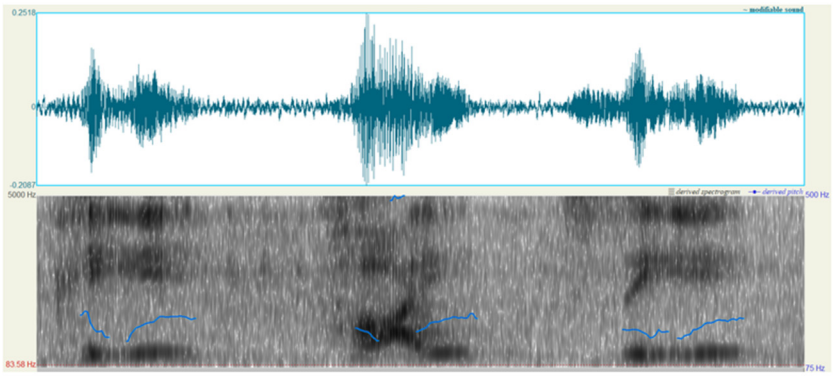


图 4：崖城军话入声调基频曲线举例

崖城军话非轻声两字组连读的声调变化不明显，**舒声调**上声前字变调：221→22/___各调，这可看作是协同发音；**入声调**前字变短：324→4/___非高阶调（阳上入），324→2/___高阶调（阴去）；入声调单念具有紧喉特点，而在连读调中前字变短，这是早期入声音节喉塞音尾的遗存现象。

2.2 崖城军话的声调系统演变

崖城军话的声调系统与明代《西儒耳目资》的调类调值十分接近，比较如下：

表 3：明代南京官话与现代崖城军话声调系统比较

调类	明代《西儒耳目资》			现代崖城军话	历史演变说明
	曾晓渝 1992	高田时雄 2004	格局		
阴平	33	33	中平	33 中平	
阳平	21	11	低	31 降	11>31
上声	42	42	降	221 低	42>221
去声	35	24	高	55 高	35>55
入声	34	12/23	升	324 升	324（嘎裂调）

表 3 显示，崖城军话与明代声调系统相比较，其“高、低、平、降、升”的格局基本未变，其阳、上、去的调值变化：阳 21>31，上 42>221，去 35>55，主要是阳、上调头高低互换变化，这种此消彼长现象可能是在较封闭环境中声调自然演变结果。

关于汉语官话方言单字调值自然演变的方向性，平山久雄（1984，1998）提出了“环流说”（55>53>42>31>213>13>24>44>55）；远藤光晓（2004）根据荔波汉语声调老中青年龄差异现象，发现其调值演变的方向与“环流说”相反（如 55>45>35，113>213>212>21>11）；Yang 和 Xu（2019）也论证了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声调历时演变呈现“顺时针周期”（11/22>32>42>52>55/453>45/35>24/13>323/214>11/22>……），也是与“环流说”（逆时针）演变方向相反。

那么，来看崖城军话声调的音变方向，有符合“环流说”（逆时针）的（42>21，35>55），也有相反的“顺时针”（21>31）。从发音方便考虑，可能先是阳平 21/11 的调头先升高变化，当升至与上声调值发生冲突时，上声调头降低。

2.3 小结

自明代以来，崖城军话在海南岛最南端始终处于优越社会地位，其声调系统基本保持了原貌，也有系统内自然平衡变化（阳平 21/11>21>31,上声 42>21）。声调调值的自然变化既有“顺时针”方向，也有“逆时针”（环流说）方向，究竟朝哪个方向变，取决于发音便利和系统内平衡机制的相互作用。

三、云南官话的声调演变

明代洪武年间，约三十六万南京军屯移民进入云南（曹树基 1997：308），自此云南人口数量剧增，居民族属比例发生根本变化，汉族军户占居民总数百分之七十强（方国瑜 1987/2012：1136-1141），当时广大军户通用语南京官话，即云南官话的源头。

综合方国瑜（1987/2012:1136-1141）记述的洪武年间云南卫所分布地，谭其骧（[第七册]1996:76-77）明代万历年间云南地图中标注的云南卫所分布地，明代云南卫所驻地标注如图 5。



图 5：明代云南卫所驻地分布图

3.1 云南官话的声调系统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 1969）中记录了 1940 年云南官话 101 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就声调系统而言，绝大部分是阴、阳、上、去四调类，古入声归阳平[4]；少数方言点有阴、阳、上、去、入五调类，入声调独立。具体分类如下表：

表 4：《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40 年材料）的声调系统分类

声调分类	调值主要特点（1940 年材料）	备注

[4] 只有盐津一个点入声归去声（杨时逢 1959，1969：1721），盐津靠近四川，入声归派与川南地区入归去的特点一致。对这一特例不计入表 4 中，故表 4 中统计 100 个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共 100 个点）
A 入声归阳平（占 86%）	A-1（阳低上高）	44	31	53/42	24/214		78 个（占 78%）
	A-2（阳高上低）	55	42	32/33	13/213		7 个
	A-3（阴平低降）	31	44	53	35		1 个
B 入声独立（占 14%）	B-1（阳低上高）	44	31	53	35	312/24	4 个
	B-2（阳高上低）	44	53	31	24	312/13	8 个
	B-3（上并阴/阳）	44	42	并阳	35	313	1 个（镇康）
		42	21	并阴	55	24	1 个（丽江）

根据表 4，云南官话各类声调分布如下图 6（采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开发的语言地图软件，底图审图号：高德地图©2023 AutoNavi-GS(2021)6375 号，后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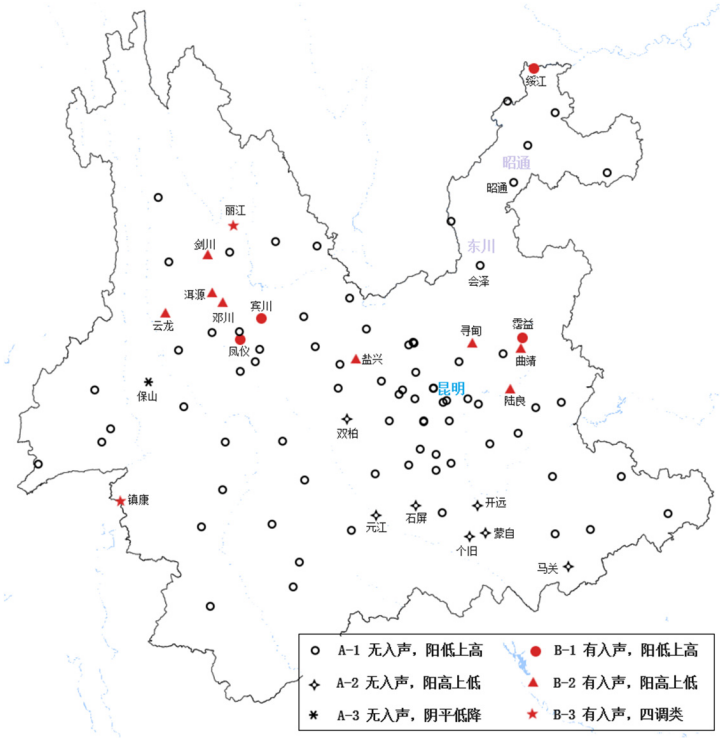


图 6：云南官话声调类型分布图

值得注意的是，图 6 中云南官话保留入声调的方言点分布区域与图 5 明代南京军屯移民卫所驻地分布基本重合。[5]

3.2 云南官话的声调演变

3.2.1 入声调的保留与演变

明代南京官话入声调独立，现代云南官话里只有很少方言点保留入声调类了，对比如下（参见表 3、表 4、图 6）：

表 5：明代南京官话与现代云南官话保留入声声调系统对比

古今声调类别		调值主要特点					备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明代南京官话	1	33	21/11	42	35	34/24	曾晓渝（1992）
	2	33	11	42	24	12/23	高田时雄（2004）
现代云南官话（1940 年材料）	B-1	44	31	53	35	312	**保留明代声调格局**
	B-2	44	53	31	24	312	阳 31>53，上 53>31
	B-3	44	42	并阳	35	313	镇康，傣族聚居区
		42	21	并阴	55	24	丽江，纳西族聚居区

表 5 显示，现代云南官话 B-1 类的声调系统与明代南京官话的声调格局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认为云南官话 B-1 类声调基本延续保留了 600 年前军屯移民祖先语言的声调面貌。而 B-2 类则是在 B-1 类基础上，阳平、上声调头高低互换（阳平 31>53，上声 53>31），这与崖城军话情况相似（见前文 2.2）；B-3 类的两个点比较特殊，调值相近的上声与阳平/阴平合并，这种声调变化很可能是少数民族使用汉语语言接触所致。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 1969）中反映 1940 年云南官话里有 14 个方言点保留入声调，之后《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吴积才 1989）记录的云南官话只有 6

[5] 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1996:76-77），[第八册]1996:48-49），现代云南东北部的东川、昭通地区，在明代属于四川辖区，到清代才划归云南；图 5 中处于东北角属昭通地区的入声绥江点，不在明代云南军屯卫所驻地分布区内，而是与四川南部入声区连成一片，故后文分析排除该方言点。

个方言点有入声调，对比如下表。

表 6：云南官话入声方言点 1940 年到 1989 年异同对比

方言点及分类		1940 年材料（杨时逢 1969）					1989 年材料（吴积才 1989）					备注
		阴	阳	上	去	入	阴	阳	上	去	入	
B-1	霑益	44	42	53	25	312	44	31	53	213		入归阳
	凤仪	44	31	42	35	14	44	31	53	213		入归阳
	宾川	33	42	53	13	31	44	31	53	212		入归阳
	邓川	33	53	31	24	11	44	31	53	213		入归阳
	盐兴	55	53	42	313	31	44	31	53	212		入归阳
	寻甸	44	53	31	13	42	44	31	53	212		入归阳
B-2	曲靖	33	53	42	35	312	44	31	53	213		入归阳
	陆良	44	53	42	24	312	44	53	42	213	312	
	云龙	33	53	31	55	112	44	52	31	45	212	
	洱源	44	53	42	24	21	44	52	31	213	21	
	剑川	44	42	31	45	213	55	42	31	45	21	
B-3	镇康	44	42	并阳	35	313	55	31	42	45		入归阳
	丽江	42	21	并阴	55	24	54	31	42	213		入归阳
其它	绥江	55	31	42	24	33	55	31	42	213	33	明代归四川
	水富						44	31	53	213	33	

表 6 显示，云南官话 1940 年的 14 个入声点 50 年来减少了 9 个。分布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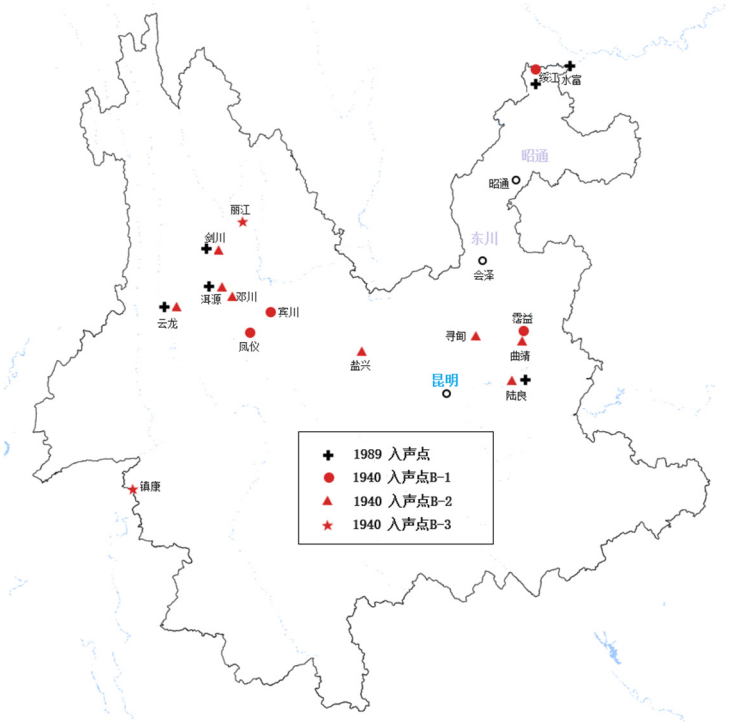


图 7：云南官话入声点 50 年变化分布图

以上表 5、表 6、图 7 说明：

（1）至今保留入声的方言点主要分布在较边缘地区，经济交通相对欠发达。

（2）云南东川、昭通地区明代属于四川，到清代才划归云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1996:76-77，[第八册]1996:48-49），故本文不讨论东北角的绥江、水富两个入声点。

（3）B-3 类的丽江、镇康两个点受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上声归阴/阳平，1940 年有入声，1989 年入声消失，汉语趋同于昆明话；不过，10 年前调查（陈希 2013）丽江老派汉语尚存入声调，但当时已很少人会说老派汉语了。

（4）B-1 类最接近明代南京官话声调格局（见表 5），但如今已全部入声调消失并入阳平调了（见表 6）；再排除受语言接触影响的 B-3 类，所以，只有 B-2 类可进行比较讨论。

笔者 2023 年 9 月调查了 B-2 类的陆良话[6]，下面是陆良一家三代四位的单字调格局的

[6] 发音合作人是世居陆良的一家三代，爷爷老李先生（68 岁），退休干部，大专学历；儿子李先生（38 岁），企业职工，大专学历；儿媳妇冯女士（38 岁），企业职工，大学本科；孙子小李（14 岁），中学生。谨此对老李先生全家的热情支持表示由衷感谢！

绝对时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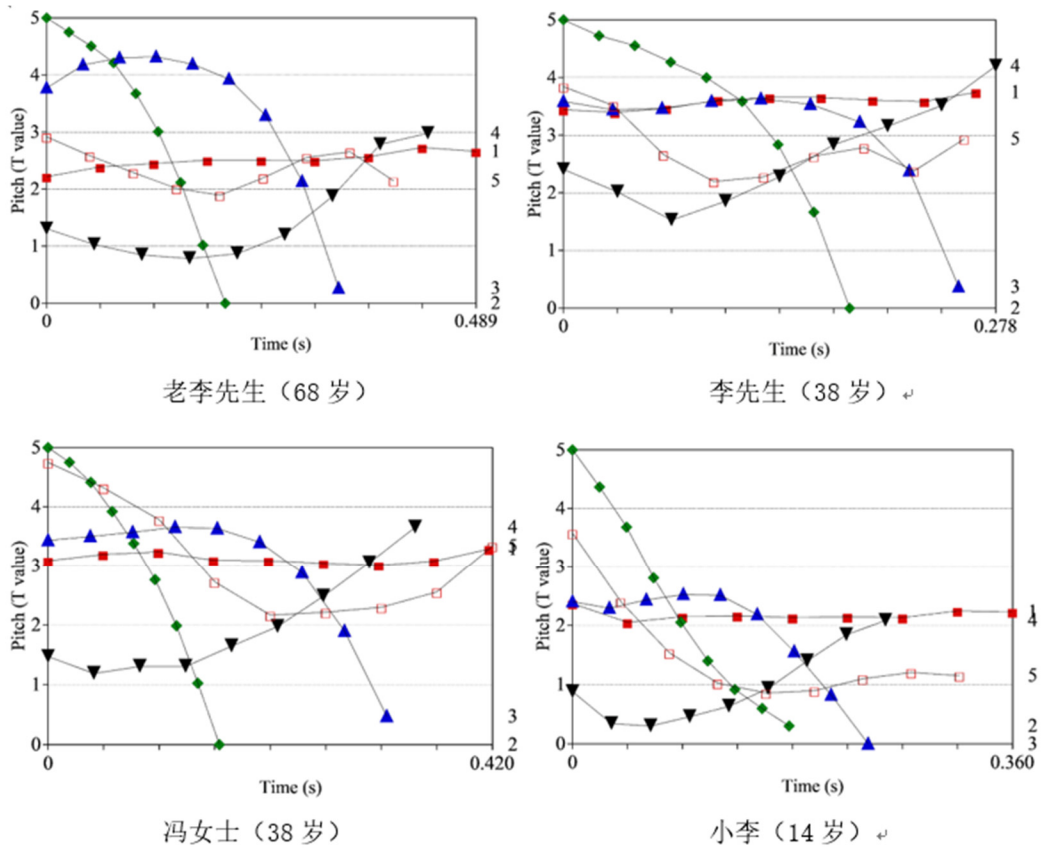


图 8：陆良话声调格局年龄差异对比图

根据图 8 的年龄差异调值比较表如下：

表 7：陆良话单字调年龄差异调值对比

年龄差异		调值主要特点					单字调特点格局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老李先生	68 岁	33	51	441	113	322	阴平：中平 阳平：高降（直降，短） 上声：中降（平降，长） 去声：低平升 入声：中降平
李先生	38 岁	44	51	441	224	433	
冯女士	38 岁	44	51	441	224	533	
小李	14 岁	33	51	331	113	422	

从图 8、表 7 可以观察到，陆良话声调格局各年龄段基本一致，但是入声调头中年、少年有所抬高。

综上，明代云南官话的入声调类到现代依然保留在一些方言点中，根据不同方言点入声调值的差异，推测入声调值的演变链：12>212>312>311>322，其演变方向是与系统内去声调值形成区别对立。

3.2.2 入声调归阳平

入声归阳平是现代主流云南官话的特点，这是因为调值相近的调类合并演变（参见表 5、表 6）。入归阳亦为西南官话的主要特点，有些方言点入归去（川南自贡）、入归阴（川西雅安），也是因调值相近所致（曾晓渝 1998/2004）。

昆明话是主流云南官话的代表，这里将不同学者历年记录的昆明话单字调比较如下：

表 8：昆明话单字调历时记录比较

时间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备注
1940 年	44	31	53	22	归阳	城内，杨时逢 1969:19
1984 年	33	31	52	21	归阳	宜良，远藤光晓 1984/2001:16-32
1989 年	44	31	53	212	归阳	市区，吴积才 1989:20
1997 年	44	31	53	212	归阳	市区，毛玉玲 1997:7，42
2013 年	44	42	53	31	归阳	官渡区，陈希 2013
2018 年	44	31	53	21	归阳	盘龙、五华区，周斯琦 2018
2019 年	44	31	53	212	归阳	盘龙、官渡区，黄利 2019

表 8 显示，80 年来昆明话的单字调格局基本稳定，去声最低，上声起点最高。

3.2.3 阳平调头的抬高变化

在云南官话中，无论是否保留入声调，其阳平、上声基本上都是降调，但存在调头高低的差异（参见图 6）。根据现代云南官话绝大多数阳平调头低于上声，入声调多为 312/21 或归阳平的现象（参见表 4、表 5、表 6），以及陆良话单字调语音实验（参见表 7、图 8），阳平、上声调形时长有差异，阳平直降（短），上声平降（长），由此设想：

（1）早期云南官话阳平为中降调，后来部分方言点阳平调头抬升，高于上声调头，上声的平降调型则相对稳定不变。不过，少数方言点（例如红河地区的蒙自、个旧等）上声调值 50 年来发生了 32>33 的变化。

（2）阳平调值的调头抬高是比较晚近的音变，很可能发生于入声归阳平之后，入声调 312/21 与阳平调值相近而归并，如果阳平调抬高先发生，就不好理解入归阳的现象。当然，在保留入声的系统内也会发生阳平调头抬高的变化，这可能与直降调容易发生调头升高的自然变化相关。

3.3 小结

明代来自南京（南直隶）的数十万军屯移民把南京官话带到云南，云南官话从此形成。在独处一隅的西南边疆，600 年来云南官话声调主要是自然变化，**就调类而言**，其演变分为两类：a. 保留入声调，在现代云南官话方言点中约占 13%，从发展趋势看，这比例会越来越小；b. 入声调归阳平，这在云南官话方言点中约占 87%，此比例还会越来越大。**就调值来看**，总体基本保持原有调形调阶，阳、入调值逐渐趋同合并，部分方言点阳、上调头音高有交替。

表 9：云南官话声调演变小结

调类	明代南京官话		现代云南官话		历时演变
			陆良	昆明	
阴平	33	33	33	44	33>44
阳平	21	11	51	31	①11/21>31；　②31>52
上声	42	42	441	53	①42>441>553；　②441>331
去声	35	24	113	212	24>213>212>113
入声	34	12/23	322	入归阳	①12>212>312>311>322
					②12>11>21>31（同阳平）

四、贵州屯堡话的声调演变

贵州在元代之前属少数民族聚居区。贵州汉语方言的形成，与明代初年贵州建省、

大量汉族军籍移民进入贵州密切相关。《简明中国移民史》（葛剑雄等 1993:387-388）：“洪武十四年（1381 年），蓝玉、沐英等率军进入贵州，设 13 卫、1 所，有军士 10 万多人，合家属则有 30 万人。……明初的军籍移民对于贵州汉族人口的形成至关重要。”从此，贵州汉语方言开始形成。

在明代贵州地图中（谭其骧[第七册]1996:80-81），可以看到贵州军屯移民卫所的分布地带，主要在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下面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贵州各卫驻地的标示图，当时的平坝卫驻地对应如今屯堡话分布区域（贵州中部平坝、安顺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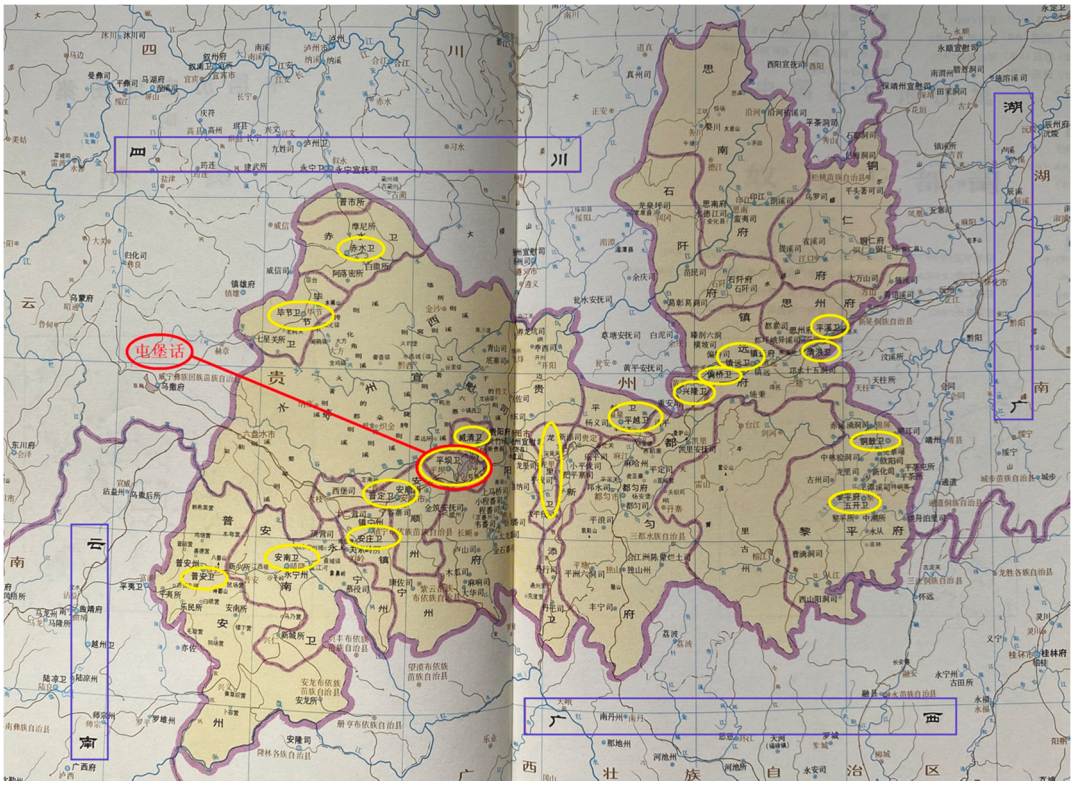


图 9：明代贵州各卫驻军分布图

笔者 2012 年 1 月到贵州中部的屯堡村镇进行实地调查，屯堡村镇的建筑特色是延续明代以来连成片的石砌房，内部相通，对外封闭。



图 10：贵州屯堡村寨石砌房建筑

屯堡人都认为祖先是从明代从南京来的，他们的生活习俗、服饰、语言等与周边汉族、苗族有较大差异。

4.1 屯堡话的声调系统

就语言环境而言，贵州汉语方言均属西南官话（《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2012：B1-12,83），但屯堡话音系的声韵调有诸多异于西南官话的特点，如声母分平翘、入声韵合并、入声调归派等，恰与中原官话固镇话高度吻合（曾晓渝 2021:206-218）。贵州西南官话声调的主要特点是入声归阳平（川黔片、湖广片），或入声独立（西蜀片）。可是，屯堡话却不然，声调系统的特点是“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平”，这在西南官话中绝无仅有，而与遥远的中原官话一致。 由于明代南京辖区内已经存在中原官话（凤阳府为中心）、江淮官话（应天府为中心），由此推测，屯堡人的祖先（明代平坝卫军屯移民）使用的是南京辖区的中原官话，在封闭的生活环境里代代相传至今，换言之，屯堡话源自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的中原官话（曾晓渝 2013，2021:197-206）。[7]

贵州屯堡话的单字调格局如下图：[8]

---

[7] “卫”是明代的一种军事编制，每卫军人 5600 人。明初军户制规定家属必须随军，按一户三口人计算，推知当时平坝卫的军屯移民约 16800 人。《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记录了贵州威清卫、平越卫、安南卫的军官籍贯，其中 42%来自南直隶（其中江淮官话区的多于中原官话区的），可是没有找到平坝卫的档案材料；不过，根据屯堡话声调中原官话的特点，有理由推测平坝卫军屯移民群体主要源自南直隶的中原官话区域。

[8] 2012 年 1 月调查，发音合作人：陈女士，69 岁，贵州平坝县天龙镇人，初中文化，退休小学教师；宋先生，48 岁，贵州安顺西秀区上九溪村人，初中文化，务农。二位声调系统相同，这里采用宋先生的声调格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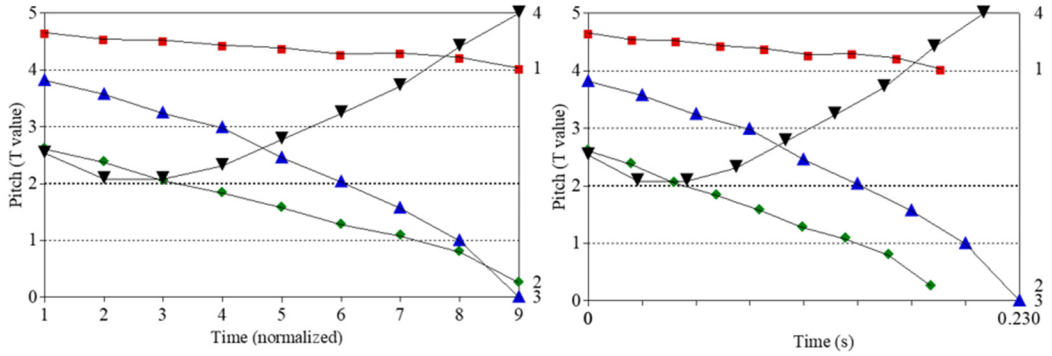


图 11：贵州屯堡话单字调格局

4.2 屯堡话声调系统的变化

4.2.1 单字调的变化

这里将屯堡话、贵阳话、安徽固镇话的单字调作对比：

表 10：屯堡话、贵阳话、固镇话单字调对比

方言点	调类调值					备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屯堡话	55	31	41	35	清次浊归阴，全浊归阳	笔者调查（2012）
贵阳话（西南官话）	35	21	42	213	归阳平	远藤光晓（1984）
	55	21	42	213		李蓝（1997）
固镇话（中原官话）	212	55	24	51	清次浊归阴，全浊归阳	笔者调查（2011）[9]

表 10 显示，屯堡话的单字调格局与贵阳话很相似，但入声调归派不同；屯堡话与固镇四声调值差别较大，可入声调归派一致。这说明，屯堡话的调值已逐渐趋同于贵阳话，但字调归类还坚守着明代源头语言中原官话的底层特点。

这里，从官话方言入声调归派分布图[10]来观察，可以帮助理解屯堡话声调的特殊性及其来源。

[9] 2011 年 7 月调查，发音合作者：王先生，62 岁，专科文化，干部，固镇汪庄子人；华先生，67 岁，初中文化，干部，固镇城关人。两位发音人的声调系统相同。

[10] 官话方言入声归派分布图主要依据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2010）中各个官话分区的方言代表点的声调特征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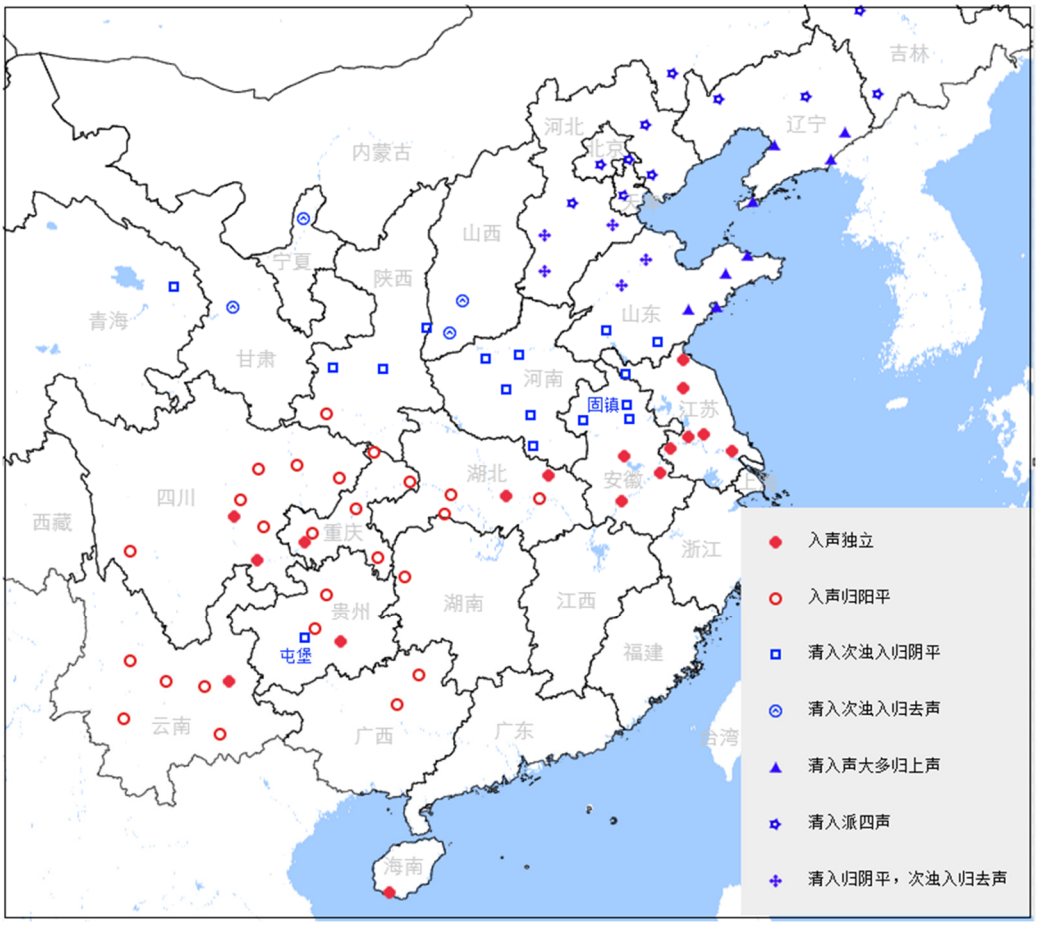


图 12：官话方言入声归派特点分布图

不过，在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下，屯堡话也出现了清入、次浊入读阳平的苗头，笔者调查的安顺上九溪村屯堡话，《方言调查字表》（2002）中 32 个清入声字已有 6 个（“出窄切铁拍发”）阴平/阳平两读，7 个次浊入声字有 2 个（“入纳”）读阳平。此外，再早调查的安顺二铺屯堡话有清入次浊入读阳平、全浊入读阴平的例外现象（涂光禄 1998:120-121）。

4.2.2 关于连字调

屯堡话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与贵阳话、固镇话的比较：

表 11：屯堡话、贵阳话、固镇话连读变调规则比较

方言点	非轻声两字组变调规则	备注
屯堡话 （阴 55 阳 31 上 41 去 35）	上声 41→44/____各调（55，31，41，35）	笔者调查（2012）
贵阳话（西南官话） （阴 35 阳 21 上 42 去 213）	上声 42→55/____各调（35，21，42，213）	远藤光晓（1984）
固镇话（中原官话） （阴 212 阳 55 上 24 去 51）	阴平 212→24/____阴平（212）	笔者调查（2011）

表 11 显示，屯堡话的连读变调趋同于贵阳话，即高降调上声（41/42）前字一律变高平（44/55）；固镇的连读变调则是低调阴平（212）相连前字变中升（24）。可见，连读变调规律与共时单字调调值系统直接相关。

4.3 小结

600 年来，屯堡话一方面保守延续着祖先中原官话入声归派的特点，另一方面在西南官话强势影响包围中，调值逐渐趋同于贵阳话。小结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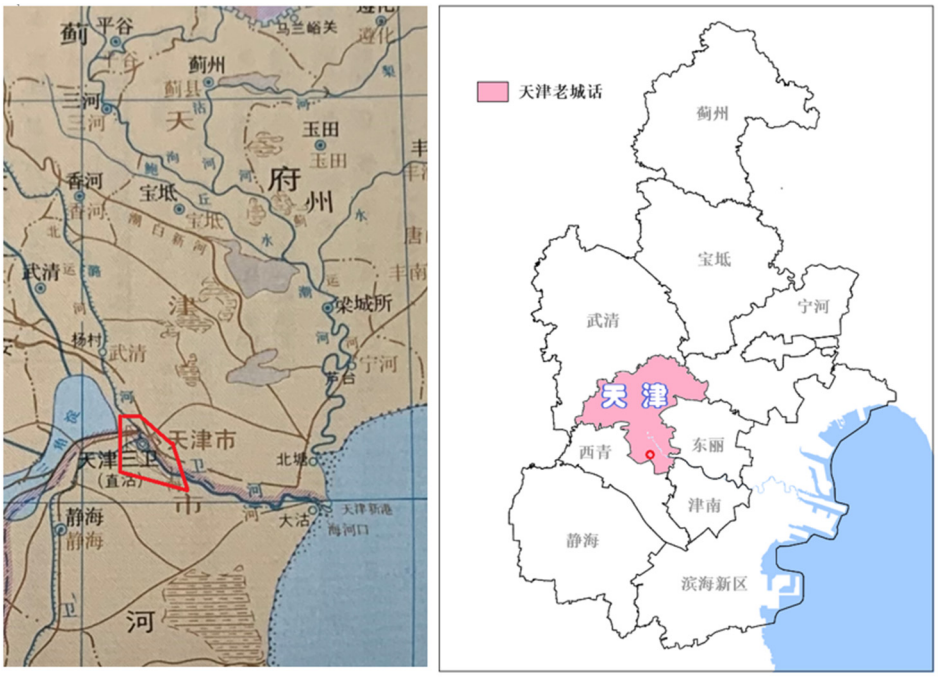
（1）入声字调归类反映底层特点及方言归属；

（2）声调系统中，入声字调归派类别是隐性的，调值是显性的；

（3）调值容易受周边强势方言影响而发生变化；调类则相对保守稳定，但随着语言深度接触也可能逐渐变化。

五、天津话的声调演变

明代永乐二年（1404），天津三卫 5 万余军屯移民开拓筑建天津城（南炳文 2007:387），他们近一半来自南京（南直隶），内部通用南京官话，此即现代天津老城话的源头（曾晓渝 2021:51）。明代地图（谭其骧[第七册]1996：44-45）天津三卫的筑城位置，正是现代天津老城话区域。



明代天津三卫建城位置）　　（现代天津老城话区域）

图 13：明代天津城位置与现代天津老城话区域

5.1 天津话的声调

本文天津话指老城区话。据《天津话音档》（杨自翔等 1999）的录音，其单字调格局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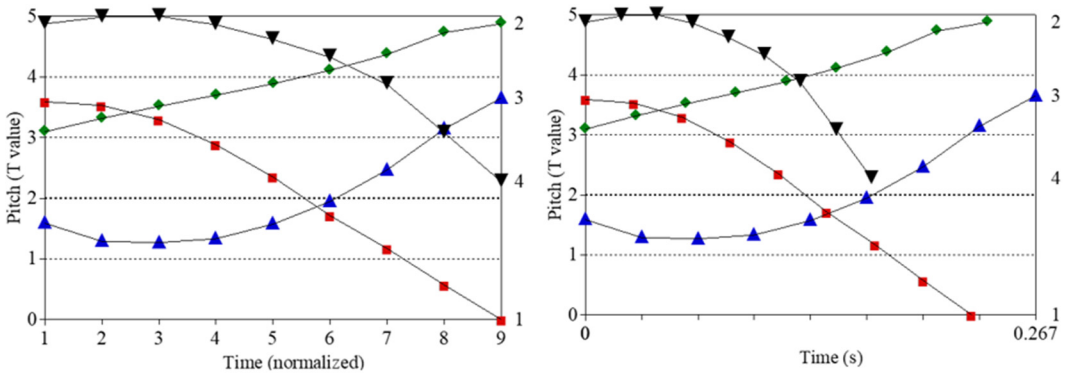


图 14：天津老城话房女士单字调格局（1999）

这里再比较 2019 年调查录音的天津话单字调格局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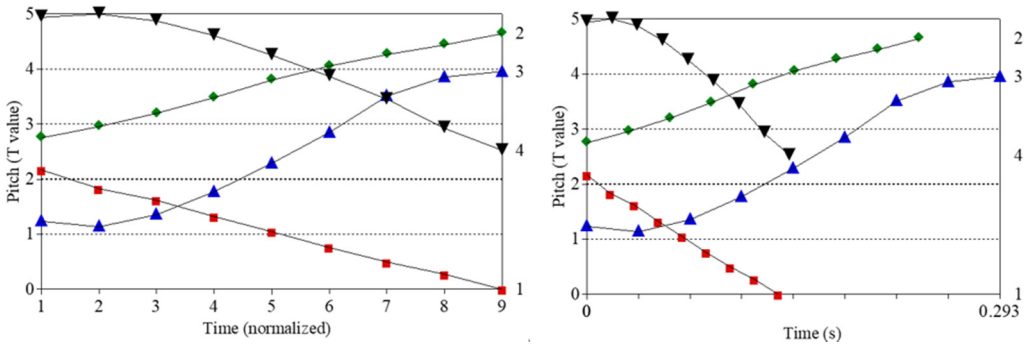


图 15：天津老城话宋先生单字调格局（2019）

图 14、15 的单字调格局基本一致，图 14 的阴平调起点高一些，可能是女性发音人的个体差异。

天津话单字调与周边方言有明显区别。根据杨自翔教授（1980s-1990s）实地调查记录，现代天津辖区内官话方言单字调主要分为 A、B、C、D 四类，分属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的不同小片（依据钱曾怡 2010:10-11），如下表 12：

表 12：天津辖区内官话方言单字调主要分类

类型	单字调主要特点				方言分区小片，主要分布区域
	阴	阳	上	去	
A 类	21	45	13	53	冀鲁官话**天津**小片，市区/老城区
B 类	43	45	213	31	冀鲁官话**定霸**小片，静海
C 类	55	33	213	52	冀鲁官话**蓟遵**小片，蓟州、宝坻、宁河
D 类	55	35	214	51	北京官话**京承**小片，武清

表 12 显示，A 类天津话自成一小片，其单字调调值与 B、C、D 类明显不同，阴平是低降调。虽然如此，天津话却与其他三类一样“入派四声”，这与明代南京官话入声调独立、或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的中原官话入声二分归派（宁忌浮 2009:222）差异很大。那么，天津话声调是如何从明代演变至今的呢？

[11] 2019 年 7 月调查，发音合作者宋先生，72 岁，大专文化，退休干部，天津南开区南市人。

5.2 天津话的声调变化

5.2.1 与相关官话方言单字调比较

这里选取天津话周边及与其声调历史发展相关的 20 个方言点（分属北京、冀鲁、中原、江淮官话）[12]，并用五项特征进行比较：① 阴阳上去调值格局“低高升降”；② 入声三分，清入派四声；③ 入声三分，清入归阴平；④入声二分，清、次浊入归阴平；⑤入声独立。如下表（“+”是，“-”否）：

表 13：天津话与相关官话方言单字调特征共时比较

方言点	调类调值					特征比较					备注
	阴	阳	上	去	入	①	②	③	④	⑤	
天津	21	35	113	53		+	+	-	-	-	冀鲁官话
北京	55	35	214	51		-	+	-	-	-	北京官话
承德	55	35	214	51		-	+	-	-	-	北京官话
沈阳	33	35	213	53		-	+	-	-	-	北京官话
锦州	44	34	213	53		-	+	-	-	-	北京官话
唐山	55	22	213	52		-	+	-	-	-	冀鲁官话
保定	45	22	214	51		-	+	-	-	-	冀鲁官话
沧州	35	54	55	53		-	+	-	-	-	冀鲁官话
石家庄	23	53	55	31		-	+	-	-	-	冀鲁官话
济南	213	42	55	21		-	-	+	-	-	冀鲁官话
济宁	213	52	55	312		-	-	-	+	-	中原官话
阜阳	213	55	24	51		+	-	-	+	-	中原官话
固镇	212	55	24	51		+	-	-	+	-	中原官话
蒙城	212	55	24	51		+	-	-	+	-	中原官话

[12] 本节材料引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其中蒙城、蚌埠、固镇、合肥、南京、安庆方言点是笔者分别于 2011 年 7 月、2023 年 10 月调查所得；方言分区依据《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 2010:10-16）。

蚌埠	21	55	24	53		+	–	–	+	–	中原官话
徐州	213	55	24	51		+	–	–	+	–	中原官话
安庆	31	35	213	52	55	+	–	–	–	+	江淮官话
合肥	21	55	24	53	5	+	–	–	–	+	江淮官话
扬州	31	35	42	55	5	–	–	–	–	+	江淮官话
南京	31	24	11	44	5	–	–	–	–	+	江淮官话

根据表 13，相关方言点的声调特征分布如下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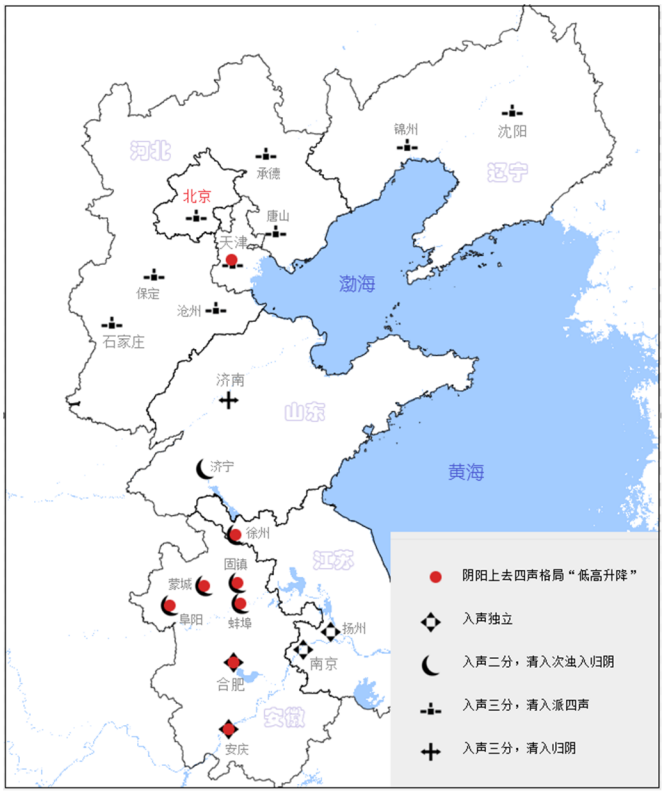


图 16：天津话与相关官话方言点声调特征异同比较图

表 13、图 16 显示，天津话阴阳上去“低高升降”格局与南边安徽中原/江淮官话方言遥相呼应，入声归派则与周边北京/冀鲁官话基本一致，具有南北融合的特点。

5.2.2 与相关官话方言连读变调比较

天津话与相关官话方言的非轻声连读变调规则（排除协同发音，如北京话去声连读“51+51→53+51”等）的比较如下表（注：表中固镇、蚌埠、南京、合肥话的材料为笔者分别于 2011、2023 年调查所得，其余各点引自陈章太、李行健 1996）。

表 14：天津话与相关官话方言连读变调规则比较

方言点		非轻声两字组变调规则	备注
天津话 （阴 21 阳 35 上 113 去 53）		阴+阴 21→113/____21（江山） 上+上 113→35/____113（厂长） 去+阴 53→35/____21（认真） 去+去 53→21/____53（进步）	阴阴→上阴 去阴→阳阴 上上→阳上 去去→阴去
北京	**北京话** 阴 55 阳 35 上 214 去 51	上+上 214→35/____214（水果）	上上→阳上
冀鲁	**济南话**（冀鲁官话） 阴 213 阳 42 上 55 去 21	阴+阴 213→23/____213（公司） 上+上 55→42/___55（土改） 去+去 21→23/___21（大雁）	上上→阳上
中原	**固镇话**（中原官话） 阴 212 阳 55 上 24 去 51	阴+阴 212→24/____212（珍珠）	阴阴→上阴
	蚌埠话（中原官话） 阴 21 阳 55 上 24 去 53	阴+阴 21→24/____21（珍珠）	阴阴→上阴
江淮	**南京话**（江淮官话） 阴 31 阳 24 上 11 去 44 入 5	阴+阴 31→44/____31（生姜） 上+上 11→24/____21（彩礼）	阴阴→上阴 上上→阳上
	合肥话（江淮官话） 阴 21 阳 55 上 24 去 53 入 5	阴+阴 21→23/____31（生姜）	阴阴→上阴[13]
	安庆话（江淮官话） 阴 31 阳 35 上 213 去 52 入 55	阴+阴 31→35/____31（秋收） 去+阴 52→45/____31（电灯）	阴阴→阳阴 去阴→阳阴

[13] 合肥话有老派新派之分，表中是 2011 年 7 月调查老派的，上上连读不变调； 2023 年 10 月调查的 48 岁女性发音人，上声调值 212，上上连读前字变调。

从表 14 可以看出，天津话的连读变调规则也具有南北官话融合的特点。具体说明几点：

（1）凡阴平是低调的方言点，都有“阴+阴”变调规则，这符合 OCP 强制曲拱原则；不过，天津话与固镇、蚌埠、合肥话共有规则“阴阴→上阴”，虽不能证明之间的渊源关系，但也不排除同历史底层的可能性；

（2）天津、安庆有“去阴→阳阴”变调规则，这也许与历史底层相关；

（3）北方区域官话方言的“上上→阳上”多属历史音系规则（参见平山久雄 1998），不受共时调值影响（例如济南话上声 55 调），所以，从上上连读变调看，天津话与北京官话、冀鲁官话有某种底层关联；明代南京官话上声调值*42（曾晓渝 1992；高田时雄 2004），如今南京话的上声 11 调可能是后来变化的，故推测其“上上→阳上”是后起的共时规则。

（4）天津、北京、固镇、蚌埠、合肥、安庆话的去声均为高降调，仅天津有“去去→阴去”变调规则，这体现了天津话的独特创新。

5.2.3 天津话声调的源头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中记录天津右卫军官籍贯近一半来自南京（南直隶，辖今安徽、江苏），其中具体籍贯地多分布于凤阳府（辖今固镇、蒙城、蚌埠，属中原官话）、庐州府（辖今合肥，属江淮官话），约占总数的 67%（曾晓渝 2021：41-44），如图 17 所示（明代南直隶地图引自谭其骧[第七册]1996：47-48，图中标注圆圈的大与小，分别表示军官籍贯地人数的多与少）。

鉴于表 13、14 和图 15、16，同时考虑到天津话阴阳上去“低高升降”格局与安徽中原官话（固镇、蒙城、蚌埠）和江淮官话（合肥、安庆）方言遥相呼应，由此推测，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凤阳府、庐州府的声调系统很接近，而与应天府（辖南京）的有区别，当时传教士记录的全国通用官话声调系统，是以应天府的南京话为准的。

根据传教士记录（参见表 1）以及现代相关方言声调（参见表 13），同时考虑到江淮官话边界线历史上有“北退南进”的发展趋势（参见刘丹青 1997；刘祥柏 2010），明代南京（南直隶）北部的凤阳府有可能还存在江淮官话，拟测如下表：

表 15：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的声调系统差异

方言代表点	声调基本格局拟测					备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凤阳府（辖固镇、蒙城、蚌埠）	21	55	24	51	二分归派/5	中原官话/江淮官话
庐州府（辖合肥） **安庆府**（辖安庆）	21	55	24	51	5	江淮官话
应天府（辖南京）	33	21	42	35	24	江淮官话，全国通用

天津话声调主要源于南京（南直隶）的凤阳府、庐州府区域的中原/江淮官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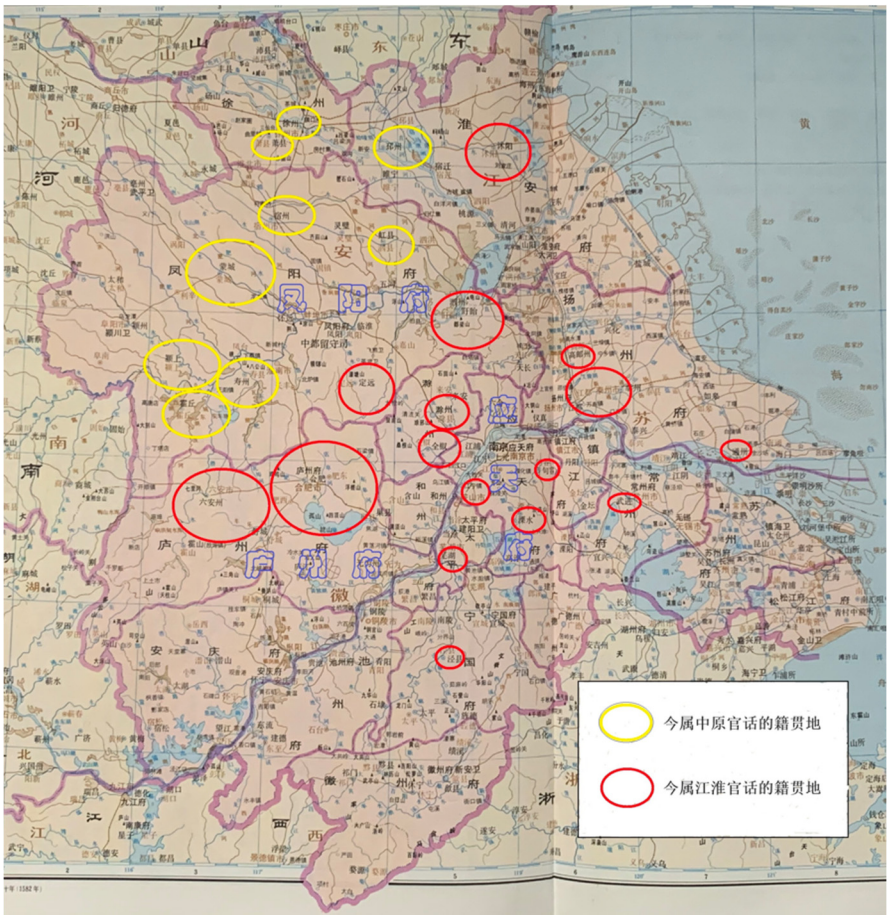


图 17：明代天津右卫军官南直隶籍贯地分布图

5.2.4 天津话声调的接触变异

明朝 200 多年间，天津一直保持卫制，进入这座军事城堡的外来人口很有限。清初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因明末战争和瘟疫，天津人口减至 15,190～18,948

之间。清代雍正至咸丰年间（1723-1860），天津开放为商埠，转型为经济中心，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迅速增长。1741 年到 1846 年，天津城厢区（今老城区）人口从大约 16,000 增至 198,715（参见高艳林 2002：46-70）；到 1909 年，天津城市人口达 42 万（曹树基 2001：790）。由此可知，清末时天津城市居民数量已经变为以外来人口为主。

天津城军事建制长达 320 年，形成了天津人的优越感，也养成了说天津话的鲜明心态。随着天津成为经济中心城市，外来移民成为天津市民的主体，天津话因之发生变化。设想，大量新市民说天津话，他们自觉掌握了天津话调值的显性音征（发音、声学、感知特征）（陈忠敏 2022），却不自觉保留了母语入声归派的隐性特点；同时也不排除北京话的强势影响。于是，清代移民的天津话逐渐覆盖明代老天津话，形成了现代天津话的独特声调：基本保留明代南京（南直隶）官话的四声调值特点，入声归派则被周边北京/冀鲁官话特点裹挟改变，不过，今天津话清入声字多读阴平（曾晓渝 2021：101-103）可能依稀反映中原官话的底层痕迹。[14]

根据艾约瑟（Edkins 1857/1864：18）的记录描述，160 年前天津话四声调值“阴平 11、阳平 35，上声 13，去声 53”[15]，入声调分别归派到阴平、上声等，现代天津城区话的声调格局与之一致。此外，Forke（1894）也描述十九世纪末的天津话四个调类，依照其五线谱图示及说明，四声调值分别是“阴平 41、阳平 35，上声 24，去声 31”，这个声调系统与天津静海话十分接近。清末韵书《韵籁》（188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天津话时音，但声调系统阴、阳、上、去、入五个调类，入声调独立（曾晓渝 2015），这可能是当时天津文人的读书音。

5.3 小结

天津城由明初天津三卫的军屯移民开拓筑建，自 1404 年到 1725 年一直保持军事建制，外来移民很有限。清代中后期天津开埠，由卫制军城转型发展为经济中心城市，周边移民大量涌入，成为天津市民的主体。移民认同并使用天津话，自觉掌握了天津话显性的调值系统，却不自觉保留了母语北京/冀鲁官话入声归派的隐性特点，这样，清代移民的天津话逐渐覆盖明代老天津话，由此形成了天津话单字调值、入声归派、连读变调的南北官话融合的特点。

天津话声调系统是语言深度接触变异的结果。

---

[14] 其他方言旁证：重庆人说普通话，改用北京话四声调值很容易，但入声归阳平难改，“川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入声归阳平。

[15] 艾约瑟的声调描写采用的是一套字母系统（Edkins 1857/1864：13），远藤光晓（2015）将这套字母系统转写为了五度值，在此引用。

六、结语

源自明代南京（南直隶）官话的海南崖城军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天津话，其声调系统的历史发展有不同演变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6：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的声调演变模式

模式	方言点	环境条件	言语群体	演变结果
I 自然演变	崖城军话	较封闭，自身为强势方言	小，内源	基本保持南京官话声调格局
	云南官话	独处一隅，自身为强势方言	大，多内源	a. 基本保持南京官话声调 b. 因调值相近入归阳（主流）
II 自然/接触	屯堡话	较封闭，在强势方言包围中	小，内源	保持南直隶中原官话入声归派特点，调值趋同西南官话。
III 接触变异	天津话	开放都市，紧邻北京话	大，多外源	基本保持南直隶中原/江淮官话阴阳上去调值系统，入声归派趋同北京/冀鲁官话。

最后总结几点：

第一，明代南京（南直隶）辖区内存在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通用于全国的明代南京官话声调系统属江淮官话；缘于军官士兵家乡在南京（南直隶）辖区内的地域方音差异，海南崖城守御所、云南卫所军屯移民群体倾向使用江淮官话声调系统，贵州平坝卫军屯移民群体倾向使用中原官话声调系统，天津三卫军屯移民群体则可能使用凤阳府、庐州府区域的中原/江淮官话声调系统。

第二，外部干扰小、自然状态下的声调演变比想象的慢得多，甚至可能几百年基本保持原有格局（如崖城军话、部分云南官话）。

第三，调值自然演变的方向，既有“顺时针”方向，也有“逆时针”（环流说）方向，演变方向取决于声调系统内部的平衡调节机制。

第四，接触演变中，显性的调值容易改变，隐性的入声字调归类不易改变；浅度接触结果：调值系统易受强势方言影响发生变化，而入声字调归类相对保守稳定（如屯堡话）；深度语言接触结果：作为目标语的调值系统基本保留，但始发语入声字调归类会因言语者过多而裹挟改变目标语的特点（如天津话）。

第五，连读变调规则主要取决于单字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底层。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格局研究”（批准号20AYY020）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曹树基 1997《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五卷）（葛剑雄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曹树基 2001《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　希 2013《云南官话音系源流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上、下）语文出版社
陈忠敏 2022《音类的音征与语音演变》《语言科学》第 6 期
方国瑜 1987/2012《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中华书局
高田时雄 2004《明末官话调值小考》《语言学论丛》第 29 辑，商务印书馆
高艳林 2002《天津人口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 1993《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黄　利 2019《柳州方言合昆明方言语音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尼阁 1626《西儒耳目资》（上、中、下）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年影印
李　蓝 1997《贵阳话音档》，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
利玛窦 金尼阁 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
刘春陶 2011《崖城军话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丹青 1997《南京话音档》，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祥柏 2010《江淮官话》，载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毛玉玲 1997《昆明话音档》，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
南炳文 2007《明史新探》中华书局
宁忌浮 2009《汉语韵书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84《江淮官话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语言研究》第 1 期
平山久雄 1998《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轻声前变调》《方言》第 1 期
钱曾怡主编 2010《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谭其骧主编 1996《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涂光禄主编 1998《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吴积才主编 1989《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杨时逢 1959《云南方言声调分布》，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方言卷（一）》中华书局 2009
杨时逢 1969《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杨自翔 1980s-1990s《天津方言调查资料》（未刊稿）
杨自翔、国赫彤、施向东 1999《天津话音档》，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
远藤光晓 1984/2001『桂林、貴陽、宜良方言の聲調』，『均社論叢』第 15 号；载远藤光晓『漢語方言論稿』好文出版
远藤光晓 2004《从年龄差异归纳音变的方向性——以汉语荔波方言为例》，石锋、沈钟伟主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曾晓渝 1992《〈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语言研究》第 2 期
曾晓渝 1998/2004《重庆方言里古入声字的读音》，《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 1998；收入《语音历史探索——曾晓渝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曾晓渝 2013《明代南直隶辖区的官话方言考察分析》《古汉语研究》第 4 期
曾晓渝 2015《修改本<韵籟>内容初探》，远藤光晓、石崎博志主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曾晓渝 2016《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语言科学》第 2 期
曾晓渝 2021《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接触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 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城市大学 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言语言研究所 2002《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周斯琦 2018《昆明话的语音变异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琼州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Chao, Yuanren（赵元任）. 1930/1980. A System of “Tone-Letters”（一套标调的字母）《方言》第 2 期
Edkins, Joseph（艾约瑟）. 1857.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2nd ed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Forke, Alfred. 18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China Review*

21.3: 181–203

Shi, Feng（石锋）. 2020. On the essential tones in Standard Chinese（试论普通话声调的本调——兼谈五度值记调法的性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 140–157. https://doi.org/10.1075/ijchl.00008.shi

Yang, C. and Xu, Y. 2019. Cross-linguistic trends in tone change: A review of tone change stud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Diachronica* 36.3: 417–459. https://doi.org/10.1075/dia.18002.yan

“肚皮”今昔

汪维辉　卜宇钦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

内容摘要：在汉语史上，总的来说，人和动物的腹部，上古称“腹”，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称“肚”，宋元称“肚皮”，明清则称“肚子”，并沿用至今。现在，“肚皮”一词仍然保留在吴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赣语等汉语方言中。对于“肚皮”一词的共时分布，我们大概可以从移民史的角度作出如下历时解释：宋代“肚皮”在“汴洛官话”中兴起，靖康年间随着宋室南渡被带到了临安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方言中，吴语中的“肚皮”是临安官话影响的结果；元末明初“肚皮”又随着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由湖广方言和赣语进入了四川、重庆等地的西南官话。明代“肚子”在江淮官话中兴起，逐渐取代了“肚皮”，通过江淮官话的通语地位而广泛传播，北方除了部分保守的晋语区几乎都被“肚子”占领，南方只影响到了近江方言。其中，吴语受影响最小，赣语沦陷了一小部分，湘语、徽语则被蚕食殆尽。“肚子”对“肚皮”的替换仍在进行中。

表示｛肚子（belly）｝的词属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词，被 Morris Swadesh 列入 100 核心词表。表示这个概念，汉语历史上发生过从“腹”到“肚”的历时更替，现代方言中因之有“肚”和“腹”两系，“肚”系词项众多，“腹”系则较少。[1]在纷繁多样的“肚”系词中，有一个是“肚皮”，它的历史来源和共时分布很值得探讨。

一、“肚皮”的历史来源[2]

在汉语史上，总的来说，人和动物的腹部，上古称“腹”，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称“肚”，宋元称“肚皮”，明清则称“肚子”，并沿用至今。其中“肚”替换“腹”的过程发生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到了唐代，“肚”取代了“腹”。在口语化程度很高的《王

[1] 参看曹志耘主编（2008）《词汇卷》，069“肚子”地图。
[2] 参看秋谷裕幸、汪维辉、盛益民、沈瑞清（2023）《吴语的肚子义词》，待刊。

梵志诗》里，表示｛肚子｝基本已经是说“肚”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梵志诗》还出现了“肚皮”这一组合，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用例，[3]虽然可能尚未成词（详下）。估计至迟到九世纪中叶，在通语的口语里“肚”已经取代“腹”而成为表示｛肚子｝这一概念的主导词。

“肚”取代“腹”以后，又发生了双音化。其中最主要的是“肚皮”和“肚子”两个词。下面重点讨论“肚皮”。

“肚皮” 最初应该是短语， 指“肚之皮”。目前所知的两个最早用例都见于唐代，[4]一是王梵志诗“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肚皮”虽然可以理解为｛肚子｝，但是解释成“肚之皮”可能更符合原意，当时表示｛肚子｝是单说“肚”。二是敦煌变文《解座文二首》“盖得肚皮脊背露，脚根有袜指头串”，《汉语大词典》用作“腹部；肚子”义的始见书证。[5]这个“肚皮”也可以两解，情况同上。因此这两个早期用例恐怕都还不能看作等同于今天方言中的双音词“肚皮”。[6] 这种可以两解的“肚皮”，宋代以后仍然常见，如：

(1)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过长坑大蛇岭处》)

此例｛肚子｝说“肚”，“肚皮”则指“肚之皮”，故云“裂破”。下面两例的“肚皮”也可以这样理解。

(2)遂呕吐数声，曰：“世间人吃却米粽，教老僧胀破肚皮。”(《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七《佛眼清远禅师语录》)

(3)把那厮剜了眼睛，豁开肚皮，摘了心肝，卸了手足，圪支支拗折那厮腰截骨。(《元刊杂剧三十种·冤报冤赵氏孤儿杂剧》第四折)

不过到了北宋，指｛肚子｝的双音词“肚皮”就出现了，虽然用例还不多。比如下面三例就不能再解释成“肚之皮”：

---

[3] 《汉语大词典》首引《敦煌变文集·不知名变文》：“盖得肚皮脊背露，脚根有袜指头串。”（6·1170），略嫌晚。

[4] 唐李石《司牧安骥集》卷五：“口鼻白色喘息粗，左右摇头颤肚皮。急用妙药针本穴，当时轻快病痊宜。”此例为“腹部；肚子”义。但据邹介正、和文龙（2001：4）考证，现存八卷本《司牧安骥集》卷五中的《黄帝八十一问并序》为明昌壬子年（1192）所写，故卷五为后人增益而成，不可视作唐代语料。

[5] 依《敦煌变文集》题作《不知名变文》，现在一般改题为《解座文二首》。

[6] 汤传扬（2017：74）引陈抟《对御歌》：“争如臣向青山顶头，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看作唐代用例，加按语云：“陈抟乃唐末五代隐士。”但未注明出处。按：目前所见最早收录《对御歌》的资料是南宋祝穆（？-1255）所辑《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一和宋末元初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九。故此例恐不宜视作唐代语料，反映的很可能是南宋口语。

(4)正叔言：某见居位者百事不理会，只恁个大肚皮，于子厚，却愿奈烦处之。（程颢、程颐撰，朱熹辑《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先生语十》）

(5)食时辰，齿生津。输肚皮，亏口唇。（释惠洪（1071-1128）《林间录》卷上）

(6)每恨肚皮从旧窄，而今却做得家翁。（吴芾（1104—1183）《湖山集》卷八《偶苦耳聋》）按：吴芾为两宋之交人。

到南宋就很常见了，禅宗语录如《古尊宿语录》《五灯会元》中尤其多见，例如：

(7)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篾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五灯会元》卷五《药山惟俨禅师》）

(8)上堂："开口是，合口是，眼下无妨更著鼻。开口错，合口错，眼与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说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宽。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开，是山僧寻常用底。敢问诸禅德，刹竿因甚么头指天？力士何故揎起拳？"（《五灯会元》卷十六《智海本逸禅师》）

(9)上堂："结夏时左眼半斤，解夏时右眼八两。谩云九十日安居，赢得一肚皮妄想。直饶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虽然如是，千钧之弩，不为鼷鼠而发机。"（《五灯会元》卷二十《荐福休禅师》）

(10)乃云："此夏居白云，禅人偶聚会。三月九旬中，尊卑相倚赖。粥饭与茶汤，精粗随忍耐。逐意习经书，任运行三昧。彼此出家儿，放教肚皮大。"（《古尊宿语录》卷二十《舒州白云山海会（法）演和尚语录》）

(11)良久曰："你诸人何不与我放下布袋，解开肚皮笑一声子？"（《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九《舒州龙门（清远）佛眼和尚语录》）

(12)且问你：佛向下人作什么模样？不可老僧这里有佛向上人、有佛向下人来向诸人说邪。你若不言，我不可知你肚皮里事也。（《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五《大随开山（法真）神照禅师语录》）

(13)小鬟解事高烧烛，群花围绕樗蒲局。道是五陵儿，风骚满肚皮。玉鞭鞭玉马，戏走章台下。笑杀灞桥翁，骑驴风雪中。（刘克庄《菩萨蛮·戏林推》）

(14)【忆秦娥】似哑子吃了黄柏，教我苦在肚皮里。（《张协状元》第三十九出）

《董解元西厢记》中还有加"儿"尾的用法，如：

(15)【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儿里骨辘辘地雷鸣，眼悬悬地专盼着人来请。（《董解元西厢记》卷三）

(16)谩道不想，怎不想？空赢得肚皮儿里劳攘。（同上）

据上所论可知，"肚皮"唐代偶见，但可能还是短语，北宋成词，南宋普遍行用。

"肚皮"即"肚之皮"，原义是｛肚子的外皮｝。｛肚子｝义的"肚皮"是由肚子

的组成部分指称整体肚子。汉语的身体部位词常有部分＞整体的词义演变发生。[7]

“肚皮”后来在北方话和通语中又被“肚子”所取代。汤传扬（2017）对近代汉语时期“肚皮”和“肚子”的使用情况及地域分布做过考察，我们在此基础上重加调查核实，[8]下面概述主要结论。

唐五代说“肚”，“肚皮”和“肚子”都只是偶见。宋代指腹部“肚”和“肚皮”并存，处于两者更替的过渡阶段，“肚子”偶见，且都是指胃，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时“肚皮”的口语化程度已经高于“肚”，“肚皮里”“一肚皮××”常见，还有“满肚皮”“闲肚皮”等，这些组合中的“肚皮”完全可以换成“肚”。同时“肚里”“满肚”也很常见，那么为什么要说成“肚皮”呢？解释应该是：这些组合的存在意味着“肚皮”已经是口语中的一个常用词，“肚里”“满肚”之类可能已经有词化的倾向了。

此外，“肚皮”在成词过程中可能也受到了“脊皮”的类推。“脊皮”原指“背脊上的皮”：

（17）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欢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三国志·东夷传》）

（18）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后汉书·东夷列传》）

（19）后生为牛马，为人偿宿债，颔穿脊皮断，鼻穴肌肉裂。（《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

后可用以指“背脊”，如张涌泉（2010：238）指出《燕子赋》中“终遣官人棒脊”的“棒脊”在王梵志诗中作“棒脊皮”，《双盲不识鬼》：“赤绳串着项，反缚棒脊皮。”又《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二回：“我只道你做了千年调，永世用不着儿孙，挣的衣裳裹在自己身上，挣得银钱扁在自己腰里，挣的粮米饱了自己脊皮！”[9]

而在唐诗与北宋语料中都有“脊皮”与“肚”“肚里”相对的情况：

（20）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无名氏《嘲伛偻人》）

---

[7] 感谢岩田礼先生函示：“肚皮”＞“肚子”这种变化看来是逆向变化，“肚皮”有理据，而“肚子”是无理据的。多数变化是先产生带词尾的形式，后来才理据化。如表膝盖的词，淮河以南地区的形式多数都以“膝头”为基础，而“膝馒头”“膝头骨”等等都是后起的形式。（2024 年 5 月 16 日电邮）其实短语“肚皮”是有理据的，但是词汇化以后可以看作是无理据了。

[8] 感谢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生戴佳文同学提供帮助。

[9] 《汉语大词典》“脊皮”条引《醒世姻缘传》此例，释作“泛指身躯，此指肚皮”。恐未确。

（21）别人吃饭从脊皮上过，我吃饭从肚里去。（程颢、程颐《程氏外书》）

对于背脊与腹部这两个一前一后的身体部位，背脊称“脊皮”，那指腹部的“肚”称“肚皮”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元代，单用的“肚”已经极少，语素化程度更高，“肚皮”则南北通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出现了 6 例，其中“肚皮里”3 例，“一肚皮”2 例，《元典章·刑部》“肚皮”用例更多，达 39 个。这些充分说明当时的北方话也是说“肚皮”的。“肚子”在元代尚未见于可靠语料。明代以前“肚子”只见到个别例子，如敦煌变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若裹菜蔬三五啖，摩娑肚子饱咳咳”。[10]宋代的少量“肚子”都是指动物的胃，来自古端母，如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有“肚子羹”，宋魏岘《魏氏家藏方》卷七：“右咬咀，同羊肾切细，入在羊肚子中，以线缝肚子口，于净甑蒸。”元杂剧的宾白中有一些“肚子”，可能出自明人之手。明代指腹部的“肚子”开始兴起并逐渐大量使用，对“肚皮”形成竞争，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最终“肚子”在通语中胜出，在《红楼梦》前 80 回中，已经只有“肚子”（15 例）而没有“肚皮”了，正如汤传扬（2017：76）所说：“清代，‘肚子’是北方方言中表‘腹部’的主导词。”“肚子”一词的源生地尚不清楚，有可能是明代南系官话的创新、融合和发扬，理由是：（1）江淮方言背景的《西游记》兼用“肚子”和“肚皮”，两者的出现次数为 16：11，同样具有江淮方言背景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肚子”用得更多，两者之比为 38：10；（2）与《西游记》同时的北系官话语料没有发现“肚子”；（3）明末苏州方言已用“小肚子”指称｛小肚子｝，[11]用“肚皮”指称｛肚子｝。《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等具有明末清初山东方言性质的作品中“肚子”已占绝对优势，“肚皮”大都只出现在“一肚皮”“满肚皮”等固定结构中。苏州方言和山东方言中的“肚子”可能都是江淮官话扩散的结果。

北方方言中“肚子”的“肚”大多来自定母，但也有不少来自端母。江淮官话中，洪巢片为“肚定子”，泰如片、黄孝片为“肚端子”；胶辽官话中，登连片为“肚定子”，青州片为“肚端子”；冀鲁官话中也是二者并存。由此可见今指腹部的“肚子”既有来自“肚定”“肚定皮”的创新形式，也有部分来自原本指胃的“肚端子”。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汉语方言中错综复杂的“肚子”。

综上，｛肚子｝义词的历史演变可以大致图示如下：

---

[10] 汤传扬（2017：73-74）引了他所考察的“40 篇宋元小说话本”中的两例“肚子”，其中例（4）出自《醒世恒言·小水湾天狐诒书》，例（5）未标注出处。我们认为这两个例子的时代难以确定，不能排除明代的可能。

[11] 例如《山歌》卷七《笃痒》：“叫得小阿奴奴小肚子底下、膝馒头上的手掌大介一搭，痛弗痛，痒弗痒。”

腹（唐以前）＞肚（唐五代宋）＞肚皮（宋元）＞肚子（明清至今）

二、“肚皮”的共时分布

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图 069 和其他方言资料，“肚皮”一词在今天的方言中仍有较多分布，主要有两大片，加上一些零星的点。分述如下。

2.1 吴语和江淮官话

“肚皮”在苏南、上海和浙江中北部有成片的集中分布。其中大部分是吴语，包括北部吴语的太湖片和南部吴语的台州片、婺州片、处衢片以及其他。还有目前归属于徽语的浙江淳安、建德、寿昌（旧），吴语学界通常把它们归到吴语。江淮官话则是安徽郎溪。具体方言点见下表。

方言区	省/市	方　言　点	备　注
北部吴语	江苏	启东、海门、张家港、常熟、太仓、江阴、常州、金坛、无锡、昆山、苏州、宜兴、吴江、吕四、丹阳、溧水、通州	溧水“肚皮～肚光=”兼说 通州“肚皮～肚子”兼说
	上海	上海、崇明、宝山、嘉定、浦东、闵行、南汇、青浦、松江、奉贤、金山	
	浙江	嘉善、长兴、嘉兴、平湖、湖州、桐乡、海盐、崇德（旧）、安吉、德清、海宁、孝丰（旧）、武康（旧）、杭州、余杭、临安、於潜（旧）、昌化（旧）、富阳、新登（旧）、分水（旧）、桐庐、萧山、绍兴县、绍兴柯桥、上虞、诸暨、嵊州、新昌、新昌儒岙、宁波、慈溪、余姚、镇海、鄞州、奉化、象山、宁海、舟山	
南部吴语	浙江	天台（台州片）、金华、汤溪（旧）、浦江、义乌、兰溪（以上婺州片）、龙游、丽水、宣平（旧）、景宁（以上处衢片）	景宁“肚皮～肚子～肚屎”兼说

徽语	浙江	淳安、建德、寿昌（旧）[12]	
江淮官话	安徽	郎溪	“肚皮～肚子”兼说
其他	浙江	兰溪诸葛[13]	

值得注意的是“肚皮～肚子”兼说的点，包括属于江淮官话的郎溪，属于吴语的景宁，还有处于交界地带的通州，[14]这些点处于新词和旧词并存的过渡阶段。溧水“肚皮～肚光⁼”兼说，也是新旧词并存，不过“肚光⁼”可能是溧水方言的独立创新（《地图集》中“肚光⁼”的说法只见于这一个点）。

2.2 西南官话和平话

“肚皮”在四川、重庆、贵州有连续性分布，湖南和广西也有个别点，具体方言点见下表：

方言区	省/市/区	方　言　点	备　注
西南官话	四川	成都、北川、平昌、华蓥、盐亭、宝兴、遂宁、资中、泸定、汉源、乐山、富顺、屏山、长宁、古蔺、米易	成都、北川、平昌、华蓥“肚皮～肚子”兼说
	重庆	重庆、大足、武隆、綦江、秀山	重庆“肚皮～肚子”兼说
	贵州	习水、正安、德江、遵义县、铜仁、大方、余庆、镇远、天柱、都匀、荔波、贵阳	都匀“肚子～肚包”兼说
	湖南	桃源	
平话	广西	柳州	“肚皮～肚子”兼说

[12] 这几个点（还有浙江遂安（旧））《汉语方言地图集》归入徽语，这也是目前的一般做法；但是吴语学界多把它们归到吴语。

[13] 指浙江兰溪的诸葛镇，方言归属不明。秋谷裕幸等（2002：3-4）说：“诸葛话与城关话、金华方言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差异似乎超出‘口音’的区别，而是可以视为两个不同的方言。诸葛镇方言的归属尚待进行深入的研究。”

[14] 通州西部部分地区属江淮官话区，其余地区为吴语区。

2.3 赣语

江西中部和西部有些地方说“肚皮”，比如南昌市、南昌县、进贤、万载、新干、吉水、上高，均属于赣语。

2.4 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兰银官话

这些零星分布的方言点见下表：

方言区	省/区	方言点	备　注
中原官话	新疆	吐鲁番	“肚皮子[15]～肚子”兼说
冀鲁官话	山东	莒县	“肚皮～肚子”兼说
兰银官话	内蒙古	阿拉善左	“肚皮～肚子”兼说
	甘肃	高台	“肚皮～肚子”兼说

以上这些“肚皮”的“肚”都来自古定母，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

三、“肚皮”共时分布的成因

柴田武（2018：2）说过：“语言地理学并不仅仅要阐明语言变化的过程，还要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肚皮”在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兰银官话中的零星分布，说明早期中原地区曾经广泛使用这个词。其他方言中的“肚皮”应该来自历史上的中原官话。下面尝试从移民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共时分布。

3.1 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兰银官话

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兰银官话的“肚皮”都只有个别点，呈零散分布，这应该是早期官话区“肚皮”曾经广泛分布的残迹。其中有些点“肚皮～肚子”兼说，这是边缘地区新旧更替慢于核心地区的反映。

3.2 吴语

在吴语中，“肚皮”是明清以来的主导词。

太湖片、婺州片和处衢片吴语的“肚定皮”是后起的，我们认为它是宋室南渡之

[15] 据汪燕洁《安徽贵池傩戏剧本语词研究》（2020 年，第 92 页）说，兰银官话和江淮官话也有“肚皮子”的说法。但是我们暂未查到，不知何所依据。

后，由“汴洛官话”带入到吴语的词，即宋室南渡时从汴京（开封）带过来的。理由如下：

（1）正如上文所示，“肚皮”南宋常用，“肚”单说的例子反而不多；元代“肚皮”还是南北通用的通语词，明代开始才受到新兴的“肚子”挑战并逐步被取代；明代南系官话“肚子”“肚皮”并用。“肚皮”表示｛肚子｝大概是“汴洛官话”的创新，吴语的“肚皮”是其影响的结果。太湖片靖江、吕四和宣州片的“肚端子”以及太湖片的北部方言中指称｛小肚子｝的“小肚端子”可能才是江淮官话扩散的结果。太湖片海门四甲表达{肚脐}用“肚定皮眼子”[du^{21}bi^{35}ŋæ̃^{51}tsɿ^{0}]，但是{肚子}{拉肚子}{肚子痛}均用“肚端子”，也是江淮官话扩散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通州“肚皮～肚子”兼说，但却是“肚定子”[du^{231}tsɿ^{35}]和“肚端皮”[tu^{52}bi^{0}]，这应该是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地带两种形式混杂的反映。

（2）在不少能区分阳上和阳去的方言点中，“肚定”读的是阳去。吕四方言的“肚定”本身就有阳上与阳去两种读法，表示｛怀孕｝的“担肚”tæ̃^{5}du^{4} [tæ̃$^{334\text{-}33}$du^{231}]中读的是阳上调（卢今元 2007：352），而“肚定皮”du^{6}bi^{2}[du$^{213\text{-}11}$bi$^{113\text{-}44}$]中则读的是阳去调；萧山方言单字调区分阳上和阳去，“肚皮”[du^{22}bi^{44}]的变调[22-44]符合“阳去＋阳平”的变调，而与“阳上＋阳平”的[24-21]不同；富阳方言单字调已经不区分阳上和阳去，但不少口语词的变调仍然能区分两者，而富阳的“肚定皮”dʊ^{6}bi^{2} [dʊ^{11}bi^{35}]也是按照阳去变调的，而非阳上。以上变调行为表明，“肚定皮”是外来成分，而不是内部创新的结果。

（3）太湖片表示{肚子}{拉肚子}{肚子饿}{肚子痛}四个概念，只使用“肚定皮”的是杭州、绍兴柯桥和苏州，而杭州和苏州是吴语中受临安官话影响最大的两个城市。在南部吴语中，受临安官话影响比较大的金华和金华汤溪方言中“肚定皮”更常用。这种地理分布，也比较符合宋室南渡对吴语的影响（盛益民 2018），即以杭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各地受影响的程度深浅不一。

（4）着眼于吴语历史文献，明代《山歌》等早期文献里已经有“肚皮”的用例（石汝杰等 2005：157），与上述观点不矛盾。

因此，我们认为吴语早期使用单音节的“肚定”*du^{4}，绍兴以北的太湖片多用方位词结构“肚定里”。后来，杭州一带的吴语从临安官话引进了“肚定皮”。其他地区吴语的“肚定皮”是这个地区吴语的“肚定皮”逐渐替代原来的单音节“肚定”或方位词结构“肚定里”的结果。这一替换过程是漫长的。“肚定皮”至今还没有进入瓯江片，台州片也只有个别点。从吴越等（2012：319-320）对缙云方言的描述来看，婺州片中“肚定皮”一词的历史也缺乏时间深度。可以说，“肚定皮”替代“肚定”

的过程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3.3 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中的“肚定皮”跟北部吴语基本上连成一片，均处于长江以南，应该也是来自“汴洛官话”，理由如下：

（1）据吴松弟（2022：266），南宋时建康府[16]地理位置上处于江淮交会之处，为北人南渡的必经之地，是江南仅次于临安和平江的移民较多的府州。建康曾作为高宗的驻跸地，定都临安后又以其为留都，并屯有重兵，故每个阶段的移民浪潮对建康均有冲击。建炎间金兵曾对建康进行过屠城，人口十不存一，屠城后北方移民开始成为居民主体，《至大金陵新志》卷八引戚氏语：“在宋建炎中，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仕家。视东晋至此，又为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气习大率有近中原。”“肚皮”随着宋室南渡的北方移民由“汴洛官话”而进入江淮官话。

（2）在江淮官话历史文献中，还存在着“肚皮”“肚子”并用的局面（汤传扬2017：75），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明初的江淮官话中，“肚皮”仍然是占据一定地位的词语。随着明代南系官话创新出现了“肚子”，并逐渐取代“肚皮”的地位，“肚皮”就在江淮官话中几乎消失殆尽了。

3.4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的“肚皮”则可能来自于元末明初的湖广方言以及赣语，理由如下：

西南官话中定母仄声字与端母字声母均作[t]，同时浊上归去，“肚”皆读去声，故“肚皮”之“肚”应该也是来自古定母。

（1）从方言地图看，长江沿岸原来应该存在着广泛的“肚皮”分布区，连接着如今的东西两块“肚皮”区域，形成连续性分布。而后，来自江淮官话的“肚子”割断了其领域，将湖北、湖南、江西北部尽皆占领。[17]《地图集》中西南官话“肚皮”的分布与明代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的区域极为相似，大致相当于成渝片加灌赤片与黔北片、黔南片的部分地区。成渝片在民间也被称为“湖广话”，一般认为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崔荣昌 1985；周及徐 2011）。[18]元末明玉珍定都重庆，故元末明初的

[16] 宋时句容属建康府。

[17] 感谢岩田礼先生的提醒。

[18] 对于西南官话的形成时间与形成过程，学界尚有分歧。牟成刚（2016）认为西南官话形成于明末，葛剑雄（2022：105）则认为应形成于明代初年。崔荣昌（1985）指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

湖北移民也大多随之聚集于此，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分布格局，与“肚皮”在西南官话区的分布同样近似。我们认为西南官话的“肚皮”正是来自于元末明初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元末明初，经过宋金、宋元时期的战争，四川人口锐减。据曹树基（2022：135）的统计，四川至元十九年（1282 年）与嘉定十六年（1223 年）的人口数字相比，仅存10%。民国《大邑县志》卷十八李惺《牟氏祠堂记》对此有一段深刻的记载：“蜀处西南陬，代多兵劫，元末重罹其毒，到明末而益甚，十室九空，几于靡有孑遗。计全川之为厅者八，为州者十九，为县者一百十二，顾于其中求一唐宋人家，殆不可得。大抵今日所为土著者，率皆国朝定鼎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上文推得在元代“肚皮”是南北通用的词语，那么元末明初的情形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多。元末明初西南地区的少量残存居民说的很可能本就是“肚皮”，但人口太少，无法形成规模，主要还是应该考虑移民语言的影响。

宋代时，黄州、蕲州[19]是两湖和两淮的门户，为南北必经之地。随着金军到达黄河北岸而后攻占开封，河南的百姓开始大量南迁。端平年间，孟珙守黄州，“边民归来者日以千计”，可知北方移民在黄州当地人口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肚皮”由此随着“汴洛官话”进入黄州地区。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一批移民来自湖北麻城、黄州一带，明初入川移民也以湖北人为主，其中又多为麻城籍（葛剑雄 2022：105）。可见当时不管是军事移民还是民籍移民均以湖北人为主，而湖北移民中又以麻城、黄州为主要来源地，其中既包括麻城、黄州本地人，也包括其他地区的移民在此停留后向四川迁移的。[20]这批移民就将“肚皮”带入了川渝地区。

方志中的许多记载可以佐证我们的推测。清《江津县志》卷十四：“先大父讳大

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周及徐（2013）不同意崔荣昌的观点，他指出：“现代四川方言大致以岷江为界，以东以北地区是明清移民带来的方言，以西以南地区则是当地宋元方言的存留。”据周振鹤、游汝杰（2019：49-50）的研究，西晋永嘉丧乱到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人民大南移在洞庭湖北部形成了西南官话的雏形，“安史之乱”的移民则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到了明清时代，西南官话随着流民和屯垦活动向四川、贵州、云南地区逐步推移，南线到达西南边陲。钱曾怡（2010：375）则认为西南官话是先在四川成形，然后以四川为中心，逐步扩展到湖北、贵州、云南、广西及其他省市的。曾晓渝（2021：164）总结了上述部分观点：“西南官话形成于宋代以荆南为中心的湖广地区，明代随大规模移民‘推平’四川土著语言，清代再一次随移民大潮涌入川黔滇等地，形成如今西南官话方言区格局。”无可否认的是，西南官话的形成与移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元末明玉珍的移民揭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序幕，紧接着便是明初的洪武大移民，最后是明末清初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三次移民都深深地影响并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西南官话。

[19] 即今黄冈、孝感一带。

[20] 多为江西人。

猷，字允轩。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家徽州，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始祖程、辛二府君避乱入蜀，寓渝之巴县双溪蛮洞口，又自巴迁津邑，世居五岔，代有显者。”民国《重修南川县志》卷十二：“况唐宋两朝，均列外戚，[21]姓著上等，仅次皇家。惜宋末元兴，冠冕渐替。然本支迁蜀，始祖派出河南汝宁，籍原麻城孝感，尚能以南宋节度起家侯爵，中州西蜀，光昭远绪。大明一代，一则出崇名宦，一则处祀乡贤，虽公侯将相顿歇无闻，而文彩风流，未尝废坠。”以上两家都是祖籍汴洛，随着宋室南渡而南迁，又自麻城孝感地区入川，正是当时移民浪潮的缩影。

（2）上文已述赣语区也有部分“肚皮”的分布，在明初洪武大移民中，“江西填湖广”也是重要的一章，从黄麻地区入川的湖北人很多就是江西籍。今黄冈族谱中多有“明初奉令从江右迁徙而来”“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黄”等记载。在元代及洪武迁入黄州府宿松县的氏族中，江西移民的比例占到87%左右（曹树基2022：119）。正如葛剑雄（2022：105）所说：“江西方言通过移民这一媒介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官话。”《地图集》中“猪利子‘猪舌头’的婉称”“跳去声，跑”“跳去声，逃”“默想”“青黑”等词都在西南官话与赣语中呈现远隔分布，故西南官话中的“肚皮”可能也有部分来自于赣语。

（3）放眼整个西南官话区，大致呈现出“肚子”对“肚皮”的包围态势，边缘地区用“肚子”，中心地区用“肚皮”，但这并不代表“肚皮”是后起的。“肚皮”在边缘地区尚有残迹，如川北的广元剑阁、达州宣汉表达{肚子}用“肚定子”[tu^{214}tsɿ^{52}] [tu^{214}tsɿ^{53}]，但是{肚脐}用“肚定皮眼”[tu^{214}p^{h}i^{31}iə^{52}] [tu^{214}p^{h}i^{31}iə^{53}]。贵州黔南平塘“肚皮～肚子”[tu^{13}p^{h}i^{53}] [tu^{13}tsɿ^{24}]兼说，表达{肚脐}用“肚定皮眼”[tu^{13}p^{h}i^{53}iɛ^{24}]，{肚子疼}用“肚定皮疼”[tu^{13}p^{h}i^{53}t^{h}en^{53}]，{拉肚子}用“屙肚定皮”[uœ^{44}tu^{13}p^{h}i^{53}]。黔南都匀“肚子～肚包”[təu^{13}tsɿ^{24}] [təu^{13}pau^{44}]兼说，但是{肚脐}也用“肚定皮眼”[təu^{13}p^{h}i^{53}iɛ^{24}]，亦可证西南官话中“肚子”是后起的。重庆、四川成都、华蓥、平昌、北川“肚皮～肚子”兼说，处于“肚子”对“肚皮”的替换过程中。

西南官话北部与东部的“肚子”分布区分别与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湘语的“肚子”分布区相接壤，形成连续性分布。我们认为，这是明代“肚子”的徒步式传播与清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所导致的，清初的湖广等地应该都已被明代兴起的“肚子”覆盖了。从移民分布[22]来看，今重庆东北部与成都及其周边是清代移民最密集的区域，

[21] 即宋高宗赵构生母显仁皇后韦氏一支，韦氏为开封人，下文“南宋节度”指的是韦渊、韦谦等人。

[22] 参见曹树基（2022：91）。

而《地图集》中渝东北的云阳、[23]忠县均说“肚子”，成都“肚皮～肚子”兼说。川北的青川、旺苍也仅说“肚子”，大概是陕西、甘肃两省中原官话“肚子”南进的结果。

（4）历史文献和方言证据已经证明了处于中心地带的“肚皮”不是后起的创新形式，那么就必须回答云南、贵州西南的“肚子”连续分布区域与北方的广大“肚子”连续分布区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是明代南京军屯移民导致的结果。[24]明初，中央政府通过调拨军队戍守屯垦实施了对云南和贵州二地的移民，驻守云、贵的军士以今苏、皖二省籍人为主（葛剑雄 2022：105）。依据曹树基（2022：272）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云南卫所共有士卒约 12 万人，与家属合计，则应有 36 万人口……如果将卫所带管的州县人口合而计之，则属于军籍系统的人口可达 45 万，比民籍人口多出 20 万。”从数量上看，明代南京军屯移民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较云南原住民占显著优势；从集中程度看，军屯移民以卫所的形式分布，集中程度较高；从社会文化看，军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移民主要来自京师，文化上也具有相对优势。总之，明代南京军屯移民对云南的方言影响巨大。曾晓渝、陈希（2017）、曾晓渝（2021）均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可参。故云南、贵州西南的“肚子”应当是来自明代的南京官话。

从《地图集》来看，类似“肚皮”式分布[25]的词语在西南官话中十分常见，如“落雨下雨”“生下蛋”“接娶”“婆婆奶奶（呼称）”“媳妇儿媳妇（叙称）”“脑壳头”“颈项脖子”“胚/麻胚女阴”“扯拔萝卜”“跕蹲下”“柴柴火”等。此外如“猴狲儿猴子”“拴系鞋带”“衣袖袖子”“拈夹菜”“干/口干渴”“看”“睏睡”等，它们的早期分布形式应该也是“肚皮”式分布。这些词语证明了云南与贵州南部和四川、重庆、贵州北部的词汇系统的来源与历史层次复杂。正如曾晓渝、陈希（2017）所指出的，云南官话有许多异于周边西南官话的特点。

（5）在“肚皮”进入西南官话之前，部分地区的“肚”演变为了“肚儿”。据笔者调查，“肚子～肚皮”兼说的重庆巴南人与奉节人、四川江油人均认为“肚子”“肚皮”“肚儿”可以部分混用，但“肚儿”一般只用在“笑得肚儿痛”等固定结构中。重庆璧山表达{肚子}{肚子痛}时用“肚儿”[$tu^{24}le^{31}$]“肚儿痛”[$tu^{24}ə^{31}t^{h}oŋ^{212}$]，是比较古早的形式。重庆南岸、垫江、云阳、大渡口、渝中、合川、北碚表达{肚子}用“肚皮”，{肚子痛}用“肚儿痛”。重庆万州表达{肚子}用“肚子”[$tu^{13}tsɿ^{42}$]，{肚

[23] 据语保工程采录平台，云阳说“肚皮”[$tu^{214}p^{h}i^{31}$]。

[24] 感谢曾晓渝老师的意见。

[25] 即四川、重庆与云南分布着不同的语言形式（贵州有时与川渝相同，有时与云南相同，有时被一分为二）。

子痛}用“肚儿痛”[tu^{13}ɚ^{21}t^{h}oŋ^{24}]。这些“肚儿”都是早期形式的残存。四川内江隆昌表达{肚子}时“肚儿～肚皮”[tu^{13}ɚ^{21}] [tu^{13}p^{h}i^{21}]兼说，但{肚子痛}仅说“肚儿痛”[tu^{13}ɚ^{21}t^{h}oŋ^{13}]，还处于“肚皮”对“肚儿”的替换过程中。

要之，我们认为西南地区早期可能使用单音节的“肚”*du^{4}。“肚皮”在元末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时随着黄麻地区的移民从湖广方言及赣语进入川渝的西南官话，形成以成渝小片为中心的分布格局。“肚子”则随着明代南京军屯移民进入云南等地，而后又在在清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时被各省的混杂移民带入川渝的西南官话，影响的主要是渝东北以及成都等移民密集区。由此呈现出了“肚子”与“肚皮”的竞争态势，“肚子”对“肚皮”的替换也在进行之中。在晚清四川中江[26]方言作品《跻春台》中，“肚子”与“肚皮”之比为 8：2，“肚子”已占绝对优势，如今四川中江已只说“肚子”，不说“肚皮”了。

3.5 赣语

如上所述，江西中部和西部的赣语区南昌市、南昌县、进贤、万载、新干、吉水、遂川、上高都说“肚皮”。它们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推测，应该也是来自“汴洛官话”，理由如下：

（1）秋谷裕幸（2018）指出“肚端”系以双音节的“肚端子”为主，“肚定”则以单说的形式为主。这些情况都表明，在赣语里“肚定”早于“肚端”。宜春上高表示{肚子}用“肚端皮”[tu^{213}pi^{44}]，{肚子疼}用“肚端皮疼”[tu^{213}pi^{44}t^{h}əŋ^{52}]，但是{拉肚子}却说“泄肚定”[ɕiɛʔ^{4}t^{h}u^{52}]，宜春万载表示{肚子}{肚脐}{肚子疼}时都用“肚定皮”[t^{h}u^{51}p^{h}i^{3}]，而{拉肚子}用“泄肚定”[ɕieʔ^{3}t^{h}u^{51}]。可以推知“肚皮”在赣语中也是外来成分。

（2）“肚皮”在赣语中大致沿赣江呈现零散分布，少许分布于锦江周围。今南昌市、南昌县、进贤宋代属洪州；万载、上高属袁州；新干、吉水、遂川属吉州。王洪君（2016）指出，南方吴赣粤客诸方言目前保留的最早的文读层次均为宋朝廷南迁之前的汴洛之音。该层文读的形成与宋朝廷和大量中原人士南迁并长期定居南方有关。宋时江西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且距离首都临安较近，交通方便，故南宋初期江西的移民甚多，时人称“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吴松弟 2022：318）。江西的移民既包括了靖康之役期间北方流民武装和难民的大批涌入，也包括其后各阶段的陆续迁入，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便是隆祐太后率领的南渡官民。

宋室南渡时，中原官吏士民一支随高宗走东南，另一支随隆祐太后走江西。陈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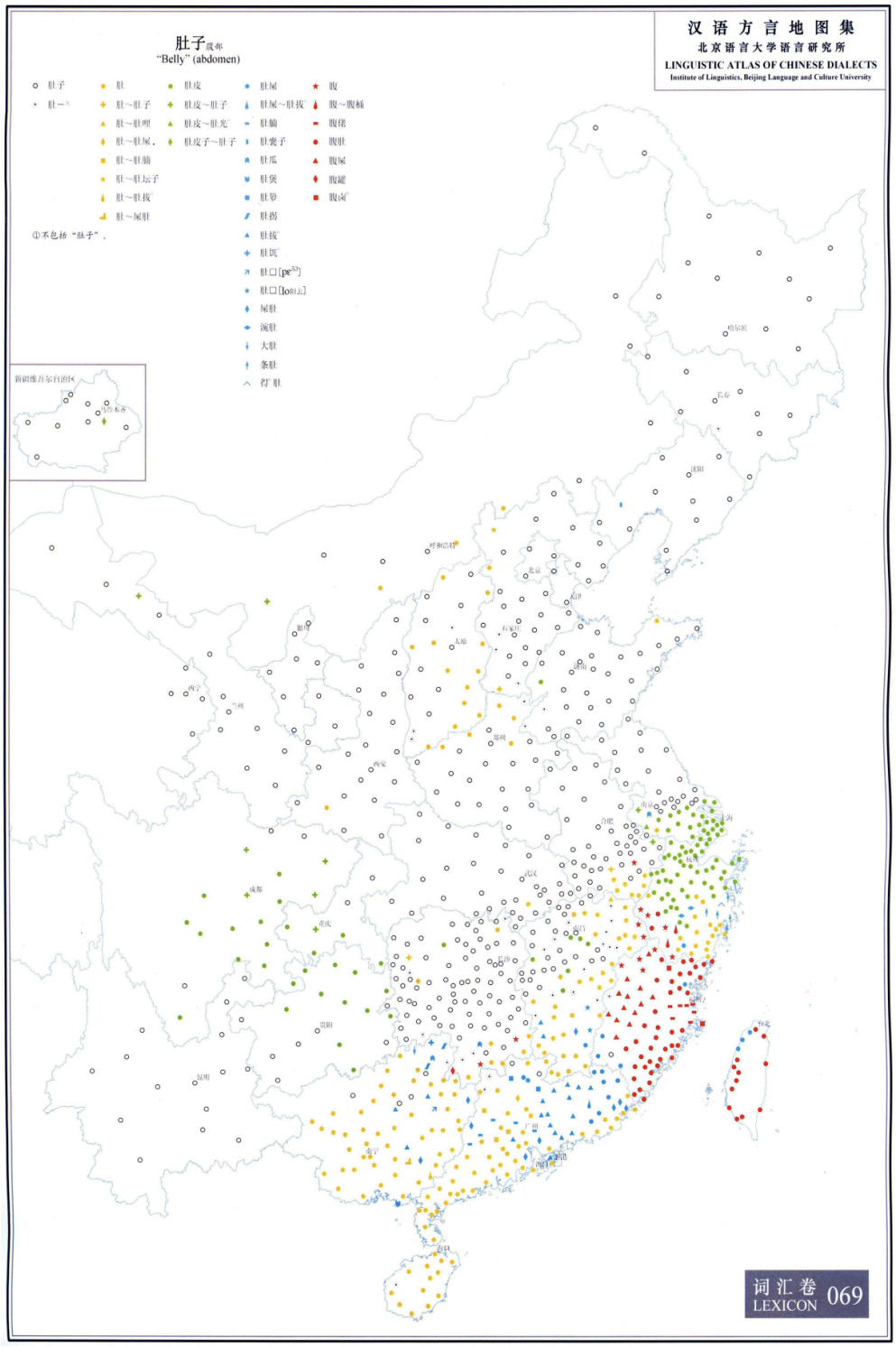
[26] 属德阳市，临近成都。

素（1982）举《宋史·高宗纪》与《三朝北盟会编》认为，建炎南渡很大一部分的官吏士民跟随隆祐太后沿赣江走洪州、吉州、虔州。高宗要求“百司非预军旅之事者悉从”，并在洪州设立了三省及枢密院分部，于是洪州在当时成为了所谓的“临时政府”驻地。建炎三年十二月，隆祐太后离开洪州后金军对洪州进行了屠城，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笔录》：“又见茶司备到仲山公文，称金人已于十二月二十间离洪州，杀城中老小七万余人，由袁之潭矣。”方志与史料中也有不少有关隆祐太后南渡的传说和记载。明《吉安府志》卷一：“十一月，隆祐太后至吉州，金寇追之，吉州陷。”又卷十六：“刚应庙：在县北一里，傍有二石，纵横如柩，旧名石材。宋隆祐太后避敌如赣，维舟岸侧，神现梦曰：‘速行。’后得便风疾去，追者不及，还。后赐额‘刚应’。”清《临江府志》卷三：“暮膳桥：城南五里，宋隆祐孟太后道经此进暮膳，故名。”明廖道南《楚纪》卷五十二：“刘光世，字平叔，保安人，初为兵马都监、蕲州防御使。时隆祐太后在南昌，议者谓金人自蕲、黄渡江，命光世移屯江州为屏蔽。”而在隆祐太后返回临安后，这些官吏士民没有跟随着太后前往临安的条件，又无法北还，除了虔州的一部分人进入岭南，其余都应在江西定居安家了。吉州是南宋初期江西南迁移民进出的中心，跟随隆祐太后溯赣江迁移的移民就是在吉州太和被叛将冲散的。（吴松弟 2022：320）袁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和宗室移民。

综上，我们认为赣语中早期使用单音节的“肚”*du^{4}，靖康之乱与隆祐太后走江西带来了大量的上层非补充式移民，“汴洛官话”的“肚皮”由此进入江西，形成主要沿赣江分布的格局，在洪州等遭遇屠城且士大夫与宗室移民较多的城市扎根并部分保留到现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从移民史角度对今天“肚皮”一词在吴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和赣语中的分布的解释还是初步的，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

附录：《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肚子”地图



参考文献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199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鲍士杰 1998　《杭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重印本），1995 年第二版，北京：语文出版社。

蔡国妹 2016　《莆仙方言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蔡国璐 1995　《丹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主编）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日]秋谷裕幸（主编），曹志耘、[日]秋谷裕幸、黄晓东、[日]太田斋、赵日新、刘祥柏、王正刚（著）2016　《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志耘、[日]秋谷裕幸、[日]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日]柴田武（著）、崔 蒙（译）2018　《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乐素 1982　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第 6 期。

陈　丽、刘祥柏 2020　《安徽芜湖六郎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程　朝 2019　吴语松阳玉岩方言语音词汇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崔荣昌 1985　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第 1 期。

崔山佳 2005　“杜撰”和“肚撰”，《辞书研究》第 2 期。

崔山佳 2011　从《红楼梦》甲戌本的“肚撰”说起，《红楼梦学刊》第一辑。

崔山佳 2023　“杜撰”“肚撰”与“臆撰”，《汉字汉语研究》第 2 期。

[日]大西博子 1999　《萧山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董志翘 200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松熹 1993　《舟山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冯良珍、赵雪伶 2014　《霍州方言研究》，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伏俊连 1994　《敦煌赋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葛剑雄（主编），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安介生、张根富、陈鹏飞（著）2022　《中国移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顾　黔 2015　《泰兴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 2022　《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 12 卷（征求意见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胡　方 2018　《蒲城方言》，北京：团结出版社。
胡　平 2018　汉语人体部位词语义移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胡松柏（主编）2014　《赣文化通典·方言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黄树先 2011　汉语核心词“腹”音义研究，《中文学术前沿》第 2 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黄雪贞 1993　《江永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江蓝生 2010　语词探源的路径——以“买单”为例，《中国语文》第 4 期。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主编）2015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
金　龙、史文磊 2019　说台州方言一类特殊的量名结构，《语言研究》第 4 期。
李　荣（主编），刘村汉编纂 1995　《柳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1997/2003　论音义相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收入其《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晓斌 2005　清代云南汉族移民迁徙模式的转变及其对云南开发进程与文化交流的影响，《贵州民族研究》第 3 期。
李中清、吴宏元 1983　一二五〇年—一八五〇年西南移民史，《社会科学战线》第 1 期。
林晓晓 2011　吴语台州（路桥）方言词汇，《东方语言学》第九辑。
林彦乔 2014　汉语肢体词“腹”“肚（～子）”历时替换研究，《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第 10 期。
刘祥柏 2007　江淮官话的分区（稿），《方言》第 4 期。
刘祥柏、陈　丽 2017　《安徽泾县查济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卢今元 2007　《吕四方言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牟成刚 2016　西南官话的形成及其语源初探，《学术探索》第 7 期。
乔全生（主编）2023　《中国语言资源集·山西·词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曾怡 2019　扬雄“蝇，东齐谓之羊”古今考，《中国语文》第 4 期。
[日]秋谷裕幸 2001　《吴语江山广丰方言研究》，爱媛大学综合政策研究丛书 1（松

山：爱媛大学法文学部综合政策学科）。
［日］秋谷裕幸、赵日新、［日］太田斋、王正刚 2002　《吴语兰溪东阳方言调查报告》，［日］《汉语方言史研究》（2）。
［日］秋谷裕幸 2018a　《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系列之六十，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日］秋谷裕幸 2018b　闽东区方言的“嘴”义词及其相关的词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二辑。
［日］秋谷裕幸 2018c　闽东区方言的“肚子”和“肚脐”，《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
［日］秋谷裕幸、陈泽平 2012　《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邱丽佳 2010　“腹”与“肚”词义的断代演变，《宁波教育学院学报》第 1 期。
阮咏梅 2013　《温岭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沈　明 2012　《安徽歙县（向杲）方言》，北京：方志出版社。
沈　明 2016　《安徽宣城（雁翅）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盛益民 2018　宋室南渡和临安官话对吴语的影响——若干词汇、语法的例证，*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3）。
盛益民、李旭平 2018　《富阳方言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施　俊 2021　《义乌方言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石明远 1995　《莒县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石汝杰、[日]宫田一郎（主编）2005　《明清吴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苏晓青 1996　《徐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增耀（主编）2009　《靖江方言词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汤传扬 2017　《宋元小说话本词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汤珍珠、陈忠敏 1993　《嘉定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1997　《宁波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唐爱华、刘玲燕 2015　《东至龙泉方言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汪高文 2019　《彭泽方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汪　平 1994　《贵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汪　平 2011　《苏州方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汪维辉 1999　《近代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汪维辉 2000/2017　《东汉一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汪维辉 2005　《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中国语文》第 6 期。
汪维辉 2016　汉语“肚子”义词的历史与现状，《长安学术》第九辑。
汪维辉 2018　《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福堂 2015　《绍兴方言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王洪君 2016　普通话审音的一个难点——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历史、现状及思考，《语言规划学研究》第 1 期。
王文胜 2012　《吴语处州方言的地理比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王文胜 2015　《吴语处州方言的历史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　越、楼兴娟（编著）2012　《缙云方言志》，上海：中西书局。
项　楚（校注）1991　《王梵志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谢留文 2018　《江苏高淳（古柏）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留文、沈　明 2008　《黟县宏村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熊正辉 1995　《南昌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徐　越 2016　《嘉兴方言》，北京：方志出版社。
许宝华、陶　寰 1997　《上海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许宝华、陶　寰 2015　《松江方言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颜逸明 1994　《吴语概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　琳 2000　“杜撰”语源考，《古汉语研究》第 3 期。
杨时逢 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姚永铭 1997　试论《慧琳音义》的价值，《古汉语研究》第 1 期。
姚永铭 1999　“杜撰”探源，《语文建设》第 2 期。
游汝杰 2006　合璧词和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倾向，《东方语言学》第 1 辑。
游汝杰 2018　《吴语方言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成材、朱世奎 1987　《西宁方言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张桂权 2005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资源延东直话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张惠英 2022　从汉语方言的“射、污”说起，《方言》第 3 期。
张惠英、顾晓东、王洪钟 2014　《崇明方言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　林、谢留文 2010　《安徽铜陵吴语记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涌泉 2010　《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8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 汉语方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长楫 1998　《厦门方言词典》（第二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及徐2011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层次,《语言历史论丛》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

周及徐 2012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第 3 期。

周及徐 2013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第 1 期。

周　源、屠国瑞（主编）2011　《常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祖谟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北京：中华书局。

邹介正、和文龙 2001　《司牧安骥集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现代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中国境内现代汉语方言各地的持续标记大都属于“著”类持续标记，根据语音的不同，“著”类持续标记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通过分析现代汉语方言“著”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特点，结合[t]和[tʂ/ts]两类持续标记在汉藏语系的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亲属语言中的具体表现，说明不同的语音形式虽然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但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并存，也可以被非汉语借用、从另一个区域（借用区域）得到映证。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组成。和许多语言一样，汉语也有自己独特的语法。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历史悠久，发展到现在，其内部方言形式多样，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罗自群（2023）认为普通话“门开着呢”“他们坐着呢”“他正跑着”中的“着”是表示持续意义的语法标记，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对应形式如“着”“之/子/仔”“倒/到”“哒”“得”“的”“紧/等/稳/餐/恁”“起”“住/居”“[l/n]”等都来自中古附着意义的“著”，这些持续标记总称为“著”类持续标记。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著”类持续标记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

一、现代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基本分布情况

《中国语言地图集》（1990）将现代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平话区等十个区。

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主要是基于语音的标准，“著”类持续标记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关系，既有联系又不完全一致。罗自群（2003）认为，不同的持续标记都有它们一定的通行范围，而这个范围和现有的方言分区有一定的联系，但每一种持续标记往往又不局限在同一个方言区内使用，跨方言区使用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如表 1[1]所示：

[1] “+”表示有，“-”表示无。

表 1：“著”类持续标记在不同方言区的分布

持续标记	官话	吴语	湘语	晋语	闽语	徽语	客家	粤语	平话	赣语	（方言区）
“倒/到”类	+	+	+	-	-	+	+	+	-	+	7
“住/居”类	+	+	+	+	+	-	-	+	+	-	7
“哒”类	+	+	+	-	-	+	-	-	+	-	5
“得”类	+	+	+	+	-	+	-	-	-	-	5
“的”类	+	+	-	+	+	-	-	-	-	-	4
“紧/等/稳/餐/恁”类	-	-	+	-	-	-	+	+	+	-	4
“起”类	+	+	+	-	-	-	-	-	-	-	4
[l/n]类	+	+	-	+	+	-	-	-	-	-	4
零声母类	+	-	-	-	+	-	+	-	-	-	3
“着”类	+	-	-	+	-	-	-	-	-	-	2
“之/子/仔”类	+	+	-	-	-	-	-	-	-	-	2
（种类）	10	8	6	6	5	3	3	3	3	1	-

表 1 中有 11 类“著”类持续标记，从拥有的持续标记类型的多少来看：官话最多，10 类，只是没有阳声韵类；吴语次之，8 类，没有阳声韵类和零声母类；赣语最少，只有 1 类，“倒/到”类。

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住/居”类和“倒/到”类的分布最广，十大方言中的 7 个方言都有这两类。除了官话、吴语、湘语二者都有之外，其他都形成一个互补的分布：“倒/到”类在晋语、闽语、平话中没有，“住/居”类在赣语、客家话、徽语中没有。“着”类和“之/子/仔”类分布的方言区最少，2 个。除了官话以外，晋语有“着”类、吴语有“之/子/仔”类。

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看，不同省、市、自治区里使用的持续标记类型也是有所不同的[2]：

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朝住[tsu$^{45\ 去声}$/tsu^{0}]（朝着）

海拉尔话：坐着[tʂə^{0}]吃比站着吃得劲儿些

呼和浩特话：老张嘞？正跟一个朋友说话的[tə^{0}]嘞

[2] 本文未明确标注出处的，均来自罗自群 2023《汉语方言持续标体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山东沂水话：背着[tʂɔ^{0}]抱着一样沉儿

牟平话：空的[ti^{0}]手儿

济南话：记住（记着）

淄川话：抄着[ə^{0}]手（袖着手）

天津话：[tʂə^{21}/ʐə^{21}/ə^{21}]吃比站着吃好

山西大同话：坐着[tʂəʔ^{32}]吃比站着吃强

武乡话：他点的[tə^{0}]灯作饭咧

晋城话：他正做恁[nə̃^{0}]饭呢

太原话：下班路上就住[tsu$^{45\ 去声}$]（捎带）买上咧，不用专意跑

沁县话：坐勒[ləʔ^{0}]吃比立勒吃好些

陕西西安话：路不远，你走着[tʂɤ^{0}]去//链住[pfu^{0}]（连续，不间断）

汉中话：走到[tau^{0}]去

甘肃宕昌哈达铺话：他正上课着[tʂɤ^{0}]嘞

文县城关话：坐倒[tau^{0}]吃比站倒吃舒服

青海西宁话：想着[tʂɔ$^{53\ 上声\sim0}$]说，耍抢着说//家（他）对住[tʂʰu$^{213\ 去声}$]我着笑哬

河南洛阳话：你扶着[tʂə^{0}]墙站那儿

郑州话：请他捎带着[tsu^{0}]（顺便）给我买本书

获嘉话：他在门儿外头站的[liʔ^{0}]

湖北襄阳话：他站子[tsʅ^{0}]在

武汉话：他站倒[tau^{0}]说

荆沙话：我把鞋子倒穿起[tɕʰi^{0}]，只见去了不见来

房县话（桃源）：坐住（坐着）

重庆话：生起[tɕʰi^{0}]病都坚持上班//围倒锅边转

四川松潘话：坐住（坐着）

成都话：他说倒[tau$^{53\ 上声}$]说倒就哭起来了//趴起[tɕʰi$^{53\ 上声}$]睡

贵州贵阳话：看倒[tau$^{53\ 上声}$]你的面子才借给他//坐起[tɕʰi$^{53\ 上声}$]吃

云南路南话：坐着[tʂo$^{44\ 阴平}$]

永胜话：读倒读倒就睡着了

永富话：门还锁起的

石屏话：坐□[lo$^{\ 阴平}$]

安徽巢县话：坐吱[tʂʅ^{3}]不如站吱

宿松话：坐倒[tau$^{51\ 上声}$]喫

湖南临武官话：坐着[tso$^{11\ 阳平}$]吃好，还是站着吃好

长沙话：看到[tau$^{41\ 上声}$]看到天就亮哒//讲餐[ts^{h}an^{0}]讲餐笑起来哒

江永土话：义老大再复记倒[lau$^{35\ 阴上}$]了“好吧”

益阳话：抿起[tɕ^{h}i$^{41\ 上声}$]嘴巴笑//他讲住[tɕy^{0}]讲住哭起来哒

江西湖口话：坐着[tʂo^{35}]

南昌话：省吃俭用掐到[tau^{0}]（抠着）赌

于都话：佢正食紧[tɕiẽ$^{35\ 上声}$]饭，唔要吵佢

清溪话：徛儿[e^{0}]食（站着吃）

江苏徐州话：抿着[tʂou^{0}]个嘴笑

南京话：你站倒[tɔo$^{44\ 去声}$]，后面人看不见了

扬州话：谈著[tsu^{0}/tɔ^{0}]话

苏州话：对牢[læ$^{13\ 阳平}$]（对着）

上海话：坐仔[zɿ$^{13\ 阳舒}$/tsɿ$^{55\ 阴上}$]吃比立仔吃适意//（嘉定）话：闭牢[lɔ$^{31\ 阳平}$]眼睛

浙江宁波话：嘴巴扪仔[tsɿ$^{35\ 阴上}$]笑（手掩着嘴笑）//头莫抬介高，伛倒[tɔ$^{35\ 阴上}$]（弯曲，低下头）眼

海盐话：墙头浪贴起[tɕ^{h}i^{213}]张地图霍（墙上贴着一张地图）

杭州话：你坐牢[lɔ$^{213\ 阳平}$]不要动

福建厦门话：顺着[tioʔ$^{55\ 阳入}$]（沿着）河仔墘（河边）行//徛咧[le^{0}]讲

连城话：渠侪举稳[vaŋ^{51}]定伞得街上行

建瓯话：操住[tiu$^{55\ 阳去}$]手（叉着手）

宁德话：徛咧[e^{0}]讲

广东广州话：梳住[tsy$^{22\ 阳去}$]两条辫仔（梳着两条小辫儿）//佢冲紧[kɐn$^{35\ 阴上}$]凉，唔该你等阵（他正在洗澡，请你等一会儿）

南雄珠玑话：坐倒[tau$^{31\ 上声}$]来食还是徛倒来食好

乐昌长来土话：坐起来食（坐着吃）

广西柳州话：张老师上到[ta$^{54\ 上声}$]课，你等一下子

南宁平话：你等下，我打紧[kən^{0}]电话（我正打着电话）//渠讲住[tsy^{0}]话，冇得闲（他正说着话没有空）

临桂平话：披起[hi$^{53\ 上声}$]个头毛（披着头发）

各地通行的持续标记类型不一样，持续标记种类最多的是湖南，有 6 种。如表

2[3]所示，至少有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tʂ/ts]类持续标记，有 19 个有[t]类持续标记，有 13 个有“住”类持续标记[4]，有 9 个有“起”类持续标记，有 7 个有“等”类阳声韵持续标记，有 5 个有零声母类持续标记：

表 2：“著”类持续标记在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分布

地名/类别	[tʂ/ts]	[t]	紧	起	住	[l/n]	零声母	种类
湖南	+	+	+	+	+	+	-	6
山西	+	+	+	-	+	+	-	5
福建	-	+	+	-	+	+	+	5
山东	+	+	-	-	+	-	+	4
湖北	+	+	-	+	+	-	-	4
云南	+	+	-	+	-	+	-	4
江西	+	+	+	-	-	-	+	4
江苏	+	+	-	-	+	+	-	4
浙江	+	+	-	+	-	+	-	4
广东	-	+	+	+	+	-	-	4
广西	-	+	+	+	+	-	-	4
内蒙古	+	+	-	-	+	-	-	3
陕西	+	+	-	-	+	-	-	3
河南	+	-	-	-	+	+	-	3
四川	-	+	-	+	+	-	-	3
天津	+	-	-	-	-	-	+	2
重庆	-	+	-	+	-	-	-	2
青海	+	-	-	-	+	-	-	2
甘肃	+	+	-	-	-	-	-	2
安徽	+	+	-	-	-	-	-	2
上海	+	-	-	-	-	+	-	2
贵州	-	+	-	+	-	-	-	2

[3] “+”表示有，“-”表示无。

[4] “住/居”类持续标记的简称。下文同。

另外，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宁夏等地只有[tʂ/ts]类持续标记，新疆只有[t]类持续标记，香港只有“等”类阳声韵持续标记，而海南的持续标记是浊声母的。

二、现代汉语方言“著”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特点

2.1 声母方面形成了一个[t]和[tʂ/ts]的对应态势

以“着”为代表的[tʂ/ts]类声母的持续标记主要分布在北京、黑龙江、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包括了官话（如北方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等）、晋语、湘语、粤语等。分布区域非常广泛。“之/子/仔”除了分布在东北官话区及山东境内，在声母[tʂ/ts]和[t]两类持续标记分布区之间狭长的交界地带上，从东部的上海，到安徽，再到中部的襄阳，直至西部的宁夏断断续续地散布着。

以“倒”为代表的[t]声母的持续标记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湖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官话（如东北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晋语、湘语、赣语、吴语、徽语、粤语、客家话等。分布区域也非常广泛。还有“哒”“得”“的”几类持续标记的地理分布，一方面与“倒”类持续标记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比“倒”的分布范围更广。这几类，看似零星，实则难舍难分。

“倒”类持续标记和“着”类持续标记在中、东部形成南北对峙的两大分支，前者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者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从北到南，既有[t]分布区的和[tʂ/ts]分布区的对应，又有一个方言区域内部、一个方言点内部的[t]和[tʂ/ts]的对应（如宁夏中宁话的“着[tʂɿ^{0}]/ [ti^{0}]”）。

“住/居”类持续标记的分布范围也比较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青海等都有。

“起”类持续标记的主要分布在湖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南等省市，包括西南官话和湘语。“起”类持续标记的分布范围相对比较集中。

以“紧/等/稳”为代表的阳声韵类持续标记主要分布在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自治区，包括客家话、粤语、平话等，“餐”主要分布在湖南的湘语区内。

另外，韵母方面，形成了入声韵和非入声韵、齐齿呼和开口呼等的对应。声调方

面，形成了入声调和舒声调、轻声和非轻声的对应。这里不再赘述。

2.2 有不少地方两种及以上种类的持续标记并存

“著”类持续标记的分布比较复杂，一方面，同一种持续标记可以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区域通行，一个方言点只有一种持续标记，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同时有两种及以上种类的持续标记并存现象（如表 3）。

表 3：不同的“著”类持续标记在同一地方并存的情况

编号	组合类型	方言点举例	种类
1	着 1—着 2	山东德州话、陕西户县话	1
2	着—子	北京话、山东即墨话	2
3	着—倒—起	湖南宜章赤石土话、临武官话	3
4	着—哒	江苏丹阳话	2
5	着—得	陕西神木话	2
6	着 1—（着 2）—住 1—（住 2）	青海西宁话、陕西西安话、山西万荣话、河南郑州话	2
7	着 1—（着 2）—Ø	天津话、山东博山话	2
8	子—倒—的—[l/n]	浙江宁波话	4
9	子 1—（子 2）—倒	湖北襄阳话、江苏南京话	2
10	子—的	宁夏中宁话	2
11	子—哒—[l/n]	江苏苏州话	3
12	子—哒	江西永新话	2
13	子 1—子 2—[l/n]1—[l/n]2—[l/n]3	上海话	2
14	倒 1—倒 2—倒 3—起	湖北荆沙话	2
15	倒 1—倒 2	湖南沅陵乡话	1
16	倒 1—倒 2—的—起	湖南常德话	3
17	倒—哒	湖北阳新话	2
18	倒—哒—起	湖南浏阳话	3
19	倒—哒—餐—起	湖南长沙话	4
20	倒—得	湖南华容话	2
21	得—起—住	湖南娄底话	3

22	倒—的—起	湖南吉首话	3
23	倒—起	湖北长阳话、四川成都话、贵州贵阳话、江西婺源话、湖南岳阳话、石门话、祁阳话、隆回话、绥宁话、安乡话、溆浦话	2
24	倒—起—住	湖南汝城话	3
25	倒—餐—起	湖南韶山话、攸县话、安仁话	3
26	倒—紧	湖南酃县话、广东乐昌皈塘土话	2
27	倒—紧—住	广东信宜话	3
28	倒—稳	江西修水话	2
29	倒—稳—紧	江西石城（龙岗）话	3
30	倒—住	江苏扬州话、湖南平江话	2
31	倒—Ø	江西黎川话	2
32	哒—得—[l/n]	浙江温州话	3
33	哒—起	湖北张家界话、湖南衡阳话、辰溪话、常宁话、汨罗长乐话	2
34	哒—餐—起	湖南湘潭话	3
35	哒—起—住	湖南湘乡话、衡山话	3
36	哒—餐—起—住	湖南益阳话	4
37	得 1—得 2—得 3	浙江绍兴话	1
38	得—的—起	湖南东安土话	3
39	得—起	安徽休宁话、湖南涟源话	2
40	得—[l/n]	安徽黟县话	2
41	得—的	山东牟平话	2
42	起—[l/n]	湖南江永土话	2
43	稳—紧	广东连平话、江西于都话	2
44	紧—[l/n]	湖南嘉禾土话、嘉禾话	2
45	住—得	山西太原话	2
46	住 1—住 2—紧	广东广州话、增城话、广西南宁话	2
47	住 1—住 2—[l/n]	海南屯昌闽语	2

表 3 给我们呈现的是现代汉语方言“着”类、“子”类、“倒”类、“哒”类、“得”类、“的”类、“稳”类、“餐”类、“紧”类、“起”类、“住”类、[l/n]类及零声母类（用 Ø 表示）持续标记在同一个方言点并存的各种组合类型。

表 3 有 14 种持续标记在不同的方言中，要么和自己同类的另一种语音形式的持续标记并存，要么和其他一类或两类、三类的持续标记并存，这样，最少的有一类持续标记（如德州话、户县话、沅陵乡话、绍兴话），最多的有 4 类持续标记（如宁波话、长沙话、益阳话、），一共有 47 种组合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有 17 种组合类型（编号 3、14~20、24、30、31、33~35、37、41、43）只有湖南话的用例[5]，还有 4 种组合类型（编号 25~27、38）有湖南话的用例，说明湖南这一地域内的持续标记种类多、搭配方式多样，表达方式更丰富。

三、现代汉语方言两类持续标记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中的表现

罗自群（2023）认为：来源于“著”的持续标记中古时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古去声的“著”（古知母、遇摄、御韵、合口、三等），另一个是古入声的“著”（古澄母、宕摄、药韵、开口、三等）。而古上声的“著”（古端母、遇摄、语韵、合口、三等）和古入声的“著”后来合流了。现代汉语方言的“著”类持续标记语音形式多样，不同的语音形式是“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具体表现。“著”是古知组声母字，所以，[t]类声母持续标记产生在前，[tʂ/ts]类声母持续标记出现在后，二者历史层次不同。

上文提到，“著”类持续标记的声母方面形成了一个[t]和[tʂ/ts]的对应态势。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鉴于千百年来汉语和周边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一直持续着，我们在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里，也发现了一些与[t]和[tʂ/ts]两类“著”类持续标记相对应的持续标记。

3.1 [t]类持续标记

3.1.1 [t]类持续标记之一：[to]类

[to]类持续标记在藏缅语族（如柔若语、基诺语、景颇语、浪速语、勒期语、土家语等）、苗瑶语族（如苗语、炯奈语等）、壮侗语族（如侗语、茶洞语、仫佬语等）一些语言中都有所发现：

[5] 这里没有包括衡阳话的[ta$^{33\,上声}$]和[ta$^{22\,入声}$]。

柔若语：[6]

tu^{55} ŋa^{53}mi^{31} iɯ^{33} tɷ^{53}. 他正在打瞌睡。

他 瞌睡 打（助词）

柔若语有一些带 tɷ^{53}、tɷ^{13} 的词语，如“lɛ^{53}tɷ^{53} 躺、ta^{13}tɷ^{53} 依偎、tɕa^{13}tɷ^{13} 连接（绳子）、thɔ^{55}tɷ^{13} 举（石头）、tha^{55}tɷ^{13} 顶、tɕhɔ^{55}tɷ^{13} 撬（用棍子）、kho^{33}tɷ^{13} 系（腰带）、ʔua^{53}tɷ^{13} 穿（衣）、tɯ^{55}phu^{33}tɷ^{13} 涨（价）、lio^{55}tɷ^{13} 吊（灯）、lue^{55}tɷ^{13} 卷、lua^{55}tɷ^{13} 移动、tɯ^{31}tɷ^{13} 凝固、vu^{55}tɷ^{13} 长（大）”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具有持续性的动词后面带 tɷ^{53}、tɷ^{13}。

攸乐基诺语：[7]

a^{33}phi^{44} mi^{54}tshɔ^{54} phju^{44} tɔ^{54}. 奶奶在晒太阳。

奶奶 阳光 晒 倒

景颇语：[8]

Nan^{55}hte^{33} ndai^{33} ko^{ʔ55} hkum^{31} a^{55}ga^{31}leng^{31} to^{33} yo^{51}. 你们别老躺在这里哟。

你们 这 里 别 老躺 （助动）（语气）

载瓦语：[9]

vaʔ^{21} xji^{51} tu^{21} ki^{21} kiŋ^{21} kiŋ^{21} tu^{21} tɷ^{21} pe^{51}. 这头猪紧紧地捆着了。

猪 这 头（结助）紧 紧 捆 着 了

浪速语：[10]

sa̱k^{55}ŋauk^{55} thø^{55}mɛ$^{31/51}$ pɛ̱^{55} tʃɔʔ^{31} tɷ^{55} ʒa^{55}. 那树梢上有什么？

树梢 那里 什么 有 着（助）

勒期语：[11]

naŋ^{31} tan^{33} tan^{33} ja:p^{31} tɷ^{55} aʔ^{55}！你直直地站着吧！

你 直 直 站 着 吧

[6] 金有景 1990《拉祜语的主语、宾语、状语助词》，《民族语文》第 5 期。tɷ^{53} 的紧喉特征在语流中常常消失。

[7] 根据笔者田野调查的材料。

[8]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例句为景颇文。

[9] 徐悉艰、徐桂珍 1984《景颇族语言（载瓦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10] 孙宏开主编、戴庆厦著 2005《浪速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11] 马学良主编 2003《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

仙仁土家语有“phu$^{33/31}$tɔ^{35} 凋谢”[12]、“kẽ^{54}tɔ^{33} 跟着（回）”等说法。[13]

弥勒苗语：[14]

kau^{31} ɳau^{43} tou^{44}，ko^{55} mo^{21} tʂau^{55} ni^{21} lo^{21}. 你坐着，我去找他来。

你　坐　着　　我　去　找　他　来

小陂流苗语：[15]

nã^{31} to^{35} χẽ^{31}. 吃着饭。

吃　到　饭

炯奈语：[16]

ni^{21} ntha^{44} ʈou^{44} ʂou^{24} ko^{55} so^{43}pu^{13} hai^{33} ta^{33} “kau^{31} ʑau^{13} ko^{55} le^{33} ku^{13}lua^{13}”

他　扶　到　上　我　肩膀　说　道　你　是　我　的　朋友

他扶着我的肩膀说道：“你是我的朋友。”

侗语：[17]

ma:u^{6} tham^{3}’ we^{4} to^{3}！　他正做着呢！

他　正在　做　着

茶洞语：[18]

mən^{2} ɵui^{6} to^{3} l̥aŋ^{1} l̥e^{1}. 他坐着看书。

他　坐　着　看　书

仫佬语：[19]

mɔ^{6} tu^{6} kwa::n^{1} tɔ^{1} tɔ^{6}，ŋ^{5} kom^{3} kau^{5}.　他就关着门，不敢看。

他　就　关　门　着，不　敢　　看

3.1.2 [t]类持续标记之二：[ta]类

就所掌握的材料来看，[ta]类持续标记主要使用范围都集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还没有发现有表示持续意义的[ta]。

---

[12] 笔者怀疑来自汉语西南官话的“仆倒（仆着）”。

[13] 戴庆厦、田静 2005《仙仁土家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4] 戴庆厦主编 2002《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第 2 辑，语言专辑）民族出版社。

[15] 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 2005《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语言科学》第 4 期。

[16] 孙宏开主编、毛宗武、李云兵著 2002《炯奈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7] 王均等编著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18] 李锦芳 2001《茶洞语概况》《民族语文》第 1 期。

[19] 王均等编著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彝语：[20]

tɯ[21] ko[33] hi[55] ta[33]. 就地起立。[21]

起 某地 立 着

彝语诺苏话的[ta[33]]可以跟在表示持续意义的动词后面，例如：tshi[33]ta[33] 捏着、ȵa[55]ta[33] 哄着、tsɪ[21]ta[33] 埋着、ŋɻ[33]ta[33] 坐着、tɕhǫ[55]ta[33] 变化着、hɪ[55]ta[33] 站着、tu[33]ta[33] 撑着、hɯ[21]ta[33] 向着、ŋgǫ[33]ta[33] 撞着、tɕhi[21]ta[33] 放着、sɪ[34]ta[33] 拿着、tshi[21]ta[33] 堵着、tɕi[55]ta[33] 瞄着、tɕhu[34]ta[33] 守着、tshi[55]ta[33] 开着、thu[33]ta[33] 套着、phu[21]ta[33] 拴着、ʂo[33]mu[33]ta[33] 假装着、dʑi[34]ta[33] 决定着、ndo[34]ta[33] 放置着、bi[21]ta[33] 给着、tɪ[55]ta[33] 挂吊着、pi[21]ta[33] 背着、i[55]ta[33] 躺着等。[22]

拉祜语：[23]

zɛ[2] qhɔ[1] lo[1] lɛ[1] tʃhɔ[1] te[3] ɣa[3] mɤ[1] ta[7]. 屋里坐着一个人。

屋 里（主状助）人 一 个 坐 着

波拉语：[24]

nɔ̃[55] tɛ̃[35] tɛ̃[35/31] jɛʔ[31] ta[35] ɛʔ[55]！ 你直直地站着吧！

你 直 直 站 着 吧

景颇语的 ta[55] 可以表示表示持续意义。例如：[25]

Ma[31] ndai[31] hkum[31] ga[31]htet[31] da[55] nuʔ[31] ai[33]. 这孩子发烧了。

孩子 这 身体 热 （助动）（句尾）

3.1.3 [t]类持续标记之三：[tɯk]类

[tɯk]类以壮语为代表，包括语音相近的、以及没有塞音韵尾的持续标记，比如[tɯk/tɯ]、[tɛʔ/tɛ]等。

[20] 戴庆厦、胡素华 1998《彝语 ta[33] 的多功能性》《民族语文》第 2 期。

[21]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22] 陈康、巫达 1998《彝语语法（诺苏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3] 金有景 1990《拉祜语的主语、宾语、状语助词》《民族语文》第 5 期。

[24]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

[25]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3.1.3.1 [tɯk/tɯ]类

壮语：[26]

kjoŋ^{35}wun^{31} pa:i^{31} to:i^{33} tɯk^{55} ɕa:n^{33}kwa:n^{33}. 人们排着队参观。

人们　　排　队　着　　参观

白语：[27]

tsɯ^{31} tsɯ^{31} no^{33} mɛ̠^{44} tɯ̠^{44} khɣ^{33} tɯ̠^{21}. 树上爬着一条蛇。

树　棵（助）爬　着　蛇　只

3.1.3.2 [tɛʔ-tɛ]类

藏语拉萨话能与助动词[tɛʔ^{132}]连用的动词具有强持续，例如：kuʔ^{13}tɛʔ^{132} 等待、tsy:^{13}tɛʔ^{132} 钻在、roʔ^{13}tɛʔ^{132} 帮着、tʂuŋ^{55}tɛʔ^{132} 守着、sam^{51}tɛʔ^{132} 想着、sɵʔ^{11}kom^{51}tɕ^{h}ɛ^{0}tɛʔ^{132} 忍受着、tuʔ^{11}tɕ^{h}ɛ^{0}tɛʔ^{132} 坚持着、ɕɛʔ^{51}tɛʔ^{132} 说着、ŋ̠ã:^{31}tɛʔ^{132} 听着、ŋ̠op^{132}tɛʔ^{132} 困倦、t^{h}om^{51}tɛʔ^{132} 发楞、t^{h}oŋ^{55}tɛʔ^{132} 常见、ɕiʔ^{51}tɛʔ^{132} 相处、ɕum^{13}tɛʔ^{132} 缩着、ŋ̠ɛ:^{13}tɛʔ^{132} 躺着，等等。[28]

卡卓语有表示持续义的舒声的[tɛ^{33}]。例如：[29]

ʑi^{33} kɛ^{31} xɯ^{55} tɛ^{33} ʑɑ^{33} ŋ^{24} kɑ^{33}. 他站着看书。

他（助）站 着 书　看

3.1.4 [t]类持续标记之四：[i]类

这里谈的是声母为[t]，主要元音为[i]或以[i]为介音的持续标记，包括苗瑶语族苗语的“tio^{5}着”、畲语的“ti^{42}着”、壮侗语族拉基语的“tiu^{33}着”，等等。

苗语：[30]

moŋ^{2}moŋ^{2}tio^{5}！ɕəu^{5}dɑŋ^{4}ʑəu^{4}！　你先吃着吧！别等了！

你　吃 着，别　等　了

畲语：[31]

[26]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 1999《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27] 徐琳、赵衍荪 1984《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28] 王志敬 1994《藏语拉萨口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9] 孙宏开主编、木仕华著 2003《卡卓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30] 戴庆厦主编 1999《民族教育研究》增刊。

[31] 毛宗武、蒙朝吉 1986《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khji^{53} khjaŋ^{53}kɔ^{33} sɤ^{33} ti^{42} i^{35} naŋ^{22} ne^{53} kɤ^{31}. 桥上站着一个老人。

桥　上头　站 着 一 个 人 老人

拉基语：[32]

la^{33}te^{55} ĩ^{55} tiu^{33} li^{33} sã^{33} po^{33}qɛ^{33} na^{24} su^{55} sã^{55} mia^{33}qɛ^{33}.

我们 养 得 一 只 公鸡 和 两 只 母鸡

我们养着一只公鸡和两只母鸡。

3.2 [tʂ/ts]类持续标记

[tʂ/ts]类持续标记在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一些语言中有所发现。

属于羌语支的扎坝语（道孚县扎坝区扎拖乡扎拖村话）是我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藏族居民使用的一种语言，它的自主动词用后加[tʂə^{55}]或[tʂe^{55}]的形式表示动作正在进行。例如：[33]

ŋʊ^{55}ʐʊ^{55} ɳu^{33}wu^{55} kʌ^{33}tʌ^{33}tɕə^{55}ti^{55} ʐʌ^{33}-tʂe^{55}. 他用笔写着字。

他　笔　字　写（正在）

撒尼彝语：[34]

ŋa^{33} tsa^{33} dza^{21} tʂo^{33}.　我正在吃饭。

我 饭 吃 着

白语的 zort[tsʊ^{42}]“着”可表持续义。例如：[35]

Cenrx zort vux zeirx hhaf hhorx nox beirx.　乘着雨还没有下就走。

弥勒苗语：[36]

tua^{24}tshi^{31} ɳau^{43} tʂo^{21} kha^{43}hui^{24}. 大家坐着开会。

大家　坐　着　开会

[32] 戴庆厦主编 1999《民族教育研究》增刊。

[33]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

[34] 戴庆厦、胡素华 1998《彝语 ta^{33} 的多功能性》《民族语文》第 2 期。

[35] 赵衍荪、徐琳 1996《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36] 戴庆厦主编 2002《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第 2 辑，语言专辑）民族出版社。

红河上游傣雅语：[37]

han$^{1'}$ tʂo^{3} tje^{2} nan^{4} k^{h}it$^{7'}$ hjəu^{5}tɕe^{3} vai^{4}.　看到墙那儿写着字。

看　着 墙　那　写　　字

布依语在有些地区用“tso^{5} 着”附在动词之后表示行为的持续。比如贵州省龙里县羊场话：[38]

ti^{1} zaŋ^{6} tso^{5}. 他坐着。

他 坐 着

虽然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与汉语的关系，学界尚无定论，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那些持续标记，都是从汉语借来的“著”持续标记。只不过，[t]和[tʂ/ts]两类在它们中的借用情况有些不一致：早期的[t]类持续标记更加广泛地被很多语言借用，连“著”作为三等字读[i]时的语音形式也保留在其中，而后起的[tʂ/ts]类持续标记被借用的情况明显要少一些。这两类持续标记在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中的并存，和它们与汉族、汉语的交往有关——从表 3 可知，一方面，青海、天津、河南、上海有[tʂ/ts]类无[t]类，四川、重庆、贵州、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t]类无[tʂ/ts]类，另一方面，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湖北、湖南、云南、安徽、江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既有[t]类又有[tʂ/ts]类。[t]类和[tʂ/ts]类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并存，但是，在北方，是[tʂ/ts]类略占优势，在南方，是[t]类占据明显优势，而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也正好靠近后者的这些地方。汉语和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之间千百年来的联系，“著”类持续标记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现代汉语方言“著”持续标记的基本分布情况及地理分布特点，结合[t]和[tʂ/ts]两类持续标记在汉藏语系的藏缅、苗瑶、壮侗三个语族亲属语言中的具体表现，说明不同的语音形式虽然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但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并存，也可以被非汉语借用、从另一个区域（借用区域）得到映证。

[37] 邢公畹 1989《红河上游傣雅语》语文出版社。
[38] 王均等编著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参考文献

陈康、巫达 1998《彝语语法（诺苏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

戴庆厦、胡素华 1998《彝语 ta^{33} 的多功能性》《民族语文》第 2 期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

戴庆厦、田静 2005《仙仁土家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 2005《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语言科学》第 4 期

戴庆厦主编《民族教育研究》1999 年增刊

戴庆厦主编 2002《中国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论集》（第 2 辑，语言专辑）民族出版社

何守伦 1989《永胜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贺巍 2002《官话方言研究》方志出版社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 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黄伯荣主编 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黄雪贞 1993《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有景 1990《拉祜语的主语、宾语、状语助词》,《民族语文》第 5 期

李锦芳 2001《茶洞语概况》,《民族语文》年第 1 期

李荣主编、熊正辉、张振兴副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州（叶祥苓 1993） 长沙（鲍厚星 崔振华等 1993） 太原（沈明 1994）

西宁（张成材 1994） 贵阳（汪平 1994） 武汉（朱建颂 1995）

南京（刘丹青 1995） 南昌（熊正辉 1995） 柳州（刘村汉 1995）

洛阳（贺巍 1996） 扬州（王世华 黄继林 1996）

徐州（苏晓青 吕永卫 1996） 西安（王军虎 1996）

宁波（汤珍珠 陈忠敏 吴新贤 1997） 上海（许宝华 陶寰 1997）

南宁（覃远雄 韦树关 卞成林 1997）于都（谢留文 1998）杭州（鲍士杰 1998）

广州（白宛如 1998） 建瓯（李如龙 潘渭水 1998） 济南（钱曾怡 1998）

成都（梁德曼 黄尚军 1998）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永明 1988《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林立芳、庄初升 1995《南雄珠玑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
刘纶鑫 1999《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卢甲文 1992《郑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卢开 、张茀 1988《永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罗自群 2023《汉语方言持续体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自群 2007《从语言接触看汉语方言“哒”类持续标记的来源》《语言研究》第 4 期
马学良主编 2003《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
毛宗武、蒙朝吉 1986《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莫超 2004《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曾怡主编、罗福腾著 1995《牟平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钱曾怡主编、孟庆泰、罗福腾著 1993《淄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钱曾怡主编、张廷兴著 1999《沂水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孙宏开主编、戴庆厦著 2005《浪速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主编、毛宗武、李云兵著 2002《炯奈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孙宏开主编、木仕华著 2003《卡卓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主编、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 2002《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孙立新 1998《陕南方言略说》《方言》第 2 期
汤珍珠、陈忠敏 1993《嘉定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田希诚、吴建生 1995《山西晋语区的助词“的”》《山西大学学报》第 3 期
王均等编著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王群生 1994《湖北荆沙方言》武汉大学出版社
王志敬 1994《藏语拉萨口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伍云姬主编 1996《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邢公畹 1989《红河上游傣雅语》语文出版社
邢向东、张永胜 1997《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徐琳、赵衍荪 1984《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徐悉艰、徐桂珍 1984《景颇族语言（载瓦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杨时逢 1969《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六
杨时逢 198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二
喻遂生 1990《重庆方言的“倒”和“起”》《方言》第 3 期

詹伯慧、李如龙、张双庆 1996《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郑贻青、李旭练、谢建猷 1999《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双庆主编 1996《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张双庆主编 2000《乐昌土话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张薇 2019《浙江方言资源典藏 海盐》浙江大学出版社
赵衍荪、徐琳 1996《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等 1972《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台联国风
周本良 2005《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临桂义宁话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試論上古漢語的方位詞“所”及其方言特徵

宮島和也
成蹊大學

内容摘要：在戰國末期到秦代的簡牘資料中多見方位詞“所”（“所L”），戰國時代其他地區的資料中則未見“所L”。因此頗有可能戰國時代秦國的書面語當中“所L”已成立了，當時其他地區則不然。秦國語言具有少用“于/於”、出現“所L”這兩個創新特徵，有可能不常用“于/於”的秦方言當中產生“所 L”。通過秦國的一統天下和書同文字，至少在書面語上具有這些特徵的秦方言成為標準的、權威的語言，對之後漢語的演變方向產生了影響。

一、前言

上古漢語中可見由表示具體〈地方〉義的名詞語法化為方位詞的“所”（以下簡稱“所L”），附著於名詞之後，表示〈處所〉〈對象〉〈來源〉等語法意義。本文利用戰國時代到秦代的出土文獻，以試圖討論“所L”及其方言特徵，以及秦方言在漢語史上的位置。

二、“所L”的性質

董秀芳（1998）討論《史記》中的“後置詞”的“所”（相當於本文所謂“所L”），首先檢討董秀芳（1998）的分析，以總結“所L”的具體情況及其性質。

董氏將《史記》中的“所L”分成A、B兩類。A類是提示處所的，表示現代漢語的“那兒/那裡”般的意思，如[1]：

(1)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高祖本紀）
[去九江王黥布那兒。]
(2) 書及璽皆在趙高所。（李斯列傳）

[1] 本節以下用例基本上都是董秀芳（1998）所舉的，但做過一些調整。

[文書和璽印都在趙高那兒。]

(3) 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淮陰侯列傳）
[是因為我在你那兒]

(4)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高祖本紀）
[晚來的人到蛇那兒的時候]

董秀芳（1998：108）舉以下（5）-（7）等例子，云“[A 類的：引用者]‘所’都可以對譯成現代漢語的‘那裡’或‘那兒’，輔助表示處所。但與作為名詞的義為‘處所，地方’的‘所’不是一回事。…從以上例子[即本文（5）-（7）：引用者]可以看出表示‘處所’的名詞‘所’字都是作為一個偏正短語的中心詞出現的，整個短語是一個普通名詞短語，義為‘……的地方’。而作為後置詞提示處所的‘所’字則是附著在前面的名詞性成分之上的，義為‘……那裡’，整個短語具有方位短語的性質”：

(5) 妾不知其死所矣。（孫子吳起列傳）
[我不知他死去的地方]

(6) 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秦始皇本紀）
[（親書）在中車府令的趙高舉行符璽之事的地方。]

(7) 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三王世家）
[想要在什麼地方當王呢？]

也就是說，（5）-（7）這種“所”是一般的名詞，表示實際的〈地方〉義，A 類“所 L”與此不同，詞彙意義比較虛，似乎發生了語義漂白化（semantic bleaching）。

董氏所謂的 B 類是如下（8）-（13），董秀芳（1998:108-109）說“這裡[例（8）（9）：引用者]強調的並不是實際的處所，雖然理解為處所也說得通。正如現代漢語中說‘我從他那兒學的刻字’，‘他那兒’不一定是指一個具體的處所，而主要表示（知識技能的）來源。…第四例[例（10）：引用者]…‘NP+所’作動詞的間賓，這個例子中的名詞性成分‘趙王’可以歸入對象格。…這一例由於不能對譯成現代漢語的‘那裡’，‘所’字的虛化程度更高了。…這裡[例（11）：引用者]的‘民’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因而不可能提示確切的實際處所，‘所’在這裡也是幫助表示來源。後例[例文（12）：引用者]中的‘所’不能譯成‘那裡’或‘那兒’，它只是提示一個對象

語義格，‘不賣諸侯所’即不賣給諸侯，表示處所的含義也已虛化”：

(8) 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田叔列傳）
[跟樂巨公學黃老之術]
(9)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韓長孺列傳）
[曾經跟騶縣的田先生學《韓非子》和雜家之說]
(10) 午言之趙王張敖所。（田叔列傳）
[趙午向趙王張敖報告此事]
(11) 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扁鵲倉公列傳）
[先年從民間買了她]
(12) 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扁鵲倉公列傳）
[沒有賣給諸侯]
(13) 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扁鵲倉公列傳）
[不是對你藏奸]

也就是說，B 類“所 L”與 A 相比語法化的程度更高，可以表示來源、對象等處所以外的意義。

總上述，“所 L”從表示具體、實際的〈地方〉義的名詞語法化而成為表示比較抽象的語法意義的成分，附著於名詞之後表示處所、來源、對象等。

三、上古漢語文獻中的“所 L”

3.1 秦簡中的“所 L”

“所 L”也見於近年所發現的秦簡、漢簡等出土文獻中[2]，以下是秦簡（戰國末期秦國～秦代）中的例子[3]：

(14) 癸詣私書媵所（嶽麓秦簡《為獄等狀四種》210-211）
[癸將私書寄給媵]

[2] 參見角谷常子（2023）。
[3] （14）-（20）引自角谷常子（2023）所舉的例子，而其釋文則根據筆者認識進行了一些修改或補充。

(15) 縣官上計執灋，執灋上計最皇帝所。（嶽麓秦簡《秦律令（壹）》346）

[執灋將帳目的總計上給皇帝]

(16) 為書以告將吏所。（嶽麓秦簡《秦律令（壹）》186）

[向將吏報告]

(17) 學書吏所年未盈十五歲者，不為舍人。（嶽麓秦簡《秦律令（貳）》41-42）

[跟吏學書]

(18) 與去疾買銅錫冗募樂一男子所。 （嶽麓秦簡《為獄等狀四種》48）

[從冗募的樂（之手下的）一個男子買了銅、錫]

(19) 今寫校券一牒上，謁言巴卒史衰、義所，問狼船存所。（里耶秦簡 8-135）

[告訴巴郡的卒吏衰、義]

(20) 甲親子，誠不孝甲所，毋它罪。（睡虎地秦簡《封診式》51）

[甲的兒子真對於甲不孝]

也有“所 L”出現於主語位置，但極其罕見[4]：

(21) 其頭所不齊戔戔然。（睡虎地秦簡《封診式》36）

[（首級的）後頸不整齊且短小]

上舉都是見於律令、行政文書等秦國的公文書類文獻的例子，頗有可能體現出的是當時秦國通用、標準的書面語面貌[5]。由這些例子可以知道，戰國時代的秦國“所 L”已經成立了。

[4] 楊安娜（2019）指出“X 所”在中古時期的早期漢譯佛典中未見出現於主語位置的例子，只出現於位移動詞的賓語位置或者與“於”“從”等構成介詞短語而當作狀語。

[5] 參見大西克也（2006：147-148）、（2013：130、147 注 15）等。

3.2 其他文獻中的“所”

與秦簡不同，戰國時代楚國的簡帛資料中未見“所 L”。如下例（22）（23），名詞直接充當賓語：

(22) 君王屬僕於子左尹□，子左尹屬之新佔𠂤尹丹□。（包山楚簡 15-16）
[君王將我（的申訴）付託給子左尹，子左尹將此付託給新佔𠂤尹的丹。]
(23) 以致命於子左尹□（包山楚簡 137 反）
[向子左尹交差]

（22）（23）包山楚簡的內容是司法文書，也體現出當時楚國本地性書面語的面貌[6]。可見在戰國時代的楚地頗有可能“所 L”尚未成立。

本文對於部分戰國時代傳世文獻（《左傳》《論語》《孟子》）進行了初步調查，發現這些文獻當中亦未見“所 L”，名詞直接充當賓語，如：

(24)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孟子・告子下》）
[天子去諸侯（的領地）]
(25)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左傳》昭公十六年）
[其中一個在鄭國商人那兒。]
(26) 逢蒙學射於羿□（《孟子・離婁下》）
[逢蒙跟羿學射箭。]

而這些文獻中的“NP+所”的“所”都表示具體的〈地方〉意，可以理解為一般的名詞[7]，如：

(27)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北斗星在自己該所在的地方]
(28)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左傳》襄公九年）
[（叫隧正）到火災（所發生）的地方去。]

[6] 參見大西克也（2006：147-148）、（2013：130、147 注 15）、(2015：22-23)等。
[7] 其實（28）（29）或許可以理解成“VP+所”，如“火”也有“發生火災”之意的動詞用法（《左傳》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另外《墨子・號令》有“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以火指鼓所。”一句，其中“鼓所”似是“NP+所”，其實當理解為“V+所”，意為“打鼓的地方”。

(29)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左傳》哀公十六年）

[我知道他（白公）的死屍所在的地方]

(30) 國之禍難，誰知所儆。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左傳》襄公三十年）

[姑且保住我的地位吧[8]。]

（30）的“所”與〈地方〉義稍微不同，但可以看作是由〈地方〉義衍生出來的一個義項。

其實這些戰國時代文獻中的“NP+所”裡面也可見與董秀芳（1998）所謂 A 類“所 L”相似的例子，但都是“王所”“君所”等用例，如：

(31)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孟子・滕文公下》）

[讓他（薛居州）在王所在的地方/王那兒]

(32)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左傳》哀公二十五年）

[去君所在的地方/君那兒]

本文認為，這些“所”也可以理解為表示具體的〈地方〉意的名詞。這些“王”、“君”等名詞之後加“所”，或許與禮貌策略（politeness strategy）有關，即不直接涉及到“王”“君”等高貴的人物，將其表現為他附近的處所，用委婉的、間接的表達[9]。這種“所”還是應該看做與“所 L”性質不同[10]。

綜上所述，秦簡中可見不少“所 L”，至遲戰國末期的秦國語言當中已經成立了“所 L”；其他戰國時代文獻中似乎未見“所 L”，“所”基本上都可以看做是表示具體〈地方〉義的名詞。秦簡以外的戰國文獻中也可見類似於 A 類“所 L”的例子，但語境很有限，應當是出於語用上的動因加“所”的。因此頗有可能戰國時代秦以外地區的語言當中尚未成立“所 L”，“所 L”似是秦地語言中所出現的一個創新。

[8] “姑成吾所”，鄭注“欲以無所附著為所”，沈玉成（1981：363）翻譯成“姑且保住我的地位吧”，本文暫從沈氏翻譯。

[9] 角谷（2023：475 注 9）引用白川靜（1984：429）曾說“所”的本義是“祭祀祖靈的地方”，在春秋時代金文中“帝所”“靈公所”等說法都表其本義。

[10] 本文例（15）的“皇帝所”或許也與禮貌（politeness）有關，也就是其“所”也可以理解為“所 L”，也可以理解為名詞的“所”。其實就“所”與禮貌的關係，角谷常子（2023：469）也已涉及到，但角谷氏表示否定的態度。

四、在漢語史上的“所 L”

4.1“所 L”與空間範疇的成立

“所 L”應當與漢語語法史上空間範疇的成立密切相關。正如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過，本來漢語名詞形式上不區分實體和處所，如（33）的“山”“淵”是實體，（34）的“山”“淵” 則是處所[11]：

(33)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荀子・勸學》）
(34)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莊子・天地》）

而後來形成處所名詞和非處所名詞的區別，非處所名詞上需要加方位成分。“所 L”也可以看做是合乎這個潮流的。方經民（2008:165）云：

> “先秦漢語裏處所名詞跟一般名詞沒有什麼區別，空間區域只是一個概念範疇，因此也就沒有區分維度特徵的語法手段。隨著處所名詞跟非處所名詞功能上的對立和方位成分的功能分化，非處所名詞表達空間區域範疇時就必須通過後置一個方位成分使之空間化…地域專名是無標記的，它指定一個以零維的點為區域特徵的自身區域。隨著處所名詞的次範疇化，非處所名詞指定自身區域也需要有標記，後置成分‘所’‘處’和指示代詞‘這兒’‘那兒’相繼成為零維的語法化標誌。”

另外，上古漢語中有表示處所、對象、來源等義的介詞“于/於”，而先秦到秦漢時代“于/於”的使用頻率越來越少，似亦與處所名詞和非處所名詞的分化關聯。就此董秀芳（1998：110）引用（35）（36）那樣的例子且指出：

> “與這一過程[即漢語實體名詞和處所名詞的範疇差別的產生：引用者]相應，先秦時，在動詞和表處所的名詞之間通常要加介詞‘於’，作為提示處所名詞的標記。而到《史記》中，由於表處所的名詞已有方位詞指名，在動詞和表處所的名詞之間用‘於’的情況大大減少了。…[例（36）的：引用者]‘河中’因在實體名詞後出現了方位詞，其表處所的意義非常明顯，所以前面可以不用介詞‘于’，而當‘河’後無方位詞時，‘於’就是必不可少的。”

[11] 參見李崇興（1992：245-251）、董秀芳（1998：109）、蔣紹愚（1999：6）、方經民（2008）、大西克也（2011：26-27）等。

(35) 投其璧于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36) 乃投璧河中（《史記・晉世家》）

雖然不知能不能斷定沒有方位詞的時候“于/於”是“必不可少”的，但“于/於”和“所 L”在使用上確實似有關聯。秦簡中也有“于/於”和“所 L”共現的例子[12]，但如例（37），前一句用“于”而不用“所 L”，後一句則不用“于”而用“所 L”，這種例子似乎表示出“于/於”的不用和“所 L”的使用似是關連的[13]：

(37) =（16）以書謝于將吏□…為書以告將吏所。（嶽麓秦簡《秦律令（壹）》186）
[用文書告訴將吏。…作成文書以向將吏報告。]

4.2“所 L”與秦方言的特徵

宮島和也（2015）指出，秦國語言中“于/於”少見，秦以外的東方地區則多用“于/於”[14]，頗有可能不常用“于/於”是秦方言的特徵；如上述（本文 3.2），“所 L”應當在戰國時代的秦地已經成立了，其他地區則不然。也就是說，秦國語言中可見①少用“于/於”、②“所 L”這兩個與其他地區相比創新的特徵；並且如上節所說，①和②似是有關聯的，有可能不常用“于/於”的秦方言當中產生“所 L”[15]，處所名詞的次範疇化也發展了。方經民（2008：168）說漢代以後開始處所名詞的次範疇化，其實戰國時代的秦國語言中已經存在起萌芽，並且這個現象甚至也有可能本來先在某一個方言當中所發生的。

漢代以降“所 L”也繼續被使用，而到了中古時期可見其他“處”、“邊”、“間”、“許”、“行”等與“所 L”功能類似的成分[16]。我們可以推測，上述①和②本來是在秦方言中發生的創新，而通過秦國的一統天下和書同文字，至少在書面語

[12] 比如：卅五年六月戊午朔己巳，庫建、佐般出賣祠𥫱□□□一朐于隸臣徐所，取錢一。（里耶秦簡 8-1002+8-1091）
[13] 大西克也（1994：129）調查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秦代寫本？）中的處所補語句 99 個例子，而指出其 99 例中的 92 例沒有介詞“于/於”；99 例中的 80 例用“中”“下”“東”等方位詞。
[14] 實際上頗有可能戰國時代東方地區主要只用“於”，一般不用“于”（參見宮島和也 2015）。
[15] 其實也有反過來的可能，即因為常用“所 L”所以不太用“于/於”了。
[16] 參見董秀芳（1998）。楊安娜（2019）主要調查早期漢譯佛典中的“所”“處”，指出“‘所’的實體義已基本消失，虛化爲一個附著性成分，而‘處’的實體義依舊很強”（楊安娜 2019：84）。

上具有①②這特徵的秦方言成為標準的、權威的語言，漢朝也基本上繼承了秦國書面語[17]，對之後漢語的演變方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五、結語

本文討論了上古漢語中的“所 L”，主張：從戰國時代到秦代的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來看“所 L”已在戰國時代的秦國語言當中成立了，其他地區則頗有可能尚未成立，“所 L”似是秦方言中發生的一個創新；秦方言不常用介詞“于/於”，這也當是與東方地區語言不同的秦方言特徵，並且與“所 L”的產生密切相關；通過秦國的書同文字，具有這種特徵的語言成為標準或強勢語言，有可能影響到漢語演變的趨向。

本文未能充分討論其他方位成分，就此有待進一步討論。

附記：本文相關內容曾在“第 58 回中國語文法研究會”（2023 年 9 月 2 日，線上）以及“中國語言歷史地理研究論壇 2024”（2024 年 3 月 2-4 日，線上）上宣讀過，承蒙與會專家的指正；寫作過程中得到羅盛吉先生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本文得到 JSPS 科研費 24K16068 的資助。

参考文献

白川靜 1984.《字統》，平凡社。

大西克也 1994.《帛書《五十二病方》的語法特點》，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125-131，湖南出版社。

大西克也 2006.《戰國時代の文字と言葉—秦・楚の違いを中心に—》，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篇《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146-174，雄山閣。

大西克也 2011.《所有から存在へ：上古中國語における「有」の擴張》，《漢語與漢語教學研究》2:16-31。

大西克也 2013.《秦の文字統一について》，渡邉義浩編《中國新出資料の展開》127-149，汲古書院。

大西克也 2015.《清華簡『繫年』の地域性に関する試論：文字學の視点から》，《資料學の方法を探る》14:21-47。

[17] 參見張世超、張玉春（1990：30）。

董秀芳 1998.《古漢語中的後置詞"所"：兼論古漢語中表方位的後置詞系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08-112。
宮島和也 2015.《戰國楚・秦における前置詞「于」「於」をめぐって》,《中國語學》262:114-133。
方經民 2008.《論漢語空間區域範疇的語法化》,《漢語史學報》7:156-172。
角谷常子 2023.《名詞の後につく「所」》，三宅潔編《嶽麓書院所藏〈秦律令（壹）〉譯注》465-475，汲古書院。
蔣紹愚 1999.《抽象原則和臨摹原則在漢語語法史中的體現》,《古漢語研究》4 : 2-5。
李崇興 1992.《處所詞發展歷史的初步考察》，胡竹安、楊耐思、蔣紹愚編《近代漢語研究》243-263，商務印書館。
沈玉成 1981.《左傳譯文》，中華書局。
楊安娜 2019. 《早期漢譯佛典中的處所詞考察—以"所"、"處"爲中心》,《饕餮》27:72-85。
張世超、張玉春 1990.《漢語書面形態學初探》，張世超、張玉春撰集《秦簡文字編》19-35，中文出版社。

語料來源

《論語》：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孟子》：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左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09 年。
《史記》:《史記》，中華書局，2014 年。
《荀子》：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 年。
《莊子》：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 年。
《墨子》：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 年。
包山楚簡：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年。
睡虎地秦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
嶽麓秦簡：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肆)(伍)，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2015、2017 年。

里耶秦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貳），文物出版社，2012、2017年。

魏晉南北朝的魚虞分合時序地圖

三輪大樹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

内容摘要：羅常培（1931）曾製作過一張關於魏晉南北朝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的地圖，但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未能反映年代的差異，以及以文人的本貫作為基準而非實際的出身地。在本文中，我們以文人的生年和語言形成期所經歷的地方為基準，製作了反映魏晉南北朝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的時序地圖（time series map）。結果顯示，魚韻與虞韻的特徵在江南的吳郡表現得尤為顯著；在南渡文人中，這種特徵尤其集中在京口和烏程的寒門出身者，並最終擴展到整個中國。此外，研究還顯示，西北方言可能從魏晉南北朝的早期階段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區分魚韻與虞韻。

一、前言

在考慮《切韻》的成立時，魏晉南北朝的音韻變化非常重要。魏晉南北朝留存有大量的押韻資料，根據這些資料可以追溯韻母系統的變遷。其中，魚韻與虞韻由於是開音節，因此對主母音的研究非常適合，關於其音值和分合狀況，已有許多研究成果。

在拙稿（2023）中，我指出了魚韻與虞韻在聲母條件下的分合狀況偏差，並揭示了其語音學和音位學的部分意義。本文在此研究基礎上，從方言地理學的角度，描繪出魏晉南北朝全體的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的變遷，並製作出其時序語言地圖（time series map）。

二、先行研究

2.1 羅常培（1931）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代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最初開始正式研究的，無疑是羅常培（1931）。在製作了魏晉南北朝時代魚韻與虞韻的分合圖的基礎之上，羅常培（1931/1963: 6）論述道：“如果咱們拿金陵作中心，彭城作北極，餘姚作南極，而

畫一圓周，恰好把這些魚、虞分用的地方都包括在內”，並認為在這個區域之外，魚韻與虞韻沒有區別。

羅常培先生研究的價值毋庸置疑，但也受到時代限制，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他在判斷各文人所用方言時，使用了本貫而非實際出身地。因此才會出現將實際上出生於江南的庾信（本貫：南陽新野）歸入北方人，並且為了自圓其說，將庾信少數幾個魚、虞通用的例子視為他不區別魚韻與虞韻的證據的這類錯誤。潘悟雲（1983）對此有詳細的批判。

另外，羅常培（1931/1963: 12）在韻字的認定上也有許多錯誤。特別是關於吳方言的部分，在拙稿（2023）中已經討論過，可以參考。

本稿要指出的問題是，羅常培先生用一張地圖代表了長達 400 年的魏晉南北朝的語言狀況，然而魚韻與虞韻的區別情況因地域、年代和社會階層而異，一張地圖無法全面反映這些變化。

2.2 三輪（2023）

在此，簡要介紹筆者的研究。拙稿（2023）在指出了羅常培（1931）等先行研究存在的問題的基礎之上，重新調查了魏晉南北朝時代魚韻與虞韻的通押狀況。結論可大致總結如下：

第一，眾所周知，六朝時期吳方言基本區分魚韻與虞韻，但也有少量魚韻與虞韻通用的例子。羅常培（1931/1963: 7）認為通用的虞韻字“大多數也都以‘牙音’、‘唇音’及‘喉音’喻紐（影紐只有一‘紆’字）‘半舌音’來紐為限”，但實際上可以更進一步限制條件。具體而言，在典型的吳方言中，魚韻與虞韻的通押僅限於虞韻是唇音或云母的情況。

第二，南朝時期，這種吳方言的特徵逐漸在南渡文人中成為了普遍現象。南渡初期的文人與洛陽文人一樣，自由地通押魚韻與虞韻，但到了六朝後期，魚韻與虞韻被嚴格區分開來。

第三，我們可以認為引起這種通押現象出現的是唇音和云母的共同音聲特徵，即聲母的圓唇性導致了魚韻與虞韻開口度（或圓唇性）對立的中和。因此，可以推測，六朝吳方言中云母的音值應該是具有強圓唇性的輔音 w。

三、研究方法

羅常培先生僅製作了一張關於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的方言地圖，但實際上，分

合狀況隨年代變遷會發生顯著變化。因此，需要將魏晉南北朝時期劃分成幾段，製作一些能夠俯瞰語言變化的時序語言地圖。本稿將利用 ArcGIS online（https://www.arcgis.com/index.html）這一網絡應用程式，製作魏晉南北朝時期魚韻與虞韻分合狀況的時序地圖。其具體方法如下：

3.1 資料

押韻資料依據周祖謨（1996），實際分析時使用鈴木慎吾師將之電子化的《諸家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韻譜韻讀》（https://suzukish.sakura.ne.jp/search/xianqin/，2024 年 1 月 31 日閱覽）的數據。關於韻字認定的修正部分，請參考拙稿（2023）。

3.2 調查對象

本文將研究對象限定為生於 170 年至 569 年間，可以通過史書或其他材料推測出其出生地，且具有兩字以上魚、虞韻的押韻例的文人。

3.3 出身年代及出生地

一般的語言地圖是基於特定時間點不同世代人群的調查結果而製作的。然而，本文所研究的是歷史文獻，採用此類調查方法幾乎不可能。本文將更多關注文人的出生年代，並按年代製作地圖。基本上，母語通常在語言形成期，即約 13 歲之前形成，因此可以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也是有效的。本文將某位文人在言語形成期時生活的地點視為其“出生地”，並在地圖上予以反映。需注意的是，這指的是言語形成期所在地，而非實際出生地。出生地僅採用可從正史記載、父親任職地或本人言及中確定的信息。當出身地與本貫不同時，將特別註明。對於無法從史書等材料推測出生地的情況，將參照陸侃如（1985）與曹道衡、沈玉成（1991）的研究成果。

3.4 獨用率與完全獨用率

在判斷每位文人是單獨使用還是合用魚、虞韻時，需要設定客觀的指標。本文首先設置了“獨用率”這個指標。在每位文人的押韻例中，將魚、虞韻中占多數的總數除以魚、虞韻的總數即可得出“獨用率”。例如，如果押韻是魚魚魚魚、虞虞虞，則獨用率為 100%；如果是魚虞虞虞、魚魚虞，則為(3+2)/7=71.42%；如果是魚魚虞虞，則為 2/4=50%。當魚、虞韻完全單獨使用時，獨用率為 100%，這是最高值；最低值則是魚、虞韻均等分布時的 50%。

在使用獨用率時，需要注意的是，這僅僅是魚、虞韻中占多數的總和，並不是

嚴格意義上的完全單獨使用比例。即使某位文人隨意地使用魚韻和虞韻，獨用率可能也會顯得相對較高。

因此，除了獨用率外，我們還還引入了另一個叫作“完全獨用率”的指標。它表示完全單獨使用的押韻例在所有押韻例中的比例。其最低值為 0%（即所有押韻都是魚、虞韻合用），最高值為 100%（即所有押韻都是魚、虞韻單獨使用）。例如，如果押韻是魚魚魚魚、魚魚魚虞，則獨用率是 7/8=87.5%，完全獨用率是 4/8=50%。即使獨用率很高，如果完全獨用率非常低，那也很難認定其單獨使用魚、虞韻。

然而，僅使用完全獨用率可能會導致一些文人儘管大多數情況都在單獨使用魚、虞韻，但如果有一些一字合用的例子，則計算出來的數值也會很變低。因此，需要綜合考慮獨用率和完全獨用率來做出總體判斷。

四、各時代的押韻狀況

接下來將具體確認各時代各地區的押韻分合狀況。

4.1 170～224 年（曹魏建国後）

表 1：北方文人（170~224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應瑒	洛陽[1]	河南洛陽	170?	76.5	17.6	4	17
劉楨	東平寧陽[2]	山東寧陽	170?	66.7	16.7	3	6
繁欽	潁川[3]	河南禹州	170?	87.5	56.3	6	16
王粲	洛陽[4]	河南洛陽	177	68.2	6.8	13	44
吳質	濟陰鄄城[5]	山東菏澤鄄城	177	57.1	0	1	7

[1] 應瑒的本貫是汝南南頓（河南項城），是代代侍奉後漢王朝的名門。《三國志》卷二十一注：“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據此記載，推斷他與父親一同居住在洛陽。

[2] 《三國志》卷二十一注引《文士傳》；“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後漢書》卷八十：“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劉楨從父親那一代起就是東平寧陽的貧窮家庭。《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劉楨》：“貧居晏里閒，少小長東平。”據此記載，可以了解到劉楨在六朝時期的幼年時期是在東平寧陽度過的。

[3] 《三國志》卷二十一注引《典略》：“少得名於汝、潁。”繁欽從幼年時起就在本貫潁川附近活動的事實據此得以確認。

[4] 《三國志》卷二十一：“獻帝西遷，粲徙長安”，由此推測王粲之前居住在洛陽，而他當時十四歲，推測語言形成期是在洛陽度過的。

[5] 《三國志》卷二十一：“吳質，濟陰人。”雖然史傳中未詳其縣名，但易小平（2003: 180）根據他的後裔東晉的吳隱之的本貫是鄄城，推測吳質也是濟陰郡鄄城縣的人。本文也遵循這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曹丕	沛國譙[6]	安徽亳州	187	72.1	28.0	13	43
何晏	鄴[7]	河北邯鄲臨漳	190?	66.7	11.1	5	18
卞蘭	琅邪開陽[8]	山東臨沂	200?	70	10	2	10
阮籍	鄴[9]	河北邯鄲臨漳	210	65.8	15.8	18	76
傅玄	河內[10]	河南	217	69.2	18.3	33	104

首先要確認的是曹魏建國後直至 224 年之間出生的北方文人的情況。每位文人的數據如表 1 所示，包括出生地、今址、出生年、獨用率、完全獨用率、押韻總組數和押韻字總數。

從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文人的獨用率均未超過 90%，除繁欽外，完全獨用率也未超過 30%。在第 4.4 節中，我們還將看到梁朝蘭陵蕭氏中獨用率較低的文人的完全獨用率超過了 40%。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這個時期的北方文人顯然未區分魚韻和虞韻。不僅在押韻中，在實際語言中未區分魚韻和虞韻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表 2：南方文人（170~224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胡綜	會稽[11]	浙江紹興	183	75	25	2	4
薛瑩	江南	江蘇	220?	100	100	2	5
楊泉	會稽?	浙江紹興?	3 世紀?	60	10	3	10

與北方文人豐富的文獻資料相比，這一時期南方文人的資料非常少。只有孫吳的胡綜、楊泉、薛瑩留下了少量的押韻資料（見表 2）。

薛瑩的籍貫是沛郡竹邑[12]，其父薛綜自孫吳建國初期即仕於孫權。由此可以推

一考證。

6 《三國志》卷二；“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

7 《三國志》卷九：“晏長於宮省。”

8 《三國志》卷五：“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秉薨，子蘭嗣。”

9 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可以認為他在鄴下出生並成長。

10 《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傅玄原本被認為是在其父親的任地扶風出生的，但很快父親去世後搬到河內居住。本文推斷他的語言形成期在河內度過，因此將河內視為他的出生地。

11 《三國志》卷六十二；“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雖然胡綜本貫是汝南，但據推測其言語形成期是在會稽度過的。

測薛瑩成長於江南或其父薛綜任地交州[13]。雖然薛瑩的例子數量不多，但我們可以看到他完全區分了魚、虞韻。

楊泉自身曾言及其在孫吳會稽的經歷[14]。楊泉的獨用率和完全獨用率較低，似乎更隨意地使用魚、虞韻。然而，他的籍貫據知是梁國[15]。由于我們缺少楊泉幼年時期的資料，因此是否可以將他的例子作為會稽的資料需謹慎考慮。在會稽度過幼年時期的胡綜也同樣未區別魚、虞韻。楊泉和胡綜的例子或許可以成為孫吳時期會稽地區區分魚、虞韻較為寬鬆這一可能性的佐證。

4.2 230～308 年（晋室南渡開始前）

表 3：北方文人（230～308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嵇康	譙郡銍	安徽濉溪臨涣	224	70.7	17.2	12	58
張華	范陽方城	河北廊坊固安	232	72.8	3.9	10	51
傅咸	洛陽[16]	河南洛陽	239	71.9	21.9	10	32
摯虞	洛陽[17]	河南洛陽	240?	63.6	9.2	10	33
左思	臨淄[18]	山東臨淄	253?	73.8	27.2	33	103
束晳	馮翊[19]	陝西渭南	265?	90.5	76.2	6	21
郭璞	河東聞喜[20]	山西運城聞喜	276	85.7	58.7	29	63
盧諶	鄴[21]	河北邯鄲臨漳	285	62.5	20.8	6	24

[12] 《三國志》卷五十三：“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13] 《三國志》卷五十三：“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

[14] 《太平御覽》卷五十九《物理論》：“余昔在會稽。”

[15] 《意林》卷五《太玄經》注：“梁國楊泉，字德淵。”

[16] 《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州舉秀才，除郎中。”陸侃如（1985 年）認為這一年份為 240 年，此時他的兒子傅咸年僅 2 歲。據推測，傅咸在洛陽度過了語言形成期。

[17] 《晉書》卷五十一：“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同：“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摯虞的父親是魏的官僚，在洛陽附近的新安居住，曾師事於皇甫謐。由此可知他是洛陽附近出身的人。

[18] 《晉書》卷九十二：“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可見他幼年時期在臨淄度過。

[19] 《晉書》卷五十一：“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父龕，馮翊太守。”可見束晳在沙鹿山或馮翊長大。本文認為是馮翊出身。

[20] 《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惠懷之際，河東先擾。……。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郭璞從幼年起就居住在河東，並在那裡學習卜筮，直到惠帝時期才逃往東南。

[21] 《晉書》卷四十四：“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雖然盧諶的幼年時期

下面將確認在 230 年到晉室南渡前的 308 年之間出生的文人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北方文人大多仍保持著較低的獨用率和完全獨用率，延續前一時期的趨勢（見表 3）。不過，也有像郭璞和束晳這樣獨用率相對較高的文人存在。

表 4：吳郡文人（230～308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陸機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261	98.5(100)	90.91(100)	23	65
陸雲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262	94.5(100)	76.4(100)	23	55
夏靖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3 世紀	100	100	1	3
蔡洪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3 世紀	100	100	2	6
鄭豐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3 世紀	100	100	4	12

木津（1996）的考證顯示，西晉時期隨著孫吳的滅亡，有一群可稱為“吳人集團”的吳地出身者移居洛陽。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生的。其中，夏靖、蔡洪、鄭豐等人完全區分了魚韻和虞韻（見表 4）。

“吳人集團”的代表無疑是二陸兄弟，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押韻資料。他們的獨用率未達到 100%是因為存在虞韻的同用例，但這些同用例的虞韻字僅限於唇音和云母字，這已經由三輪（2023）指出。因此，本表假設虞韻的唇音和云母字也可以與魚韻通押，在括號內同時列出了這種情況下的獨用率和完全獨用率[22]。這些數值在二陸兄弟身上均達到 100%。

綜上所述，在這一時期的吳郡地區，魚韻和虞韻被明確區分，通押也僅限於虞韻唇音和云母字。

表 5：會稽文人（230～308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楊方	會稽山陰	浙江紹興	3 世紀?	75	0	1	4

然而，會稽的情況與吳郡有所不同（見表 5）。現存的例子僅有楊方《合歡詩》中的“(浮求)軀(杯裯)趨(留)魚(牢)軀(灰儔) ”。雖然具有吳方言的特徵，如虞韻和尤韻通押。但反之也能看到魚韻的“魚”與虞韻的“軀趨”通押。我們可以推測，在楊泉和

尚不清楚，但考慮到其父親曾任職鄴下，本文將其視為鄴下出身。

[22] 在每個合用例中，如果魚韻字出現頻率較高，則將虞韻唇音和云母字視為魚韻字進行計算；反之則將虞韻唇音和云母字視為虞韻字進行計算。

胡綜之後，這個時期的會稽可能依然未區分魚、虞韻。

4.3 314～399 年（孫恩之亂前）

表 6：南渡文人（314～399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支遁	江南[23]	江蘇/浙江	314	64.3	0	4	28
孫綽	會稽[24]	浙江紹興	314	71.4	25	10	28
傅亮	會稽[25]	浙江紹興	374	73.7	21.1	4	19
王韶之	烏程[26]	浙江湖州吳興	380	90(100)	70(100)	4	10
顏延之	建康[27]	江蘇南京	384	40	20	11	40
謝靈運	會稽[28]	浙江紹興	385	72.3	25.5	23	94

下面來看從晉室南渡後的 314 年至孫恩之亂發生於 399 年期間出生的文人的情況。首先是南渡士人（見表 6），如 314 年出生的支遁和孫綽等，在幼年時期隨家人避難至江南，可以視為南渡一世的文人。這些文人的独用率和完全独用率與前時代北方士人相當，並不明確區分魚、虞韻。這種趨勢延續到 4 世紀下半葉，如琅邪顏氏的顏延之和陳郡謝氏的謝靈運，也未區分魚、虞韻。顏延之雖幼年時期即居住於建康，但在 4 世紀下半葉的建康南渡士人社會中仍未區分魚、虞韻。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會稽的南渡士人也沒有區分魚、虞韻。

然而，也出現了一些稍有不同趨向的文人。琅邪王氏的王韶之區分了魚、虞韻，但合用例僅限於《開封府君歌》的"序舉羽(祖祜)"，其中"羽"為云母。王韶之從幼年起就居住在吳興郡烏程縣境。雖然王韶之本人出自名門琅邪王氏，但他的家族已經

23 《高僧傳》卷四："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他的幼年時期雖多未詳，但熊開發（1997:99）認為支遁是永嘉之亂期間南遷的北方士族之一。

24 《晉書》卷五十六："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他幼年時與兄孫統一同渡過長江，後來定居於會稽。考慮到語言形成期在會稽度過，因此看作出身地為會稽。

25 《晉書》卷四十七："敷字穎根……永嘉之亂，避地會稽。"泥陽傅氏在傅亮之前的傅敷階段已經避難到會稽。本文將傅亮視為會稽出身。

26 《宋書》卷六十："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

27 《宋書》卷七十三："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

28 佐藤（1997: 37）根據《詩品》中的"十五方還都"這一描述推測，謝靈運十五歲時避開孫恩之亂，從會稽逃往烏衣巷。本文也遵循這一說法，認定謝靈運在此之前居住在會稽。

衰敗，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可能深受烏程本地方言影響。

表 7：江南文人（314～399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孔寧子	會稽山陰	浙江紹興	4 世紀	100	100	1	8
孔欣	會稽山陰[29]	浙江紹興	4 世紀	54.5	0	1	11
顧愷之	晉陵無錫	江蘇無錫	348?	60	10	4	10
沈演之	吳興武康	浙江湖州德清	397	50	0	1	4

這一時期江南本地文人的用例極少，僅有表 7 中的四人。會稽山陰的孔寧子僅在《氂牛賦》中有"阻渚狩鼠楚旅序所"一例，並無虞韻的用例。同樣出身會稽山陰的孔欣有《相逢狹路間》中的"蹔衢如驅渝虛樞胥廬書娛"一例，顯然是隨意地通押魚、虞韻。吳興沈氏的沈演之有《白鳩頌》中的"栩所處宇"一例，通押魚、虞韻。此外，無錫的顧愷之也通押魚、虞韻。

雖然沒有吳郡的用例，但可以說江南地區在這個時代普遍不區分魚、虞韻。會稽可能延續了前一時代的押韻特徵，其他文人可能也受到與南渡士人交流影響而形成了這種押韻習慣。

此外，作為吳地以外的南方人，尋陽柴桑的陶淵明也通押魚、虞韻（見表 8）。

表 8：陶淵明（314～399 年）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陶淵明	尋陽柴桑	江西九江	365	66.9	5.8	21	121

4.4 南朝（5 世紀以後）

然而，5 世紀以後，不論是否為吳人，南朝的大多數文人都開始區分魚、虞韻。首先來看本貫江南的文人。

表 9：江南文人（5 世紀以後）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沈約	吳興武康	浙江湖州德清	441	100	100	35	151
張融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444	80(100)	60(100)	3	5
孔稚珪	會稽山陰	浙江紹興	447	100	100	1	3
虞羲	會稽餘姚	浙江餘姚	5 世紀	100	100	4	16

[29]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卷四十："會稽山陰人,仕晉。入宋為國子博士。"

吳均	吳興故鄣	浙江湖州安吉	469	96.3	88.9	10	27
陸倕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470	100	100	4	17
陸厥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472	100	100	3	11
張率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475	100	100	3	14
沈炯	吳興武康	浙江湖州德清	504	79.0	26.3	6	19
顧野王	吳郡吳	江蘇蘇州吳中	519	100	100	1	4
虞世基	會稽餘姚	浙江餘姚	557	100	100	4	11

他們幾乎一致區分了魚、虞韻。繼二陸等“吳人集團”之後，如陸倕、陸厥、張率、顧野王等吳郡出身者完全區分了魚、虞韻。同樣，吳郡的張融雖有合用例，但僅見於《海賦》中虞韻的云母字“羽”與魚韻的字“舉”合韻，顯示其吳方言的特徵。這個時代不僅限於吳郡，像孔稚珪和虞羲等會稽文人的用例也具有相同的特徵，這在之前的時代是不常見的。

在表 9 中，吳均和沈炯的獨用率及完全獨用率較低。吳均雖然完全獨用率較低，但實際上僅有《食移》中的“阻佇<u>縷</u>”一例。該句“羌難得而覯縷”，引用了後漢王延壽《王孫賦》的相同表達。“覯縷”意為“委曲”（《廣韻·戈韻· 小韻·覯》），是一個雙聲詞，或許可以認為是一個例外。

表 10：彭城劉氏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劉義恭	京口	江蘇鎮江丹徒	413	97.7(100)	79.0(100)	5	19
劉駿	建康	江蘇南京	430	92.9(100)	78.6(100)	6	14
劉鑠	建康	江蘇南京	431	100	100	1	7
劉彧	建康	江蘇南京	439	100	100	1	3

下面來看南渡士人的後裔。拙稿（2023）曾指出，南渡文人的後代不僅區分魚、虞韻，合用也僅限於虞韻的唇音和云母，展現出吳方言的特徵。

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彭城劉氏（見表 10）。雖然他們的籍貫是位於江南以北的彭城，但實際上自劉混曾祖父時期開始遷居京口[30]，並定居於此。

劉鑠和明帝劉彧完全區分魚、虞韻，而劉義恭和孝武帝劉駿雖然有合用的情況，但合用僅限於虞韻的唇音和云母字。

劉義恭出身江南五世，已經明顯受到京口方言的影響。他並非出身所謂的門閥

[30] 《宋書》卷一：“高祖武皇帝諱裕，……，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

貴族，而是中等程度的官吏家庭，或許這也促進了他對本地方言的接受。

表 11：琅邪王氏（5 世紀以後）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王僧達	建康[31]	江蘇南京	423	100	100	2	5
王秀之	建康[32]	江蘇南京	442	57.1	0	1	7
王儉	武陵[33]	湖南常德	452	78.6(100)	50(100)	4	14
王融	建康[34]	江蘇南京	467	93.8	84.4	10	32
王褒	建康[35]	江蘇南京	513	100	100	7	23

在 5 世紀，琅邪王氏也顯示出明顯區分魚、虞韻的趨勢（見表 11）。

出生於建康的王僧達是南渡第五世，雖然用例數量不多，但完全區分魚、虞韻。被認為是南渡第六世的王秀之，初看似乎沒有區分魚、虞韻。他的用例只有《臥疾敘意》的“豫慮曙(暮)霧去(故)樹(路)賦”一例，其中虞韻僅包括“霧”“樹”“賦”三字，而“樹”以外皆為唇音。這也顯示出與吳方言相近的特徵，即魚韻和虞韻的唇音通押。正如拙稿（2023: 60）指出的那樣，王儉也區分魚、虞韻，並且當通押時只限於虞韻的唇音字“武”和云母字“雨”。王融雖然看似對魚、虞韻的區分不嚴格，但如拙稿（2023: 63）指出的那樣，他與魚韻通押的虞韻字除了“樹”以外只有唇音的“務”。北周人的王褒實際上出生於建康，完全區分魚、虞韻。

這樣看來，早期來到江南的琅邪王氏，在南渡第五世的時候已經能夠區分魚、虞韻了。

31 《宋書》卷四十二：“（王弘）（永初）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弘於王僧達出生前一年進入宮廷，因此推測王僧達也在建康長大。

32 《南齊書》卷四十六：“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他的父親是金紫光祿大夫。王秀之應該是在建康長大的。

33 《南齊書》卷二十三：“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同卷三十三：“（王僧虔）兄僧綽，為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為廢寢食。”王儉在出生後不久，其父僧綽遭到殺害，被其叔父僧虔所撫養。他們在孝武帝即位初期（約 453 年）與僧虔一同遷居武陵，推測在那裡度過了語言形成期。

34 《宋書》卷七十五：“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為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王融的父親道琰在王融出生前的公元 465 年返回建康，然後在抵達其下任地廬陵之前去世。因此，推測王融的幼年時期是在建康度過的。

35 《梁書》卷四十一：“（王規）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王褒出生時，其父王規應當在建康，因此推測王褒也是建康出身。

表 12：陳郡謝氏（5 世紀以後）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謝瞻	會稽?	浙江紹興?	387	100	100	1	2
謝惠連	建康?	江蘇南京?	407	100	100	4	10
謝莊	建康[36]	江蘇南京	421	70.6	23.5	15	34
謝超宗	嶺南[37]	廣東	430	81.3(93.8)	43.8(68.8)	6	16
謝朓	建康[38]	江蘇南京	464	96.8(98.4)	90.3(95)	15	62
謝微	建康?	江蘇南京?	500	100	100	1	5

接下來看居住在會稽的陳郡謝氏的情況（見表 12）。南渡第四世的謝惠連是謝靈運之後的一代，他完全區分魚、虞韻。而生於 500 年的謝微雖然沒有虞韻的用例，但魚韻是獨用的。謝超宗和謝朓的獨用率雖然不是 100%，但其通用例中虞韻的云母和唇音字占多數，這一點已在拙稿（2023: 59-60）中指出。

雖然也存在像謝莊這樣獨用率和完全獨用率都較低的例外，但我們可以在 5 世紀以後的會稽的謝氏家族中，看到區分魚、虞韻，並且唇音和云母與魚韻通用的趨勢。

表 13：蘭陵蕭氏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蕭道成*	南蘭陵	江蘇常州武進	427	75(100)	0(100)	1	4
蕭賾*	建康	江蘇南京	440	100	100	1	2
蕭衍	秣陵同夏[39]	江蘇南京	464	100	100	3	6
蕭子範*	建康	江蘇南京	486	84.6	69.2	7	13
蕭子顯*	建康	江蘇南京	487	100	100	1	2
蕭子雲*	建康	江蘇南京	487	78.6	35.7	3	14
蕭統	建康[40]	江蘇南京	501	84.4	40.6	10	32

[36] 《宋書》卷五十八：“（謝弘微）太祖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謝莊出生不久，其父謝弘微便已於太祖文帝即位時（公元 424 年）成為黃門侍郎，因此推測謝莊與父親一同居住在建康。

[37] 《南齊書》卷三十六：“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謝超宗在元嘉末（約 453 年左右）之前是在嶺南長大的。

[38] 《宋書》卷五十二；“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謝朓的父親謝緯曾被流放到廣州，在孝建年間（454-456 年）返回建康，而在謝朓出生後不久的泰始年間（465-471 年）升任正員郎中。由此推測謝朓也是在建康度過了幼年時期。

[39] 《梁書》卷一：“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40] 《梁書》卷八：“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表示他出生於襄陽。然而，次年梁國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蕭綱	建康	江蘇南京	503	94.3	75.3	52	158
蕭綸	建康	江蘇南京	507	100	100	1	3
蕭繹	建康	江蘇南京	508	90.5	71.4	23	63
蕭詧	建康	江蘇南京	519	100	100	2	5
蕭大圜	建康	江蘇南京	542?	100	100	1	4
蕭慤	建康?	江蘇南京?	6 世紀	100	100	4	12

此外，南朝后期，齊和梁的皇室蘭陵蕭氏留下了許多用例（見表 13）。為了區分，齊皇室的蕭氏（蕭僊的血統）在名字右標注星號。齊皇族的蕭賾和蕭子顯完全區分了魚、虞韻。蕭道成的用例僅限於《塞客吟》的"序楚武渚"一例，其中"武"是唇音字。而蕭子範和蕭子雲的獨用率都較低。蕭子範的押韻例中，除了《七誘》的"府書"和"(土)柱距"外，其餘全部區分魚、虞韻，其中前者為虞韻唇音字"府"。蕭子雲的獨用例僅見於《梁三朝雅樂歌·俊雅》的"序寧舉旅楚"，而《梁三朝雅樂歌·雍雅》的"序筥羽舉簧"和《梁三朝雅樂歌·需雅》的"初需芻書祛"則屬於合用例，其中前者為云母字"羽"。

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推斷齊的蕭氏區分了魚、虞韻，且同用時也傾向於使用虞韻的唇音字和云母字。

梁的蕭氏（蕭鏘的血統）雖然大致上區分魚、虞韻，但蕭統、蕭綱和蕭繹兄弟的作品數量眾多且獨用率明顯較低。然而，即使如此，蕭統的完全獨用率也達到了 40%，蕭綱和蕭繹則超過 70%，明顯高於魏晉時期北方文人。此外，兩字以上的魚韻字與一字虞韻字通押時，虞韻字大多數是唇音和云母字。例如，蕭統的《示雲麾弟》中的"阻舉渚雨所予佇"，蕭綱的《有所思》中的"輿疎虛蕪"，蕭繹的《玄覽賦》中的"渚與(鼓)武(虎)"都屬於這種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蕭綱的《怨歌行》中的"初虛軀除舒魚疎祛輿"。此外，蕭綱《舞賦》中的"侶拊赴"，蕭繹《庾先生承先墓誌》中的"府舉"也是虞韻唇音字與魚韻通用的例子。

根據以上的事實，我們推測，雖然蕭統、蕭綱和蕭繹兄弟在押韻時可能對魚、虞韻的區分較為寬鬆，但他們在自然語言中可能已有能力區分魚、虞韻。蕭統早逝，而蕭綱和蕭繹的押韻風格相似性可能不僅與他們的兄弟關係相關，也與他們在宮體文學集團中的核心地位有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文學集團的成員或受到其影響的文人都像他們一樣獨用率低。如庾肩吾、江總以及喜愛宮體詩的陳叔寶

建立後遷都建康，因此推測他的語言形成期在建康度過，本文將其視為建康出身。以下，蕭衍的兒子皆被視為建康出身。

等人完全區分魚、虞韻，而徐陵和庾信也幾乎區分魚、虞韻。至於徐陵和庾信的通押例，正如拙稿（2023: 63-64）所指出的，虞韻唇音字和云母字與魚韻的通押很多。

4.5 北朝

表 14：北朝前期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衛操	代郡	山西大同	3 世紀	73.7	10.5	5	19
高允	中山[41]	河北定州	390	69.6	30.4	8	23
宗欽	金城[42]	甘肅蘭州	4 世紀末?	92.3	46.2	4	13
程駿	姑臧?[43]	甘肅武威?	414	66.7	33.3	2	3
陽固	?	?	467	76.9	38.5	7	13
元宏	平城	山西大同	467	71.4(100)	0(100)	1	7

跟南朝相比，北朝的資料較少。表 14 記載了直至孝文帝元宏時期的北朝士人資料。據推測在 3 世紀後半出生於代郡的衛操，以及 390 年出生於渤海的高允，與前代北方文人一樣，完全不區分魚韻與虞韻。然而，約在 400 年左右出生於甘肅的宗欽，独用率明顯增高。到了 467 年出生的孝文帝元宏，則顯示出與吳方言完全相同的特徵，即虞韻云母字“禹”、“宇”與魚韻通押。

表 15：北朝後期

文人	出生地	今址	生年	獨用率	完全獨用率	韻數	韻字數
李諧	鄴[44]	河北邯鄲臨漳	496	100	100	1	9

[41] 《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為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高允返回故鄉（渤海）時已經度過語言形成期，大約是十幾歲。推測他至少在道武帝攻下中山之前（公元 397 年）居住在中山，故將其出生地視為中山。據信他當時也認識仕於慕容垂身邊的崔宏。

[42] 《魏書》卷五十二：“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宗欽在金城黃河以西，或者呂光的都城姑臧長大，這一點已經確定。本稿暫時將其定位為金城。雖然他的出生年份不詳，但推測是在呂光在位的 4 世紀末左右。

[43] 《魏書》卷六十：“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程駿出生於涼州，雖然具體地點不明確，本文暫時將其定為呂光的都城姑臧。

[44] 《魏書》卷六十五（李平傳）：“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下，親幸平第，見其諸子。”他的父親李平居住在相州鄴下，因此推測李諧也在鄴長大。

溫子昇	濟陰冤句[45]	山東菏澤	496	100	100	1	2
邢邵	洛陽[46]	河南洛陽	496	100	100	1	4
盧元明	洛陽?	河南洛陽?	6 世紀?	100	100	1	5
王偉	潁川[47]	河南禹州	6 世紀?	100	100	1	2
魏收	洛陽[48]	河南洛陽	506	100	100	1	4
陸卬	洛陽	河南洛陽	510	100	100	6	14
盧思道	鄴?	河北邯鄲臨漳?	535	100	100	5	24
楊素	長安?	陝西長安?	544	100	100	1	5
牛弘	長安[49]	陝西長安	545	94.7(100)	84.2(100)	6	19
孫萬壽	鄴[50]	河北邯鄲臨漳	556	100	100	1	8
煬帝	長安	陝西長安	569	100	100	3	11

表 16 所記載的是孝文帝以後的北朝文人。溫子昇、邢邵、魏收、陸卬、盧思道、煬帝楊廣等主要文人，都可以區分魚韻和虞韻。

此外，出生於西魏的牛弘完全區分了魚韻和虞韻，通押例只有《圜丘歌·文舞》中虞韻云母字“雨”一例。此外，於 517 年逝世的北魏人崔敬邕的墓誌銘、“魯孔子廟碑”、北齊的“洛陽合邑諸人造像銘頌”以及“北齊後主時謠”等闕名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魚韻和虞韻唇音、云母字的通押例。

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是受到了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政策以及南朝文學的影響。特別是《切韻序》中提及的所謂“五家韻書”，其中包括了陽休之的《韻略》、李季節的《音譜》、杜台卿的《韻略》這三本北朝的韻書。這些書中都明確區分了魚韻上聲

45 《魏書》卷八十五：“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

46 《北齊書》卷三十六：“邢卲，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卲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考慮到邢卲父親曾在宮中任職，並為官僚崔亮所知，以及“少在洛陽”的記載，推測他是洛陽出身。

47 《南史》卷八十：“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為許昌令，因居潁川。”

48 《北史》卷五十六：“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于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群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魏收的父親魏子建最初擔任奉朝請，後來隨魏收一同調任東益州。推測他十五歲以前居住在洛陽，因此將他的出身地定為洛陽。

49 《隋書》卷四十九：“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牛弘的幼年經歷尚不明確，但考慮到他與西魏有關，因此暫時將其出身地定為長安。

50 《隋書》卷七十六：“父靈暉，齊國子博士。”由此推測他出生於北齊的鄴下。

語韻和虞韻上聲麌韻，這一點在王仁昫的《刊謬補缺切韻》（王三）中有明確記載[51]。特別是陽休之是北魏的陽固之子（其確切出生地不詳）[52]，這一時期押韻風格的急劇變化，更多地反映了規範意識的變化，而非自然語言的變遷。

另外，與南朝出身的顏之推、庾信、王褒等文人的直接交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例如與顏之推同為《切韻》編纂者的盧思道，在北周時他的作品曾受到庾信的高度讚揚[53]。

因此可以說，北朝文人對於魚韻和虞韻的區別，更多來自於受到南朝文學和韻書的影響而產生的規範意識的變化。

五、地圖與考察

5.1 時序地圖

根據以上數據，筆者製作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魚、虞韻分合的時序地圖。晉朝南遷之前居住在江南的文人標示為□，其他文人標示為◯。獨用率超過 90%而且完全獨用率超過 80%的文人標示為紅色，完全獨用率超過 40%的文人標示為紫色，其他文人標示為藍色。5 世紀以後分為了三個部分。

51 《刊謬補缺切韻》卷三：“語，呂與麌同，夏侯、陽、李、杜別，今依夏侯、陽、李、杜。”

52 《北齊書》卷四十二：“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

53 《隋書》卷五十七：“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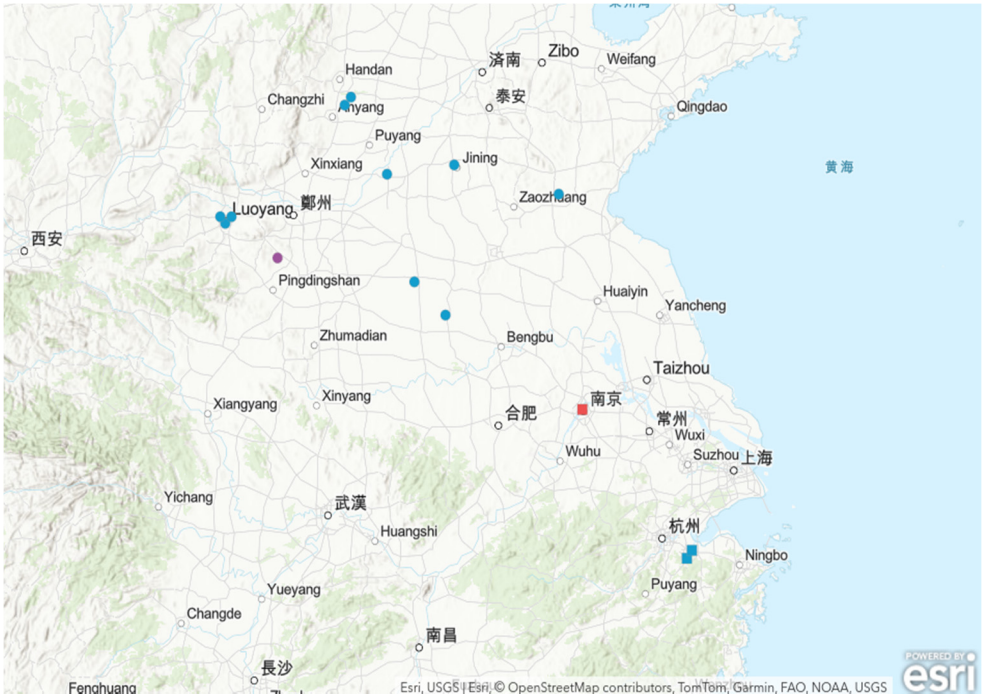


圖 1：170～224 年



圖 2：230～308 年



圖 3：314～3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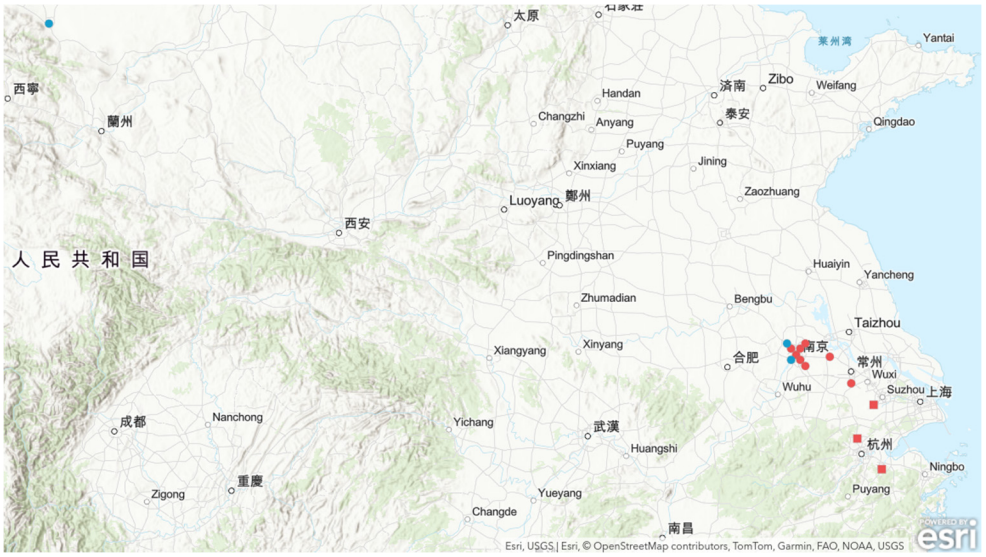


圖 4：400～450 年



圖 5：451～490 年（南）



圖 6：451～490 年（北）



圖 7：491～569 年

5.2 會稽、吳興與吳郡

自六朝前期以來，會稽地區長期顯示出較低的的獨用率。根據大川（1985）的考證，會稽原本自後漢時代以來即成為移民繁盛之地。而根據王志邦（1989）的研究，即便在晋室南渡後，這種趨勢還持續了一段時間。當然，楊泉、胡綜等人是在晉室南渡之前就已移居會稽的文人。後漢至東晉時期這種移民在會稽郡產生了很強的影響，有可能當時還未能區分魚韻和虞韻。

再來看吳興。烏程的王韶之在魚韻和虞韻的使用規則方面與吳郡接近。而在武康的沈氏家族中，排除沈約這一例外的話，可以看到沈演之和沈炯的魚韻獨用率都較低，這可能也體現了一些地域和家族上的特徵。吳均的合用例也非常少，但魚韻的獨用率未達到 100%，這一點可能與其本貫吳興故鄣的方言特徵有關。然而，就算在沈氏家族中，到了陳至隋時代的沈君道，也可以看到魚韻獨用的例子（如《侍皇太子宴應令》中的“車疎魚餘”）。

總之，即使在江南內部，也可以看到方言的差異，尤其是可以認為區分魚韻和虞韻是吳郡的一個特徵。

5.3 西北地區

圖 2 以及圖 3 的西北地區中的紫色值得注意。它代表了即便不完全，仍能在某種程度上區分魚和虞音的地區。潘悟雲（1983/2002: 47）指出隋唐五代時期，西北方言中已經對魚、虞韻有所區別。實際上，這一趨勢可能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

5.4 六朝末的一個特徵

最後，筆者想談談六朝末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區別魚、虞韻，並且在合用時也僅限於虞韻的唇音、云母字，這是吳方言的一個特徵。這一點在六朝大多數文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但到了六朝末年，似乎還出現了將虞韻以母字與魚韻通押的現象。

涉及這一現象的文人有孔奐、文帝楊堅和虞世南三人。孔奐在《和六府》中用了魚韻的“裾余漁居譽”和虞韻以母的“榆”，楊堅在《宴秦孝王於并州作》中用了魚韻的“除”、虞韻唇音的“無”和虞韻以母的“臾”，虞世南在《奉和幸江都應詔》中用了魚韻的“樗”和虞韻以母的“歈”來押韻。

雖然這些文人的用例數量不多，但這樣的趨勢在之前的時代幾乎看不到，非常值得注意。考慮到《切韻》之後云母和以母的合流過程，可以說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值得今後進一步探討。

六、結語

本文依據文人的出身地和年代描繪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魚、虞韻的分合情況的時序地圖。從中可以看出，對魚、虞韻的區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在整個魏晉南北朝的範圍內擴展開來。最初這種區分在吳郡吳縣尤為明顯，而後它在南渡文人中的京口和烏程等寒門出身者之中被接受，最終擴展到包括北朝在內的整個中國。此外，押韻資料和地圖顯示，西北方言從魏晉南北朝初期起可能就已經區分了魚、虞韻。而在江南地區，特別是早期移民活動頻繁的會稽地區，受南北朝初期不區別魚、虞韻的北方語言影響較大。除了沈約以外的吳興沈氏也很有可能未區分魚、虞韻。

不過，對於這種吳方言特點的接受是否涉及自然語言，還是僅僅處於作詩上的考慮，仍需要結合魚韻和虞韻以外的韻腳情況以及唐代的押韻情況進行比較，才能做出慎重的判斷。

本文僅調查了魚、虞韻的分合情況，實際上還需要仔細研究相鄰的歌韻和尤、

侯韻的分合情況。雖然區分魚、虞韻這一吳方言特徵已經廣泛傳播到了南渡文人中，但實際上，吳方言的其他特徵，如虞韻與尤韻的通押，在南渡文人中幾乎沒有被接受。從這點來看，並不能斷言吳方言在基層方言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應該說，以南渡文人帶來的北方方言為基礎，一部分吳方言的特徵也被吸收了進去。

此外，本文在製作地圖時為了方便起見，只能將文人的出身地定為一個地點。例如，本文將左思的出身地視為臨淄，但潘悟雲（1983/2002: 50）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他可能在上洛後在宮中學習了洛陽方言。事實上，這兩種語言哪一種佔主導地位很難判斷。此外，還需審慎考慮文學風格和文學集團的人際關係對個別文人押韻情況的影響。自然語言與押韻上的語言並非必然一致，這也是今後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曹道衡、沈玉成 1991《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大川富士夫 1985「後漢代の會稽郡の豪族について」『立正大學文學部論叢』81

陸侃如 1985《中古文學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羅常培 1931《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1963 所收）

羅常培 1963《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中華書局

木津祐子 1996「陸機と「楚」:聲律意識の形成について」『中國文學報』1996(53)

潘悟雲 1983《中古漢語方言中的魚和虞》《語文論叢》2:78-85 頁（2002 所收）

潘悟雲 2002《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潘悟雲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三輪大樹 2023「六朝文人における虞韻唇音・云母字と魚韻の通押現象」『雲漢』1

王志邦 1989《東晉朝流寓會稽的北方士人研究》《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

熊開發 1997《支遁生平事蹟及思想考辨》《海南師院學報》1997(04)

易小平 2003《吳質生平及著作考略》《齊魯文化研究》2003(00)

周祖謨 1996《魏晋南北朝韻部之演變》東大圖書公司

佐藤正光 1997『南朝の門閥貴族と文學』汲古書院

〔古籍〕

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 年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文出版社，1972 年

《北齊書》，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2 年
《北史》，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4 年
《高僧傳》，叢書集成初编，中華書局，1991 年
《晉書》，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4 年
《梁書》，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3 年
《南齊書》，二十五史系列，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
《南史》，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5 年
《三國志》，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59 年
《宋書》，二十五史系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隋書》，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3 年
《太平御覽》，國學基本叢書，新興書局，1959 年
《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國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1947 年
《魏書》，二十五史系列，中華書局，1974 年
《意林》，叢書集成初编、中華書局 1991 年

藏语支语言数词“二十”与二十进制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铃木博之
京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藏语支语言数词“二十”的词形及二十进制开展地理语言学分析。研究表明，藏语支语言本来具有两套数词，即独立使用的数词与跟度量衡量词搭配使用的数词。数词的独立形式为十进制，二十进制的数词形式则属于后者。目前，东部藏区的部分区域（迭部县下迭地区）保留的二十进制与其形式能单独使用，但其使用条件根据地区和使用者年龄有所不同。文章对相关词形按来源分为几种并绘制分布地图，之后重点对迭部县及其周边地区的二十进制使用条件进行详细的解释。

一、前言

藏缅语族语言大部分拥有十进制数词系统，其中少数语言的土话才具有二十进制数词系统。二十进制主要出现在不丹、尼泊尔等地区的语言中，如仓拉（Tshangla）语、东博语支（East Bodish）语言、基然提语支（Kiranti）语言等（Shirai et al. 2023）。二十进制在藏语支（Tibetic）语言中也不多见。按照 Tournadre and Suzuki（2023）的分类，藏语支内西北组（如巴尔蒂[Balti]语等）、西南部组（夏尔巴[Sherpa]语、约尔姆[Yolmo]语等）、南部组（宗卡[Dzongkha]语、锡金[Dränjong]语、达布[Dwagspo]语等）、东部组（下迭部[Thewo-smad]语等）等语言中，二十以下的数词为十进制，但二十及以上数词呈现出二十进制。

藏语支语言的二十进制数词早期也受到关注，例如 Mazaudon（1982）、Bielmeier（1985）、共确加措（1987）、van Driem（1998）、Hari and Lama（2004）、Tournadre et al.（2009）、仁增旺姆（2011, 2013）、Yliniemi（2019）等学者的报道。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大致为基数词呈现二十进制。然而，藏语书面语（也可以说古藏语）有两套数词系统：一是单独出现的基数词，使用十进制；另一套是与量词同时出现的数量数词，使用二十进制。但二十进制并不是用于表达所有的数量。实际情况下，十进制与二十进制往往并存于一个土话内，只是作为基数词使用时，有的土话使用十进制，有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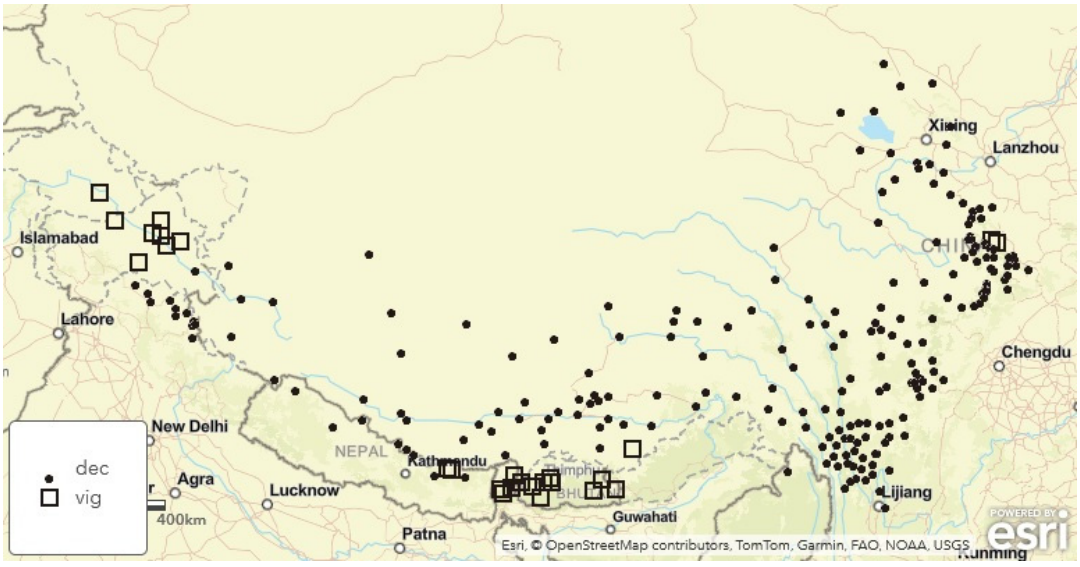
话使用二十进制。目前，这两个并存的进制慢慢统一成单一的进制，而统一成哪一个进制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十进制和二十进制的书面语词形[1]有以下区别，如例（1）所示。

（1）

数词	基数词（十进制）	数量数词（二十进制）
一	gcig	gang
二	gnyis	do
十	bcu	tham pa
二十	nyi shu	khal cig

在现代口语中，严格区分使用两套数词的语言有限，明确保留古代（或早期）面貌的土话只有达布语等少数语言。大部分藏语支语言保留“一”的 gcig 和 gang 之间的对立，其次也可能保留“二”的两种形式。其余数词在大部分语言中都统一使用基数词词形，即采用十进制。下面图 1 表示藏语支语言内部使用二十进制的土话的分布概况。可以看出，这些使用二十进制的土话都位于藏语支语言分布区的周边。



dec：十进制；vig：二十进制

图 1：藏语支语言内使用二十进制的土话分布（“二十”以上的基数词）

[1] 藏文的拉丁转写依据 de Nebesky-Wojkowitz (1956)。

二、“二十”的词形和二十进制数词的表现

藏文的基数词“二十”为 nyi shu，本来各音节分别表达“二”义与“十”义。其特殊之处是，第二音节为擦音，而不是塞擦音(b)cu。现代各种口语中基本都出现擦音声母。明代汉-藏对照词汇集（即丙种本《西番馆译语》）存在一个例外，所记录的“二十”为“尼竹”，“竹”代表了塞擦音声母。

二十进制的数词“二十”含有 khal（音译成“克”；参见仁增旺姆 2011；以“二十个”为一的数量单位；可以说用作量词）作为词根，后续有一个表“一”的词素，按口音可以写成 gcig 或 yig。前者 gcig 在南部组语言中出现，后者 yig 在东部组语言中出现。比如，南部组宗卡语[2]的说法如（2）所示：

（2）

	宗卡语	书面语写法（直译）
二十	$k^{h}\varepsilon$: tɕi	khal gcig（一克）
二十一	$k^{h}\varepsilon$: tɕi ta tɕi	khal gcig dang gcig（一克和一）
三十	$k^{h}\varepsilon$: $^{p}tɕ^{h}e$ ta $^{ʔ}ŋ̊i$:	khal phyed dang gnyis（到两克差一半）
三十一	$k^{h}\varepsilon$: tɕi ta tɕu: tɕi	khal gcig dang bcu gcig（一克和十一）
四十	$k^{h}\varepsilon$: $^{ʔ}ŋ̊i$:	khal gnyis（两克）

东部组桑坝话的说法如（3）所示：

（3）

	桑坝话	书面语写法（直译）
二十	$k^{h}\varepsilon$: ji	khal yig（一克）
二十一	$k^{h}\varepsilon$: ji ^{h}tɕiʔ	khal yig gcig（一克一）
三十	$k^{h}\varepsilon$: ji $t^{h}\alpha$: ba	khal yig tham pa（一克十）
三十一	$k^{h}\varepsilon$: ji ^{h}tɕu ^{h}tɕiʔ	khal yig bcu gcig（一克十一）
四十	$k^{h}\varepsilon$: $^{ɦ}ŋ̊i$:	khal gnyis（两克）

如上面（2）和（3）所示，宗卡语和桑坝话都采用和藏文 khal 对应的词形，但

[2] 宗卡语按铃木博之（2004）的方式标音。

不同之处在于“一”和“十”的词形以及十位和一位之间是否存在连接词素。

与上面不同，西北组的巴尔蒂语也采用二十进制，但其基本词与藏文 nyi shu 对应。例（4）为根据 Sprigg（2002:122）的描述，按 Tournadre and Suzuki（2023）的语音记录方式改写（再自行加对各个音节的书面语写法）得出：

（4）

	巴尔蒂语	书面语写法
二十	ŋis ɕu	nyi shu
四十	ŋis ɕu ŋis	nyi shu gnyis
八十	ŋis ɕu ^{b}ʑi	nyi shu bzhi
九十	ŋis ɕu ^{b}ʑi na ^{p}tɕu	nyi shu bzhi na bcu

此外，在舟曲藏语里还发现了另一种形式。该语言使用 po 音节表达“十”，但不采用二十进制，如（5）所示果耶话的说法：

（5）

	果耶话	书面语写法
十	po ^{h}tɕiʔ	? gcig
十一	^{h}tɕɯ ^{h}tɕiʔ	bcu gcig
二十	po ^{ɦ}ɳi	? gnyis
三十	po ^{h}sɯ	? gsum

目前，该 po 音节的意思尚不清楚，但依据“十”的形式，po 是个普通的名词。理由是没有语言采用数词“十”bcu 构成 bcu gcig 来表示“十”（该说法只能解读为“十一”）。虽然此语素没有相对应的藏文形式，但在下面统一写成 po。

三、甘南迭部及其周边土话中数词“二十”的语言地图

上文提到甘南迭部有二十进制的语言，但其具体分布尚不清楚。因此，本文尝试对甘南迭部、卓尼、舟曲三县开展问卷调查[3]，调查了乡村级调查点的二十进制使用

[3] 此次调查得到了闹九次力（rNal-’byor Tshe-ring；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英周草（gYu-’brug-mtsho；中央民族大学硕士）两位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情况。通过此调查，我们发现二十进制使用的地理分布和代际差异。分布范围如图 2 所示。除了该三县，图 2 还包含了相邻的若尔盖、九寨沟两县的调查点，但不包括任何安多藏语的方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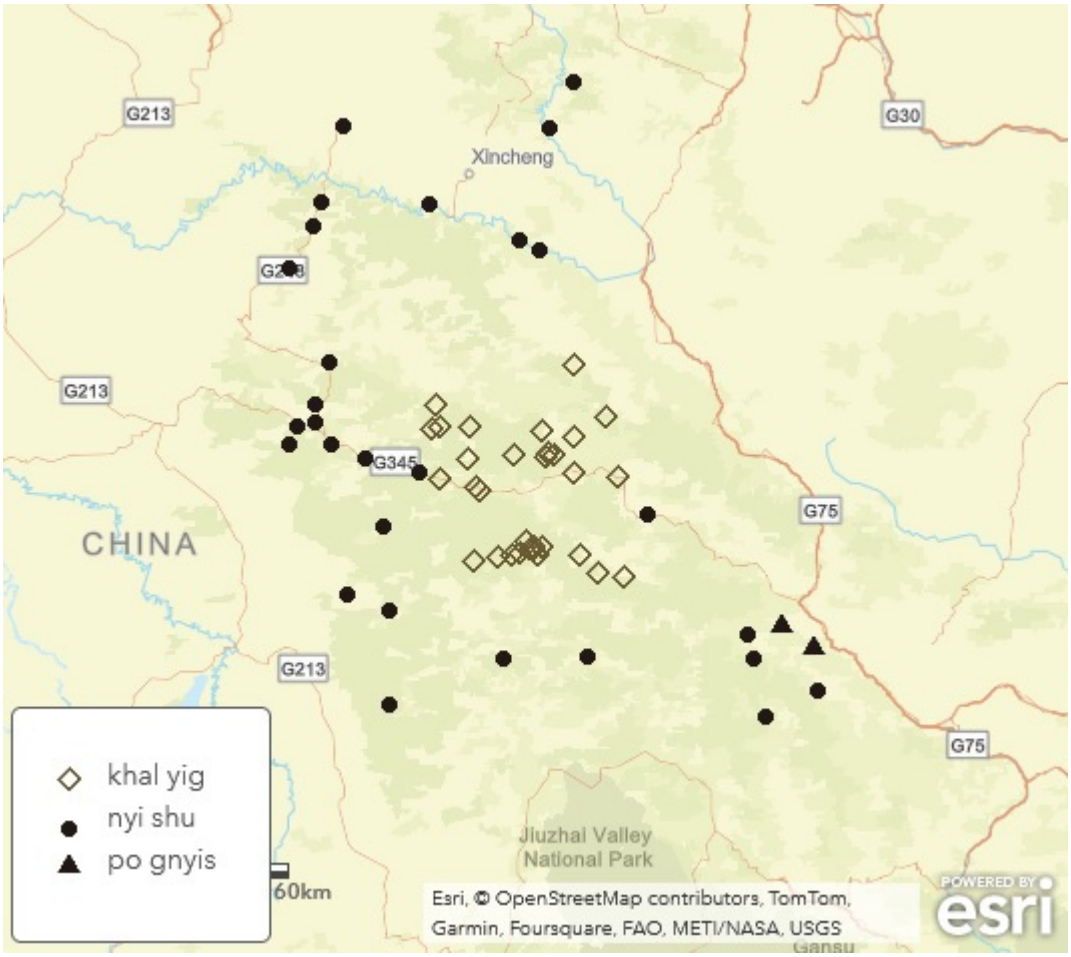


图 2：甘南迭部县及附近调查点的“二十”词形

根据图 2， 使用 khal yig 表达“二十”的范围是迭部县下迭部内的所有村寨：西至卡坝乡，与上下迭部分界区尼沙村接壤（尼沙话使用 nyi shu 和十进制）；东至洛大乡，与舟曲巴藏乡接壤（巴藏话使用 nyi shu 和十进制）；北至腊子口，与岷县接壤（岷县的情况不明；最接近的地点为卓尼那浪乡司日纳村，使用 nyi shu 和十进制）；南至阿夏乡，与九寨沟县大录乡接壤（大录话使用 nyi shu 和十进制）。另外，舟曲的果耶乡、八楞乡等地使用 po gnyis，属于十进制一类，但词形具有特色。

图 2 所示的分布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khal yig 分布区的东、西两端。khal yig 分布区和 nyi shu 分布区由一条公路连接起来，两个区域的居民日常来往频繁。东端部分与迭部、舟曲两县边界对应，而西端部分以传统地理区划中的上下迭部分界线为界。这说明地理区划对语言特征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图 2 所示的词形与笔者亲自记录（参见 Suzuki 2022 的记录点）的词形相比有不同表现。比如，旺藏话、阿夏话和洛大话都使用 nyi shu 和十进制（参见铃木博之 2022），但中年人以上则使用二十进制（如图 2 表示）。图 3 反映的是青年人数词用法的地理分布。



图 3：甘南迭部县及其附近调查点的“二十”词形（青年人）

如图 3 所示，使用 khal yig 和二十进制的区域就相对有限，仅有洛大乡代古寺、

桑坝乡以及卡坝乡亚力巴村等三个地点。在其他地点，khal yig 词形会有残存，不过二十进制完全由十进制替代。

青年人的语言中发生了上述的系统性变化，此情况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如第一节所述，藏语支语言本来就有两套数词，使用二十进制表达数目的同时，也用十进制表达数量，如月、日等名称。目前已确认的是阿夏话，老年人使用二十进制表达数目，但表达月、日的词除外。比如，“初十”是 tshes bcu，而不是 tshes tham pa。这意味着，和大部分藏语支语言一样，数量数词词形慢慢合流为基数数词词形，最先丢失二十进制，但“一”和“二”的数量数词词形（gang 和 do）仍旧保留。

外因包括教育、藏语支内双语、广播电视等多个方面。在学校里，当地口语、汉语（兰银官话或普通话）及安多藏语会发生接触。当年轻一代去城里或都市上学后，就会慢慢习惯使用所谓的“社会上层”语言，即安多藏语和普通话。广播电视媒体的语言大部分都是这些“社会上层”语言。汉语和安多藏语都使用十进制数词，因而同这些语言的接触会影响下迭部藏语的说法，导致二十进制的使用率降低。

四、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整个藏语支语言中二十进制数词的地理分布，发现其分布在该语言区域的周边，即位于东、南、西各端的语言土话中。其次，文章重点讨论了东部区域的迭部及其周边的藏语支语言中二十进制数词的分布与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仅下迭藏语的各种土话才使用二十进制数词。然而，下迭藏语中对二十进制数词的使用已经出现年龄差异，一部分年轻人已开始使用十进制数词。我们指出了出现此情况的两种原因。一是语言词汇系统的内部演化所致。本文所讨论的相关语言有十进制和二十进制，其十进制部分会影响二十进制部分。二是源自地理差异与社会语言学背景。从地理角度，靠近交通路的土话比深山内的土话更倾向于使用十进制数词。从社会语言学背景来看，在外地上过学的母语人，因使用安多话的机会增多扩大，而更容易从二十进制数词系统改用到十进制数词系统。

附记：本研究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17H04774）、基盘研究（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8H00670），及基盘研究（B）“迁徙和语言接触视野下的汉语全时代形成史的历史地理语言学研究”（23K253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共确加措[dKon-mchog rGya-mtsho] 1987《色绕龙哇藏语初探》载《西藏研究》第 2 期 53–69.

仁增旺姆[Rig-'dzin dBang-mo] 2011《"克"（khal）在下迭部藏语中引起的数词系统及相关演变》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141–144.

仁增旺姆[Rig-'dzin dBang-mo] 2013《迭部藏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鈴木博之 2004「ゾンカ語の音声と音素設定」『ニダバ』33: 109–118. URI: http://ir.lib.hiroshima-u.ac.jp/00045540

鈴木博之 2022「下迭部チベット語阿夏['Azha]方言のチベット文語形式との音対応と語彙：迭部県のチベット系諸言語の概観とともに」『言語記述論集』14: 65–114. 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4411/

Bielmeier, R. 1985. *Das Märchen vom Prinzen Čobzaṅ, eine tibetische Erzählung aus Baltistan : Text, Übersetzung, Grammatik und westtibetisch vergleichendes Glossar*. Bonn: Wissenschaftsverlag.

van Driem, G. 1998. *Dzongkha*. Leiden: Onderzoekschool CNWS.

Hari, A. M. and Chh. Lama. 2004. *Dictionary of Yohlmo-Nepali-English*. Kathmandu: Central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ribhuvan University.

Mazaudon, M. 1982. Dzongkha numer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eijing). URI: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0452217

de Nebesky-Wojkowitz, R.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Shirai, S., Sh. Ebihara, K. Iwasa, K. Kurabe, H. Suzuki. 2023. Numeral systems in Tibeto-Burman. In Ch. Fukushima, S. Shirai, M. Fukazawa, H. Suzuki, and M. Endo (eds.) *Linguistic Atlas of Asia and Africa III*, 172–176.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223731

Sprigg, R. K. 2002. *Balti-English English-Balti dictionary*. Richmond: Routledge Curzon.

Suzuki, H. 2022. *Geolinguistic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An introduction*. Tokyo: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5989176

Tournadre, N., Lhakpa Norbu Sherpa, Gyurme Chodrak, and G. Oisel. 2009.

Sherpa-English and English-Sherpa dictionary with Literary Tibetan and Nepali equivalents.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Tournadre, N. and H. Suzuki. 2023.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Villejuif: LACITO Publications.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0026628

Yliniemi, J. 2019.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Denjongke (Sikkimese Bhut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URI: http://hdl.handle.net/10138/300475

关于语言地图符号设计原则的思考

——以“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集”为例

刘岩　黄诗淇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语言地图的标记符号是对语言现象进行描述的重要工具，不仅具有基本的地理定位功能，还可表达不同语言点的语言特征及类型差异。符号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地图的可视化效果。在制图手段和技术不断丰富的今天，理应对语言地图的符号设计这一环节给予足够重视。本文认为符号设计至少要遵循系统性原则、逻辑性原则和认知心理原则，要对语言现象进行细致的分类、分层，把控复杂现象与符号归纳的平衡，以及对特征的抽象反映与视觉解读的平衡。文中还以“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集”项目的符号系统设计为例谈相关问题与思考，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语言地图中符号设计环节的重视。

一、目前语言地图符号的使用状况

语言地图作为地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将语言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变异和扩散以二维平面的形式呈现，是语言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最直观、最有效的信息载体。其中的标记符号，是对语言现象进行描述的重要工具，不仅在语言地图的整体设计与编制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地图的可视化效果。

由于语言地图所要表达的信息十分复杂，涉及到的因素也很多，所以传统的手工制图的方法往往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比如，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制图周期长、版面与色彩设计受限，且对地理空间信息和地面变化因素的反映也不易准确，地图现势性较差。况且手工制图一般都只用黑白符号表示，对语言现象的归类能力就比较弱。有很多对地理语言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成果，仍显示出其符号标记方面的局限。如詹伯慧、张日升（1990）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三·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共收录 42 幅方言特征分布图，为中国方言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而详实的语料，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对古全浊上声今读（图 1）等现象，难以用符号准确地表达分类的内在逻辑。



图 1.《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古全浊上声今读图例

另外，手工绘制对整体制图流程限制也很大。手绘地图比例尺、图幅范围、符号设计一经确定，便不能随意更改。但语言现象纷繁复杂，前后绘制过程难免需要调整，但手绘地图一旦调整则会带来巨大的工作量。金有景（2006）就曾提到，由于设计图例时考虑不周，《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中部分图的符号与最初设定的原则并不相符。且符号大小是固定的，放大或缩小地图时符号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失真。对排版和印刷也有一定限制。总之，手工制图工作量大、容错率低、更新难度高，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大规模的语言地图制图需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被应用到语言研究中，语言地图也进入到了计算机制图时代。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已建成了 1:100 万和 1:25 万地质图空间数据库，为语言地图带来了更为高效、便捷、准确和容错率更高的制图方式。计算机制图可根据地图信息负载量更改地图比例尺、图幅范围、符号大小，能够表达的信息量增加，地图也由黑白地图转为彩色地图，可视化效果显著提高。

尽管计算机制图为语言特征表达提供了更丰富的符号样式，但目前由于对符号的使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规划，导致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给读者造成了很多记忆和理解上的困难。大多数的问题是由于着重于细致的分类而忽略了逻辑的呈现。比如，在不同大类下的相近小类繁多的情况下，只重视了使用不同形状区分小类，而对小类之间的联系缺乏考虑，导致形状样式杂乱。也有作者对设计元素的使用很随意甚至前后矛盾，比如前面使用有无颜色表示发音方法，后面又用形状来表示。这种不一致都会影响到语言地图的阅读效果和对语言特征内在逻辑的理解。总之，地理语言学发展至今，表现手段和符号样式都已经是丰富多样，众多学者的实践成果逐渐面世，很多年轻的学者们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有必要把语言地图的“符号设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进一步研究了。

二、语言地图符号设计的基本原则

语言地图的符号是服务于语言特征分类及其分布位置的表达的，其设计要考虑很

多方面的因素，如语言地图研究对象的语言特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的制图手段和印刷技术、制图行业的传统习惯甚至读者的认知能力等。我们认为在设计符号时，至少要遵循以下几个主要原则。

第一，系统性原则。无论是写单篇文章还是一本著作，或是一本地图集，都要把符号设计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语言现象是异彩纷呈的，也是十分繁复的，但符号标记又是有限的。在一本著作或地图集中，不能奢求全书统一，但至少要有大致的统一安排，不应前后矛盾。比如，我们不能强求一个符号在全书中或整体项目中只能指代一个信息，但颜色和形状分别用于表示什么类的语言特征，如送气和不送气音的区别符号遵循什么原理等，这种设计原则应该统一，可以避免许多误解。系统性原则里还要考虑简洁性。要根据复杂的语言现象的数量和层次，统一掌握符号与现象对应的度，太繁复会失去了符号的归纳性意义，太简单又无法完成分类任务。

第二，逻辑性原则。语言地图符号通常采用一种元素来区分大类，在亚级分类里面用另一种元素，而且符号彼此间要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不可任意为之。多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通过基本图形及其形状组合的实践中，努力地表明语言特征的内在逻辑。次林央珍、铃木博之（2021）绘制了“酥油”“你”等词在东旺乡的 31 个自然村的地理分布，符号设计以语音形式为基础，用形状表示声母、形状内部差异区分韵母，如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你”分为声母 A/ɕʰ/类、B/tsʰ/类和 C/tɕʰ/类三类，分别用圆圈、方框和三角表示，形状内部因韵母不同而不同。如 A1/ɕʰɤ/、A2/ɕʰɛ/、A3/ɕʰie/分别用黑实心●、黑白对半◑和空心圆圈○来表示，而 B3 tsʰie 与其他 tsʰ 类一样用方框表示声母，用空心来表示韵母为/ie/类，所以使用了空心方框□，以此表示小类之间存在关联。

颜色和形状是语言地图计算机绘制时最重要的两个元素。现有的语言地图中，大部分学者以颜色来表示语言特征的大类，再通过符号形状的变化、套叠等方法，在亚级类别下做更细致的区分。如曹志耘（2008）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中“雨的声母”一图（图），以颜色表示不同发音部位的声母大类，再用不同形状表示大类下的具体声母。如：



图 2：《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2008）“雨的声母”图例

也有学者用形状作为基本符号表示大类，再以颜色作为延伸符号表示小类。林春雨、甘于恩（2021）所著《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以形状为基本符号，区别声母、韵母和声调图，以颜色区分具体的语音形式。如遇同一个调查点存在两种语音形式，则采用两种颜色对半的方式，与单一颜色符号产生关联。铃木博之（2022）研究了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的“狗”相关语音形式的地理分布，以形状表示发音部位、颜色表示发音方法的原则来设计符号，如“狗”的声母类型为腭前音的、用圆圈表示，为齿-龈音的，用方框表示；又用橙色表示擦音、黑色表示塞擦音、用符号的实心与空心来区分送气情况，如齿-龈塞擦音[ts]和腭前音[ɕ^{h}]分别用■和○表示。

还有学者针对某些具体的语言现象，在使用符号时考虑到内在逻辑。如亓海峰、远藤光晓（2019）在考察山东莒县方言尖团音的变异时，用黑、白基本符号作为大类，区分尖音是否腭化，用黑色填充程度来表示腭化的程度，如尖音字“进”带有腭化色彩，读为[tsj]的标为◕，完全腭化的[tɕ]标为●。孙建华（2021）用语言地图呈现了延安市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地理分布，其符号用颜色区分大类的不同说法，再用形状的差异来表示具体方言说法。如第三人称代词复数“他们”可分成四大系列：“他”系、“兀”系、“人家”系和“那”系，分别用黑色、红色、蓝色和绿色表示。“兀/人家”两读的符号用红蓝两色符号表示，体现大类间的联系；方言的具体说法则选用不同的形状表示，如说法“他”用●表示，说法“他子”用◆表示，“他几个”用★表示。

第三，认知心理原则。符号作为反映客观语言现象的抽象集合，应具有概括力和表现力，与要表达的语言特征之间应当存在内在联系，要符合人类认知心理，利用通感使符号与语言特征产生联想，才能让读者易于理解、接受、记住地图传递的信息。比如，由于浊音和清音的区别在于声带是否振动，那么表示浊音用实心●就比用空心○好；在形状选择时，用圆形表示唇音、三角形表示舌尖音就比用三角形表示唇音、圆形表示舌尖音更好；如果用颜色表示出现的频次，红、黄、蓝的排序更符合汉语“三原色”的排序，所以频率排序用红>黄>蓝的顺序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等。

三、“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的符号设计过程及遇到的问题

我们在设计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集”时，对符号设计进行了一些研究。我们使用了 ArcMap10.7 制作矢量符号，用 ArcMap 的符号管理器（Style Manager）存储符号。确保地图显示时不会因比例尺变化而失真。符号系统由基本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系统设计流程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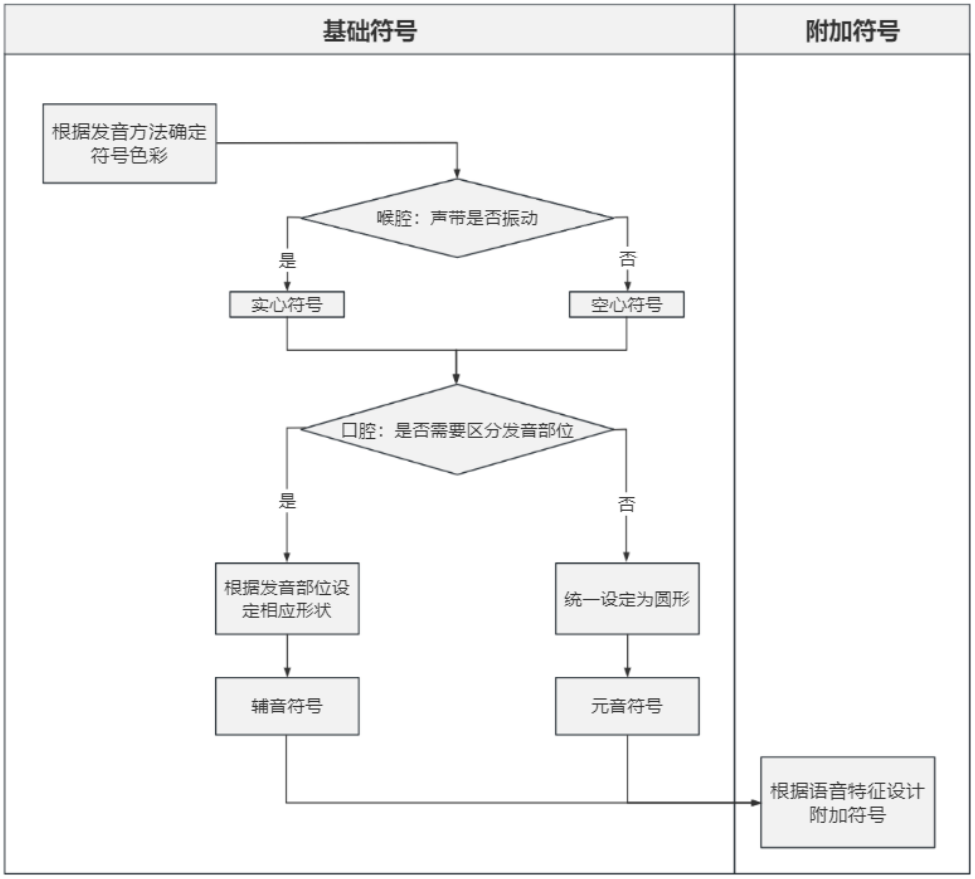


图 3：“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符号系统设计基本流程

在理想状态下，符号设计最好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能更好地有的放矢。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需要在地图上标记才能进行研究。“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的符号设计环节，是在我们的项目开展了一半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研究结果尚未出来，我们并不知道最后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语音方面是发音部位还是发音方法会有更凸显的特征。所以由于发音部位更容易拟形，容易与人的认知心理联系起来，就决定用形状来表示发音部位。唇音用椭圆形、舌尖音用三角形、舌叶音用竖菱形、舌面音用方框、小舌音用悬垂的水滴状，这几个都是拟形；喉音是表意，用中有关卡的图案来表示喉咙这个气流出来通道的“天下第一关”。发音方法用颜色来表示。根据发声通道气流被阻塞的状态，我们使用红色和绿色（符合人类对交通灯的认知心理）表示辅音中相对最阻塞和相对最通畅的辅音。所以，红色表示塞音，绿色表示擦音，红色加绿色表示塞擦音；鼻音、边音性质相近，前者用黄褐

色，后者用浅黄色；颤音闪音性质独特，与众不同地用蓝色表示（表 1）

另外，考虑到并非所有语音地图都需要区分发音部位，系统规定，当地图不需要区分发音部位时，默认使用圆形。如韵尾通常情况下不区分发音部位，塞音韵尾、鼻音韵尾、边音韵尾、颤音韵尾、擦音韵尾就分别用红色、黄褐色、浅黄色、蓝色、绿色的圆圈表示。元音用黑色圆圈表示，与彩色的辅音相区别。元音没有下分细项，如果需要表示，则可直接用国际音标标在图中。

表 1：语音系统基础符号设计原则实例

元辅音用黑色或彩色区别	元音 ● 辅音（以塞音为例）●	
辅音发音部位用形状区别	通用 ○ 唇 ⬭ 舌尖 △ 舌叶 ◇ 舌面 □ 小舌 ◌ 喉 ⧖	
辅音发音方法用颜色区别	清浊用是否填充区别（以舌尖音为例）	清音△ 浊音▲
	辅音发音方法用颜色区别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边音▲ 颤音、闪音▲

根据以上基础符号设计原则，辅音符号设计结果如表 2。

表 2： 辅音符号系统设计实例

		发音部位通用	唇音	舌尖音	舌叶音	舌面音	小舌音	喉音
塞	清	○	⬭	△		□	◌	⧖
	浊	●	⬬	▲		■	◌	
塞擦	清	⊖	⬭	△	◇	⊟		
	浊	◒	◒	▲	◆	■		
鼻	浊	●	⬬	▲		■	◌	
边	浊	●		▲				
边擦	清	○		△				
颤闪	浊	●		▲			◌	
擦	清	○	⬭	△	◇	□	◌	⧖
	浊	●	⬬	▲	◆	■	◌	⧗

附加符号是在基本符号上增加其他符号组合构成，用于表示更多的语言特征。如辅音清化、元音长短等现象，可以对每种特征设计特定的符号，见表 3。

表 3： 附加符号系统设计实例

	特征	增加的符号	示例	最终符号
辅音	送气	○	ph/th/kh	
	清化	◌̥	m̥/n̥/ŋ̊	
	复辅音	r l w j	pr/pl/pw/pj	
	前加音节	+	k´p/ŋ´k	
	前喉塞	ʔ	ʔp/ʔt/ʔk	
元音	紧音	◌̲	i̲/ɛ̲/a̲	
	长音	:	i:/ɛ:/a:	
	短音	◌̆	ĕ/ɛ̆/ă	
	鼻化	~	ẽ/ɛ̃/ã	

附加符号设计时，一是要注重跟语言现象、基础符号的逻辑性。如送气特征，清送气则是在空心图案外加圈，浊送气是在实心图案外加圈。红色空心圆里加 r 表示第二辅音是-r-的清复辅音。二是由于需要表示的语言特征很明显和独特，符号可以表达得更加直接，如基本符号内加长音符号“:”表示长元音、加波浪号“~”表示鼻化音。这种组合方式符合研究传统中的规定性或者习惯用法，突出了所要表达的语音特征的独特性。而且充分地利用基础符号，在其上叠加的方式减少了大类的划分，避免了复杂符号带来的视觉纷扰。同时，这种方式还为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开放的空间，以后若遇到目前系统中未涉及的特征，也可参照这一设计思路，在基本符号上进行延伸、叠加。

基于以上设计原则与方法，我们以中国境内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为基础，做一古南亚语今读的地理分布情况的例子。以“叶子”为例，古南亚语语音构拟为“*sla?”（Sidwell, 2015:348）。现代中国境内孟高棉语族语言“叶子”的声母共有 7 种形式，如图 4。班洪、岩帅等地的“l”声母带有送气特征，勐卡、阿瓦来等地又带有清化的特征，大渡岗话的“叶子”声母则为舌面清擦音“ɕ”，与其他地点发音并不相近。从地图来看，这些特征是交错分布的。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结合古南亚语和现代语言的特征，找到其中的关联，确定哪些是本语传承的，哪些是借入的，分布规律与语言或地理是否有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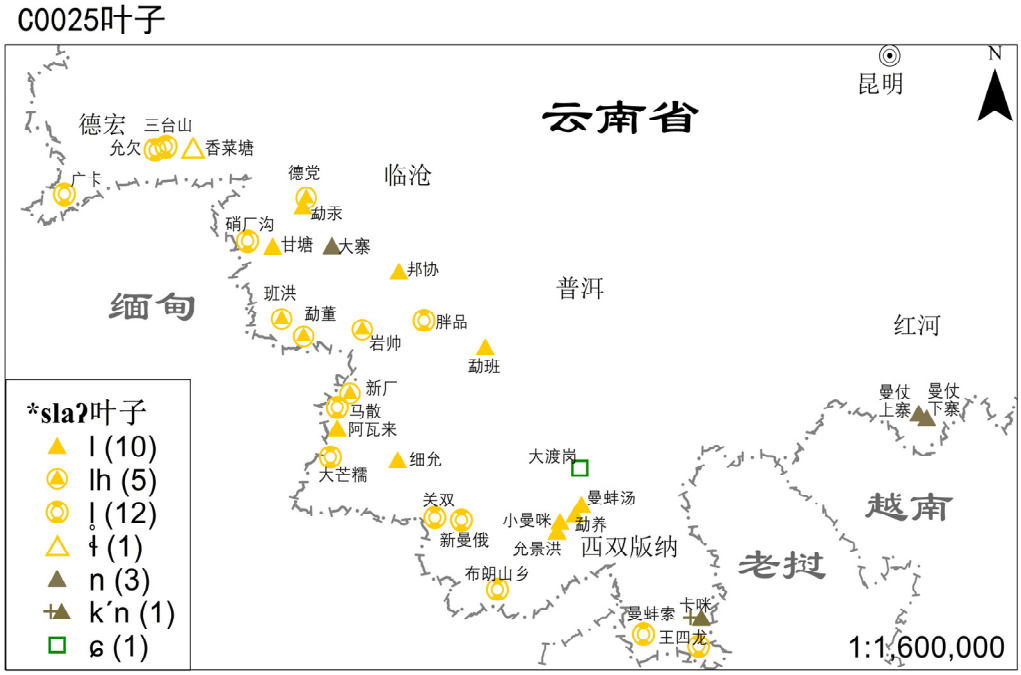


图 4 孟高棉语“叶子”的声母特征分布图

四、结 语

标记符号是语言地图制作的重要因素，不仅具有基本的地理定位功能，还可表达不同语言点的语言特征类型及相互差异，直接影响地图的可视化效果。在制图手段和技术不断丰富的今天，理应对语言地图的符号设计这一环节给予足够重视。本文认为符号设计至少要遵循系统性原则、逻辑性原则和认知心理原则，要对语言现象进行细

致的分类、分层，把控现象的复杂性与符号的归纳性的平衡，以及对特征的抽象反映与视觉解读方便的平衡。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地理语言学研究者们都能设计出适合自己语料的一套科学准确、逻辑清晰、简洁高效的语言地图标记符号。

附记：本文为 2023 年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南亚语系语言地图集”（项目编号：23AYY01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音卷》商务印书馆

次林央珍、铃木博之 2021 东旺藏语语言地图及其与周边土话的关系 铃木博之、远藤光晓共编《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

金有景 2006《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的编绘理论与实践《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林春雨、甘于恩 2021《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铃木博之 2022 滇川藏交界处藏语支语言中的“狗”——相关语音形式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岩田礼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日本地理言语学会

亓海峰、远藤光晓 2019 山东莒县方言尖团音变异的初步考察《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 1 期

孙建华 2021 延安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

詹伯慧、张日升 1990《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三 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

Jenny, M. & P. Sidwell. 2015. *The handbook of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Brill.

超越泉漳——粤琼闽语的三项音韵存古

曾智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内容摘要：潮汕、雷州和海南闽语相对于泉漳方言的存古特点较少受到关注。本文通过“竹-绿”“初-絮{丝瓜瓤/擦洗}”“倢{小母鸡}-烂”这三组对立的分析，说明粤琼（尤其是雷琼）方言有超越泉漳方言的存古特点，它们是泉漳方言的姊妹分支而非直系后代。莆仙方言和内陆闽南方言中也有和粤琼一致的存古特点，表明这些环泉漳分布的方言并未参与泉漳的特定音变；粤琼和莆仙、内陆闽南的相似性，更多是存古而非共享创新造成的。

一、引言

1.1 研究问题及相关研究

潮汕、雷州和海南（或称琼文）的闽南方言是自福建向西南迁移扩散的，大规模移民最晚开始于北宋（李如龙 1997: 87–90; 林伦伦 2015: 38–46; 张梦翰等 2016）。在闽语比较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本土闽方言具有较多典型特点，而粤琼闽方言具有较少的典型特点和较多的变异特点（甘于恩 & 周洪涛 2005）。这意味着，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粤琼闽语相对于本土（如泉漳）方言的创新，而较少关注其相对于泉漳方言的存古特点。在这一方面，少数的例外如 Bodman（1985）对潮州/n l/对立和雷州“竹”读-ip 的讨论。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粤琼闽语的音类划分能否完全由泉漳方言解释；如果不能，粤琼闽语的存古性在地理分布上有何特点？本文将以三个音韵存古为案例，梳理其在莆仙、内陆闽南（如龙岩）、泉漳和粤琼闽语的表现，以初步回答这个问题。

此外，根据族谱以及口传，雷州（蔡叶青 1993: 251）、海南（周长楫 2010: 33; 陈波 2008: 19）等地的闽语母语者的祖先可能主要来自福建兴化府（今莆田）。有学者根据某些语音（如边擦音（蔡国妹 2016: 291））、词汇（如“床”{桌子}（李如龙 2011））、语法（如“乞”的用法（刘秀雪 2015））的相似性认为粤琼闽语的确与莆仙而非泉漳有更近的历史关系。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Bodman 1988: 405）。在语言学上要证明粤琼闽语与莆仙闽语有更近的关系，需要找到粤琼和莆仙共享而泉漳未参

与的创新。因而，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在所考察的音韵特点中，是否存在只有粤琼和莆仙共享的创新？

本文讨论的三项音韵存古分别是：（1）“竹-绿”的韵母区别（Bodman 1985; 秋谷裕幸 2023）。（2）“初-絮”以韵母区别反映早期的声母对立。黄纳领（2023）注意到海口等方言“初-梳”韵母不同，但未全面考察“絮”等字的情况。（3）“健-烂”以声调区别反映早期的声母对立。佐藏瑾（2022; 2023）首先指出沿海闽南方言中有区分二者的方言，但对其成因的分析与本文不完全相同。下文在论述每项特点时，还将进一步说明相关的研究背景。

1.2 材料和方法

首先界定三个术语。（1）“内陆闽南方言”，指主要分布在龙岩、大田境内的闽南方言（Branner 1999）。（2）本文所说的“粤琼闽语/方言”，不包括中山的闽东方言（秋谷裕幸 2022a），也不包括云浮、惠州、陆丰等地较晚迁来的漳州方言（陈云龙 2012; 潘家懿 & 郑守治 2010）。（3）PM（Proto-Min），即原始闽语。PM 拟音根据 Norman（1981; 1974; 1973）的系统构拟；*š组改写为*ʃ组（秋谷裕幸 2022b）。

本文分析得主要方言点有 11 个（图 1），分别是仙游（代表莆仙方言），龙岩（代表内陆闽南方言），泉州、漳州（代表泉漳方言），潮州、海丰、中山三乡、雷州、海口、琼海（温泉）、三亚崖州马岭（下文简称“崖州”）（代表粤琼方言）。有必要时，再增加大田梅山、漳平永福（内陆闽南方言）、漳州南靖枫林和云霄等。

方言材料主要来自二手资料，具体列于文末。为确定分界线的具体位置，第四节中笔者对漳州部分方言进行了专题式电话调查。发音人均为 50 岁以上的本地人，每个方言点 1-2 人。调类的记录采用（近）最小对比法进行检验，例如，以与“赖”{姓} lua.6 同音与否来判断“濑”字读作 5 调还是 6 调。若某些词只能出现在前字变调或囝缀变调的环境里，则与语音环境相似的词比对，以确定其调类[1]。

本文以 PM 为参照，用历史比较法辅以地理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第二至四节依次分析三项音韵特点。每节的结构如下：第 1 小节介绍研究背景并呈现相关方言的语音对应，第 2 小节分析哪些方言保持了对立，第 3 小节探讨相关的合并创新和“特字”。在列举材料时，按从东北到西南的大致方位排列。第五节为总结。

[1] “健”{小母鸡}不少漳州方言说“鸡健囝”，“囝”是小称后缀。调查发现，大多数漳州方言 5 调＋囝缀时前字读高平调，6 调＋囝缀时前字读升调，从而能够区别 5、6 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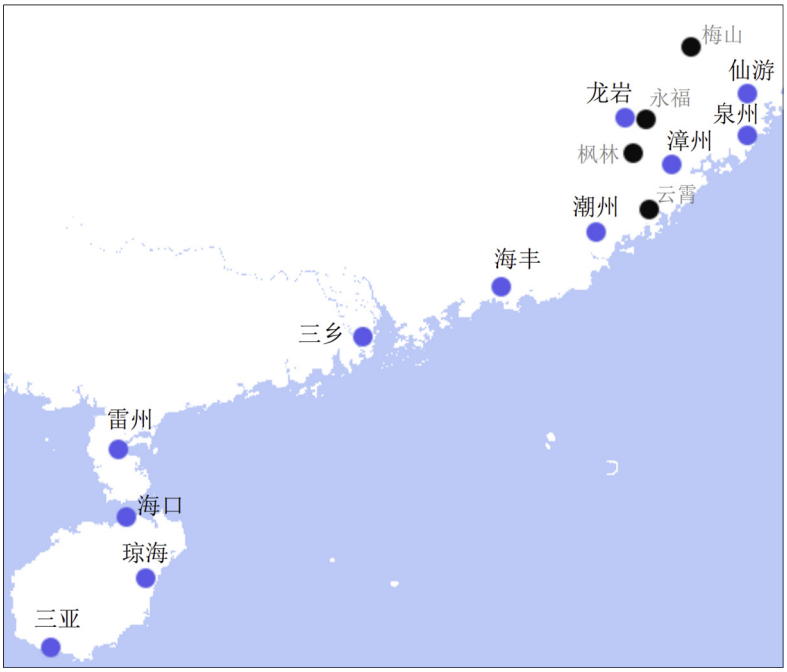


图 1：主要方言点地理位置

二、区别“竹-绿”

2.1 表现

PM *yk 和*yok 两类主要对应屋韵三等和烛韵三等字，分别包含“竹肉叔”、“绿粟曲”等字。大多数闽南方言这两类已合并，但雷州等方言区别这两类，秋谷裕幸（2023）据此将闽南方言这两个韵母拟为*iuk 和*iok。表 1 是“竹”*tyk，“绿”*lyok，“沃{浇}”*uək，“入{进入}”*nip 四类字的表现。“竹”类字还包括“肉”*nhyk 和“叔”*tʃyk。

表 1：“竹”等四类字的语音对应

	沃	绿	肉[2]	竹	叔	入
PM	*uək	*yok	*yk			*ip
仙游	ɒʔ.7	lɒʔ.8	nyʔ.8	tyøʔ.7	tsyøʔ.7	liʔ.8
龙岩	ak.7	liok.8	-	tiok.7	tsok.7[3]	liap.8
泉州	ak.7	liak.8	hiak.8	tiak.7	tsiak.7	lip.7
漳州	ak.7	lik.8	-	tik.7	tsik.7	lip.8

[2] “肉”的声母也是对应的，参见沈瑞清（2023）。仙游的清鼻音声母曾使“肉”的韵母变为鼻化韵，故其与一般的“竹叔”韵母不同（另文详述）。

[3] 龙岩存在以声母为条件的韵母分化，早期舌叶音声母吞并*i 介音（秋谷裕幸 2023）。

潮州	ak.7	lek.8	nek.8	tek.7	tsek.7	zip.8
海丰	ak.7	liok.8	niok.8	tiok.7	tsiok.7	zip.8
三乡	ak.7	liɔk.8	hip.8	tip.7	tsip.7	zip.8
雷州	ak.7	liak.8	hip.8	tip.7	tsip.7	zip.8
海口	ak.7	liak.8	hiɔk.8	dĩɔk.7	tsip.7	zip.8
琼海	ak.7	liak.8	hiok.8	ʔdiok.7	tsip.7	zip.8
崖州	a.7	lia.4	heu.4	dẽu.7	tsi.7	zi.4

2.2 保留“竹-绿”韵母对立的方言

三乡及其西南的方言“绿”和“竹”都不合并，莆仙方言也没有合并。

2.3 创新

所考察的方言涉及三个合并音变：（A）*yk 和*yok（非唇音）（竹-绿）；（B）*yok 和*uək（绿-沃）；（C）*yk 和*ip（竹-入）。内陆闽南、泉漳、粤东方言发生了“竹-绿”合并（A）。莆仙方言发生了（B）。三乡、雷州发生了（C），*iuk>ip 是/u/的圆唇性部分同化了/k/，使其变为唇音/p/（参见秋谷裕幸 2023:329）。秋谷裕幸（2023）还发现海口话“竹”类字又作两分，“竹肉”读 iɔk，“叔”读 ip，他“暂且认为这是方言接触所造成的现象”。事实上，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说，海南岛上的闽语全都呈现这样的特殊情况。即“肉竹”都不和“绿”合并，只有“叔”跟“入”合并了[4]。我们将其处理为“特字”，这些方言一致地只有“叔”这个语素经历了（C），表 2 记为小写的“c”。

表 2：“竹”等四类字的合并类型

	仙游	龙岩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合并	B	A	A	A	A	A	C	C	c	c	c
特字	-	-	-	-	-	-	-	-	叔	叔	叔

总之，粤西（包括三乡）、海南方言和莆仙方言有共同存古，但发生了不同方向的音类合流，没有一致的创新。

[4] 文昌、万宁是这样的情况，陵水则没有“叔”的白读。

三、区别“初-絮”

3.1 表现

“梳”类 PM *uə 主要对应鱼韵庄知组字。Norman（1981:48）举出四个语素，“梳”{梳子} *ʃuə，“疏”{稀疏} *ʃuə，“初”{开始} *tʃʰuə，“苎”{亚麻} *duə-b。吴瑞文（2009）称之为“苎”类，并根据沿海闽语的对应，新增了“絮”{丝瓜/擦洗[5]} *tsʰuə-c、“贮”{盛、装} *tuə-b，“鑢”{摩擦，用锉刀磨} *luə-c（?）[6]，“黍”{高粱/玉米} *ʃuə-b。这类字到原始闽东变为*œ（秋谷裕幸 2020: 856），到原始闽南变为*œy（秋谷裕幸 1992），依然是独立的音类。

“初”和“絮”是该韵类里仅有的送气塞擦音，二者的声母构成舌尖（齿龈音）和舌叶（龈后音）的最小对比。尤溪、大田的一些方言区分原始沿海闽语的舌尖和舌叶音，根据笔者调查，“絮”的声母指向舌尖组，和舌叶组的“初”不同。如大田梅山，“絮”tsʰy.5 {棉瓜～：刷锅的丝瓜瓤}，“初”tʃʰy.1 {农历初几}。梅山咝音组*uə 与 *y 合并。

表 3 是“梳”类 7 个语素的表现。不同的底色代表不同的合并类型。由于涉及多达 6 个与“梳”类合并的音类，表 3 没有举出其例字。

表 3：“梳”类字的语音对应

	初	絮[7]	梳	疏	黍	苎	贮
仙游	tsʰø.1	tsʰø.5	sø.1	sø.1	sø.3	tø.6	tieu.3[8]
梅山	tʃʰy.1	tsʰy.5	ʃy.1	ʃy.1	-[9]	tiɔ.4	tiɔ.3
永福	tsʰui.1	tsʰiu.5	siu.1	siu.1	-	tiu.4	-
龙岩	tsʰui.1	tsʰi.5	sui.1	sui.1	-	tui.4	-
泉州	tsʰue.1	tsʰue.5	sue.1	sue.1	sue.3	tue.4	tue.3
漳州	tsʰe.1	tsʰe.5	se.1	se.1	se.3	te.6	te.3
潮州	tsʰiu.1	tsʰiu.5	siu.1	siu.1	siu.3	tiu.4	tiu.3
海丰	tsʰiu.1	tsʰiu.5/	siu.1	-	siu.3[10]	tiu.4	-

[5] {擦洗}是本文新识别的语义。沿海闽语“絮”指丝瓜或刷锅用的丝瓜瓤（李如龙 1995; 吴瑞文 2009），后者词形往往是“鼎～”。另外，“絮”还引申做动词，表示用丝瓜瓤擦洗，或泛化为用各种工具擦洗，甚至是一般的摩擦。比如，宁德九都 tsʰœ.5 {擦}，仙游 tsʰø.5 {重擦}，泉州 tsʰue.5 {摩擦；揉搓}，诏安 tsʰiu.5 {刷洗}。

[6] “鑢”调类对应特殊，拟音待定。

[7] 永福义为{擦洗}，龙岩有动、名两个义项，{刷洗}，以及“鼎～”{洗锅的刷子}。

[8] “贮”的韵母在闽东、莆仙等一般和“苎”不同，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9] 指{高粱/玉米}的词在尤溪方言和内陆闽南话中一般指向 PM *ʃe-b，和其他沿海闽语不同，本文姑且视为不同的语素。

[10] 来源：谢立群（2013: 262）。

		tsʰou.5					
三乡	tsʰe.1	tsʰiu.5[11]	se.1	se.1	-	-	-
雷州	tsʰoi.1	tsʰiu.7’调!	soi.1	sɔi.1	soi.3	-	-
海口	sɔu.1	siu.5	tiu.1	-	-	-	ɗiu.3
琼海	sou.1	siu.5	tiu.1	tiu.1	toi.3[12]	-	-
崖州	soi.1	-	soi.1	soi.1	-	-	-

3.2 以韵母之别保留“初-絮”声母对立的方言

海丰及其西南的方言“初”和“絮”韵母不同，永福和龙岩也不同。

上述方言“初-絮”的韵母对立，很可能是舌叶和舌尖音声母造成的分化[13]。除了部分尤溪、大田方言，绝大多数沿海闽语丢失了两套咝音的对立；上述方言以韵母之别保留了原始语两套咝音的对立，是一种存古。内陆闽南方言中，龙岩“絮”*tsʰuə-c 和其他字不同，是唯一的舌尖咝音字发生了特殊演变；永福“初”*ʧʰuə 和其他字不同，则是唯一的舌叶送气塞擦音字发生了特殊演变。

海口和琼海发生了“初”的分化，“初”并入了*o（*o 例如“粗”），这样的方言还有文昌、万宁、陵水等。三乡和雷州则发生了“絮”的分化，“絮”并入了*iu。海丰“絮”演变为两个语素 tsʰou.5 和 tsʰiu.5，前者是“絮”的特殊分化（并入*o）。具体来说，{丝瓜}读作“tsʰou.5 瓜”，在词典中写作同音字“醋瓜”；而动词义{用布、手巾、牙刷等摩擦使干净}则读作 tsʰiu.5。[14]

表 4：“初-絮”韵母有别的方言

分化类型	方言（并入的音类）[15]
“初”分化	永福（=*ui），海口、琼海（=*o）
“絮”分化	龙岩（=*y），海丰△（=*o），三乡、雷州（=*iu）

从原始闽南出发，“絮/初”并入*o 类的音变过程可能是：*œy > *œu > *ɔu / *tsʰ

[11] 来源：tpyao（2015）。文中称“鼎 tsʰiu.5”是“把椰子外皮剖开约成四瓣”，做成的刷大铁锅的工具。tsʰiu.5 还有动词义{用破瓦片磨掉脚底的硬皮}。

[12] “黍”{高粱/玉米}，琼海并入*e 类，和其常例不符。高粱和玉米对于海南是外来作物，“黍”一词也许是从雷州等大陆方言借用的。

[13] 闽南话中两套咝音所造成的其他韵母分化，见曾南逸（2022）。

[14] 上述方言的“初絮”与其他方言语义上的对应很严格。拿“初”来说，我们选取的琼北“初”的音和泉漳一样表示农历日期，而“初中”等词里的“初”另有文读音。“絮”这样的口语词更不可能是外来影响所致。这说明“初絮”特殊对应的成因不是层次，而是音变。

[15] 有变异、两读的方言，加“△”以示区别。下同。

或*tʃʰ__。*o 在原始闽南读*ɔu，Kwok（2018）则拟为*ou。

总之，海丰及其西南方言的“初-絮”韵母通常有区别，这些方言要么与永福同属“初”分化型，要么与龙岩同属“絮”分化型。然而，没有一个方言在“初”或“絮”的音类合并上与永福或龙岩一致（见表 4）。由此可见，这种相似模式仅代表共同的存古，而非共享的创新。

3.3 “梳”类常例的创新

上文已经分析了“初-絮”异韵的情况，下面考察“梳”类的常例所反映的合并。主要涉及 5 个合并音变[16]：

（A）*uə 和*oi（例：坐）　　（B）*uə 和*y（例：鱼）

（C）*uə 和*yi（例：水）　　（D）*uə 和*iu（例：酒）

（E）*uə 和*e（例：洗）

常例指“梳疏”等语素。莆仙、梅山、永福、龙岩分别并入 PM *oi、*y、*iu 和*yi。泉、漳发生了展唇化音变（E）：原始闽南*œy > *ɛi，与 PM *e（闽南>*ɛi）合并。粤琼闽语只有两种合并方向：粤西（三乡、雷州）和琼南（崖州）与*e 合并，跟泉漳一致；粤东（潮州、海丰）和琼北（海口、琼海）则与*iu 合并（D）[17]。（D）的过程可能是：*œy > *øu > iu。粤琼闽语没有发生莆仙和内陆闽南所发生的（A）、（B）或（C）。泉漳以南呈现创新类型的穿插分布，见表 5。

表 5：“梳”类常例的合并类型

	仙游	梅山	永福	龙岩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合并	A	B	D	C	E	E	D	D	E	E	D	D	E

四、区别“健-烂”

4.1 表现

Norman（1974）指出，PM 所有浊送气类声母（第 III 组声母）逢去声，福州读为阴去，厦门读为阳去。这组声母包括阻音如*bh，以及清鼻音如*mh、清边音*lh 等。之后，学者陆续指出，龙岩（Branner 1999）、大田（郭必之 2016）等内陆闽南方言，

[16] PM * uə 的音值和这些合并方向语音差别较大，一方面，原始闽语的音值可能需要修改，另一方面，可以将沿海闽语的*œy 作为早期形式，暂且搁置从 PM 到原始沿海闽语的演变过程。

[17] 漳州最南端的诏安、诏安四都也并入*iu。

以及莆仙方言（戴黎刚 2022），这项表现跟福州相同。秋谷裕幸（2022a）总结了沿海闽语的对应规律，即闽东区、莆仙区、内陆闽南区读为阴去，仅沿海闽南区[18]读为阳去。

佐藏瑾（2022; 2023）则注意到沿海闽南区内部也存在差异：响音中锐音的*lh、*nh、*ńh 在“漳南”（漳州南部）和潮汕方言里归阴去，在“泉厦”方言里归阳去。[19]响音中的钝音*mh 和*ŋh 以及阻音，沿海闽南区都读阳去，没有差异。上述声调归派差异是由清响音声母造成的，相关音变必定发生在清响音声母和一般响音声母还有区别的时代。而现存的沿海闽语两套响音不以清浊区别，可见这一音变的时间是相当早的。

从维持对立的角度看，沿海闽语清响音读 5 调当视为存古（秋谷裕幸 2022a）[20]。比如“健”*lhɑn-c 和“烂”*lɑn-c，清响音读 6 调的方言，“健=烂”；读 5 调的方言，“健-烂”以声调有别的方式，维持了原始声母的区别。

在 Norman（1991）和佐藏瑾（2022; 2023）的基础上，本文尽可能多地识别出*lh、*nh 去声的语素，共计六个。包括（1）“健”*lhɑn-c，{没生蛋的小母鸡}，通常词形为“鸡健”。该词内陆闽语则指向*lhon-c，原因不明。（2）“露”*lho-c，{露水}。（3）量词，用于{（瓜果等）瓣、片、条或块}。也有进一步引申的，如，漳浦长桥友爱指{（一）道（隆起的伤痕）}，诏安四都指{（一）畦（菜地）}。在闽语中只见于沿海闽语。原始宁德方言*lim.5（秋谷裕幸 2018: 533），厦门 liam.6，可以拟为*lhim-c。[21]（4）“濑”*lhɑi-c，{浅滩、急流或瀑布}。（5）“润”，义为湿润或食物回潮。Norman（1991）未举出“润”在内陆闽语的反映。光泽寨里{花生潮了}用“润”nin.5，根据对应，可拟为*nhiun-c。[22]（6）“脓”，PM 有*nhəŋ 和*nhəŋ-c 两个竞争的形式，本文讨论的是第二个形式。

表 6 是“健”和“烂”类的表现。“烂”类指 PM *l 和*n 去声字，这类字对应整齐，读阳去调，有些方言阳去又并入了 1 或 2 调。“健”类读 5 调的保留了*nh/lh 和

18 “沿海闽南”指“内陆闽南”之外的闽南话，泉漳、粤琼方言包括在内。

19 本文没有找到 PM *ńh 且去声（c 调）的语素。

20 沿海闽语似乎有些响音字，所有方言都读阴调，去声的有“鑢”{摩擦}（泉州 lue.5）、{掐断}（泉州 liam.5）等。这批词有可能是晚期进入的。本文暂不处理这个问题。

21 闽东和闽南的韵母对应特别，应是*l(h)在前元音之前的条件音变造成的。另文详述。

22 PM *iun 在原始沿海闽语变为*un。在后接非前高元音时，PM *n(h)在闽南会变为 l 或 n，而不会变为 dz。Norman（1991）把厦门的 dzun.6 列为对应形式（根据《厦英》），但 dzun.6 其实类似潮州的 dzun.4 或陵水的 zun.7’，属于文读层。声母为 l 或 n 的“润”才是对应的口语词。漳浦以南的多数方言里“润”可以单用为动词，语义是湿润或食物回潮，漳浦北面的沿海闽南方言多数不能单用，只存在于特定的复合词里，或者已丢失。

*n/l 去声字的对立，在表中标为蓝底。有两处用方括号补上了邻近方言的说法。

表 6：“倢”和“烂”类字的语音对应

	烂	倢	润	露	{瓣/块}	濑	脓[23]
PM	*l	*lh	*nh	*lh	*lh	*lh	*nh
仙游	nuã.6	nuã.5	[noŋ.5]莆田	lɔu.5	nieŋ.5	-	-
永福	nuã.2	nuã.5	lun.5	lou.5	liam.5	lua.5	-
龙岩	luã.1	luã.5	lun.5	lu.5	liam.5	-	-
泉州[24]	nuã.6	nuã.56	lun.6	lɔ.6	-	[lua.6]永春	-
枫林	nuã.6	nuã.6	lun.6	loʔ.8 调![25]	liam.6	lua.6	laŋ.6
漳州	nuã.6	nuã.6	lun.6	lɔ.6	liam.6	luaʔ.7 调![26]	-
云霄	nuã.6	nuã.5	lun.5	lou.5	liam.5	lua.5	-
潮州	nua.6	nua.5	luŋ.5	lou.6	liəm.5	-	-
海丰	nua.6	nua.5	nun.5	lou.5	niam.5	-	-
三乡	nua.6	nua.5	-	-	liem.6	-	-
雷州	nua.1	nua.5	nuŋ.5	leu.5	niaŋ.1 韵!	-	-
海口	nua.1	nua.5	-	lɔu.5	liam.1	-	naŋ.5
琼海	nua.1	nua.5	nun.5	lou.1	liam.1	-	-
崖州	nuə.1	nuə.5	-	leu.1	leŋ.1	-	-

4.2 以声调之别保留“倢-烂”声母对立的方言

漳州漳浦-平和及其西南的方言“倢-烂”声调有别，莆仙和内陆闽南也有别。

[23] 沿海闽语通常用平声的“脓”，不过少数方言保留了去声的“脓”。闽东区有寿宁斜滩 nœuŋ.5，内陆闽南有永安青水 laŋ.5，漳州北部有枫林 laŋ.6。海口虽然{脓}说 naŋ.2，但{中耳炎}说“耳 naŋ.5”，阴去调的 naŋ.5 即对应 PM 清鼻音去声的“脓”。

[24] 泉州 5、6 在单字调合并，“倢”仅有单字调形式，不能确定是 5 还是 6 调。泉州方言里，永春、同安单字调能区分 5、6。同安“倢”lua.6（声母例外地丢失鼻化），永春“濑”lua.6。可见，泉州方言一律读 6 调。另外，泉州的“润”语义不详。

[25] 枫林{露水}说“loʔ.8 水”，大概是“露”受到了“落”{下}的类音牵引。

[26] 漳州市区、华安高安等地“濑”读阴入调 luaʔ.7，很可能是 5 调促化而来。大概由于这两个方言 5 调和 7 调都是低降调，相当接近。周围的华安丰山、龙海等方言“濑”都读 5 调；反映早期漳州北部口音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谢秀岚 1818）“濑，湍也，水急流石上也”也是阴去调，可以佐证。

有无对立的分界线在漳州境内。如表 6 所示，南靖书洋枫林（位于漳州西北部）一律读 6 调，而云霄（位于漳州南部）一律读 5 调。漳州方言更详细的分布如图 2（数据见附表 1）。可以清楚地看到，漳州北部的市区、龙海、华安、长泰、南靖以 6 调为主，漳州南部的平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以 5 调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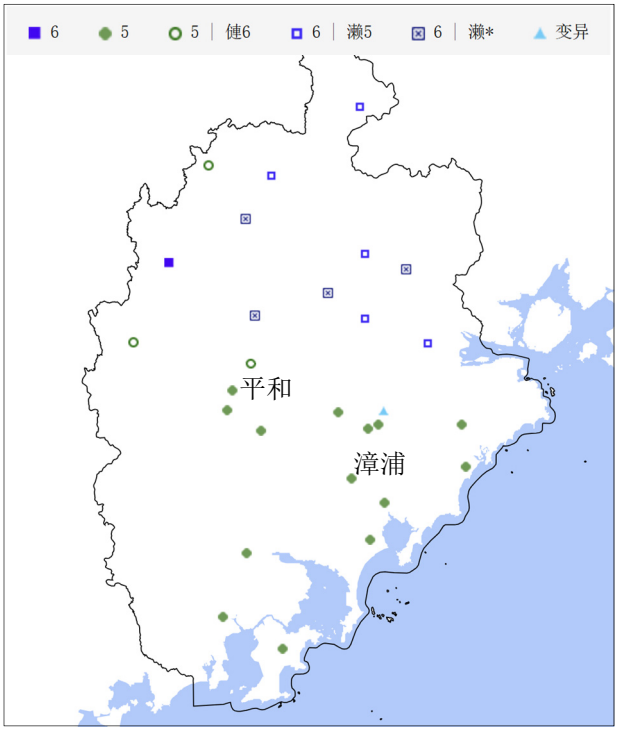


图 2：漳州方言“健”类字的调类归派[27]

漳州北部虽然常例读 6 调，发生合并创新，但许多方言“濑”读 5 调。这一特字现象应当是存古的残余，也体现了漳北和泉州方言的重要区别。

4.3 “健”类特字的创新

从表 6 不难看出，“健”类在粤琼方言显得不太规则。除了海丰呈现较规则的存古（5 调），潮汕东部的澄海、饶平、南澳方言的“露”也读 5 调，也呈规则的存古

[27] 说明：（1）南靖话“濑”不同人有 5、6 调的异读，另有些北部方言调查不到“濑”的说法，这两种情况在图 2 中均记为“6| 濑*”。（2）漳浦长桥友爱村是南北分界点之一，存在显著的人际变异。在所调查的两个发音人里，“露”和“润”读 6 调，“健”和{一道伤痕}读 5 或者 6 调。而它南边大约 5 千米的潭阳村就属典型的 5 调区。

（附表 1）。此外，雷州{瓣}虽读 6 调，但电白{瓣}有异读 liam.5/1，liam.5 应该是规则的读音。其他特字创新读 6 调的情况，列于表 7。

表 7：“健”类特字的创新

	仙游	龙岩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露≠健	-	-	-	-	√	-	?	-	-	√	√
{瓣}≠健	-	-	-	-	-	-	√	√	√	√	√

五、结论和讨论

5.1 粤琼闽语的存古性

5.1.1 超越泉漳：粤琼闽语不是泉漳方言的直系后代

本文研究的三项音韵存古（总结于表 8）表明，粤琼闽语保留了一些泉漳方言中不存在的音类区别，而这些区别在莆仙和内陆闽南语中可以找到。这说明在泉漳方言发生这些合并创新时，莆仙、内陆闽南以及部分粤琼方言已经出现了分化。因此，原始泉漳方言（特别是泉州和漳北）无法解释所有粤琼闽语的音类区别，粤琼闽语与泉漳方言实际上是姊妹关系，而非泉漳方言的直系后代。

表 8：三项音韵存古的表现

	仙游	龙岩	泉州	漳州	漳浦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竹-绿	√	X	X	X	X	X	X	√	√	√	√	√
初-絮	X	√	X	X	X	X	√△	√	√	√	√	√
健-烂	√	√	X	X	√	√	√	√	√	√	√	√

表注：√：保持对立；X：合并

5.1.2 远离泉漳：雷琼相比粤东有更多存古特点

表 8 实际上呈现地理语言学的“周圈分布”（岩田礼 2009: 19）。远离泉漳的方言保留了特殊的对立信息。

雷琼方言（即粤西和海南）比粤东有更多存古的特点。三乡及其西南的方言保存了所考察的全部三项对立，往东一些的海丰保留了两项（且其中一项存在变异），而粤东潮州话只保留了一项。漳南也保留了一项。“健”和“烂”的合并可能是以泉州为中心扩散的，距离扩散中心较远的漳南和粤东都没有参与创新。也就是说，就这三个音韵特点而言，从漳浦到三乡，越往南有越多存古特点，可见远离泉漳核心对保持

特殊存古的作用。

5.1.3 粤琼与莆仙、内陆闽南的相似性更多来自存古或平行演变

表 8 呈现的莆仙、内陆闽南和粤琼闽语的相似性是由共同存古造成的。此外还有个别看似一致的创新。比如，粤东、琼北“梳”类常例和永福一样，并入*iu（表 9，②D）。但是，永福附近的内陆闽南话，如龙岩、菁城、溪南、新桥、双洋、适中、苏坂等地，“梳”字都不并入*iu。在未发现永福附近存在连片的（D）型方言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永福一个点的创新与粤琼诸多方言的创新并非共享创新，大概率是一种平行演变。再者，如果这确实是共享创新，我们应预期还存在着其他共享创新。然而，举阳去调的合并为例，多数雷琼闽语并入 1 调，龙岩也是如此，永福却并入 2 调（郭必之 2016），见表 6“烂”。在这点上，永福并没有如预期那样与雷琼有一致的创新。因此，“梳”>*iu 也好，阳去调>1 调也好，都更可能是晚期平行演变所致。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主张粤琼闽语主要源自莆仙方言的观点，需以共享创新作为依据。然而，本文考察的音韵特点显示，粤琼闽语与莆仙及内陆闽南并未显示可靠的共享创新。因此，目前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5.2 讨论：粤琼闽语演变的复杂性

表 9：“竹”类和“梳”类常例相关合并

	仙游	永福	龙岩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①	B	A	A	A	A	A	A	C	C	c	c	c
②	A	D	C	E	E	D	D	E	E	D	D	E

表注：①：“竹”等四类的合并（表 2）；②：“梳”类常例的合并（表 5）

表 10：特字情况

	仙游	龙岩	泉州	漳州	潮州	海丰	三乡	雷州	海口	琼海	崖州
①	-	-	-	-	-	-	-	-	√	√	√
②	-	-	-	-	√	-	?	-	-	√	√
③	-	-	-	-	-	-	√	√	√	√	√

表注：①“叔-竹肉”异韵（表 2）；②“露-倢”异调，③“{瓣}-倢”异调（表 7）

本文重在揭示粤琼超越泉漳的若干存古特点，无意也无法对粤琼闽语的分化和接触过程做出详尽的描述。不过，在所考察的范围内，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值得一提。第一，粤琼闽语虽然有超越泉漳的存古特点，但也参与了一些泉漳的创新，如“梳”

类常例的合并（表 9，②）。而且，“梳”类常例的合并提示了“泉漳-粤西-崖州”和“粤东（及诏安）-琼北”共享创新的可能性。要确证这个“可能性”，需要考察更多的语言创新。第二，特字的情况反映了粤琼闽语复杂的生成过程，尤其海南闽语特字的数量较多，有可能与更深的方言接触有关（表 10）。[28]这也呼应了 Bodman（1982）的主张，粤琼闽语的音韵差异并不都是音变造成的，有些可能来自较晚近的方言混合和竞争。第三，以前学界较少关注的三乡，其表现更接近雷州而非海丰。例证有“竹-绿”“初-絮”的存古（表 8），合并①、②（表 9），“絮”分化且并入*iu（表 4）等。

粤东和雷琼方言有超越了泉漳方言的存古性，同时展现出内部复杂的创新模式和特字现象。这些特点呼吁语言学家对粤琼方言进行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描写，并基于该区域内部的独特性，自下而上地探索其演变肌理。只有在“边缘”的视角下理解“边缘”，才能更好地诠释整体的历史。

方言材料来源：
莆田、仙游（莆田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21），梅山、青水（笔者调查），龙岩（郭启熹 2016），永福（张振兴 1992），菁城、溪南、新桥、双洋、适中、苏坂（陈筱琪 2019），泉州（周长楫 2006; 王建设 & 张甘荔 1994），永春（林连通 & 陈章太 1989），厦门（周长楫 2006），华安高安（徐睿渊 2020），漳州（陈正统 2007），龙海（福建省龙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漳浦（漳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云霄（黄健亨提供），东山（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诏安（张以文 2017），饶平（佐蔵瑾提供），南澳云澳、后宅（林伦伦 & 林春雨 2007），澄海（林伦伦 1996），潮州（陈璟桁提供），海丰（罗志海 2009），中山三乡（高然 2013; 2014; 2015），雷州（张振兴 & 蔡叶青 1998），电白（杨永康 2021），海口（陈鸿迈 1996），文昌（云惟利 1987），琼海（李配提供），万宁（中嶋幹起 2002），陵水（林明康 2023），三亚崖州马岭（张屏生 2018），寿宁斜滩（秋谷裕幸 2010），光泽寨里（秋谷裕幸 2024）。上面未提及，但附表 1 中出现的方言，均为笔者调查。

[28] 当然，不排除将来能找到潜在的语音分化条件，比如“叔”有可能也是原始语舌叶声母造成的分化，“健”类的分化可能与*nh 或*lh 有关等。但目前来说，“叔”找不到与之构成最小对比的舌尖声母字。“健”类无论采取什么分析都会存在“特字”。或许在找到“濑”等在粤琼闽语的说法之后，能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此外，龙岩“叔-竹肉”确实异韵，但舌叶组＋i 介音在 a 和 o 前失落介音是规则音变（注 3），所以龙岩的情况不是“特字”。

附记：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 AutoNavi-GS(2019)6379号）。感谢曾晓渝教授提供软件使用权。感谢沈瑞清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也感谢“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 2024”与会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陈璟桁、黄纳领、黄健亨、黄文韬、李配、林明康、叶延缘、钟勋、佐蔵瑾等师友与我讨论相关问题并惠赐方言材料。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帮我介绍合适的受访老师。

附表 1：“健”类字在漳州和粤东的对应

	健	露	{瓣/块}	濑	润	脓
南靖和溪林中	nuã.6	lɔ.5	liam.5	lua.5	-	-
南靖	nuã.6	lɔu.6	liam.6	lua.5/6	lun.6	-
南靖金山	nuã.6	lɔu.6	liam.6	-	-	-
南靖靖城下割	nuã.6	lɔ.6	liam.6	-	lun.6	-
平和芦溪双峰	nuã.6	lɔ.5	liam.5	lua.2 调!	-	-
平和山格	nuã.6	lɔ.5	liɛm.5	lua.5	-	-
平和小溪产坑	nuã.5	luou.5	liam.5	lua.5	-	-
平和坂仔	nuã.5	lo.5	liɛm.5	lua.5	-	-
平和南胜义路	nuã.5	luou.5	liam.5	lua.5	-	-
华安高安	nuã.6	lɔ.6	liam.6	luaʔ.7 调!	lun.6(?)	-
华安丰山	nuã.6	lɔ.6	liam.6	lua.5	-	-
华安仙都先锋	nuã.6	lou.6	liam.6	lua.5	-	-
长泰	nuã.6	leu.6	-	-	-	-
龙海	nuã.6	lɔ.6	-	lua.5	lun.6(?)	-
漳浦长桥友爱	nuã.5/6	lɔ.6	liam.5/6	-	lun.6	-
漳浦长桥潭阳	nuã.5	lɔu.5	-	-	lun.5	-
漳浦长桥农场	nuã.5	lou.5	liam.5	-	lun.5	-
漳浦马坪马圩	nuã.5	lɔ.5	liam.5	-	-	-
漳浦佛昙轧内	nuã.5	lou.5	liam.5	-	lun.5	-
漳浦旧镇城内	nuã.5	lou.5	liam.5	-	-	-
漳浦	nuã.5	lɔu.5	-	lua.5	lun.5	-
漳浦霞美山岭	nuã.5	lɔu.5	liam.5	-	lun.5	-
漳浦南浦马苑	nuã.5	lɔu.5	liam.5	-	lun.5	-
诏安四都	nuã.5	lɔu.5	liɛm.5	lua.5	-	-
东山	nua.5	lo.5	-	-	-	-
饶平	nua.5	lou.5	-	-	luŋ.5	-
南澳云澳	nuã.5	lou.5	-	-	-	-
南澳后宅	nuã.5	lou.5	-	-	-	-
澄海	nuã.5	lou.5	niaŋ.5	-	luŋ.5	-

表注：（1）已见于表 7 的不列；（2）加注“？”的表示材料中语义不明

参考文献

蔡国妹 2016《莆仙方言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蔡叶青 1993《海康方言志》中山大学出版社

陈波 2008《海南方言研究》海南出版社

陈鸿迈 1996《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筱琪 2019《闽南西片方言音韵研究》中西书局

陈云龙 2012《福建移民与粤西闽语》,《南方语言学》(4)

陈正统 2007《闽南话漳腔词典》中华书局

戴黎刚 2022《闽语仙游话浊去字例外读阴去的性质》,《莆田学院学报》29(4)

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东山县志》中华书局

福建省龙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龙海县志》东方出版社

甘于恩 & 周洪涛 2005《典型特点与变异特点——域内闽语与周边闽语之语音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2)

高然 2013《中山三乡闽语分类词汇(上)》,《南方语言学》(5)

高然 2014《中山三乡闽语分类词汇(中)》,《南方语言学》(5)

高然 2015《中山三乡闽语分类词汇(下)》,《南方语言学(2014)》

郭必之 2016《大田前路话在闽语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中西书局

郭启熹 2016《龙岩方言词典》鹭江出版社

黄纳领 [答霓] 2023 在“知乎”发布的《新视角下的琼雷闽语分区尝试》.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2120606?utm_psn=1809827761713451008

李如龙 1997《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2011《从特征词看莆仙话和粤琼闽语的关系》,《语言文化分布与族群迁徙工作坊论文集》厦门大学

林连通 & 陈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林伦伦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林伦伦 2015《潮汕方言历时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林伦伦 & 林春雨 2007《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中华书局

林明康 2023《海南陵水闽方言同音字汇》,《海南开放大学学报》91(2)

刘秀雪 2015《泉州闽南语的[乞],[度],[传],[与]及其可能演变》,《台湾语文研究》10(1)

罗志海 2009《海丰方言辞典》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潘家懿 & 郑守治 2010《粤东闽南语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划分》台湾语文研究(5)
莆田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21《莆仙方言大词典》厦门大学出版社
秋谷裕幸 2010《闽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秋谷裕幸 2018《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秋谷裕幸 2020《闽东四县市方言调查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秋谷裕幸 2022a《广东中山市隆都方言的历史音韵特点及其归属》,《声韵论丛》(28)
秋谷裕幸 2022b《原始闽语中的舌叶塞音声母及其相关问题》,《语言学论丛》(1)
秋谷裕幸 2023《原始闽南区方言的*iuk 和*iok 及其相关问题》,《台湾语文研究》18(2)
秋谷裕幸 2024《福建光泽(寨里)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
沈瑞清 2023《闽南语的去鼻化音变与原始沿海闽语的清响音》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4(3). https://doi.org/10.1075/lali.00139.she
typao. 2015. 在“海墘闽语论坛”发布的《椰笴?》. https://www.ispeakmin.com/bbs/thread-8780-1.html
王建设 & 张甘荔 1994《泉州方言与文化》鹭江出版社
谢立群 2013《海丰音字典(第二版)》汉学出版社
谢秀岚 1818《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影印文林堂本
徐睿渊 2020《福建华安(高安)方言同音字汇》,《方言》42(3)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杨永康 2021《广东电白黎话语音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云惟利 1987《海南方言》澳门东亚大学
曾南逸 2022《原始闽语*tš-组声母字在闽南方言中的两类洪细对应》,《中国语文》(6)
张梦翰, 金健 & 潘悟云 2016《闽南方言传播模式的计量分析》,《语言科学》15(5)
张屏生 2018《海南闽语的调查比较研究(第 2 年)》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漳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漳浦县志》方志出版社
张以文 2017《福建诏安闽南方言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张振兴 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振兴 & 蔡叶青 1998《雷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长楫 2006《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长楫 2010《闽南话概说》福建人民出版社
佐藏瑾 2022 在“知乎”《如何评价各学者的原始闽南语构拟?》下的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53597075/answer/2726366946?utm_psn=1809826

468357877762
佐蔵瑾 2023 在“知乎”《谈谈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声调系统？》下的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9981276/answer/2856222824?utm_psn=1809822629269487616
秋谷裕幸 1992『閩南祖語における*ɔi · *œy の再構』,『中國語學研究· 開篇』(10)
中嶋幹起 2002『海南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Bodman, N. C. 1982. Some Recent Sound Shifts in Chaozhou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3(4). 615–625.
Bodman, N. C.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ua.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2–2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0006706
Bodman, N. C. 1988. Two Divergent Southern Min Dialects of the Sanxiang District, Zhongshan, Guangdon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2). 401–423.
Branner, D. P. 1999. The classification of Longy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5). 36–8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825676
Kwok, B.-C. 2018. *Southern Mǐ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New York: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672304
Norman, J.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749795
Norman, J.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749809
Norman, J.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Norman, J. 1991. Nasals in Old Southern Chinese. In William G. Boltz & Michael C. Shapiro (eds.),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77), 205–2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cilt.77.10nor

从方言分布看中国历代的水利设施——以“池塘”为例

铃木史己　　**渡部展也**　　**大川裕子**
南山大学　　中部大学　　上智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将通过结合语言、历史、考古（GIS）三门学科来分析现代汉语方言的〈池塘〉义词。根据语言地理学的分析，〈池塘〉义词呈现出南北对立。华北地区分布着来自〈积水〉义和〈洼地〉义的词形，其分布情形与标高和坡度相关。从植被的角度来看，分布于南方的“塘”类词形与水稻有着密切关联，到了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传播到长江以南。本文还分析了处于南北交界处的河南固始的水利设施，通过历史地图和卫星图像的对比，我们发现河南固始水利设施的类别和地理环境之间呈现出规律性，明清的称呼与现在的地形条件、蓄水池的分布情况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一、前言

本文试结合语言、历史、考古（GIS）三门学科来分析现代汉语方言的〈池塘〉义词，旨在尝试跨学科的历史语言研究。池塘指“蓄水的坑”（《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第 174 页），但是其用途并不限于蓄水，池塘的用途与构型颇为广泛。池塘的发展与人类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人工修筑的池塘与农业技术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池塘〉义词的方言差异不仅是语言学所要解决的课题，还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等许多领域，如果能够互相参考和借鉴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就可以分析得更为深入。因此，本文将从语言、历史、考古这三个角度对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池塘〉义词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我们绘制〈池塘〉义词的词形分布地图，据此进行语言地理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GIS）的观点重新分析方言差异。接着，通过南北交界处的个案研究，揭示水利设施的称呼、构型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

文中的方言地图通过 ArcGIS Online 和 QGIS 系统制成，方言材料来自已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 ”内表示词语形式，〈 〉内表示词义或所指。

二、“池塘”的所指

水利设施及其名称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在开始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需明确“池塘”的所指，以便弄清本文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以及问题所在。

2.1 水利设施的连续性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所收的主要水利设施如下：

池塘：蓄水的坑，一般不太大，比较浅。（第 174 页）

湖：被陆地围着的大片积水。（第 551 页）

Cf) 坑：洼下去的地方。（第 743 页）

堤：沿河、沿湖或沿海的防水构筑物，多用土石等筑成。（第 278 页）

坝：拦水的构筑物。（第 21 页）

“池塘”、“湖”和“（天然积水的）水坑”三者的区别在于大小的不同，或者来源的不同（天然还是人工），然三者实际上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堤”和“坝”都是为治水而建的设施，前者是沿水流筑成，后者拦住水流。“堤”、“坝”等词素在汉语方言中被用于〈池塘〉义词，可能是因为这些词素与池塘的蓄水方式有关。

其实，有关水利设施的称呼存在连续性。譬如，“塘”类词语有时兼指〈池塘〉和〈湖〉（广东陆河），有时兼指〈池塘〉和〈水坑〉（云南澄江），有时还专指〈堤防〉（杭州富阳）。指称〈池塘〉义的词语有时和〈湖〉义词一致（陕西定边），有时又和〈水坑〉义词一致（山西左云）。〈湖〉义词和〈水坑〉义词也有着连续性（广东连平）。

广东陆河：〈池塘〉塘[$t^{h}ɔŋ^{35}$]　〈湖〉塘[$t^{h}ɔŋ^{35}$]（林伦伦等 2022：56）

云南澄江：〈池塘〉塘子[$t^{h}ɑ̃ŋ^{31}$ $tsɿ^{51}$]〈水坑〉塘塘[$t^{h}ɑ̃ŋ^{31}$ $t^{h}ɑ̃ŋ^{0}$]（张莆 1996：132）

浙江杭州富阳区：〈池塘〉池[$dʑɿ^{113}$]〈堤防〉塘[$dɔ̃^{113}$]（盛益民等 2018：112）

陕西定边：〈池塘〉海子[$xɛ^{52}$ $tsɿ^{0}$]　〈湖〉海子[$xɛ^{52}$ $tsɿ^{0}$]（王建领 2020：311）

山西左云：〈池塘〉水坑[$suɛi^{54}$ $k^{h}əɣ^{31}$]〈水坑〉水坑[$suɛi^{54}$ $k^{h}əɣ^{31}$]（乔全生 2022：37）

广东连平：〈湖〉湖[fu^{21}]　〈水坑〉湖[fu^{21}]（林伦伦等 2022：56）

2.2 “池塘”的多样性

我们最初设想的典型池塘是“人工修筑的蓄水灌溉的洼地”，但池塘的实际来源和用途却是多种多样的（参看下图 1）。池塘的来源可以分为天然（水塘、湖泊、洼地等）和人工（截流、开凿等），但纯天然的池塘极少存在，几乎所有的池塘都或多或少兼具天然和人工两种因素；用途则有灌溉，养鱼，栽培水生植物等，甚为丰富。

重要的是，池塘的利用“意图”介于来源与用途之间，其“意图”与池塘的用途是相对应的，比如为灌溉而调整水量，为确保饮料而蓄水或引水，为防备洪水而修建堤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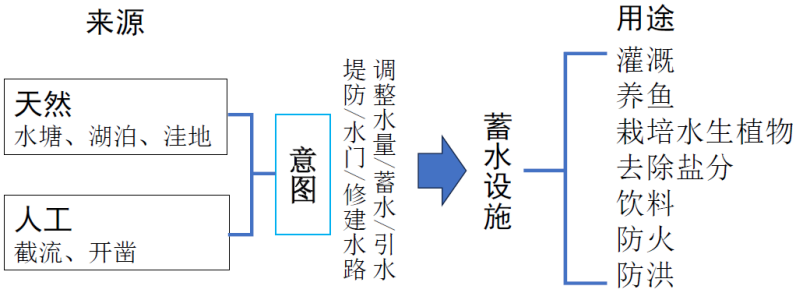


图 1　池塘的来源及用途

另一方面，方言材料往往只记录词语形式，几乎没有记载该词所指的池塘构型，有时无法判断该词是否表示〈池塘〉。因此，我们把池塘的定义改为“为供人们使用而进行了相应改造的蓄水设施”，广泛收集蓄水池的称呼，同时尽量排除没有经过人工维修的天然水坑的称呼。

三、〈池塘〉义词的方言分布

下面将具体考察〈池塘〉义词的方言分布。我们先绘制出综合地图，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观察大致的分布格局，之后从考古学（GIS）的观点来考察〈池塘〉义词的方言分布。

3.1 〈池塘〉义词的分布概观

3.1.1 词形分类

〈池塘〉义词带有表示蓄水空间的词素，本文将其称为“中心成份”。〈池塘〉义词的结构可以分为 3 种类型：(1)中心成份（+词缀）、(2)中心成份+中心成份、(3)修饰成份+中心成份。“(2)中心成份+中心成份”不是重叠形式，而是由两种不同的中心成份构成，如“池塘”、“堰塘”。

〈池塘〉义词的中心成份大多来自蓄水空间的构型：“塘”、“堰”和“坝”表示用堤防或河坝截流的蓄水空间；“泊”、“泡”、“汪”、“涝”、“湾”等表示面积较广而水深较浅的蓄水空间；“坑”是利用了天然洼地的蓄水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方

言点使用几种不同的词形，其所指亦有所不同。如在福建晋江，“池”指较浅的圆形池塘，“潭”指较深的池塘，非圆形的池塘则用“塘”，三者在使用上有大致的分工。

福建晋江：池[ti^{24}]：圆形，浅　（蔡国妹等 2023：54）

塘[təŋ^{24}]：非圆形

潭[tʰam^{24}]：深

由此可以推想，〈池塘〉义词的中心成份或多或少反映着当地池塘的实际情况，可用于考察该词形与非语言因素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文根据中心成份的原义分为 4 大系：A〈池塘〉系、B〈堤坝〉系、C〈积水〉系和 D〈洼地〉系。

A〈池塘〉系：A-1“池”类，A-2“池塘”类

B〈堤坝〉系：B-1“塘”类，B-2“堰”类，B-3“坝”类

C〈积水〉系：C-1“泊”类，C-2“泡”类，C-3“汪”类，C-4“涝”类，C-5“潭”类，C-6“湾”类

D〈洼地〉系：D-1“坑”类，D-2“圪”类

该词若带有两种中心成份，以第一中心成份为标准进行分类，例如“池塘”一词根据第一中心成份“池”归于 A〈池塘〉系。“塘”原指〈堤防〉，因此本文分为 B〈堤坝〉系。其它词形均归于 E 其它。此外，部分方言点没有池塘及其名称，本文特地分为“F 无”标出。

3.1.2 分布特征

A〈池塘〉系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华北地区，同时也见于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呈现出远隔分布，也类似于一种周圈分布。由此可以推测，A〈池塘〉系的分布区域在过去可能更为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沿海地区的 A-1“池”类分布于“桑基鱼塘”的区域内。“桑基鱼塘”是一种在低湿地进行的开发方式，把桑树种于池塘岸边，池塘里养鱼，鱼粪施用于桑树。在池塘中养鱼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以“池”指称〈鱼塘〉（黄金贵 2016：258）。福建的 A-1“池”类和其他词形的所指可能有所不同[1]。

A-2“池塘”类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至福建一带，倾向于与 B-1“塘”类毗连分布。《汉语大词典》“池塘”条首引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第 5 卷第 938 页）但是，这里的“池塘”是“池”的“塘”，即〈池的堤岸〉（黄金贵 2016：259），还不是〈池塘〉义。可见，〈池塘〉义的 A-2“池塘”

[1] “鱼塘”一词多见于福建，但其分布区域与 A-1“池”类词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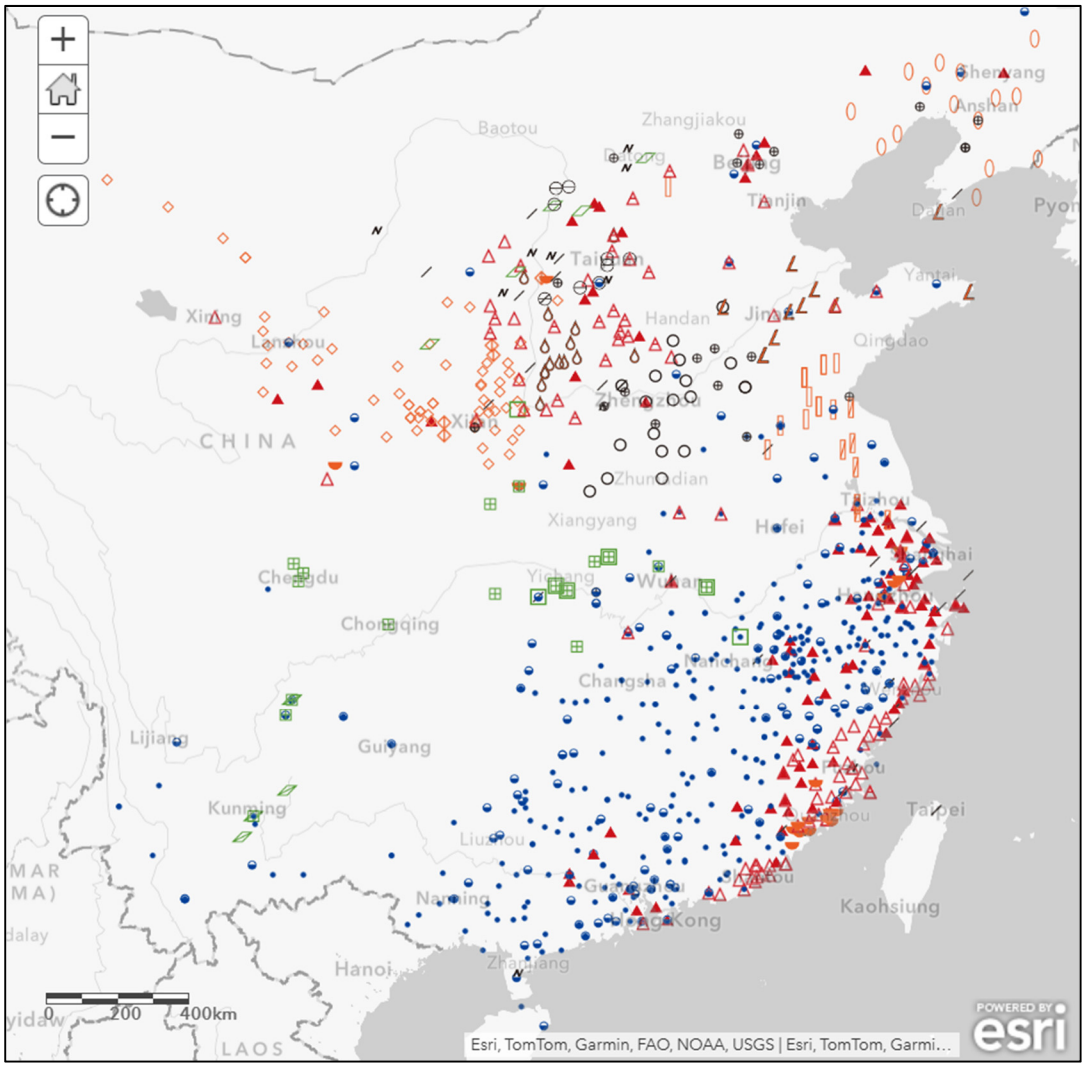


图 2　〈池塘〉义词的综合地图

A〈池塘〉系
A-1-1 池，池子
A-1-2 水池，鱼池
A-2 池塘
B〈堤坝〉系
B-1-1 塘，塘子
B-1-2 水塘,河塘,鱼塘
B-2-1 堰
B-2-2 堰塘
B-3-1 坝，水坝
B-3-2 坝塘
C〈积水〉系
C-1“泊”类:泊池,水泊
C-2“泡”类:水泡子
C-3-1 汪，水汪
C-3-2 汪塘
C-4-1 涝子，涝场
C-4-2 涝池，涝坝
C-5“湾”类：湾，湾坑
C-6“潭”类：潭，水潭
D〈洼地〉系
D-1-1 坑
D-1-2 水坑，大坑
D-2“圪”类：水圪洞
E 其它：河,海子,湖哩,水壕,水库,埠,沟湾 etc
F 无

出现于 B-1“塘”类之后。

B〈堤坝〉系主要见于华中至华南。B-1“塘”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塘”一词原指〈堤防〉，唐代以后才指称〈池塘〉义（黄金贵 2016：259）。B-2“堰”类分布于四川、湖北等长江上中游地区，B-3“坝”类零散分布于云南、山西等地区。B-2“堰”类的大部分是与“塘”结合的 B-2-2“堰塘”，B-3“坝”类也会与“塘”结合（B-3-2“坝塘”），见于云南。

C〈积水〉系和 D〈洼地〉系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其分布区域的界限较为明显：C-1“泊”类分布于山西省的临汾盆地；C-2“泡”类分布于辽宁；C-3“汪”类分布于山东南部至江苏；C-4“涝”类分布于陕西至甘肃、青海；C-5“湾”类分布于山东。D〈洼地〉系的 D-1“坑”类分布于河南；D-2“圪”类分布于山西北部。C〈积水〉系可能反映着〈积水〉义词的方言差异，D〈洼地〉系则与池塘的来源有关。这些词形的分布可能是与地形条件相对应的，本文将在 3.2 详细讨论。C-6“潭”类算是一个例外，主要分布于福建的沿海地区。

综上所述，〈池塘〉义词的分布情形如下：

(1) A〈池塘〉系呈现出远隔分布，也类似于一种周圈分布。

(2)华北地区分布着 C〈积水〉系和 D〈洼地〉系，长江以南分布着 B-1“塘”类，呈现出南北对立。

在“南北对立”的框架中，南方的语言特征往往更古老（参看岩田 2009），但是就〈池塘〉义词而言，南方词形“塘”类到了唐代才产生，属于相对较新的说法。关于“塘”类分布区域的形成，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考察。

3.2 〈池塘〉义词与 GIS

下面我们采用简化的词形分类法结合 GIS 数据进行分析。为了观察“塘”这一词素的地理分布，这里将包含“塘”的词形优先归入 B“塘”类，之后根据第一中心成份进行分类。该词若带有两种中心成份，则以第一中心成份为标准进行分类，例如，“涝池”归入“涝”类，而“池塘”则归入“塘”类（参看下图 3，4 的凡例）。

首先，以高程图为背景图，考察华北地区的词形与标高和坡度的关系（3.2.1，图 3）。其次，以归一化植被指数为背景图，分析长江以南“塘”类的分布情况（3.2.2，图 4）。

3.2.1 华北的〈池塘〉义词与标高

华北地区分布着来自〈积水〉义和〈洼地〉义的词形，其分布情形与当地的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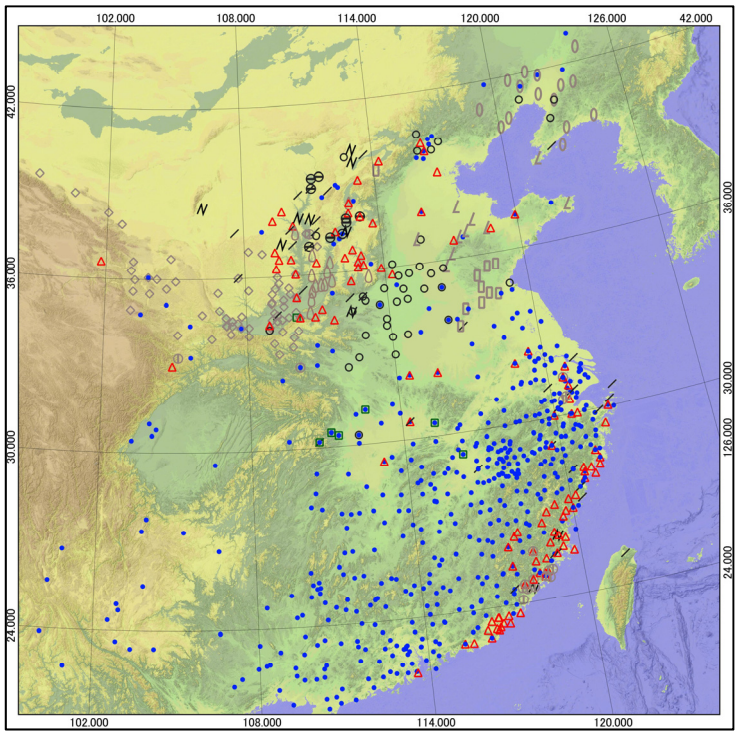


图 3　〈池塘〉义词与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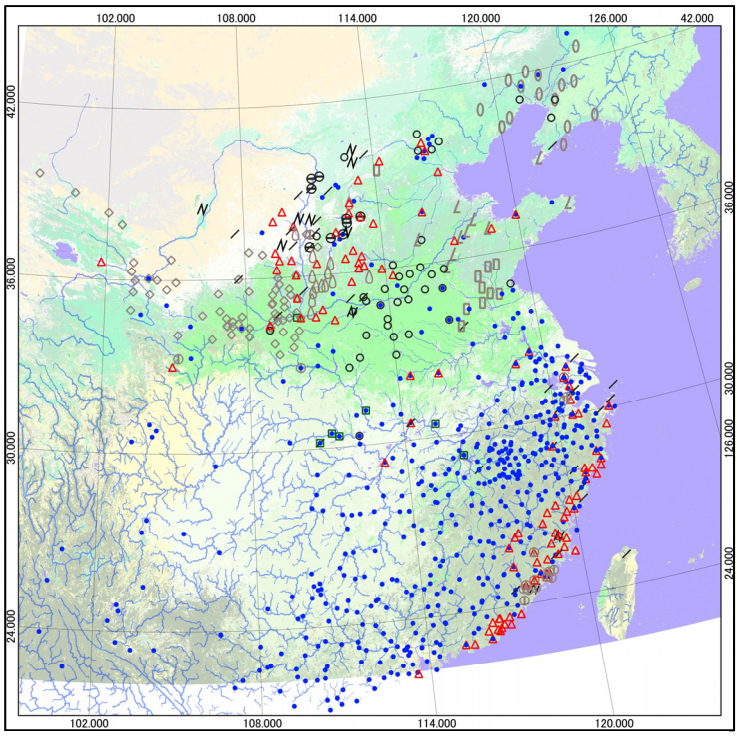


图 4　〈池塘〉义词与植被指数

凡例（图 3, 4 共通）

△ A“池”类: 池, 池子, 水池, 水池子, 麻池

• B“塘”类: 塘, 池塘, 水塘, 鱼塘, 堰塘, 汪塘

□ C“堰”类: 堰

D“泊”类: 泊子, 泊池

E“泡”类: (水)泡子

F“汪”类: 汪, 水汪

◇ G“涝”类: 涝池, 涝坝

H“潭”类: 潭, 水潭

I“湾”类: 湾, 水湾儿

○ J“坑”类: 坑, 水坑

⊖ K“圪”类: 水圪洞, 水圪泊

／ L 其它 :河, 窟 etc

N M 无

和坡度有一定的关联。图 3 以高程图（Elevation map）为背景图绘制而成。来自〈积水〉义的词形中，F“汪”类和 I“湾”类分布在低且平坦的地区[2]，G“涝”类则分布于高地[3]；来自〈洼地〉义的词形中，J“坑”类分布于低地，而 K“圪”类则有处于高海拔地区的趋势[4]。由此可以推测，中心成份的选择很可能反映着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池塘的构型。

D“泊”类的分布情况也值得注意。D“泊”类的分布区域沿着临汾盆地的河谷向太原的方向伸展。D“泊”类基本分布在黄河以东，只有一个方言点见于黄河以西（参看图 5）。这附近的孟门镇是古代黄河渡口之一（村松 2023：115-116），这意味着两个地区通过一个渡口相连，也许这暗示了古代的交通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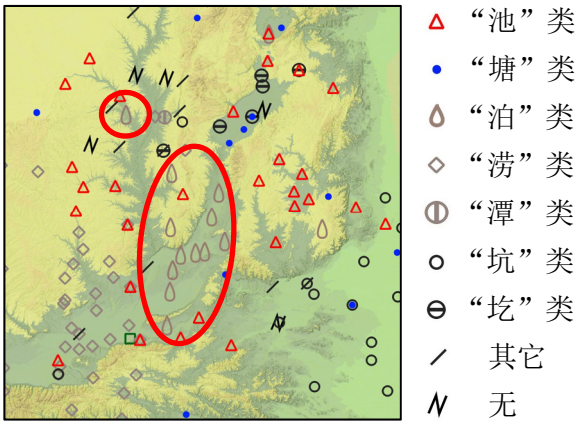


图 5　山西省附近的扩大图

3.2.2　〈池塘〉义词与植被指数

图 4 的背景图是通过卫星图像（MODIS/Terra 250 米分辨率）计算出多个时间段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简称 NDVI）数据，利用多元分析（无监督分类）进行分类和整合的。因此，图 4 是根据全年植被活动的变化特征进行的彩色编码分类。一般来说，植被与气候、土壤和水等各种环境因素相对应，因此，大空间尺度上的植被活动变化类型可用作表示生态环境差异的指标。

植被类型的分布大致与农业类型相符，以长江为界限，南北方的趋势各不相同。

[2] F“汪”类的平均标高是 137.0 米，平均坡度是 1.0 度。虽然最大标高超过 900 米，但这个地点可视为一个例外。I“湾”类的平均标高是 47.2 米，平均坡度是 0.7 度。
[3] G“涝”类的平均标高是 1086.3 米。
[4] J“坑”类的平均标高是 197.1 米，K“圪”类则是 882.0 米。

至于华北地区的来自〈积水〉义和〈洼地〉义的词形，分布区域的界限与植被变化的界限较为一致。此倾向与高程图（图 3）相同，根据植被类型可以再次确认华北地区的〈池塘〉义词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着对应关系。

B“塘”类广泛分布在长江以南，长江下游的分布点也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塘”类的分布区域与稻田分布大概一致，尤其是需要为水稻田蓄水的山区。“塘”本指〈堤防〉，从而指称用堤坝截流蓄水的池塘。此技术与水稻密切相关，起初盛行于长江下游，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传播到长江以南。可以说，“塘”类的分布情况反映了水稻技术的传播过程。

四、河南固始的历史地图与 GIS

最后，我们尝试语言、历史、GIS 的结合。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位于南北的交界处，即水稻和旱田的交界地带。关于固始，因为留存有明清地方志等详细的历史记录，所以有利于考察淮河流域水利设施的实际情况。本文通过参照现代的卫星图像和明代的地方志记载，来考察固始的水利设施、地理环境与语言的对应。

现代固始的〈池塘〉义词有两种词形：

河南固始：塘[$t^haŋ^{33}$]（叶祖贵 2009：185）

小池子[$ɕiau^{24}$ $ʦ^hɿ^{55}$ $ʦɿ^0$]（辛永芬等 2023：24）

其实，有关固始的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塘”、“陂”、“湖”、“堰”等多种称呼，这里主要着眼于“塘”和“湖”进行分析。

4.1 现代固始附近的水利设施

固始附近的蓄水设施可分为 3 种：(1)引河/集雨型池塘、(2)截流型池塘、(3)方形环濠。在中国，环濠聚落的出现能追溯到一万年前，但环濠一般呈圆形，方形环濠则出现于公元前 3000 年，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5]。固始附近的环濠呈方形，现在还留存着许多方形环濠。为了考察现代固始地区的情况，我们在不同地势的区域调查了蓄水设施的位置及其类别[6]。

[5] 方形环濠见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迹，如良渚文化（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樊城堆文化（江西抚河流域、赣江流域）、大汶口文化（山东五莲县丹土）、屈家岭文化（湖南），参看中村（2023）。

[6] 池塘所在的位置在旧时的卫星图像上很难找到，因此这里使用了现代的卫星图像。虽然有可能包括最近形成的池塘，但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过去的情况，至少可以推测，池塘的构型

图 6 利用卫星图像展示出现代固始地区的蓄水设施的位置及其类别：红点表示(1)引河/集雨型池塘；黄点表示(2)截流型池塘；蓝点表示(3)方形环濠。(1)引河/集雨型池塘多见于谷地（D），即适于引河流或者蓄积雨水的地势。(2)截流型池塘多见于山区（B）或丘陵地（A, C），即把流下来的雨水拦截在山坡上。(3)方形环濠多见于中小河流的泛滥平原的低地（E），在这种地形比较容易确保充足的水量，可以常时在环濠里放水。此外，三者都少见于泛滥平原（F），可能是因为水量丰富的地区不需要修建蓄水池。据此可见，水利设施的类别和地理环境之间具有规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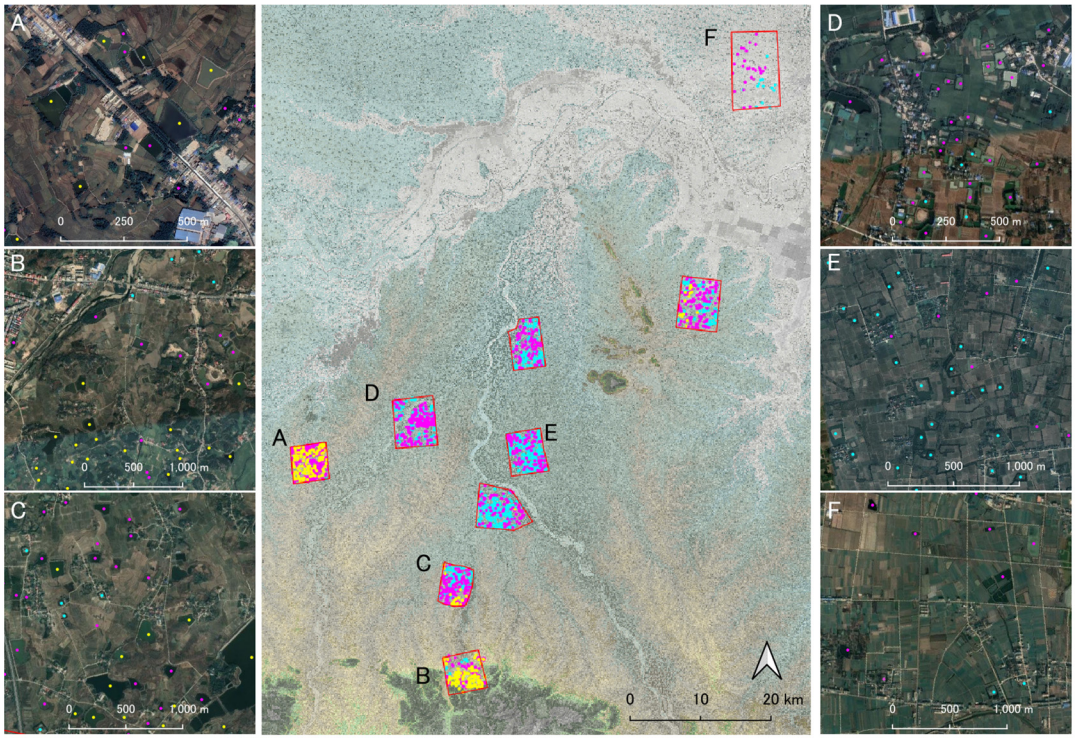


图 6　蓄水池的位置及其类别（中央：全图[7]、A-F：扩大图[8]）

● (1)引河/集雨型池塘　● (2)截流型池塘　● (3)方形环濠

和地形条件大体上是相符的。

[7] 我们通过 SRTM 绘制高程图，重叠 CORONA 卫星图像作为背景图。CORONA Satellite image courtesy of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 NASA JPL (2013).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1 Arc-Second Global.NASA EOSDIS Land Processes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Accessed 2024-06-21 from https://doi.org/10.5067/MEaSUREs/SRTM/SRTMGL1.003

[8] 卫星图像来自 Google, ©2024 Maxar Technologies, CNES/Airbus。

4.2 明清固始的历史地图

明・嘉靖《固始县志》卷 4《水利》所收蓄水池的分布图。这幅图原本是为记录池塘的所有权而绘制的，其地理位置虽然未必准确，但记载着“…塘”、“…堰”、“…陂”、“…湖”等称呼，可与卫星图像作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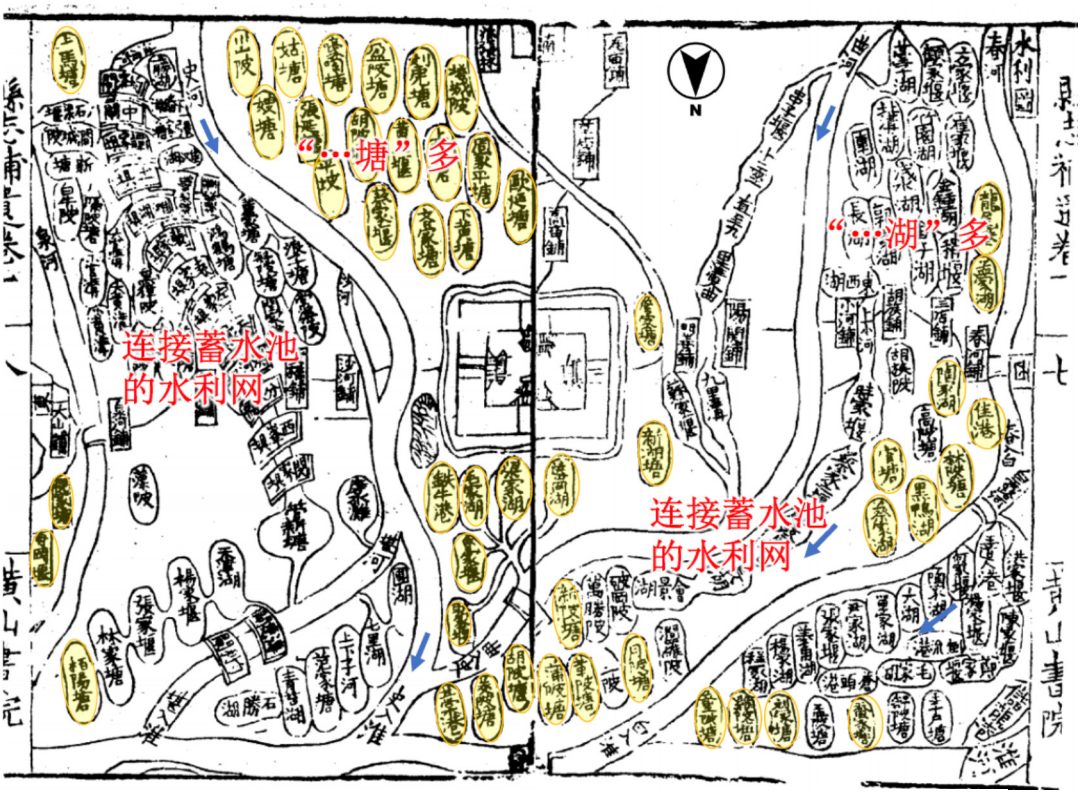


图 7　根据嘉靖《固始县志》卷 4《水利》推定的集雨型池塘（黄圈）

我们根据明・嘉靖《固始县志》卷 4《水利》推定了当时的水利设施的情况（图 7）。固始县从南向北流的两条河（史河、曲河（灌河）），最后都流入淮河（蓝色箭头表示河流的方向）。一个圈子表示一个池塘，圈子里的字面可能表示所有者或当时的通称，末位附加了“…塘”、“…湖”等成份。加之，有的圈子用细线相连，可以推测，当时很多池塘是通过水路连接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推定了集雨型池塘的位置（黄圈），还发现了史河东边和曲河西边有着连接蓄水池的水利网（注意：上为南，下为北）。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河和曲河之间，有许多被称为“…塘”的蓄水池，曲河西边则分布着被称为“…湖”的蓄水池。

图 8 则是将历史地图信息反映在现在的卫星图像上。跟现在的卫星图像相比，“…塘”蓄水池较多的地区相当于低地，这里的池塘类别大多是引河/集雨型池塘和方形环濠。“…湖”蓄水池较多的地区为丘陵地，截流型池塘较多。据此可见，“…塘”和“…湖”这些称呼似乎是有区别的，三种蓄水池的类别和称呼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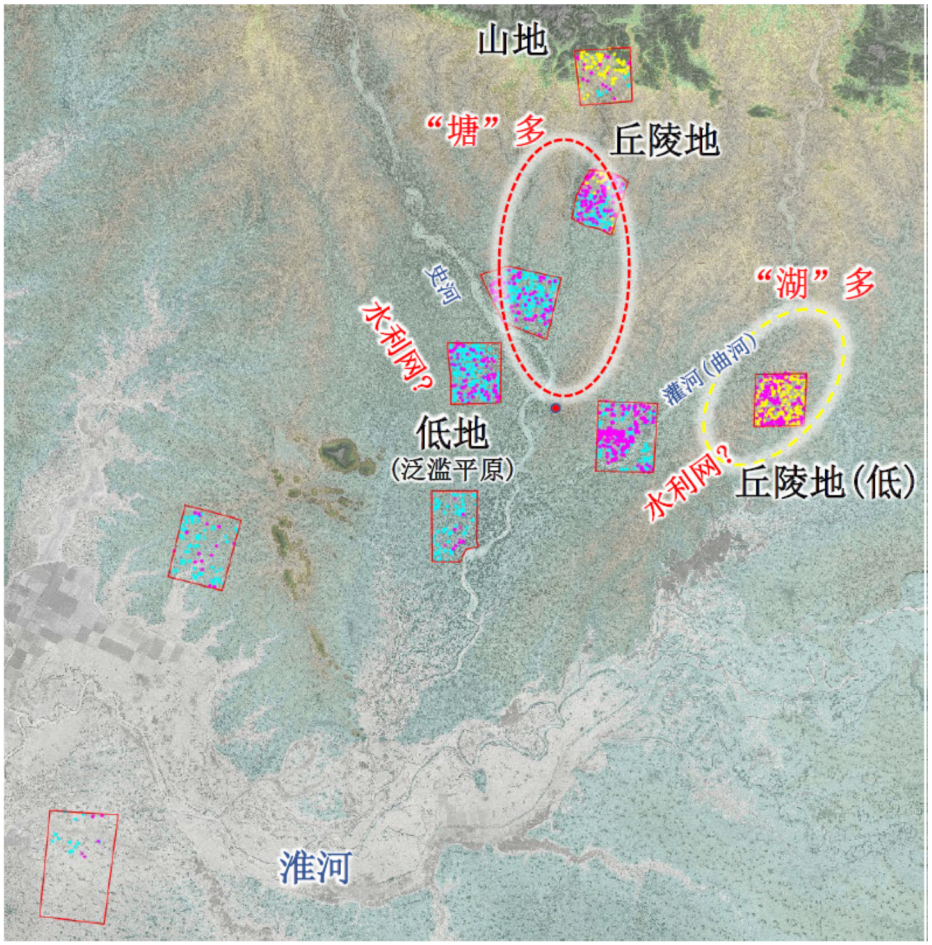


图 8　历史地图与卫星图像的核对[10]

●(1)引河/集雨型池塘　●(2)截流型池塘　●(3)方形环濠

[9] “…湖”还零散分布于低地等其他地势，《固始县志》以外的史料中也有类似情况。

[10] CORONA Satellite image courtesy of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 NASA JPL (2013).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1 Arc-Second Global.NASA EOSDIS Land Processes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Accessed 2024-06-21 from https://doi.org/10.5067/MEaSUREs/SRTM/SRTMGL1.003

五、结语

本文从语言、历史、考古的三个角度来考察了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池塘〉义词。根据语言地理学的分析，〈池塘〉义词呈现出“南北对立”：华北地区分布着来自〈积水〉义和〈洼地〉义的词形，华南地区则分布着“塘”类词形。来自〈积水〉义和〈洼地〉义的词形与标高和坡度相关联。从植被的角度来看，分布于南方的“塘”类词形与水稻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河南固始的历史地图和卫星图像的分析，本文发现现代固始地区有 3 种蓄水池：(1)引河/集雨型池塘、(2)截流型池塘、(3)方形环濠。此 3 种类别分别多见于谷地(1)、山区或丘陵地(2)、低地(3)。加之，固始的历史地图上“…塘”较多的地区相当于低地，“…湖”较多的地区多为丘陵地。可以认为，明清的称呼和现在的地形条件、分布情况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方形环濠多见于“塘”类词语的分布区域中，把现代固始和先秦遗迹的方形环濠作对比，就会发现两地的环濠不仅是形状，规模也很相似（参看图 9，卫星图像上的红线表示 100 米）。此两地的方形环濠是否有某些渊源？“塘”类词和环濠有何关联？这些疑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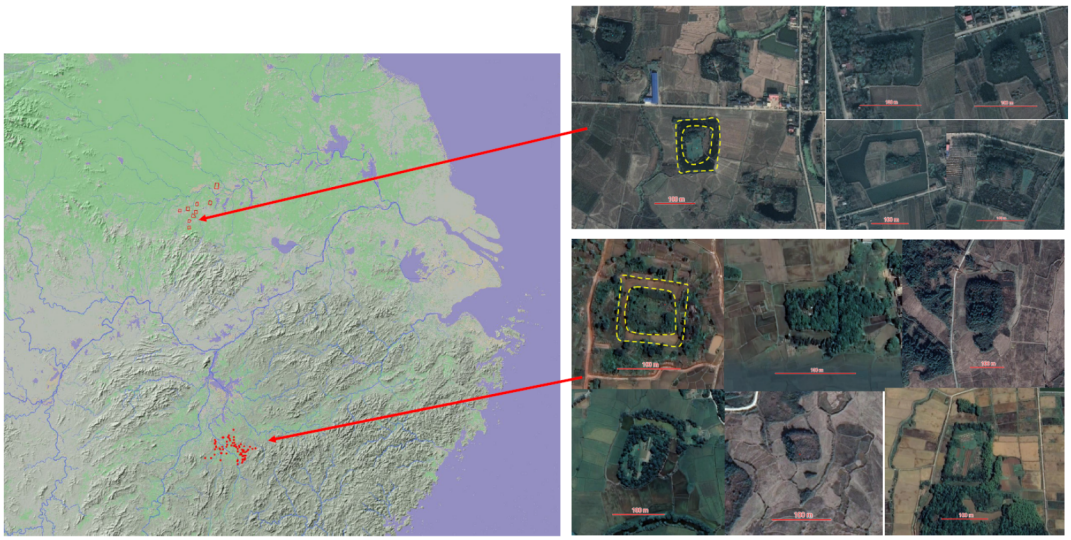


图 9　从卫星图像看方形环濠的形状以及规模[11]

（右上：固始一带的环濠、右下：江西省抚河流域先秦遗迹的环濠）

[11] 卫星图像来自 Google, ©2024 Maxar Technologies, CNES/Airbus。

本文还处于初步研究的阶段，至少还有以下 4 个课题可待研究：(1)利用历史文献的历史语言研究；(2)〈水利设施〉语义场（包括〈堤防〉、〈堤坝〉、〈(天然积水的）水坑〉etc.）的系统研究；(3)蓄水池的结构与其称呼如何对应；(4)蓄水池的发展史。我们认为，语言、历史、考古（GIS）三学科的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互相参考和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才能进行完整的分析。

附记：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中国语言历史地理论坛 2024”（2024 年 3 月 3 日，online）上进行过口头报告，承蒙汪维辉教授、罗自群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概由笔者负责。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JSPS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20H05818、23H00625 以及 2024 年度南山大学パッヘ研究奖励金 I-A-2（Nanzan University Pache Research Subsidy I-A-2 for the 2024 academic year）的资助。

参考文献

蔡国妹、唐若石主编 2023《中国语言资源集・福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金贵 2016《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一版）》商务印书馆

林伦伦、甘于恩、庄初昇主编 2022《中国语言资源集・广东・词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竹风主编 1988-1994《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乔全生主编 2022《中国语言资源集・山西》商务印书馆

盛益民、李旭平 2018《富阳方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建领主编 2020《陕西方言集成（榆林卷）》商务印书馆

辛永芬、王新宇、段亚广 2023《中国语言资源集・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叶祖贵 2009《固始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茀 1996《澄江方言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张梯、葛臣纂修 1542（明・嘉靖 21 年）《固始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51，上海古籍書店，1963

中村慎一 2023「方形環濠の広がり」，『日中共同研究成果報告書 II 中国新石器時代

文明の探求』六一書房
村松弘一 2023「中原への道～人・モノ・馬はどこで黄河を渡ったか？」,『日中共同研究成果報告書 II 中国新石器時代文明の探求』六一書房

看类动词表“趁”义来源探析

马菁屿
大理大学

内容摘要：看类动词“看、瞅、瞄”可表“趁、乘”义，在今一些方言中仍见使用。“看”由“观看”义引申出“等待”义，继而虚化为“趁”义。“看”之“趁”义最早见于元代文献。“瞅”由“看”义虚化为“趁”义，最早见于清代文献。“瞄”可能是个方言词，用于通语表“看”义较晚，约在清代。看类动词虚化为“趁”义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汉语中，在羌语南部方言萝卜寨话中，动词 sə（看）可虚化为从属连接标记，对译为汉语的“趁”。羌语的 sə 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条件式附加成分 -sa\-se 及其变体，当属同一形式。

看类动词“瞄、瞅”可表“趁”“乘”义。《汉语方言大词典》：“瞄，〈动〉趁着。闽语。广东揭阳[bio^{55}]那个杀仔瞄伊无注意对伊个手袋抢起住走（那个小偷趁着她没留意，把她的手袋抢了就跑。）”《新潮汕字典》：“瞄，趁着：瞄伊无预就入去（趁他不备就进去）。”《武汉方言词典》：“瞅，乘（机会等），瞅他来了你再说。我瞅倒人少了再买。”[1]《汉语方言大词典》认为“瞄”表“趁着”义是动词，但从例句看“瞄伊无注意”的结构是“瞄+小句”，是“趁她不注意”义，显然已经虚化为介词。“看”之“趁”义,马菁屿（2022/2020）略有提及，但考察不够详尽，始见书证亦嫌偏晚。对看类动词表“趁”义的来源，学界还未见阐述。

下面通过对“瞅、瞄、看”方言、文献的考察，结合类型学理据，探析看类动词虚化为介词表“趁”义的过程。

一、看类动词表“趁”义在文献和方言中的例子

1.1 “看”之“趁”义

“看”之“趁”义，表利用时机、及时。其后可接形容词、小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文献是元代。

[1] “瞄”见《汉语方言大词典》第 6530 页，《新潮汕字典》第 546 页，《武汉方言词典》第 218 页。

1） 玄德不语。张飞曰：“看汉天下无主，杀太师贼臣，再扶汉室。”（元佚名《全相平话·三国志平话》卷上）“天下无主”是杀太师、再扶汉室的条件。

2） 月馀了毕，鲁肃对孙权举荐庞统。孙权骂鲁肃：“前看刘表死，你赴荆州吊孝，引刘备在夏口，又引诸葛过江，美言说动三十万军，百员名将，把了柴桑渡，相拒曹操。”（元佚名《全相平话·三国志平话》卷下）鲁肃赴荆州是因为刘表死，“看+小句”表后一行为发生的原因，同时也是鲁肃赴荆州吊孝的条件。

3） 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全元散曲》之张养浩《雁儿落兼得胜令》）“看时”表“趁时”[2]义。

4） 芰荷衣，松筠盖。风流尽胜，画戟门排。看时节采药苗，挑芹菜。捕得金鳞船头卖，怎肯直抢入千丈尘埃？（《全元散曲》之张养浩《普天乐》）“看时节”即趁时候。

5） （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散心耍一回去来。（元王实甫《西厢记》第 1 本楔子）小姐出去散心的条件是没人去佛殿敬香。夫人并不是让红娘看看如果佛殿无人烧香，才准去玩耍。而是夫人凭经验知道现在殿堂上没有香客，小姐可以趁便去散散心。

6） 思量起，是老亲合颠倒。公公，你图他折桂看花早，不想自把一身，送在白杨衰草。（元高明《琵琶记·感格坟成》第 27 出）“折桂看花早”意为蟾宫折桂要趁早[3]。

明清时期戏曲、小说中偶见。

7） 所幸大金皇帝，遥封俺为溜金王。央我骚扰淮扬，看机进取。（明汤显祖《牡丹亭·牝贼》第 19 出）

8） 【绕池游】〔小生儒巾上〕功名小小，镇日萦怀抱，赴春闱试期已到。洛阳花好，准备着游缰看早，怕他人攀条最高。（明沈泰《盛明杂剧二集•樱桃园》卷 28）

9） 【煞尾】没照会，先去了那掣肘汉家官；有机谋，暗添上这助臂番儿汉。等

[2] 《小孙屠》第三出：“对此三春好景，就西郊这丽春园内沽卖香醪。一来趁时玩赏；二来恐遇得个情人，亦是天假其便。”（《汉语大词典》“趁时”条）“看时行踏”正与“趁时玩赏”意近。

[3] 宋韦骧《登科》：“喜汝登科年尚少，好摅事业趁明时。”“明”为“明艳”义，趁明时即趁年华明艳的时候。

不的宴华清《霓裳》法曲终，早看[4]俺闹鼓鼙渔阳骁将反。（清洪升《长生殿·合围》第 17 出）“早看”是“看早，趁早”义。

10）〔又望介〕是阿！是阿！一些也不差。看他歇肛光景,待他拢来，我就跳上去便了。（明末清初李玉《清忠谱·哭追》第 12 折）

11）西门庆一面笑着，看街上无人，带上眼纱去了。不在话下。（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 4 回）句中的“看”既可解为“观看”，也可表“趁”义。

以上例句中“看”可带小句，表后一行为发生的条件或原因；还可以带表时间的词，如“早、时”，多出现在口语化较强的戏曲、小说中，诗词文章鲜有。在今天的一些方言[5]中，仍然有用“看”表“趁”义的。

12）看天晴，可以去山上逛逛。（云南宣威）

13）看我在这点嘛，你就赶紧问。（云南临沧沙河乡平掌村 四排山话）

14）看我还能动得着，我把娃给你看着，你们去忙你们的。\看天晴，把衣裳晒下。（甘肃天水秦州区西口镇）

15）看你有时间，把脏衣服洗了吧。\看你还有零花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云南墨江县）

16）看早去吃。看早咱赶紧走。办啥事得看早，晚了就来不及了。（河南开封市）

17）你看我搁这儿了，你赶紧问。（你趁我在这儿了，你赶紧问。河南周口）

18）你看你记着这事哩，赶紧把它给办了。（你趁你记着这事哩，赶紧把它给办了。河南周口）周口方言需要“你看”连用，这里的“你看”还不能完全视作话题标记，“看”仍有“趁”义。

19）看他没注意，你就偷偷溜走。（湖南耒阳市）

20）看着没人夹菜你赶紧夹。（年轻人或受过教育的中年人用“趁”，爷爷奶奶辈老人或未受过教育的人一般用“看着”，也用“望着”，如望着天还晴，你赶紧把衣服洗了。）（云南普洱）

今礼泉、朔州、阳泉、大同、南阳、保定等地区，“看”可单用，如“看我还能动，给你带带孩子[6]”，“看饭还热着，赶紧吃”。但使用范围有限，“看”后不能直接接表时间、状态的词，如不能说“看早”、“看热”。

---

[4] 宋辛弃疾《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一身（一作：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早趁”即“趁早”义。

[5] 以下例句提供者为史红强老师、陈蛾老师、刘哲、杨健、鲁冰、张航、张玉慧、白明静、杨夏、曾微。

[6] 周口、兰州、济南、常德也可以说。

以上文献和方言的用例，“看”所在的小句或组成成分表另一种行为实施或事件发生的条件。

1.2 “瞅”之“趁”义

“瞅”[7]也写作“丑、瞅”，表“趁”“趁着”义，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用例是清代。

21） 贾母笑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气。”（《红楼梦》第 88 回）

22） 袭人忙打发人去说：“少乱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你们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不说。”（《红楼梦》第 58 回）

23） 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攒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红楼梦》第 52 回）

24） 你说你呆我心里明白，丑着没有人儿，你就溜进来打牙逗嘴。（王廷绍辑《霓裳续谱》卷 8）

25） 倘或那丫头瞅空儿寻了死，反不好了。（《红楼梦》第 77 回）

26） 王夫人便道：“既这么着，你去干你的，这时候满屋子的人，暂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儿[8]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红楼梦》第 96 回）

27） 偏这方氏又不肯安静吃饭，一面对许寡装羞，一面与不换递眼，瞅空儿将脚从桌子下伸去，在不换腿上踢两下缩回。（《绿野仙踪》第 21 回）

28） 施公又瞧，扬扬得意，暗送眼色，快头心下明白，就知瞅空叫动手了。（《施案奇闻》第 15 回）

29） 一院子只因一会不在家，怎么丑了个空儿[9]都都偷了去，只剩下半死不活的一只草鸡。（王廷绍辑《霓裳续谱》卷 7）

30） 凤姐儿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红楼梦》第 44 回）

31） 湘莲便起身出来，瞅人不防去了，至门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罢，我到城外就来。”（《红楼梦》第 47 回）

32） （贾琏）口里说着，瞅他不防，便抢了过来，笑道：“你拿着终是祸患，不

---

[7] 章太炎《新方言》：“顺天，谓视曰谯，不分近察远望，俗字作瞧。又谓旁睐微察曰督，音如秋，俗字作瞅。”在今沂水方言中，“秋”[ts^{h}iou^{213}]有看、偷看、探视、看顾、照料等义。见张廷兴《沂水方言志》第 136 页。《汉语方言大词典》引 1936 年《牟平县志》：“偷视曰督，音抽。又曰瞧。”我们认为沂水方言中的“秋”本字当是“瞅”。

[8] 此时宝玉浑浑噩噩，脑子不清不楚，一大家子人正商量用婚事给宝玉冲喜。袭人避开众人告知王夫人宝黛之情，王夫人才有此说。因此文中的“空儿”指便宜的机会，不是空闲义。

[9] 今山东牟平有此用法，“我瞅个空儿去看看他”。参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 5130 页。

如我烧了他完事了。”（《红楼梦》第 21 回）

33） 平儿又笑道：“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的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红楼梦》第 61 回）

以上例句中，21 至 24 例“瞅（盹）着”表“趁着”义，也可理解为“看着”义，介于动词和介词之间。25 至 29 例中“空（空儿）”为“机会、空隙”义，是抽象名词，无法看见，故“瞅+（个）空（空儿）”为“趁空隙、利用机会”义。30 至 32 例“瞅+小句”表后一行为的条件，33 例“瞅……时节”相当于“趁……时候”，我们认为 30 至 33 例中的“瞅”已经虚化为介词。

今天的一些方言，“瞅”仍有上述用法。《烟台市志》[10]（下）记录了乳山、海阳“瞅、捎、就、赶”相当于普通话的“趁”。

34） 瞅着人少的时候，再跑出去[11]。（安徽岳西）“瞅着……时候”表“趁着……时候”义。

35） 他瞅冷子蹚。（哈尔滨。他乘人不备跑了）“瞅”表“乘”义。

36） 瞅着这会儿没人，赶紧缓一坎儿（趁这会儿没人，赶紧歇一下）。（甘肃平凉）

37） 瞅着今天天气好，咱俩出去逛逛吧。（山东泰安）

通过对“瞅”的考察，我们认为“瞅”的虚化，经历了由“看着”义，到可两解为“趁着”、“看着”义，介于动词和介词之间的状态。当“瞅”后加抽象名词时，不再表“看见”义。当“瞅”后可带小句或构成“瞅……时节”结构，虚化为介词“趁”义。

“瞄”表“趁”义方言例见前，文献用例尚未找到。“瞄[12]”可能是个方言词，用于通语表“看”义较晚，约在清代。《孽海花》第 31 回：“说着，已一手举起了手枪，瞄准玛德，只待要扳机。”

---

[10] 《烟台志市》下 1701 页。36、37 例句提供者马金航、齐宝鲁。

[11] 32 例见《汉语方言大词典》第 6824 页，33 例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 5130 页。

[12] 邢向东先生认为“瞄”为后起字，《广韵》《集韵》均无记载。因本字不明，人们多写作眈，有的写作瞧、目+冒。他认为瞄[ᶜmau]是一个地道的高频土语词。可以将它最晚的产生年代推至宋代。与“ 猫描緲”等平行，它在方言中也可能有带介音、不带介音的异读，对应到今方言，就是[ᶜmau]/[ᶜmau]两读。见《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兰银官话表“看”义的“瞄”[ᶜmiau] / [ᶜmau]》,《方言》2024（2）。友生奠传旺说在溆浦话里“瞄”读为[mau[44]]表“看”义，读为[miau[13]]表“瞄准”义。与“瞄”音近义通有个字“瞷”，《汉语方言大词典》：“瞷，看，①西南官话。四川成都。明李实《蜀语》：‘谓看曰瞷。’四川宜宾。清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志》：‘谓看曰眷，曰瞷。’贵州遵义。②湘语。湖南[miau]。《玉篇·目部》：‘瞷，无昭切，张目也。’”（第 7243 页）不过《正字通》认为“瞷”是讹字。《正字通》：“瞷，讹字，旧注音描，张目，非。”

二、“看”由“观看”义演变为“趁”义的过程

《论“闻”之“趁”义的来源》[13]一文，分析“闻”产生“趁”义的原因是，“闻”可用于表假设的条件句，还可与表将来时的“将”连用。“看”恰也满足这两个条件。

2.1 “看”用于表假设的条件句

38） 若看如今，自是有见成下工夫处。(《朱子语类》卷 104“朱子一 • 自论为学工夫”)

39） 因说：“前辈诸先生长者说话，于大体处固无可议；若看其他细碎处，大有工夫未到。”(《朱子语类》卷 104“朱子一 • 自论为学工夫”)

40） 某宋江是也，昨差阮小五招安刘唐史进去了，又差山儿李逵救李孔目，都不见上山来。小偻罗，踏著山冈。看他来时，报复我家知道。(《元曲选•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第四折）“看他来时”即“如果看见他来”。

2.2 “看”表“将要”义

“看”表“将要”义，可以和表将来时的“将”连用。林绍德《诗词曲词语杂释》举了 15 例“看”表“将会、将要”义的例证。如（唐）岑参《送陶铣弃举荆南觐省》：“明时不爱璧，浪迹东南游。何必世人识，知君轻五侯。……坐见吾道远，令人看白头。”“‘令人看白头’是使人即将白头的意思。”再举几例。

41） 莫为久住，看则去时，虽论有顶之天，总到无常之地。(《敦煌变文校注》卷 6“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看则去时”指将要离开人世时[14]。

42） 将成佛果，看座（坐）花台。(《敦煌变文校注》卷 5“维摩诘经讲经文 4”）“看、将”对文，“看”即“将”义。

43） 我所以弃如灰土，自力修行，如今看即证菩提，不可交（教）却堕落。(《敦煌变文校注》卷 6“维摩诘经讲经文 5”）“即”指“以后不久的时间”义，“看即”表将要义。

44） 红日看将山上没，白云又向岭头生。(《敦煌变文校注》卷 6“维摩诘经讲经文 5”）“看将”连用，“眼看将要”义。

---

[13] 参看马菁屿（2022：4）。

[14] 41 例第 1081 页；42 例第 857 页；43 例第 889 页；44 例第 890 页。

在这种语言环境的浸润下，“看”由“观看”义，引申出“等待”义，继而虚化为“趁”义。

45） 愿明使君少垂详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虽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复为乱。(《三国志·吴书·周鲂传》)“空隙”表时机义。“看、伺”同义，其后加抽象名词“空隙”，即“等待时机”义。

46） 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太平广记·豪侠三·义侠》出《原化记》）“看时机为”是“见机而作”意，“看”后加抽象名词“时机”，“看”表“等待”义。

47） 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贼，方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隋书·李穆传》)《资治通鉴·陈纪》第 175 卷：“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贼，便散走，努力还乡。’”“待看吾死”，《资治通鉴》作“汝俟吾死”，是知“待看”与“俟”同义，表等待。“待看吾死”不能理解为等待看着我死，故“看”宜理解为“等待”义。“待看吾死，且可降贼”，前一分句表条件，“待看”为“待等……时候”义。

48） 沙门志公忽然起舞歌乐，须臾悲泣，因赋五言诗曰：“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隋书·五行志上》)“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是预言公元 547 年（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将有祸患。“八十三”指八月十三日是时间，时间无法观察到。“看”后加小句“八十三，子地妖灾起”，小句表发生的事件和时间，因此“看”宜理解为“等到”义。

49） 永元中，童谣云：“……乌集传舍头，今汝得宽休。但看三八后，摧折景阳楼。”（《南齐书·五行志》卷 19）“但看三八后”指“只等到 24 年之后”，“三八”指从建元元年至中兴二年，共 24 年。三八指时间，是抽象名词，“看”后的小句“三八后，摧折景阳楼”，表发生的事件和时间，因此“看”宜理解为“等到”义。

50） 止不过奏说边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觑迟疾紧慢。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冒突天颜。(《元曲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 2 折)“空便”，“机会、方便”义，抽象名词。“看空便”即“瞅机会、等待机会”义，也可理解为“趁空、趁着方便”义。

51） 大嫂，你守着铺面，我自歇息去也。倘有甚么客人到我店中投宿，你只推

先要房钱。看他秤银子时，若是有些油水，你便来叫我下手。（《元曲选•玎玎珰珰盆儿鬼》第 1 折）“看他秤银子时”，不是看着他秤银子，而是等他将银子拿出来在给他秤重量的时候，如果有些油水，如何如何。因此句中的“看”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视觉类动词，更多带有“等待”义。“看他秤银子时”是后续事件发生的条件，因此“看”既可解为“等待”义，也可重新分析为“趁”义。

当“看”后加抽象名词或小句，表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即将发生的条件时，虚化为介词“趁”义。

三、看类动词表“趁”义的类型学依据

在今羌语南部方言萝卜寨话中，动词 sə（看）可虚化为从属连接标记，对译为汉语的“趁”。

例：趁我们年轻出去走走[15]

52） tɕe tsɑ-je hɑ-sə ŋɑ， qɑlɑ sə-ke-ŋɑ sə-je-ɛɑ
还 小—名物化 向下—看 连词 我们 向外-走-状语 看-状态变化-未完成体、第一人称、语气

53） tɕe tsɑ-ŋɑ sə， qɑlɑ sə-ke-ŋɑ sə-je-ɛɑ
还 小-状语-趁（连词，表时间）

第一种表达，sə 仍具有动词“看”的性质。整句可理解为“看着还小，出去走走”。第二种，sə 用于从句的末尾已经完全虚化为从属连接标记，表时间，可对译为汉语的“趁”。此外 sə 还能表示从句和主句之间的因果关系[16]。虚化了的 sə，语音上有时会跟其前面的音合并，声调随前面的词，有时声调会变得很弱[17]。以上两个例子“sə”都用于未完成体，与汉语表“趁”义的“看”“闻”适用的时态（将来时）一致。

“sə”在东乡语里是条件副动词的形态标志，“带有这种标志的动词和后面的动词结成修饰关系，说明后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发生的条件”或原因[18]。土族语的假

[15] 中央民族大学王保锋老师提供了例句和分析。

[16] mu^{55} pia^{55}-ti^{31} $ja^{35}ji^{31}$ du^{35}-$t^hi^{31}sə^{31}$, $qa^{55}la^{55}$ ma^{31}-ke^{31} pe^{31}-$ɛi^{31}$（由于天气太热了，我们不去了）参见王保锋（2017：194）。

[17] 王保锋老师表示羌语声调作用很小，同一个人不同时候读一个词，声调可以不同。是以 50、51 例就不标声调了。

[18] 刘照雄《东乡语简志》第 67-68 页。敏春芳写作“se”《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定副动词作-sa，“有时假定的意义不明显”，表示前一个行为是后一行为的条件[19]。除表示条件外，还可作从比格的附加成分，表示比较的标准、原因（或行为产生的缘由）和（行为开始发生的）时间[20]。

54） nen**sa** tɕirvallə vainanu:？（有比这便宜的吗？）

55） ndatɕær kun sain kunsgɜ**sa** be:sən gua.（坏人不喜欢好人。）

56） ne ɢadʑærdə ʂdana urdʑɔŋ**sa** bu:də tarəna.（这地方从古以来盛产麦子。）

同属于蒙古语族的保安语，其条件副动词的形态标志作-sa\-se，东部裕固语-sa\-se\-so,蒙古书面语-ɣasu\-gesü，-basu\-besü。比较有趣的现象是突厥语族的条件式（假定式）附加成分也作-sa\-se\-sə,撒拉语-sa\-se,西部裕固语-sa\-se，图瓦语-sa\-se、-za\-ze+第三人称，-sə\-si、-zə\-zi+第一、二人称[21]。孟达来认为“蒙古族甘、青语言的假定式附加成分跟突厥族语言的假定式（或条件式）附加成分属于同一形式”[22]，其说甚是。王远新认为突厥语族语言的“动词条件式的基本功能是表示动作和行为发生的条件，……在一定语境或条件下，还可以表示动作和行为发生的时间、因果、让步等意义以及其他语体色彩。”[23]维吾尔语动词条件式的-sa 形式，除了可以表假设、条件关系外，还能表对比、时间等关系[24]。

羌语的 sə 也能作比较标记,如“这些土豆一个比一个大”[25]

57） $jan^{31}jy^{55}$ $tsə^{31}$-k^he^{55} a^{31}-$tɕe^{55}$ die^{31}-$sə^{31}$ a^{31}-je^{55} ba^{31}-u

土豆 这-复数 一-个 离心-看 一-个 大-示证范畴

58） $jan^{31}jy^{55}$-$tsə^{31}k^he^{55}$ a^{31}-$tɕe^{55}$-$sə^{31}$ a^{31}-je^{55} ba^{31}-u

土豆-这些 一-个-比较标记 一-个 大-示证范畴

第一种表达，sə 仍有动词“看”的性质，可理解为“这些土豆一个看着（比）一个大”。第二种 sə 是一个比较标记。

汉语的“看”也有类似的表达。

---

[19] 清格尔泰（1988：233-234）。

[20] 观点和下面的例句皆出自清格尔泰（1988：163-164）。-sa 作为从比格的附加成分可以“表示行为的起点，离开的或经过的地点，句中充当状语”、表示行为开始发生的时间，事物性质的渐变关系，行为先涉及整体的一部分，比较的标准，原因或行为产生的缘由，行为的施事者等等。

[21] 王远新（1995：206）。孟达来（2001：133）。

[22] 孟达来（2001：134）。

[23] 见王远新（1995：207）。王新远说：“从我们汇集的古代突厥文碑铭文献语言中的所有条件式句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动词条件式除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条件之外，还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时间。”第 210 页。

[24] 方晓华（1986：4）。

[25] 例句出自李保锋（2017：159）。

1）表比较、估量。《北齐书·郑述祖传》卷 29：“（崔）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所听得意旨，记取，却来与吾说，看惠能见解与吾谁疾迟。”（CBETA 2021.Q4, T48, no. 2007, p. 337a4-6)两句中的“看”带有比较，估量的意味。“在这种关照（打量\判断）的过程中，认识主体往往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性。”[26]

2）表原因。华容湘语的视觉感知动词“看”能置于句首，连接两个因果关系的小句。“看他总是葛里催，我就来哒。”（因为他总是催我，我就来了）“（他里）看我老冒得时间，会就只好取消哒。”（[他们]因为我总是没有时间，会议就只好取消了）[27]

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条件式附加成分-sa\-se\-sə 与羌语的 sə 都能表因果、时间、对比，我们认为当属同一形式。汉语的“看”除能表条件外，还有估量和比较的意味，在华容湘语中已开始向因果小句标记演变。此外韩语的보 다 （看）也可虚化为助词，用于体词之后，表示“比较”[28]。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汉语的看类动词“看、瞅”后加抽象名词或小句，表前一动作是后一动作即将发生的条件时，虚化为介词“趁”义。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羌语的 sə（由动词看 sə 虚化而来的从属标记）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条件式附加成分-sa\-se 及其变体，属于同一形式，都可以表条件、原因和比较。对于突厥语族的条件式附加成分-sa\-se 及其变体形式，王远新认为是由“古代不带人称附加成分的初始形式”-sar\-sɛr 形式发展而来[29]。在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古突厥语的-sar\-sɛr 的源头或许也是一个视觉类动词。籍此抛砖引玉，希望有人能真正解决-sar\-sɛr 的来源问题。

---

[26] 郑慧仁（2012：9）。郑慧仁认为根据语义来源的不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比较标记可分为“看”型、“起点”型、“终点”型、“经过”型、“方位”型。

[27] 华容湘语的分析和例句来自高再兰（2012：5）

[28] 马淑红（2012：17）。

[29] 王远新（1995：209）。古突厥语条件式-sar\-sɛr 到现代突厥语-sa\-se 的演化，参见王远新《从现代哈萨克语看突厥语动词条件式的发展过程》新疆大学学报，1982（4）。对于动词条件式-sar\-sɛr 的来源，学者们的意见尚不一致。兰思铁认为来源于阿尔泰语动词*se-（认为、想、希望、说、做）+r（形动词附加成分）。见《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第 226 页。

附记：感恩汪维辉老师的指点，文章谬误之处一概由本人负责。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从《说文解字》义界训释因子看词义演变规律研究”ZD202216。

参考文献

烟台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4《烟台市志》（下）科学普及出版社

黄征 张泳泉 1997《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

刘照雄 1981《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林绍德 1986《诗词曲词语杂释》四川人民出版社

清格尔泰 1988《土族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远新 1995《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孟达来 2001《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晓华 1986《维吾尔语动词的形态分类问题》《语言与翻译》第 4 期

高再兰 2012《“看”“听”从感官动词到小句标记语法化类型学研究》《语言科学》第 5 期

马淑红 2012《关于韩语“보다”和汉语“看”的比较分析》《科技创新导报》第 17 期

马菁屿 2022《论“闻”之“趁”义的来源》《语言研究》第 4 期

王保锋 2017《萝卜寨羌语语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邢向东 2024《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兰银官话表“看”义的“瞄”[ᶜmiau] / [ᶜmau]》《方言》第 2 期

郑慧仁 2012《东北亚语言比较标记的类型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蜘蛛”异名小考

——从现代方言“蛛”的特殊读音谈起

陈思捷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指出部分现代方言的“蛛”读入声是舒声促化的结果。随后探讨古代典籍中“蜘蛛”的各种异名及其理据，主张归为四系：（1）“蜘蛛”系，根据“反复用双脚踏地”的特点逆向重叠构词，包括罐罐、蟹蛛、罐蛛、蟹蚩、次蟗；（2）“罐蠢”系，理据不明，包括罐蝵、蠿蠢、蝑蝵；（3）“侏儒”系，根据“短小”的特点顺向重叠构词，包括蠾蝓、蝳蜍；（4）其他，包括社公（理据不明）、网工（根据“蜘蛛能结网”的特点命名）。

笔者在《汉语方言“蜘蛛”义词中“蜘”的读音与本字》一文里，举出了许多方言中“蜘”读入声的例子（有的写作“结、织、蛰、节”），并通过语音分析，认为这些特殊读音都源自“蜘”的舒声促化。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其中的“蛛”也有读促声的现象，本文打算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梳理古代典籍中“蜘蛛”的相关异名及其理据。

本文将会涉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舒声促化。所谓舒声促化，就是指一个舒声音节出于某些原因变为促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方言中均非鲜见。陈思捷（2024）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舒声促化：词汇促化、音系促化和形态促化。其中，词汇促化指单个词语中某（几）个舒声音节由舒转促的现象。其特点是成员内部不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往往是单个的、零散的，它们与具体的词语相结合，不可类推，本文要讨论的“蜘蛛”即属此类。词汇促化虽然是一种例外音变，但实有规律[1]可循，其中与本文的讨论关系最密切的一点是，促化字必须“并韵”，“并韵”有两种可能的方向，可称为“韵母归并律”（陈思捷 2024）：

①并入央化韵：主元音央化或增生央元音，并入含央元音的入声韵；

②并入邻近韵：并入最接近于原舒声韵母的入声韵。

此外，韵腹的[±圆唇]特征在促化后倾向于得到保持。

下文的分析会用到这条规律。

[1] 这些规律是对促化音变共有的倾向性（tendency）的概括，不能理解为严格的定律（law）或规则（rule）。

一、现代方言中“蛛”的促化

本文调查的方言材料基于岩田礼（2012）的研究，书中有关“蜘蛛”的记录共计1418 条，疑似是“蛛”读入声的数据有 5 条，不过这当中有的材料没有提供完整的音系和同音字汇，出于解释音变的需要，只能暂时筛去。这样共得到 2 个比较明确的例子，见下表：

表 1：“蛛”读促声的方言点及相关材料[2]

方言点	“知”的读音	“朱”的读音	{蜘蛛}
山西太谷	$ts\eta^{22}$	tsu^{22}	蛛蛛 $tsu?^{11}tsu^{22}$
浙江余姚	$ts\eta^{44}$	$ts\text{ɥ}^{44}$	菊织 $tɕyo?^{5}tsə?^{5}$

根据促化字韵母的圆唇性质倾向于保持不变的规律来判断，山西太谷话里“蜘蛛”义词的原始形式应当是合口的“蛛蛛”，前一个“蛛”促化，并入了邻近韵，过程比较显豁。

再看余姚话。在《汉语方言“蜘蛛”义词中“蜘”的读音与本字》一文中我们已论证，当地“蜘蛛”义词的原始形式是“蛛蜘”，所以[tɕyo?^{5}]应当是“蛛”的促化形式，这个过程可以视为并入邻近韵的佳例。余姚话共有[a?、ia?、ua?、o?、io?、uo?、yo?、ə?、iə?]9 个入声韵。[ɥ]源于[y]的高顶出位，是后者舌尖化的结果（张琨 1992，朱晓农 2004）。并且，如前所述，促化时往往会保留撮口性质，所以与[ɥ/y]最接近的入声韵应当是[-yo?]。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促化音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如果促化发生在“蛛”读[tɕy]的阶段，那么音变过程就是[tɕy]＞[tɕyo?]；如果促化发生在读[tsɥ]的阶段，那么理论上应当先变为[tsyo?]，可是余姚话的尖音已并入团音，所以声母逢细音时进一步发生腭化，整个过程就应当是[tsɥ]＞[tsyo?]＞[tɕyo?]。

在我们划定的材料范围之外还见到两个例子。江苏高淳的“蜘蛛”义词是“喜菊菊[ɕi^{55}tɕyə?^{5}tɕyə?^{2}]”（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370），尽管这份材料没有关于“朱”或其他同音字的记录，但根据其合口特征，我们推测它与余姚类似，[tɕyə?]应当源于“蛛”的促化。其原始词形是“蟢蛛蛛”，“蛛”在促化时韵母并入了央化韵。另一处是江苏太仓，今称“觉=蛛[tɕio?^{3}tsη^{44}]”，前一音节应该也是“蛛”的促声[3]，介音读非圆唇的[i-]是音系变迁的结果，因为当地许多古合口字如“觉、橘、局、决、血、

[2] “知、蜘”在《广韵》里同属一个小韵，可以把“知”的读音当作是“蜘”未发生音变前的读音。根据《广韵》的反切，“蛛”属知母，“朱”属章母，两者声母有别。不过此处涉及的方言里知三与章母一般不存在对立，所以不影响论证；而与“蛛”同个小韵的其他字（如“株、诛”）又未必在各份材料中都有收录，不便比较。综合考虑，本文用“朱”来表示“蛛”促化前的读音。

[3] 后一音节的本字似非“蛛”，因为当地虞韵字基本读合口，个别字虽有例外，但也不读[ɿ]。后字与“知”同音，我们认为其原始词形更可能是“蛛蜘”。

缺”等皆读[io?]韵。(《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a，b，c）清光绪《太仓直隶州志》卷六有载：“鼅鼄曰蛄蛛。蛄读如决。”说明至晚于光绪年间，太仓话的“蛛”已有促读。

郑张尚芳（2012）还提到了南昌蒋巷方言的一例，他说：“‘蛛’很古就有一个南方的促声形式‘蝈’，‘蜘蛛’古又称‘蝈蝀’，《尔雅》《方言》郭注皆云：‘今江东呼蝈蝀（音掇）。’‘蝈’读合口，是‘蛛’而非‘蜘’的促声。今南昌县蒋巷蜘蛛称 tɕyɛʔ˧˩tɕy˧˩tsɿ，就有可能不是‘蜘˧˩蛛子’，或是‘蛛˧˩（蝈）蛛子’了。”我们赞同他对南昌蒋巷话的分析，至于其中提到的“蝈蝀”，下面将结合“蜘蛛”的其他别名一起讨论。

二、古代典籍中“蜘蛛”的异名

本节以《尔雅》《方言》《说文》《广雅》等重要训诂著作及其后代注疏为中心，梳理“蜘蛛”的种种异称。

2.1 鼅鼄（蟹蛛、鼈蛛、蜇蚱）、鼄蟊（鼄蝀）、蠿蟊、蝈蝀

上文提到，郑张尚芳（2012）认为“蝈”是“蛛”在古时候的一个促读，类似意见清儒实已提出。

《尔雅·释虫》：“次蚩，鼅鼄。鼅鼄，鼄蟊。土鼅鼄。草鼅鼄。”郝懿行《义疏》云：

> 然则蟹蛛、次蠢[4]、蠿蟊、鼄蟊，并声转声近字也。

《方言》第十一收集了“蜘蛛”的诸多异名，节引如下：

> 鼅鼄，知株二音。鼄蝀也。音无。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鼄蝀。今江东呼蝈蝀，音掇。……

关于郭璞注中的“蝈蝀”，钱绎撰集的《笺疏》有一段意见：

> 《玉篇》：“蝈，蜇蚱也。”陶弘景《名医别录》云：“蜘蛛，亦名蚰蠷。”按：“蚰蠷”，即“蝈蝀”之转声也。

《广雅·释虫》：“蛛蝀、网工、蠾蜮，蜴蜍也。”王念孙《疏证》云：

> 《说文》“蝈”作“蠿”，云：“蠿蚩，作网蛛蟊也。”蛛与蝈，声之转耳。

可见，他们三位已将“蚩、蛛、蠿、蝈、蚰”等字系联起来，惜皆谓“声转（转声）”，语焉未详，段玉裁做了更明确的阐发。《说文·黾部》：“鼅鼄，〔鼄〕[5]蟊也。”段注云：

---

[4] 今本《尔雅》作“蚩”，郝氏改作“蠢”，关于这一点，详见下文 2.2 节的讨论。

[5] 根据段玉裁的意见，此处脱一“鼄”字。结合《尔雅》《方言》的异文来看，此说可信。

各本夺鼄字，今补。鼄蟊，叠韵。《蚰部》曰："蠿蟊，作网鼄蟊也。"此曰"鼄鼄，鼄蟊也"，以见一物三名，如"蜘"下、"鼄"下、"鼆"下皆曰"詹诸也"之例。《方言》："鼄鼄，鼄蝥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鼄蝥，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鼄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蝳蜍。"按"蠿蟊"即《尔雅》之"次蠭"。蠭音浮，断非从出也。鼄鼄同，《尔雅》"鼄蟊"即《尔雅》[6]之"鼄蝥"，郭曰："今江东呼蝂蝥。蝂[7]音掇。"晋时江东呼蝂蝥，蝂即鼄促言之耳。蝂或作蚾，本艸亦作蚾。

此段考证内容丰赡，就我们的议题来说，段氏指出了"蜘蛛"这个概念在当时有"鼆鼄""鼄蟊"和"蠿蟊"三种对应的说法（"一物三名"），分别在不同的方言中使用。而且他根据《尔雅》郭璞注明确提出，在两晋的南方地区，"蛛"有一个促化形式"蝂"（"鼄促言之耳"），也可写作"蚾"。我们赞同这一看法。

本节要点可总结如下：（1）"鼆鼄、蟹蛛、鼆蛛、蟹蚩"，后来一般写作"蜘蛛"，它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8]同样，"鼄蟊"和"鼄蝥"也是一词异形的关系。（2）根据《说文》，"蜘蛛"在当时至少有"鼆鼄、鼄蟊、蠿蟊"三种叫法。到了晋代的南方地区，"鼄蟊"又可称"蝂蝥"，"蝂"是"蛛"字促读的形式。

2.2 次蚩

如上所引，今本《尔雅》作"次蚩，鼆鼄"，段注却说"按'蠿蟊'即《尔雅》之'次蠭'"。"蚩、蠭"两字不同，实系段氏有意改之。[9]

《说文·蚰部》："蠿蟊，作网鼄蟊也。"段注云：

《（尔雅·）释虫》曰："次蠭，鼆鼄。鼆鼄，鼄蝥。"按"次蠭"即许之"蠿蟊"，"鼄蝥"即许之"鼄蟊"也。次，古音同漆，故与蠿音近。蠭，缚牟切，故与蟊音近。《尔雅》字讹"蚩"，而《释文》云"或作蝥"，郭音秋，盖误甚矣。或曰："蚩从出声，即郭注之蝂字，《集韵》之蚾字。《尔雅》之次蚩，即许之蠿字。"是说近之，然陆氏《音义》未能言之也。作网鼄蟊，谓即今能作罔之蛛蝥也。

段氏的看法似有可商之处。先看"次"字，滕胜霖（2023）指出，古文字中"鼆（蜘）"有"蛩"、"胥"、"螯"、"鼇"等写法，《尔雅》写作"次"应是取声符

---

[6] 按，寻绎文意，此处"《尔雅》"似当作"《方言》"。

[7] 按，今本《尔雅》郭注无此字。

[8] 字形从"黾"或从"虫"，是人们在认知上对"蜘蛛"的识别结果不同。从"黾"是以蜘蛛"大腹"的特征为依据，把"蜘蛛"与腹大的"黾"（蛙类）归为一个范畴；而从"虫"是基于概念层级的考量，"蜘蛛"是"虫"的下位概念。（薛永刚 2022）

[9] 黄侃《尔雅音训》也认为这个字是"蚍蠭（蜉）"的"蠭"，而且说："次蠭音近，鼆鼄音近，次蠭与蜘蛆音近，犹言趦趄也。又与蟋蟀、蜘蝑、蠨蛸音近。"我们认为这样广泛的系联，缺乏严密的论证。它们的音"近"到什么程度、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都没有说清楚。

的简写，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再看后字，按照段说，“蟗”乃“蠢”字之讹。“蠢”即“蜎”字，《广韵》缚谋切，属上古之部；“蟊”在上古幽部。声纽虽同为唇音，但一为並母，一为明母。总的来看，两字的声和韵均有些许隔阂。更为关键的是，按照这种思路，其原始词形当为“蜘蟊”，可是古籍中只见“蛛蟊”而无“蜘蟊”之类的形式。换句话说，处于后字位置的“蟊”只与“蛛”（或其变体）结合而不与“蜘”（或其变体）结合。据此则段说恐难成立。

窃谓段注中“或曰”之说近真（前引郝懿行语即持此论），此说认为“蟗、蛩、蛐、蠷”其实同出一源。我们进一步主张，这几个字记录的其实就是“蛛”的促化读音。“蟗、蛩、蛐、蠷[10]”的声符“出、叕、辍（绝）”韵部接近，“叕、绝”同属月部，“出”归物部，韵尾相同，韵腹微别，这非常符合促化音变的特点：第一，从现代方言的情况来看，在有-p、-t、-k 韵尾的语音系统里，促化字以收-t 尾为主（郑张尚芳 2012，太田斋 2016，陈思捷 2024）。可以看到，无论是月部还是物部，都与这条规律相符[11]。第二，韵腹略有差异可能是因为促读在不同方言中选择了不同的归并方向，一些并入央化韵，另一些并入邻近韵，这造成了具体音值的参差，进而在文字上有所反映。正如现代方言中促读的“蜘”也有诸多异写[12]，其实都不过是记音字而已，未得其朔。当然，段注提到的“《释文》云‘或作蝃’”、“郭音秋”等说法的确很可疑（《广韵》亦七由切），未详其据，有待来哲。

综上，我们认为段玉裁将“蟗”改作“蠷”失之武断。至于“次蟗”的原始词形，其实就是“蜘蛛”，后字“蟗”是促化的结果（语言层面），前字“次”则只不过是“蜘”的异写（文字层面）。“鼅鼄”是常用的共名，“次蟗”是“鼅鼄”的语音变体（别名），《尔雅》说“次蟗，鼅鼄”，以共名释别名，也非常符合此书一般的训释格式（张永言 2015：75）。这样来理解“次蟗”及其与“鼅鼄”的关系应当是比较顺恰的。

---

[10] 《说文・虫部》：“蠷蟊，作网鼄蟊也。”按此，“蠷蟊”似特指结网的蜘蛛，是下位概念。不过我们倾向于认为“蠷”起初只是“蛛”字促化的记音字。在汉语中，人们受到“一音一义”心理的影响，总是倾向于给无意义的音节赋予一个和整体词义看起来相关的理据，使其能在意义上有所落实，由此造成的“通俗词源”现象屡见不鲜。可以推想，“蛛”在促化后形成了一个理据不明的音节，人们想用一个字来记录它，理想的情况是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能与“蜘蛛”有所关联。这时人们发现它的读音和“绝”有些接近（实际情况很可能存在微别），“辍（绝）”与“丝”有关（《说文・系部》：“绝，断丝也。……辍，古文绝，象不连体，绝二丝。”），这与蜘蛛能吐丝结网的特点恰有关联，于是便造了一个从虫、辍（绝）声的字来记录它。后人进一步根据字形，把“蠷蟊”解释为能结网的蜘蛛。其实，从意义上说，“绝”所表示的“断丝”跟蜘蛛吐丝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人们把前字促读的“蜘蛛”写成“织蛛、蛰蛛、节蛛、折蛛、蛭蛛、急蛛、蚰蛛”等，背后的心理和过程都是类似的。（详参陈思捷 2024）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看法，还可以再讨论。

[11] 郑张尚芳（1990）主张上古入声韵尾是浊音（*-b，*-d，*-g）。这个问题关乎语音实质，可以讨论，不过同发音部位的清浊之别不会磨灭舌尖音与双唇音、舌根音之间的显著差异，因此不影响此处的分析。

[12] 详参笔者《汉语方言“蜘蛛”义词中“蜘”的读音与本字》一文中的举例与分析。

2.3 蠾蝓、蝳蜍、社公、网工

除了 2.1 节已经引述的部分外，《方言》卷十一还提到了“蜘蛛”的其他称呼：

> 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罐蠪，或谓之蠾蝓。烛臾二音。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蝳蜍。齐人又呼社公，亦言周工。音毒余。

结合郭璞注，可知“蜘蛛”还有“蠾蝓、蝳蜍、社公、周工”的叫法。

“蠾蝓”和“蝳蜍”大概与侏儒有关。《方言》已经指出“蠾蝓”是“侏儒”之语转，钱绎《笺疏》说“蝳蜍、蠾蝓”乃一声之转，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里也说两者“声亦相近耳”。根据这些意见，“侏儒、蠾蝓、蝳蜍”三者可以系联起来。

“社公”又作“松公”，宋本《玉篇·蚰部》：“蟊，亡侯切。蠹蟊也，螣也。燕曰蝳蜍，齐曰松公也。或作蚣。”“社、松”可能至少有一字存在讹误，语源待考。

“周工”为“网工”之误。《广雅疏证》已指出本当为“罔”字，“罔”与“冈”同。各本“冈”讹作“冈”，后来大概进一步讹作“周”了。“罔”即“网”之异体，“网工”这个叫法显然是根据蜘蛛能结网的特点来命名的，与“蜘蛛”“罐蟊”这类词的造词理据有所不同。

三、古代典籍中“蜘蛛”各异名的理据

本节尝试探讨蜘蛛各异名的理据问题。由于前人研究有时把“蜘蛛”的多种不同称呼合在一起讨论，难以拆分，因此下文不依词形分述，直接介绍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社公、网工”的得名之由与其他几类明显不同，已见前述，本节不赘。

3.1 因形体短小得名

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蜘蛛以体短而得名，持此论者包括钱绎、刘师培等，现代学者刘又辛（1984）、李海霞（2005：629-630）亦从此说。其中论述较详的是刘师培，下面以他的看法作为代表。刘氏《〈尔雅〉虫名今释》说：

> 案，《方言》《广雅》均训“蜘”为短，《玉篇》云：“吴人呼短物曰蜘。”蜘，或作“掇”，如《庄子》“掇而不技”，郭注训短是也。又或作“叕”，《淮南子》“愚人之思叕”，高注训短是也。故“窭”为短面，见于《说文》；“惙”为短气貌，见于《声类》；“颟”为头短，见于《广韵》。“蜘”又转音为“侏儒”，侏儒为短人，转音则为“侥僚”，《山海经》所载是也。而梁上短柱，《释名》谓之“椳儒”，《礼记》郑注称为“侏儒”。柱，《尔雅·释宫》作“椳”字，或作“捥”，见《释文》，此均“蜘”字之转音也。蜘蛛亦然，盖本名为“蝂”，转为“蝂蠪”，又转音为“罐蠪、次蠪、罐罐”，异文则为“蠪蠪”，“蠾蛱、蝳蝓”则为异名，均即侏儒之义也。盖蜘蛛形短，故命名与短柱同。

由“叕”得声的字多有“短”义所言非虚，然作者认为“蜘蛛”初名为“蝂”且

因短得名，此说颇可怀疑。第一，“蝍”这一形式直到两晋郭璞的注解中才见诸文献，与“蜘蛛”相比，显然出现较晚，而且只是一个方言变体，从时间上说，“蜘蛛”一类的形式才更应当是“源”，“蝍”更有可能是“流”。既然“源”不是“蝍”，那么得名之由也与此无关，除非认为“蝍”是一个纯粹创新的形式，与“蜘蛛”等形式没有语源上的联系（那么这样只能解释“蝍”的得名之由，而与“蜘蛛”的理据无关）。第二，“蝍”还可以写作“蟗、蛆、蠼”（见 2.2 节），从“出”“翟”得声的字并没有短义，可见此说只要出现异写便难以维继，除非找到足够的依据证明“蝍”是记录语源义的本字。如果按照我们的看法，认为“蝍、蛆、蟗、蠼”都不过是记录“蛛”之促读的记音字，以上困难便不成问题。

3.2 因行动缓慢得名

钱绎撰集的《方言笺疏》卷十一指出：

> “罷罷”之言踟跦也。成公绥《啸赋》云：“逍遥携手，踟跦步趾。”亦作“踟蹰”。《邶风·静女》篇：“搔首踟蹰。”《文选·鹦鹉赋》李善注引薛君《章句》云：“踟蹰，踯躅也。”《三年问》云“蹢躅焉，踟蹰焉”，《释文》作“踶蹰”。《易是类谋》云“物瑞踶躅”，郑注云：“踶躅，犹踟蹰也。”并与“踟跦”同。是“罷罷”以其行动之象名之也。

这段引文认为“罷罷（蜘蛛）”与“踟跦、踟蹰、踯躅、蹢躅、踶蹰、踶躅”有同源关系。“踟蹰”是缓行貌，所以具体而言，此说主张“蜘蛛”因其行动缓慢而得名。

我们认为“踟跦、踟蹰、踯躅、蹢躅、踶蹰、踶躅”等词确实可以看成是同源词，而且与行动缓慢有关，因为它们大都有着实际的用例。从谐声偏旁看，“罷罷（蜘蛛）”与这组词在语音上也确实很接近，但是它们之间相通的意义是不是“缓行”还有疑问，至少文献中没有明显的反映，而且“缓行”似乎也并不是蜘蛛的显著特征。这个问题下文 3.6 节还会再做探讨。

3.3 因体圆得名

李海霞（2005：629-630）认为：“蛛：犹珠，腹短圆如珠。◆蛛、珠上古同声符。”因为她将“蜘蛛”拆开来解释，所以又得解释“蜘”：“蜘：犹枝，指其 8 条长肢。◆蜘、枝、肢上古音端章准双声，支部叠韵。蜘的初级声符是矢，矢亦细长物。”在分析“蠾蝓”时，又说：“蠾：犹蠋、髑、镯，圆物。蜘蛛腹圆。◆蠾、蠋、髑、镯，上古均以蜀为声符。头骨叫髑，圆柱形的猪儿虫叫蠋。……”“蝓：犹窬、逾、腧、褕，圆或短，蜘蛛体圆短。◆蝓、窬、逾、腧、褕，上古同声符。……”

一般认为“蜘蛛”“蠾蝓”是联绵词，将它割裂开来，认为两字各有其义，缺乏坚实的证据。而且联绵词的变体特多，其中的许多未必是本字，这样去探求语源不够科学。

3.4 因“务”得名

这是就“鼅螫”之“螫”而言的。钱绎《方言笺疏》云：

> 《贾子》“礼”篇云：“蛛螫作罟。”“螫”之言“务”也。《太玄·务·次五》曰：“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綸。测曰：踟跦[13]之务，无益人也。”

晋范望《太玄解赞》曰：“蜘蛛有丝，虽其勉务，非人所用，则不如蚕一綸之利也。”又明叶子奇《太玄本旨》曰：“五在君位，资性阴暗，而不知所以为君之道，如蜘蛛之为事，虽勤无补，不如蚕之一綸，虽微有益。”可见《太玄》中的“务”指的就是“事务、事情”，说“螫”的语源与“务”有关，似乎窒碍难通。

“鼅螫”的得名之由还不清楚。李海霞（2005：629）说：“螫：犹矛、蟊、蜂，伤害之名。蜘蛛会用其螯肢刺人夹人，有的螯内含毒汁。◆矛、矛、蟊、蜂，上古均在明母幽部。矛，尖刃兵器。蟊，食根的害虫。二词《诗经》里已有。蜂，螳螂，猛虫。……”“螫”与“蜘蛛刺人”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不好说，但“螫（蟊）”作“害虫”讲确实很早就见诸文献。《诗·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毛传云：“食根曰蟊，食节曰贼。”考虑到“螫（蟊）”是一种昆虫，“鼅螫”或许可以分析为像“杨树”“松树”那样的种属并列复合词（董秀芳 2023），但“螫（蟊）”能否作为一个属概念还有疑问，目前缺乏旁证。另一种可能是，“鼅螫”的“螫”和“蟊贼”的“蟊”不具有词的同一性，这样的话，“鼅螫”的理据仍然是个谜团。

3.5 因“知诛”得名

这是王安石《字说》中的看法。此书已佚，不过其中的“蜘蛛”一条有幸保存在后人的引述中：

> 【蜘蛛】《字说》曰：“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诛义者也。”（《埤雅》卷十一）

> 【蜘蛛】《字说》曰：“设一面之网，虫至而获焉，知诛义者也。”（《尔雅翼》卷二五）

> 【蜘蛛】王安石《字说》云：“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乎诛义者，故曰蜘蛛。”（《本草纲目》卷四十）

这几条引文在文字上有一些出入，其中的“知诛义者也”“知乎诛义者”不容易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认为“蜘蛛”的得名之由是“知诛”，“知”是知道，“诛”指的是蜘蛛结网捕杀虫子。但是什么叫“知道诛杀”？“义者”又指什么？颇不可解。这大概又是此书穿凿附会之一例，殊难信从。

---

[13] 《太玄》本作“蜘蛛”。

3.6 重叠式构词法

不同于上述探讨，孙景涛（2021）从词法（morphology）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古汉语中的重叠现象，对许多联绵词的构词理据提出了新看法，富有启发性。

重叠是一种词法手段。在重叠过程中，一个形式得到重复，从而产生出一个新的意义。重叠前的形式叫作基式（base），重叠部分（redupliant）则是重叠过程中新产生的语音形式，基式加上重叠部分就得到重叠式。根据孙景涛（2021）的看法，古汉语中的许多联绵词都是重叠式。他通过全面的调查，把古汉语中的重叠归纳为四种类型：顺向重叠、裂变重叠、逆向重叠和完全重叠，每种类型都有各自的形式特点和表达功能，可归纳为下表：

表 2：古汉语重叠系统（孙景涛 2021：171）

重叠类型	形式特点	表达功能：例子
顺向重叠	基式在前，重叠部分在后，两个音节韵母相同，第二音节的声母总是流音。	1）指小/爱称：螳螂、蜉蝣 2）绘景摹态：逍遥、委蛇
裂变重叠	基式声母保留在第一音节，后随韵母与基式韵母相应；基式韵母保留在第二音节，第二音节的声母总是流音。	不够典型的意义（非典义）：髑髅、胡蝶
逆向重叠	基式在后，重叠部分在前，两个音节声母相同，但韵母呈现出[-圆唇]/[+圆唇]或其他类型的无标记/有标记的对立。	重复：辗转、踟蹰
完全重叠	基式音节自我复制，变成两个相同的音节。	生动的形象：旦旦、关关

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可以讨论，但这个分类体系总体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先看逆向重叠。逆向重叠在形式上的特点主要是韵母呈现[-圆唇]/[+圆唇]特征[14]的配列。其中的大部分基式是动词，有的动词重叠后仍为动词，主要表示重复义。如“踟蹰（*dràj dràɥ）”[15]，基式是“蹰（躇）”，重叠后表示反复用双脚踏地，因此有了走来走去、徘徊不前的意思；又如“霢霂（*mrákʲ mákᶣ）”，基式是“沐”，重叠后表示反复“淋（雨）”，因此有了连绵不断的细雨之义。另一些动词重叠后可以转指与动作相关的事物，例如“蛣崛（*kʰàkʲ kʰwət）”，基式是“屈”（蝎子的弯尾巴是突出特征），

[14] 众所周知，上古音的构拟各家差异很大。不过若从大类着眼，这些体系之间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共识的，比如下面讨论到的“踟蹰”“霢霂”“蛣崛”“蜘蛛”等词，无论哪家拟音都具有[-圆唇]/[+圆唇]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孙景涛（2021：25-32）已作了很好的说明。

[15] 依原文，采用蒲立本的拟音系统。

动词“屈”逆向重叠后转指蝎子这种动物。有大量的昆虫、小动物、小植物或其他小物件都通过这种手段造词，按照书中的分析，“鼁鼁（蜘蛛，*tràj tràq）”也是如此。（孙景涛 2021：40-41，52-56）考虑到“鼁鼁”与“踟躇”的语音联系，我们推测“鼁鼁”也是因其动作得名的，不过不是由于行动缓慢（见 3.2 节），而是因为它在爬行时，八条腿前后配合，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视觉效果，古人正是利用“行动重复”这一特点来重叠构词，为之赋名。

那么“侏儒、蠾蝓、蝳蜍”和“鼁鼁”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许多观点认为“鼁鼁”和“侏儒”等词同源，得名之由是形体短小。然而，根据孙景涛（2021）的分析，“侏儒（*tàq nàq）”的两字韵母都有[+圆唇]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叠韵。比较其他例子可知，“侏儒”应当归入顺向重叠，与“鼁鼁”这类逆向重叠存在类型上的差别。“蠾蝓、蝳蜍”同“侏儒”，而不同于“鼁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倾向于不把“鼁鼁”和“蠾蝓、蝳蜍”系联为一组同源词。

要之，本小节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三点：（1）“鼁鼁、踟躇”和“侏儒、蠾蝓、蝳蜍”都是重叠构词的产物，不过前一组属于逆向重叠，后一组属于顺向重叠；（2）古人根据“反复用双脚踏地”这一特征进行重叠构词，形成动词为“踟躇”，转指名词则成“鼁鼁”；（3）“蠾蝓、蝳蜍”与“侏儒”同源，可能得名于形体短小。

四、结语

本文是从现代方言中“蛛”的促化读音出发，考释古汉语中“蜘蛛”的种种异名的。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却不认为现代方言中“蛛”的促读与两晋江东地区的“蝛”存在源流关系。有一条疑似的材料，清光绪《泰兴县志》卷三云：“鼁鼁曰蝛蚤。”似乎显示出江苏泰兴话继承了古江东方言“蝛蚤”一词。对此我们颇感怀疑，因为根据岩田礼（2012）的全面调查，并未见到任何一种方言有类似的形式，泰兴话是个孤例。而且，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说明：“邑当吴楚之交，偏方谣谚不尽与古合，纪其有所本者，而俚俗不典之语，概无取焉。”因此我们推测这条记载恐有附会之嫌。总的来看，方言中促读的“蛛”不是特别多见（见第一节），而且在词形上与文献中的“蝛蚤”“次蚩”也并不相合，说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尚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无论如何，现代方言存在促读的情况对于梳理“蜘蛛”在古汉语中的各种异名很有启发，因为词汇促化大多是语音弱化的表现，弱化作为一种顺乎自然的音变，完全可以在古今汉语中独立发生。（陈思捷 2024）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把“蜘蛛”的异称分为四系：

（1）“蜘蛛”系：根据“反复用双脚踏地”的特点逆向重叠构词

[一词异写]鼁鼁、蟹蛛、鼁蛛、蟹蚩

[语音变体]次蚩

（2）“鼁蠢”系：理据不明

[一词异写]鼇蝫

[语音变体]蠽蠭、蝝蝫

（3）“侏儒”系[16]：根据“短小”的特点顺向重叠构词

蠾蝓、蝳蜍

（4）其他：

社公（理据不明）

网工（根据“蜘蛛能结网”的特点命名）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汉至唐朝出土文献汉语用字研究”（21&ZD295）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蒙岩田礼先生惠赐《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中“蜘蛛”条目的原始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深情厚谊，谨志铭感！成文后又承汪维辉师审看，諟正多处。古汉语名物词的考释和语源的探索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笔者学浅词顽，幸达者教之。假若文中梳理出的材料能对后续研究起到些许参考价值，那么即便其中的微末浅见悉数被推翻，也足以令人快慰了。

参考文献

论著类：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a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语音系统卷》凤凰出版社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b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字音卷（老年）》凤凰出版社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c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词汇卷（上）》凤凰出版社

陈思捷 2024 《汉语舒声促化现象研究》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董秀芳 2023 名词双音化的几种形式选择及其特点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九辑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海霞 2005 《汉语动物命名考释》 巴蜀书社

刘又辛 1984 释簠簋 《语言研究》第 1 期

孙景涛 2021 《古汉语重叠构词法研究》（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太田斋 2016 “舒声促变”及其痕迹 《神户外大论丛》第 66 卷第 1 号

滕胜霖 2023 说楚简里的“黿”与“鼇” 《汉字汉语研究》第 1 期

[16] 注意，“侏儒”本身不能指“蜘蛛”，这样称呼是为了凸显其理据。另外，“蠾蝓”和“蝳蜍”的关系尚不明朗。

薛永刚 2022 汉字义符异构的认知心理学分析——以《说文》“黾鼃－蜘蛛”为例 《语言学论丛》第六十五辑
岩田礼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 好文出版
张 琨 1992 汉语方言中的几种音韵现象 《中国语文》第 4 期
张永言 2015 《训诂学简论》（增订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 1990 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 《语言研究》第 1 期
郑张尚芳 2012 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中华书局
朱晓农 2004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 《中国语文》第 5 期

古籍类：

《尔雅义疏》，[清]郝懿行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尔雅音训》，黄侃著，黄焯辑，黄延祖重辑，中华书局，1991。
《方言笺疏》，[清]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中华书局，1991。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撰，张靖伟、樊波成、马涛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刘申叔先生遗书》（十二），刘师培撰，赵羡渔、郑裕孚校，排印本，1934。
《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著，中华书局，1991。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撰，中华书局，2013。
《太仓直隶州志》，清光绪稿本。
《太玄校释》，[汉]扬雄撰，郑万耕校释，中华书局，2014。
《泰兴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王安石全集》（第一册），[宋]王安石撰，张钰翰辑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华学诚汇证，王智群、谢荣娥、王彩琴协编，中华书局，2006。

辽宁方言声调类型

刘婧涵
南开大学

内容摘要：根据单字调和连字调格局中阴平调的不同表现，辽宁方言声调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四调方言有 A、B、C 三类，其中 A 类阴平单字调为降调，连字调为降调或平调；B 类存在特殊的“上声+阴平”变调；C 类阴平在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中均为平调，又根据阴平在声调格局中的位置分为 C1、C2 两类。非四调方言为 D 类，其中 D1 类阴平与去声合并，单字调三调；D2 类正在经历阴平与阳平去声调的“再合并”，单字调呈现三调或两调。辽宁方言声调的各个类型属于不同层次，在方言地图上的分布体现了移民、语言接触以及强势方言的影响。

一、引言

1.1 辽宁方言分区及调查情况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的划分，辽宁地区自西向东分布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其中东北官话分布最广。

本研究选取 27 个方言点，覆盖了辽宁区域内汉语方言的六个小片，以一手田野调查材料为主，无法实地调查的方言点采用已有的声调记录。二手材料除《中国语言资源集·辽宁》中的记录外，其他均选取采用语音实验方法记录声调信息的材料。调查点地理分布及方言系属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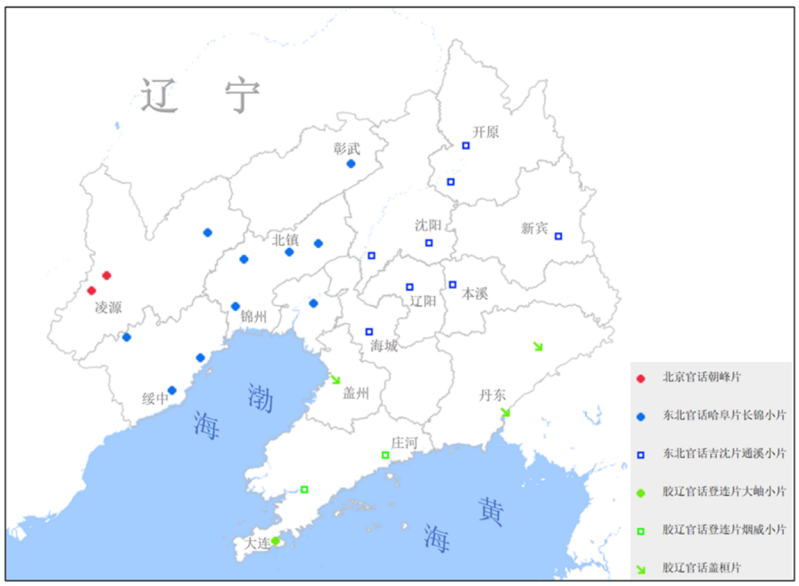


图 1：调查点方言系属[1]

其中凌源、北镇、黑山、建昌、彰武、辽中、沈阳、铁岭、铁岭县、本溪、新宾、大连、普兰店、庄河、丹东、宽甸 16 个方言点使用一手材料；建平、锦州、兴城、绥中、义县、北票、辽阳、海城、盖州 9 个方言点使用《中国语言资源集·辽宁》的记录；盘锦材料来自《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开原材料来自《开原方言双字调变调的实验研究》。

发音人尽量选取 40 岁以上，长期生活在本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调查内容包括阴平（清声母平声字）、阳平（全浊、次浊声母平声字）、上声（清、次浊声母上声字）、去声（去声字、全浊声母上声字）四个声调以及清入、次浊入、全浊入三个类别的情况，以上声调及类别两两组合后的两字组连读变调情况，以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做前字的轻声变调情况[2]。根据曾晓渝（2022）的研究，双音节词是最基本的韵律单位，是汉语连调域的核心，故两字组连读变调调查词项限定在“词”一级，尽量选取口语词、常用词。

[1] 本文语言地图使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语言地图软件绘制，底图基于北斗卫星 GPS 定位系统的高德地图（GS 京(2022)1061 号）。

[2] 辽宁方言单字调归派情况大部分与普通话一致：今存四声，清声母平声字归阴平，浊声母平声字归阳平，全浊上声归去声，入声派入四声，区别仅在于清入声字的归派，多归入上声。由于今入声不独立，已归入平上去三声，下文不单独展示入声的单字调及连字调情况。

1.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声调数据，结合语音实验将调值量化，运用声调模型理论[3]框架进行调位归纳，排除协同发音的影响，综合考虑单字调、连字调格局[4]对声调数据进行分析。

Bao（1990，1999）提出的声调模型理论框架，将声调分为调阶（register）和调形（contour）两个维度，调阶（r）和调形（c）是声调（t）统治下的姐妹节点，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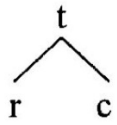


图 2：Bao（1990,1999）声调几何[5]

用 H、L 表示高调域和低调域，l/h、lh、hl 表示平、升、降三种调形，曲折调是派生的，仅存于音系表层，调阶和调形组合共生成以下八种底层声调形式：

表示法	调阶	调形	举例
[H, h]	高	高平	55
[H, l]	高	低平	33
[H, hl]	高	降	53
[H, lh]	高	升	35
[L, h]	低	高平	33
[L, l]	低	低平	11
[L, hl]	低	降	31
[L, lh]	低	升	13

音系中，声调通过音系规则由底层实现为表层，即连读变调规则，协同发音不涉及音系层面的变化，是声调表层形式的动态调整，属于语音规则，音系规则先于语音规则施用。本文统一将单字调形式设为声调的底层。

[3] BAO, Z. 1999.The structure of t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连字调格局”由曾晓渝提出，指相对稳定独特的连读变调结构系统，与单字调格局相对（曾晓渝. 2022. 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的几个基本问题思考. 南开语言学刊. (02):30-40）。

[5] 引自 BAO, Z. 1999.The structure of t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

二、辽宁方言声调特点及分类

综合各方言点调查情况，辽宁方言大部分为四调，东南部胶辽官话区有三调或两调方言的分布。四调方言中，阳平、上声、去声内部一致性较高，与普通话基本相同，阴平调在单字调及连读变调中的表现差异较大，另外部分方言点存在“上声+阴平”模式变调，这种模式下上声由凹调变为升调，类似连上变调。辽宁地区方言可依据声调在单字调、连字调中的表现分为四调型、非四调型两大类，同时依据阴平调的音系表现，再分为 A、B、C、D 四类，其中 A、B、C 类声调格局中阴平独立，但在单字调、连字调以及历史层次中调形表现不同，D 类声调格局中阴平不独立，与其他调类合并，具体分类及特点如表 1 所示：

表 1：辽宁方言声调特点及分类

<table>
<tr><th colspan="3">类型</th><th colspan="2">声调特点</th><th>方言点</th></tr>
<tr><td rowspan="4">四调</td><td colspan="2">A</td><td colspan="2">阴平在单字调格局中为降调，连字调格局中为降调或平调</td><td>开原、北镇、黑山、建昌、辽中、沈阳、铁岭、铁岭县、彰武</td></tr>
<tr><td colspan="2">B</td><td colspan="2">阴平在降调前存在凹调形式，“上声+阴平”连调式提示更早层次</td><td>盖州、海城、本溪、新宾</td></tr>
<tr><td rowspan="2">C</td><td>C1</td><td rowspan="2">阴平在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中均为平调</td><td>阴平在调域最高位置</td><td>锦州、绥中</td></tr>
<tr><td>C2</td><td>阴平不在调域最高位置</td><td>辽阳、兴城、义县、北票、凌源、建平、盘锦</td></tr>
<tr><td rowspan="2">非四调</td><td rowspan="2">D</td><td>D1</td><td colspan="2">有独立阳平调</td><td>大连、 丹东、宽甸</td></tr>
<tr><td>D2</td><td colspan="2">无独立阳平调</td><td>普兰店、庄河</td></tr>
</table>

由图 3 可见 C 类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东南部沿海为 D 类，中部 A、B 类交错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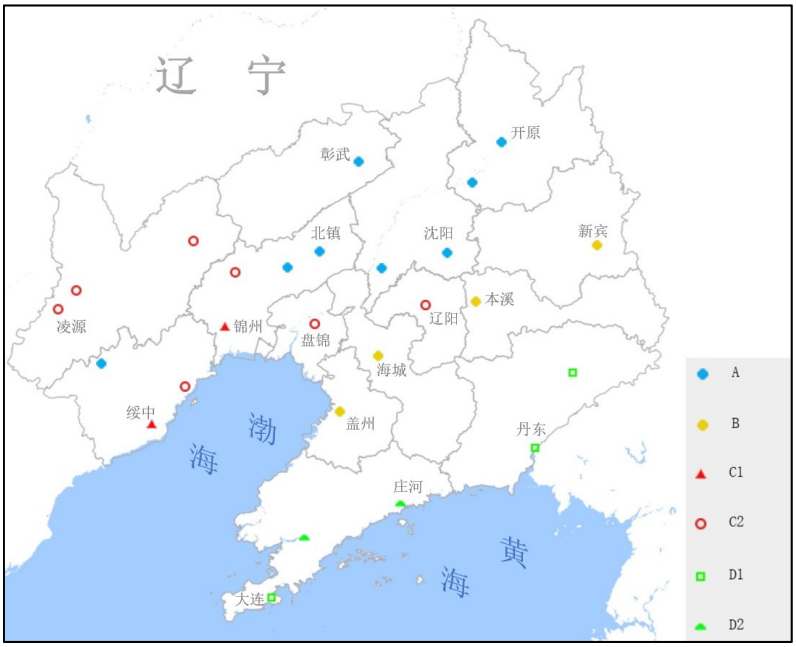


图 3：辽宁声调类型图

三、各类方言点声调具体表现情况

3.1 A 类——辽宁方言底层声调形式

A 类是东北官话中占比最高的声调类型，共有 9 个方言点，阴平在单字调格局中为降调，连字调格局中有降调、平调两种形式。

目前已有研究中在描述东北方言、辽宁方言声调时，基本都是“与普通话的区别仅在于调值偏低”“阴平是稍低的平调 33/44”，但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方言点阴平为降调而非平调，如表 2 所示。这种差异可能是语音演变的结果，也可能是记音差别的体现，本文倾向认为东北方言阴平在音系底层及早期形式就是降调形，过去研究中记为平调是因为耳听手记造成的不准确，对细微差别的感知不够清楚，或将阴平调尾的降势视作平调的自然衰减。

表 2[6]：A 类方言点阴平实验与传统听辨记音对比

方言点	实验结果	传统听辨	
		调值	材料来源
开原	32	44	那琳（2019）《开原方言语音研究》
北镇	32	44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黑山	31	44 44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韩天宇（2014）《黑山方言音系研究》
建昌	43	44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辽中	31	44 33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王琪（2016）《辽中县方言语音研究》
沈阳	43	33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铁岭	43	44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彰武	31	44	宋学（1963）《辽宁语音说略》

A 类方言点中单字调阴平的降调有缓降 43/32 和降 31 两种，连字调格局中还有平调的形式，平调的出现是普通话或西部北京官话区方言点影响的结果，而非阴平调的早期形式，单字调中缓降的形式是降调形受普通话影响向平调过渡的表现。关于阴平降调形是辽宁方言底层形式的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7]，本文简要概括结论。认为辽宁东北官话区阴平调早期为降调的理由如下：

第一，连调后字保留降调是东北官话的区域性特点。9 个方言点除铁岭外，在连字调格局中，阴平字或多或少存在降调的情况，单字调为缓降的方言点中连字调格局中也存在降调形式，后字中降调形的保留尤其完整。阴平在连调后字中有降调形式在东北官话区一致性非常高，是东北官话的共性特点和区域特征，虽然单字调中阴平有时表现为中平调或缓降调，但连调后字的降调特征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区域共性在整个官话区独具特色，且无法用“省力”来解释，因为临近的北京官话区，以及阴平单字调以平调为主的西南官话区，连调后字并没有因为“省力”而发生明显下倾。

6 表中实验结果通过本次田野调查录音得到，与传统听辨使用的方言材料存在时空差异。部分传统听辨材料年代与本次实验时间相近，有一定可比性；根据后文论述，平调相对降调是后起形式，20 世纪 60 年代传统听辨将阴平记为平调也应视为记音方式造成的误差。

7 见 LIU, J. H. 2023. The 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ast Mandarin in Liaoning. in TRỊNH, C. L., TRẦN, T. H. H., SUZUKI, H., & ENDO, M.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125-14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382130

第二，早期文献关于北京话的记录保留阴平降调形式。根据陈晓（2018）文章中的统计，北京话阴平的记录在 1900 年前存在高平与降调两种，大多数人习惯于高平，另有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高降，随着声调系统内部格局的调整，阴平逐渐统一为高平。Edkins 的记录中提到高平调是高降调的变体："But it becomes the upper even monotone, in combination with another word following."这与辽宁方言的阴平连读变调概况一致。文章还指出，远藤光晓、Bruce 等[8]的研究中老舍录音有一奇特现象：轻声前第一声常有变为第四声的倾向，如"先生、声音、干净"，是北京话阴平为高降调的历史痕迹，这也和辽宁话类似。这些记录中北京话阴平的降调形式，很可能是满人从东北带来的痕迹。"从龙入关"带到北京的满人，大多操东北官话，尤其是沈阳附近的方言，北京话中曾经存在的阴平降调形式是今 A 类方言点阴平古老形式为降调的证明。

降调是少数民族学习偏误的结果。东北地区历史上以少数民族统治为主，其对汉文化和汉语的学习始终十分重视。母语为无声调阿尔泰语言的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时一定程度会改变目标语的面貌，其中声调的学习是一大难点。由于接触密切，辽宁地区少数民族早期学习的是汉语北方官话，根据王力（1957）、杨耐思[9]、忌浮（1986）的构拟，《中原音韵》中阴平为中平调，张玉来（2017）构拟出明代官话的声调系统，阴平也是平调，清代北京话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阴平均表现为平调，说明辽宁地区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目标语的阴平调始终为平调。辽宁地区底层汉语方言阴平为降调，是学习权威方言平调的偏误，一方面降调较平调而言发音简单，另一方面即使音系中存在读为高降的去声，两个降调对立，母语为重音语言的少数民族也可以很好分辨这两个调类。此外，历史上山东人口大量迁往辽宁，也有山西移民的记载，带来的阴平降调形式与底层一致，强化了阴平降调的地位。

早期阴平降调的特征在辽宁地区的分布范围更广，近年来与标准语的接触使得阴平的底层特征仅表现在辽宁中部的 A 类方言点中，A 类方言点阴平正在经历"降调>缓降调>平调"的演变。

3.2 B 类——东北官话与胶辽官话深度接触产物

B 类方言点的特点是存在特殊的"上声+阴平"变调，可以描写为规则[L,l]→[H,lh]/__ [L,hl]。以本溪为例，单字调阴平 31，阳平 24，上声 212，去声 51，连读变调情况如表 3 所示：

[8] Edkins、远藤光晓、Bruce 等的材料转引自陈晓.2018.清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4):435-445+511。

[9] 转引自林端.1992.元代大都口语的调位系统.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79-86.

表 3：本溪方言连读变调情况

后字 前字	阴平 31	阳平 24	上声 212	去声 51	轻声
阴平 31	33+21 飞机	32+12 欢迎	33+212 端午	32+41 公路	51+0 公公
阳平 24	24+31 平安	24+23 农民	25+212 成语	23+52 肥皂	13+0 娃娃
上声 212	24+31 火车	21+13 火柴	35+21 水果	21+52 考试	211+0 祖宗 24+0 想想
去声 51	53+31 面包	52+12 杏仁	53+212 户口	53+52 运动	53+0 弟弟

前文对 A 类方言点的分析中，说明阴平的降调形式是古老调形，本溪方言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虽然连读变调中阴平有 33、32、31 三种调值，但 31 层次更老，而 B 类方言点特有的“上声+阴平”变调提示了在这些地区阴平存在比降调更早的其他形式。辽宁东南部方言受胶东半岛移民影响很大，“上声+阴平”变调同样广泛存在于山东方言中，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胶东半岛及周边方言点“上声+阴平”变调情况

方言点	阴平	上声	上声+阴平	是否变调
威海	53	312	34+53	是
烟台	31	214	35+31	是
牟平	51	213	35+51	是
龙口	313	214	55+313	是
寿光	213	55	55+213	否
济南	213	55	55+213	否

存在“上声+阴平”变调的方言点上声为凹调，阴平为降调或凹调。龙口的变调（313+214→55+313）最容易解释，两凹调相连前字变调，符合 OCP 原则，威海、烟台、牟平三点后字阴平无法再触发连凹变调，可以假设阴平发生了凹>降的变化，“上声+阴平”变调提示了阴平的更早形式，阴平变化后，类化变调的作用仍然存在，“上声+阴平”组合仍然变调，存在一定滞后性。

B 类方言点分布在辽宁东部，移民主要来自山东，“上声+阴平”变调是山东方言特点的保留。今天海城、本溪、新宾单字调、连字调中阴平都不存在凹调痕迹，但“上声+阴平”连调式提示阴平在降调前存在过凹调形式，而盖州方言单字调中阴平为 412

的凹调形式，说明其对古老调值的保留更加完整。

因此，B 类方言阴平存在（凹）>降>平的变化，连读变调中降调是原调保留，“上声+阴平”变调提示阴平更早的形式，二者处在不同层次。B 类方言点的声调的表现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既有山东方言的痕迹，总体上又与东北官话类似，是东北官话与胶辽官话在移民影响下深度接触的结果。

3.3 C 类——北京官话影响结果

C 类方言点阴平在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中都是平调形式，与普通话一致性最高。其中 C1 类阴平占据调域最高位置，调值表现为 55；C2 类阴平不占据调域最高位置，调值为 44，但都可以描写为[H,h]。

C 类方言点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北京官话与东北官话之间，其声调格局的形成发展受到二者的接触影响，声调格局在整体上与西部北京官话一致，呈现“平-升-凹-降”的形式。C2 类方言点阴平调值偏低的特点又体现出东北官话底层的影响，以兴城方言为例，单字调阴平 44，阳平 35，上声 213，去声 51，两字组连读变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兴城两字组连读变调情况

后字 前字	阴平 44	阳平 35	上声 213	去声 51	轻声
阴平 44	44+44 飞机	44+35 欢迎	44+213 端午	44+51 公路	44+0 公公
阳平 35	35+44 平安	35+35 农民	35+213 成语	35+51 肥皂	35+0 娃娃
上声 213	21+44 火车	21+35 火柴	35+213 水果	21+51 考试	21+0 祖宗 24+0 想想
去声 51	51+44 面包	51+35 杏仁	51+213 户口	51+51 运动	51+0 弟弟

3.4 D 类

3.4.1 D1 类——阴平、去声合并的三调方言区

D1 类方言点有大连、丹东、宽甸三处，其特点是三调方言[10]，阴平与去声合并，阳平为独立的升调，声调格局如图 4 所示：

[10] 宋学（1960）、董岩（2008）等学者的调查材料，大连市区、丹东市区是四调型，本文的调查材料与之存在时空差异，也说明阴平、去声的合并现象发生较晚，仍在进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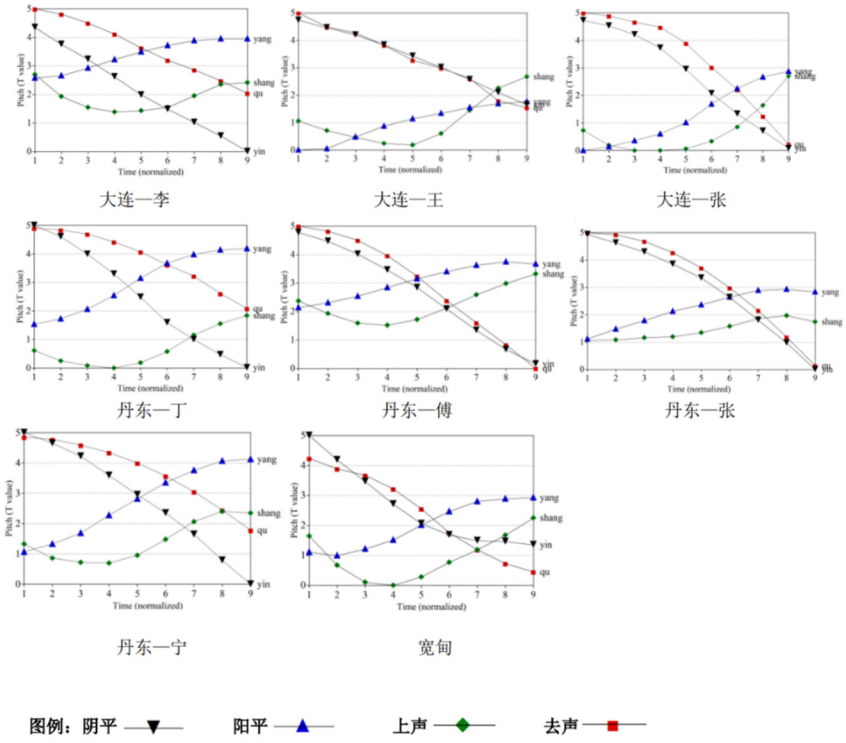


图 4：D1 类方言点声调格局图

阴平与去声在单字调中合并的过程以阴平调域升高为起点，D1 类方言 8 个发音人阴平全部为高降调。阴平、去声合并的程度不同，有的调值完全相同，如大连王、张两位发音人，有的阴平、去声起点相同，降幅不同，去声降幅小，如丹东丁姓发音人。去声降幅变小，可能如下节 D2 类方言一样，有去声变成平调的趋势，但实际交流中 51 和 53 区分度不高，连读变调中仅轻声前部分发音人去声变为平调，这里仍将其视为阴平与去声合并，单字调格局中有三个声调。根据宋学（1963）的记录，20 世纪 60 年代大连和丹东阴平单字调为 312，D1 类方言点在六十年间经历了调形改变，调域升高的变化，即 312>31>51（[L,hl]>[H,hl]）。由于这种音变发生的时间较短，在连读变调中阴平、去声并未完全合并，且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发音人的情况都不相同。

在与阳平、上声组合时，无论前字、后字，阴平和去声表现基本一致，连调式未完全中和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四种降降相连的组合中，即“阴平+阴平”“阴平+去声”“去声+去声”“去声+阴平”。丹东、大连两地情况类似，阴平前的降调，无论原调是阴平还是去声，均发生变调，变成平调或升调，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以平调居多；去声前的降调不变调。宽甸除前字变调外，去声在降调后也发生调形变化，变成低平

或低升。另外，轻声前阴平和去声的表现也不相同。阴平与去声未中和的连调式如表6所示：

表6：D1类方言点降降相连及轻声变调情况

方言点（发音人）	非轻声连读变调		轻声变调
	阴平+阴平	阴平+去声	阴平+轻声
	去声+阴平	去声+去声	去声+轻声
丹东（丁）	44+41 阴天 23+41 花生	51+31 公路	51+0 姑姑
	44+41 面包	52+41 运动	54+0 妹妹
丹东（傅）	55+52 阴天	53+42 公路	51+0 姑姑
	55+52 面包	53+42 运动	54+0 妹妹
丹东（宁）	55+51 阴天	53+42 公路	52+0 姑姑
	55+41 面包	53+53 运动	554+0 妹妹
丹东（张）	44+41 阴天	53+41 公路	51+0 姑姑
	554+41 面包	52+42 运动	553+0 妹妹
大连（李）	55+51 阴天	53+51 公路	51+0 姑姑
	44+41 卫生 45+41 面包	53+51 运动	43+0 妹妹
大连（王）	33+31 阴天	41+31 公路	53+0 姑姑
	33+41 面包	51+42 运动	55+0 妹妹
大连（张）	35+51 阴天	51+41 公路	51+0 姑姑
	35+51 面包	52+41 运动	53+0 妹妹
宽甸	34+52 阴天	51+22 公路	52+0 姑姑
	34+52 面包	52+31 运动 52+13 互动	554+0 妹妹

综合来看，D1类方言点单字调格局中阴平与去声合并完成，连字调格局仍可以观察到二者调类的对立，未完成合并，连字调格局的表现反映了更隐性、更早的单字调系统。丁邦新（1998:238、260）、潘悟云（1982）均阐释过“连调形式可能保存着早期单字调状况”，说明连字调格局变化滞后于单字调格局，但学者们所指的原调显现一般是连字组前字保留着原调值。D1类方言点连字调格局原调保留的方式与之不

同，非轻声连读变调中阴平与去声调值表现相同，变调情况也相同，但二者做连调后字时对前字的作用不同，降降相连时，阴平后字会促使前字变调，去声做后字时则不变调；轻声变调中通过不同调值反映阴平与去声的对立，如表 7 所示：

表 7：D1 类方言点阴平、去声在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中表现情况

		阴平	去声	备注
单字调		高降	高降	三调类
连字调	非轻声	高降调在阴平前变调 高降→[高平，高升]/___原阴平	高降调在去声前不变调 高降[不变调] /___原去声	四调类显现
	轻声	轻声前不变调 高降(原阴平)[不变调]/___轻声	轻声前变调 高降(原去声)→[高平]/___轻声	四调类显现

3.4.2 D2 类——三调方言调类“再合并”区域

D2 类方言点在胶辽官话区有庄河、普兰店两处，特点是阴平与去声合并，且没有独立的阳平调，单字调中呈现三调或两调的格局，是整个辽宁地区声调现象最复杂的区域。

D2 类方言的调类合并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阳平、去声合并，这种调类合并现象是由山东移民带来的，阳平、去声合并的现象在威海、烟台、栖霞、招远等地均有体现，是胶东半岛方言的共性特征，钱曾怡（2001:83）将其总结为“烟台型”三调方言；近年来阴平逐渐与去声合并，阳平字的归属出现了游移，在连读变调中的表现尤为明显，这是移民方言在辽南进一步发展的本土化结果，可以视为调类的“再合并”。D2 类方言调类“再合并”对单字调、连字调格局造成的影响在庄河、普兰店二地表现不同，总体看庄河调类“再合并”的进程快于普兰店，下面将具体说明。

前人对庄河单字调格局的描写见表 8：

表 8：庄河单字调格局

调查者	阴平	上声	阳平去	备注
宋学（1963）	312	213	53	
张世方（2000）	42	213	53	
董岩（2008）	312	213	53	

董琼瑜（2014）	312	213	42	
孙雯（2015）	312	213	42	
李昕升（2019）	51	213	442/341	实验测量，两类去声不影响听辨
张乐（2019）	51	213	442/341	实验测量
马希霖（2019）	51	213	42	传统听辨
	51	213	442/342	实验测量

可以看出，各家对于阴平的记录差别较大，一类为中凹调 312，一类为高降调 51/42，上声为低凹调，阳平去为高降调。庄河方言的平声在过去六十年间发生了 312>51/42 的变化。当阴平与阳平去同为降调时，张世方的记录中以音高区别，阴平略低于阳平去；其余记录以斜率区别，阴平降幅大，斜率大，阳平去降幅小，斜率小，调头起点也不同，阴平调头起点高于阳平去。

本次田野调查结果显示阴平为 51，上声为 314，阳平去为 443，阴平与阳平去依靠斜率进行区分，单字调格局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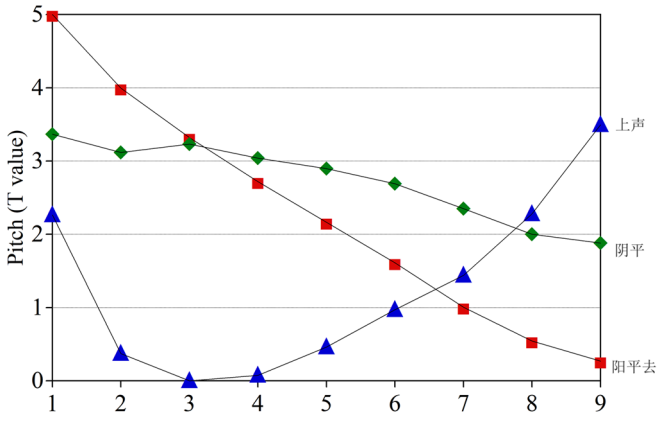


图 5：庄河方言单字调格局

连读变调情况如表 9 所示，在初步调查中发现，阳平字在庄河方言的连读变调中情况比较复杂，并不完全与去声一致，故将阳平字的组合纳入连读变调分析：

表 9：庄河两字组连读变调情况

后字 前字	阴平 51	阳平 42	上声 314	去声 42	轻声
阴平 51	24+41 飞机	24+41 青年 41+11 冰糖	52+213 端午	41+11/22 公路	51+0 公公
阳平 42	33+31 良心 24+41 牙膏	32+21 农民 41+22 银行	53+312 成语	41+33 肥皂	23+0 石头 42+0 瞧瞧
上声 314	24+41 火车	23+31 鲤鱼 31+24 嘴唇	24+312 水果	21+44 考试	11+0 祖宗 24+0 想想
去声 42	33+21 面包	33+31 杏仁 41+33 象棋	44+312 户口	41+33/22 现在 31+12 互动	443+0 弟弟

阴平与去声虽然都是降调，调值十分接近，但是在连读变调中的表现区别度很高。阴平调在连读变调中表现为升调或降调，而去声调无论前字变调还是后字变调，基本都变成了平调，轻声前也保留着这样的调形对立，说明连字调格局中降调调形由阴平承担。并且当阴平与去声相连时，发生变调的往往是去声，这也说明降调调形在阴平中表现更加稳固，阴平调相对去声来说处于优势地位。

涉及到阳平字的连读变调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单字调格局中阳平归去声，但连读变调中阳平有时与阴平表现一致，有时与去声表现一致，概率基本相当，并且在某些组合中产生了独立的连调形式。说明随着阴平调由凹调演变成降调，调值又与去声十分接近，阳平在归属问题上发生了游移，一部分字在连读变调中由归去声转为归阴平，在这个过程中又涉及到普通话的影响，所以阳平字在脱离去声而未入阴平的过程中表现出与双方都不一致的连调形式，独立的连调形式体现了阳平调转换归派过程中的中间态。

近六十年来庄河方言的单字调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中，并未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变动主要发生在阴平和阳平去中，表 10 展示了变化前后单字调格局的对比，20 世纪 60 年代的单字调以宋学（1963）的记录为准。

表 10：庄河方言变化前后单字调格局

20 世纪 60 年代			当今		
阴平	上声	阳平去	阴平	上声	阳平去
312 L,hl	213 L,l	53 H,hl	51 H,hl	314 L,l	443 L,hl

可以看出，六十年间阴平与阳平去的调阶发生了易位，由于在今天连读变调中的表现阴平字相对于阳平去处于强势地位，对降调调形的保存更加稳固，推断首先起变的是阴平，调阶升高，表层也由凹调转为降调，经历了 312>31>42>51（[L,hl]>[H,hl]）的变化。根据朱晓农（2012）的研究，312 可以算作后凹调，后凹调演变为低降调是自然而容易的。随着阴平调阶的升高，在推链作用下阳平去发生了降阶的变化，即 53>443（[H,hl]>[L,hl]），在今天的连读变调中阳平去大都变成平调，也可以说明阳平去在单字调格局的调整中处在被动起变的位置。

结合单字调和连读变调的表现，从演变进程上看，庄河方言调类再合并的过程经历了以下三步：

第一步，阴平单字调变化：表层看为后凹>低降>高降，即 312>31>42>51，从底层看为升阶，即 L>H。

第二步，单字调变化影响连读变调：连读变调中保留了阴平和去声的对立，即降调形主要由阴平承担，去声在两字组前、后字位置发生变调，以平调为主，阳平字出现了归派上的混乱。

第三步，连读变调影响单字调：推链作用下，阳平去调域降低，降幅变缓，暂时表现为低降调。考虑到连读变调中的表现，以及目前阳平去降幅变缓的事实，未来很可能阳平去在单字调中表现为与连调中一致的平调，即阳平去发生高降>低降>中平的变化。

普兰店方言单字调表现为两调，阴平与阳平去合并，两位发音人的单字调格局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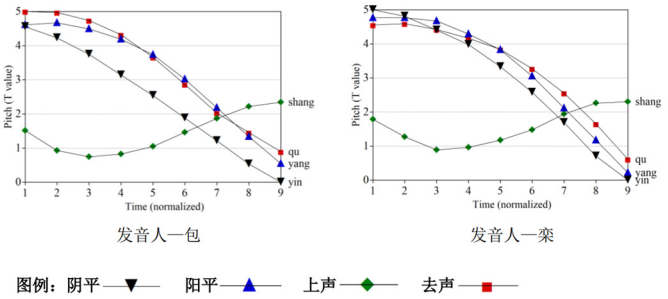


图 6：普兰店方言单字调格局图

连读变调中阴平与阳平去在一些组合中可以区分，阳平去在连字调中有变成平调的趋势。从调类再合并的步骤上看，普兰店正在经历前两步，连读变调对单字调的影响暂未发生，未来有可能与庄河一致，将第三步完成，即阳平去变成中平调。仅从单字调上观察，可能会得出普兰店调类再合并进程快于庄河的结论，但从整体上看，普兰店处于庄河型的中间阶段，单字调两调格局的现状恐怕不会保持太久，这也是实际交际中表达清晰的要求。

D2 类方言点调类再合并的过程中，单字调经历了三调>两调>三调的历程，但连字调中始终为三调格局，说明辽宁方言声调格局最小的稳定态为三调，极端的两调情况是非常不稳定的，仅短暂出现在单字调格局中

四、辽宁方言声调的层次

各个类别声调特征的不同反映了层次的差异，受到语音自然演变、移民和语言接触影响，辽宁各地方言声调呈现出类型丰富、异质性较强的特点是由下面四个层次共同作用造成的。

第一，辽宁方言的底层声调。A 类方言点体现辽宁方言声调底层特点，即单字调格局为“降-升-凹-降”，这种声调格局无法用移民因素解释，因为历史上向辽宁中部移民规模最大的山东、河北地区并未见此类声调格局，且辽阳、沈阳先后作为辽东地区的行政中心，中部应该是历史上汉族人口聚居的区域，保留着底层方言的色彩。3.1 中对阴平降调历史的追溯也证明了 A 类方言点保留的声调特点是辽宁方言自然演变的结果，在清以后大规模移民到来之前，辽宁大部分地区都保留着“降-升-凹-降”的声调格局，以沈阳、辽阳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此外，调查中发现 A 类方言点阳平调值

普遍偏低，可能也是底层声调格局的保留。

第二，移民对辽宁方言声调的重塑。虽然广阔的东北地区，尤其辽宁地区始终是周边移民躲避战乱饥荒之地，但朝代更替下偏远的东北地区仍常常处于“有土无人”的状态。清以后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规模庞大，持续时间久，且并未向从前一样祸乱平息后便返回原籍，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方言十分强势。

东西两个方向到来的移民同时带来了原籍方言，登录东北后与当地底层方言接触、竞争，逐渐在辽宁东西两翼形成了与中部不同的声调系统。西部北京官话区以河北、直隶地区移民为主，声调系统与今普通话高度一致；东部跨海路到来的山东移民也带来了本地方言，辽宁地区胶辽官话区域声调系统与胶东半岛上方言声调系统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如 D2 类方言点最初“烟台型”的调类合并方式、D1/D2 类方言点阴平早期记录中凹调的表层特点，都能在山东话，尤其是胶东半岛上方言中找到对应。移民方言在聚居区的通行，改变了辽宁地区内部一致性较高的底层形式，为区域内带来异质成分。

第三，语言接触下的新发展。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聚居地向中部的深入，移民方言与底层方言势必发生竞争、接触，过渡区的声调形式会同时具有两种方言色彩。

西部东北官话区存在大量 C1/C2 类方言点，阴平作为平调是北京官话的特征，随着语言接触逐渐影响周围地区，A 类方言点单字调或连字调系统中出现的阴平平调形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接触影响的结果。另外，北京官话区方言点阴平调值稍低，是受到东北官话低降调影响的结果，这种接触影响是双向的。

东部语言接触的现象更加丰富，B 类方言点中保留的“上声+阴平”变调方式、D1 型独立的阳平调，都是胶东方言与辽宁底层方言接触，两种声调体系接触、竞争、杂糅的结果，带有双方的特点。

第四，普通话的影响。自推广普通话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投入，辽宁地区的权威方言由沈阳话变成普通话，影响范围也由原来的中心扩散式变成整体覆盖式，各类方言点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中、西部最明显的变化是阴平在越来越多的环境下变为平调，原有的语言接触仅发生在辽西地区，但现在中部方言点在连字调格局中也出现阴平平调形式，个别点单字调也在变化过程中，降幅越来越小。普通话对东部的影响主要在 D2 类方言点的阳平调，两字组连读中个别阳平字脱离去声，表现为独立的升调，这种现象目前比较少见，仅存在于个别词和词组中，处在词汇扩散的初期。

五、结语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数据，运用语音实验将声调信息量化，在声调模型理论框架下，综合单字调、连字调对辽宁方言声调进行描写分析，发现辽宁各地方言声调差异较大，类型丰富。根据阴平在单字调和连字调中的表现，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声调类型的不同主要是移民和方言接触的结果。A 类方言点的声调类型属于最老层次，体现了辽宁地区底层方言的声调表现，C1/C2、D2 类主要是移民方言的体现。在东、西部都能观察到语言接触的痕迹：C2 类阴平调值稍低的现象可以归因于与东北官话的接触；A 类中阴平的平调表现一定程度上与接触有关； B 类“上声+阴平”变调保留胶辽官话色彩，其余声调表现又与东北官话类似；D1 类基本保留了移民方言的特征，但阳平为独立的升调。此外，近年来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也从整体上影响着各地方言的声调格局。

附记：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格局研究”（批准号 20AYY020）资助研究，并在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研究论坛上宣读，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曾晓渝老师的指导，远藤光晓老师为文章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陈晓.2018.清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4):435-445+511

丁邦新.1998.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董琼瑜.2014.庄河音系内部差异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董岩.2008.大连方言语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韩天宇. 2014.黑山方言音系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忌浮.1986.《中原音韵》的调值.语言研究.(01):99-108.

李南依.2019.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昕升.2019.庄河市区方言声调与元音格局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林端.1992.元代大都口语的调位系统.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79-86.

刘欣.2021.开原方言双字调变调的实验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马希霖.2019.庄河市区与北部山区单字调比较实验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那琳.2019 开原方言语音研究.锦州: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潘悟云.1982.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10):359-385.
钱曾怡主编,张树铮,罗福腾副主编.2001.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孙雯.2015.庄河方言市区话与两岛话语音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力.1957.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王琪. 2016.辽中县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夏中华,原新梅主编.2021.中国语言资源集 • 辽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晓渝.2022a.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的几个基本问题思考.南开语言学刊.(02):30-40.
张乐.2019.庄河市区方言双字调变调的实验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世方.2000.汉语方言三调现象初探.语言研究.(04):48-61.
张玉来.2017.明代官话声调系统及其音变特点.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02):22-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编.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汉语方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晓农.章婷,衣莉,2012.凹调的种类——兼论北京话上声的音节学性质.中国语文.
BAO, Z. 1990. On the nature of to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O, Z. 1999. The structure of t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U, J. H. 2023. The 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ast Mandarin in Liaoning. in TRỊNH, C. L., TRẦN, T. H. H., SUZUKI, H., & ENDO, M.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uistics.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125-142. https://doi.org/10.5281/zenodo.8382130

黄淮地区官话方言阴平低凹调的连字调表现

肖能萍
南开大学

内容摘要：阴平单字调以低凹调为主是黄淮地区官话方言声调的突出特点。但不同方言点、调类组合和声调环境中的阴平连字调表现有所不同。本文根据黄淮地区 37 个方言点的二手材料，综合考察阴平低凹调的连字调表现，认为阴平低凹调在连读变调中几种变体的出现与原调保留、接触替换、OCP 原则等因素有一定的倾向性关系。

一、引言

本文所涉黄淮地区指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交界的黄河下游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就语言分区而言，包括《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 汉语方言卷》（2012）所指的中原官话徐淮片、商阜片、信蚌片以及江淮官话洪巢片的北部区域。本文选取了这片区域的 47 个方言点进行考察，其中 37 个点的阴平单字调都是低凹调（见表 1 灰底部分数据）。对表 1 稍加分类整理，可以得到表 2。表 1 和表 2 中各类型的单字调特点如下：A1 类无入声，其阴平为低凹调，阳平为高平调，上声为升调，去声为高降调；A2 类、A3 类和 A4 类，舒声调与 A1 类一致，但保留入声，A2 类入声为高短调，A3 类入声为低升调，A4 类入声兼有低升调和高短调；B1 类阴平为低升调且无入声；B2 类阴平为低凹调，其他调类与 B1 类一致，即阳平为高降调，上声为高平调，去声为低降调；C1 类阴平为低凹调，阳平为高升调，上声为高降调，去声为高平调，入声为低升调；C2 类基本与 C1 类保持一致，只是入声为高短调；D 类的特点是阴平为低降调（或中降调）且保留入声。图 1 是黄淮地区单字调类型的地理分布。从表 2 和图 1 中也可以看出该地区声调的突出特点是阴平单字调以低凹调为主；只有少数分布于河南境内的点，阴平为低升调（B1），少数分布于江苏境内的点，阴平为低降调（D）。

表 1：黄淮地区 47 个方言点的单字调

类型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来源
A1	阜阳	213	55	24	53	-	孟庆惠 1997
A1	临泉	213	554	24	41	-	李天向 2020
A1	蒙城	212	55	24	52	-	杨自翔等 2011
A1	濉溪	213	44	24	53	-	郭迪迪、郭辉 2014
A1	蚌埠	212	55	24	53/51	-	杨自翔等 2011
A1	固镇	212	55	24	52	-	杨自翔等 2011
A1	凤阳	212	55	24	53	-	《凤阳县志》1999
A1	颍上	213	55	35	51	-	石芳 2020
A1	淮南田家庵	213	55	24	53	-	《淮南市志》1998
A1	凤台	213	55	34	51	-	岳粹莲 2017
A1	信阳	113	44	24	53	-	辛永芬等 2023
A1	固始	213	55	24	51	-	辛永芬等 2023
A1	淮滨	213	33	24	43	-	葛丽 2013
A1	息县	213	55	24	42	-	《息县志》1989
A1	徐州	213	55	24	51	-	苏晓青 1985
A1	沛县	213	54	24	51	-	汪平等 2015
A1	邳州	213	55	24	51	-	汪平等 2015
A1	新沂	323	55	35	51	-	汪平等 2015
A1	睢宁	323	44	14	51	-	汪平等 2015
A1	砀山	213	55	24	53	-	崔晨曦 2013
A1	淮北	213	44	24	42	-	郭辉、郭海峰 2013
A1	宿迁	213	55	24	51	-	汪平等 2015
A1	寿县	212	55	24	53	-	《寿县志》1996
A1	赣榆青口	213	55	324	51	-	岩田礼 1989
A2	寿县瓦东	213	55	24	53	5	任声楠 2020
A2	东海	213	55	35	41	5	苏晓青 1997
A3	赣榆罗阳	213	55	324	41	24	岩田礼 2012
A4	泗洪	213	55	224	51	13/5	汪平等 2015
B1	周口	24	53	44	41	-	辛永芬等 2023
B1	郸城	24	42	44	51	-	辛永芬等 2023
B1	上蔡	24	53	55	31	-	《上蔡县志》1995
B1	宁陵	23	53	45	31	-	范振洁 2021
B2	永城市	213	53	334	41	-	辛永芬等 2023
B2	驻马店	213	53	44	31	-	辛永芬等 2023
B2	商水	113	53	55	31	-	刘雪霞 1999
B2	漯河	224	53	44	31	-	辛永芬等 2023
B2	商丘	223	52	44	41	-	辛永芬等 2023
C1	沭阳	213	35	51	55	13	汪平等 2015
C1	连云港新浦	214	35	41	55	24	汪平等 2015
C1	灌云	213	35	41	55	24	汪平等 2015
C2	灌南	312	24	31	55	4	汪平等 2015
D	怀远	21	35	212	53	2	贡贵训 2014

D	泗阳	31	35	213	55	5	汪平等 2015
D	响水	31	24	213	55	4	《响水县志》1996
D	滨海	31	24	312	44	5	王文婷 2011
D	射阳	42	24	213	44	5	刘旭红 2005
D	洪泽	42	24	213	55	4	严晨 2015

注：材料来源后文若无特殊说明，与此表同，不再赘述。

表 2：黄淮地区单字调类型

类型	图例	代表点	单字调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A1		阜阳	213	55	24	53	-
A2		东海	213	55	35	41	5
A3		赣榆罗阳	213	55	324	41	24
A4		泗洪	213	55	224	51	13/5
B1		周口	24	53	44	41	-
B2		商丘	223	52	44	41	-
C1		连云港新浦	214	35	41	55	24
C2		灌南	312	24	31	55	4
D		泗阳	31	35	213	5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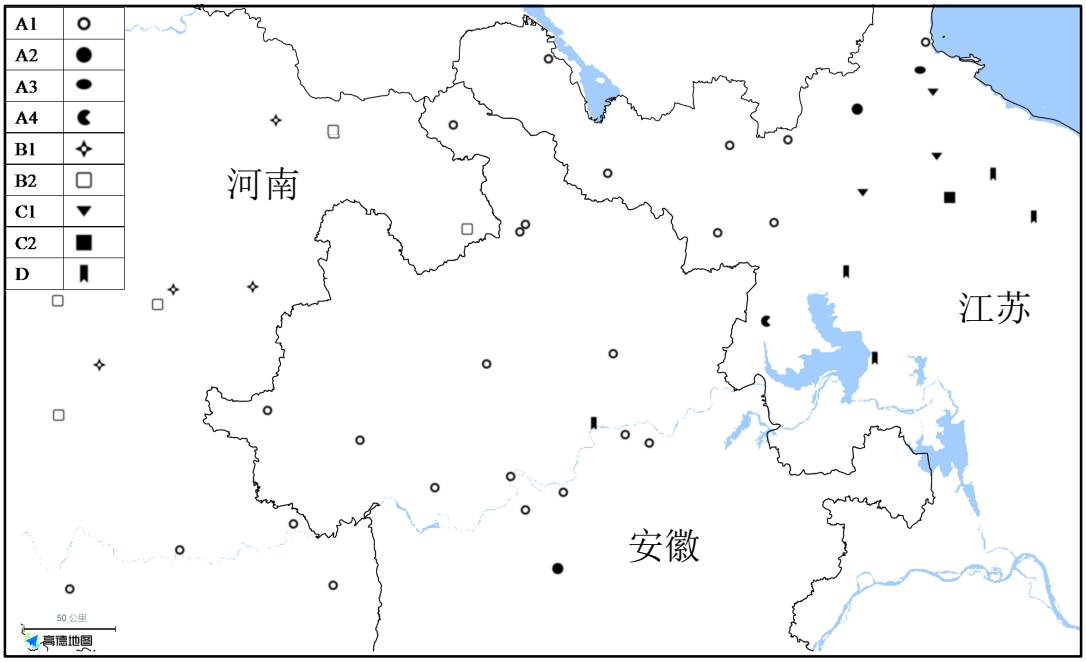


图 1：黄淮地区单字调类型地理分布[1]

前人在对江淮官话区或苏北鲁南地区的声调研究时，对阴平单字调的祖调值进行了构拟，并对音变原因和音变链做了讨论。岩田礼（2012）在平山久雄的环流说的基础上，根据阴平调的 ABCBA 分布，认为牛山的阴平单字调早期是低降调。许井岗（2022）进一步认为苏鲁毗连地区阴平调值的演变，是由去声降调化引起的推链的一环，而阴平单字调链式变化过程为 31>21>213>214>13>24。

前人的研究为区分该区域阴平单字调的新旧层次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关注到阴平的低凹调调形使得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作为标记性高的调形，低凹调通常存在低调域的多种变体。这些变体是随机出现的吗？还是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黄淮地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低凹调变调材料。区域内的大部分阴平单字调为低凹调，且在不同方言点、不同位置上的连字调表现有所不同，存在低升调、低降调等多个变体。那么，这几种变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影响因素是什么？

本文根据黄淮地区 37 个方言点的二手材料，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1] 绘图采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开发的语言地图软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审图号 GS(2023)4677。

二、阴平调的连字调表现

2.1 前字调

前文已经提及黄淮地区 37 个点的阴平单字调都是低凹调。那它们在两字组中的连字调表现如何？首先来看前字调。

表 3：黄淮地区阴平低凹调在两字组中的前字调表现

方言点	阴平					单字调类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临泉	21	21	21	21	-	A1
颍上	21	21	21	21	-	A1
淮滨	21	21	21	21	-	A1
宿迁	21/213	21/213	21	21/213	-	A1
阜阳	21/13	21	21	21	-	A1
邳州	21/13	21	21	21	-	A1
睢宁	32/23	32	32	32	-	A1
蒙城	24	21	21	212	-	A1
濉溪	24	21	21	21	-	A1
蚌埠	24	21	21	21	-	A1
固镇	24	21	21	21	-	A1
凤阳	23	21	21	21	-	A1
淮南田家庵	13	21	21	21	-	A1
凤台	23	21	21	21	-	A1
徐州	24	21	21	21	-	A1
砀山	24	21	21	21	-	A1
淮北	24	21	21	21	-	A1
寿县	12	21	21	21	-	A1
信阳	13	11	11	13	-	A1
固始	13	21	21	13	-	A1
沛县	13	21	21	13	-	A1
息县	44	21	21	21	-	A1
新沂	32/33/35	32	32	32	-	A1
赣榆青口	21/55/13	21/13	55/13	21/13	-	A1
东海	21	21	21	21	21	A2
寿县瓦东	24	213	213	213	213	A2
赣榆罗阳	21	21	21	21	21	A3
泗洪	213	21	21	21	21	A4
永城市	22	21	21	21	-	B2
商丘	223	223	22	223/52	-	B2
商水	113	113	113	113	-	B2
驻马店	23	213	23	23	-	B2
漯河	24	24	24	24	-	B2
沭阳	213/21	21	213	213/21	213	C1

连云港新浦	21/14	21/214	214	214/21	214/21	C1
灌云	13	31	13/213	31	31	C1
灌南	13	31	13	31	31	C2

由表 3 可知：当单字调为低凹调的阴平，作为两字组的前字时，有低降调（[21]、[32]）、低升调（[12]、[13]、[23]、[24]）、低凹调（[213]、[214]、[223]、[113]）和高平调（[33]、[44]、[55]）四种变体。这四种变体在不同方言点、不同的调类组合及不同的声调环境中的出现的频率不同：

1、越靠近河南，低升调出现的频率越高，如漯河的阴平在四声前都是[24]，驻马店的阴平在阴、上、去前都是[23]。低凹调主要在河南的商丘、商水以及保留入声的寿县瓦东、沭阳和连云港新浦出现。河南商丘的阴平，原先为低凹调，近年来变为低升调。[2]而沭阳和连云港新浦，低凹调通常和低降调交替出现。高平调只在息县、新沂和赣榆青口三个点出现，且多出现在阴平相连的组合中。

2、大部分方言点的阴平在阴平+阳平、阴平+上声、阴平+去声和阴平+入声等组合中为低降调，只在阴平相连的组合中变为低升调。

3、低升调容易出现在 A1 型方言点的阴平+阴平组合中以及 C1 型、C2 型方言点的阴平+上声组合中。

4、同一方言点，最多有以上四种变体中的三种，如赣榆青口的阴平在阴平前有[21]、[55]、[13]这三种调值。

2.2 后字调

前文详细介绍了黄淮地区阴平前字调的表现，下面介绍阴平的后字调表现。

[2] 吕萌（2010）所记商丘话，阴平为[24]；而辛永芬等（2023）所记商丘话，阴平则为[223]。

表 4：黄淮地区阴平低凹调在两字组中的后字调表现

方言点	阴平					单字调类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临泉	213	213	213	213	-	A1
颍上	213	213	213	213	-	A1
淮滨	213	213	213	213	-	A1
宿迁	213/21	213/21	213/21	213/21	-	A1
阜阳	213	213	213	213	-	A1
邳州	213	213	213	213	-	A1
睢宁	323	323	323	323	-	A1
蒙城	212	21	212/21	21	-	A1
濉溪	213	213	213	213	-	A1
蚌埠	21	21	21	21	-	A1
固镇	21	21	21	21	-	A1
凤阳	212	212	212	212	-	A1
淮南田家庵	213	213	213	213	-	A1
凤台	213	21	21	21	-	A1
徐州	213	213	213	213	-	A1
砀山	213	213	213	213	-	A1
淮北	213	213	213	213	-	A1
寿县	212	212	212	212	-	A1
信阳	113	113	113	113	-	A1
固始	213	213	213	213	-	A1
沛县	213	213	213	213	-	A1
息县	213	213	213	213	-	A1
新沂	323	323	323	323	-	A1
赣榆青口	213	213	213	213	-	A1
东海	213	213	213	213	213	A2
寿县瓦东	213	213	213	213	213	A2
赣榆罗阳	213	213	213	213	213	A3
泗洪	213	213	213/21	213	213	A4
永城市	213	213	213	213	-	B2
商丘	223	223	223	223	-	B2
商水	113	113	113	113	-	B2
驻马店	113	113	113	113	-	B2
漯河	224	224	224	224	-	B2
沭阳	213	213	213	213	213	C1
连云港新浦	214	214	214	214	214	C1
灌云	213	213	213	213	213	C1
灌南	31	31	31	312	31	C2

表 4 可知，当单字调为低凹调的阴平，作为两字组的后字时，只有低凹调（[213]、[212]、[113]、[323]、[224]、[214]）和低降调（[21]、[31]）两种变体。大部分方言点的阴平在阴平+阴平、阳平+阴平、上声+阴平、去声+阴平和入声+阴平等组合中为低凹调，即大部分方言点，阴平的后字调与单字调保持一致。除蚌埠和固镇的阴平后字调为低降调外，低降调只在蒙城、宿迁、凤台、泗洪和灌南的部分组合中出现。

上文初步描写了阴平连字调的几种变体，这些变体在不同方言点、不同的调类组合及不同的声调环境中的出现情况。这些变体的出现似乎是有条件的。它们究竟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变体的层次以及变化的动因。

三、连字调的影响因素

连字调的影响因素，曾晓渝（2022）也称为连读变调的机制或制约条件。曾文提出了 6 条制约条件，包括 OCP 原则、前字变调、后字保调、中和、重高轻低和原调保留。本文受此启发，从历时演变、共时音变及系统内外的角度，分别分析原调保留、OCP 原则及接触替换对黄淮地区阴平连字调的影响。

3.1 原调[3]保留

前文已经提到，已有研究（岩田礼 2012；许井岗 2022）认为黄淮地区的阴平单字调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由低降调变为低凹调，再变为低升调的过程。因此大体而言，低降调为旧层次，低凹调为中间阶段的新层次，低升调为最新的层次。前人主要是根据地理分布得出上述结论，本文在此增加两则新证据：

1、阜阳的单字调为[213]，其阴平相连时，前字有两读的情况：前字为古清平时读作[21]，前字为古清入、次浊入时读作[12]或[13]。这说明，至少阜阳一地，清入和次浊入，尚未派入阴平时，阴平前字调为[21]，而入声的前字调为[12]或[13]。黄淮地区保留入声调的方言（见表 5），只要入声已经舒化，其调形多为低升调。

表 5 黄淮地区保留入声调的方言点的单字调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沭阳	213	35	51	55	13
连云港新浦	214	35	41	55	24

[3] 丁邦新（1984/1998）提出需要从历时角度增设“基调”和“原调”两个术语。“基调”是特定方言点的旧调值，而“原调”则是比较不同方言时拟测的次方言古调。由于官话方言内部一致性较强，基调和原调往往调值一致。因此本文将历时维度的旧调值统称为原调。

灌云	313	35	41	55	13
灌南	312	24	231	55	224

2、这一地区，轻声[4]前的阴平绝大部分是低降调。平山久雄（1998）指出德州方言的轻声前变调中保留着比单字调值早一层的调值状态。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也适用于黄淮地区。

以上两则证据都是对这一地区大部分方言点的阴平原调都是低降调的再证明。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如息县的阴平原调是高平调。它很可能是早于低降调的层次。因为更靠南的南京话，其阴平相连，前字变为[44]；与息县较近的江淮官话黄孝片的阴平调，不论单字调还是连字调都是[44]。根据地理分布，南京和黄孝片位于边缘，更为存古。另外赣榆青口的阴平调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替换，具体见 3.3，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上文 2.1 提到的大部分方言点的阴平前字在阴平+阳平、阴平+上声、阴平+去声和阴平+入声等组合中为低降调，这是一种原调保留。同样，息县阴平前字调中出现的高平调也是忠实于原调的表现。

但这种原调保留在后字调中不太明显，后字调更容易与单字调保持一致。因此，低凹调通常在后字调中更新为单字调，很少受到保留原调的束缚。后字与单字处于同样的后接空白时段的位置，后字调的这种边界性质决定了它拥有与单字调相同的声调表现。王大佐（2021：176）通过对普通话的听感实验，就曾指出两字组后字的听感边界通常比在前字中低但更稳定。也因此，低凹调作为后字时，容易受发音生理条件制约，产生低降调的变体（曾晓渝 2022）。

3.2 OCP 原则[5]

上文 2.1 指出，低升调容易出现在 A1 型方言点的阴平+阴平组合中以及 C1 型、C2 型方言点的阴平+上声组合中。在这些组合中，后字都是低凹调。这是一种条件音变，即低凹调相连，前字变低升调。根据曾晓渝（2019）对汉语官话方言低凹调类连

[4] 本文所涉部分方言点的材料既包括轻声也包括轻音，比如徐州和淮北。徐州话阴平是[213]调，在阴平前变为[35]调，在其他声调（包括由其他声调变来的轻声）前变成[21]调，在由阴平变来的轻声前则有[35]和[21]两种变调。淮北话阴平在原为非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改读轻声的字音前均由[213]变成[21]；在原为阴平而改读轻声的字音前，则有两种不同的变调。其规律大致为：如果该两字组的末音节在普通话中也是轻声，前字变[21]，如果该两字组的末音节，淮北话读轻声，普通话一般不读轻声，此时前字则变[24]。

[5] OCP（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强制曲拱原则：制约音系表达式的基本原则。意即：禁止或至少不赞同相邻自主音段（autosegment, 自主的、在自己音层上表征的音段——声调、元音、辅音）上出现相同的特征赋值，即它不赞成冲突（综合参考[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2000:247；[英]R.L.特拉斯克编《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2000:181）。

字调的整理材料，我们发现除去江淮官话，31 个方言点中，21 个方言点的前字变升调（这些方言点中低凹调对应的调类四声皆有）。低凹调相连前字变低升调，具有跨方言的普遍性，它是符合 OCP 原则的连读变调。因此低升调大多只出现于阴平+低凹调的组合中。但也有一些阴平调，并无低凹调作为的触发环境，比如漯河的阴平在四声前都是[24]，驻马店的阴平在阴、上、去前都是[23]，信阳、固始和沛县的阴平在高降调前都是[13]。我们推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这些方言点不断受到阴平为低升调的汴洛强势口音的影响，二是低凹调前的阴平调变成低升调后，低升调在阴平与其他声调的组合中类推。

另外，在黄淮地区，OCP 原则产生的低升调恰好与层次最新的低升调一致，这并不意味着 OCP 原则必定产生新调。曾晓渝（2013）记录的重庆老城话，去声[213]相连，前字变为[24]，但这里的[24]却是去声的旧层次[6]。也就是说 OCP 原则所产生的变调与历时维度的原调、新调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除 OCP 原则外，曲折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Ups and Downs, PUD）[7]或许也有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后接高调时，低凹调容易变成低降调。例如北京话上声与阴平、阳平及去声相连吗，容易变成半上[21]。但是这一点在黄淮地区的方言中似乎不太典型，有待更多材料的支持。

3.3 接触替换

就已知的语言事实来说，接触替换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徐州方言的文白异调。

徐州方言形容词 AA（的）式重叠和表示统指的名词 AA 式有文白异调的现象：读书时 A 为阴平调，则前字变[24]调，后字不轻读；口语中，A 为阴平调，则前字变[21]调，后字轻读（苏晓青 1985）。这是徐州方言中残存的接触音变的痕迹。在以徐州为代表的方言中，连字调中的低升调取代中降调自书面语开始，逐渐影响口语。

2、阜阳方言阴平相连时，前字两读的情况。

前文 3.1 提到，阜阳方言的入声单字调原本应是低升调，而阴平单字调原本是低降调。可见清入和次浊入归阴平，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这是处于入声舒化阶段的方言受到临近无入声的中原官话的影响后形成的。

3、赣榆青口的新老差异。

[6] 赵元任（1922/2007）记录的重庆老城话去声是[24]。

[7] Hyman（1978）针对非洲语言曲折调的连读变调提出了音高曲折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Ups and Downs, PUD），即在给定时间内音高向上和向下变化的次数要尽量减少。

岩田礼（1989）对赣榆青口的连读变调进行了老派和新派的详尽调查，老派的阴平前字调为[13]，但新派的阴平前字调以[21]和[55]为主，[13]反而是次要形式。这种短期内多个形式的突然出现，与接触关系密切。

表 6：赣榆青口两字组连读变调（岩田礼 1989）

		后字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前字	阴平 213	13+213	13+55	13+24	13+51	13	老派
		21~55~13+213	21~13+55	55~13+24	21~13+51	21~13	新派
	阳平 55	55+213	51+55	51+24	55+51	55	老派
			55+55				新派
	上声 324	55+213	24+55	51+24	24+51	24	老派
			55+55		55+51		新派
	去声 51	31+213	31+55	31+24	31+51	51	

注：方框内表示主要的变调形式，~表示或者。

以上三个例子均说明，黄淮地区存在不少方言点，其阴平调为低凹调或低升调所取代是一种接触替换，当然这种替换在语音上是突变的，但在词汇中是逐渐扩散的。从语音表现上说，这些典型的因接触发生替换的方言点，通常存在多个阴平连字调变体。从外部条件来说，这些方言点往往在近几十年发生了行政区划上的变动，比如徐州、赣榆和连云港青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属于山东省，20 世纪 50 年代陆续划归江苏省。这种行政区划的变动，使本来就处于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过渡地带的方言接触更为复杂。

四、结语

按照朱晓农、衣莉（2011）的观点，本文所讨论的 37 个点的阴平调的三种变体（高平调除外）都属于纯低调。不可否认有时（特别是单念的情况下）这些变体之间不以拱形作为区别特征，其共同特点是[+LOW]“低性”。但是在特定方言的连字调中，这些变体真的是随机出现的吗？换句话说在连字调中有必要区分低升调、低降调和低凹调吗？本文通过考察黄淮地区 37 个方言点的阴平连字调表现，认为这些变体在不同的调类组合和声调环境中的分布受到原调保留、OCP 原则以及接触替换的影响：

1、低降调等变体容易因保留原调而出现于前字调。低凹调通常在后字调中更新为单字调，很少受到保留原调的束缚。部分低升调的出现是对古清入、次浊入调值的保留。

2、受到 OCP 原则的影响，低升调容易出现在低凹调前。黄淮地区阴平相连前字变调属于后起的连调规则，它不像连上变调一样，能够找到官话范围内成片的连字调对应。也由于低升调是语音环境触发的新调值，所以低升调不出现在后字调中。OCP 原则产生的低升调恰好与层次最新的低升调一致，这很可能是一种巧合。

3、接触替换往往使多个变体在特定的调类组合中同时竞争。

从连字调（包括前字调和后字调）与单字调的关系来说，连字调总是滞后于单字调发生变化；后字调通常与新调（即单字调）保持一致，偶见的后字调中出现的区别于单字调的变体很可能是边界位置的常见变体；接触替换的中间阶段更多地保留在前字调中，很少保留在后字调中；由 OCP 原则触发的前字调变体并不一定属于新层次。

总之，低凹调作为高标记性的调形，具有丰富的连字调变体。区分低凹调的连字调变体，有助于分析原调和新调，具有历时意义，也有助于加深对连字调的共时变体的认识。

附记：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格局研究”（批准号 20AYY020）资助研究。感谢会上远藤光晓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分享的珍贵资料！感谢导师曾晓渝教授的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同时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受到支建刚教授的启发，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崔晨曦 2013《砀山县城话语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丁邦新 1984/1998《吴语声调之研究》，载《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范振洁 2021《宁陵方言语音演变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凤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
葛丽 2013《河南淮滨方言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贡贵训 2014《怀远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郭辉、郭迪迪 2014《皖北濉溪方言的连读变调》，《淮北职业技术学报》第 5 期。
郭辉、郭海峰 2013《淮北方言研究综述》，《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6 期。
淮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淮南市志》，黄山书社。
李天向 2020《安徽临泉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旭红 2005《射阳方言语音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雪霞 1999《商水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吕萌 2010《商丘方言的声调分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孟庆惠 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98《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方言》第 1 期。
任声楠 2020《淮南寿县方言瓦东话音系》，《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上蔡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5《上蔡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石芳 2020《颍上方言语音研究》，阜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寿县志》，黄山书社。
苏晓青 1985《徐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苏晓青 1997《东海方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汪平、孙华先、苏晓青 2015《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 第 14 册 语音系统卷》，凤凰出版社。
王大佐 2021《汉语普通话声调听感格局的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文婷 2011《滨海方言语音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息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9《息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响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响水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辛永芬、王新宇、段亚广主编 2023《中国语言资源集·河南·语音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井岗 2022《苏鲁毗连地区方言声调的读音类型、分布与演变》，《语言科学》第 2 期。
严晨 2015《江苏洪泽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岩田礼 1989《赣榆·青口方言（新派）的连读变调》，《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37。
岩田礼 2012《声调调值演变的微观探讨：以江苏东北角的方言为例》，《语言时空变异微观》。
杨自翔、曾晓渝、陈希 2011《安徽蒙城、蚌埠、固镇、合肥方言语音调查报告》未刊稿。
岳粹莲 2017《凤台话语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曾晓渝 2013《重庆话音系七十年比较分析》，《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 2 期。

曾晓渝 2019《重庆方言“去去”连字调的内部差异及其解释》第三届南方官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10 月 19 日，西南大学。
曾晓渝 2022《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的几个基本问题思考》,《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赵元任 1922/2007《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载《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编 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 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
朱晓农、衣莉 2011《两折调的故事》,《语言研究季刊》第 8 辑。
[英]戴维 • 克里斯特尔编 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 译），商务印书馆。
[英]R.L.特拉斯克编 2000《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 译)，语文出版社。
Hyman, Larry M. 1978. Historical tonology.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ed. by Victoria A. Fromkin, 257–26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乙种本《华夷译语》“来文”里的汉蕃对音

更科慎一
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明代语言课本《华夷译语》中以民族文字标记汉语音的四种资料(汉蕃对音)，探讨其汉语基础方言音系的特点。涉及的语音特点有：声母方面，疑母和舌齿音二三等；韵母方面，i 类韵母和部分入声韵；声调方面，调值高低问题和入声调独立与否问题。

一、引言

《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朝廷编纂的一系列汉蕃对译语言教科书的总称，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版本。甲种本编纂于明洪武年间，所收录的语言只有蒙古语；乙种本由明四夷馆（1407 年设立）编纂，涵盖了女真、鞑靼（即蒙古）、高昌（即维吾尔）、回回（即波斯）、西番（即藏）、缅甸、百夷、八百、暹罗（以上三种均属台语）、西天（即梵）等十种语言。丙种本由明会同馆编纂，涵盖十三种语言[1]；丁种本是清乾隆年间由会同四译馆编纂，记录了至少四十二种语言。《华夷译语》中的各个语言部分，通常被称为《某某（馆）译语》，如《西番译语》、《回回馆译语》等。具体版本的书名还会有《华夷译语》（不明示语种）、《某某（馆）译书》等类型。

从体例上看，以上四种《华夷译语》都包含对译词汇，学术界称之为“杂字”。“杂字”所收的每一个词语用音译汉字写成，乙、丁种本还附有民族文字。

甲、乙两种还包括对译文书部分，主要指明廷与塞外诸民族之间的往来文书，学术界一般称其为“来文”。[2]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乙种本中的“来文”部分。

乙种本中的《译语》，除《西天馆译语》外，其他九馆均包括“杂字”和“来文”

[1] 它们是：西番、百夷、暹罗、女真、鞑靼、畏兀儿、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满加剌、回回等语言。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袁氏贞节堂钞本《译语》是一部丙种本系统的本子，其中有一篇叫《河西（译语）》，记载了“河西语”。如果将河西语包括在内，那么丙种本涵盖的语言达 14 种。

[2] 乙种本中的《西天馆译语》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是梵文《西天真实明经》及其汉字注音，缺乏“杂字”部分。尽管此《译语》一般被划分为“来文”，但从内容上看，与其他语种的“来文”完全不同。

两部分，各自独立成册。本文将它们分别称为“《某某（馆）杂字》”和“《某某（馆）来文》”。在提到“来文”时，通常省略“馆来文”的部分，如直接使用“《缅甸》”时，指的就是“《缅甸馆来文》”

表一列出了作者目前所查阅的包含‘来文’部分的乙种本《华夷译语》版本。

表 1：乙种本《华夷译语》“来文”版本情况（〇号表示该版本含有此“来文”）

	东洋文库本[3]	复旦本[4]	杏雨书屋本[5]	伯林本[6]	《高昌馆课》本[7]	巴黎本[8]	《西域同文表》本[9]
鞑靼馆来文	〇			〇	〇		
高昌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女真馆来文	〇		〇	〇			
西番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〇
回回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〇
百夷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缅甸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八百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暹罗馆来文	〇		〇	〇		〇	〇

[3] 日本东洋文库藏明抄本。

[4]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今用《续修四库全书・第二三〇册・经部・小学类》所收影印本。

[5] 杏雨书屋（在日本大阪）藏明钞本。今利用该书屋所藏的复制本。

[6] 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今用该馆 Digitized Collection 所提供的画像（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4615730X&PHYSID=PHYS_0001），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

[7]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今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6 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所收影印本。

[8] 该本为清钞本，由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传至法国，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今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的复制本。

[9] 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旧称内阁文库），本文利用“国立公文书馆数字档案馆”所提供的画像（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eng&BID=F1000000000000095087&ID=&NO=1&TYPE=JPEG&DL_TYPE=pdf），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30 日。

乙种本各馆的“来文”部分，收录的文书数量不一，少则十余篇，多则近百篇，每篇文书由汉文和民族语言对译构成，汉文部分的字数一般在 50 至 100 字之间，最多约为 150 字。从内容上看，各篇文书大部分是由塞外民族向明廷发送的表文，少数为明廷发给塞外民族的敕谕。《缅甸馆来文》中还有七篇既不是表文，又不是敕谕，而是从一般书籍中摘录的文章片段，情况十分特殊。

乙种本“来文”成书时间尚不明确。石田（1944/1973:152-153）根据吕维祺所著《四夷馆增订馆则》的记载推测，乙种本的“来文”可能是嘉靖二十一（1542）年以后编撰附加的。石田的这一推测所依据的是四夷馆提督官郭鋆的上奏（载《增订馆则》卷四・训规；卷十五・文史条约类），任萍（2015:157）也引用此奏文，指出从此以后，四夷馆的教学内容除了杂字之外还增加了诏敕和来文。现存“来文”收录的一些文书里还出现明代的年号，从中可以推测文书写成的上限(而非下限)年代。年号年号以正统、景泰、天顺至嘉靖时期为主，最晚的纪年出现在《暹罗馆来文》中，为隆庆四年（1570 年），其次是《西番馆来文》中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据此，我们姑且将现存的“来文”成书年代推测为嘉靖末年至万历初之间。

二、乙种本“来文”中的汉语音韵材料

2.1“来文”所见汉语音韵材料概观

乙种本“来文”的民族语言部分使用该语言固有的文字书写，不像甲种本那样使用音译汉字。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来文”里不存在译音对勘材料。首先，汉文部分包含若干音义汉字，用于给民族语言固有词（主要是专名）注音。如：

ħāfiẓ 哈非子　　（柏林本《回回馆来文》第二篇）

ʔɔɔk kh$_1$un yai 握坤涯　　（柏林本《暹罗馆来文》第一篇）

在民族语言部分还可以看到一些将汉语专名音译成民族文字的例子。如：

忠顺王 ČWNK-ŠWYN ’WNK　　（柏林本《高昌馆来文》第三十四篇）

安定卫 ’AM-TYNK WY　　（《高昌馆课》(高昌馆来文)第八十篇）

洪武 hung2 wuu　　（柏林本《暹罗馆来文》第十一篇）

本文对这种对音资料不作分析。因为一般说来，专名的汉字译音常常出现一些不常规的对音关系，不易分析。

如上所述，乙种本“来文”的内容主要是由塞外民族发给明廷的表文，按理说应以民族语言为正文，汉语为译文。然而，凡是看过这份资料的人都会发现，“来文”中的汉语部分极其规范、符合语法规则，而民族语部分几乎是汉语文的逐字硬译，其语法（包括句法和形态变化）和词语搭配习惯常常被忽视。汉语部分的每一个汉字都

按原有词序，从上到下被替换为固定的民族语言词语。有时甚至不使用民族语言中已有的词语，而是采用音译的方法，用民族文字转写汉字音。例如，以下是《西番馆来文》中的一个例子：

【汉文】臣　　欲　奋　　力　　勦　　杀　不　係　领　勅　人　数

【藏文】blon-po ’dod hwun she-mong tshar-gcod bsad ma hi rin ’ja’-sa mi’i grangs

【汉文】难　　以　调　兵

【藏文】dka’-ba yi ti’u bing

(复旦本《西番馆来文》（第一篇）)

原文每一篇都是先有汉文，后有藏语译文。为了对照方便，本文将汉文放在上行，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放在下行。汉字和藏语词的对应关系一般都是固定的，如“臣”对应 blon-po[10]，“欲”对应’dod[11]，“力”对应 she-mong[12]等。但是，有些字（加方框线的部分）在藏文译文中并未作意译，而是只作音译（拉丁字母转写下划线部分），这类词在“杂字”中均未见。除了《西番馆来文》以外，《回回馆来文》、《女真馆来文》、《鞑靼馆来文》和《高昌馆来文》中也有这类音译词。我们认为这类音译词大部分不是民族语言中已有的汉借词，而是编撰“来文”时临时创造的。

《高昌馆来文》还有另一种音译类型[13]，即在将汉字翻译成维吾尔语词的同时，还加上了汉字音译，形成意译与音译并列的形式。意译词和音译词中间通常插入一个连接成分“b”。如：

【汉文】望　　天　皇帝　怜悯

【维文】inayat b 'WNK tngri qaγan irinčkäp b LAN MYN

(柏林本《高昌馆来文》（第一篇）)

这一段维文里，“望”、“怜悯”两个词采用“意译音译并列”的方式，维语译文中加下划线的“inayat”、“irinčkäp”是意译，加波浪线的“'WNK”、“LAN MYN”是音译。

在《百夷馆来文》和《八百馆来文》中，每篇文书分为若干段落，每段先被意译成民族语言，然后再用民族文字进行全文音译[14]。如《百夷馆来文》：

---

[10] 《杂字》135“臣”，卜乱-播 blon-po。

[11] ’dod 一词，《杂字》未见。’dod pa, “to desire with the mind” (Das 1902/1997:690)。

[12] 《杂字》214“力气”，舍-蒙 she-mong。

[13] 《高昌馆来文》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关于《高昌馆来文》音译词的详细情况，参见庄子仪（2018）、更科慎一（2021）。

[14] 泉井久之助（1949）最早指出《百夷馆来文》中存在“先意译后音译”的交错语体现象，

【汉文】普天下地方都是天皇帝管理

【百夷文】tuau phaa nöw nin kå-lak möng phaa-wång-tie siang yau（以上为意译部分）｜phu thäñ-haa tii-phang tu chii thän-hang-ti kuan-li（以上为音译部分）

（东洋文库本《百夷馆来文》 （第一篇））

《缅甸馆来文》又是另一种类型。根据前贤的报告和作者所见，所有文书中的缅文部分都是汉文音译，没有意译部分。这就是说，《缅甸馆来文》中的“缅语文”实际上是汉语的缅文转写[15]。

2.2 关于本文材料

本文从乙种本“来文”中选择了缅甸、百夷、八百、西番四种语言的材料来概述“来文”所见汉蕃对音的音韵特征，分析对象就是上一小节 2.1 介绍的，用民族文字音译的汉字音部分。选用这四份材料的理由如下：一、被音译的汉字数量较多；二、用来音译的文字均属于古代印度婆罗迷文系统，辅音字母和元音符号比较齐全，能够对汉语语音进行比较细致的描写。

资料中汉蕃对音的字数如下：

《缅甸馆来文》，出现 732 个字（不重复字数，下同）（更科 2024a）

《百夷馆来文》，出现 364 个字（更科 2022a）

《八百馆来文》，出现 355 个字（更科 2022b）

《西番馆来文》，出现 311 个字（更科 2023）

2.3 关于转写

本文的拉丁字母转写主要沿用了上述拙作（更科 2022a, 2022b, 2023, 2024a）中的方法，但为了字符统一，做了若干必要的调整。

三、“来文”汉蕃对音的特点

3.1 前言

本文以作者已发表的文章（更科 2022a, 2022b, 2023, 2024）为基础，分声母、韵母、声调，概述乙种本四种“来文”所见的汉语音韵特点以及民族文字音译的方式。

但他未对其音译部分的汉语音韵进行分析。《八百馆来文》的版本中只有柏林本采用了意译和音译交错的形式，东洋文库本和《西域同文表》本缺乏音译部分。泉井先生对《八百馆来文》也进行了研究（泉井久之助 1953），但因为他使用的是东洋文库本，所以泉井久之助（1953）中未提及音译部分。有关《八百馆来文》文本的详细情况可参见更科（2022b）。

[15] 荻原弘明（1965）、西田龙雄（1970）、钟智翔（2010:125）都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对“来文”中汉蕃对音的音系进行全面描述，而是选取了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关于“来文”资料中鼻音韵尾的转写问题，作者另有专文讨论（更科[待刊]）。

3.2 声母

3.2.1 总体情况。四种“来文”都具备全浊声母“平送气仄不送气”的特点，这与《老乞大》、《朴通事》、《西儒耳目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明代资料一致，但不同于《洪武正韵》。微母的存在与否不太明显，因为四种民族文字均不能区分零声母合口呼和浊的轻唇音([v], [ʋ]等)。资料中也未发现以 m 标微母的例子。尖团音的区分一般非常清晰，但在《八百馆来文》和《缅甸馆来文》中存在一些可疑的例子[16]。

本文将对疑母和知章系声母的对音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3.2.2 疑母。作为声母的 ŋ-，在缅甸语、百夷语、八百语、西番（藏）语四种语言中都以辅音字母的形式存在，而且在现代的后裔语言（现代缅甸语、德宏傣语、北部泰语、现代藏语）这一声母都仍然读作 ŋ-。因此，在明代，这个声母读作 ŋ-（舌根鼻音）是毋庸置疑的。现从“杂字”举几个例词（每个例词中的数字为该词条在“杂字”中的序号，双引号内为汉语条目，分号左侧为音译汉字，右侧为民族文字的拉丁字母转写。下仿此）：

《缅甸馆杂字》：169“鱼”，阿：ŋa；279“哭”，偶：ŋow；
554“银”，位：ŋwe

《百夷馆杂字》：168“芝麻”，阿罗：ŋa’ lå ; 192“龙”，额：ŋök；
195“蝎”，命蓊：miaŋ ŋoŋ

《八百馆杂字》：48“影”，奥：ŋau；612“银”，恩：ŋön；
224“柑”，抹耶：hmaak ŋä

《西番馆杂字》：535“五”，剌：lŋa；356“鹅黄”，吾儿渴：ŋur-kha；
553“我”，额：ŋed

如果“来文”中有使用 ŋ-字母来拼写汉字音的例子，那么该汉字音很可能具有 ŋ-声母。“来文”中疑母字的对音情况详见表 2。

[16] 关于“来文”的尖团问题，本文作者做过报告（更科 2024b）。

表 2：“来文”中部分疑母字的对音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西儒耳目资》(供比较)
牙	疑麻平二开・假	yaa	—	yaa	ñaa	ia 阳平
月	疑月入三合・山	wac	—	we	wää	iue 入
我	疑哿上一开・果	ŋå	—	ʔå	ŋå	go 上
宜	疑支平三开・止	ʔip	yi	—	—	ni 阳平、i 阳平
议	疑寘去三开・止	ne	—	—	—	ni 去、i 去
逆	疑陌入三开・梗	yyii	—	—	—	nie 入
五	疑姥上一合・遇	ʔuu	—	wu	wuu	u 上
鱼	疑鱼平三合・遇	—	yu	—	—	iu 阳平
眼	疑产上二开・山	yyañ	—	—	—	ien 上
原	疑元平三合・山	wañ	yon	—	wään	iuen 阳平
银	疑真平三开・臻	yin	—	yin	yin	in 阳平
仰	疑养上三开・宕	yaŋ	nyaŋ	—	yaŋ	—
硬	疑映去二开・梗	yiŋ～ʔiŋ	—	—	—	im 去

实际上，“来文”中出现的疑母字绝大多数都标记为 y, w, ʔ等，没有鼻音成分。《八百馆来文》中“牙”字的标音使用了 ñ 字母，这个 ñ 实际上表示/y/，而非鼻音[17]。因此，可以认为“来文”中的疑母字基本上已经演变为零声母。但是，有一个例外：“我”字在《缅甸馆来文》和《八百馆来文》中的标音都带有 ŋ-声母，这表明当时的官话中可能就是 ŋ-声母。不过，在《八百馆来文》中，这个字记作ʔå，表示带零声母。所以，可以推测，除去《八百馆来文》，其他三种“来文”所描写的汉语里，/ŋ/声母仍然存在，尽管大部分的古疑母已经消失，演变为零声母。此外，还有《缅甸》中“议”字记作 ne，《西番》中“仰”字记作 nyaŋ[18]，可以被视为古疑母的遗留现象。

另外，有四个非疑母字（其中三个是影母一等开口，一个是云母三等合口）却带有 ŋ-声母。这四个字在《西儒耳目资》中也多带 g-(/ŋ/)声母，这应该是实际语音的反映。唯有在《八百》中，除了“恩”字带 hng-以外，其余三个字都不带鼻音声母。详见表 3：

[17] 参见更科（2022b:94）。

[18] nyaŋ 的声母由基本字母 n（ན）和下置字母 y（ྱ）构成，并非 ñ（ཉ）。ny-这个组合在藏文中很罕见，可能是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记录汉字发音。

表 3：“来文”中非疑母字带 ŋ 声母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西儒耳目资》
安	影寒平一开・山	ŋan	ŋan	ŋan	ʔaan	gan-阴平
鞍	影寒平一开・山	ŋaM	—	—	ʔaan	gan-阴平
恩	影痕平一开・臻	ŋon	—	ŋön	hŋään	gen-阴平
位	云至去三合・止	ŋwe	—	—	wuuy	uei 去、goei 去

综上所述，从“来文”的拼写形式看，古疑母字大部分已不保留舌根鼻音，演变为零声母，尤其是在《八百》中。但“我”、“安鞍”、“恩”、“位”等少数字仍保留了 ŋ-。

3.2.3 知庄章组声母。

知庄章组声母的问题相对复杂，所以讨论其在“来文”里的对音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民族语言中的齿音声母及其在“杂字”音译汉字的对音关系作一说明，以明确民族文字相关字母的音值。四种民族语言都有齿音声母，其中藏语的齿音系声母分两个发音部位：c, ch, j, sh, zh 属于一系，ts, tsh, dz, s, z 属于一系。一般认为前者是舌面前塞擦音和擦音，后者是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其余三种语言的齿音声母只有一个发音部位，包括 c, ch, s 三个辅音。《八百馆译语》所描写的八百文还保留了浊音字母，因此有 c, ch, j, s, z 五个。下面表 4 是四种“杂字”中的字母和音译汉字声母的对应关系。

表 4：“杂字”四种对音材料中汉语齿音声母的对音情况

		对音字中古来源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I 类	塞擦音	精组	—	ts, tsh, dz	—	—
	擦音	精组	s	s, z	s	s, z
II 类	塞擦音	知庄章组	c, ch	c, ch, j	c, ch	c, ch, j
	擦音	庄章组	—	sh, zh	—	—

Ⅰ类塞擦音及擦音，四种语言里均对应精组（精清从心邪），所以发音部位应该是舌尖前部。Ⅱ类塞擦音及擦音在四种族语言里则对应知庄章组（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虽然Ⅱ类的具体发音部位难以确定，但毕竟与Ⅰ类有所区别，可能位于舌叶或者舌面前部。除了西番（藏）语外，其他三种语言中，擦音属于Ⅰ类，塞擦音属于Ⅱ类，发音部位有所不同。

在了解“杂字”中汉语齿音声母和民族语言辅音的对音关系后，我们再来看“来文”中的对音情况。

首先，来看精组。下面表 5 是“来文”中汉语精组声母和民族文字辅音的对应情况。

表 5：“来文”中精组：精清从心邪的对音情况

		对音字中古来源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塞擦音	不送气	精、从仄；邪	c	ts, dz	c 洪/s 细	s, z
	送气	清、从平；邪	ch	tsh	s；ch 此抢	s, z
擦音		心、邪	s	s, z	s	s, z

在《西番》中，精组字整齐地对应 ts, tsh, dz, s, z。然而藏文的清浊（ts/dz, s/z）与汉语的清浊并不对应，而是与当时汉语的声调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下文 3.3 将详细讨论）。

在《缅甸》中，精组字也整齐地对应 c, ch, s。上面提到在《缅甸馆杂字》中，虽然 s 对应心邪两母，但是 c 和 ch 并不对应精组，而是对应知庄章组。“来文”中精组塞擦音与 c, ch 对应是因为缅甸语缺乏[ts][tsh]之类的声母，而采用了与其相近的发音。

《百夷》中，不送气声母的对音较为特殊，洪音对应 c，细音对应 s，发音方式不同。其原因目前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送气音和擦音的对音字母基本上都是 s，说明/tsh/和/s/混同。需要注意的是，在送气音中“此”chii、“抢”chang 二字的标音出现了 ch-，属于例外情况。

在《八百》中，精组声母的标音基本上都是 s-或 z-。s-和 z-的区别并非反映古汉语清浊的对立，而是与汉语声调的区别有关。这一现象也见于《西番馆来文》，拟在下文 3.3 中探讨。

在百夷、八百两种“来文”中，精组塞擦音的标音多出现擦音 s(z)而较少出现塞擦音 c, ch，这是为什么？从“杂字”的对音关系看，百夷、八百两种语言的 s(z)的音值是舌尖前音[s]，c, ch 的音值是舌面前音[tɕ, tɕʻ]或舌叶音[tʃ, tʃʻ]。而汉语的精组塞擦音是舌尖前音，发音方法上接近 c, ch，发音部位上却更接近 s(z)。因此，给这类字注音的人似乎更重视发音部位，选择了 s(z)作为标音。

下面表 6 和表 7 展示了舌上音、正齿音二三等声母和民族文字辅音的对应情况。

表 6：“来文”中知組二等(知彻澄)和庄组(莊初崇生)的对音情况

		对音字中古来源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塞擦音	不送气	知庄澄仄崇仄	c	dr	c	—
	送气	彻初澄平崇平	ch	ch	ch；s 剿[19]	ch；j 差；z 差
擦音		生崇仄	s, hr, sr	sh, zh, shr	s；ch 使事	s；ch 产

表 7：知组三等知彻澄、章组章昌船书禅以及日母的对音情况

		对音字中古来源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塞擦音	不送气	知章澄仄	c	c, j, dr	c	c, j
	送气	彻昌澄平船平禅平	ch	ch	ch	ch；z 陈臣
擦音		书船仄禅	s, hr, sch	sh, zh, shr	ch；s 束水圣；c 烧	s, z
通音		日	r	r, gzh；ŋ 迩	y, l, ʔ	y, ñ

表 6 和表 7 中的不送气音，当时汉语声母可以拟定为/tš/（š 代表舌叶音或舌面前音）；送气音，汉语声母可拟定为/tšh/；清擦音，汉语声母可拟定为/š/。“通音”是日母，其发音部位与/t š, tšh, š/一致，发音方法为通音 approximant（或许带弱摩擦），我们拟定为/ř/。

在《西番馆来文》中，舌上、正齿音的标音原则上不区分二等和三等，一律使用 c/j, ch, sh/zh。例如，二等初母“册”cha’i 和三等昌母“倡”chaŋ 都用 ch-，二等生母“使”、二等崇母“事”、三等禅母“视”都记作 shi，未作区分。又二等生母“所”记作 zho，三等昌母“寿”记作 zhi’u，二三等都用 zh 标音。有一些标记使用了带下置字母-r-的 dr, shr。例字共有 6 个，其中“剳”知二 dra、“师”生 shri、“使”生 shri 是二等，“知”知三 dri、“之”章 dri、“指”章 dri’i 是三等，二等和三等共存。

若仔细观察，几个例子中似乎仍然能看到二等和三等的区别。如：二等“搀”初 chan：三等“阐”昌“禅”禅 chen；“善”禅“陕”书 shen，这些例子似乎体现了二

[19] 表格中，某一个字母的用例少于四例时，揭示其例字。

等 -an 与三等 -en 的对应关系。然而，三等日母“然”字却被标作 gzhan，而不是 gzhen，只能视作例外情况。

在《缅甸》中，舌齿音同样不区分二三等：不送气音用 c 表示，送气音用 ch 表示。擦音的情况则非常复杂，资料中符合条件的 52 个（不重复）汉字竟然采用了 15 种不同的写法：s, sy, sw, syw, chy, chw, sr, r, hs, hsy, hsyw, hcy, hch, hr, hsch（在表 6 和表 7 中列出时省略了介音成分-y-, -w-和 h-）。这 15 种写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类型：

1) 基本字母为 s，无介音-y-（s, sw, sr, hs）

2) 基本字母为 s，有介音-y-（sy, syw, hsy, hsyw）

3) 基本字母为 c/ch，无介音-y-（chw, hch）

4) 基本字母为 c/ch，有介音-y-（chy, hcy）

5) r 和 hr

6) 特殊结合 hsch（h+s+ch，仅见于“时”字的标音：hschi）

三等的书船禅母出现在所有类型中，而二等的生母、崇母字只出现在类型 1、2 和 5，尤其集中在 1（12 例中占 8 例）。从“杂字”的对音上，缅文字母 s 与汉语齿头擦音(心邪)对应，c 与汉语的舌上/正齿二三等塞擦音对应这一事实看来，“来文”二等生母、崇母的记音多为 s（且大多数是类型 1，不带 y 介音），表明其“颚化性”较少，其音值可能是舌尖后音[ʂ]或舌尖前音[s]。

在《百夷》中，舌齿音二三等的对音在塞擦音的情况下基本上是 c（不送气音）或 ch（送气音），二三等的区别原则上反映不出来。在擦音的情况下，对音是 s 或 ch，具体对音如下：

1) s

二等：杀 sak；生 söng；数 sok；瘦 sow

三等：束 sok；水 soy；圣 siaŋ

2) ch

二等：使事 chii

三等：擅 chan；上尚 chaŋ；设舍 chie；侍十世是拾势 chii；失 chik；守收 chiw；书 chu

二等字记作 s 的比较多，三等字记作 ch 的比较多。“来文”里 s 也多用来标记齿头音心母、邪母、清母、从母仄声，表明二等字的 s 的性质与齿头音接近。而 ch，“来文”里还用来标记送气的舌齿二三等声母。“杂字”的 ch 也经常与音译汉字舌齿二三等送气音声母对应，因此 ch 作为百夷语的音值应该是[tɕʰ]或[tʃʰ]而不是舌尖前音[tsʰ]，也不是擦音[ɕ]([ʃ])。这解释了为什么‘来文’中许多三等字被标记为 ch，这

是因为注音者更重视发音部位的一致性，而非发音方法。可见“来文”所描写的汉语里，正齿音三等字“颚化性”比二等字更强。只有“束水圣”三个字被标记为 s-，这可能是记音不正确，或者这三个字的声母已经演变为[s]或[ʂ]的音值。

在《八百》中，舌齿音二三等的对音为：塞擦音为 c（不送气）、ch（送气），擦音为 s。另外还出现了浊音字母 j, z。正如前文所述，《八百》中的清浊实际上与汉语的声调有关，在声母的标音上将 j、z 分别视为 c 和 s。与《百夷》不同，《八百》没有用 ch 标记擦音的例子（参见表 6、7 的“擦音”一栏）。虽然有 chan“产”（生母）的例子，但此字在很多现代方言中发音都为[tʂʰ]声母，在当时也念送气音的可能性很大，在此应该将其排除在外。由此可见《八百》的标音不但不区分二等和三等，而且在擦音连齿头音（心邪）和正齿音（生书禅等）都不分，一律写作 s/z。

《八百》的 j 和 z 还有几个对应于汉语/tšh/（正齿清送气音）的例子，构成例外：陈澄母臣禅母 zïn，差 jai~zuuy[20]。这些对音确实不易解释。共同台语（Proto-Tai）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泰国语、老挝语等语言变为清送气音，《八百馆杂字》也能找到一个 420“喜”彭寨：böŋ cai 的例子，八百文浊音字母 b 与音译汉字“彭”（并母平声）的/ph/相对应，西田龙雄（2001:742）据此例怀疑八百语中的 b 已经开始清送气化，但除此例外，《八百馆杂字》中并未发现浊音声母变清送气音的其他例子[21]。事实上，böŋ cai 一词在《八百馆杂字》中共出现三次（除上述“喜”外，还出现在“欢呼”(741)、“乐业”(753)），其余两个例子（741 和 753）中，与 böŋ 的音译汉字在复数版本（如柏林本）中写作“崩”（帮母平声）。西田龙雄（2001:742）也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八百语的 d 和 b 在当时仍保留浊音。此外，《八百馆杂字》中也没有 z 和 j 被用来音译送气音的例子。因此，将“陈臣差”三字里出现的 z, j 解释为送气音，虽然从汉语的角度上看是合理的，但从八百语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并不可靠。

总之，在四种“来文”的对音中，舌齿音二三等的区分不太明显，主要原因在民族语言齿音系声母分类不够细致，无法反映汉语二三等的细微区别。然而，仔细观察《缅甸》和《百夷》的标音，仍可以窥见这两套声母在发音部位上的差异，可以说三等的颚化程度比二等更强。

---

20 “差”，“来文”中常以“派遣”义出现，有时标作 jai，有时标作 zuuy。后者标音含 uu 元音是不常规的。

21 但是，在《八百馆来文》里，确实还有浊塞音对应送气音的例子，就是用八百文 g 标记汉语/kh/，如颗 gå、孔 gååŋ、求 giiw，与 g 标记/k/的例子（如敢感 gaan、缴 gääw、景 giiŋ）共存。参见更科（2002a:95）。

3.3 韵母

3.3.1 总体情况。韵母的问题较为复杂，本文仅对 i 类韵母和入声韵母的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

3.3.2 i 类韵母。所谓的“i 类韵母”，指的是来源于古汉语的止摄开口、蟹摄三四等开口、曾梗臻深摄三等开口入声诸字的韵母[22]，《中原音韵》在三支思韵和四齐微韵。

“来文”的四种语言都有 i 元音（除藏文外，字面上都还要分长短：i 和 ii），常用于汉语的 i 类韵母的标记。在同样的条件下，《缅甸》中还出现了 e，出现的条件尚不明确。例字详见表 8：

表 8：四种“来文” i 类韵母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以	以止上三开・止	yi	yi	yii	ʔii
帝	端霁去四开・蟹	tii	—	tii	tii
匹	滂质入三开・臻	phii	phi	phii	phii
赍	精齐平四开・蟹	cik	dzi	sii	sii
意	影志去三开・止	ye	g-yi	—	—

部分唇音字在标音上显示合口介音的痕迹，其情况大体上与《西儒耳目资》以及现代普通话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具体情况详见表 9：

表 9：四种“来文”唇音声母+i 类韵母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耳目资	现代北京
婢	并纸上三开・止[23]	pi	—	poy	pii	pi 去	pi 去
被	并纸上三开・止	pe	pi	—	pii	pi 去	pəi 去
備	并至去三开・止	pe	pi	poy	—	pi 去	pəi 去
非	非微平三合・止	fin[24]	hwu’i	—	—	fi 阴平	fəi 阴平

当 i 类韵母与齿音声母结合时，对音材料中还出现了其他元音字母。以下将对此

22 有必要的话，还兼顾到合口字。

23 “婢”字属重纽 A 类，韵图在四等。

24 韵尾-n 费解，可能是《来文》作者的误写。

进行详细讨论。

精组+止摄开口（见表 10），在《西番》中都标作 i。在《八百》中则标作 ï（后（或央）高展唇元音）。由于八百语中高展唇元音有 i（前）和 ï（后）之别，《八百》选用后元音 ï，意在标记舌尖元音[ɿ]。在《缅甸》和《百夷》中，多数标记为 i（或 ii），《缅甸》部分字还被标记为 e。此外，还有部分心母字出现了 sow（缅甸）/söw（百夷）的标记，可以解释为对舌尖元音[ɿ]的描写（后详述）：

表 10：四种“来文”精组+止摄开口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子	精止上三开・止	cyii	—	cii	zïï
此	清纸上三开・止	hchi[25]	—	chii	zïï
次	清至去三开・止	che	—	sii	sïï
司	心之平三开・止	sii	si	söw	—
死	心旨上三开・止	sye	—	—	zïï
四	心至去三开・止	sow	si	sii	sïï

我们认为，这类字的韵母在“来文”的汉语音系里应该全部读舌尖元音[ɿ]。《缅甸》、《西番》、《百夷》所见的舌面元音 i（或 e），并不能视为实际的汉语音，而是一种利用近似音的宽式记音。由于四种语言中都没有舌尖元音[ɿ][ʅ]，其母语者将汉语的舌尖元音听做他们的[i]元音，所以才把它写成 i（八百语除外）。八百语存在[ɯ]，听觉上与[ɿ]比较接近，所以才标记为 ïï。百夷语有[ɤ]和[ɯ]（两者都写作 öw，字面上没有区别），但与《八百》不同，这个 öw 只适用于部分心母字的标记，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标作 i。至于《西番》，由于其语言连[ɤ][ɯ]这类元音都没有[26]，只能标作 i。

知组+止摄开口（见表 11）。四种“来文”都标作 i（《缅甸》中还出现了 e）。《西番》中“知”记作 dri，下置字母-r-只能解释为卷舌成分的描写。因此，这类字至少在《西番》的汉语基础方言里可能发音为[tʂʅ] [tʂʰʅ]。

[25] 亦作 hchii。

[26] 藏文只有五种元音，即 a, i, u, e, o。

表 11：四种“来文”知组+止摄开口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知	知支平三开・止	cii	dri	cii	cii
置	知志去三开・止	ce	—	cii	—
治	澄志去三开・止	ci	ci	cii	—
迟	澄脂平三开・止	—	—	chii	—

章组+止摄开口（见表 12）。情况与知组类似，但在《缅甸》中，“是”字（以及表中没列出来的“侍”禅志去三开・止、“恃”禅止上三开・止）的标音出现了 ow。《西番》中，“之”（以及表中没列出来的“指”章旨上三开・止）记作 dri。

表 12：四种“来文”章组+止摄开口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之	章之平三开・止	cii	dri	—	cii
支	章支平三开・止	—	ji	—	—
只	章纸上三开・止	ce	—	cii	cii
旨	章旨上三开・止	cyii	—	cii	cii
齿	昌止上三开・止	hchii[27]	—	—	—
时	禅之平三开・止	shchii	—	—	sii
是	禅纸上三开・止	sow[28]	—	chii	sii

庄组+止摄开口（见表 13）。缺少塞擦音的例子。《缅甸》中出现了标记为 ow 的情况。

表 13：四种“来文”庄组+止摄开口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事	崇志去三开・止	soow	shi	—	sii
使	生止上三开・止	sow	shi~shri	chii	sii
师	生脂平三开・止	swow	shri	—	—

[27] 亦作 hchi。
[28] 亦作 soow。

知三、章组入声字（见表 14）。缺乏庄组例子。各“来文”的韵母标记都是 i（或 ii）。

表 14：四种“来文” 知三、章组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勅	彻职入三开・曾	chii	—	chii	chii
隻	章昔入三开・梗	cii	ji	cii	cii
十	禅缉入三开・深	syi	—	chii	sii
失	书质入三开・臻	—	—	chik	—

蟹摄开口三等（表 15）。各“来文”的韵母标记大都是 i（或 ii），但《缅甸》出现的两个例子都是 chye，元音是 e。

表 15：四种“来文”蟹摄开口三等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制	章祭去三开・蟹	—	ci	—	—
世	书祭去三开・蟹	chye	—	chii	—
势	书祭去三开・蟹	chye	—	chii	—

上面讨论的 i 类韵母的对音情况可归纳如下，见表 16：

表 16：四种“来文” i 类韵母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止摄开口精组	i, e, ow	i	i, öw	ï
止摄开口知组	i, e	i	i	i
止摄开口章组	i, e, ow	i	i	i
止摄开口庄组	ow	i	i	i
入声字知三章组	i	i	i	i
蟹摄开口三等	e	i	i	—
唇音	i, e	i, u’i	i, oy	i
其他声母	i, e	i	i	i

《八百》中，止摄精组写作 ï，其余写作 i，说明《八百》的标记法能区分汉语中的[ɿ]和[i]。其他“来文”大多使用 i 来反映这些音，因为这些语言没有舌尖元音，所以无法区分[ɿ]和[i]。但《缅甸》的 ow 和《百夷》的 öw 很可能是对[ɿ]音的描写。

首先来看《百夷馆译语》的 öw。百夷文的元音字母 ö，相当于缅文的 o，是 i(◌ိ)和 u(◌ု)的结合。在“杂字”中，ö 不出现在开音节中，而是以 öw 的形式出现。在这里，-w 不对应于任何成音段音位，可以理解为一个虚设的辅音字母。《百夷》中含 öw 的汉字标记有：

梗摄二等入声字：百（pöw）、革（köw）

曾摄一等入声字：墨（möw）、得（töw）、勒（löw, röw）

曾摄三等入声字：职（cöw）、色（söw）

曾摄一等舒声字：能（nöw）

止摄三等舌上音声母字：知（cöw）

止摄三等舌头音声母字：泥（ñöw）

这些音节的元音大体上与现代德宏傣语的 ɯ、ə 对应，如 60“（地）名”，知（猛）：cöw，德宏傣语 tsɯ1“名，名字”；419“手”，墨：möw，德宏傣语 mɯ2“手”；续 142[29]“虎”，色：söw，德宏傣语 sə6“虎，豹的总称”[30]。西田龙雄（1960）也给“杂字”的 öw 构拟了 ɯ、ɤ 的音值。与 öw 对应的音译汉字也支持其音值是后高或后半高的展唇元音。“知”和“泥”的例子似乎显示有时 öw 的舌位更高、更前一点，接近[ɨ]。基于从“杂字”中得知的音值，解释 öw 的拼写形式在“来文”中表示汉语的舌尖前部元音[ɿ]，是十分可能的。

再来看《缅甸馆译语》中的 ow。《缅甸馆杂字》里，缅甸语的 ow 韵母一般与音译汉字的流摄一三等字对应，如某（mow）、垢（kow）、咒（cow）、谬（myow）等。但当 ow 与 p, ph, r 声母以及 Cr 形复声母拼合时，与此相对的音译汉字就是遇摄一等字/通摄三等入声字，如补（pow）、普（phow）、肉（row）、某路（mrow）、克路（khrow）等。据此可以认为缅甸语的 ow 具有类似[ou]或[ᵒu]的音值，带圆唇成分。这样的音值与[ɿ]相差甚远，很难解释为什么 ow 在“来文”里被用来标记“四；是事使师”等字的韵母。西田龙雄（1972:210）提到“来文”“师”字写作 swow 的

29 乙种本各种语言“杂字”除了正文以外，还有增补词汇。在已发表的拙作中，本文作者管正文叫“正编”，管增补部分叫“续编”。“续 142”表示增补词汇第 142 条词目。

30 德宏傣语语音形式和汉义引自周耀文、方峰和、郗卫宁（2005）。

问题时说：“……又，部分-ɿ元音转写为-ow，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把“师”字转写为 swow‘suəu’？这些问题在这里是很难解答。但是可以期待，百夷馆来文所见的汉字音转写或许会提供一些重要线索。这一问题还要留待他日考察。”西田先生很敏锐地关注到了《百夷馆来文》，暗示《百夷》用 öw 来标记汉语[ɿ]可能与《缅甸》的 ow 有关。然而，据我们所知，他并未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继承西田先生的思路，进一步认为《缅甸》的“师”swow 类拼写方式并非基于 ow 在缅甸语的音值，而是受到百夷文译写汉字音方式的影响。

既然明确《百夷》的 öw 和《缅甸》的 ow 都用于标记汉语[ɿ]，那么可以推测《缅甸》止摄开口庄组“事使师”和止摄开口章组“是侍恃”的标音里出现的 ow，也是在描写[ɿ]，即这些字读作[sɿ]。这表明，《缅甸馆来文》所描写的汉语里掺杂了某种庄章组字在止摄与精组合并的方言。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流摄和梗摄的字中，如“瘦”（生宥去三开・流），在《缅甸》中写作 hsow，其声母为 hs-（前置辅音 h-的职能暂不明）；“生”（生庚平二开・梗），《缅甸》写作 song，声母是 s-。另一方面，“争”字（庄耕平二开・梗）的标音是 cing，含 i 元音，暗示声母颚化，与章组字“正”cing 一致。《缅甸》甚至还有“政”（章劲去三开・梗）标作 cong 的例子，含 o 元音，暗示声母并非颚化辅音，而更像[ts]、[tʂ]。可见《缅甸》所描写的汉语音并非纯粹的、单一的，而是杂凑的。考虑到缅甸语的地理位置，《缅甸》记录的汉语音，可能是当时云南一带通用的“地方普通话”。

3.3.3 入声韵母。

塞音韵尾。四种“来文”的汉字音标记中偶尔记有塞音韵尾，如：

《缅甸馆来文》：八 pat、答 tat、活 hyac、李 lip、革 kok、帽 hmåk、……

《西番馆来文》：掠 ryog、德 dad（仅此二例）

《百夷馆来文》：杀 sak、得 tök、业 yac、纳 nap、挖 wat、去 khwat、……

《八百馆来文》：雀 chååk、百白 pök、途土 dhuuk、路 luuk（仅此六例）

一般说来，这些塞音韵尾在“来文”的汉蕃对音材料中很少出现（尤其是在《西番》和《八百》中），其分布也不成系统，也不一定与中古入声韵尾-p、-t、-k 一致（甚至非入声字也带上塞音韵尾，如上例中的“李”、“帽”、“去”、“途”、“土”、“路”）。而且大部分的旧入声字以开音节的形式出现。我们认为，“来文”中的大部分塞音韵尾并不反映当时汉语的实际发音，也不是“存古”的写法（译音对勘资料一般不反映比资料年代更古的语音，只能反映当时的实际读音），有的是无意义的成分，有的则是从“杂字”中的对应关系类推出来的拼写法[31]。

[31] 西田龙雄（1972: 199）也持类似观点，他在《缅甸馆来文》中发现了许多与“杂字”平行

《缅甸》塞音韵尾的使用还有缅文拼写特点的原因。由于缅文元音 o 后面必须有辅音韵尾-w、-n、-k，所以如果要描写一个音色与缅语 o 接近的汉语元音，就必须添加-k，不管在那里有没有-k[32]。另外，《缅甸》有的拼写形式未见于“杂字”，如“俗”suk、“浴”yuk 中的 uk 这个拼写形式就不见于“杂字”。如果 uk 不见于缅甸语固有词，而是“来文”独有，那么就不能认为它是“杂字”对音的类推，也就是说，写-k 是有汉语音根据的。我们认为这类-k 的意图可能是喉塞音[ʔ][33]。

《百夷》出现-p 韵尾用例“纳”nap 和-t 韵尾用例“挖”wat、“去”khwat，这两种韵尾在《百夷》汉语标音中是十分罕见的。除了“去”的-t 找不到中古音方面的根据外，其他两个例字的韵尾恰好与中古音一致。这两个例子也许是南方方言音（粤语等）的混入[34]。

下面对-k 入声中部分曾梗江宕摄的韵母对音形式进行分析。通摄和-t、-p 尾入声字的对音情况没有特色可言，在此从略。

曾梗摄入声韵母的对音形式。先看开口韵的情况（表 17、18）。

表 17：四种“来文”曾摄一等开口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墨	明德入一开・曾	myac	—	—	—
得	端德入一开・曾	tok	—	tök	—
德	端德入一开・曾	—	dad	—	—
特	定德入一开・曾	tok	—	thök	—

表 18：四种“来文”梗摄二等开口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白	并陌入二开・梗	pok	—	pök	pök
百	帮陌入二开・梗	pac	—	pök	pök
責	庄麦入二开・梗	—	—	ce	—

的标音法，认为“来文”对汉字的有些标音是类推“杂字”对音关系而形成的。又，《百夷馆来文》里，ac 形式用于汉语“劫缺别绝截切业”等字韵母的标记，而“杂字”里含有 ac 的百夷语词则用“楪呆列歇结”等字音译。以上这些字《中原音韵》大多在车遮韵，在《百夷馆译语》的基础汉语方言也应该读[ie]。因此可以推测，“来文”中的对音关系“ac：/ie/”是从“杂字”的对音关系类推出来的，在此-c 不表示任何辅音。

[32] 参见更科（2024a: 132）的相关讨论。

[33] 同注释 34。

[34] 参见更科（2022a:150）。

冊	初麦入二开・梗	—	cha’i	—	—
革	见麦入二开・梗	kok	—	—	—
客	溪陌入二开・梗	khac	—	—	—

绝大多数用例都带-k 韵尾，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个-k 难以理解为中古-k 韵尾的遗留。《西番》的“册：cha’i”显示复合元音[ai]的形式，可能是元代汉语的遗留。其余的例子都显示单元音韵母的形式，说明四种“来文”的汉语基础方言属于现代北京话“文读音”系统。该系统又可分两套，一种是缅甸的 ok、百夷的 ök 和八百的 ök，这些都是半高的非前元音（[ə]或[ɤ]）。现把具有此类韵母的方言叫做“后元音型”的方言；另一种是缅甸的 ac 和西番的 ad，可以解释为半高的前元音（[e]或[ɛ]），具有这类韵母的方言叫做“前元音型”的方言。《百夷》中 e 的分类将在后文讨论。至于曾摄和梗摄的区别，从对音上看不出来，可能是已经合流了。

《缅甸》中 ok 和 ac 并存，甚至中古韵母相同的“白”pok 和“百”pac 也不同音。这表明，《缅甸》的汉语基础方言可能至少有两种来源，一种属后元音型，另一种属前元音型。

《百夷》中在“责”一例出现-e 对音。由于百夷语半高展唇元音有前（e）/后（ö）的对立，这个 e 就只能解释为前元音[e]或[ɛ]。《百夷》的“责”字，当然可以归为前元音型，但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责”声母为正齿音，虽然是“颚化性”较弱的庄母字，其音值仍然可能是舌面前音或者舌叶音，从而导致主要元音前化，读为[e]或[ɛ]。这是一种条件性的音位变体，在具有后元音型特征的方言中也可以出现。因此，《百夷》中的“责”并不能决定其方音属性：既可以是前元音型，也可以是后元音型。

综观四种“来文”材料，可以说曾梗摄一二等开口入声字的韵母读作单元音，后元音类型（[ə]或[ɤ]）是当时官话的主流，而前元音类型（[e]或[ɛ]）则作为地方变体。

再来看合口韵的情况（见表 19、20）。

表 19：四种“来文”曾摄一等合口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国	见德入一合・曾	ku	gui	kwe	—
惑	匣德入一合・曾	hwac	—	—	—

表 20：四种“来文”梗摄二等合口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获	匣麦入二合・梗	hwac	—	—	—

曾梗摄合口入声字的材料较少，《八百》中没有相关用例。曾摄合口“国”的读音，三种语言的“来文”中存在差异。《西番》的 gui 可以理解为复合元音，是元代汉语的遗留。《缅甸》的 ku 显示单元音类型（即无-i 韵尾），可能描写了类似[kuə]的音节。《百夷》的 kwe 出现前元音 e[35]，属前元音型。

在《缅甸》中，还有两个-wac 韵的用例，元音偏前，属前元音型的形式。

最后，我们来看看**江宕摄入声韵母**的对音形式（见表 20）。

表 20：四种“来文”江宕摄二等开口入声字的对音情况

		缅甸	西番	百夷	八百
乐	来铎入一开・宕	law	—	—	hlå
各	見铎入一开・宕	kwau	—	kuak	—
角	见觉入二开・江	kwau	—	—	jå
雀	精药入三开・宕	chyå	—	cuak	chååk
约	影药入三开・宕	—	—	yuak	yå
跃	以药入三开・宕	—	yo	—	—

江宕摄入声字元音上的反映是：缅甸 aw, au, å; 西番 o；百夷 uak；八百 å, ååk。《缅甸》的 aw, au, å 在“来文”里还用于效摄和果摄的标音[36]。而在“杂字”中，aw 的用例未找到，au 的用例也很少[37]，只有 å 的用例很多。“杂字”里含 å 韵的缅甸语音节经常用效摄字音译，这表明 å 作为缅甸语发作复合元音[ɑu][38]。但作为“来文”中汉语音的标记，å 对应效摄的和果摄的都有，所以目前尚无法确定“来文”中的 å 是读复合元音[ɑu]或者读单元音[ɔ]（或[o]）。值得注意的是，缅甸语中只有带-u 韵尾

35 泉井久之助（1949）把百夷文拼写形式 we 转写为 ůå，要按照他的转写法，“国”字韵母拥有一种圆唇后元音，属后元音型。我们不采取他的转写。

36 详细情况参见更科（2024a: 115;120）。

37 au 在“杂字”的唯一的用例是“将”有蓋：yuu hrau（见于柏林本“杂字”的增补部分）。蓋，同蕊，《广韵》如累切（纸韵合口）以及如垒切（旨韵合口），今普通话读 ruǐ，韵母标作 au 有点费解。

38 参见西田龙雄（1972: 77-78）。

的[ɑu][ou]，而没有不带-u 韵尾的[ɔ]、[o]。“来文”中的 å 兼表效摄韵母和果摄韵母的原因也就在此，也就是说，用缅甸文记录汉字音的编者试图借着缅语的 å[ɑu]来标记汉语的[o]元音。aw, au 的形式，在功能上也与 å 一样。我们认为，鉴于整个乙种本《华夷译语》音译汉字-k 入声字普遍读作单元音（即“文读音”系统）这一大情况，《缅甸》宕江入声字也应该读作单元音[o]（也可以记作[ɔ]）。

《西番》中，除了“跃”yo 外还有两个宕摄入声字：恪（溪铎入一开・宕）khyo、掠（来药入三开・宕）ryog。这两个例子都不常规，“恪”属一等却有-y-；“掠”有罕见的-g 韵尾。

《百夷》中，宕江摄入声字韵母无一例外地都写作 uak，且与果摄韵母写法有区别（果摄韵母写作 å，如：可 khå、我ʔå、火 khå），这表明入声字很可能还保留独立的韵母。更科（2022a）把“来文”中的 uak 解释为/uo(ʔ)/，其中“(ʔ)”表示短促性。

《八百》中，宕江摄入声字韵母的标音以 å 为主，只有“雀”的韵母标作 ååk。前面提到《八百》中有六例带-k，但其中三个（即：途土路）并非古入声字，因此无法确定 ååk 中的-k 是否反映了入声的短促特征。

综上所述，四种“来文”中的宕江入声字都有后半高圆唇元音（[o]或[ɔ]），不带-u 韵尾。从《百夷》的情况来看，可能还具有短促性。考虑到汉语音系的一般情况，入声韵母仅部分保留短促性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推测，至少在《百夷馆来文》的汉语基础方言里，整个入声字仍保留了独立的入声，都具有短促性。

3.4 《西番》和《八百》的声调系统

3.4.1“来文”汉蕃对音声调研究的可行性。本文所涉及的四种民族文字——缅甸文、西番文（藏文）、百夷文、八百文，均不具备标记声调的手段，因此我们基本上无法通过“来文”的汉蕃对音来研究汉语声调。但是，在《西番馆译语》和《八百馆译语》中，民族文字字母的清浊与汉语声调的高低之间存在选择的倾向，利用此种对应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当时汉语的调值。

3.4.2《西番馆来文》。藏文有三十个基本字母，其中塞音(包括塞擦音)和擦音分为清音和浊音。清的塞音、塞擦音又分送气和不送气，只有不送气音与浊音形成对立。擦音没有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只有清/浊的对立。鼻音和通音无清浊之分，都是浊的。但是，如果上面带前置/上置字母，声调行为上与清辅音相当。如复辅音声母 dm-，由前置字母 d 和基本字母 m 组成，声调行为上相当于清声母。

在“来文”藏汉对音中，汉语的同一个声母（比如/k/）有的用清音类标记，还有的用浊音类标记，清、浊两类字母均有出现。如“灌”标作 kon，“官关”标作 gon。

“来文”藏汉对音中出现在声母位置，且构成清浊对立的字母如下表 21。

表 21：“来文”出现的藏文字母和汉语声母的对应关系

清音类	浊音类	对应的汉语声母[39]
p	b	/p/
t	d	/t/
ts	dz	/c/
c	j	/č/
	dr	
k	g	/k/
s	z	/s/
sh	zh	/š/
shr		
dm	m	/m/
gl	l	/l/
db	w	/∅/合
g-y	y	/∅/齐、撮

西田龙雄（1970）在研究《西番馆杂字》音译汉字时发现，以“清音类”开头的藏语音节多用去声字音译，而以“浊音类”开头的藏语音节多用阳平字音译。西田龙雄（1970）在解释“杂字”音译汉字时，参照了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音系，具体汉字的调类也依照《图经》进行。西田龙雄（1970）还以“来文”中抽出的藏汉对音作为旁证，初步揭示了部分“来文”汉字音声调和藏文字母清浊之间的关系。

更科（2023）从“来文”中提取了上述“清音类”和“浊音类”的藏文字母标记用例，并与汉字调类逐一核对，制作了统计表（表 22）。在统计过程中，汉字调类未按照《等韵图经》的系统，而是先将古汉语四声按清、次浊、全浊三类划分，再根据近代北方话的一般规律进行合并，但入声鉴于现代官话下属方言情况各异，未进行合并。这样得出了如下七个调类群：

阴平（<清平）

阳平（<次浊平、全浊平）

[39] / /号内的音位标记根据更科(2023)。

上声（<清上、次浊上）
去声（<全浊上、清去、次浊去、全浊去）
清入
次浊入
全浊入

表 22:《西番馆来文》藏汉对音藏文声母类和汉字调类的关系（根据更科 2023: 58-59）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清入	次浊入	全浊入	总计
清音类	11	1	3	55	4	5	1	80
浊音类	39	25	30	5	5	2	1	107

正如西田龙雄(1970)指出的那样，汉语去声字和藏文清音类字母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于藏文浊音类和汉语声调的关系，除了西田龙雄（1970）提到的阳平调以外，阴平和上声的对应也较为常见。

3.4.2《八百馆来文》。八百文属古高棉文系统，与当代泰文、老挝文、傣叻（西双版纳傣）文接近。八百文的辅音字母分清音类（也叫高音组）和浊音类（也叫低音组）两类，这一点与藏文十分相似。

表 23：八百文清浊两类辅音字母以及其与汉语声母的对应关系

清音类	浊音类	对应的汉语声母[40]
p	b	/p/
ph	br	/ph/
hm	m	/m/
B		
f	v	/f/
hw	w	/∅/合、撮
t	d	/t/
th	dh	/th/
	n	/n/

[40] / /号内的音位标记根据更科（2022b）。引用时对个别声母的记号做了改动，使和表 21 取得一致。

hl	l	/l/
D		(仅一例)
	r	(仅一例)
c	j	/tš, k/
ch	j	/tšh/
s	z	/s, š, ts, tsh, tšh, x/
	ñ	/∅/齐、撮, /ř/
	y	
k	g	/k/
kh	g	/kh/
hng	ŋ	/ŋ/
χ	γ	/x/
h		
ʔ		/∅/

更科（2022b）借助前述 3.4.1 提到的七个调类群，采用与 3.4.1 相同的方法，考察了汉语调类和八百文声母类的关系，结果如下表 24：

表 24：《八百馆来文》八百-汉对音八百文声母类和汉字调类的关系（根据更科 2022b: 96-97）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清入	次浊入	全浊入	总计
清音类	56	13	12	84	23	4	6	198
浊音类	7	53	62	19	7	4	1	153

3.4.3 《西番》《八百》汉蕃对音的声调对应比较

两种材料都显示，汉语去声调与民族文字清音类辅音的关系非常密切。两种材料还显示，汉语的阳平、上声两调与民文浊音类辅音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清楚。

至于汉语阴平调，两种材料的反映似乎有些相反：西番倾向浊音类，八百倾向清音类。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两种材料所描写的汉语基础方言中的阴平调值不同；二、两种材料的阴平调值相同，但由于阴平调的调值“不高不低”，注音者可能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如果藏语和八百语的“清”和“浊”的音节符合声调语言“清高浊低”的一般倾

向，且实际发音中也具有高调/低调的话，那么上述结果与某些明代官话资料所得的信息是吻合的：

《翻译老朴》声点（远藤光晓 1984:168）：阴平 45，阳平 214，上声 11，去声 55。

《西儒耳目资・问答》：“清平无低无昂，[……]最高曰去，次高约入。最低曰浊[平……引用者按]，次低曰上。”

在这里，上声为低调尤其重要，因为现代北京话(包括东北官话)中的上声为低调，《老朴》和《西儒耳目资》的上声也较低，而现代官话方言中，上声调念高平或高降调的占多数，如郑州 55、青岛 55、敦煌 51、成都 53 等，只有江淮官话的上声调与北京话较为接近：南京 22、如皋 213、合肥 24 等。《来文》汉蕃对音的汉语基础方言可能属于南京官话系统。[41]

至于入声字，两种资料里标作清、浊音的都有，具体如下：

《西番馆来文》

清：嫡的益抑以上清入；睦曆驿亦翊以上次浊入；及逐以上全浊入

浊：笣德国隻吉以上清入；跃六以上次浊入；食术以上全浊入

《八百馆来文》

清：八發百得设作阙雀疋匹的隻勅赤湿给乞喫一益竹束忽以上清入；乐亦驿目以上次浊入；白合极十石服以上全浊入

浊：法角约索屋以上清入；纳月立物以上次浊入；着以上全浊入

在《八百》中，入声字多用清音类拼写，如果八百文的清浊与音节音高有直接关系，那么，这可能表明入声是一个高调。

两种资料里，清浊分组与古汉语清浊之间关系不大，但似乎与主要元音有关。用清音类注出的入声字主要元音多为高元音 i, u，而低音组的主要元音有不少是 a, o, e 等中低元音。这一现象让人联想到《翻译老乞大》右侧音汉语入声调的高低分调（菅野裕臣 1977、远藤光晓 1981），非常有趣。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乙种本《华夷译语》所收四种语言“来文”的汉蕃对音资料，探讨了其汉语基础方言的若干特点。总体而言，“来文”对音资料里描写的汉语音是明代官

[41] 官话方言上声调调值地理分布，可以参考 Hashimoto (1984)所附地图 3-1，以及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图 019“肿的调值”等。

话。但是，通过比较可知，各种“来文”所标出的字音在细节上有许多出入，甚至同一种“来文”内部也能看到不同层次的发音。这表明“来文”汉蕃对音并不代表统一的音系，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同地方字音混入。

“来文”的成书过程，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说，《来文》编者的母语是汉语还是民族语言？3.2.3 介绍了《缅甸馆来文》里/ś/声母有 15 种不同的标记方式，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表明，对于《缅甸》编者，汉语的/ś/声母发音很难，不易记录。如果《缅甸馆来文》记音人的母语是汉语，这种困难不太可能存在。因此可以推测，《缅甸馆来文》的编者可能是缅甸人。此外，“来文”汉蕃对音的汉语基础方言与“杂字”音译汉字的基础方言是否相同，这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中文

曹志耘[主编]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商务印书馆。

更科慎一(待刊)《论乙种本《华夷译语》汉语-民语对音资料所反映的阳声韵尾》，《辞书研究》。

任萍 2015《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远藤光晓 1984《《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

钟智翔 2010《缅语语音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周耀文、方峰和、郗卫宁 2005《德宏傣语同音词典》，民族出版社。

莊子儀 2018「『高昌館課』中的漢回對音」。『聲韻論叢』第 21 輯、臺灣學生書局，103-140 頁。

日文

石田幹之助 1944「所謂丙種本『華夷訳語』の『韃靼館訳語』」，石田幹之助(1973)『東亜文化史叢考』，財団法人東洋文庫，147-205 頁所収。

泉井久之助 1949「百夷館雑字並に来文の解読」，『比較言語学研究』，創元社，191-304 頁所収。

—— 1953「八百館雑字ならびに来文の解読」，『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 2，1-109 頁。http://hdl.handle.net/2433/72854

荻原弘明 1965「東洋文庫本華夷訳語・緬甸館雑字——附、訳史紀餘・緬甸国書——についての覚書(緬甸史雑考Ⅲ)」，『鹿大史学』13，1-28 頁。

更科慎一 2021「ウイグル語学習書としての『高昌館来文』の性質について」、『異

文化研究』(山口大学人文学部)第 15 号, 66-81 頁。https://petit.lib.yamaguchi-u.ac.jp/28510

—— 2022a「『百夷館訳語』来文に見られる明代漢語の表音システム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の歴史と現在』、山口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研究科編著、白帝社、122-155 頁。

—— 2022b「『八百館来文』に見られる八百文字表記漢語について」、『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 72 巻、2022 年 3 月、75-112 頁。https://petit.lib.yamaguchi-u.ac.jp/28890

—— 2023「『西番館来文』に見られるチベット文字表記漢語について」、『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 73 巻、39-78 頁。https://petit.lib.yamaguchi-u.ac.jp/29309

—— 2024a「『緬甸館来文』に見られるビルマ文字表記漢語について」、『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 74 巻、99-135 頁。https://petit.lib.yamaguchi-u.ac.jp/29611

—— 2024b, 「乙種本『華夷訳語』対音資料から見た漢語軟口蓋音声母の口蓋化について」,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Research Project B「アジア諸言語の接触と変容：通時的・共時的観点からのアプローチ」2023 年度研究会：2024 年 3 月 16 日, 神戸。

西田龍雄 1960「十六世紀におけるパイ・イ語-漢語、漢語-パイ・イ語単語集の研究」, 『東洋学報』43-3, 1-48 頁。

—— 1970『西番館訳語の研究』, 松香堂。

—— 1972『緬甸館訳語の研究』, 松香堂。

—— 2001「八百文字」, 河野六郎・千野栄一・西田龍雄編著(2001)『世界文字辞典』(言語学大辞典別巻), 三省堂, 741-745 頁所載。

朝文

菅野裕臣 1977《司譯院漢學書에 記入된 近世 中國語의 聲調表記》, 國語國文學論叢 : 李崇寧先生古稀紀念, 塔出版社, 405-416 頁。

英文

Das, Sarat Chandra, 1902/1997,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Hashimoto, Mantaro J, 1984, Linguistic Diffusion of Chinese Tones: Observations on the Latitudinal and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Syllabic Intonation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7, pp.1-20 (and maps, pp.21-51).

《华夷译语》中彝文的地理语言学分析及其有效性

岩佐一枝
名古屋外国语大学

内容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地理语言学方法验证及分析《华夷译语》之《猓猡译语》中的彝文，并且展示其结果。尤其在目前的重要研究课题，即认同《猓猡译语》的第四本与第五本的采编地的问题上，充分应用了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得出了其研究成果。在验证时，首先制作了彝文地图以阐明彝文的地区特征，然后根据地理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字的分布情况。探明彝文的传播过程与其历史演变是该文字研究的最大研究目标之一，而这正是该研究的延续。

一、前言

本研究，为了表明彝文的地区特征并确定共同彝文，首先制作彝文地图，其次根据地理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字的分布情况，验证字体、音值和汉字注音。随时提示彝文地图实例。然后，基于这分析结果力图澄清《猓猡译语》彝文采编地区，换言之，阐明第四本与第五本的彝文来自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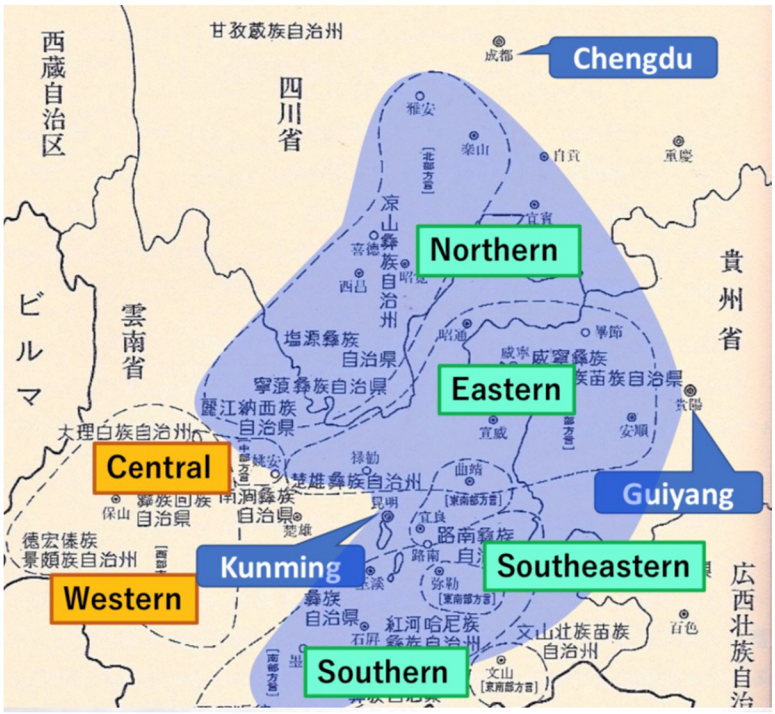
下面，先提供关于彝语及彝文、《猓猡译语》的基本情报和有关的以往研究。

1.1 彝族及彝语

彝族居住在中国西南部、越南及老挝的北部。彝语属于藏缅语族彝缅语支，在中国，该语言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中国西南部一带被使用。

根据国内分类，彝语分为北部、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和中部的 6 个方言 25 个土语。请参考地图 1 如下。

彝语是分析性语言，基本语序是 S（主语）O（宾语）V（动词），N（名词）A（形容词）。



地图 1: 彝语分布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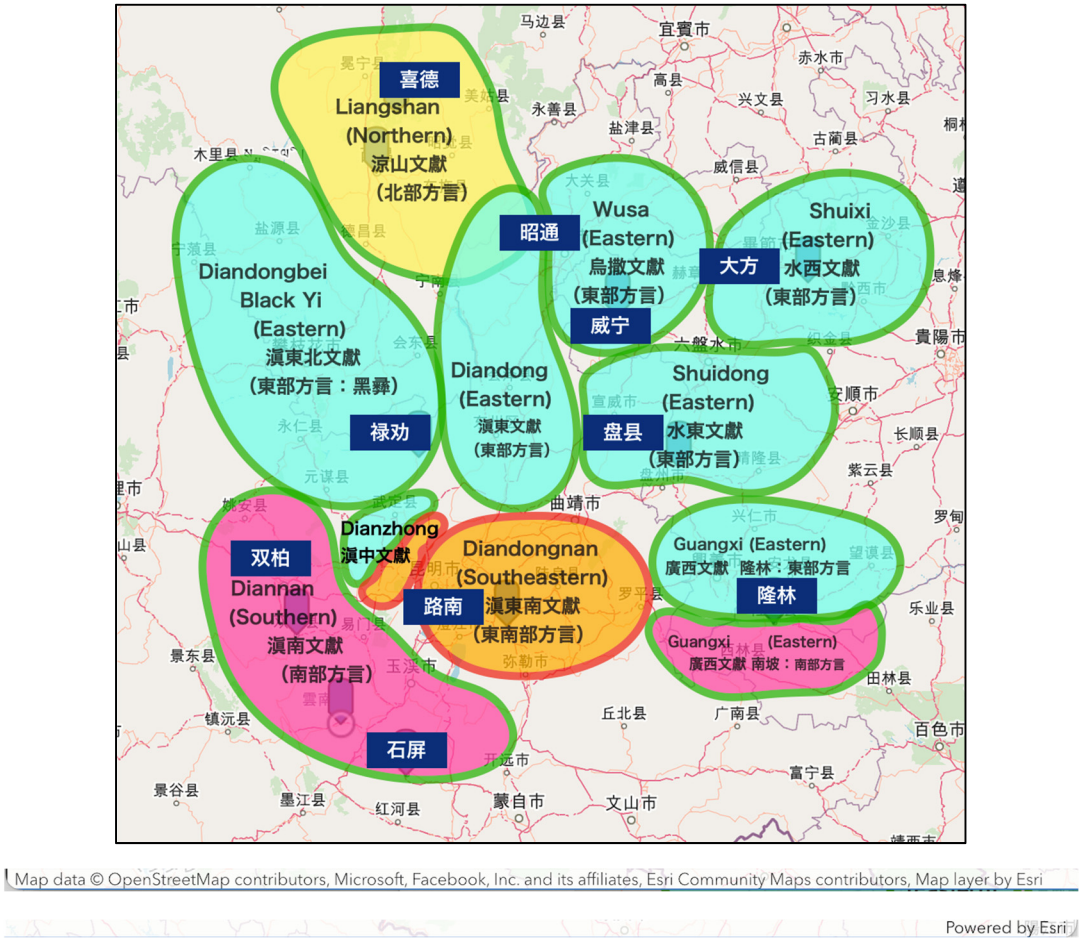
上述的 6 个方言之中，有文字与文献的是北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方言。

彝文不仅是相通工具，而且还是十分带有个人性的文字。这是与彝族社会文化有紧密的关系。

彝文和文献都只能由叫“毕摩”的彝族宗教的祭司使用的。彝文和以经典代表的彝文文献是毕摩他们一族的传统机密，这些都是基本上毕摩父子代代相传的。为了保守父子世袭的传统机密，彝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家祖传的经典文献不被外传，即不是用于交流的工具。因为彝文不是相通工具之一，毕摩的自由裁量程度还是比较高了，就成为了十分带有个人性的文字。彝文的这种闭锁性以及个人性更会引起无数的异体字出现。此外，在字体上，各地域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彝文被认为原来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过来的一种表语文字，它现在各地还在“音节文字化”的过程，即是它还在从表语文字发展成音节文字的过程中。

[1] 在西田（1980：182）的地图的基础上，笔者添加了彝语方言分布区、彝文及文献分布区以及省都。蓝色地区是有彝文及文献的，换言之，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方言地区。它们是用绿色表示。没有彝文及文献的地方是用橙色表示，是中部和西部方言地区。



地图 2: 彝语文献分布地域图

Bradley (2002)的分类	中国官方分类
绿线 = Northern Loloish	黄色地域 = 北部方言
红线 = Central Loloish	浅蓝色地域 = 东部方言
	粉色地域 = 南部方言
	橙色地域 = 东南部方言

1.2 《猓猡译语》简介

《猓猡译语》是《华夷译语》之中的“彝语-汉语词汇集”。《猓猡译语》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的两所大学。多年来，据说该材料也藏于越南河内，但从未被发现。

《猓猡译语》有五种本，则有五个采编地。在该五种本里，第四本和第五本还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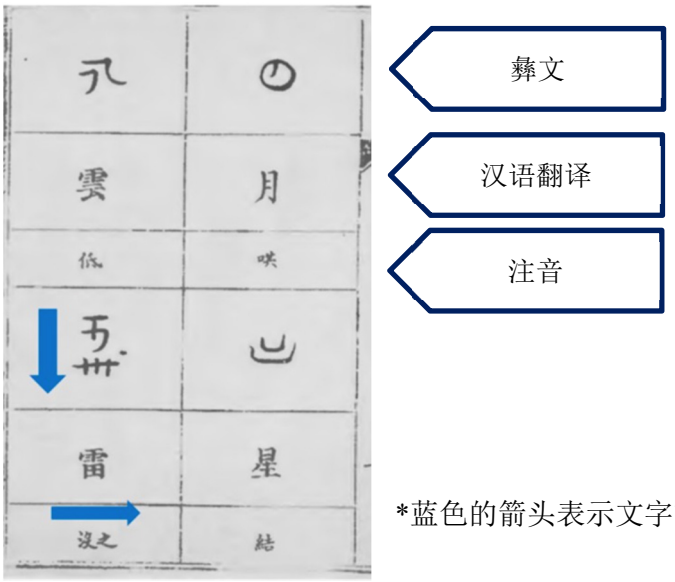
标注其采编地区。这是关于《猓猡译语》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请参见如下表 1。

表 1: 《猓猡译语》的收藏地以及五种本和其采编地[2]

（采编地）	第一本 (東川)	第二本 (建昌)	第三本 (永寧)	第四本 (X*)	第五本 (Y*)
北京	1	2	3	4	5
京都	-	大谷本 **	今西本 **	-	-
河内	(1)	(3)	(2)	-	-

《猓猡译语》有 20 各门类的词汇范畴，一共有 740 个词条。除了第一本有 16 门类 286 词条以外，其他的三种本门类和词条基本上同一。下面图 1 提示《猓猡译语》的基本书面形式。箭头所表示，上面有彝文，其下面有汉语翻译，最下面有用汉字表示的彝文的注音标记。



*蓝色的箭头表示文字方向

图 1: 基本书面形式：第三本的一页，西田（1980：3）

[2] 西田（1980）以 X 与 Y 分别表达第四本和第五本的采集地。在表 1 里，“大谷本”表示在日本大谷大学收藏的，“今西本”表示它原来是日本京都大学今西春秋教授保存的。

1.3 以往的研究及其结果

关于《猓猡译语》的先行研究是如下：

1. 西田龙雄 (1980) 『倮儸譯語の研究：倮儸語の構造と系統』京都. 松香堂.
2. 孔祥卿 (2016) 《《猓猡译语》的版本及校勘》《民族語文》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1-82.
3. Hongyin, Nie (2018) Loloish dialect and script of 18th century Liangshan reflected in the *Luoluo Yiyu*.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1). 13-17.
4. 聂鹏 (2018) 《《永宁属水潦译语》校译》《民族语文》, 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81-97.
5. 聂鹏，孔祥卿，文智 (2019)《故宫藏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考证》《民族翻译》第 2 期. 北京.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22-34.
6. 聂鹏 (2020) 《故宫藏东川府属《猓猡译语》考论》《中国文字研究》, 32.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23-231.
7. 聂鹏，孔祥卿 (2020) 《大谷大学藏《猓猡译语》译者身份考 —兼与松川节、聂鸿音先生商榷》《文献》2020 年 9 月第 5 期.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86-99.
8. Kazue Iwasa (2023)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Yi script written in *Hua-Yi Yiyu*',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Geolingistics.*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pp. 172-202.

其中有三个研究验证第四本和第五本，则 2，5 和 8 的以往研究。尤其，第 2 和 5 的研究都是十分有先驱性，也有详细的验证，其成果不少。然而，这两篇论文的考察均仍是重点字音的倾向较高，对彝文字形并不重视，虽然彝文字体会显示不少的地域特征。因此，笔者在 Iwasa (2023)开始了把地理语言学应用于分析写在《华夷译语》的彝文。

在 Iwasa (2023)，进行了如下的准备及验证。

① 画彝文地图

② 以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分析写在彝文地图上的字体（以及字音）与其分布情况

1. 把捉地其特征：参考地图 3 及 4
2. 制定共同彝文：参考地图 5 及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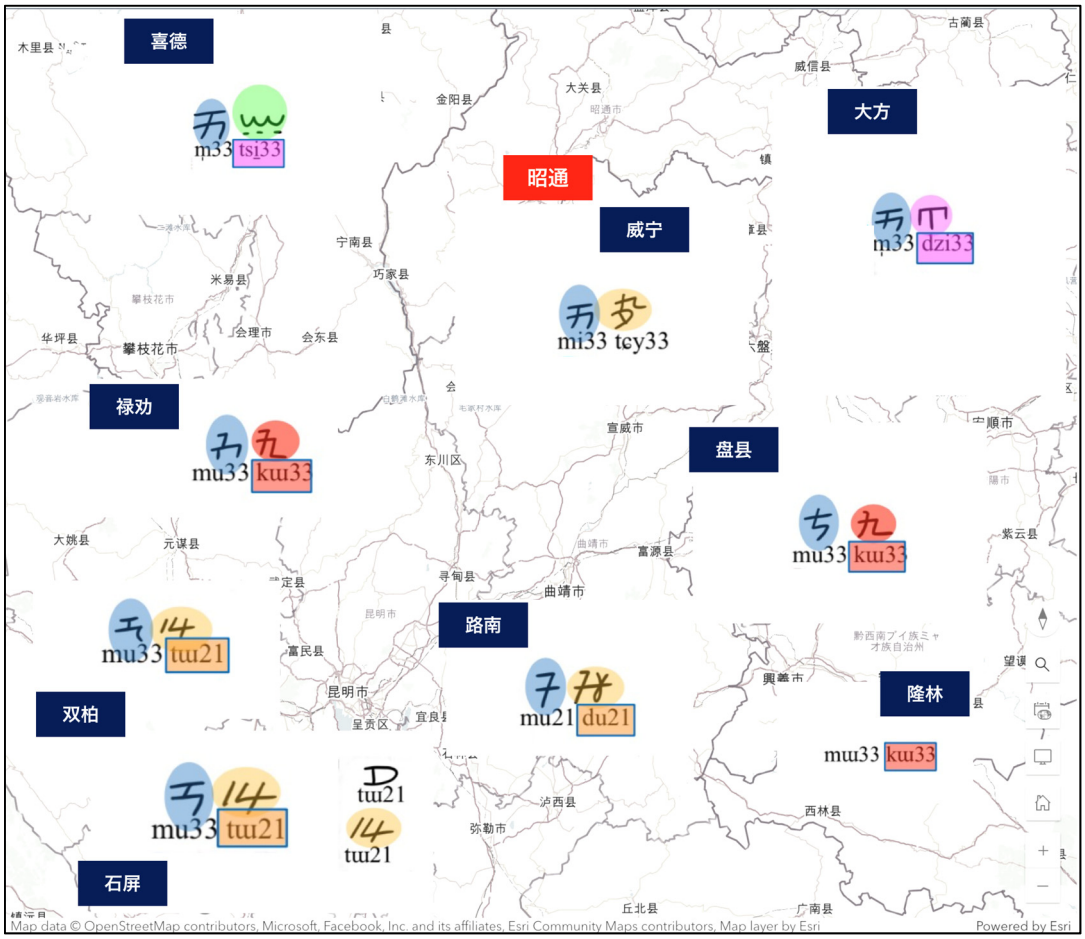
③ 推测彝文的传播路径与变迁过程（目前在进行中）

请参看下面地图 3。它是表示“雷”的彝文地图，是地区特征一例。

由于蓝色阴影的第一个文字表示“天（空）”及“与天空关连的现象”，请注视到

第二个文字。它是被橙色、红色等颜色阴影所突出[3]。

在地图上，用橙色阴影表示的彝文字体主要分布在云南双柏、石屏以及路南。这些文字的字音也十分相似。这些彝文可认为显示云南地区的特征。然而，用红色阴影表示的彝文分布在这幅地图中间，即是禄劝和盘县两点。这两点都属于东部方言地区，该地点的彝文字体都可以看作具有东部方言的特征。虽然没有文字的情报，在属于东部方言的隆林，其音值[mɯ^{33} kɯ^{33}]还是跟禄劝的[mu^{33} kɯ^{33}]以及盘县的[mu^{33} kɯ^{33}] 相似，也提示东部方言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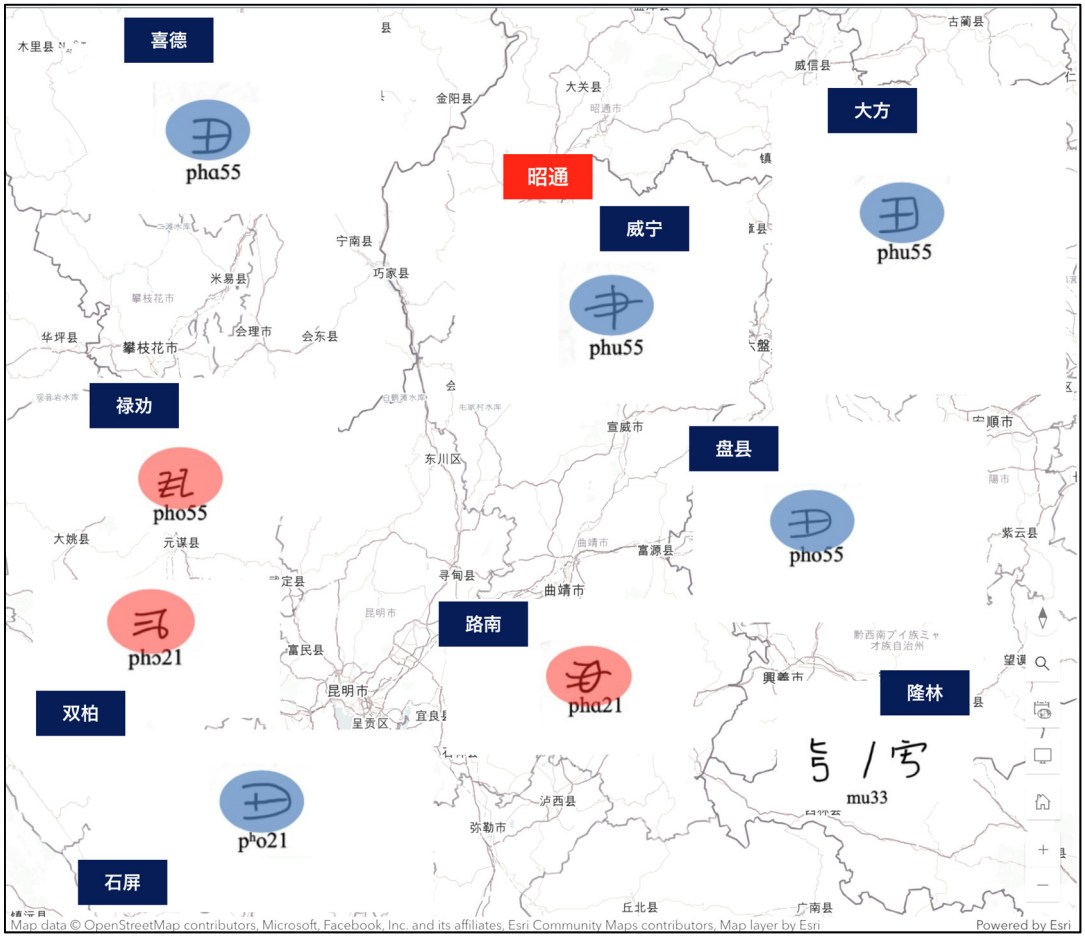


地图 3: 地区特征一例“雷”[4]

[3] 在本文之中，地图上的彩色阴影表示彝文字群，与其彩色阴影同一颜色的线条则表示其字群的异体字。以下相同。

[4] 地图 3 是笔者在 Iwasa (2023: 184)的 map 12 上稍加修改而成的。

下面揭示另外一例，表示“父”的彝文地图。



地图 4: 地区特征一例“父”[5]

在这幅地图上有两种文字群：第一个是用蓝色阴影显示的彝文群，第二个是用红色阴影表示的彝文群。在这个例子，两个文字群超越方言区分。

第一群分布在彝语分布区的周围地区；四川喜德，贵州威宁、大方、盘县，以及云南石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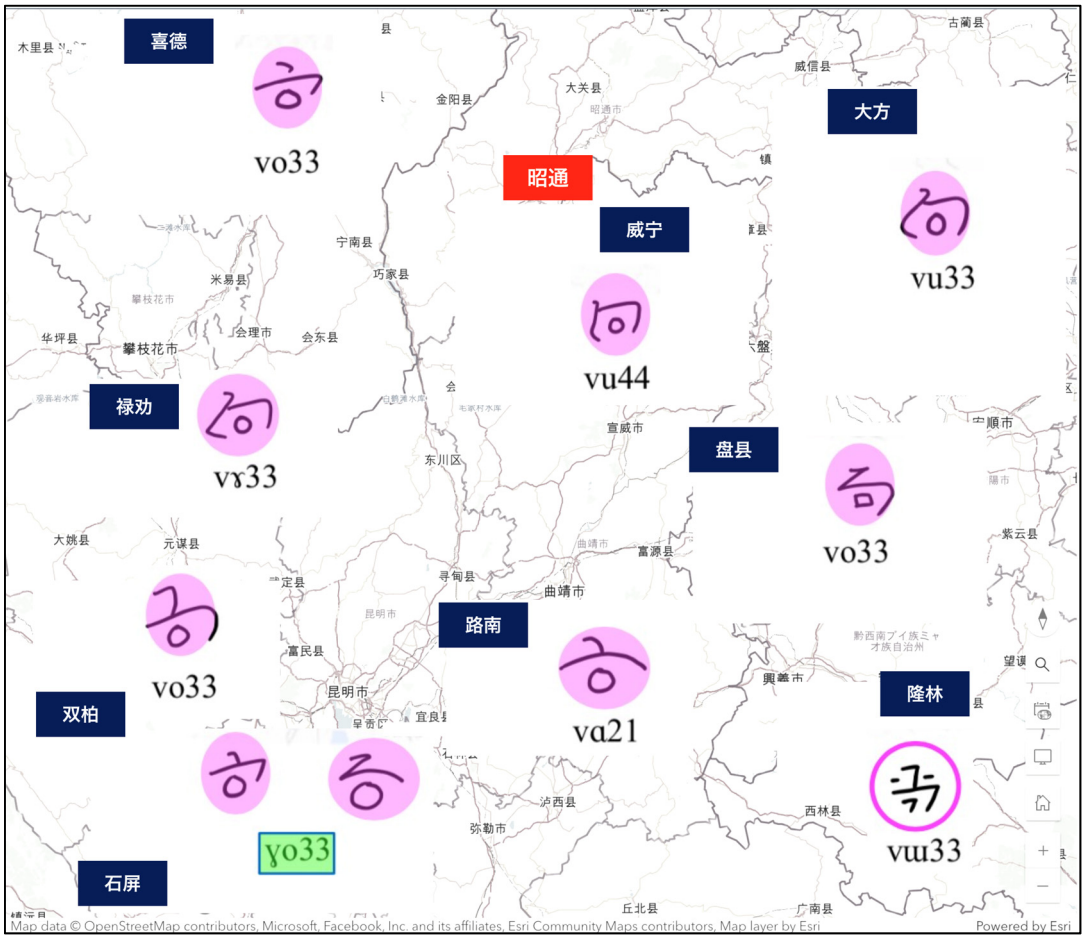
第二群分布在彝语分布区的中间；云南双柏、禄劝、路南。

这张地图呈示 ABA 分布。根据地理语言学的观点，第二群的文字比第一群的有

[5] 地图 4 是笔者为本研究所画成的。

可能更新。总之，在云南双柏、禄劝和路南等的地方内可能在字体上发生了有些新变化，在边缘地区一直使用着原来的字体。

在下面介绍共同彝文的地图实例。



地图 5: 共同彝文实例“雪”[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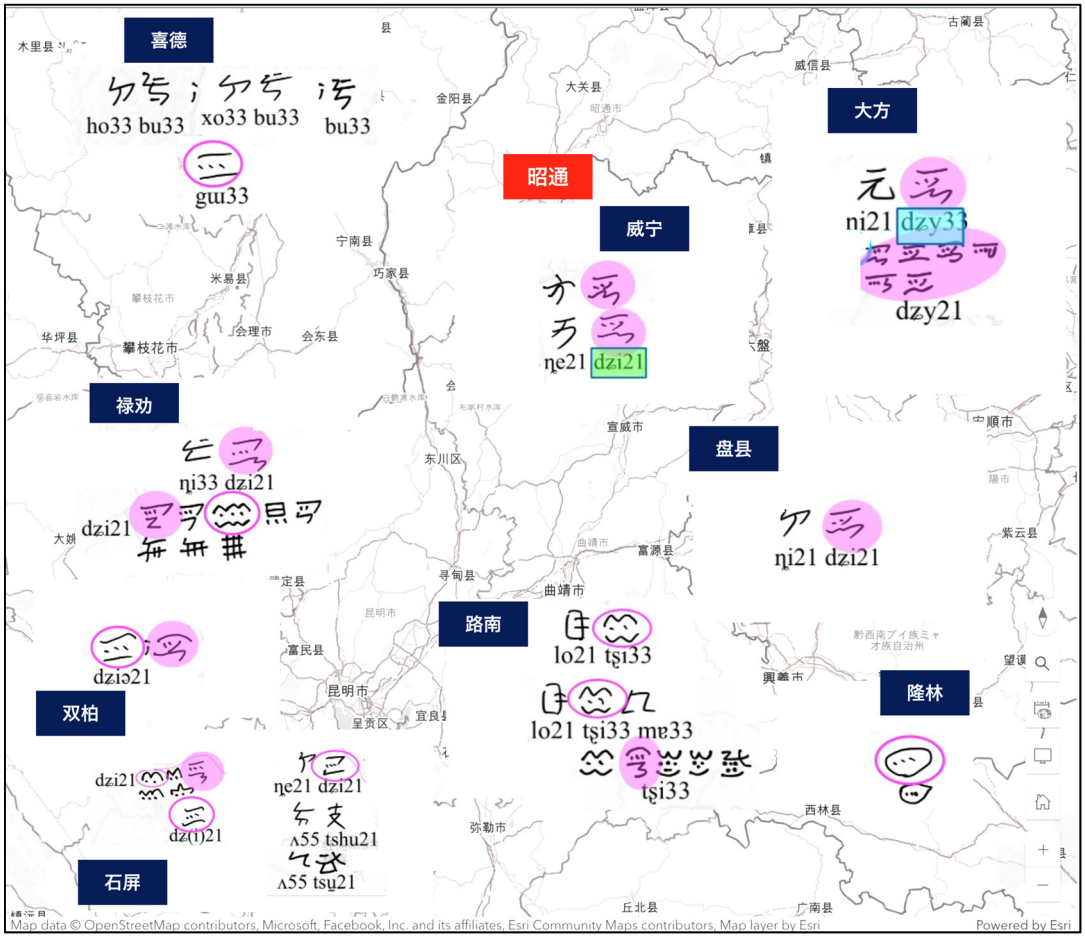
在这幅地图，虽然用粉色线条[7]围绕的隆林的彝文呈现出比用粉色阴影表示的其他地区的文字稍微复杂，但它仍然与其他地区的彝文有共同的特征，可以认为是共同

[6] 地图 5 是笔者为本研究所画的。

[7] 如在脚注 3 中所述，如果文字被彩色阴影强调，则表示其文字属于某个文字群。然而，彩色线条包围文字时，它指示某个字群中的异体字。

彝文[8]。此外，其音值也与其他文字的音值非常相似。

请参阅另外一个实例。



地图 6: 共同彝文实例“太阳”[9]

在上面的地图上，用粉色阴影以及粉色线条所指示的文字虽然在字体上略有不同，但它们仍具有共同的特征，可以认为它们都是共同彝文[10]。不仅如此，它们的音值也

[8] 在共同彝文内仍有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说，在大方、威宁和禄劝等的东部方言地区，文字的两旁都有两条线（两个笔画）围绕着中心的小圆（）。然而，其他的地方字体可分为两个字群；东部方言的盘县及南部方言的一部有像厂部似的笔画（）；北部方言的喜德，双柏等的南部方言地区，东南部方言的路南，东部方言的隆林有像宝盖儿样的笔画（）。

[9] 地图 6 是笔者在 Iwasa (2023: 182)的 map 6 上稍加修改而成的。

[10] 如脚注 3 中所述，用和某个字群的阴影同一的彩色线包围的文字表示某个字群的异体字。

相当相似。

如前所示，利用地理语言学的观点分析彝文地图，可以识别具有较高地区性的文字，并且可以制定共同彝文。例如，从验证目标中排除观察到大量共同彝文的条目使得更容易确定每个地区特有的文字。

1.4 本研究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论

鉴于上述的情况，关于《猓猡译语》的目前的研究课题是如下：

1. 如在 1.2 中也提及，认同第四本和第五本的采编地
2. 阐明彝文的传播路径及文字变迁过程

为此，本研究把地理语言学应用于：

- 分析当时的彝文多样性以及各地区的特征
- 进行比较写在《猓猡译语》中的彝文和其他彝文材料的字体与字音

如在 1.3 所提示的以往研究之中，该研究与孔 (2016) 以及聂他 (2019) 不同，跟随 Iwasa (2023)将关注彝文的标语性质，主要根据彝文字形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采取以下方法：

1. 基于五本《猓猡译语》与收集各地彝文的工具书等彝文材料，画成彝文地图
2. 对比《猓猡译语》彝文和各地彝文的字形，根据其字体分类各地的文字
   - 如有必要，分析文字的音值[11]
3. 试标注第四本与第五本的采编地，制定共同彝文（目前在进行中）

本研究参考如下的彝文资料：

a. 《猓猡译语》五种本：采编地；东川、建昌、永宁、X、Y

b. 彝文资料

- 《滇川黔贵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东南部、东部、北部、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 《汉彝简明辞典》：东南部、东部、北部、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 《彝汉简明辞典》：东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在此相同。

[11] 关于《猓猡译语》的注音汉字的音值，首先必须验证每本上的注音汉字是基于哪个地区的汉语写的。然而，由于篇幅有限，这一点，笔者想改稿讨论。因此，本文将不涉及细节，仅提及词汇形式的相似性等而已。

- 《滇南彝文字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 《古彝文常用字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 《云南规范彝文彝汉词典》：南部方言文字资料

采集地：

- 东南部（SE，路南）
- 东部（E，禄劝、大方、威宁、盘县、隆林）
- 北部（N，喜德）
- 南部（S，双柏、墨江、石屏）

二、地理语言学对《猓猡译语》中彝文的应用

2.1 地理语言学对《猓猡译语》中彝文的应用及其主要结果实例

本研究进行了对比五本《猓猡译语》中彝文与彝文地图上的彝文及其分布情况，取得了三个重要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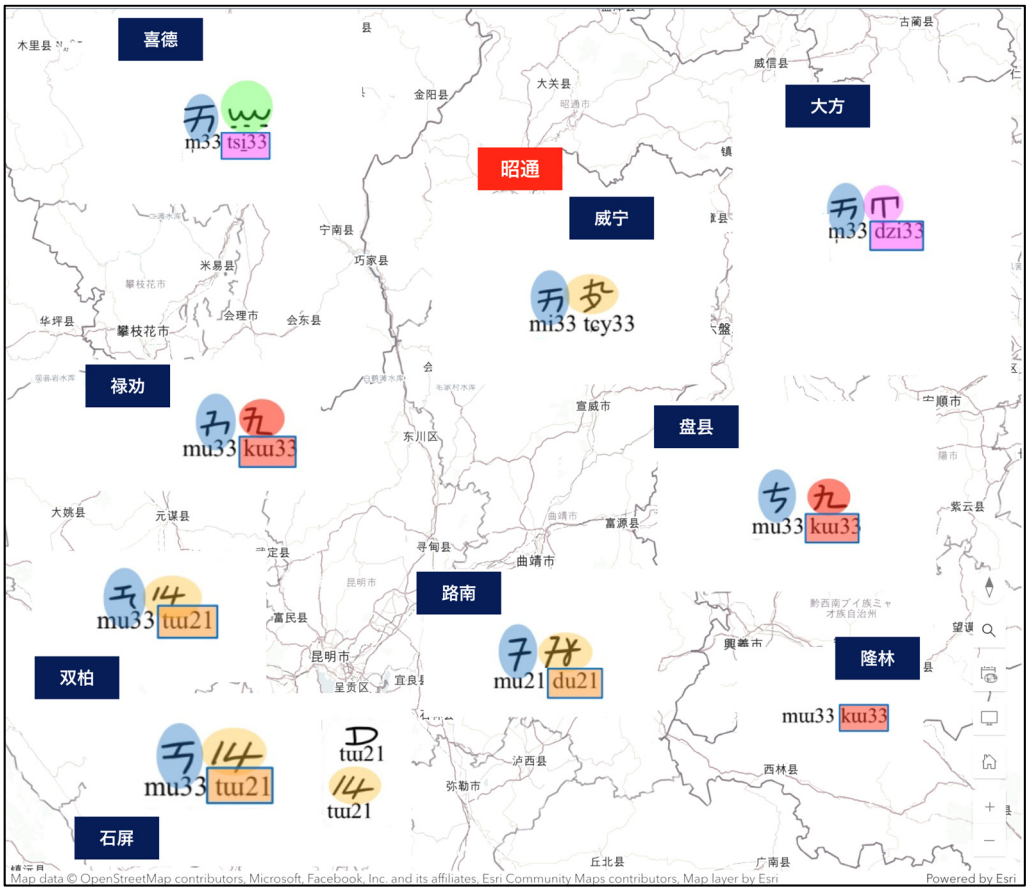
第一：把捉了地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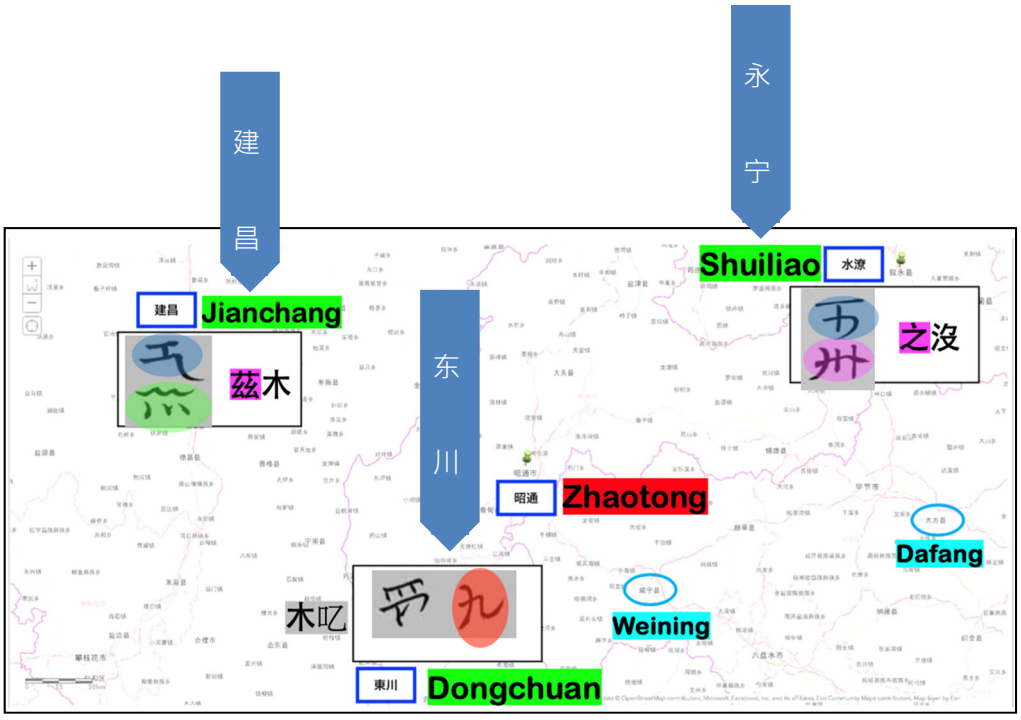
第二：除了 Iwasa (2023) 所揭示外，还发现了共同彝文

第三：虽然还需要详细的验证，很有可能标注第四本和第五本的采编地

下面提示彝文地图来介绍该研究的主要结果和其实例。首先，显示有助于发现地区特征的彝文地图以及基于地理语言学的分析结果。第二，提示共同彝文也有可能助于识别地区特有的文字的例子。最后，展示有些实例贡献认同采编地。

2.1.1 基于地区特征分析的实例





地图 7（上图）及 8（下图）：基于地区特征分析的实例“雷”

- 地图 7 是彝文广域地图，地图 8 是《猓猡译语》第一（东川）、二（建昌）、三（永宁）本中的彝文地图[12]

[12] 此后，上图都是彝文地图全图，下图都是根据《猓猡译语》第一、第二、第三本中彝文制作的彝文地图。本文中，如果可以将地图中的音值和表中的注音汉字分成群，则以颜色区分它们。以下相同。关于彝文广域地图以及《猓猡译语》上记载的彝文窄域地图的地图与其版权，请参阅注 2。

表 2: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注音及其拼音标记[13]

第四本　　第五本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歇?	遮木
Pinyin	xie?	mu zhe

← 彝文（文字方向：自左到右）

← 注音（文字方向：自右到左）

← 注音汉字的拼音标记（文字方向：自左到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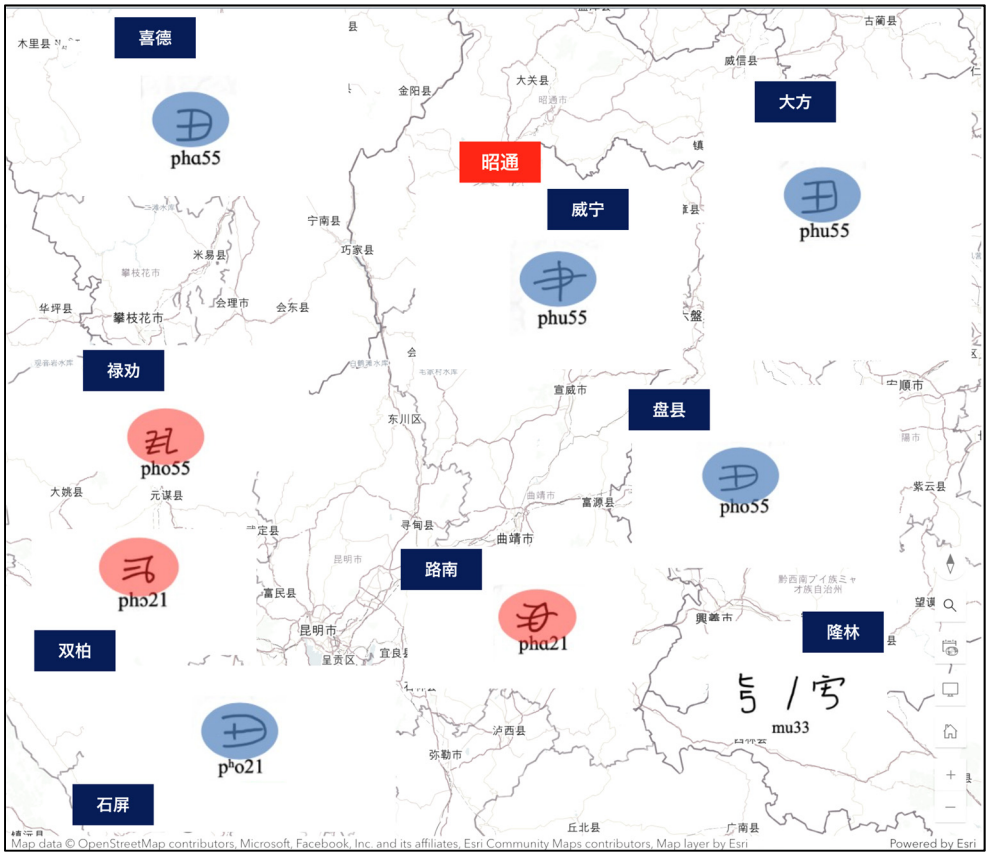
地图 7 是跟地图 3 同一的。它所显示的是北部、南部、东部与东南部方言中意为“雷”的彝文。地图 8 是根据《猓猡译语》中彝文作成的彝文地图。第一本的彝文对应东川地区，第二本的对应建昌，第三本的对应永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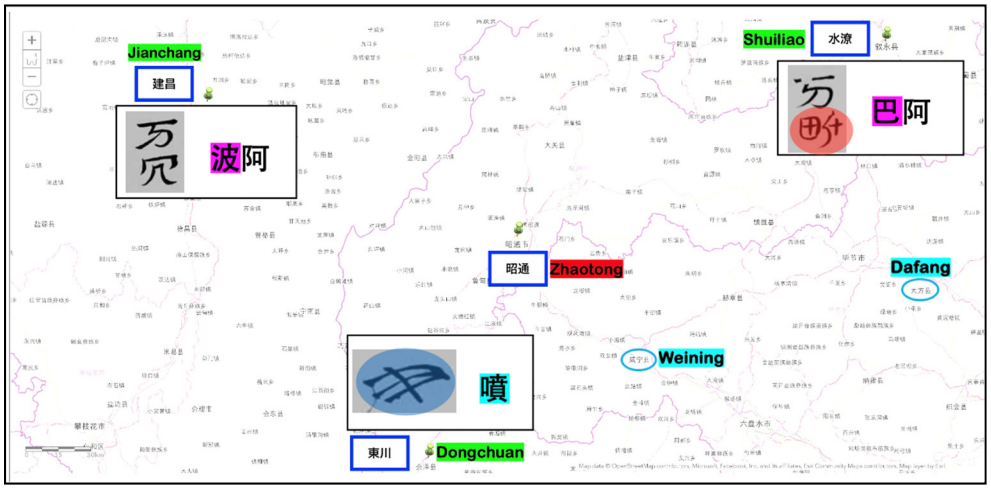
对比地图 7 和 8，我们看出来南方及中间地区表示同一或者类似的特征。

同时，表 2 中第五本的彝文（在两张地图上这些文字都时蓝色和粉色阴影显示的）与地图 7 上的大方地区的文字及地图 8 上的永宁地区的彝文字体非常相似。第二个文字的音值，大方[m̩^{33} dzi^{33}]和第五本的注音“木遮”也像相当类似。这也许表明第五本的采编地会是大方地区。

下面介绍另外一个地区特征的实例。

[13] 此后，同样的表都表示第四本（左）与第五本（右）的：上面=彝文，中间=注音，下面=注音汉字的拼音标记。





地图 9（上图）及 10（下图）：基于地区特征分析的实例“父”

表 3: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注音及其拼音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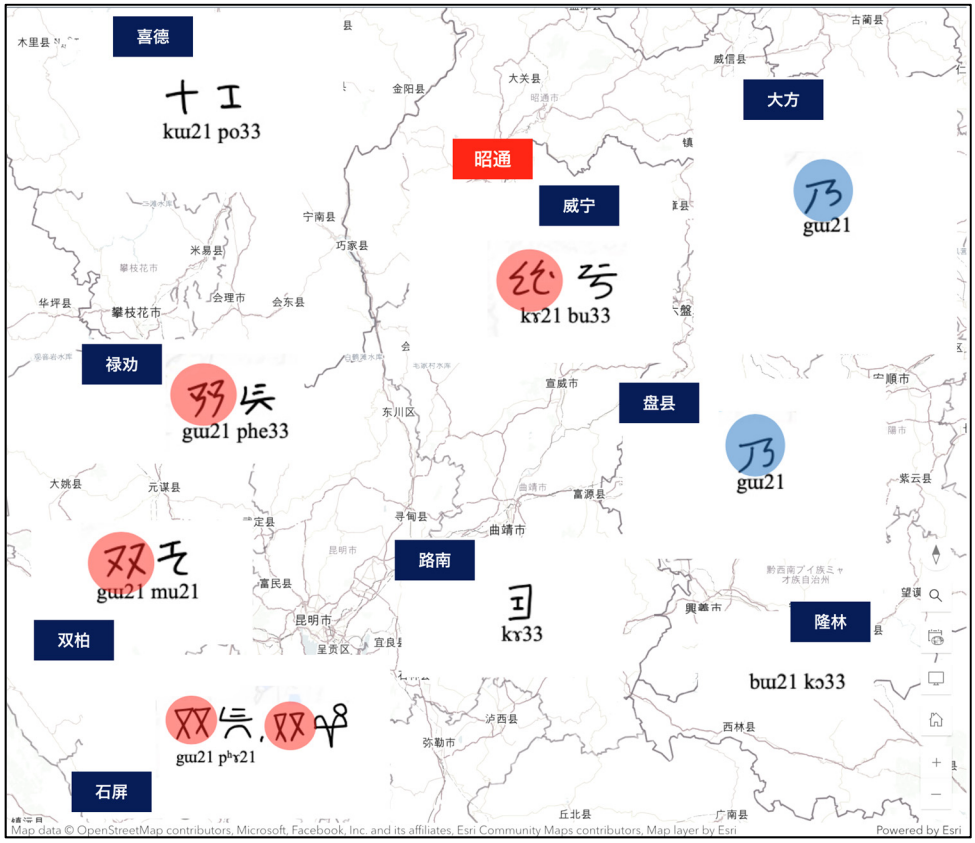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巴阿	舖
Pinyin	a ba	p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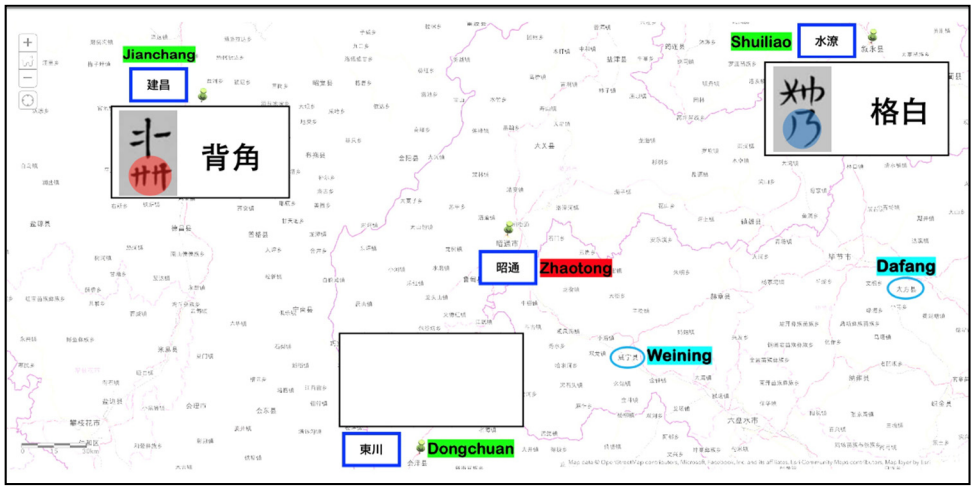
观察地图 9 和 10，我们发现第四本的彝文与第三本永宁的彝文非常相似。它们的语音也一致，“阿巴”。

然而，第五本的彝文和地图 10 的第一本东川及地图 9 的威宁地区的彝文很近似。这三地点的语音也近似；第五本“铺”、第一本（东川）“喷”、威宁[phu^{55}]。

鉴于其字体与语音的类似性，至少第四本和第五本的彝文都会属于东部方言，尤其贵州地区的。

下面还有一个实例也显示地区特征。





地图 11（上图）及 12（下图）：基于地区特征分析的实例“身体”

表 4: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注音[14]及其拼音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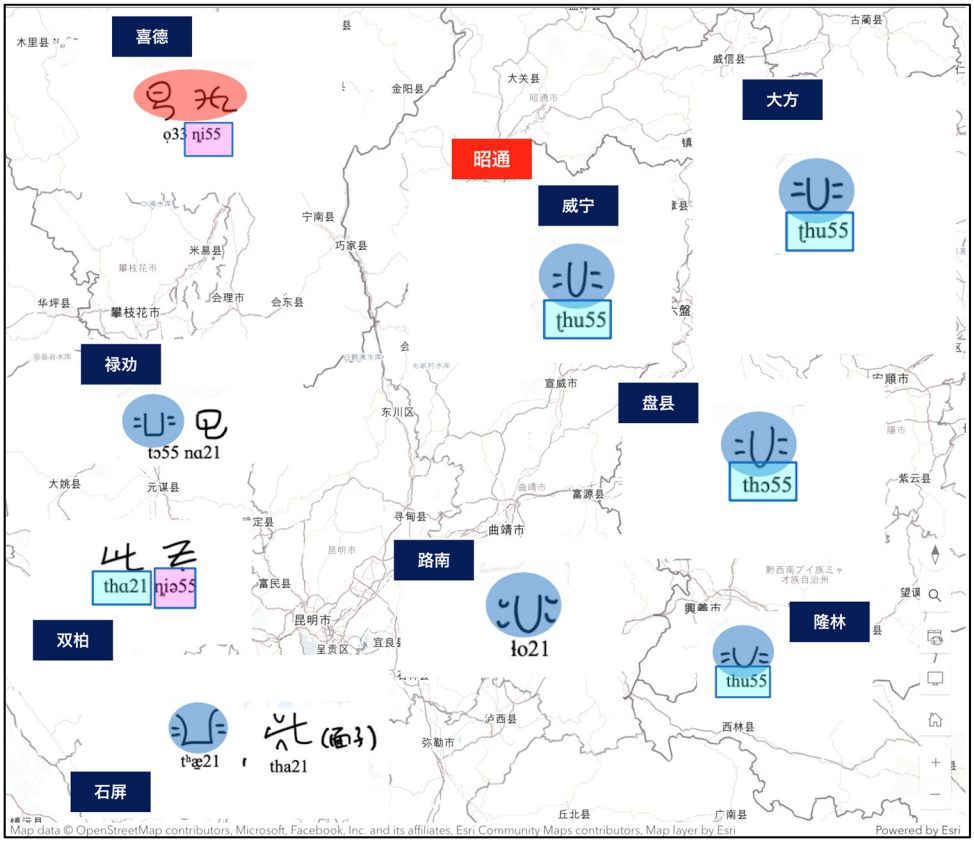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舉	「口草」
Pinyin	ju	c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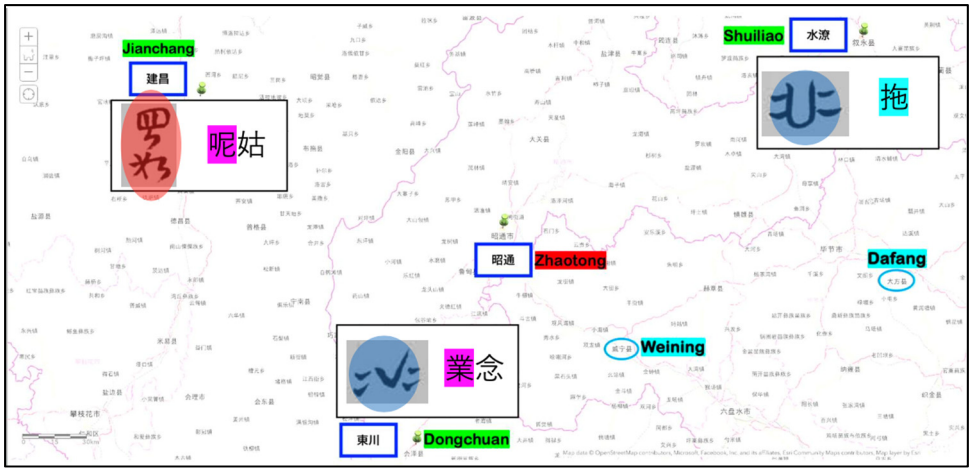
观察地图 11 和 12 以及表 4 的彝文，我们认为第四本的彝文很可能属于红色阴影的文字群。这文字群分布在最大的范围，从四川建昌到云南石屏地区。而，蓝阴影显示的彝文群，包括第五本的彝文，只分布在贵州永宁、大方、盘县等地区。因此，虽然无法标注第四本的采编地，第五本的采编地却会是贵州地区的永宁、大方、盘县等地方。

2.1.2 基于共同彝文分析的实例

不仅是具有地区特征的彝文，共同彝文也有助于识别有些地方独特的彝文。请参阅如下。

[14] 由于笔者环境没有适应的字体，只好合起两个汉字来表示在第五本里记载的注音“口草”这个文字。在本文中，同样的情况与该字相同，使用括号来表示。





地图 13（上图）及 14（下图）：基于共同彝文分析的实例“面”

表 5: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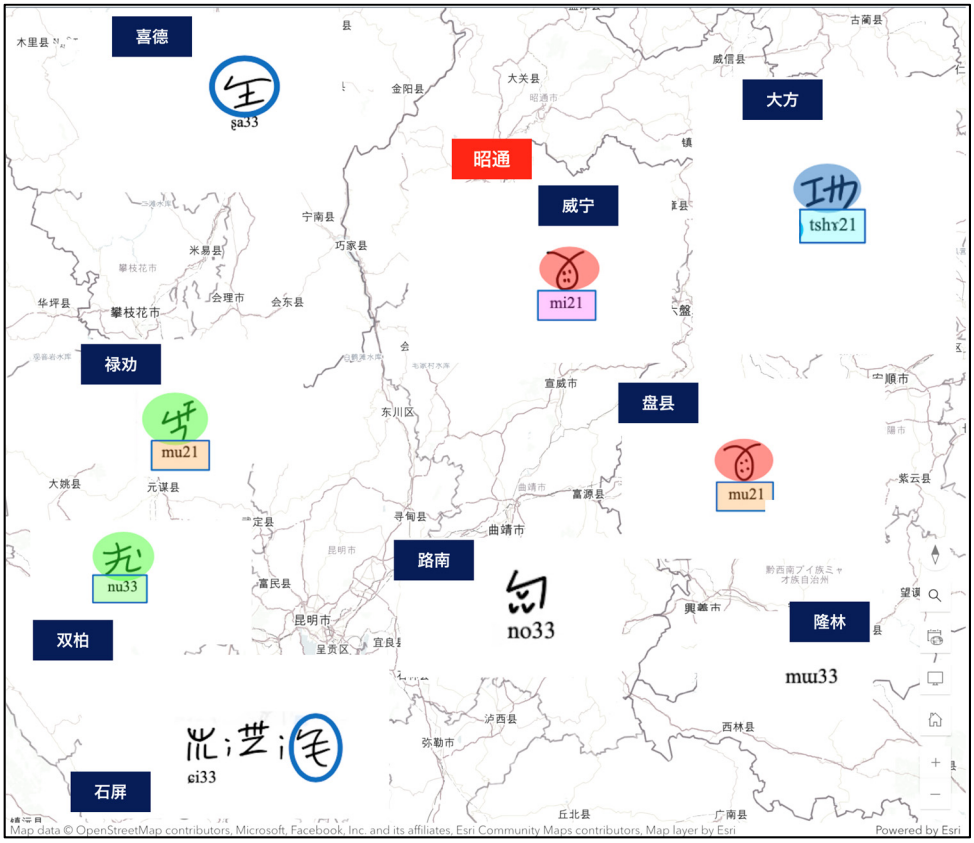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拖	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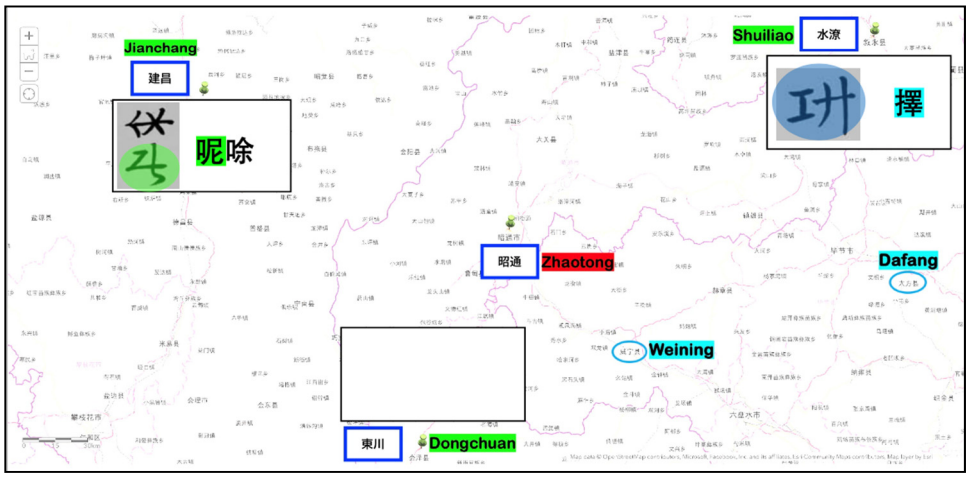
验证地图 13 与 14，建昌和喜德的彝文字体呈示共同特征。尤其，建昌的第二个文字其语音“呢”也显示与喜德的[ȵi^{55}]相当类似，而可以说是四川地区特有的彝文之一。

接下来，示例标注采编地区的分析例。

2.1.3 标注采编地的分析实例

下面是标注采编地的实例之一。





地图 15（上图）及 16（下图）：标注采编地的实例“毛”

表 6: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及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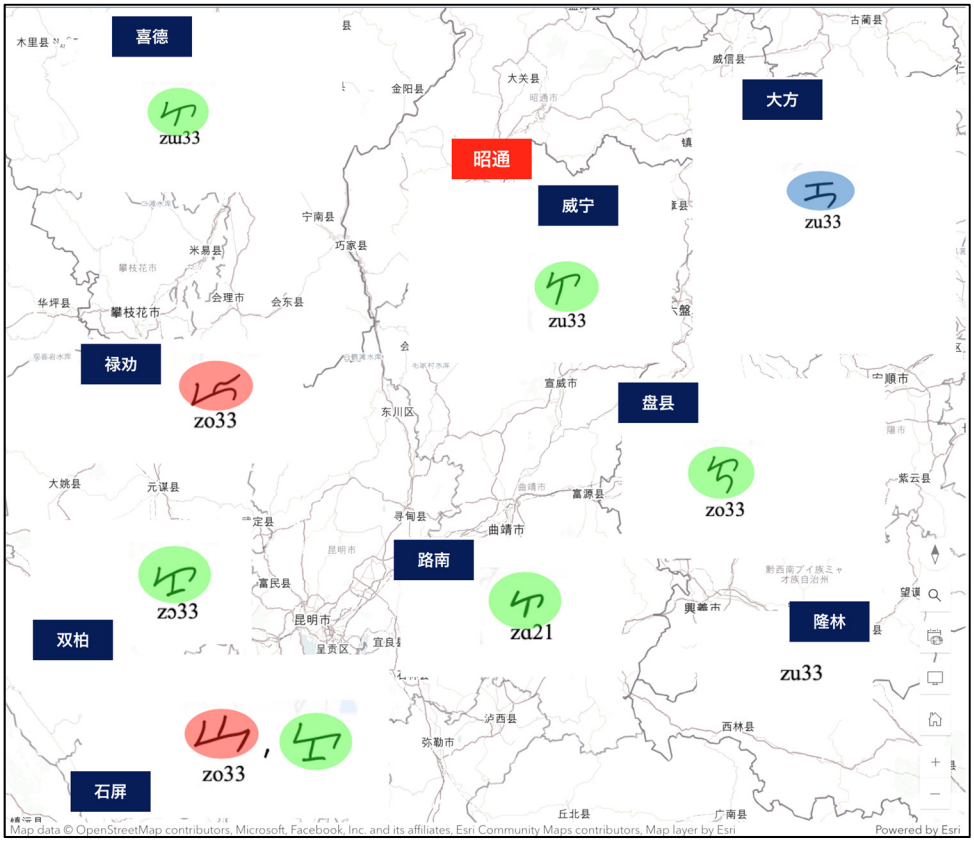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泌	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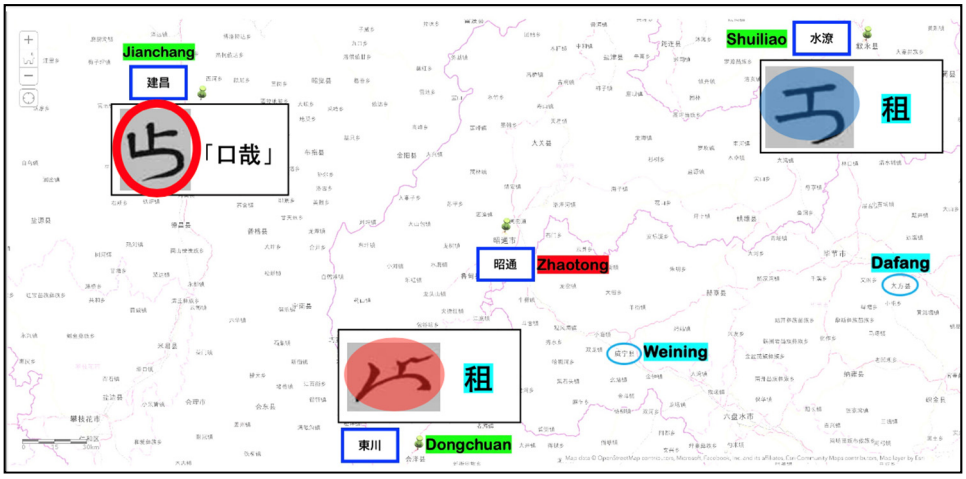
与第四本的彝文相似的红阴影的文字群分布在地图 15 上的威宁及盘县。然而，与第五本的文字类似的蓝阴影文字群分布在地图 15 里的大方、字体上虽有稍微差异的喜德和云南南部的石屏地区，以及地图 16 上的永宁。

现在考虑文字的语音，在《猓猡译语》第四本中的注音“泌”和威宁地区的彝文音值[mi^{21}]对应似的。

第五本的彝文的语音“择”和喜德与石屏地区的音值不一致，但是与大方的[$tshɤ^{21}$]，虽有送气不送气的差异，仍表示有些类似性。鉴于字体以及语音的相近，第五本的彝文很可能是大方地区的。

下面有另一个标注采编地的实例。这也是通过本研究被发现的共同彝文之例。





地图 17（上图）及 18（下图）：标注采编地的实例“子”

表 7: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及注音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租	租

根据字体，表示“子”的彝文分别为三个字群，则绿阴影字群、红阴影字群以及蓝阴影字群，虽然这三种字群字体高度相似，可以认为它们似乎构成一种连续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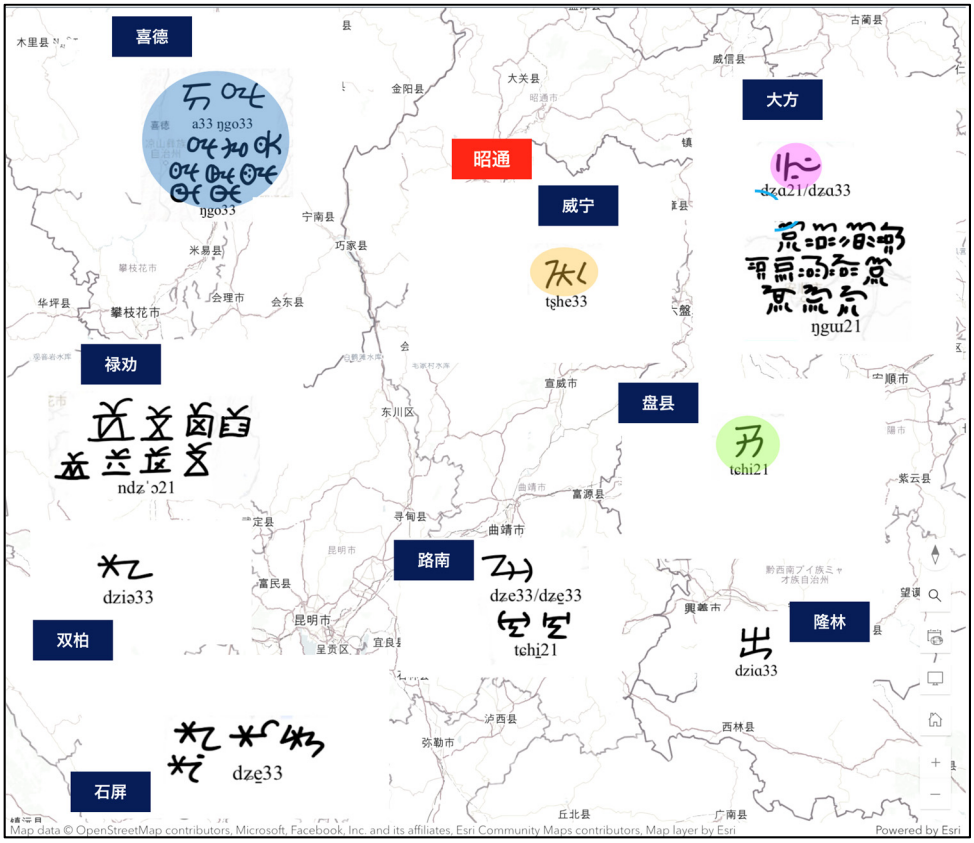
第四本的彝文属于绿阴影字群，这字群分布在最大的范围，从北到南。相反，红阴影字群和蓝阴影字群分布在绿阴影字群的周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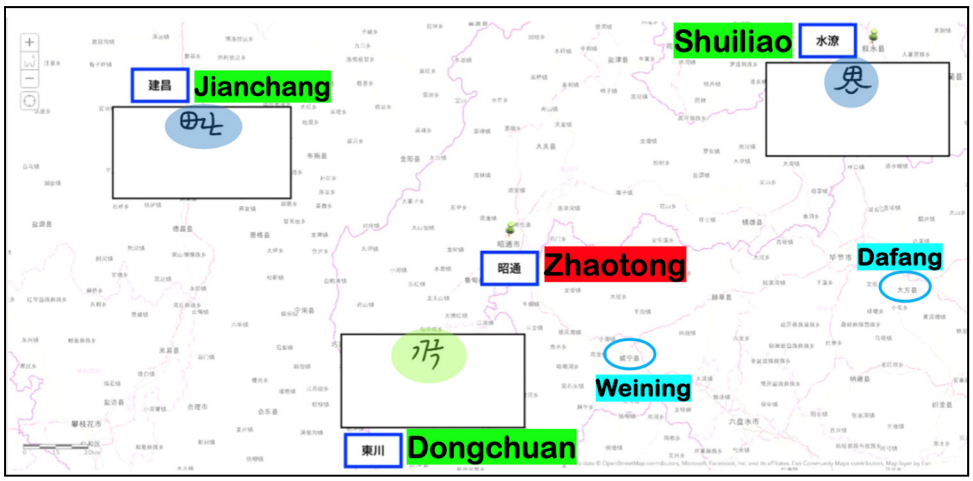
在每个字群内，更详细地注视字体的稍微差异，第四本的文字与盘县地区的文字最相似。因此，第四本的文字很可能来自贵州盘县地区一带。请参阅下面的这两个文字。红线指示类似点。

第四本；  盘县： 

另一面，第五本的文字显示与大方、永宁高类似性。它很可能来自贵州大方或永宁地区一带。

下面有另外一个例子。





地图 19（上图）及 20（下图）：标注采编地的实例“寒”

表 8: 《猓猡译语》中的彝文、注音及其拼音标记

	book 4	book 5
Yi character		
Transcription in Ch.	尺	家
Pinyin	chi	jia

对比、观察上面的地图及表的彝文字体，第四本与威宁地区的字体几乎同一。同样，第五本和大方地区的字体也十分类似。虽然第五本的字体和绿阴影字群也可能有些关系，但在地图 19 和 20 上，与这两种字体同一的仍不存在其他的地方。

进而，考虑到第四本和第五本的两个文字的音值，虽然必须验证《猓猡译语》的注音基于什么地方的汉语，然后必要构拟彝文的音值，可以认为第四本的彝文很有可能是威宁地区的，而第五本的会是大方地区的。因为第四本的彝文注音“尺”可以以为送气、舌尖后及塞擦音的声母，似乎它与威宁区文字的音值[tʂhe^{33}]一致。而，因为第五本的彝文注音“家”会是不送气、舌面及塞擦音的声母，则它似乎与大方区文字的音值一致。

2.2 地理语言学分析的其他结果

以下是通过本研究得到的除《猓猡译语》之外的主要地理语言学的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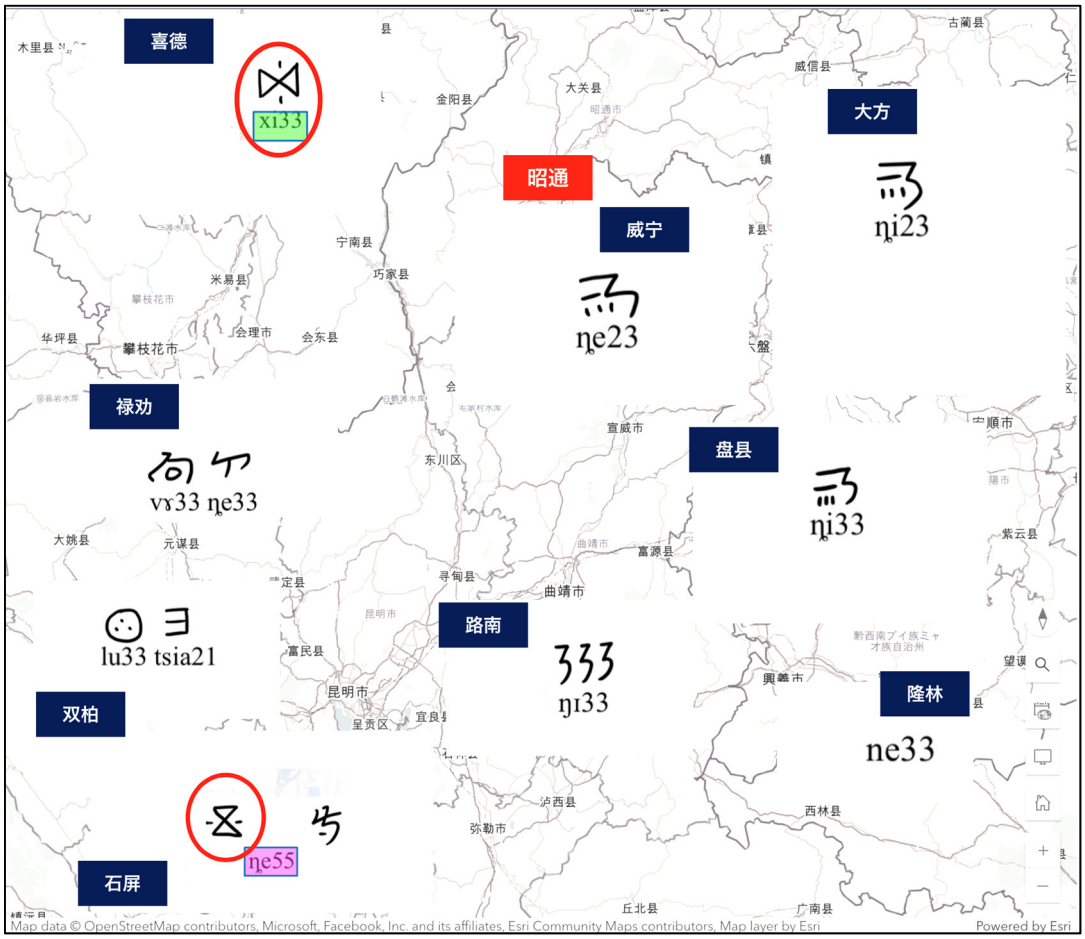
1. 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字体高类似性
2. 各个地区的特征
3. 各地造词法上的差异[15]

2.2.1 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字体高类似性

与 Iwasa (2023)提及的一样，本研究也指示出北部和南部方言的文字，虽然这两地相距较远，语言上也有不同的特征，但仍能观察到相似的字形。请参考如上地图 15，两地的文字都用蓝线条包围表示。

[15] 由于篇幅有限，细节将留给别稿。

此外，请参阅如下地图 21。



地图 21: 显示北部和南部方言之中的类似性的地图“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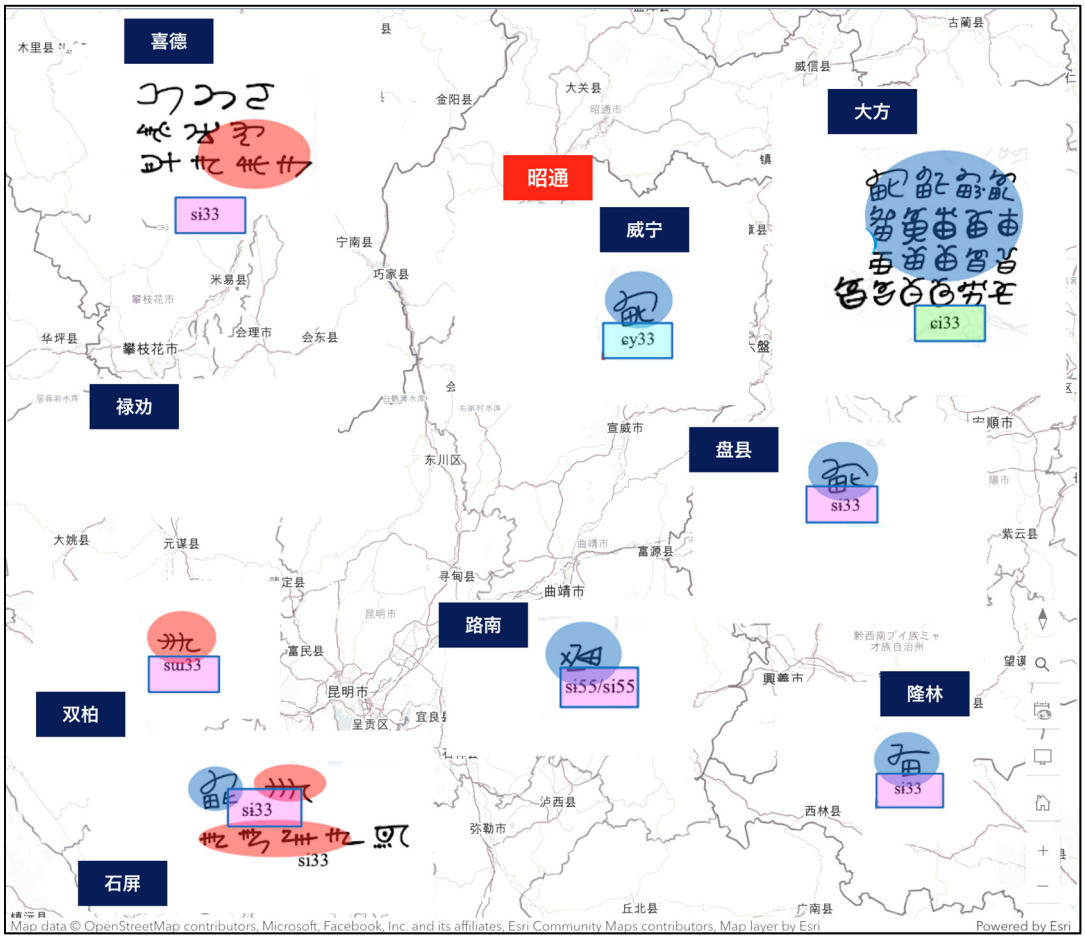
在地图 21 上，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彝文都用红线条包围来表示。重视彝文的表语性进行分析，虽然文字的方向以及音值不同，两地的文字字体相当类似。这种情况推测出边缘地区的字形可能比其他地区保留着更古老的形式。

2.2.2 各个地区的特征

各个地区的主要特征有如下三个。

1. 东部方言彝文比其他地区的趋向于稍微复杂（请参看如下地图 22）。尤其同一方言中，贵州地区的文字比云南地区的复杂程度稍高

2. 在东部方言中，贵州地区的文字变迁有与云南地区的不相同的趋势
3. 总体来说，东南方言地区的字体表示高独立性。虽然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东南部方言地区也许是一种文字“𠱁”，还是由于它的语言区分[16]与其他的方言不同？



地图 22：表示各个地区特征的地图“血”：东部方言彝文的复杂性

四、结语

如上所述，本研究表示地理语言学对于彝文历史研究有功能性。地理语言学是一种针对阐明语言历史变迁过程的学问。因此，它与彝文的历史分析有高亲和性。

[16] 关于语言区分，请参看 Bradley(2002)及地图 2。

该研究目下取得了如下结果：

- 显示各个地区的彝文特征
- 发现共同彝文
- 发现各地造词法的差异
- 关于《猓猡译语》第四本与第五本的采编地，筛选候选地点并且确定其真出处

尤其，识别《猓猡译语》第四本与第五本的采编地以及表明为其注音使用的汉语的来源，今后仍需要继续仔细地验证与分析。

附记：本研究得到了 JSPS 科研费 15J40040 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费 19K00556 的资助。在此道谢。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远藤光晓教授一直支持我的研究，并给予了我宝贵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池田巧教授、铃木博之讲师经常向我提供了难得的支助与指教，对此深表谢意。

参考文献

陈士林等 1985《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春花，李英，郭金芳 2018《清乾隆年编《华夷译语》述论》*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19, 380-396. https://www.dpm.org.cn/Uploads/File/2020/04/15/u5e96d0789ba34.pdf

故宫博物院 2018《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一册，北京，故宫出版社，5-6.

黄建明 1993《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石田幹之助 1973 [1931]「女真語研究の新資料」『東亜文化史叢考』東洋文庫論叢第 54, 3-69 東洋文庫

岩佐一枝 2019《地理语言学原理的应用－以彝文为例－》《东部亚洲地理语言学论文集》131-144.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6_eastern_asian_2019.pdf

孔祥卿 2005《彝文的源流》民族出版社

孔祥卿 2016《猓猡彝语的版本及校勘》《民族语文》2, 71-82.

栗林均 2003『華夷譯語（甲種本）モンゴル語全単語・語尾索引』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叢書第 10 号 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http://hdl.handle.net/10097/54697

松川節, 聶鴻音 2013「大谷大学所蔵『倮儸譯語』述略」『『華夷譯語（西番館譯語四種　倮儸譯語一種)』影印と研究』　大谷大学文献研究叢書 1, 23-29. 大谷大学真宗総合研究所 京都 松香堂

聂鹏 2018《《永宁属水潦译语》校释》《民族語文》3, 81-97.

聂鹏 2020 《故宫藏东川府属《猓猡译语》考论》《中國文字研究》32, 223-231.

聂鹏, 孔祥卿, 文智 2019《故宫藏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考证》《民族翻译》2, 22-34.

聂鹏, 孔祥卿 2020《大谷大学藏《猓猡译语》译者身分考－兼松川节、聂鸿音先生商榷》《文獻》5, 86-99.

西田龍雄 1980 『倮儸譯語の研究：倮儸語の構造と系統』 華夷譯語研究叢書 6 京都 松香堂

聞宥 1940《倮儸譯語攷》《華西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季刊》1(1), 77-97.

山崎忠 1953「我が国における華夷譯語研究史」『朝鮮学報』(5), 45-58.

山崎忠 1954「我が国における華夷譯語研究史補遺」『朝鮮学報』(6), 163-165.

Bradley, David. 2002.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In Christopher Beckwith (ed.) *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73-112. Leiden: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47401308_010

Coulmas, Florian. 2003. *Writing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nguistic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4597

Nie, Hongyin. 2018. Loloish dialect and script of 18th century Liangshan reflected in the *Luoluo Yiyu*.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1). 13-17. https://doi.org/10.1177/2513850217748207

Iwasa, Kazue. 2017. Mapping the Yi characters – an attempt to explore a route of their historical change and origin –. In Hiroyuki Suzuki and Mitsuaki End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Geolinguistic Method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59-67.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s://publication.aa-ken.jp/proceedings_geolinguistic_SouthEastAsian_2017.pdf

Iwasa, Kazue. 2018. *Remarks on Maps of the Yi Script Based on the Swadesh 100 Wordlis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5_yi_2018.pdf

词典类：

白显云主编 1995《彝汉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 2004《滇川黔桂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出版社

李增华主编 2014 《古彝文常用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

普璋开主编 2005 《滇南彝文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

武自立，纪嘉发 2011 《汉彝简明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编 1984《彝汉简明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

张晋智 2014《简明彝汉字典（禄劝版）》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院彝族历史文献班主编 1984《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辞典》中央民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

用残差地图呈现方言之间的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

黄河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内容摘要：山川湖海等自然地理因素以及行政边界等人文地理因素会影响方言之间的差异。本文将地物对语言地理的影响分为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本文首次通过宜兴方言地理的材料提出用残差地图呈现方言之间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的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语言系统存在内在的规则，同时也受到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影响语言地理的外部因素很多，包括了如山川阻隔等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行政边界等人文地理因素。Haag（1898）很早就指出语言边界与物理边界（physical border）[1]、行政边界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物理边界属于自然地理因素，行政边界属于人文地理因素。自然地理因素以及行政边界等人文地理因素会制约人们在地表的移动，也就进一步制约了不同地点的人群之间的交际密度（communication density），在时间的作用下塑造了语言地理的面貌。特殊的地形因素会影响一个区域的定居史，进一步影响语言地理的分布。德川宗贤（1959）发现丝鱼川根知谷坡面上的村庄的语言比山谷中河流沿岸的村庄更古老。因为河流涨水会淹没河岸边的村庄，所以早期居民定居在坡面，而晚来的居民只能使用低地。

常见的自然地理因素有山、川、湖、海，它们可能扮演障碍物（barrier）和沟通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两种角色。广阔的海洋、湖泊，难以逾越的山脉通常构成障碍物，障碍物两侧的语言通常有较大的差异。运河、河流、海岸线通常扮演着沟通渠道的角色。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古代，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加廉价方便，大宗物品都要通过水路运输。语言成分通常沿着沟通渠道扩散，沟通渠道上的地理距离较远的语言也会比较相似。有时候，同一个地物会同时在不同的方向上充当障碍物和沟通渠道，例如长江这样的大型河流，上下游方向构成沟通渠道，而长江对南北两岸会构成阻碍，因为横渡大型河流并非易事。因此，地物对语言地理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

[1] 这里的物理边界指的是山川河流等地形障碍。

相反的效应：**阻碍效应（barrier effect）**和**通道效应（channel effect）**。在特定地理距离下，由于障碍物的存在而导致语言距离变大的效应，叫做阻碍效应。同理，在特定地理距离下，由于沟通渠道的存在而导致语言距离变小的效应，叫做通道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学界对它们的讨论还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这方面的计量实证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宜兴语言地理的材料开发计量方法以呈现方言点之间的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

二、方法

2.1 材料

本文采用黄河（2017）对江苏省宜兴市 58 个方言点的语言地理调查材料。宜兴历史上隶属于常州府，今属无锡市。图 1 为宜兴市地图，南部为丘陵地带，北部为河网密布的鱼米之乡。北部的大面积水域为滆湖[2]，将宜兴北部分割为东北和西北两块区域。横亘在宜兴中部、与宜城构成东西走向的湖泊带自西向东依次是西氿、团氿、东氿。图中棕色色块为主要城镇的建成区域，最大的城市是城关宜城，其次是位于东南部的丁蜀，西南山区的张渚，东北部的和桥，以及西北部的官林。宜兴东接太湖，西接溧阳，北接常州武进，南部和浙江省的长兴县接壤。

宜兴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该材料包含 153 个语言变项，一个语言变项绘制一幅语言地图，其中包含 60 个音韵变项、17 个功能词变项以及 76 个实词变项。该材料由同一名学者按照统一的调查流程和处理数据的标准而收集，具有较高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基于该材料已经有多篇方言测量学的论文讨论各种语言地理学的问题（黄河 2022a，2022b，2024）。

[2] 图 1 由作者参考“天地图-宜兴地图”进行制作。图 1 仅仅呈现属于宜兴市范围内的滆湖南部区域，实际上滆湖的大部分水域在常州境内，是西北部吴语地区重要的大面积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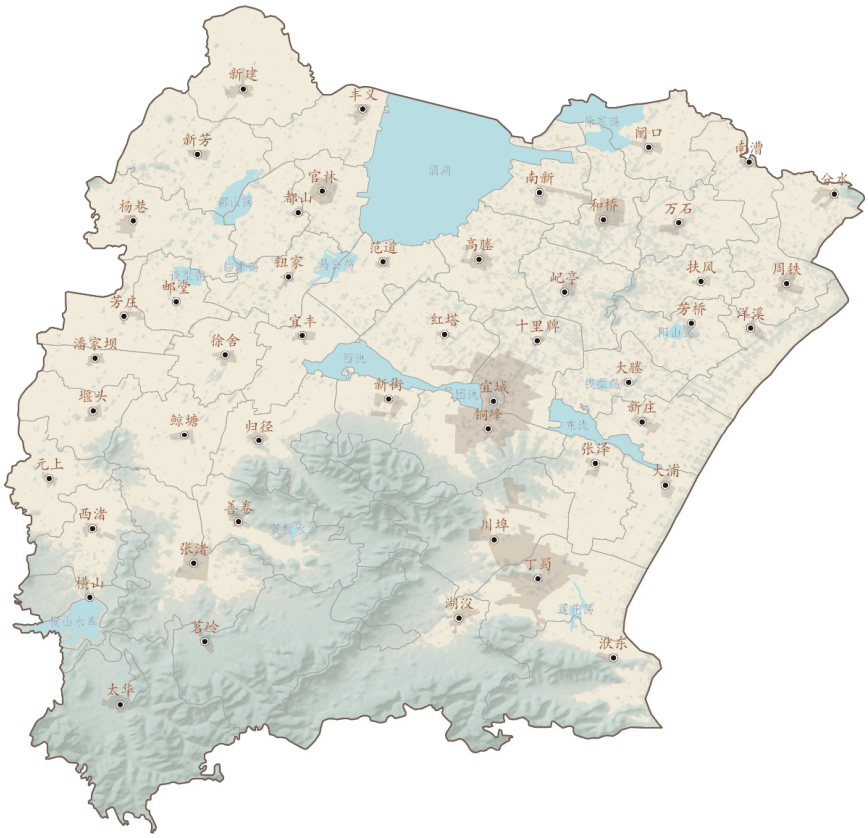


图 1：宜兴市地图

2.2 方法

方言测量学（dialectometry）综合考虑地理语言调查中所有的语言变项下的所有语言变体计算语言距离，这种方法属于集成数据分析（aggregate data analysis）。集成数据分析是分类学中常用的一种计量方法，已经在语言类型学（Greenberg 1963）、方言测量学（Geobl 1982）、多维语域研究（multidimensional register studies, Biber 1988）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最早的方言测量学研究是法国学者 Séguy（1971）基于加斯科涅语言地图集进行的计量探索，除了计算语言之间的距离，还探索了语言距离和地理距离之间的计量关系。语言距离有多种计算方法，主要的计算方法有标准化莱氏距离（Levenshtein 1965）、杰卡德加权距离（Huang et al. 2024）。莱氏距离是将不同地点的某个词的语音形式当做一个字符串，当计算任意两个方言点的两个词形的距离时，考察一个形式变为另一个形式的最小操作步数，允许插入、删除、取代三种操作，每一步进行一次操作，最后以操作步数作为语言距离。由于越长的词倾向于需要更多的

操作步数，因此，需要根据词长对操作步数进行标准化处理，故称“标准化莱氏距离”。杰卡德加权距离是基于地图集的词型分类体系开发的一种语言距离的算法，具体的算法详见黄河（2022a）和 Huang et al. (2024)。黄河（2022a）详细介绍了标准化莱氏距离和杰卡德加权距离各自的优劣。本文采用杰卡德加权距离作为语言距离的计算方法。

地理距离就是方言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地理距离有很多种定义方法，如大圆距离（great-circle distance）、步行时间（hiking time）、行车时间（driving time）等。不同的地理距离在刻画人们在地理上的交际密度时有不同的作用。不管是哪种地理距离的算法，其计算都是基于调查地点的经纬度。最简单的地理距离计算方法就是大圆距离。大圆距离指的是地球表面两点之间的球面距离。这种算法只能看做是对空间距离的一种粗略的近似，因为人们实际上不是坐飞机沿着球面航线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步行时间是衡量地理距离的另一种方式，在没有汽车、火车等交通手段之前，小范围内的往来主要依赖步行。步行和大圆距离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步行不是沿着地球球面曲线，而是只能沿着蜿蜒的道路行走，道路的实际路径受制于地形；步行并不是匀速的，受到地形的制约，平地行走最为省力，同样的长度若是上坡或下陡坡都会大大增加所需时间。所以步行时间对现实中一个地点的人们到另一个地点去交际的过程进行了更加细腻的刻画，理论上讲，更能反映不同地点人群实际的跨地交际。行车时间与步行时间类似，只是将交通工具换为汽车，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们的跨地交际更少受到地形条件的制约，它反映了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不同地点间的跨地交际成本。黄河（2022b）采用详细介绍了步行时间和行车时间的计算方法以及它们在引力模型中的应用。

本文试图通过宜兴语言地理的材料开发计量方法以呈现方言点之间的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我们已经知道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都是自然或人文地理要素对不同地点人们的交际密度的作用，进而影响了不同地点方言之间的距离。因此，侦测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需要一个基线模型（baseline），即不同地点的人们在一个没有任何起伏、没有山川河流、不存在任何地物的地表上活动。此时，地物对语言距离的效应为 0，既不存在降低交际密度而增加语言距离的阻碍效应，又不存在增强交际密度进而降低语言距离的通道效应。由于大圆距离在空间中是均匀渐变的，不考虑任何地形等因素，这一属性使得该算法符合拟合基线模型的要求，因此，本文采用大圆距离作为地理距离的测量方法。

我们采用局部加权回归（loess regression）拟合了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的关系。我们首先以杰卡德加权距离为因变量，以大圆距离为自变量，分别用局部加权回归对集成数据以及不同语言层（音韵、功能词和实词）的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线见图 2。

落在拟合线上的数据点表明这些方言之间的语言距离正好可以被地理距离预期，即上文提及的基线模型中不同地点的人们在一个没有任何起伏、没有山川河流、不存在任何地物的地表上活动，所有的地点之间的语言距离完全由空间距离的远近所决定，这些方言点之间不存在任何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落在拟合线之上的数据点表明这些地点之间的语言距离比大圆距离所预期的要大，则说明这些方言点之间存在阻碍效应；反之，落在拟合线之下的数据点表明这些地点之间的语言距离比大圆距离所预期的要小，则说明这些方言点之间存在通道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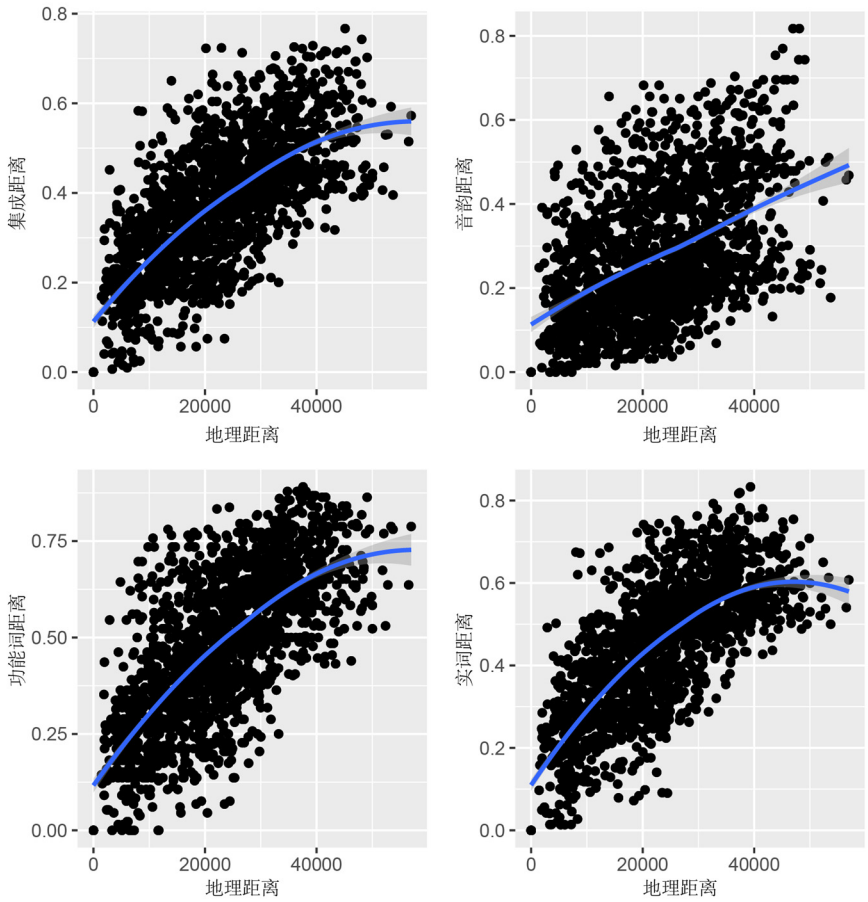


图 2：集成距离以及各语言层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局部加权拟合

对数据进行局部加权拟合后，提取残差（residuals），并根据残差的正负分为两个子集。由于图 1 每一个观测点代表的是一个地点对儿，所以我们用光束图（beam map）分别呈现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光束图用一根线连接地图上任意两个地点，通过线的

颜色的深浅表示两个地点之间的某种属性（本文为残差值）的数值大小[3]。光束连接的地点之间存在效应，光束的颜色深浅表示效应量。我们把呈现残差的光束图叫做残差地图（residual maps）。通过残差地图，我们就能知道哪些地点之间存在通道效应，哪些地点之间存在阻碍效应。由于正残差或负残差的数量很多，全部画在光束图上会呈现叠置，不利于进一步分析，因此，我们先分别求出正残差和负残差的三个分位点（quantile）[4]：一分位点（Q1）、二分位点（即中位数，Q2）、三分位点（Q3）。我们提取大于三分位点（Q3）的正残差和小于一分位点（Q1）的负残差，将其绘制成残差地图。这么做相当于呈现了最为显著的阻碍效应、通道效应。

三、结果与讨论

3.1 阻碍效应

图 3、图 4 分别是表示正残差和负残差的残差地图，前者反映阻碍效应，后者反映通道效应。首先来看阻碍效应的残差地图，图 3 中连线所连接的两个地点之间存在一定的阻碍效应，颜色的深浅表示这种效应的强弱。首先，我们可以发现阻碍效应的连线多为东西走向，这说明宜兴东西部之前存在一定的阻碍效应，宜兴本地素有“东乡话”、“西乡话”的说法，可见这种民众对宜兴方言差异的感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语言经验基础。其次，存在阻碍效应的连线集中分布在宜兴的中部和北部，而南部基本没有这样的连线，这说明东西走向的阻碍效应主要集中于宜兴中部和北部，即宜兴的东西差异在中部和北部较为明显，在南部没那么明显。我们认为造成宜兴中部和北部的阻碍效应的主要因素不是来自于自然地理因素，而是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因素。除了滆湖，宜兴中部和北部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地理障碍，却有着较大的阻碍效应；而宜兴南部存在大量的丘陵，东西片之间的阻碍效应却很弱，因此自然地理因素无法对这种效应提供合理的解释。黄河（2021）讨论了麻三字音的同言线分布，我们已经看到宜兴北部滆湖以东和以西呈现不同情况，说明常州话对宜兴方言的影响在滆湖东岸和西岸是两股不同的力量。可以佐证的是 Huang（待刊）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的结果，多元对应地图表明常州对滆湖西侧的宜兴西北角方言和东侧的宜兴东北角方言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在此，我们提出一个“阳湖-武进分路南下”的假说。常州在历史上东西二分，西部为武进县，东部为阳湖县，常州方言是东西差异较大，常州南部、宜兴北部被滆湖分割为东西两块，因此，

[3] 本文光束图中的地点连线的颜色越深表示残差值越大，颜色越浅表示残差值越小。其配色深浅与数值的关系与 Goebl (1983)的方案相反是为适应本文研究的需要，特此说明。

[4] 分位点是指用分割点（cut point）将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范围分为几个具有相同概率的连续区间。3 个分位点能将数据分为 4 个区间。

常州话对宜兴方言的影响也是“兵分两路”，阳湖县范围的常州话变体主要在滆湖以东南下，长期影响宜兴东部地区，武进县范围的常州话变体主要在滆湖以西影响宜兴西部地区。因此，宜兴方言的特征也倾向于东西分片，这种力量自北向南逐渐减弱。这个假说把宜兴方言放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内考量，可以很好地解释宜兴地理语言的格局，以及诸多语言现象[5]。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阻碍效应在不同语言层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宜兴西北角、东北角在不同语言层上的表现有很多不同。在音韵上，西北角的方言点主要和宜溧交界地带有较多的连线，在实词上，西北角主要和宜兴东部地区有较多的连线。这说明西北角方言点在音韵上和宜溧交界地方的方言有较大的分歧，而在实词上和宜兴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分歧。东北角在音韵上主要和宜溧交界地带的方言点存在分歧，在实词上主要和西北角存在分歧。功能词和音韵、实词的情况都不同，东北角和宜兴东部方言有很多颜色较深的连线，此外，较之音韵和实词，功能词在东西走向上的连线更多，这说明功能词主要体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其他方向上的差异。

[5] 本文暂且仅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论证该假说需要通盘考虑常州、宜兴、溧阳的地理语言面貌，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宜兴地理语言，该课题留待他文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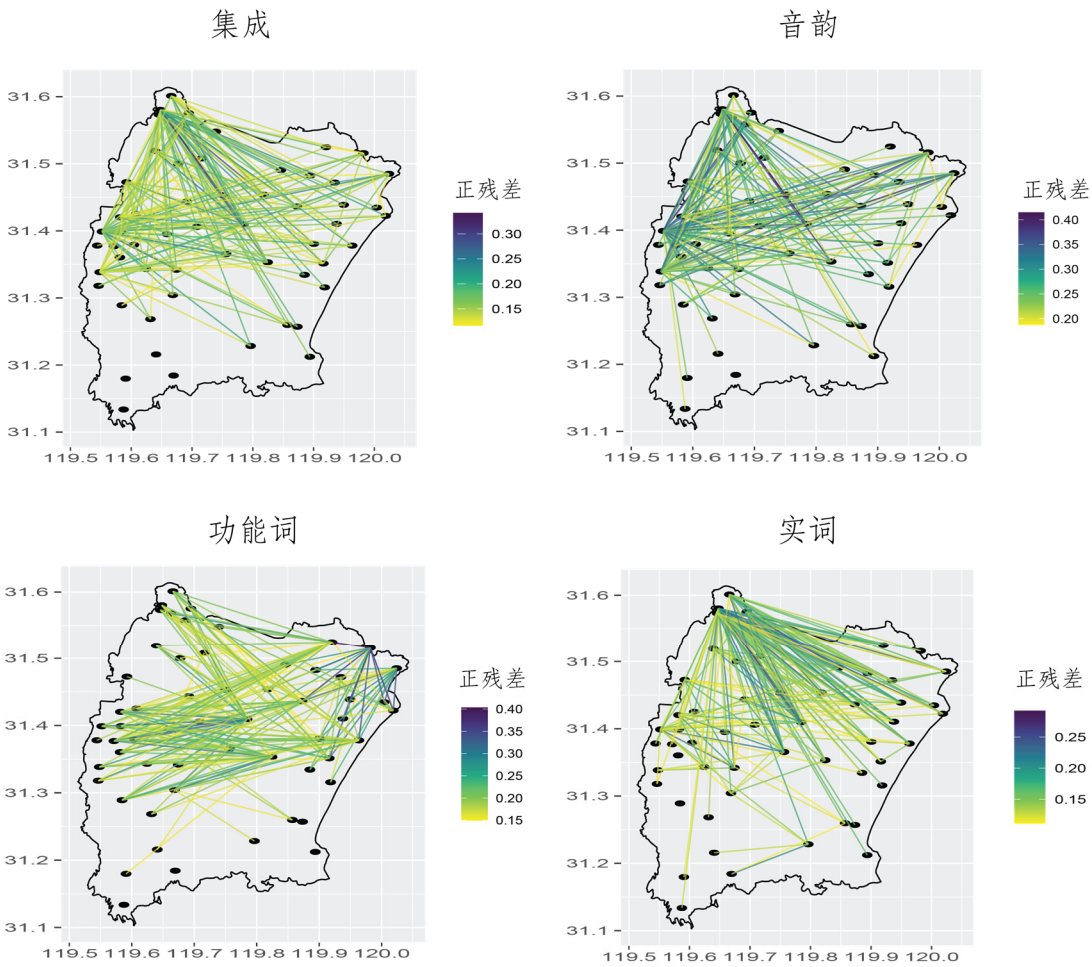


图 3：阻碍效应的残差地图

3.2 通道效应

图 4 中连线所连接的两个地点之间存在一定的通道效应，颜色的深浅表示通道效应的强弱。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通道效应的连线走向主要是南北走向，阻碍效应的走向主要是东西走向。这说明宜兴方言倾向于东西分片，东西片的南北部之间有较强的通道效应。我们还能发现不同语言层之间的差异，西北角在音韵、实词上趋向于孤立，和宜兴其他地区的分歧较大，但在功能词上西北角和宜兴西部方言有密切的联系。与之不同的是东北角在音韵和功能词上趋向于孤立，在实词上和宜兴东部方言有密切的联系。宜溧交界地带在音韵上趋向于孤立，但是在功能词和实词上和宜兴西部其他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不同语言层的差异呈现一个明显的规律：除了宜溧交界地带和西北角，宜兴其他大片区域的音韵现象较为趋同；功

能词和实词的网络明显分为东西两块，功能词东西两片的连接枢纽是西汎以北的范道、官林，实词东西两片的连接枢纽是西汎以南的新街、归径。此外，西南部和东北部在音韵上有更多的连接，但是西北部和东南部在所有语言层上的联系都不是特别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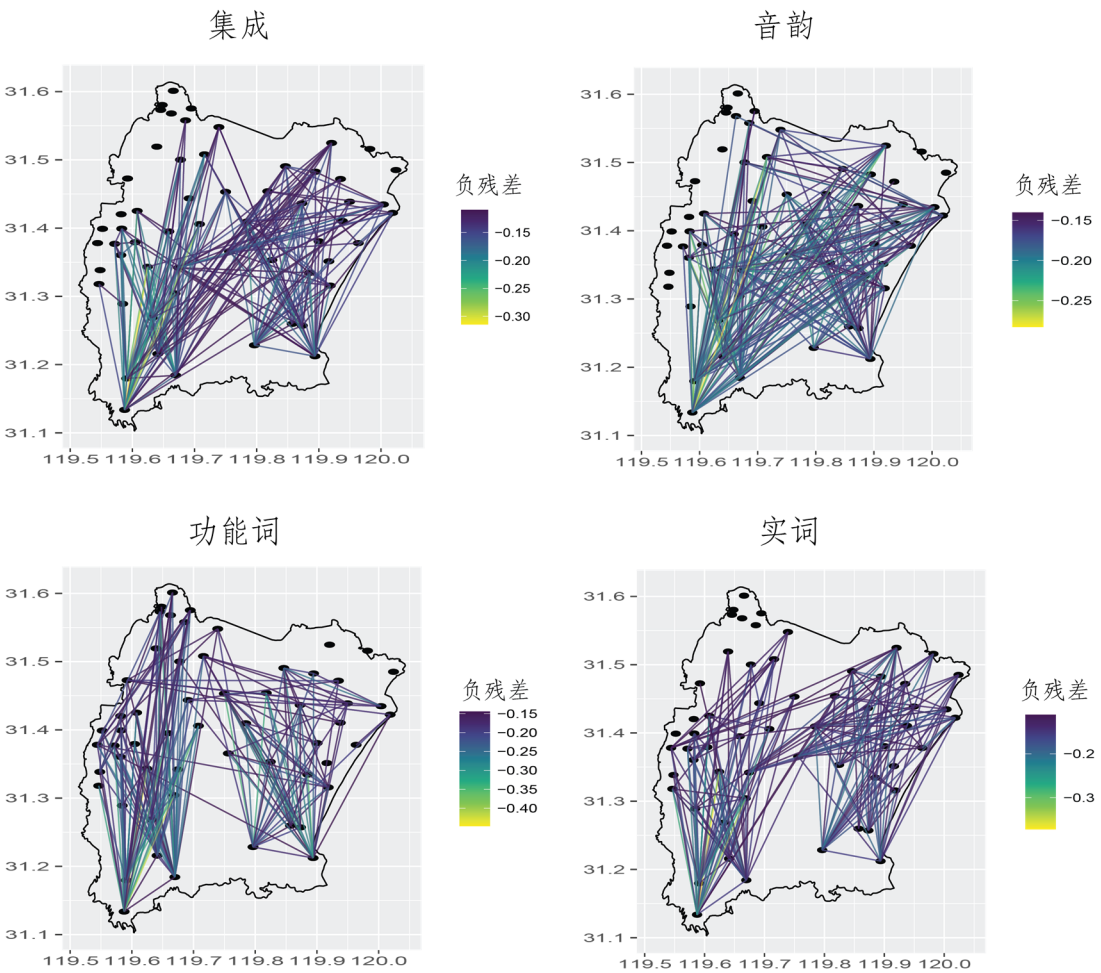


图 4：通道效应的残差地图

四、结语

本文基于宜兴语言地理的数据，通过拟合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之间的关系抽取正负残差，以绘制残差地图呈现宜兴不同方言点之间的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我们得出以下有意思的结论：（1）宜兴方言的阻碍效应主要存在于东西部之间，通道效应主要存在于南北部之间，说明了宜兴方言东西对立的地理格局，以及东乡话和西乡话内部

具有较高的交际密度；（2）阻碍效应主要集中于宜兴中部和北部，说明宜兴的东西差异在中部和北部较为明显，在南部没那么明显，我们提出一个“阳湖–武进分路南下”的假说以解释阻碍效应自北往南的衰减现象；（3）我们发现了不同语言层在阻碍效应和通道效应上存在明显的地理差异，这些差异都说明不同语言层因其“结构化程度”不同在受到语言外部因素的作用时产生不同的影响（黄河 2022a）。

参考文献

黄河 2017 《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黄河 2021 从地理语言学的视角看文白读音的势力消长，《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152-166，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https://doi.org/10.15026/116778

黄河 2022a “结构化程度”与“各向渐变性”——宜兴话的方言测量学研究，《中国语文》（3）

黄河 2022b 外部因素影响的“滞后效应”——方言的引力模型计量研究，《当代语言学》（6）

黄河 2024 历史边界对语言地理变异的影响——兼论边界效应的测量方法，《语言学研究》36 辑

徳川宗賢 1959 「カマキリの方言分布を解釈する」国立国語研究所論集 1『ことばの研究』https://doi.org/10.15084/00001718

Biber, D.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1024

Goebl, H. 1982. Dialektometrie: Prinzipien und Methoden des Einsatzes der Numerischen Taxonomie im Bereich der Dialektgeographie. Wien.

Goebl, H. 1983. Parquet polygonal et treillis triangulaire. Les deux versants de la dialectométrie interponctuelle. *Revue de linguistique romane* 47: 353-412.

Greenberg, J.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 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58-9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ag, C. 1898. *Die Mundarten des oberen Neckar- und Donaulandes (Schwäbisch-alemannisches Grenzgebiet: Baarmundarten)*. Mit Karte. Reutlingen: Hutzier.

Huang, H. (forthcoming). Identifying How Variants Shape Regional Patterns through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Brill.

Huang, H., Grieve J., Jiao L. and Cai, Z. 2024. Geographic Structure of Chinese Dialects：A Computational Dialectometric Approach. *Linguistics* 62(4): 937-976. https://doi.org/10.1515/ling-2021-0138

Levenshtein, V. I. 1965. Binary Codes Capable of Correcting Deletions, Insertions and Reversals. *Soviet Physics Doklady SSSR* 163: 845-848.

Séguy, J. 1971. La relation entre la distance spatiale et la distance lexicale. *Revue de linguistique romane* 35: 335-357.